唐礼摭遗
——中古书仪研究
吴丽娱 著
价：34.00元
NB 7-100-03544-9/K·738
查明，被告人在案发后有悔罪表现，请求法庭对其从轻处罚。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专刊》
编 纂 缘 起
将本所同仁每年之优秀论著汇为一编，公诸同好，交流切磋，乃全所几代学人之夙愿。继论文集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于2001年10月问世之后，承商务印书馆杨德炎总经理暨著作室鼎力支持，本所《专刊》甲种之第一、二部，亦喜获出版。就大体门类而言，本所《学刊》乃论文荟萃，而《专刊》则系成卷帙之著述。其间，或专著，或译著，或文献整理，或资料汇编，一言以蔽之，凡同仁论文外之优秀著述，皆在《专刊》著录范围之中。此次奉献于诸位者，乃《专》之甲种，即专题学术论著刊，一为樊克政先生著《龚自珍年谱考略》，一为吴丽娱先生著《唐礼摭遗》。二位先生之大著稿，先送京内同行专家匿名评审，然后经本所学术委员会全体委员审议，再交商务印书馆著作室复核，从而确保了书稿之质量。
日后，本所凝视学术成果之具体状况，将此一《专刊》逐年编纂下去。积以岁月，蔚成风气，以期弘扬前辈诸大师开创之实事求是学风，为繁荣我国历史科学而竭尽绵薄之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二〇〇二年九月廿三日
序

王永兴

敦煌书仪研究是敦煌学研究的重要部分。近数十年来，我国众多学者从事于此项研究，取得可喜的成绩。一般重大科研项目，须分为几个阶段进行。每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及经验，总结之，以利于进一步分析论述。此一阶段的总结，乃下一阶段分析研究的基础，其成就如此，其疏失则改正之。

近日，学生吴绪娱以其书稿见示，并索序于余。就全书的内容而言，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乃我国数十年来敦煌书仪研究的总结；另一部分，乃在总结的基础上开启唐礼研究的新途径。总结部分，著者论述详悉，读者阅之可知。我愿指出：著者首先肯定敦煌书仪数十年研究的成绩，对我国学术文化的贡献；其次，著者以谅解的态度，指出研究过程中的方法与论证的疏失，误者正之，不足者补充之，此即责人以宽也。这在我国今日学风的改造中，甚有裨益。

据敦煌书仪可研究的课题甚多，著者特重视礼制，开启研究新途径，此乃由于书仪载有礼制之文。著者指出，《礼记·中庸》称：‘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礼用以别尊卑贵贱，是古代国家维护等级秩序、宗法关系所必须，且作为国家存在的精神支柱，与用于治政的律令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唐朝国家在礼制上虽然
继承隋朝,但在太宗贞观、高宗永徽一显庆和玄宗开元中都曾数次制定新礼，唐朝民众也有重礼仪的风尚。但是礼仪是通过怎样一种方式向全社会普及的呢？……据《唐会要》卷三五记开元二十一年(年733)敕,要求‘诸州县学生,专习正业之外,仍令兼习吉凶礼,公私礼有事处,令示仪式’。这说明吉凶礼仪式既是在习学经书的正业”之外,也不是完全来自朝廷礼书。从敦煌遗书中可以发现,有关三《礼》的文献仅P.2500、S.621等数件《礼记》残卷,而唐朝正式制定的礼(书如贞观礼、开元礼等)竟一件也未见到。可见唐朝在一般民众中传播礼仪的方式,主要地不是依靠礼经和朝廷正礼的传习。那么,如何填补在礼仪普及和礼制教育方面的空阙呢?敦煌书仪的大量出现,至少部分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陈寅恪先生论述北魏孝文帝之世,汇集汉魏时期华夏民族礼仪职官等制度之三支派而为一,为华夏民族典章制度之正统。北魏传诸北齐,北齐传诸隋,隋采用南朝后期梁陈礼仪等制补益之;隋传诸唐,即贞观礼与显庆礼也。唐玄宗在位期间,本诸贞观礼与显庆礼,并多方面增补完备之,成为大唐开元礼。华夏民族数千年历史中,唐代前期为前所未有之盛世,其光辉照耀史册,此固由于前所未有的文治武功,大唐开元礼的撰制,亦其一端也。北宋开宝礼之撰制,以大唐开元礼为本,此后之金礼与清礼亦莫不如是,大唐开元礼之重要可知也。著者在书中研究丧服礼的部分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并论证了开元礼作为中古礼制定型及取代上古礼的过程,是十分有见地的论点和发现。
精神与实事求是之精神进行研究，孜孜矻矻，不息不懈，终必有成，愿黾勉为之。
第1章 月仪和朋友书仪

一、传世月仪的源流与演变
二、敦煌本朋友书仪
   （一）《朋友书仪》的内容组成及月贺仪的发展
   （二）《朋友书仪》的两种文体
   （三）《朋友书仪》中的复书痕迹
   （四）《朋友书仪》的产生地区与年代

第2章 吉凶书仪的时代特色及内容变化

一、仪注类史书中所见的书仪和其他俗礼书
   （一）南北朝时期的大族制作
   （二）史书记载的唐五代吉凶书仪
二、敦煌文献中的吉凶书仪和其他俗礼书
   1. 唐早期吉凶书仪
   2. 唐中期吉凶书仪
第 六 章  曹 氏 归 义 军 通 使  中 原 与 五 代 王 朝 的 河 西 经 营

第 五 章  敦 煌 表 状 笺 启 书 仪 的 分 类 与 特 色

(一) S. 078v 中的 “梁 王” 和 “太 保”
(二) S. 1725v 中的年代、性质

二、 敦 煌 表 状 书 仪 文 集 的 类 型 和 制 作

(一) 表 状 书 信 文 集
(二) 虚 拟 或 规 范 化 的 公 式 文 牍
(三) 附：S. 4473《后 晋 文 抄》是《李 崧 文 集》的 讨 论

一、从 P. 2945v 书 仪 论 曹 氏 归 义 军 归 奉 中 原 王 朝 问 题

(一) P. 2945v 书 仪 论 曹 氏 归 义 军 归 奉 中 原 王 朝 问 题
(二) 书 仪 性 质、内 容 的 再 认 识
(三) 灵 武 节 度 使 在 曹 氏 归 义 军 通 使 中 的 作 用

(一) “沙 州 令 公” 和 “泾 州 太 傅”
1. “沙 州 令 公” 其 人 及 于 阗 来 朝
2. “泾 州 太 傅” 的 提 前 报 告 和 谢 状 带 来 的 疑 惑

(二) 灵 武、 泾 州 地 方 权 力 的 转 换 及 五 代 朝 廷 的 河 西 经 营

(一) 书 状 的 主 人 公 说 明 致 书 者 不 是 一 个 人
(二) 书 状 的 性 质 与 撰 集 者

敦 煌 书 仪 形 式 的 总 体 演 变 与 内 容 交 叉

上 编 结 语
第七章 吉凶书仪溯源

一、古礼与家法相结合的吉凶书仪制作背景

(一) 家法的来源及书仪制作
1. "家法"一词的渊源、变化
2. 唐代的家法、家仪

(二) 家法的内涵及在书仪中的具体表现

二、朝廷礼制渗入书仪

(一) 唐前期礼的制定和书仪中的礼律
(二) 贞元、元和的礼书再兴

第八章 书仪的礼书规格及诸种程式

一、书仪的制作程式与等级规定

(一) 书仪对象和等级的确立
(二) 书范常式和写作规格

二、卑辞、敬语的使用及其改革

(一) 卑辞、敬语和书仪中的一些特殊词汇
1. 支福、支胜等
2. 蒙恩、蒙推免、蒙免、推免、推遣等

(二) "旧仪"的沿用和创新

第九章 书仪的书体形式及应用

一、吉凶书仪中的单、复书

(一) 复书在改革前后的应用范围
1. 杜氏书仪"重丧吊答"中的复书和单书

204 204 205 206 211 216 224 227 237 237 237 239 246 246 248 249 252 259 259 261
2. 其 他 吉 凶 仪 中 的 复 书 应 用

(二) 内 外 族 吉 凶 复 书 的 形 式 变 化

1. 告 哀 吊 答 书 从 繁 复 到 层 次 合 一

2. 通 婚 书 的 两 种 形 式

3. 单 复 书 的 合 流 及 与 传 世 文 献 的 比 较

二、唐 后 期 五 代 的 官 牍 别 纸

(一) 别 纸 的 来 源 和 意 义

(二) 别 纸 和 重 叠 别 纸 在 晚 唐 五 代 书 仪 和 文 献 中 的 应 用

第 十 章 官 称 与 行 第

一、官 称、官 称 别 名 的 使 用 与 官 员 敬 称 的 等 级 变 化

(一) 官 称 的 普 及 化

(二) 中 晚 唐 书 仪 中 的 官 称 别 名 和 官 场 文 化

(三) 官 员 敬 称 的 时 代 色 彩

二、书 仪 中 的 行 第 之 称 与 行 第 普 及 的 庶 民 影 响

(一) 吉 凶 书 仪 中 的 行 第 之 称

(二) “四 海 平 蕃 破 国 庆 贺 书” 的 主 人 公 和 行 第

(三) 敦 煌 社 会 的 行 第 习 俗

(四) 关 于 行 第 观 念 的 再 探 讨

第 十 一 章 官 民 婚 丧 礼 俗 仪 典 的 示 范

一、婚 礼 仪 俗

(一) 通 婚 书 与 婚 礼 程 式

(二) 婚 礼 中 的 唐 代 民 俗

二、丧 礼 程 式 和 吊 祭
第十二章
丧服制度（Ⅰ）

一、敦煌早期书仪中贞观丧服制度

1. 贞观改礼前的P.4024

   (一) S.1725与P.4024写本书仪的年代和礼“丧服仪”

2. (二)

   (三) 附：S.1725和P.4024写本书仪丧服部分录文及校释

   1. 录文

   2. 校释

二、敦煌所出杜佑丧服衣制图与郑余庆元和书仪

（一）《唐礼图》的发现及两种丧服图的渊源

（二）《丧礼服制制度》可能被郑余庆书仪收入的推测

（三）《丧礼服制制度》的图说特色及其与现实的关系

（四）附：P.2967卷《唐礼服制制度》的录文和校释

1. 录文

2. 校释

第十三章
丧服制度（Ⅱ）

一、敦煌P.3637《新定书仪镜》中丧服图年代质疑

（一）丧服图服制与开元礼的差异

（二）丧服图服制的年代问题

（三）《新定书仪镜》中丧服新制的来源

二、唐五代服制的总体发展与中古礼的定型

（一）唐宋之际丧服制发展再回顾

（二）礼的发展与唐人的观念变革
贺谢诸仪的降格与普及

1. "三《礼》" 和 "五礼"
礼经与史部仪注之学的分合同异

2. 礼则的渐变与疑古非经

(三) 唐五代的 "正礼" 与 "时俗"

三、附：唐前期丧服改革中的帝王意志与北朝风习

1. 唐太宗朝舅服和嫂叔服的改革缘起
2. 高宗朝的甥服增制和玄宗堂姨舅服之兴
3. 母服舅服的改制和 "恒代遗风" 的延续

第十四章 表状笺启书仪和官场仪制

一、从敦煌书仪中的表状笺启看唐五代官场礼仪的转移变迁

1. 敦煌书仪与传世文献所见的笺表制度
2. 唐前期的笺表制度
3. 唐后期五代笺表制度的变化

二、唐后期五代中央与地方的礼仪交接

1. 节度刺史的入朝朝参与上事中谢
2. 拜官中谢
3. 礼钱、台参和上事诸仪
4. 关于 "櫜鞬三仗" 和 "廷参" 的一点补充

5. 马在中央、地方礼仪交接中的作用
6. 外官的凶事吊赠及辍朝、起复之制
中 古 礼 制 的 分 期 与 书 仪 的 礼 书 内 涵
下 编 结 语

1. 吊 祭 使 的 派 遣 和 辍 朝

2. 起 复 优 典 的 对 外 执 行

三、客 将、客 司 与 客 省

（一）客 将、客 司
藩 镇 的 礼 仪 职 司

1. 客 司 和 客 将 的 出 现

2. 客 司、客 将 的 典 客 之 责

3. 客 司、客 将 的 出 使、交 接 之 职

（二）客 省、客 省 使

1. 客 省 与 客 省 使 的 设 立、发 展

2. 客 省 和 客 省 使 的 对“内”礼 仪 之 务

3. 客 省 使 的 五 代 特 色

4. 五 代 客 省 使 的 外 交 职 能

附 录：敦 煌 书 仪 写 卷 目 录

附 表：

1. 敦 煌 吉 凶 书 仪（内 外 族 书 仪）比 较 表

2. 敦 煌 晚 唐 五 代 吉 凶 书 仪（吉 仪 配 比）统 计 表

3. 史 籍 所 载 唐 五 代 表 状 笺 启 类 文 集 书 目 表

4. 单 复 书 形 式 统 计 表（一）: 杜 友 晋《吉 凶 书 仪》内 族 凶 书 仪

5. 单 复 书 形 式 统 计 表（二）: 杜 友 晋《吉 凶 书 仪》外 族 凶 书 仪

6. 单 复 书 形 式 统 计 表（三）:《书 仪 镜》与《新 定 书 仪 镜》

内 外 族 凶 书 仪

7. 敦 煌 曹 氏 女 供 养 人 行 第 表

8. 中 古 服 制 变 化 表

后 记
书信从一般的意义理解，是书信的程式与范本。关于书信，古人“有尺咫之书”说①，又有尺牍、书疏、笔札、刀剳之类的多种名称。《文心雕龙·书记二十五》解释书道：大舜云：‘书用识哉!’所以记时事也。盖圣贤言辞，总为之书，书之为体，主言者也。从记事记言的角度来说，一切公私信函都是书，而书信的频繁正是来自人们交往的增多。《文心雕龙》论此以“为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并举多例证明春秋交聘之际书辞多被翰墨，及战国特别是两汉以后笔札尺牍辞气纷纭的情况。唐敦煌杜友晋《新定书仪镜》P.3849)引黄门侍郎卢藏用《仪例一卷》议论也称书疏之兴，其来自久。上皇之世，邻国相闻，人至老死不相往来，则无不贵于斯矣。降及三五，迄于汉魏，宪章道广，笺记郁兴，莫不以书代词，因辞见意。《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盖书之滥觞也。可见书仪的产生是随着时代文化的进步，而与笔札书疏之：

①见《汉书》卷三四《韩彭英卢吴传》颜师古释发一乘之使，奉咫尺之书”曰。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简牍或长咫，或长尺，喻轻率也。今俗言尺书，或言尺牍，盖其遗语耳。"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872页。
盛不可分的。

书札的制作本是为了互通往来,表达人们的心曲,所谓古之作者尝不因言而见志,至于执讯之还往,尺书之问遗,皆所以导素蕴而陈嘉诲者焉”。在文士的笔下却异彩纷呈”:观其扬搉理道,论叙今古,内罄于悃愊,外影于藻翰,意趣周密,采章英发,使人三复而不能自释于手。故史氏所载,非以为繁文,后学之徒,竟漱其芳润者已”。但是汉魏以前,尚未见有教人写作的书仪类著作流传《。汉书·艺文志》所记的奏议辞章类书,一概“以篇”为名如《公孙弘十篇》,并按诸子百家排列。这说明至少在东汉以前,尚无书仪或类似文集存在。书仪的大量创作,应当是在世族社会和重文之风业已形成的魏晋以降。可以知道的是随着公私书疏的大量使用”,工尺牍”和善书翰”愈来愈受人们的重视,已逐渐形成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或体裁,即有“尺牍”之学,并和善辞赋”、博学善属文”一起,被视为一种值得称道和效法的文学修养。而此种学问修养又首先为经学传统深厚的世家大族所具备,成为世族所“具仪表”之一,也被视为士人立身之专能。

尺牍文翰的修养与世家大族的交友之道及优美辞令相结合,于是有月仪的产生;与世族礼法结合,于是有吉凶书仪;与表章书檄等朝廷官府公式文牍结合,于是有表状笺启书仪文集。此三种书仪是魏晋以迄唐五代所见最多的书仪类型,敦煌写本书仪也正可以从此三种类型中找到依据。由于三种类型的敦煌书仪均由前人作过整理,所以本编将根据需要分类列叙书仪的渊源、发展及演变过程,并从中发掘其形成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

变化规律和影响书仪内容架构的社会历史原因。虽对个别书仪的年代史实有所涉及,但重点是结合唐史对书仪的整体内容作系统性考察。另外凡本编及本书所用书仪名称和录文,大都采用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和《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除个别有异同处,一般不再作特别说明。对于所引用书仪或传世文献中的明显阙字,以[]注明,有异同、改误或补充说明者(加),有疑问者(加?)。
第一章 月仪和朋友书仪

在已发现的敦煌书仪中，有一种被定名为《朋友书仪》。虽然同类书仪只有内容大同小异的十多个写本，但其形式与传世文献中的月仪却一脉相传，属于同一系统，代表着敦煌三大类书仪中的一类。对于这种书仪，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那波利贞曾进行。此后，周一良先生和赵和平对书仪的渊源、形式及内容分类等，又进行了十分深入的探讨。笔者这里只是在前人基础上，对月仪的制作发展以及朋友书仪的结构、文体、书体变化和产生年代、制作等问题再进行一些分析和探索，以求对这类书仪的认识更加准确。

一、传世月仪的源流与演变

在传世文献所记各大类书仪中，以月仪出现的年代最早。月礼考据，那波利贞《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第一编《唐开元天宝之交为一时世转变期的考证》，创文社，1974年，第72—75页。②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二）》，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20—37页《书仪源流考》，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以上二文与赵和平《敦煌写本〈朋友书仪〉残卷整理和研究》，并收入《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此外台湾学者郭长城有《敦煌写本朋友书仪试论》，载《汉学研究》四卷一期，1986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专号。
仪是朋友间往来书信，以十二个月为编排，专叙节候景致及朋友之
情。据周一良先生考证，此类著作至少可以上溯至西晋大书法家
索靖的《月仪帖》。《月仪帖》今存传世法帖及录文，在十二月中均
缺四、五、六月份而不得窥其全豹。见于记载的又有《初学记》卷
四《岁时部下·元日第一(》《太平御览》卷二九《时序部》同)所引王
羲之的《月仪书》。《隋书》卷三二《经籍志》经籍部小学类与东汉蔡
邕、孙吴项峻著作之下注明“有《月仪十二卷》，亡。”由于是与《劝
学》、《幼学》、《始学》一类童蒙教育课本排列在一起，所以最初的月
仪大约是作为普及知识读物出现的。

晚些时期的此类著作有北宋以来流传的《锦带书》，题为昭明
太子萧统或梁元帝萧绎撰。另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真草两
体《唐人月仪帖》一件，内缺正月、二月、五月三个月份。日本藤
原佐世著《日本国现在书目录》卷一八仪注类提到“有《月仪》四卷，
许敬宗撰”，及不著撰人名“的月仪类的著作以月为序，表现朋友情怀。魏晋以降，它们的创
作者多是具备深厚文学素养的世家大族，如《南史》卷五九《任昉
传》记任昉“四岁诵诗数十篇，八岁能属文，自制《月仪》，辞义甚
美”。月仪讲究文辞优美，但是不同时期的月仪也有其不同的形式
特点。

以《全晋文》卷八四著录敦煌大族索靖的《月仪帖》为例，其正

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二)》《书仪源流考》；载《唐五代书仪研究》，第
72、94页。

②周一良《：书仪源流考》；载《唐五代书仪研究》，第94页。

③影印唐人《月仪帖》及任政《唐人〈月仪帖〉简介》；载《书法》1985
年第4期，第2—11、25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月一首称：
正月具书，君白。太蔟布气，景风微发，顺便绥宁，无恙幸甚。隔限遐塗，莫因良话，引领托怀，情过采葛。企伫难将，故及麃麃，俱蒙告音。君白。表问，信李君白。

濯景，山无由皓之隐，朝有二八之，四表清通，俊乂盛。斯诚明珠耀光之高会，鸾皇翻翥之良秋也。吾子怀英伟之才，而遇清升之祚；想已天飞，奋翼紫闼，使亲者有迩赖也。

此书仪从形式看分为上下两通，两通首尾皆“具 君白”，对照敦煌书仪中列举的单复书体格式不难发现，这件书仪采用的是一书两纸的复书形（式详下）。两通内容前后呼应，实为一首，这是魏晋以来流行的一种书体形式，与单体书信是并存的。

索靖《月仪帖》每月上半首均采用四字句式，四字句的兴起在骈体文之前，它最早的代表作是《诗经》。汉魏以降，四言诗虽多被五言取代，但在各种文作中仍有大量运用。汉赋中无论是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抑或是张衡的《两京》《归田》，都间杂有成段四言的描写。而魏晋时代除了曹操的《短歌行》《观沧海》，嵇康的《送兄秀才从军》等一类诗篇脍炙人口外，文章书信也多有用四言的，如曹丕的《与朝歌令吴质书》“以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的一段情景追忆，叙朋友情怀，全用四言。直至南朝陶宏景的《答谢中书书》，虽已属骈俪文，但他简短清丽的文字不

①《六臣注文选》卷四二，中华书局，1987年，第785—786页。
仅存魏晋遗风，且从头至尾叙写景致“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等美妙文句也由四言组成。

最早的月仪可证也是用四言的。除了索靖《月仪帖》之外，《日往月来，元正首祚；太学记》卷四所引王羲之《月仪书》“攀告辰，微阳始布；罄无不宜，和神养素”，即是四言。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唐人月仪帖》虽然并不用复书体，但句式仍然相同。其书每月一帖，月份另行标出，“如三月孟春”一首道：“芳信远临，还同面叙。枝文解封，（命企？）望成劳。言散未期，咏情何极。方今啼莺转树，戏鸟萦林，柳絮惊飘，花飞乱影。对斯节（维唯）叹恨繁怀，仅附寸心，希垂尺素。”文字工丽，虽已有骈俪色彩，但基本不脱四言。

月仪类著作最初作为童蒙课本，用四言有其简洁易诵的一面，月仪帖按其风格，似乎也应是唐初或唐前期的作品。另除此件月仪帖外，日本正仓院还藏有一件《杜家立成杂书要略》。此件书仪日本学界定为唐初杜正藏所作，“它包括三十六组书札，每组一题，如‘雪寒唤知故饮书’、‘贺知故得官书’、‘就知故乞粟麦书’、‘呼知故游学书’、‘同学从征不得执别与书’等，皆附有答书。体裁以四字句为主，先结合季节寒暄，再进入本题”。这种有来有往的体裁，虽然并非按月编排，但周一良先生指出，“日本内藤湖南氏认为此书属于《月仪》之类的书仪，是正确的”。书仪所谓的“知故”、“同学”证明其中的书疏仍然是用于朋友之间，可见得朋友性质的书仪是有用四言的。

但是索靖《月仪》的下半通句式已有变化，如正月者即转为对

①《全梁文》卷四六，中华书局，1985年，第3215—3216页。

②周一良《书仪源流考》，载《唐五代书仪研究》，第103—105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仗和四六骈偶之文。九个月之中，除少数一两月之外大都如此，可见一首之中上下文体已不尽相同。据周先生文中指出，清人姚鼐曾怀疑《月仪帖》是否出自索靖之手，甚至辨其文字亦非西晋人所撰，不过姚氏的证据并不充分。今以文体句式而论亦是如此。四言者多为魏晋人所用，四六骈体则盛于齐梁。但索靖书仪中的骈体尚不甚典型，且与四言交互用之，它所体现的似乎是一种渐变。骈体的发展虽盛于齐梁，但始于魏晋，与索靖同时代的陆机、潘岳已有此类作品。《全晋文》卷九六陆机《思归赋》节运代序，四气相推，寒气肃杀，白露沾衣。嗟行迈之弥留，感时势而怀悲。绝音尘，如与索靖于江介，托影响于洛湄等句《月仪》相比，文风已有颇多相似之处。因此《月仪帖》应如周先生所说，文字本身，恐怕仍出于晋人之手。

侧重或者完全以骈体书写的月仪大概还是在齐梁以后出现的。北宋以后流传，题为萧统或萧绎撰的《锦带书》，史家或认为是伪作，但在文体方面却甚典型。《全梁文》卷一九昭明太子《锦带书十二月启》：

伏以景逼徂春，时临变节；啼莺出谷，争传求友之音；翔蕊飞林，竞散佳人之靥。鱼游碧沼，疑呈远道之书；燕语雕梁，恍对幽闺之语。鹤带云而成盖，遥笼大夫之松；虹跨涧以成桥，远现美人之影。对兹节物，宁不依然。敬想足下，声驰海内，名播云间，持郭璞之毫鸾，词场月白；吞罗含之彩凤，辩囿日新。某山北逸人，墙东隐士，龙门退水，望冠冕以何年；鹢路颓风，想簪缨于几载？既违语嘿，且阻江湖，聊寄八行之书，代申

①《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二）》，中华书局，第2011页。
书启叙景抒情,铺陈异常华美,比索靖《月仪》更多用笔墨,而其中又夹杂用典。下面将要讨论的敦煌《朋友书仪》,其前十二首即继承了这样的风格。这种风格的出现,说明自南北朝至隋唐,四六骈文的书仪也已流行起来,且与四言体并用,成为一种更常用的文体形式。

二、敦煌本朋友书仪
《朋友书仪》是敦煌典籍中唯一与月仪形式、体裁相类的书仪。根据赵和平录校整理的这件书仪现存十三个编号,其中最长的是S.5660,存三百行左右,但上端齐头缺字,据其他写本看,每行缺7—8字。十三个写本,大致分三个钞写系统,文字不尽相同,说明版本可能不是一个,但按月编排的形式内容基本一致。由于其中的S.6180有书题“朋友书仪一卷”,故此得名。对于这件书仪,除了前人已作工作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探讨。

(一)《朋友书仪》的内容组成及月贺仪的发展
《朋友书仪》虽属月仪系统,但与前述索靖《月仪帖》及《唐人月仪帖》有不同。它的内容有两项。第一项“伺秋夏[春冬]年月日”,伺“似可同于辨,意为分辨、区分,即按年、月、日、四时、十二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月分别罗列相关套词用语。这些用语基本采用正文下双行夹注的形式，看得出是纂集了各种书钞。如释年诸语明显是出自《尔雅》，四时十二月即按《礼记·月令》孟、仲、季的时序划分，有些用语如赵和平所说，还看得出与《初学记·岁时部》和《太平御览·时序部》所引《梁元帝纂要》用语相同，但对于出处并无详细说明，可见只是简略的杂钞性质，其应付实用的目的甚明。

传世本月仪见不到有与《朋友书仪》相同的这项内容。但年月季候用语正是配合每月的月仪而使用的，十二个月的月仪必须根据时序描写景致，这就有了纂集用语的需要。从敦煌文献可以得知，包含此项内容的并非只有《朋友书仪》，不少吉凶书仪中也在“年序凡例”的部分列入相关用语。同类内容是不是吉凶书仪从月仪中吸收，并不能肯定，但有趣的是，早期的吉凶书仪和后来者在这方面也有繁简之别

唐早(期武则天时期?)的一件吉。如P.3900凶书仪中，即叙述最详。它的特点是在有关月候的词语下引述史书的各种记载。如“九月季秋”“在亦云暮秋、徂秋、九秋、三秋、杪音十五日已前云渐冷，眇秋、末秋、秋末、秋晚、十五日后云(暮)甚冷。秋□、穷秋、悲风、凄风”等形容文字下即引有《礼记·月令》《、淮南子》《、风土记》《、续晋阳秋》诸书关于九月霜降、季秋及九月九日折茱萸等各种说法、习俗等。全文引书还有《尔雅》《、晋阳秋》《、易纬》《、列子》《、孔丛子》等多种。这种采“用合本子注”方式说明季候的情况不多见，但是显得比较规范。然而到了S.6537v郑余庆《元和新定大唐吉凶书仪》，“其年序凡例第一”的写法即与《朋友书仪》完全一样了，此后的吉凶书仪在这方面也只简不详。可见详引书文有可能是初唐以前一种传统的作法，后来书仪偏重实用便把这一作法省略了。我推测早期月仪如“有(辩)年月季候也是这样的，原因是敦煌本李翰《蒙求》也
采取同一注法。此书采用四言八字句，两两相对，每句都由典故组成。注文解释典故出处，引用大量史书。李翰虽是唐人，但《蒙求》亦为童蒙读物，与上述《隋书·经籍志》所载为一类，故很可能参照南北朝以前的旧例。总之《蒙求》的作法也许可为一旁证，“辨别”年月季候是许多古典经籍常见的内容，《朋友书仪》只是将它们集中了。

十二月相（辨别）文”分两组，每组以十二月份相排，月各一札，俱是道朋友契阔、思念之情。第一组十二首，首除按《礼记·月令》以孟、仲、季作别外，还要标明上、中、下旬的不同用语。例如二月仲春”，上旬云
渐暖，中旬云较暖，下旬云已暖，极暖；夹钟。末尾的“夹钟”即相当仲春，夹钟是音律之一，以十二音律排行十二月，是《吕氏春秋》《淮南子》等的作法。传世索靖《月仪帖》即采取了此种方式，如三月“称三月姑洗”，八月则“是八月南吕”。从这个上、中、下旬全然包括的注释，可以知道每月的书仪是可以用在不同时间的。

第二组十二首月仪在时间上更具体一些，如三月“称季春极暄”，知是指三月下旬；四月“称孟夏渐热”，知是指四月上旬。但这只是每月试举一例之意，意为写景用词要与季候相符，并不是规定了应在某月某时给朋友写信。

给朋友的书信用不着规定时间，每月设一仪大概只是为了叙情写景的方便。但是在第二组十二首月仪中，“和季春极暄”、“孟夏渐热”一起，几乎每首都“有不审体内如何”之语。这是一般的问候平安语，规定用于亲朋之间，与给祖父母、父母的起居仪略有区别。这一区别可见于P.3442杜友晋《吉凶书仪》。其内族凶书仪中《祖父母丧告答父母伯叔姑书》“不审尊体起居何如”句“起居”下，注“云伯叔姑不用起居字”；《伯叔祖父母丧告答祖父母父母姑书》同一句“起居”下，也注“云姑不用起居字”，可见“问起居”只能用于父母祖父母，而不能用于其他亲属。这种规矩大概也是魏晋就有，如《全晋文》卷二六王羲之一帖问朋“友不审尊体比复如何”而不称起居如何大概就是履行这一旧规。

按关于“起居”一词用法，周一良先生早有论述，他引《通典》卷五二上陵条“旧制每年四季之月，常遣使往诸陵起居”，及唐绍上疏“自天授以后，时有起居，因循至今，乃为常事”语并李匡乂《资暇①《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二）》，中华书局，第1609页。
《集起居条》以说明起居二字“由候起居”省去候字而直作动词用由。
事实上起居之意本为动止,如起居郎、起居舍人之职就来已久
②是记天子言动,而候起居或问起居就是问好问平安,它的来源大
概是起自家庭内子弟对长辈的晨昏定省。晨昏定省是问安问起
居,出门在外或与父母尊长不住一起时,也应写信作同样的事。不
过问父母起居只是礼仪上的需要和说法,与问其他亲属和朋友平
安的意义并无不同,并且专为问候朋友平安的书式还见于杜氏书
仪” 的 四海吉书仪五首”,内中《与极尊书》《与稍尊书》都“有 孟
春犹寒,不审尊体何如”类语,只是不叙情怀,但问寒温而已,内容也
较月仪或《朋友书仪》简单。
一般的问起居或问平安恐无所谓时限,民间亦无不见面就一
定要按月问起居之说,但风俗总是朝野相互影响的。可以知道的
是百官对皇帝的候问起居如同朝见也已逐渐形之制度,并发展成
真正的月贺起居或月旦起居。据《世说新语·雅量第六》“记 顾和始
为杨州从事,月旦当朝,未入顷,停车州门外”,可“见 月旦当朝”晋
代早有制度。唐初令式或许是沿袭前朝,所以才会有类似制度并
有月旦上起居表之说《。 大唐开元礼》卷一二九《嘉礼》内 群臣奉
参起居”条,规定仪式是文武百官九品以上 俱集朝堂”,在奉礼郎
和通事舍人赞引下 通起居”,行再拜之礼。但皇帝出京或外官不

①周一良《: 敦煌写本书仪(考 之一)》,原载《 敦煌吐鲁 中华书番文献研(究 一)》
局,1982年。此处引自《 唐五代书仪研究(》 文有增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第58—59页。
② 《 唐六典》卷“八 门下省起居郎之职”条,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48页。
③ 《 唐会要》卷二十六《 笺表例》开元十一年七月十五日敕,国学基本丛书本,第
505页。
这大概就是后来月上起居表的由来。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对皇帝有月贺起居表，开元以后的吉凶书仪和表状笺启书仪反映所‘谓“起居状”也已与贺官书结合起来。如P.363《新定书仪镜》内《重贺官书》“有‘于起居状’名蒙恩’之下云：‘伏承公简自圣心，特沐天恩加荣命，下情不胜喜悦’这种起居(状启)在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中被规定‘在（寮属）起居第六”‘与（典吏）起居第七”。其文只“有‘孟春犹寒，伏唯官位尊体动止万福。即日某蒙恩，限以卑守，不获拜伏，下情无任惶惧，谨奉启起居不宣。谨启某月某日具官衔姓名启”之类的套话，与前揭杜氏书仪中《与极尊书》相似。至于与祝福加官进爵结合起来的月起居状在P.3931《灵武节度使表状集》、P.409《新集杂别纸》、P.3723《记室备要》等表状笺启书仪中都可以见到。P.3931《灵武节度使表状集》有从《正月贺》至《十二（月贺）》的十二首贺词，这些贺词的特点是用诸“如‘伏以淑景初临，和风渐扇，柳含青翠，花坼芳新’”‘伏以玉露移音，铜壶继刻，花散园林之色，萍生池沼之新”一类和月仪一样形容月景时候的词语，加“上伏惟厶（官或尚书）望美官常，德光圣世，乘兹令序，用纳休徵”’‘伏唯厶官，德比冰霜，材同梓漆，属此妍韶之美，以期授爵之荣”等颂扬德政、祝福加官的吉庆话。同样《记室备要》也有从《贺孟（月春）》《贺仲春》直到《贺季冬》的十二月仪，每月都列举贺仪多首，形式与P.3931相类，这类贺仪在《新集杂别纸》中被标明“为月旦贺官”。很明显，其中月叙节候景致是陪衬，重点则是贺官起居，它们与《贺正冬》、《贺重阳》、《贺端午》一类的名目一起，已发展为官场酬应中的一种常见形式和重要内容（详本书第十四章）。
《朋友书仪》的两种文体

《朋友书仪》的十二月相(辩 辨)文部分包括两组十二月仪。将两组月仪加以详细比较，可发现它们并非是同一形式的简单重复。就内容而言，它们固然显得前详后略；而就文体而言，它们也非属一种。其中前一组月仪语多俪偶，是典型的四六骈文，每首写法大同小异。以三月为例：

上旬云已暄，中旬云甚暄，下三月季春，旬云极暄。姑洗。自别相思，情怀夜月，恒恋妖质，念积金乌，愁飞气而添云，泪垂珠而益露。想缠绵于往日，等合韵之笙竽；情缱绻于昔时，似和音之琴瑟。谁谓(珠 朱)颜一别，(开 关)河隔万里之欢；玉貌(蹔 暂)分，边塞起千山之恨。

王景妻嘱旧时花颜，托梦里而申交；昔日翠眉，嘱游魂而魂千里相迎。送喜。

想上官清夜游园，命琴公而共酌；良宵对笛，感跃鲤而飞潭。马融吹笛，孟(常 尝)家养跃鲤飞听。客数千人。

筵宾不羡于孟(常 尝)，屈友岂殊( 惭?)于赠缟。追车命驾，谁[思]兰桂之交；敦契投欢，岂念建丰之友。某乙悬心塞外，驱役于边州；积念思乡，凄骤于戎舸。流襟之泪，谁为申裁；慷慨之情，岂能(潘 判、攀)割？娇莺百(转 啭)，旅客羞闻；戏鸟游林，羁宾赧见。三春泽雁，不附行书；九[夏]江鱼，元无受信。

这首书仪显而易见是四六句式的骈俪文。南朝齐梁之际发展起来的骈文特点是对仗工整，文风旖旎，且最擅用典。而《朋友书仪》的骈体文同样优美，铺陈景致，婉转叙情，用典亦多，说它有齐① 驱役"及 凄凄骤骤"两词原皆有重复符号，"作 驱驱役役"、凄凄骤骤"，此处以文意改。
前十二首书仪每首还多有答书，答书却用四言。三月答书曰：

期信远，劳。聚会无临，还同面叙，披文敬想，企望（诚？

期，情恨何极。方今游蜂绕树，戏蝶萦林，翠柳摇风，杨桃影烂，对斯节纳，叹逾何穷。仅附丹诚，申素何悉。

答书可以看出格式用词，基本是抄《唐人月仪帖》的。同样，后十二首书仪也用四言。以“正月”一首为例：

正月孟春犹寒，分心两处，相忆缠怀，思念往还，恨无交密。初临新节，贺庆乾坤。风影云调，寒光渐发，犹霜罢（未？

冷气侵人，万物含春，同敬晖藋。

孟春犹寒，伏唯不审体内如何？某乙虽同乡邑，阙奉经旬，节岁以来，（未？

由庆奉。连襟接袖，不许分张；杯酒同交，怨生离别。某乙聊题拙意，略附单行，更欲多言，心缠怀萦。

除“伏唯不审体内如何”一语和时“加某乙”之外，从头至尾，书仪以四言句完成。四言的特点是简练铿锵，音节顿挫，它同样可以非常优美（也间有对仗），故也是月仪或《朋友书仪》常用的体裁。

敦煌《朋友书仪》即反映了这样的两种体裁，这也是它书分两组的用意所在。不过《朋友书仪》将四六体置于四言之前，从文字和内容的描写也可看出，重点是在此部分。它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唐代特别是唐代中后期，骈体文的运用在某些书仪中是具有愈
来愈重要的地位。例如敦煌所见大量表状笺启书仪多是骈体书仪，唐中后期善作表状笺启的，如令狐楚、李商隐辈也都“是今体”即骈体大家。因此尽管唐中期提倡古文运动，但并没有改变书仪用骈体的趋势。重视文采的月仪或《朋友书仪》尤其如此，与此趋势也是合流的。

另外，尽管在文体上《朋友书仪》继承前朝月仪，但在语言上已有差别。特别是后一组十二月仪，在文辞的典雅方面远不能与前面相比。有些话“如离情已久，意念驰深”、“分袂既久，思念缠怀”，于唐人书仪常见，是习用语；有些“如今因使次，发语皆[昏]，莫生耻笑”出言俚俗，说明这件书仪在制作时语言作了较大的改造，它的通俗性实用性更突出了。而文字通俗化和内容更加实用化也是唐人书仪在南北朝基础上的一个新变化。关于这一点，自然还牵涉到唐代总的文体风格及文字发展问题，非本章所宜通论，此处即不再作过多叙述了。

（三）《朋友书仪》中的复书痕迹
《朋友书仪》的前一组十二月仪基本采取一月一书，每月兼有答书的形式。第二组月仪无答书，写法似乎也有些不同。如果注意一下，可发现上引正月书仪有两“处孟春犹寒”，原卷在第二处前并有空格与前部文字分开。从其划分的情况看很像是一月两首，但是书仪本身对此并无说明。同样的形式也见“于二月仲春”、“三月季春”、“四月孟春”和“七月孟秋”，虽不是十二月的全部，但也有相当数量。

采取以上形式的书仪是不是一月两首呢？以正月为例分析，发现内容并不重复。前“孟春犹寒”下结合节候，铺写景致，道思
念之情，后“孟春犹寒”下“伏惟不审体下如何”一语致以问候，再叙朋友契阔，并用“某乙聊题拙意，略附单行”作最后总结。因此，从上下关系和总的内容来看它们更像是一首书信而非两首。而如将这件书仪与其他敦煌书仪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于某一类型之下罗列多首的情况虽然并不少见，如P.3723《记室备要》下卷《贺孟（月 春）》《、贺仲春》等十二月贺下每月即有多首重复，但是每首都有叙节景，用词用语虽可变化且程度不同，内容却相似，无前 后之分，更无这种承上启下的情况。那么，为什么同件书仪要用两处“孟春犹寒”且上下分开的形式呢？对照传世及敦煌其他书仪，笔者以为，这种形式其实是魏晋以来传统“一书两（纸 或多纸）”的复书遗存或变体。

关于复书，赵和平根据杜友晋《新定书仪镜》已指出它的存在，并总结“出 古今书仪皆有单复两体”、“诸仪复书皆须两（纸 或两纸 以上）”且复书月日在前，单书月日在后”，且复书尾语在中等特，本书下编对此还要作点详细论述。这里只说明，复书作为一种体现敬意、规格较高的书体形式，不但被证明可以应用在吉凶书仪，而且大致从魏晋时起，也出现在月仪之中。仍以索靖《月仪帖》为例。正像本书上面已经过录的《月仪帖》的每首月仪有着开头语不尽相同，而结书尾语却完全相同的两段文字。对此，周一良先生认为“是一月两通”，并分析“一通开始是带有标题性的‘正月具书，君白’，接着结合月份说一些有关气候的寒暄话，再进入正文，如阔别叙旧之类，末尾又以‘君白’结束，君字是用来代替人名的。①

① 赵和平《新定书仪镜》题解，载《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371—375页。
另一通的性质，则是对前者的复信。"但是根据我们的认识，这种"月日"在前，结书尾语"在中"（即"君白"重复出现）而实分两纸的情况，正是典型的复书。其"中君白"按惯例也是信首自称的名白之误钞索靖《月仪帖》是复书，还可以从它的内容说明。试析《月仪帖》两纸，其上纸大多为叙时景寒暄及遥思朋友之情，下纸则夸赞朋友境遇才德或再叙朋友契阔。两纸转折自然，内容毫无重复而是各有侧重，与其认为是对答不如说是上下呼应，因此两纸实应合为一首。敦煌《朋友书仪》所列上述书函，已"无月日名白"在首及结书尾语在中典型形式。但是，标明月日时候"的正月"仍是在前，两"处孟春犹寒"似乎也代替了原来两纸开首语的重复，而内容分层次的写法犹有原来《月仪帖》的遗风。因此《朋友书仪》中虽然消除"来复书"的标志，但仍保留了它的某些基本特点，从这种情
况，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复书的痕迹。传世索靖《月仪帖》和敦煌《朋友书仪》复书形式及其遗迹的出现，证明月仪类的书仪魏晋以后也是使用过复书的。特别是《朋友书仪》是在四言体部分保存了这种痕迹，对于魏晋传统的继承更有说明意义。这个复书后来当然完全转变为单书，诸如《朋友书仪》的前面十二月仪，明显即是完全的单书。这种单书还见于前揭《锦带书》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唐人月仪帖》。单书内容与复书其实区别不大。由于月仪的写法是借
景叙情，情景交融，总少不了由写景到怀念友谊、夸赞朋友的套式，有些还要转叙自己的委屈，这些在单书复书中都是同样的。例如索靖《月仪帖》常“遥想足下”一语，以转入对朋友现状的揣测；这在《锦带书》便“敬想足下”，而在《朋友书仪》中则改成“想上官”云云。可见虽不以复书分上下，但仍有相应的词语示转折，这也许是复书变化中留下的又一种痕迹。

《朋友书仪》的产生地区与年代

根据《朋友书仪》单纯叙写时景和表现朋友情怀的内容，赵和平提出这件书仪是唐早期甚至是初唐的产物，并且有可能是目录书记载的许敬宗之《月仪书》；但是早先日本学者那波利贞也曾根据书仪中相关地理环境的记载提出过作者是“出身于今山西省而到甘肃地方去任官的人”的推测。那么，究竟是如何呢？仔细考察书仪内容，不难发现敦煌的《朋友书仪》相对传世书仪别有特色。其前部的十二月仪是重点，它大量增加了与边塞风土有关的描写，几乎首首都有诸“但厓异边城独叹，柳室孤嗟”，“分颜两地，独凄怆于边城”，“曏乙离家弃梓，远役边州；别于枌榆，遐赴碛石，荒庭独叹，收泪思朋”，“谁谓珠颜一别，河隔万里之欢；玉貌暂分，边塞起千山之恨”，“他乡迢递，羁旅难申；边境彷徨，将心无处”，“又沙漠路远，土广人稀，石碛三重，迥无分店”，“曏乙边荒忧悒，在蓬径而想思；塞外情凄，寄沙庭而忆念”，“边城桃李，花开失色之人；塞外萍莲，叶切散离乡之客”，“离家迢递，隔关岭之胡乡；桑梓枌榆，阻山岩之虏色。衣随戎变，语逐羌夷”之类语句；仅凭这些即足以知道书仪的主人公是一位远役塞外而生活境遇很不如意之人。更重要的是，书仪还透露了这...
位主人公具体的地点和身份。十二首月仪提到丰州、灵武者不下六、七处之多，"如飞砂走石，蓬转云间，永绝（紟 衿）于胡域，去飞沉于灵武"，且兰山四月，（由 田？）结冷而霜飞；灵武三春，地乏桃花之色，"灵武沙碛，地迥归书；疆部风尘，绝游家信"，河边媚柳，接胜地而连阴；灵武浮萍，（牧 收？）金花于紫水。黄河北接，地带建安；怀远西临，山连兰岭。故丰州之乡阙，新昌镇之旧都；长河入榆塞之关，遥泻接天津之浪。特别是丰州又常与胜州、灵武连称、对称：（大 大衍）望丰州之乡邑，地多运（暮 募？）之营；看胜部之川原，（此 北）连烽（戍 按以下似少二字）。

丰州地多沙碛，灵武境呈风尘。东西多泽柳之陂，南北步丰灵之路。书仪中提到的一些小地名也证明与丰、胜和灵武有关。如上引文中"有黄河北接，地带建安，怀远西临，山连兰岭"句，建安据《元和郡县志》卷四灵州灵武县，本汉富平县地，后魏破贺连昌，收胡户徙之，因号胡地域。天和中于此州东北置建安县，隋开皇十八（年 598）改为大润县，仁寿元年改为灵武（县 601），移入胡地域安置，知为灵武县旧名。又怀远据同卷是在灵州东北，隔河一百二十里，本名饮汉城，赫连勃勃以此为丽子园。后魏给百姓，立为怀远县。兰岭则书仪其他处也写作兰山，即贺兰山。在灵武县西九十三里，其山与河东望云山形势相接，迤逦向北经灵武县，正是所谓山连兰岭之势。至"长河入榆塞之关"的榆塞，不用说是指胜州的榆林关①，而新昌镇之旧都"的新昌镇可证是关内的旧地名②。

①《元和郡县志》卷四胜州榆林县，中111页。②《隋书》卷二九《地理志》灵武郡迴乐县"记后周置，带普乐郡。又西魏置临河郡，开皇元年改临河郡曰新昌，三年郡并废（"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13页）；又《元和郡县志》卷四灵州"记后周置迴乐县，枕黄河（"中华书局标点本，第93页），疑即书仪所说新昌镇。
同样，书仪七月一首提“到乙配北连横岭，龙泽南接温池”中的温池，也是地居灵州的盐池。这就进一步说明，书仪主人公所在是地处北国风光的关内道丰州、灵州之地。至于主人公的身份也可以从书仪得到进一步的解释。上面的引文，已说到他“是离家弃梓，远役边州”，信中又“有想上官游之晋地”、“想玉貌于尧都”、“想上官晋庭独步”、“虽复横飡鱼水，留犹寻晋地之风”，及“丰州土地与晋邑不同”等语，说明主人公家乡和朋友所在，是晋地、晋庭、晋邑；此三者“与尧都”结合，唐代专指河东，即今山西之地，说明书仪主人公的家乡是在河东。与此相应书仪主人公还自“称<Myth>乙长在蓬门，少亏庭训，孔丘之言(唯乖)习，马融之语阙寻，在生不解安身，遂使离乡远役”，是感叹自己出身低微，读书又少而无由仕进，不得不背井离乡去服役。另一封书又有“但谔家(之乏)衣缨，长居兵役，别平河之南运，骤西武之般输”，“谔”字的意思是直言，也就是说不掩饰因家庭贫苦而从军的情况。这“里平河”者见于《元和志》卷四关内道胜州榆林县“，黄河，西南自夏州朔方界流入……平河水，首受黄河，隋文帝开之以通屯仓。”自平河载仓粮货物入黄河往朔方，属向南的一段，故称“南运”。“西武”者无考，颇疑即指沿河套西向运入灵武，或指灵武在西，总之都是在关内道。书仪中提到与船和水有关的地方特别多。例如“积念思乡，凄骤于戎舸”“，兰蓬绝径，芦苇侵天，唯舟行人，能不凄怆”，说明主人公是长期生活在船里的人。戎舸就是大的军用船只，而且“从南运”到“西般”，可知他是在关内道从胜州到灵武从事水运的一名运卒或运输小吏。书仪的主人公即它的作者，或者是作者虚构的授书人。无论如何，能够表达上述深刻感受的，至少是有着边疆生活经历的人。
这是一种特定的生活环境和感受,完全不是凭想像能得来的。据作者所说自己家庭贫苦读书不多的生活经历,他最多是个小知识分子,而既不会是世族子弟,更不会是像许敬宗那样的朝廷大臣。据《旧唐书·许敬宗传》,许敬宗是杭州新城人”,其先自高阳南渡,世仕江左。"曾为秦府十八学士之一,一生多在朝为官,从无被遣西北的经历。何况身居贵位,如何会以役卒口气作书仪;既是世仕江左,更不会"对晋庭"、尧都"有如此独钟之情。因此,关于书仪产生地和作者的看法笔者基本同意那波利贞的意见,只不过认为作者的身份可能更低一些。

书仪的作者既然不是许敬宗,而是一个远在边疆、身服兵役之人,那么其作品写于何时呢?这一点,从书仪关于丰州、灵武的相关描写中已透出一些信息。

首先,作者将丰州、胜州与灵武相提并论,说明书仪必须是作于三者行政、军事有连带关系之际。胜州据《元和郡县志》是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始置榆林关,二十年才立胜州,贞观二(年619)灭梁师都,三年仍隋旧理置胜州"。时以柴绍等破灭匈奴,夺得河南之地",因置州,以决胜为名。"灵武即灵州,唐太宗时置灵武都督府。丰州则据《元和郡县志》、新旧《唐书·地理志》,也记为隋文帝开皇三年置,后废,唐贞观四年突厥降附,置丰州都督府",不领县,唯领蕃户"。贞观十一年废府,地入灵州。二十三年,又分置丰州。书仪的时间应在二十三年重置丰州以后。但这时丰州置军很少,与灵武关系亦不显著。那么,丰、胜二州何时与灵武结成密切的军事实体呢?与此有关,书仪提到"丰州地多沙碛,灵武境内风尘,黄河带九曲之源,三堡接斜川之岭"。黄河带九曲之源",当指河套地区,"但三堡接斜川之岭"的三堡"是指哪里呢?《资治通
景龙二年(708)三月，丙辰，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张仁愿筑三受降城于河上。三受降城即东、中、西三城。据胡注“中受降城在黄河北岸，南去朔方千三百余里，安北都护府治焉。东受降城在胜州东北二百里，西南去朔方千六百余里。西受降城在丰州北黄河外八十里，东南去朔方千余里。宋祁曰：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灵武，东城南直榆关。”结合《元和郡县志》卷四等记载，知中宗景龙二(年 708)所置三受降城俱在河套地区，它们毫无疑问即是书仪所说“的三堡”，且此三城之筑与防突厥有关“时突厥默啜尽众西击突骑施(婆娑?)葛，仁愿奏请乘虚夺取漠南之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首尾相应，绝其南寇之路。”三受降城的建立，首次使关内道北部与灵武的防御连为一体“。以拂云祠为中城，与东西城相去各四百余里，遥相应接。北拓三百余里，于牛头、牟那山北置烽堠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掠，减镇兵数万人。”开元中，朔方节度使建立《。新唐书》卷六四《方镇表》：“(开元)九(年 721)，置朔方节度使，领单于大都护府，夏、盐、绥、银、丰、胜六州，定远、丰安二军，东、中、西三受降城。朔方节度以灵州为中心，使关内道北部诸州诸军与三受降城的战略防御系统更加固定化。而书仪关于三堡和烽戍的记载，表明它写成应在这个防御系统建立之后，至少，不会早于景云二年(711)。其次，三城的建立之所以能构成朔方边境对突厥的战略防御，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军事供应与水陆运输的结合。这就是开元中朔方道水陆运使的设置。据史料记载和学者考证，这个朔方道水陆运使在开元二十年代的初期是由胜(州 榆林郡)都督府兼掌，但此后不久，即改称六城水运使且由灵州都督府长史 朔方节度使兼领了“六城”。唐后期又为五城，六城、五城具体所指虽说法不一，但是从灵州沿黄河北上，向东折经丰州、三受降城，然后仍由黄河南流入胜州、振武军的运输路线和地域却是可以确定的。这之中丰州、胜州作用很重要。敦煌P.2507《 开元水部式残卷》记胜州“有转运水手一百廿人”《。 唐会要》卷八八《 盐铁使》“称 近在丰州界”的胡落盐池”，每年采盐一万四千余石，给振武、天德水运官健”，即充分说明了它们与水运的联系。

黄河水运是供应朔方军需的一条重要路线。这一点，唐前期后期始终如此。之所以形成这条路线，正是由于关内道的置军和防御依赖于河东的供应《。 新唐书》卷五三《 食货志》称”：初，度支岁市粮于北都，以赡振武、天德、灵武、盐、夏之军，费钱五、六十万缗，泝河舟溺甚众。”《 新唐书·食货志》所说“的初”是指建中以前的情况。此后德宗宰相杨炎虽有屯田丰州之议，并在宪宗元和初，曾由代北水运使韩重华于京西置屯田，但水运并未因此罢废，使职的设立也只是名称有变。所以唐前期后期不仅关内的粮食物资很大程度是来源于北都”，即运输人员也多来自河东。如《 开元水部式》的胜州水手，即规定“均出晋、绛二州”。

①丸桥充拓：《 唐代后期的北边财政以度支系诸司为中心》《，东洋史研究》55卷1期，1996年，第35—74页。
再三再四地表达“对 榆 晋地”、“晋庭”的怀念，以及自述“平河南运”、“西武般输”的经历，都可以证明这种联系。弄清了军输和水运的关系，使书仪中的某些说法便显得易于理解。特别是书仪明确指出：“望丰州之之乡邑，地多运（暮 募？）；看胜部之川原，北连烽戍；兵旗遍野，戎马朝嘶”。‘运暮’或认为是‘连幕’之误”，“连幕”虽然也可以通，但作为诗文对仗而言，一句中不应出现两个‘连’字。更何况结合丰、胜之地在阻挡外敌及承担水运方面的特殊贡献，那就如‘暮’改‘为‘募’”，运募之营作为招募的运卒营地理解，从而与烽戍连接，呈现一幅‘兵旗遍野，戎马朝嘶’的战争图景就显得更加顺理成章了。

问题是，唐代的朔方丰、灵之地作为边境，其战火纷飞的情景并非只是一时，唐前后期都曾有过。那么，具体到书仪制作应在哪一时代呢？仍然应当结合水运来探讨这一问题。《开元水部式》规定来自胜州的水手取勋官充，不足兼取白丁，并二年与替。其勋官每年赐勋一转，赐绢三匹、布三端，以当州应入京钱物充。其白丁充者，应免课役及资助，并准海运水手例。不愿代者听之。‘勋官充水手是色役性质，白丁则是代役，所谓准海运水手例，就是‘宜二年与替，不烦更给勋赐，仍折免将役年及正役年课役’，并且按屯丁给帖丁例，每年给以二千五百文资助。这种情况与后来不同。《唐会要》谓唐后期胡落池要‘供营田水运官健’。官健是招募的雇佣兵、职业兵，已不是色役或代役性质。书仪主人公是来自晋地也即①按《史记》卷二八《封禅书》，汉高祖枌榆乡人，初起兵，祷祠于枌榆社。

枌榆指代故乡。《文选》张衡《西京赋》：‘岂伊不怀归于枌榆。’后遂以
河东，并且几次提到自己"离家弃梓，远役边州"，"悬心塞外，驱役于边州"，还"有塞外风尘，伤金河之役士"语①；说他是从役的白丁固有可能。但是，根据书仪主人公又自"称但谔家(之乏)衣缨，长居兵役"及"乡役士，长悬胜府之忧，宁远行人，镇抱丰都之恨"的情况，知主人公的身份还是一个为衣食而来"的行人和长期服役的兵员。这"里榆林县和胜州，宁远，则据《元和郡县志》卷四天德军八到"谓"西取宁远镇(故胡)落盐池，经夏州至上都一千八百里"，知也是天德军之下、位于丰夏之间和胡落池附近的军事重镇。所以，如果上面"对运暮"是"运募"的理解不错，则主人公作为雇募者的可能性似更大一些。至少"运募"的出现，说明书仪制作的当时已有招募来从事运输的官健。根据史料记载，唐代兵制向募兵制的长从健儿转化正是自开元、天宝时开始，开、天之际对外多征战，西北烽戍无一日不警，且唐朝廷这时已开始从战略的防御转入大规模的拓边，迫切需要有大量运输人员，而书仪以运卒、运募的身份、口气作书，所描述"兵旗遍野，戎马朝嘶"的战争场景也似乎与当时的形势相合；另外，从书仪某些语言文字与格调的优美动人，还是可以看出与唐前期风格的接近，所以，书仪的初制成很有可能是在开、天时期。当然如考虑到书仪称灵州多为灵武，则如将它置于重新改州为郡的天宝中也许更可靠一些。
以上,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这里将书仪的初制作年代暂定为开、天之际。但是,我们也不否认这件书仪还有随着时代变化被加以改造的可能。因为一个事实是这件书仪的写本多在晚唐五代,这就说明,至少它的流传直至五代。那么,为什么这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唐前期甚至是唐以前风格的作品,会在晚唐五代流传呢?

这就涉及到书仪的制作问题。关于书仪的制作,前辈学者如王重民先生已指出书仪随时代礼俗而变迁,故诸家纂述,不能行之久远的问题①;周一良先生则根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八录宋胡瑗撰《吉凶书仪》“称其书略依古礼,而以今礼书疏仪式附之”,认为随着时代的进展和社会风习的变化,即使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各时期流行的书仪也不相同。书仪必须随着社会礼俗作相应调整,才能实现和完成它的社会功能,这是书仪制作中不断变化的原因。

至于书仪的变化,则首在于它的类型。根据前人考证,在各类书仪中,以月仪发源最早,此后综合性的吉凶书仪发展起来,也吸收了月仪的内容。唐代后期吉凶书仪内属于官场酬应方面的内容膨胀,于是逐渐独立为表状笺启书仪。宋代以后,制作表状书仪的政治意义消失而衍为形式化,又出现了专门文牍式的书仪,每种书仪类型不同,则占据主导地位的时间亦不同。
月仪存世甚少,且在新旧《唐书·经籍志》已无记载,说明单纯性的月仪在各类书仪中,是最早退出历史舞台的。但是,以月仪为根基的敦煌《朋友书仪》却能够使用到晚唐五代,这种情况,无疑与书仪自身变化有关。我们知道在敦煌书仪中,有一种是从京城或中原地区传入,其中有不少是名家之作,如杜友晋《吉凶书仪》、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就属于这类作品。但是《朋友书仪》不完全是这种情况。这是因为一方面,它的制作(者)或拟的授书人)是身在丰、灵之地的黄河运(卒、小吏?),则书仪本来不是敦煌本地产物而是由关内传来;但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有抄袭和改造的痕迹,这就使得《朋友书仪》成为一种形式借鉴前人内容却有更新的混合产物。例如上面已经说到前十二首书仪中三月答书文字与《唐人月仪帖》基本相似,其余各月答书相对照也是如此,说明答书是照抄了《月仪帖》而稍事修改。又如本文上面所引第一组“三月仲春”一首,文辞美丽,且多用典,确乎很有南北朝或唐初书仪的文风;但是,诸“如某乙悬心塞外,驱役于边州;积念思乡,凄骤于戎舸。流襟之泪,谁为申裁;慷慨之情,岂能判割”之句,不但与上“想上官清夜游园”气氛相去甚远,与下“之娇莺百啭,旅客羞闻”也格格不入。同样,“四月孟夏”一首“且桃无散锦,花飞王母之园;柳园新(妆),叶落陶潜之室”之下也接上“了又沙漠路远,土广人稀,石碛三重,迥无分店”,显得不伦不类。这分明是在钞写前人书仪的同时增加了有关边塞的描写。

可以证明这一点的还有书仪的版本问题。赵和平的整理已说明13个写卷系统、来源不一。日本近年又发现有《朋友书仪》断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0

这件断简形式类似前述写本中第二组十二月仪,尚存简三、四、等整理本对照,虽不

五月残文。与赵和平据S.5472、S.5660乏文字相同或文意相近之处,但也有一些变化。如断简第2行三月下“今省经远”前本同处“是某乙有经王事”;第11行四月“下况在官司,情怀抱恨”,前本则“是况在异域,能不思念,中心遥遥,未蒙延屈”;同时第9—10行又“有田农至重,不可失时”一类关系农事的词句,与前者描写的边关生活不同,显示出作者所处生活环境的差别。整理者据此提出这是《朋友书仪》更早期的中原版和原版,也即《朋友书仪》还有被人从中原版修改为西北地方版的过程。可

见,经过这样的改造《,朋友书仪》就已不是简单地表达朋友情谊的月仪,而是一件文辞既优美,且能表达万里役卒心情的边塞书仪了。

正像晚唐时期一些表状书仪的作者常常不是达官贵人而是藩镇掌书记一样《,朋友书仪》的作者也不再是世家子弟而是一个有役在身、或是因家境贫寒充“当运募”的小知识分子。惟其如此,这件书仪在边境军士中也才会有广泛的应用和流传。

当然这只是就一般情况推测。我们知道唐中后期由于官僚社会和官场生活对唐人的影响,所以表状笺启书仪的制作和需求最大。表状笺启书仪是用于各级官吏之间的公私文牍,它最大的目的是官场酬应和求官求迁,实用性强,但非表达感情之作,无一般的交流之用,特别是对下层的军士而言。但后者并非不需要。丸山裕美子《静岡县磯部武男氏所藏敦煌·吐鲁番资料管见》,日本《唐代史研究》第二号,1999年6月,第16—20页。
《五代史》卷一八《敬翔传》载敬翔曾“因与人为笺刺，往往有警句，传于军中”才得知于梁太祖。唐后期书信流行四六骈体，四六骈体又称今体，李商隐体，如刘禹锡就“今体文章，复多才丽”也是特擅今。骈文的书写体章奏，“而俪偶长短”知名天下者需要一定功力，这在后来表状笺启书仪的制作中已很突出。朋友书仪适应现实需要，用骈文反映边塞军人的生活实际和思想感情，可能是它获得欢迎和推广的又一原因。

最后，再具体研究一下《朋友书仪》使用的地域范围。上面已谈到这件书仪是边塞书仪，但它产生的具体地点是关内道的丰、灵之地，也就是关内沿边诸州。关内与陇右相邻，大中847—859年以后，归义军收复敦煌，恢复了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与朔方的联系也更密切了。特别是五代梁唐政权例以灵州节度使兼领沙州，曹氏归义军更须通过灵州节度使的帮助请命中原朝廷。这样，狭义上针对丰、灵地区的《朋友书仪》，广义上便扩展到了包括敦煌在内的西北边陲。它流传至敦煌或者因此更加容易。事实上，晚唐五代流传于敦煌而出自灵武的书仪不止一种，如P.3931《灵武节度使表状仪》、P.2539《灵武节度使书状集》等都是。它们与《朋友书仪》不属一种形式，制作时间似乎也稍晚一些，但传播时间却都相同。它们可以证明晚唐五代之际关内外的沟通及中原文化对敦煌的影响始终在继续。不过《朋友书仪》作为月仪体裁的单独存在却有特殊意义。它在基本继承月仪的文学形式同时，增加了适用

①《旧唐书》卷一六○《刘禹锡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210页。
②参见《旧唐书》卷一九○下、《新唐书》卷二○三《李商隐传》；分见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078、5793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对于地方的新内容，从而制作角度、使用对象完全有别于当时流传的其他书仪，作为中原文化与西北边塞特色结合的产物，《朋友书仪》无疑是成功的代表。
吉凶书仪是史书中所见第二大类书仪。根据目前的整理，这类书仪在敦煌文献中约有二十余种，八十余个卷号，时代从唐初到五代；既有从中原地区传入者，又有敦煌及附近地区模仿、收集中原原制作者，品类、内容十分丰富。由于传世文献中唐以前吉凶书仪皆已不存，故敦煌吉凶书仪的发现甚为宝贵，对有关书仪的研究尤为重要。

吉凶书仪以社会生活中常用之吉凶礼仪和相关礼文书式为出发点，不但涉及家族内外，也涉及四海、朝廷和官场等不同社会层面，从而在发展上，上承朋友书仪，下启表状笺启书仪，包罗万象。因此，它被前人确认为综合类书仪，但在史书目录中，仍因其礼书性质被归在史部仪注类。由于此类书仪多已经整理，并由前人对年代、内容作过较充分的论证和介绍，故本书将吉凶书仪的研究主要放在礼仪方面，这里只是总结前人所论而略加补充，并对不同时期内容制作的变化作些讨论。
一、仪注类史书中所见的书仪和其他俗礼书

礼仪之所以称为礼仪, 可以将它分为原则精神“的“礼”和具体操作“的“仪注”两部分。习惯上除了作为三代礼书的《周礼》《仪礼》和汉儒的《礼记》及相应研究著作之外, 历朝各代官私所修的此点请详见礼书大都被作为仪注类史书的本书下编关于丧服礼的探讨。不过, 吉凶书仪与南北朝齐梁以后的官修五礼不同, 它们大体属于私家所修俗礼书范围, 并和其他一些俗礼书一起, 在指导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实际的作用。从南北朝到隋唐, 吉凶书仪多为大族官僚的作品, 所以尽管是俗礼书, 对于社会的影响却绝不在正礼和朝仪之下。在这方面, 各种史书目录和传世文献记载已可说明。

(一) 南北朝时期的大族制作

周一良先生曾指出《隋书》卷三三《经籍志》史部仪注类记有书仪类著作约十二种: 内外书仪》四卷, 谢元撰《书仪》二卷, 蔡超撰《书仪》二十一卷, 谢朏撰《宋长沙檀太妃薨吊答书》十二卷;《吊答仪》十卷, 王俭撰《书仪》十卷, 王弘撰《皇室仪》十三卷, 鲍行卿撰《吉书仪》二卷, 王俭撰《书仪疏》一卷, 周舍撰《书仪》十卷, 唐谨撰《妇人书仪》八卷《僧家书仪》五卷, 释昙瑗撰。这十

① 以上书仪《书笔仪》撰者谢朏《旧唐书·经籍志》作谢朓, 周一良先生已证明是谢朏之误。《妇人书仪》《旧唐书·经籍志》作唐瑾撰。又鲍氏书两唐志皆作《皇室书仪》, 唯新“志” 行卿“作 衡卿”, 并参见《书仪源流考》注释②, 载《唐五代书仪研究》, 第105页。
二家书仪，保留在《旧唐书·经籍志》的开元书目中，尚有王俭、谢朏、鲍行卿、唐谨四家。《新唐书·艺文志》除此四家外，又有谢允《书仪》二卷，谢允或是谢元之误，但书名、卷数皆不合。此外《周书》卷三十二《唐瑾传》谓唐谨撰《新仪》十篇，是即《隋书·经籍志》所记《书仪》，而新志将《妇人书仪》也记作唐谨撰，不知是否有误。这些书目宋以后的目录书已不见，说明彼时已失传。

从题目看以上书仪，并不能完全得知内容。但《经籍志》史部仪注类是历朝各代所修官私礼书，书仪被列入其内，作为礼书的意义是很明确的。其中王俭的《吉书仪》和《吊答书》如合观则涵盖吉、凶两者，谢元的《内外书仪》如参照敦煌书仪，也可以知道是内外族吉凶书仪。《妇人书仪》《皇室仪》应同样不出吉凶范围。因此以上书仪有不少是相关吉凶礼仪的，其中又多是世家大族之作。

现已知十二种书仪中，除唐瑾一种是北周士人所作，其余均来自南朝，并有五种是出自王谢高门。从著作者的先后看，时代最早的是王弘。王弘即王导曾孙，本人也生活于晋宋之际。他曾参与宋武帝禅晋之事，官至太保、中书监。《宋书》卷四二本传称“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为王太保家法。”又据传他曾“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但王弘并不一定是吉凶书仪的创始者，在他之前，或者两晋之际已有制作。
立四学。谢朏为齐高帝为骠骑将军辅政，选朏为长史，敕与河南褚、彭城刘俣俱入侍宋帝，时号为天子四友，朏所著书《炫》、济阳江。而蔡超虽为彭城王义宣之腹心将佐及文章，并行于世，却是礼学家。《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有题“为宋丞相咨议参军蔡超注”的《集注丧服经传》二卷，据书仪所作当有所依。更有名者是王俭、周舍。王俭于齐高帝受禅之际，为之撰立仪注。《南齐书》卷二三《王俭传》称：“时大典将行，俭为佐命，礼仪诏策，皆出于俭，褚渊唯为禅诏文，使俭参治之。”俭长礼学，谙究朝仪，每博议，证引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无能异者。后永明二（年484），因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礼乐，于是诏令王俭制定新礼，因集前代，撰治五礼，吉、凶、宾、军、嘉也。《同书》及《南史》纪传、礼乐舆服志等多见王俭定礼，所撰并有《古今丧服集记》《百家集谱》《尚书》音义》四卷，《礼仪答问》《礼杂答问》各十卷，及目录书《元徽四部书目》《七志》等。而周舍以博学多通，尤精义理，于梁初任为奉常丞、尚书祠部郎。时天下草创，礼仪损益，多自舍出，时太子詹事周舍撰《礼疑义》，自汉魏至于齐梁，并皆搜采，虽居职屡徙，而常留省内，罕得休下，国史诏诰，仪体法律，军旅谋谟，皆兼掌之。以上诸家，或为礼学大家，或为文学硕儒，其家仪书翰，手笔典。①《梁书》卷一五《谢朏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61—262、264页。②《南齐书》卷一《高帝上》，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3页。③《南齐书》卷九《礼志上》，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19页。④参见《南史》卷二四《王逡之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66页。⑤《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一》，中华书局标点本，第988、991页。《南齐书》卷二三《王俭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33页。《新唐书》卷五七《经籍志》，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428、432页。⑥参见《梁书》卷二五《周舍传》，卷三六《孔休源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75—376页、520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裁,为当时仰观。他们的书仪得以流传,大约不仅是由于文翰华美,也是由于世家礼法得到推重”,掌握他们写信的风格体裁,是世族高门文化修养的内容。而值得注意的是,作书仪者南朝较北"朝为多,敦煌杜友晋《 新定书仪镜》引卢藏用《仪例一卷》曾谓书仪“暨齐梁通贤,颇立标统”,指的应当正是南朝世家大族和朝廷人士纷纷将礼仪书式建作吉凶书仪的情况。

(二)史书记载的唐五代吉凶书仪
唐人的书仪,见于《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开元书目的仅裴矩《大唐书仪》十卷。《旧唐书》卷六三本传说裴矩于武德初年与虞世南撰《吉凶书仪》,参按故实,甚合礼度,为学者所称,至今行之。《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列此书即作裴、虞二人撰,此外又增加裴茞《书仪》三(卷 原注:朱俦注。茞,元和太常少卿),郑余庆《郑氏书仪》二卷,裴度《书仪》二卷,杜有晋《书仪》二卷。《宋史》卷二○四《艺文志》除裴茞、郑余庆、杜有晋三家外,又有郑(洵 珣)瑜《书仪》一卷。此外还有五代后唐刘岳《吉凶书仪》二卷和北宋司马光《书仪》八(卷 另有《涑水祭仪》一卷《,居家杂仪》一卷)。今传世唯余司马光书仪,而五代以前的吉凶书仪除保存在敦煌文献者外皆已不见。

与南北朝同样,中唐以前书仪的撰作者如裴、郑、杜诸家也是大族,不过北方士族似乎多一些,如裴矩为河东世族,父讷之、伯父谳之皆有名。谳之仕北齐为仪曹郎”,尤悉历代故事,仪注、丧礼皆

①周一良《书仪源流考》,载《唐五代书仪研究》,第95页。
裴矩在隋朝,文献皇能裁正。后崩,太常旧无仪注,矩与牛弘、李百药等据齐礼参定。后为宇文化及参定仪注,为窦建德制。杜有晋无考,定朝仪但是敦煌P.344《2 吉凶书仪》与P. 3849《 新定书仪镜》都题“名 京兆杜友晋”撰,应为同一人。其家当“是 京兆韦杜,隔天尺五”是京兆大族杜氏。郑余庆、郑珣瑜均出自荥阳郑氏北祖房,相德宗,郑余庆曾为两朝制礼。《旧唐书》卷一五八说 宪宗以余庆谙练典章,朝廷礼乐制度有乖故事,专委余庆参酌施行,遂用为详定使”,朝廷仪制、吉凶五礼,咸有损益焉。同样,裴茞和裴度出自东眷裴氏,裴茞官至国子司业,曾助郑余庆制礼。《新唐书》卷七一上,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241页;并见S.6537v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序。
《新定书仪镜》《张志》和《郑书仪》等。旧仪如何，北宋司马光《书仪》提到有可能是裴度或裴茞的《裴书仪》与刘岳《书仪》。刘岳《书仪》的撰作则与郑余庆书仪不无关系，《旧五代史》卷六八《刘岳传》只说他于后唐天成中，奉诏撰新书仪一部，文约而理当，今行于世。《新五代史》卷五五本传说：初，郑余庆尝采唐士庶吉凶书疏之式，杂以常时家人之礼，为书仪两卷。明宗见其有起复、冥（昏 婚）之制，叹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风俗，且无金革之事，起复可乎？婚，吉礼也，用于死者可乎？乃诏岳选文学通知古今之士，共删定之。岳与太常博士段颙、田敏等增损其书。不过见于目录书和其他传世史料记载的，直到五代都还是中朝大臣和名士之作，这有些不符合实际情况。敦煌P.5550忻州刺史《文仪集》、大中张敖《新集吉凶书仪》《新集诸家九族书仪》、P.4050等卷晚唐河北所出吉凶书仪，乃至五代《新集书仪》无不是地方官员甚或藩镇僚吏所作，而且这种制作中唐以后渐多，大概也成为一种趋势。

吉凶书仪是以吉凶礼仪为中心的，即所谓“采士庶吉凶书疏之式，杂以常时家人之礼”。但除了书仪之外，《隋书·经籍志》史部仪注类称之为“为仪”的杂礼书又有七种：《新仪》三十卷，鲍泉撰《文仪》二卷，梁修端撰《赵李家仪》十卷（录一卷），李穆叔撰《言语仪》十卷（《严植之仪》二卷，《迩仪》四卷，马枢撰；以及《徐爰家仪》一卷。《新唐书·艺文志》也有诸如窦维鍮《吉凶礼要》二十卷，《杨炯家礼》十卷，孟诜《家祭礼》一卷，徐闰《家祭礼》一卷，范传式《寝堂时享仪》一卷，郑正则《祠享仪》一卷，周元阳《祭录》一卷，贾顼《家荐仪》一卷（卷注“云卷亡”），孙氏《仲享仪》一卷（注“云 孙日用”），裴茞《内外亲族五服仪》二卷以及《葬王播}}
仪》一卷等多种杂礼仪书。这些礼仪书大都并非由朝廷命定，而属于士人自撰，且未必与书疏有关，但反映各类吉凶杂仪特别是世族家礼家仪的性质是共同的。所以这类礼书所涉内容也常常在吉凶书仪中见到，形成两者并不能截然分别的情况。

二、敦煌文献中的吉凶书仪和其他俗礼书

敦煌文献中吉凶书仪和其他一些俗礼书的出现，不仅大大丰富了正史的经籍、艺文志和传世其他史料记载的书目，引起我们对这一类作品的重视，而且书仪所表现的丰富内容，也使人们对它们的分期和概况与不同时期的侧重及演变有感性的认知，并总结出这一类书仪因社会需要而导致的发展规律。特别是，在吉凶书仪的作者由世家大族变为地方官吏的同时，书仪的内容也由以围绕家族的吉凶文范为主变为以官场往来文范为主，从而开始了由吉凶书仪向表状笺启书仪的转化，是研究这一类书仪最应注意的一个方面。

(一)分期与概况

敦煌书仪中的吉凶书仪品类丰富，根据前人研究，它们中较为典型且易于辨识者大约有十五种，如果按照年代，则大致可分为唐早期、开天之际或稍后、贞元元和以降和晚唐五代四个时期，现略

①《葬王播仪》《宋史》卷二○四《艺文志三》题云贾氏撰。同样性质的杂礼书《宋史》同卷又增有李随《吉凶五服仪》一卷，题独孤仪及陆贽撰《红亭纪吉仪》一卷、陈致雍一卷、卢僎《家范》一卷等，此外李《寝祀仪(》《直斋书录解题》卷六作《新定寝祀仪》商隐下也记有《家范》十卷，不知是否为其所作。按卢僎《卢公家范》一卷、狄仁杰《家范》一卷《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列在小说家类，似也应归于家礼范畴。
1. 唐早期吉凶书仪

目前可以推测为唐早期的吉凶书仪大约有四件：P.3900、S.1725、P.4024、P.3681。P.3900《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著录“为书札笺表仪式，背为残历日，存三至五月，不知何年。”其正面存79行，前后均残。但从其前半部存七至十二月节候用语，第54行书题《笺表第二》，下有庆正冬表、庆瑞表乃至庆赦表等内容，知此书仪的前部应是一般吉凶书仪都有的《年序凡例第一》。这第一部分注引周处《风土记》《礼记·月令》《续晋阳秋》《尔雅》《毛诗》《易纬》《淮南子》《列子》《孔丛子》《晋咸康起居注》等，皆南北朝以前古书，内容古雅；笺表规范，尤突出唐前期体制，则书仪确有唐前期特点。赵和平据文中凡诏书称制书，叙节候以十一月为岁首及《庆正冬表》中题函面语“有仅上京神都门下（武则天改洛阳为神都）等特点，推测为武则天时期书仪，但以十一月为岁首是古周制，除武则天外肃宗朝也有短期从此制，单凭此并不能认为就是武周书仪。此件并无武周改字，“避世”而不“避叶（高宗初定“避 昭”、“叶”字），又有圣略内昭”语，似也不刻意避武曌讳，姑存疑。

S.1725，正、背皆为书仪，但非一件。正面为吉凶书仪，现存168行。内容依次为丧服制度及妇女吉仪（拟）。丧服制度涉及斩衰以下五种服制“与礼及令”两部分。斩衰服下并有丧礼，涉及妇
人者亦较多，但尚有综合性内容。妇女吉仪则包括简要的妇人书疏说明及婚礼，基本围绕妇女或女家。惟前面凶仪与后面吉仪并未作特别划分或说明，疑只是抄撮某件书仪的部分内容。卷子背面为两部分，一部分为释奠文、祭社文、祭雨师文、祭风伯文，及四种祭祀场合所需器物、人夫，末尾有一件交代上述器物“的 刘智刚牒”。另一部分为倒书的八通书札，共35行。此八通书札内容年代与前件不一，当属另件详表状笺启书仪，祭祀文等的归属性待考。这件书仪，笔者认为年代应在贞观末期或高宗朝，详细论证见本书第十二章。

P.4024，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拟名《丧服仪》，曰：’此残卷有八十八行，无书题，内有子目二：曰丧服仪，曰服衣仪第十九；则丧服仪当为第十八，盖为抄者所脱误。’并认为其体’例盖与古人所作变除图、丧服谱相类‘”，此书非诠礼经，为应社会与时代之需要而作”，其书名与《新唐书·艺文志》所载裴茞《内外亲族五服仪》相近。赵和平根据写卷内容多与S.1725近似，及综合类书仪凶仪部分往往有内外妇三族丧仪轻重说明的情况，故定为综合类书仪也即吉凶书仪的一种。书仪前部似尚’有 年序凡例’残文，也符合吉凶书仪特点，所以应是书仪节抄。其前后均残，不讳世、(基 期)字，丧服部分也无贞观改制内容，应为唐初书仪。

P.3681，仅存11行，内容有序文“及 年序第一”。年序用太岁纪年，文用《尔雅·释天》，结合司马贞《史记索引(》但有些纪年名异，待考)，有音义注文，内容古雅。序言凡例‘有 若吊书总复书之’一语，说明此书仪的凶书仪用复书形式。凶书仪完全用复书时代不超过开、天，此书仪的时代应在开、天以前。
2. 开、天时期的吉凶书仪

属于开、天时期的有P.3442杜友晋撰《吉凶书仪》，P.3637等卷同人撰《新定书仪镜》，及S.329与S.36《1书仪镜》。P.3442写卷中部“有《书仪》卷下，京兆杜友晋”题记，故知即《新唐书·艺文志》所载杜有晋《书仪》二卷，“惟友”字与《新志》作“有”不同，研究者并据其性质改定今名。此卷长8.7363米，高27.3厘米，现存约600行，是诸种书仪中最长的写卷。关于作者杜友晋，王重民先生曾提出“友晋事迹无考《新唐志》置于最末，殆是唐末五代时人”。姜亮夫先生也认为是唐末人②，而日本学者那波利贞则认为有可能是宪宗、文宗时人。但近年周一良、赵和平先生据郑余庆元和书仪序中所提到的京兆杜氏书仪年代考为开、天时人，书仪撰作时间约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前后。

杜氏《吉凶书仪》首尾均(残图见插页1)，据内容可知应分为吉仪卷上和凶仪卷下两部分。吉仪部分现仅存内族吉书仪残文及外族吉书仪并论婚报答书、妇人吉书仪、四海吉书仪。凶仪卷下则存有凡例、凶仪纂要、表凶仪、启凶仪、内族凶仪、外族凶书仪、妇人凶书仪、僧尼道士凶书仪、四海吊答(凶书)仪、祥禫斩衰迁葬冥婚仪等的类目及仅到妇人凶书(仪不全)的内容。相对而言，知此书

①王重民《敦敦煌古籍叙录》卷三子部上《书仪》条，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225页。
②姜亮夫《莫高窟年表》公元852年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94页。
③那波利贞《〈元和新定书仪〉与杜友晋所编〈吉凶书仪〉》《史林》45卷1号，192年。
④参见赵和平:杜友晋《吉凶书(仪 P.3442)》题解《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台北新文丰出233页;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二)》,载《唐五代书版社,1993年,223第仪研究》,第53—70页。
仪的吉仪部分还应有凡例、表吉仪、启吉仪等。故王重民先生指出其内容自天子至于庶人，各具一例，简而适用，故其书能传至敦煌。

但根据残留类目推测，这件书仪的内容比较单纯，似乎不包括婚丧礼仪内容。

《新定书仪镜》有多个写本。残存部分吉仪有家内贺官和婚礼用（书见P.2619v）、内外族、四海吉书（仪以上拟名）、妇人书题等，凶仪除凡例、五服告哀书、内外族及四（海含妇人）吊答书、吊答辞等各种名目外，又增加了内外夫族服图及相当多的祭文、冥婚书等（见P.3637）。其中P.3849卷尾部有凡例二十八首，内容与P.3442杜氏《吉凶书仪》凶仪卷下凡例相同。其下有黄门侍郎卢藏用《仪例》一卷”和“通例第二”部分，中间插有《新定书仪镜吉上凶下》京兆杜友晋”一行题记，知《新定书仪镜》作者也为杜友晋。P.2616v首行题《删定仪诸家略集并序例第一》，并有《通例第二》《四海吊答第三》，其序例及通例前部与P.3849同，赵和平认为属《新定书仪镜》的别本。笔者也认为所谓序例第一”就是《仪例》一卷，而《通例第二》和《四海吊答第三》应为杜氏抄撮和纂集其他书仪的内容。此件周一良先生提出为《吉凶书仪》简本，但用于皇家的笺表”被取消。在《四海吉书题》中《重贺官书》等官场往来文范较《吉凶书仪》增加；凶仪复书也较《吉凶书仪》简化，故撰作时间明显在《吉凶书仪》之后，很可能是在天宝中。

《书仪镜》由S.329与S.361两卷写本拼接契合，在S.361中部“有书仪镜凶下”书题，且内容与P.3637《新定书仪镜》对应部分

①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卷三子部上《书仪》条，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225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相同。赵和平认为仍为杜友晋作，但《新定书仪镜》内、外、夫族丧服图等为《书仪镜》所无，而《书仪镜》比前者增加了“四海”往来书疏，故定为别一件。

《书仪镜》增加“四海”书仪是最有特色的部分，内如《贺四海加官秩书题》《贺四海婚嫁书》《吊四海遭父母丧书》《四海平蕃破国庆贺书》及《四海书题》等共二十余种。赵和平提出这个书仪“是为出门在外作官的人专门编的”，撰作时间应在天宝六年以前。

荣新江则据其中《四海平蕃破国庆贺书》全录边疆将士往来书信，内多四镇及平勃律内容，提出书仪实已经过改造而为一“安西书仪”，作者可能已不是杜友晋，其撰作时间应在天宝中后期。①

### 3.贞元、元和时期的吉凶书仪

可以确定为此期书仪的有S.1438v和S.6537v两件。S.1438v卷戴密微《吐蕃僧净记》一书第二章立有专节，称为《吐蕃统治敦煌时代一位汉族节度使的档案文书》，但后来学者大都认为是书仪。藤枝晃、张泽咸、姜伯勤、史苇湘等先后涉及或有专文进行研究。②

①荣新江《敦煌本〈书仪镜〉为安西书仪考》，载《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267-273页。

②藤枝晃《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东方学报》31册，1968年，第208页；张泽咸《唐五代农民起义史料汇编》，上册第222-224页；姜伯勤《唐敦煌书仪”写本中所见的沙州玉关骤户起义》，《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一辑，第157-170页；史苇湘《吐蕃王朝管辖沙州前后—敦煌遗书斯1438(背书仪)残卷的研究》，《敦煌研究》创刊号（总第三期），第131-141页。
对象有圣神赞普、相公、邻道高官,但也有致僧人、朋友的告哀书、吊答书等,只是其中不分类目,从形式看更像是后来的表状笺启书仪。文中仍避唐讳,"如 民""改 人",世作缺笔。此卷书仪内容涉及敦煌陷蕃及摩诃衍和尚离开敦煌的年代。中外学者或认为是在贞元三(年 787),或认为是在八世纪末,赵和平综合不同意见,定此卷名为《吐蕃占领敦煌初期汉族书仪》。近年杨铭结合Fr. 80藏文文书,证明与S.1438v作者为一人,即吐蕃任命的汉族军政长官节儿,指出文书中提到的氾国忠起义依藏文发生在沙州陷蕃七年后,为文书的制作年代提供了新的证据。贞元、元和书仪时代较确定的是S.6537v,首题"曰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一部并序,银青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兼太常卿郑余庆撰"。《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即《新唐书·艺文志》所载郑氏《书仪》二卷的全名。今存约180行,有序文及目录。序文述唐代书仪内容、作用、沿革甚详。目录包括《年序凡例第一》《节候赏物第二》《公移平阙式第三》《祠部新式第四》《诸色笺表第五》《寮属起居第六》《(吏 史)起居启第七》《吉(凶 书)凡例第八》《四海吉书第九》《内族吉书第十》《外族吉书第十一》《妇人吉书第十二》《僧道吉书第十三》《婚礼仪注第十四》《凶礼仪注第十五》《门风礼教第十六》《起复为外官第十七》《四海吊答书第十八》《内族告丧书第十九》《僧道凶书第二十》《国哀奉慰第廿一》《官遭忧遣使第廿二》《敕使吊慰仪第廿三》《口吊仪礼第廿四》《诸色祭文第廿五》《(衰 ?)服制度[第]廿六》《凶仪凡例第廿七》《五服制度① 杨铭:《 -件有关敦煌陷蕃时间的藏文文书 兼及S.1438v〈书仪〉》,
郑氏书仪是今所见敦煌吉凶书仪中内容最全面者。从目录看它涉及国家礼制和百姓社会生活,涵盖朝廷、官场和家族的不同礼仪层面,可以认为是中唐以前书仪的集大成之作。

此书仪郑余庆题衔与《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载其元和六年冬十月自东都留守为吏部尚书、及同书卷一五八本传元和七年末以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相合,故书仪的制作时间应在元和六至七(年811—812)。郑余庆在德宗、宪宗朝曾两任宰相,宪宗并以为礼仪详定使。传称他曾奏韩愈、李程等为副使和详定判官。此书仪序亦载与裴茞、韩愈“等共议时用,要省吉凶仪礼”,表明书仪的制作与贞元、元和中制礼活动有关。

大致能够断定是中唐前后的书仪还有P.5550,此卷首行有题记,可以判断“是忻州刺史”所撰《文仪集》并序”。仅存16行,保留下来的篇目有五个:内外官启第三》《四海吉书第四》《外族吉书第六》《妇人条?书第七》《内外尊卑吊答书第九》。根据这些篇目和残存的内容推测,这件书仪在《内外官启第三》前应有《年序凡例第一》和《笺表第二》,下并有《内族吉书第五》等,是综合性较强的书仪。书仪末判断应属《年序凡例第一》的两“行曰载,

文下小字夹注,仍保留引经据典的古雅方式。但忻州据《新唐书·地理志》和《元和郡县志》属河东道,撰作者已是地方官,且书仪专设内外官启仪目,已带有唐后期“重官启”的特征。推测其时代应在开元至元和之间。
4. 晚唐 五代 的吉 凶书 仪和 俗礼 书

属于晚唐五代的吉凶书仪有P.2646等卷张敖撰《新集吉凶书仪》吉仪卷上、P.2622等卷张敖撰《新集吉凶书仪》凶仪卷下、P.3502《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P.4050与S.5613等卷《晚唐河})吉凶书仪》、P.369(北 1等卷《新集书仪》。

P.2646首行有“《新集吉凶书仪》上下两卷并序”,次行题书题曰“河西节度掌书记儒林郎试太常寺协律郎张敖撰”,尾“题《要集书仪》一卷,天复八年岁次戊辰二月廿日学郎赵怀通写记”。此一卷者,实指吉凶书仪上卷吉仪而言。此件另有十一个卷号,内P.2556、P.3249残存书题。S.2200卷尾有大中十(年 856)六月十一日题记,可证张敖是宣宗时人。书仪自序称,鉴“于今朝廷遵行元和新定书仪,其间数卷,在于凡庶,固无所施”,“故采其的要,编其吉凶,录为两卷”,是简化郑余庆书仪而来,说明自大中从吐蕃手中收复瓜、沙等州后,中原礼仪又在敦煌传播。此件书仪无每种篇目,但散存有内外族吉仪、官启、四海、僧道书仪,和婚书、婚礼程式(婚礼仪注?)等,与P.2622等凶仪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补郑氏书仪之阙。

P.2622存230行,尾题“作《吉凶书仪》上下两卷,大中十三年四月四日午时写了”。姜亮夫《莫高窟年表》提出,此写本亦为张敖《新集吉凶书仪》之别本。写本与张敖前作体例近似,行文方法相 同,钞写年代相符。残存部分葬(仪 凶礼仪注?)、四海吊答书仪、口吊仪、祭文等,与郑氏书仪仪目相合,赵和平也定为张敖《新集吉凶书仪》的凶仪部分。此件尚有五个卷号,均残。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衔与作者名皆与上件书仪同。内有简要的十二月用语、封题样、诸种吉书仪,依次排列,不再按类区分。由于书仪正文前的书写文字有三处大中题年,最早一处为大中六年,故可判断此书仪制作也在大中年间。藤原佐世《日本国现在书目录》记有隋李德林撰《九族书仪》一卷,可知书仪中本有这一类。此件书仪明“题 新集诸家”,且序“称 夫书仪者,籍在简要,不在其多”,今之所著,微举洪缕,修从轻重……使童蒙易会,一览无遗,号曰纂要书仪,具载于后”,说明是杂集诸种书仪并加简要而成。

P.4050与S.5613两件残写本属同一书仪,均为册页形式。两件计共存16页,每页6—7行,行16字,书法精美。属综合类的吉凶书仪,现存内容可归为“四海吉书仪”及“妇人书仪”。另有Дx.1438以下十二卷,存26页,每页7行,行17字左右,据知也属同件,内容为四海吉书和内外族凶仪告哀吊答书等。藤枝晃《敦煌历日谱》一文提出,据写本纸制“为软轻亮纸”,与同时代的写本完全不同”,可知是中国内地所写而流入敦煌者“。卷中多“见司空”及“使主”之称,且“有司空仁恩,察以公干,擢拜河间长官”,仆不才,蒙受临河县宰等语句,可断定作者约为节度使幕僚。赵和平据其中地名考证书仪的产生地是河北,制作的时间当在晚唐。由于这件书仪相当部分为僚属向长官节度刺史或地方官员之间的书信,均为实寄书信抽去书仪姓名而成,地方色彩很浓,确有晚唐书仪特征。

①赵和平《: 晚唐时河北地区的一种吉凶书仪》,载《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收入《唐五代书仪研究》《晚唐时河北地区的一种吉凶书仪的再研究》,中华文史论丛》62辑,第192—216页,2000年5月。按此件俄藏赵和平考订为九卷,笔者又据《俄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补充Дx.05247和Дx.05247v两卷,增为十一卷,详见书后附表。
《新集书仪》已发现有17个写卷。其中P.3691首行题“□集书仪一卷 序不书”，尾“题 新集书仪勘讫”；P.4699也“题 新集书仪一卷，吉(凶 仪)卷上”，故可定名。“其 吉仪卷上”前为节候用语，约70行，与张敖书仪相同；后为官文谢贺酬应启状“与 四海”性质的书范，及与僧道去书答书等。家族书仪仅“见 夫与妻书”及答书。卷内显然汇集了《新定唐家礼亲仪》之其他一些书仪的内容，如录《姻亲贺仪，混入其间，未加分别。凶仪部分“以《新定唐家礼凶吊仪》(叙 序)”开头，未特加题目，下有吊仪、凶仪凡例及丧际用语等。体例混乱，内容庞杂。由分别见于P.3691和P.3716v的天福五年及天成五年庚寅(岁930年)及天成五年庚子(岁960年)记，知此件书仪流传于五代。书仪内多有代表节度使官职“的 司空”之称及《迎天使顿上送书》《敕书到谢天使至》等书，与敦煌归义军时期某些表状笺启书仪一致，推测制作时代约在晚唐五代。以上吉凶书仪之外，敦煌还有一些与“吉凶”有关的俗礼书。如P.2042v题曰《新集两亲家接客随月时景仪并序》，仅25行，有序及正月至七月部分。内容是主“宾 随月时景”“叙 节候寒温，对答往来”，用于结“成 婚眷”的两亲家之间，是十分客气的口头用语，性质大概有些类似上面《新集书仪》中提到的《新定唐家礼亲仪》，其流传也在晚唐五代。《新集书仪》“将 礼亲仪”“和 礼凶吊仪”之类的内容收入书仪，本身就说明书仪的性质和制作与某些俗礼书不可分。P.3909《今时礼书本》，内“有 论通婚书法第一”、“论女家答婚书第二”、“男家通婚 本”、“女家通婚答书一本”。以下有书[一？]儿郎伟“ 论障车词法第八”，内含几首作为障车词“的 “与男女对答” 的 下女夫词”的某些摘抄，与前面内容都是有关婚礼的，推测此
有可能是某件俗礼书或就是吉凶书仪的内容节录。P.2967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定名“为小册子，丧礼书”，《英藏敦煌文献》定名为《丧礼服制度》。此卷为册页形式，前后均残，今存11页，71行文字。书写工整，文字间有丧服各部插图。卷首残存序文，说明它“是淮南节度使杜佑进上《新制唐礼图》十五卷”中“的《丧礼服制度图》一卷”。文字内容为丧衣服制各部释要，文引《开元礼》、葛洪《丧服变除》、崔灵恩《三礼义宗》、崔凯《丧服变除》等，及《仪礼》丧服制度与郑玄注，参用古礼与唐礼仪。序文盛赞此礼“图精粗不差，轻重合宜，当穷本书礼，深得其仪”，并“有故持此以匡时要”一语，故推测它为某件吉凶书仪所引用。杜佑任淮南节度使在贞元中，郑余庆元和书仪目录也“有衰服制度[第]廿六”，笔者认为此卷有可能是郑氏书仪的部分。与上述写卷性质相似，敦煌文献中还有P.4043、P.3213、P.3214等几件祭文书范和祭文集，根据杜友晋《新定书仪镜》等书仪中将祭文作为凶仪一类的情况，我判断这些祭文也属书仪或礼书性质。除敦煌书仪外，赵和平还搜集有吐鲁番72 TAM 169 : 2(6 b)和日本八王寺藏本的高昌书仪两件，《西域考古图谱》载录的吐峪沟出土唐书仪一件。前两件均属吉凶书仪。内第一件含“相闻仪”、“与伯书”等多种吉仪，可作唐以前书仪之参考。

(二)《吉凶书仪》的内容结构

先贤曾指出，古礼所以有士冠、聘觐、士昏、乡饮酒、士相见等，①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
乃是为敦父子、

因此礼是因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的人伦之道人伦关系和实际生活需要而产生的,书仪尤其如此。吉凶书仪是综合性的书仪,它以反映与吉凶相关的礼仪礼书而得名。所以完整的吉凶书仪,不仅包括年序凡例、内外族吉凶书仪、吉凶凡例、四海书仪及僧道书仪、妇女书仪等,也常常涉及婚丧等相关诸礼、社会交往礼俗、朝廷仪制与官场酬应书范。不同时期的书仪也有不同的内容侧重点。

以家族为主体的初唐和开、天书仪从书仪的发展来看,吉凶书仪的形成在月仪之后,故吸收了月仪的部分内容,叙年月节候,其中节日庆赏“年序凡例”成为不少吉凶书仪必有和排在最前面的序目。而唐早期的吉凶书仪,反映此部分最为讲究、详细。如P.3900《武则天时(期?)书仪》,在年、月、节候方面大量引用南北朝以前古书,采取了类似佛经合本子注《三国志》裴注式的注解方式,其典雅的形式内容应有南北朝遗风。

初唐吉凶书仪的另一特点,是有关婚丧礼仪的内容占有很大比重。S.1725和P.4024对于婚丧礼俗即往往有细致的描述,其中婚礼的程式、丧礼的丧制、服制与衣制,大都以古礼和当代礼为依据,显示了对传统礼制和现实制度的特殊重视。

现存开、天之际的吉凶书仪内容比初唐书仪更全面、丰富,但看得出仍延续南北朝以来以家族血缘为中心的原则,并更注重礼

① 皮锡瑞《经学通论》三《论礼所以复性节情经十七篇于人心世道大有关系》,中华书局
从符仪、礼书的实用性。如杜氏《吉凶书仪》目录推知，吉、凶部分应分别都有一凡例、纂要（上于皇帝太子的）表启，及内外族、妇人、僧尼道士书仪等，而内外族书仪是其中的重心。其排列自近及远，由高至低；除内族吉仪因阙失不见外，《外族吉书仪并论婚报答书十首》、内族凶书仪二十一首》、外族凶书仪一十七首》是唐五代书仪内外族书疏致书对象最多最全者（如加上内族书仪中本应有的与祖父母、父母、伯叔姑、兄姊书和残存的《与弟妹书》、《与子侄孙书》，以及实际也属内外族性质的妇女书仪十七首，以及僧道书仪中《与祖父母父母书》《与伯叔书》《与兄子书》等，全部有关内外族书仪应超过七十首），且每首书仪内容完整，与吐鲁番出土72 TAM169 : 2(6 b )高昌书仪比较，称谓语辞更加规范讲究。只是凶书仪以告哀书为主，且告哀吊答不分。P.3637《新定书仪镜》保留内外族书仪的基本格局，现存内外族书范百余种，显然与前者一样，也是同类性质内容在书仪的各类文范中占有绝对比重。其凶书仪相对简化，并已明确分为告哀、吊答两种，有《五服告哀书一十二首（实仅八首，应是抄者有省略或遗失）》、内族吊答书一十二首》、外族吊答书一十二首》,还增加了二十余种祭文。但杜氏书仪除通婚书外，未见有设定婚丧礼俗的内容或专目。《新定书仪镜》吉仪仅见各种婚书，凶仪仅用丧服图和律令的简单规定来示意和说明服制，另外吊答辞开始增加，说明开、天之际的吉凶礼仪更多是通过书函程式和种种格式化语词来体现，书仪作为书范的主旨和特征似乎更明确了。

除了内外族书仪，妇女书仪、僧道书仪也是唐朝前期吉凶书仪的确定内容，其内容格局大体是从前朝继承者。隋书·经籍志》关于南北朝的书仪中有不知名人撰《妇人书仪》八卷；而在《初学记》
在中国古代的著作中，特别是在唐代，妇女书仪是被广泛吸收的。S.1725书仪虽无此书题，却明显抄有妇女书仪的某些内容。杜友晋《吉凶书仪》中“妇人吉书仪八首”和“妇人凶书仪九首”《新定书仪镜》“妇人书仪二十首”。从总的情况看，妇女书仪的致书对象不外丈夫和婆家、娘家的内外族近属，这已将妇女的活动限制在家内范围。书仪内容虽只是叙寒温，但语气恭顺，用词讲究，传统的贤妻良母观念跃然纸上。这类书仪到了中唐以后仍有继承，元和郑氏书仪就“妇人吉书第十二”和“妇人出嫁为本家父母服式图”《晚唐时河北的一件吉凶书仪》P.4050与S.5613等也有一些妇女书仪，但与中原地区不同，在大中张敖两件书仪和《新集书仪》已被删除，似乎表明在晚唐五代的敦煌社会这类书仪已不甚受重视。

杜氏《吉凶书仪》在妇人书仪之后，有《僧尼道士吉书仪七首》，内含《与和尚阇黎书》《和尚阇黎与俗人书》《与道士书》及答书等，凶仪部分也有《僧尼道士凶仪三首》。这类书仪不同于《隋书·经籍志》所载释昙瑗的《僧家书仪》或是佛教的《斋琬文》一类，而是属于俗家与僧道互问寒温的吉书或凶事吊丧书，故《新定书仪镜》吉仪将《与僧尼书》《与道士书》两首置“入四海”一类的书仪中。僧道书仪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出现是现实生活中俗人与僧道频繁交往的需要。与僧道的交往不仅皇帝提倡，且尤以士大夫为多。柳宗元《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总结说“昔之桑门上首，①按据原卷，僧尼道士吉书仪实仅四首。除《与和尚阇黎书》，余三首失名，此处据文意补，与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177页)定名微有不同。
好与贤士大夫游。他举魏晋高僧与世家大族谢安、王羲之等交游之例，认为当朝吏部尚书顾少连、兵部侍郎韩皋等“人皆厚于上人，而袭其道风”，是前代儒释交游的继续。《新定书仪镜》引卢藏用《仪例一卷》“道旧仪与僧尼道士书题云稽首及和尚，以代咨白再拜”，《仪例第二》“道凡与众僧书云道体，末云和南，全尊者云稽首，自余称谓同小重”，这类称谓用语是来自旧仪”实亦南北朝以来习俗，应当也是创源于当时的大族。僧道书仪不但在郑氏书仪，甚至在晚唐敦煌地区创作和流行的张敖书仪也始终保留，与唐社会特别是敦煌地区的佛道信仰是分不开的。

吉凶书仪中还有一类内容，被统名之“以四海”，在开、天以后的书仪中都可以见到。如杜氏《吉凶书仪》内有《四海吉书仪五首》《四海吊答凶仪廿一首》；《新定书仪镜》的吉仪有《问发日书》、《与未相识书》《屈讌书》《他乡经节屈讌书》《借马书》《遗物书》《求物书》《问马堕书》《问疾书》《霖雨书》《雨后书》《雪中书》《风雹书》《召蹴踘书》等，凶仪有《四海吊答书廿首》，又有《内外族及四海吊答辞》，也“含四海”内容。这里所说“的四海”首先是朋友范围，前人已发现《杜家立成杂书要略》与杜友晋《新定书仪镜》等吉凶书仪“的四海”书札在内容方面的相近与相同处，说明《杜家立成》类专供朋友间往来的信札已溶入综合类书仪中，这正是书仪形式的演变过程。不过，相比之下，吉凶书仪中的四海书仪重视的是吉凶礼仪，以事题为主，针对性实用性很强，与《月仪》或《朋友书仪》宣泄浪漫情怀不同，原来述情写景的内容已被大大

---

①《柳河东集》卷二五，中华书局，1961年，第422—423页。
②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订补》，《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37—240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58

简化了,这也说明魏晋以来贵族文化的消亡与唐官僚阶层和一般民众务实心态的上升。

以上内容多是有关人民生活的方面。唐前期的吉凶书仪虽围绕家族并以婚丧礼俗、节庆仪规及相关书信程式为主体,但对于朝廷书仪已见到《笺表第二》的内容,礼仪也有反映。敦煌P.3900 P.3442《吉凶书仪》的凶仪也有表启部分,它们大致在书仪的吉凶仪中是置于其他礼式书疏之前,详情本书在下面章节还要论述。

虽然我们并不了解唐以前的书仪是否有此类内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笺表关系到朝廷礼仪礼式,它们以皇帝为中心,很可以体现唐前期中央集权的特色。而将这项内容加在其他各类礼书之上,不但意味着唐国家政权驾驭、规范民间生活,也表明朝廷礼书乃是书仪体例中规格最高、最不可缺少的部分。

另在皇家笺表之外,有关唐前期书仪的内容中,有一个方面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它在早期的书仪中并不见仪目,但是在开元以后的“四海书仪”中已经逐渐抬头,这就是官场应酬书仪。

官场书仪的出现涉及到“对四海”的理解问题。《论语·颜渊》子夏曰:“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四海泛指天下。从兄弟所代表的平等和亲密之意引伸,则四海本可指代朋友和各种社会关系。四海书仪增加说明唐人开始重视社会生活,而逐渐地官场往还也被混同其间。这方面在初唐的书仪并不突出,如P.3442《吉凶书仪》的四海吉书仪有书范五首,内《与极尊书》致书对象“是同居继父、父之挚友、疏居属长、(见)艺师、姑父姨夫、族祖族叔、(见)、与稍尊书》对象“是谓己所事,或官位若高、姊夫妻兄”;其中既有官长,又有朋友戚属,两者之间并无特殊区别。而这件书仪无论是从仪目或内容,都看不出有专门用于官员应酬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杜家立成》将诸如“如获官事得雪”一类的内容置于“慰问知故”的范围内，也说明两者其实不分。但是年代略后的《新定书仪镜》在这方面有了变化。此书仪虽仍以内外族吉凶书仪为主，但“四海”内容数量已开始增加，还出现了诸如《重贺官书》、《贺正冬启》、《贺平贼书》等一类总题名为《四海庆贺书题》的书范。这组书仪虽标“明内外族同”，但如《重贺官书》《贺平贼书》等明显不是用于家族之内，而是致上级长官或用于官员之间。

变化更大的是《书仪镜》。如论者所示，这件书仪虽有部分内容主要是内外族吉凶书仪，但主体是名目众多的“四海”书仪。而“其四海”一词的表面含义虽仍指朋友戚属，却出现不少类似《贺四海加官秩书题》那样的官场迎奉之词，像《四海平藩破国庆贺书》竟完全是任职边疆的将领及官员的往还书信。这些隐去了收寄人姓名而惟余受书人官称行第详后）的实寄书信杂入书仪，显然已成为唐后期表状书仪制作的先声。而与此相应，《四海书题》指“明重书”的对象为：相国、左右相、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六尚书、三公九卿、节度使、太守”等官位隆重者”，次重书的收书人及致书人也是在官吏之间。因此，四海的真正含义已从广义的朋友戚属向官场范围发展，它所体现的已经是官本位之下，具有一定政治利益的社会关系。

最后，必须提到的还有书仪的吉、凶凡例部分。凡例是书仪格式称谓、书辞用语的规范，在唐前期书仪中是颇有特色的一项。杜氏《新定书仪镜》不仅自身有吉凶凡例，且在书末引用卢藏用《仪例一卷》及《通例第二》、《四海吊答第三》等专门论述书仪规则的著作以作说明，并从中批判旧仪，确立新规。因此，从唐初开始，到杜友晋《吉凶书仪》、《新定书仪镜》为止，唐朝吉凶书仪在吸收魏晋南
北朝成规的基础上,已形成了包括上述各项在内较为丰富和突出唐朝特色的内容仪目。后来的书仪在体例规模和设置方式上基本是萧规曹随,或不过是内容上此强彼弱略作调整,因此可以认为开天时期综合性吉凶书仪的创作格局已经定型。

2. 集大成的郑氏书仪

S. 6537v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可谓是唐代书仪制作的一个里程碑。（图见插页2）与贞元、元和之际朝廷加强中央集权和重建大唐威仪的努力同步,书仪也重在全面恢复和普及礼仪。其三十种仪目中,除"有年序凡例"及与杜氏书仪相同或相近的吉凶凡例、各类吉凶书仪外,更有公私平阙[式]、祠部新式、诸色笺表、国哀奉慰表、官遭忧遣使赴阙、敕使吊慰仪等突出朝廷仪制及笺表规格的内容;而节候赏物、婚礼仪注、凶礼仪注、口吊仪、衰服制度、五服制度、妇人出嫁为本家父母服式图、公卿士庶内外族殇服式图等,明显是为民间节庆、婚丧礼仪所备。带有世族遗风的"门风礼教"一目尤为以前书仪所未见,这很可以反映出其时朝廷试图重新以礼制来规范民间生活的意图。

另外仔细分析,这个规模庞大的书仪在内容格局方面与唐前期书仪相比还有一些变化和发展。其中年叙凡例、吉凶凡例和针对百姓生活层面的节候赏物及婚丧礼仪、各种吉凶书范等仪目看出是对此前吉凶书仪的集合,但是内容有详有略。如年叙凡例一项末尾说明"右按诸家仪年叙凡例,四时景候多有不同,兼之删略至多。今加添数件如前,并可入时行用。若时(诗 诗衍)流采掇,亦免寻于碎金耳。"内加添数件"者未指明,但从写法看,是先分叙年、月、日、旬、时,然后是按春夏秋冬孟仲季分叙十二月,所列仅为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61

各种季候用语，与P相比，用语可谓更加丰富完备，但已基本不用征引古书的古典方式。这种情况，与笔者判断是产生于开天时期的《朋友书仪》仍多相似。唐后期凡吉凶书仪有此项内容的大多在此基础上删繁简要，表现了愈来愈趋实用的色彩。另外书仪虽有《吉(凶)凡例第八》和《凶仪凡例第廿七》的仪目，但自序中有关凡例只说到用单书完全代替复书"和'晷运环周"改"为'晷运推移"等少数几项语词的修改，可见基本上是沿袭开天杜氏书仪一类成规。

但是郑氏书仪关系礼仪的仪目与前揭开天书仪相比却更丰富。由于其书仪序言"在凡有十余家著述"中，专门提到"到京兆杜氏之撰"，所以某些方面是为杜氏书仪作补充。例如杜氏《新定书仪镜》有《内外族及四海吊答辞廿首》和《妇人吊辞八首》，前者注云："凡行吊之礼，如重丧吊讫，未经节，每日相见则无拜，信宿已上及经节][则拜。大功已上经节][及乃]有吊拜之礼，未则否。"说"明"吊答词"是在有吊拜之礼时用。这在郑氏书仪中，就发展"为"口吊仪礼第廿四"。而且从抄录郑氏书仪的张敖书仪看到，数量从十数首增加为三十首，内容、对象多而语词更简，显然已成为通俗化大众化的一种普及形式。郑氏书仪并在《五服制度第廿八》之下增加上"述"妇人出嫁"和"公卿士庶"的殇服图，显然也是补充杜氏书仪服式图之缺。又如婚礼仪注、丧礼仪注虽见于唐早期书仪而杜氏书仪不见载，也为郑氏书仪集以传播民众。从张敖书仪所纂内容得知，其仪注大体也是在古礼和朝廷礼制的原则下力求礼俗化一，以使百姓接受。

郑氏书仪在宣传和贯彻朝廷礼制的层面上，也要比唐前期特别是开天书仪扩展得多。这不仅由于它在笺表之外，将不少相关的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朝廷礼令礼式直接录入书仪，与民间礼书、礼仪强行结合，更在于它的这些礼制有相当多的成分是针对官吏的。例如吉仪的《诸色笺表第五》在《贺冬表》之下有《封表极式》、《上四方馆牒式》和《转牒式》，此三式有“关某道节度观察刺史”上皇帝章表的封装、送省方式和沿途递交的规定，反映了对地方上朝廷笺表制度的重视。凶仪除《国哀奉慰第廿一》之外，又有《官遭忧遣使赴阙第廿二》、《敕使吊慰仪第廿三》；三者结合，包括了官吏“对国哀”帝后之死的慰问、地方（官或在外重臣）死亡的报告和朝廷对其死亡的慰问，涉及中央地方在处理丧事中的礼仪和关系，后二者的实行对象主要是在节度使。针对地方的内容在唐前期书仪中没有，而郑氏书仪所以增加，目的正是在地方中央的礼仪交接中突出朝廷的权威。

但唐后期藩镇和地方权重毕竟是事实，它与唐社会官僚化的进展同步，所导致的一个结果便是官场酬应的扩大和官场礼仪的兴盛。这一点，开天时期书仪已为滥觞。而如果说杜氏书仪尚未将此类官员往还书范从四海书仪中单独分出，郑氏书仪则在僚属起居、典吏起居和起复为外官等部分中将僚属对长官、或官员之间的礼仪函目规定下来。因此这类内容是郑氏书仪在百姓生活、朝廷仪制之外所反映的第三个层面。

郑余庆书仪由于涵盖了以上三个层面，所以可称是中唐以前书仪的集大成，是内容最丰富、最全面的书仪。但是这件书仪也许只是代表唐朝元和中兴的一度辉煌。事实上，唐朝的统治在此后一蹶不振，能够全面反映国家礼制的吉凶书仪实已不多。而在晚唐五代敦煌出品的张敖书仪、新集书仪中不少内容已被简化，所留存和表现的便大多只能是以藩镇政权为中心的地方礼仪特色了。
3. 晚唐五代书仪的格局之变

晚唐五代敦煌吉凶书仪的一个特点，是婚丧等民间应用礼仪礼书完全抄录与集合前人旧作的情况较多，在体制和内容方面已谈不到创新。如《新集吉凶书仪》自称是在郑氏书仪基础上袭取其“要，编其吉凶”而来，而他所纂集的书仪明显删除了郑氏书仪的大量内容。从文字保存完好的吉仪看，在被大大简化“的年序凡例”之下，紧接着便是官吏起居启、四海书疏等，中间原来记载朝廷礼令的节候赏物、公私平阙、祠部新式、诸色笺表等已完全被取消。被归并为一项九首的内外族吉书和原来属于婚礼仪注的内容被放在书仪的最末，甚至是在僧道书仪之后。凶仪残存部分看得出依次为凶礼仪注、四海吊答书、所余无几的内外族告丧书、僧道凶书、口吊仪、诸色祭文，而郑氏书仪插入其间的门风礼教、起复为外官、国哀奉慰、官遭忧遣使赴阙、敕使吊慰、衰服制度、五服制度以及‘妇人出嫁’和‘公卿士庶’的两种服式图都不见了，此外吉凶两部分的凡例和妇女书仪明显也在取消之列。可见原来朝廷礼制、士族懿范大体已不在张敖看重和选择的范围之内，而他所“谓的要者”除民间所重婚丧嫁娶的仪式庆吊之外，只剩官场往还和社会交游的礼式书疏了。

与《新集吉凶书仪》同样，张敖所撰《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及五代《新集书仪》等也大都是纂集前人书仪而来，这些书仪往往2
已无清楚的类目，内容划分也不严格。吉凶凡例多予取消，内外族吉凶书仪的数量大大下降，甚至在吉仪中只象征性地保留给祖父母父母、伯叔姑姨舅及夫与妻等少数几首应景文章。这种内外族书仪与开、天书仪相比大量减少的情况可以从对几件吉凶书仪比较中清楚地体现出来（详表1）。而与家族书仪减少和简化的同时，晚唐的敦煌书仪中也已不再出现反映朝廷礼制的笺表内容。但有一点却十分一致，即都是在简短的年序凡例之后，不厌其详地展示由四海书仪内逐渐发展来的官牍文范，即所谓贺官书、官僚起居状之类，使之成为书仪中最醒目和最主要的部分。

<table>
<thead>
<tr>
<th>年代</th>
<th>书仪名称</th>
<th>吉仪</th>
<th>数量（首）</th>
<th>凶仪</th>
<th>数量（首）</th>
<th>总数（首）</th>
</tr>
</thead>
<tbody>
<tr>
<td>开元</td>
<td>《吉凶书仪》（P.3442）</td>
<td>内族吉书仪（存2）</td>
<td>23</td>
<td>内族凶书仪（21）</td>
<td>47</td>
<td>70</td>
</tr>
<tr>
<td></td>
<td></td>
<td>外族吉书仪并婚书（10）</td>
<td></td>
<td>外族凶书仪（17）</td>
<td></td>
<td></td>
</tr>
<tr>
<td></td>
<td></td>
<td>妇人吉书仪（8）</td>
<td></td>
<td>妇人凶书仪（9）</td>
<td></td>
<td></td>
</tr>
<tr>
<td></td>
<td></td>
<td>僧尼道士（内外族）</td>
<td></td>
<td>僧尼道士（内外族）</td>
<td></td>
<td></td>
</tr>
<tr>
<td></td>
<td></td>
<td>吉书仪（3）</td>
<td></td>
<td>凶书仪（阙）</td>
<td></td>
<td></td>
</tr>
<tr>
<td>天宝</td>
<td>《新定书仪镜》（P.3637等）</td>
<td>内族吉书仪（阙）</td>
<td>36</td>
<td>内族凶书仪（12）</td>
<td>83</td>
<td>119</td>
</tr>
<tr>
<td></td>
<td></td>
<td>通婚书、婚礼祭文等（存6）</td>
<td>(?)</td>
<td>内族吊答书（12）</td>
<td>(?)</td>
<td>(?)</td>
</tr>
<tr>
<td></td>
<td></td>
<td>外族吉书仪（存10）</td>
<td></td>
<td>外族吊答书（12）</td>
<td></td>
<td></td>
</tr>
<tr>
<td></td>
<td></td>
<td>妇人吉书仪（20）①</td>
<td></td>
<td>外族吊答辞（存9）②</td>
<td></td>
<td></td>
</tr>
<tr>
<td></td>
<td></td>
<td>①</td>
<td></td>
<td>妇人吊答辞及其他（14）③</td>
<td></td>
<td></td>
</tr>
<tr>
<td></td>
<td></td>
<td>②</td>
<td></td>
<td>祭文、冥婚书（24）</td>
<td></td>
<td></td>
</tr>
</tbody>
</table>

①《新定书仪镜》作“妇人书题廿首”，但实为八首，且与《吉凶书仪》内容名目基本相同，疑有误。
②《新定书仪镜》书题原“作内外族及四海吊答辞廿首”，内《舅姨亡吊母辞》以下为内外族使用。
③《新定书仪镜》原“作妇人吊辞八首”，但列于下者除八首之外又有《妻父母亡夫吊答辞》《舅姑亡父母吊答辞》《男女亡舅姑父母吊》共六首，也属家族内使用。
和郑氏书仪相比,晚唐五代的吉凶书仪中,属于官场礼仪和官场生活性质的文范名目、数量被大大扩展了。张敖《新集吉凶书仪》取消了原郑氏书仪中与藩镇生活关系不大的“典史起居启”,而保留了关系最为直接的“僚属起居启状”,并且这部分也从郑氏书仪原来只有《起居启》《贺正冬启》《贺人改官启及加阶启》等,增加为《起居启、(僚属起居启状等)》《贺正献物状》《贺端午献物状》《谢赐物状》《谢蒙问疾并赐药物状》《边城职事遇疾乞替状》《蒙补职事谢语》《天使及宣慰使并敕书到贺语》等多种启状,及《贺四海朝友加官语》《四海平怀参慰语并书跋》等类似前揭《书仪镜》的“四海”书题。这类启状书题的对象由于是从上司、

①《新集书仪》中内外族书仪无题,仅散见《上祖父母及父母状》《上伯叔姑及伯(叔伯)》《夫与妻书》和《妻答书》四首。
长官“到四海朝友”，所以明显淡化了单纯的朋友氛围，却充满着下属恭礼上级和官场内相互逢迎的特色。时代更晚些的《新集书仪》(P.3691等)不仅有大同小异的名目，更有诸如《贺加官职书》《慰停职》《送客下担横过使》《打毬会》《每到州郡见节度使礼》《谢所[经]道州供给》《谢下顿》《迎天使顿上送书》《敕书到谢天使至》《使加官谢》《文官加官谢》《都头武官加官谢》《初入球场辞上马》《屈朝友等诸相识》《谢同筵席长》《谢药同胜相亚之官》《谢假》和宣扬节度使功德的《诸州节度使德并别幅》等二、三十首混在四海书仪中，内容涉及藩镇和地方政治、官员娱乐生活。这说明，愈到晚唐五代，吉凶书仪内属于官员往来性质的文范便愈多，实用性及地方色彩也就更浓厚。而以上几件晚唐书仪就是由于产生于敦煌，所以实际在一般民众之外，更迎合了归义军小朝廷领导的藩镇体制之下敦煌官僚社会的需要。

以上吉凶书仪中的许多官场文范虽看起来可用于公私之间，但无论形式、性质已纯属有固定规格及使用场合的官牍。事实上，它们的名目内容与下面将要谈到的某些表状笺启书仪已没有什么不同。吉凶书仪中官牍文范(特别是僚属上于节度使等地方长官的启状)、反映藩镇和地方生活的四海书仪的增加与朝廷礼制和内外族吉凶仪目的相对减少、简化，是综合性吉凶书仪变化最明显的方面。关于这一点，也可见于对晚唐五代几件比较完整的吉书仪内容数量分配比统计，在这个表中，三件书仪的官牍文范和四海书仪所占比重已分别是64.6%、57.2%和85.4%(详表2)。这说明初唐重家族礼仪的社会生活和以朝廷为中心的政治生活，到唐代后期已经是以社交为中心，而且愈来愈向地方藩镇和官场为中心转化。另外从传世司马光《书仪》可以看到，包括表(奏含表奏、
表式、状式)和公(文 含申状式、牒式)、私(书 含上尊官问候贺谢
大状、上书、启事、上尊官时候启状、上稍尊时候启状、与稍卑时候
起状、上尊官手启、别简、上稍尊手启、与平交手简、与稍卑手简、谒
大官大状、谒诸官平状、平交手刺、名纸)等的官场用各类公私文牍
与家书已被同列入一卷之中,其文牍名目显得更加规范,数量亦大
大超过家书。这都说明愈到后来,书仪总体上便愈是官牍化,此实
为唐后期五代表状笺启书仪产生甚至进而取代吉凶书仪的一个根
基,而官牍化逐渐抹杀两类书仪的界限,也成为中古书仪发展的大
趋势。

<table>
<thead>
<tr>
<th>书仪名称</th>
<th>总数(首)</th>
<th>内外族书仪(首)</th>
<th>百分比(%)</th>
<th>婚礼用书仪(首)</th>
<th>百分比(%)</th>
<th>四海书仪、状启类书仪(首)</th>
<th>百分比(%)</th>
<th>僧道书仪(首)</th>
<th>百分比(%)</th>
</tr>
</thead>
<tbody>
<tr>
<td>新集吉凶书仪上卷(P.2646等)</td>
<td>48</td>
<td>9</td>
<td>18.7</td>
<td>2</td>
<td>4.2</td>
<td>31</td>
<td>64.6</td>
<td>6</td>
<td>12.5</td>
</tr>
<tr>
<td>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P.3502v)</td>
<td>28</td>
<td>7</td>
<td>25</td>
<td>3</td>
<td>10.7</td>
<td>16</td>
<td>57.2</td>
<td>2</td>
<td>7.1</td>
</tr>
<tr>
<td>《新集书仪》(P.3691等)</td>
<td>106</td>
<td>4</td>
<td>3.8</td>
<td>6</td>
<td>5.7</td>
<td>91</td>
<td>85.8</td>
<td>5</td>
<td>4.7</td>
</tr>
</tbody>
</table>
第三章 表状笺启书仪探源

表状笺启书仪是敦煌所见第三大类书仪。它既不同于按月编排、专叙私交契阔的朋友书仪，亦不同于注重家族、集合礼教仪规的吉凶书仪，而是专门用于官场往还，涉及各类公私事务、人际关系的文牍。由于所用是表状笺启官文书形式，故研究者采之为总名。这类书仪敦煌发现总约三十余种、四十个卷号，近年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一书收入大部，已使其总体面目较为清晰。不过由于这类书仪以往不甚为人所知，涉及的内容又具体丰富，所以无论是各件书仪本身，还是同类书仪的系统性研究都有待进一步深入。

针对以往关于表状笺启书仪研究的薄弱环节，本书的讨论首先自书仪的渊源入手。由于此类书仪涉及两个方面，即一是书信的形成和官文书的来源，另一则是作为这一类书仪前身的公式文集在魏晋南北朝出现，故以下的论述即围绕这两方面进行。

一、尺牍之学与官文书的发展

表状笺启书仪与一般所谓吉凶书仪的不同，在于它所收公私文范虽也号称书信，却是地地道道按照朝廷规定的官文仪式书写的官牍。因此表状书仪的出现如追根求源则必离不开官文书的兴
盛,而官文书的兴盛,首先与尺牍之学的讲究密不可分。尺牍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魏晋以降公式文仪被作为一种实用文学体裁受到重视,从而直接促成了表状笺启文集的诞生。

(一)尺牍的来源及其意义
尺牍一词,其源甚早。《汉书》卷三四《韩信传》“有发一乘之使,奉咫尺之书”说。颜师古释曰:“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简牍或长咫,或长尺,喻轻率也。今俗言尺书,或言尺牍,盖其遗语耳。”《后汉书》卷一四《宗室四王三侯列传》章怀注也引《说文》解释说:“牍,书版也。盖长一尺,因取名焉。”尺牍长尺,又因作书于竹简、木简而得名,所以清人袁枚《随园随笔·尺牍》又曾以“《尔雅》:‘简谓之毕。’《说文》:‘简,牒也;牒,札也。’”又谓之牍。《史记·匈奴传》按此处实为引《汉书》同传文” :“汉以尺一牍。”注:“木简也。今云尺牍,便文尔。”《中庸疏》:“简、牒、毕同物而异名”等各种说法,来证明简、牒、毕诸物与尺牍的关系。王国维先生《简牍检署考》也得出“书契之用自刻画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后先,而以竹木之用为最广”和“简之长短,皆二十四之分数,牍皆五之倍数,意简者秦制牍也,汉制欤案”的结论。其中关于尺牍的尺寸,据《史记·匈奴传》《汉书·匈奴传》略同)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和“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大长”的说法,说明并不一定很固定,其大致的尺寸应该是八寸到一尺,根据需要也可以大一点,总之是在一尺上下。尺牍的长度和质地其实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奉咫尺之...
“书”与书信使用的问题。颜之推《颜氏家训》卷七《杂艺第十九》中提到：

真草书记，微须留意。江南谚云：‘尺牍书疏，同书’。案语有《后汉书·蔡邕传》中‘相见无期，唯是书疏，可以当面’，与江南谚微异的解释，已经说明尺牍就是书信或者书疏的代名。

尺牍既是书疏的代名，则一切公私书疏都应包括在内。欧阳修《与陈员外书》即言道：

古之书具，惟有铅刀、竹木。而削札为刺，止于达名姓；寓书于简，止于舒心意、为问好。唯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则曰符、曰檄；问讯列对，下而上者，则曰状；位等相往还，曰移、曰牒。非公之事，长吏或自以意晓其下以戒以敕者，则曰教；下吏以私自达于其属长，而有所候问请谢者，则曰笺、记、书、启。

所举书信，涵盖各种公文。而最早的书信似乎也与公函更有关系。《文心雕龙·书记二十五》论书疏，“举绕朝赠士会以策，子家与赵宣以书，巫臣之遗子反，子产之谏范宣”等多例证明春秋交聘之“际行人挈辞，多被翰墨”；并指“出及七国献书，诡丽辐辏；汉来笔札，辞气纷纭”的发展，所说大都为公文书翰。可见笔札书疏之盛是随着国家政权的建立和社会政治生活中交往的需要而产生的。

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尺牍一词往往用以指代公文。观前揭《汉书》之例便是如此。《史记》卷一○五《扁鹊仓公列传》记太仓公淳于意得罪，女缇萦救父，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称其廉平，今’。

①《欧阳永叔集》八《居士外集》卷一六，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简编本。
坐法当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集解》徐广曰”：一作‘赎’。）,虽欲改过自新,其道莫由,终不可得。妾愿人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书闻,上悲其意,此岁中亦除肉刑法。“对此太史公评论以为“是堤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此处之尺牍,固指堤萦上书而言《。晋书》卷五五《夏侯湛传》记夏侯湛举贤良,对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调,乃作《抵疑》以自广”。其辞有“今天子以茂德临天下,以八方六合为四境……乡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讽《急就》、习甲子者,皆奋笔扬文,议制论道……若乃群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带白,坐而论道者,又充路盈寝,黄幄玉阶之内,饱其尺牍矣”。他所“论”充路盈寝,黄幄玉阶之内”的尺牍,也非公卿士大夫所上朝廷公文莫属。大约也正是尺牍常常用于朝廷公文上书,所以自汉代始,人们提到尺牍,重视的便首先是字型书法。《后汉书》卷八《灵帝纪》光和元（年）178二月始置鸿都门学生”条注曰：“鸿都,门名也,于内置学。时其中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焉。同书卷六○下《邕蔡传》：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此条注引《汉书·艺文志》曰”：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引《音义》曰”：古文谓孔子壁中书也。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篆书谓小篆,盖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隶书亦程邈所献,主
于徒隶，从简易也。缪篆谓其文屈曲缠绕，所以摹印章也。虫书谓为虫鸟之形，所以书旙信也。“就此史料而言”，其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同召，不知是不是尺牍重书法的开始，但汉魏之际尺牍因书法见重的情况确实越来越多。《三国志》卷十一《魏书·管宁附胡昭传》言：“初，昭善史书，与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并有名，尺牍之迹，动见模楷焉。”"善史书"的说法在这里是指善隶书①，钟繇等人俱善文辞，但更以书法见长。同书卷二一《王卫二刘传》言卫“觊好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同卷附韦诞，裴注引《文章叙录》曰：“初，邯郸淳、卫觊及诞并善书，有名。觊孙恒撰《四体书势》，其序古文曰：‘自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其序篆书曰：‘秦时李斯号为工篆，诸山及铜人铭皆斯书也。汉建初中，扶风曹喜少异于斯而亦称善。邯郸淳师焉，略究其妙。韦诞师淳而不及也。’”由此可见，此中言尺牍“动见模楷”，突出的是书法。

言尺牍而专重书法，大约后世更甚，包括钟繇和王羲之父子在内，不少信札正是这样得以流传。言书法则不离尺牍，前揭《颜氏家训》所“说 尺牍书疏”也是“从真草书记”出发的。又《梁书》卷三《武帝纪》说“他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陈书》卷一六《蔡景历传》谓“其善尺牍，工草隶”；《隋书》卷六六《房彦谦传》称“他所有文笔，恢廓闲雅，有古人之深致。又善草隶，人有得其尺牍者，皆宝玩之”。尺牍既“与草隶”连在一起，“所宝玩”者自也是书法。在这方面魏晋已开先例，唐宋以后更莫此为甚。《旧唐书》卷一八九《欧阳询传》：询初学王羲之书，后更渐变其体，笔力险劲，为一时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73

“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彼观其迹,固谓其形魁唐梧耶。’”

太宗宝爱王氏书法,又曾谓虞世南有五绝,其一即书《急就章》。据说吴越的钱昱也是“因善笔札翰,工尺牍,太祖尝取观赏之,赐以御书金花扇及《宋史》卷四一○《娄机传》载:《急就章》”机深于书学,尺牍人多藏弆焉。”同书卷四四三《文苑·黄伯思传》称”:伯思好古文奇字,洛下公卿家商、周、秦、汉彝器款识,研究字画体制,悉能辨正是非,追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凡字书讨论备尽。初,淳化中博求方法书,命待诏王著续正法帖,伯思病其乖伪庞杂,考引载籍,咸有依据,作《刊误》二卷。由是篆、隶、正、行、草、章草、飞白皆至妙绝,得其尺牍者,多藏弆。

书法固为汉魏以降乃至后世人们重视和宝爱尺牍的一方面,但是与书法同时存在的,却还有它们作为实用文章应有的写作方式、内容文辞乃至从中体现的规则礼法等。这方面在当时显然是更重要的,特别是当它们形成为一种学问并且与表状笺启类的公文密切结合到一起以后,其意义就更加突出了。

(二)尺牍之学的形成和公式文的专门化

当尺牍书翰作为人们交往工具出现的时候,它们便逐渐会形成一些有别于其他文章的规则特点,例如我们从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中的开头称谓及“书不能悉意,略陈固陋,谨再拜”的结语就可以了解到早期书《旧唐书》卷七二《虞世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570页。《宋史》卷四八○《世家·吴越钱氏》,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3916页。《六臣注文选》卷四一,中华书局,1987年,第763—772页。
私人书信尚且如此，作为公式文牍更应有一定要求。当太史公评“价堤萦通尺牍”时，所说似乎并不止于堤萦会写信那么简单，而是指她明了给朝廷的上书应当有的规矩和写法。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从汉代始已经有了各种公式文的分别。东汉蔡邕《独断》就是现今所知对汉代官文书最早的研究。在他的书中已有“汉天子正号曰皇帝……其命令一曰册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和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的说法，从中可见对官文的分别及对各种公式文的说明。刘勰《文心雕龙·书记第二十五》论其发展缘由曰：若夫尊贵差序，则肃以节文。战国以前，君臣同书；秦汉立仪，始有表奏；王公国内，亦称奏书；张敞奏书于胶后，其义美矣。迄至后汉，稍有名品，公府奏记，而郡将（奏奉）笺。可见随着专制体制和尊卑等级的确立，官文已经开始成熟而有了不同的名目。作为不同名目、不同用途的官文有格式体例的特殊要求，前辈学者王国维、劳榦都曾专文论述汉代文书程式、文书用语程序及书牍封缄方法、封检形制乃至书牍封题。今学者结合不断出土的汉简，更有许多新的发现，他们的研究可以证实汉代的官文书制度已经相当严格和发达。魏晋南北朝以降，各类官文书的制作有了更加严格的规程。《宋书》卷一五《礼志二》《通典》卷七一《嘉礼一六》略同）记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449）东巡，有司奏皇太子监国仪注，内有各种公式文得体。①王国维《简牍检署考》，收入《王国维遗书》第九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王国维《屯戍丛残考释》，载《流沙坠简》，中华书局影印本，1993年；劳榦《汉书》的史书“与尺牍2期合刊。《大陆杂志》21卷1期。参见汪桂梅《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文的格式，包括‘某曹关某事’的常仪，尚书仆射、尚书左右丞‘某甲’启事的笺仪，太常主者寺押，某署令某甲辞‘某曹关太常甲乙启辞’的关事仪，某曹关司徒长史王甲启辞‘某曹关司徒长史王甲启辞’的上仪，外上事，内处报‘某曹关司徒长史王甲启辞’的下仪；还有关式、令书自内出下外仪‘令书自内出下外仪’、令书板文‘令书板文’、准尚书敕仪‘准尚书敕仪’、拜刺史二千石诫敕文‘拜刺史二千石诫敕文’等。其尚书敕仪下特注明：右并白纸书。凡内外应关笺之事，一准此为仪。其经宫臣者，依臣礼。这些文书虽皆为太子监国所用，但品种丰富，内容清晰完整，可谓南朝前期官文书的代表。从文书形式和说明语可知，诸种文书的签名画押、年月日、用语等都有各自固定的格式，某些看得出已是唐朝表状笺启的前身；且既然‘凡内外应关笺之事，一准此为仪’，说明公式文本身已有其标准的书法和仪范。

严格规程而具有不同要求的官文书形式是需要使用者特别是官吏们不断熟悉和掌握的，何况公私文翰从来都需要有优美的文辞来润饰，这样就有了‘文笔’之说。刘勰《文心雕龙·总术第四四》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刘师培先生已据此指出文笔应分论，如《南史》卷三四《颜延之传》谓：帝曾问以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卷五七《沈约传》：谢玄晖工于诗，任彦升工于笔。约兼而有之，然不能过也。《陈书》卷二六《徐陵传》：世祖、高宗之世，国家有大手笔，皆陵草之。同书卷三○《陆琼传》：及讨周迪、陈宝应等，都官符及诸大手笔，并中敕付琼。‘大手笔即诏诰类文书，所谓官牍史册之文，古概称笔’，笔是据事直言之意。也即‘凡文之偶而弗韵者，皆晋、宋……’

①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4—7页。
以来所谓笔类也。故当时人士于尺牍、书记之属，词有专工”。
在通“笔”的基础上更形成了个性风格。如《文心雕龙》所称：“观史迁之报任安，东方之(难)谒公孙，杨恽之酬会宗，子云之答刘歆，志气槃桓，各含殊采；并枢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
“至如陈遵占辞，百封各意；祢衡代书，亲疏得宜，斯又尺牍之偏才也。”其中陈遵事又见《汉书》卷九二《游侠传》，称“其略涉书记，赡于文辞。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因治私书谢京师故人”，口占；书吏，且省官事，书数百封，亲疏各有异。他的事说明当时人们宝爱甚至收藏尺牍已有看重个人辞采的一方面。
与此相关，尺牍之作便愈来愈受到重视。这一点在汉代虽然还不甚明显，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之际，尺牍书翰作为写作特长就愈来愈频繁地被与士人联系在一起。如《世说新语·品藻第九》注引孙盛《晋阳秋》文帝子齐王攸”，能属文，善尺牍”《。晋书》卷八二《习凿齿传》言“其每处机要，莅事有绩，善尺牍论议(桓)温甚器遇之”。南朝宋朱龄石与弟超石“虽出自将家，兄弟并闲尺牍”。徐湛之”善于尺牍，音辞流畅”。“齐(周)颙善尺牍，沈攸之送绝交书，太祖口授令颙裁答”。
梁“邵陵携王纶字世调，高祖第六子也。少聪颖，博学善属文，尤工尺牍”。
褚修“天监中，历官五经博士。修少传父业，兼通《孝经》《论语》，善尺牍，颇解文章”④“《南齐书》卷四一《周颙传》④《梁书》卷二九《高祖三王传》④《梁书》卷四七《孝行·褚修传》④《南齐书》卷四一《周颙传》④《梁书》卷四七《孝行·褚修传》④《梁书》卷四七《孝行·褚修传》。
“孙瑒少倜傥，好谋。北朝也有如略，博涉经史，尤便书翰”，涉历经史，习崔浩之书，尺牍文章见称于世的郭祚②，“及学不渊洽，而历览书史，闲习尺牍，札翰往还，甚有意理”，性雅正，工尺牍，涉猎群书的夏侯道迁、曹世表之辈③。

以上所引人物传记中尺牍和书翰一再单独提出，说明魏晋以来特别是南北朝之际书信已逐渐形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或体裁，即有“尺牍”之学。特别“是工尺牍”也和“涉猎经史”、“博学善属文”一起，被视为一种值得称道和效法的文学修养，而此种学问修养又首先为世族所具备。如《北齐书》卷三九记博陵崔季舒“少孤，性明敏，涉猎经史，长于尺牍，有当世才具”。同书卷三八《柳元景附柳恽传》：“少有志行，好学。与陈郡谢，深见友爱。曰：‘宅南柳郎，可为仪表。’”

“勉既闲尺牍，兼善辞令”，又称“他博通经史，多识前载，齐世王俭居职已后，莫有逮者。朝仪国典，昏冠吉凶，勉皆预图议。”

尺牍之学是世族显示其博学和修养的一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当然也就产生了时世所需的书仪。但是在已述月仪、吉凶书仪和表状笺启书仪三种当中，对于社会政治生活影响最重者又是第三种。说明这一点，首先应提到的是尺牍书翰与制作公式文的关系。与此相关，时人提到尺牍之长，往往不离制作者的应对敏捷。

《宋书》卷四二《刘穆之传》：穆之与朱龄石并便尺牍，尝于高祖坐与龄石答书。自旦①。

①《陈书》卷二五《孙瑒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19页。

②《魏书》卷六四《郭祚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421页。

③《魏书》卷七一《夏侯道迁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583页。《北史》卷四五《曹世表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677页。
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龄石得八十函，而穆之应对无废也。刘穆之与朱龄石的尺牍应对，大概比的不止是文辞丰赡，更在于应答迅速。与之相似者又如范云，少机警，有识具。善属文，便尺牍，下笔辄成，未尝定藁，时人每疑其宿构。勉虽文案填积，坐客。臧质，充满，应对如流，手不停笔。涉猎史籍，尺牍便敏，既有气干，好言兵权。如此类者当然是职掌各级公府文翰的高才。《北齐书》卷四五《颜之推传》载：“其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辩，工尺牍，应对闲明。大为祖珽所重，令掌知馆事，判署文书。”《周书》卷三四《裴宽附裴汉传》也称：“汉善尺牍，尤便簿领，理识明赡，决断如流。相府为之语曰：‘但是南北朝战乱之际，日下灿烂有裴汉。’军书羽檄，最为频繁，以致常常是书翰往反，日百余牒，须待随机报答。这便使尺牍高才与制作军事文书发生了密切关系，上述刘穆之与朱龄石、超石等在刘毅帐下即属此类，而能够制作军旅书翰的人才因此便成为朝廷和地方军政势力急剧征求和大量辟用的对象。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事实上是以掌表状书启的诸王将军记室出身而逐渐知名，且由地方步入中央的。他们的应时而用使表状书启的制作和尺牍书翰知识的普及成为一而二、二而一的两件事。而这一点，配合公式文的不断成熟和形式化，正是表状笺启文集和书仪形成的基础。关于此，这里只是约略及之，本章下面还有进一步

①《梁书》卷一三《范云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29页。
②《南史》卷六○《徐勉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478页；《梁书》卷二五《徐勉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78页同。
③《宋书》卷七四《臧质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910页。
④《周书》卷三二《卢柔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63页。
二、表状笺启书仪的汉魏南北朝之源

从学者以往的研究,我们了解到表状笺启书仪不但形式内容与专叙朋友契阔的月仪（即《朋友书仪》）和以婚丧礼仪、节庆仪规等为主的吉凶书仪不同,且产生年代也在其他两类书仪之后。敦煌发现的这种专门的表状仪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属晚唐五代作品。

表状笺启书仪虽然大多产生于晚唐五代,并且从一个方面,它也可视作是吉凶书仪中表状文范的独立形式;但是另一方面,根据公式文的发展,在史籍记录的魏晋南北朝相关文集中,我们也不难找到它的刍型。

(一)书仪的目录归属与魏晋南北朝的公式文集

与寻求书仪的来源有关,我们注意到,各类书仪在目录中的归属十分重要。正如上面章节已指出的,《月仪》类著作,是被记在经部小学类的童蒙著作之后;综合性的吉凶书仪是被放入史部仪注类,作为俗礼书对待;而表状笺启书仪虽然事实上也是供人模仿且有教化意义的书仪,古人给它的定位却很不相同。据王重民先生指出性质与《记室备要》相近的李太华《掌记略》等及敦煌所见刘邺《甘棠集》都没有与月仪或吉凶书仪放在一起,而是放在《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的文集类之中,这说明,传统上表状笺启书仪是被看作文集的。

表状笺启书仪被归为文集类并不奇怪,其形式大体可以分成
两种，即一种为实用过的表、状、笺、启书信集成。敦煌书仪中《甘棠集》《新集杂别纸》都比较典型。这类书仪一般都有明确致书对象，当然是属个人创作或集中多人制作的书信文集。

另一种则是无具体人名、事件，按照表、状、笺、启规定套式设计的范文样本，属于这种类型的有《记室备要》《刺史书仪》等。这些书状都是预先设想，用来应付某种关系、场合的官文形式，不是即时创作，内容语言也是约定俗成的一定之规，自然这种情况才是一般意义上标准化的书仪。不过，后者却是在前者基础上的归纳和定型，是具体表状笺启文集的抽象化，而在性质上亦与文集相似。特别是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供他人模仿，所以旧史家并没有将两种情况加以区分，而是皆列入文集类，今人则从其制作目的出发划归书仪，两者其实并无太多差别。

表状笺启书仪既与文集相通，则如从文集的角度寻觅，便不难发现其渊源。事实上表状专集的制作早已有之。在《隋书》卷三五《经籍志》总集类，即列入汉魏南北朝此类文集多部，与诏制集并行，唯数量较之略少；但唐初修书时尚存有虞和撰《上法书表》一卷、梁邵陵王撰《梁中表》十一卷《杂露布》十二卷《山公启事》三卷《范宁启事》三卷《梁、魏、周、齐、陈皇朝聘使杂启》九卷、晋散骑常侍王履撰《书集》八十八卷《书林》十卷、徐爰撰《杂佚书》六卷《后周与齐军国书》二卷、《高澄与侯景书》一卷等十余种，此外还有从阮孝绪《七录》中辑录的佚书。如《梁中表》下注曰：”梁邵陵王撰。梁有《汉名臣奏》三十卷《魏名臣奏》三十卷，陈长寿撰《魏杂事》七卷《晋诸公奏》十一卷《杂表奏驳》三十五卷《汉丞相匡衡大司马王凤奏》五卷《刘隗奏》五卷《孔群奏》二十二卷《晋金
司紫光禄大夫周闵奏事》四卷《, 晋中丞刘邵奏事》六卷《, 中丞马无忌高崧奏事》五卷, 又奏事》十三卷《, 中丞虞谷奏事》六卷, 中丞《诸弹事》等十四部, 亡。《" 杂露布》十二卷下注曰”: 梁有《 杂檄文》十七卷《, 魏武帝露布文》九卷, 亡。《" 范宁启事》三卷下注”: 梁有《 杂荐文》十二卷《, 荐文集》七卷, 亡。《" 杂佚书》六卷下注”: 梁二十抱朴二卷, 徐爰撰《; 应璩书林》八卷, 夏赤松撰《; 君书》一卷, 葛洪撰《; 蔡司徒书》三卷, 蔡谟撰《; 前汉杂笔》十卷《, 吴晋杂笔》九卷, 《吴朝文》二十四卷《, 李氏家书》八卷, 晋左将军《王镇恶与刘丹阳书》一卷, 亡。以上记载说明表状笺启文集汉魏以来已十分丰富。其中分门别类, 从名称看, “除家书”大约完全属于私人书信, 其他表奏檄书应都是关系军国政事“的大手笔("包括书"、杂笔”一类和前面混入《吉凶书仪》中的谢朏《书笔仪》可能也含有这类文章), 它们是典型的官书文集, 其名称与内容适相一致。

前节已指出汉魏以降是表状笺启公式文的成熟期。表状文集的出现看来与公式文的成熟是同步的, 但它们同样也有各自的内

前节已指出汉魏以降是表状笺启公式文的成熟期。表状文集的出现看来与公式文的成熟是同步的, 但它们同样也有各自的内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后众情乃寝。涛所奏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时称《 山公启事》。据传
言山涛所居选职为吏部尚书,”从 甄拔人物,各为题目”及晋武帝所
要求“的 不遗疏远单贱”来看,专为举荐而形成”启事”类著作,可
能还是与魏晋以降所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有关。

(二) 记室文学的派生发展
表状笺启文集虽来源不同,但与魏晋南北朝重文的传统和风
气显然分不开。在这种风气下,事实上已形成了如前所述公文尺
牍也即表章奏议等的专门之学。如《 文心雕龙》所说”:原夫章表之
为用也,所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国华。章以造
阙,风矩应明;表以致(禁 策),骨采宜耀;循名课实,以(章 文)为本
者也”。“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强志足
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体也”。“启者开
也。高宗云:‘启乃心,沃朕心’,取其义也……自晋来盛’启’,用兼
表奏。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必敛饬人
规,促其音节,辨要轻清,文而不侈,亦启之大略也。”至于檄书露布
等,更别具一格”: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或称露
布,露布者,盖露板不封,播诸视听也。”“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
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标蓍龟于前验,悬鞶
鉴于已然,虽本国信,实参兵诈……故其植义扬词,务在刚健。插
羽以示迅,不可使词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意隐;必事昭而理辨,
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

周振甫《 文心雕龙今译》,《 章表第二十二》《 奏启第二十三》及《 移檄第二十》等
节,中 华书 局,1986年,第207、213、216、187、190—191页。
各类公式文章,既有不同的用途与要求,又大为世所需,则它们的制作也就备受重视。但并不是每一个文人词臣都会写这类文章,如曹魏王粲才学曾为蔡邕所赏,《三国志》卷二一《魏书·王粲传》裴注引《典略》曰:“才既高,辩论应机。钟繇、王朗等各为卿相,至于朝廷奏议,皆阁笔不能措手。”钟繇、王朗地位虽高,但奏议却非所长。而与王粲一样议论纵横的还有陈琳和阮瑀。陈琳曾为袁绍典文章,袁败归曹;阮瑀少学于蔡邕,太祖并以琳、瑀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脍炙人口而曾令孙权众将失色的曹操近者奉辞伐罪之赤壁战书不知是否出自其人之手,然文帝《与吴质书》曾称赞道:“孔(璋)琳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典论》亦曰:“琳、瑀之章表书可见表章制作已成为一种特殊记,今之也。”

......

表章之作既为人所重,则相关人才自也不乏用武之地,特别是战争期间。《北史》卷八三《文苑传》论东晋十六国之乱:“既而中州板荡,戎敌交侵,僭伪相属,生灵涂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潜思于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亦有时而间出矣。”不少文学之士皆迫于仓促,牵于战阵,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可见彼时文人虽未必发达,但表章制作却特然秀出,而南北......

① 引文均见《三国志》卷二一《魏书·王卫二刘传第二十一》及裴注,中华书局标点602第页。
朝的政局尤为此类人士提供了机会。其时表状笺檄虽有不少是中
朝重臣所（为 如《 隋书·经籍志》所见汉匡衡王凤、晋刘隗刘邵等
作),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像陈琳、阮瑀那样的宰相将军记室之作。
《 文选》卷三八有傅（亮 季有《） 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一首》《、 为宋
公求加赠刘前军表一首》,任(昉 彦升《) 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表一
首》及同人其他四表;卷四○有任(昉 彦升《) 到大司马记室笺一
首》《、 劝进今上笺一首》,及谢(朓 玄晖《) 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一
首》。按据《 宋书》卷四三《 傅亮传》"谓 亮博涉经史,尤善文词",曾
为刘毅辅军记室参军,后为中书侍郎,从刘裕讨司马休之",以为太
尉从事中郎,掌记室”；刘宋建国”,入直中书省,专典诰命”。所以
史”称 高祖登庸之始,文笔皆是记室参军滕演,北征广固,悉委长史
自此后至于受命,表策文诰,皆亮辞也”,是从掌记室文翰到
掌中朝诏诰的实例。谢朓据《 南齐书》卷四七本传曾为随王萧子隆
府属,以文才尤被赏爱”,迁新安王记室,笺辞子隆”,即上述也。传
载“齐 高(宗 明帝)辅政,以朓为骠骑咨议,领记室,掌霸府文笔,又
掌中书诏诰”,为中书郎,转吏部郎,曾撰敬皇后迁祔哀策文”,齐世
莫有及者”。至于任昉,则少时即有文辞优美的《 月仪》问世《, 南
史》卷五九本传载其后任司徒竟陵王记室参军和齐明帝时的东宫
书记”,昉尤长为笔,颇慕傅亮才思无穷,当时王公表奏无不请焉。
昉起草即成,不加点窜。沈约一代辞宗,深所推挹”。“梁武帝克建
业,霸府初开,以为骠骑记室参军,专主文翰……梁台建,禅让文
诰,多昉所具。"除上述表笺外《, 文选》还载有他的启与弹奏。从
《 月仪》到朝廷官文表诰,任昉显然是在公私笺札方面都有建树的
大家。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85

自东汉以来，记室为掌文要职，且战乱割据中最得发挥。《南史》卷二四《王晏传》记齐武帝为晋熙王镇西长史时，板晏为记室。晏后随武帝征战，专心奉事，军旅书翰皆见委。同书卷六八《赵知礼传》记知礼涉猎文史，善书翰。陈武帝之讨元景仲也，或荐之，引为书记。知礼为文赡速，每占授军书，下笔便就，率皆称旨。由是恒侍左右，深被委任，当时计画，莫不预焉。武帝征侯景，至白茅湾，上表于梁元帝及与王僧辩论军事，其文并知礼所制。同卷《蔡景历传》记景历少家贫好学，善尺牍，工草隶。侯景平，陈武帝以书要之，景历对使人答书，笔不停缀，文无所改。帝得书，甚加钦赏，即日授征北府中记室参军，仍领记室。武帝将讨王僧辩，部分即毕，召令草檄，景历援笔立成，词义感激，事皆称旨。《南史》卷末论他和赵知礼二人，以“为属陈武经纶之日，居文房书记之任，此乃宋、齐之初傅亮、王俭之职。若乃校其才用，理不同，而卒能膺务济时，盖其遇也”。又同卷《毛喜传》，毛喜曾为陈建与周通好之策，井迎柳皇后及后主返国，是周陈通和的重要人物。天嘉三年至都，宣帝时为骠骑将军，仍以喜为咨议参军，领中记室，府朝文翰，皆喜词也。此外又有沈炯、丘巨源、韩晃等人，皆有任掌书记历史，其或以羽檄军书，或以笔翰、表奏诏诰知名，为当时所重。北朝人士如魏收、薛道衡、刘臻等人大致也有相同的经。①参见《北史》卷五六《魏收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026页；卷三六《薛道衡传》，第1340页；卷八三《文苑·刘臻传》，第2809页；并同传史臣论，第2779-2782页。
诰,文章声名被播于天下,可能就是表章之学得以兴盛、表状笺启文集得以出现形成的一个原因和基础。这一点无疑会对唐人后来文集的制作有所启发,所以汉魏记室文章实已开后来唐藩镇幕府文学之先河,而表状笺启及其文集制作唐人也必步前人之后尘。尽管上面所谈到的文集还仅仅是某一种类文章的合集而与书仪不同,且作为记室的个人专集也少见,但它们作为文范的意义不可低估。当然就表状文之制作而言,唐代直接上承南北朝,其中更不应忽视选学的作用。梁昭明太子《文选序》中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充分表明了对这一类文的欣赏。全书对公式文以诏、册、令、教等十数类分目和所收大量文篇,足以证明这类文章的地位,它所造成的影响是更深远的。从总的情况看,表状文集的出现是时势的需要,唐代在这方面的发展只是时间问题。但时代不同,两者并非简单重复,这一点也是下面将要谈到的。
第四章 唐五代表状笺启书仪

敦煌唐五代表状笺启书仪的大量出现,引起了我们对同期同类书仪如何产生的思考。在魏晋南北朝群雄争霸、政权分立的时代后,唐后期的藩镇割据和动乱确实又一次地促成了这类文集和书仪的新繁荣。在敦煌文献之外,正史目录书和其他史料给予了更多的证明。据我们粗略的统计,已达100余部。像任何一种文学体裁和创作一样,其兴衰都非无故。表状笺启书仪文集在唐代的出现虽晚于吉凶书仪,但就品种数量而言明显后来居上,是与社会政治变化下的需求分不开的。不过社会发展既有阶段性,文集和书仪产生的过程原因也是复杂的,这需要我们给予更合理的解释。

一、唐代表状笺启书仪文集的产生年代与分类

唐代表状笺启文集在前期并不发达,但是在唐中期以后呈现了渐次增加的态势,到晚唐五代出现高潮。种类则有与制诰集并举的中朝表状奏议集和来自地方的各类公式文集,后者常常由地方掌书记制作,晚唐以后,更形成异彩纷呈的局面。
有唐一代，对于制诰表章之重视不言而喻。《唐六典》卷一载唐制，将公式文分为“上之所以逮下”的“制、敕、册、令、教、符”和“下之所以达上”的“表、状、笺、启、牒、辞”，对于它们的使用对象作了严格区分。但翻开目录书，有一个事实却不得不注意，就是唐前期制诰集或表状集之类的著作甚少。《旧唐书·经籍志》所载开元四部书目中，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此类专集，尚存《书集》《书林此书著录为二百五》《山涛启事》《范宁启事》和《梁中书表集》等数种，但唐人的新作却几乎不见。《新唐书·艺文志》，关于唐前期表状集也只有郭元振《九谏书》、吴兢《唐名臣奏》及《崔融表集》数部，其中尚不排除有唐后期五代人纂集者。制诰表状集的制作唐前期显然未时尚。

但是唐后期的情况显然不同。如细阅《新唐书·艺文志》的文集部分，可发现载录有相当多的表状笺启类文集。其中可以从目录确定内容者即不下三十余种，时间则自中唐至晚唐。除刘邺《甘棠集》和王重民先生已指出的李太华《掌记略》《新掌记略》、林逢《续掌记略》之外，又有诸如陆贽《论议表疏集》十二卷、马揔《奏议集》三十卷、蒋偕集《李绛论事集》三卷、令狐楚《表奏集》、自称《白云子表奏集》十卷、赵璘《表状集》一卷《临淮尺题》二（卷题武元衡西川从事撰）、温庭筠《汉南真稾》十卷、李商隐《樊南甲、乙集》各二十卷、臧家猷《羽书》三卷、沈常《总戎集》三十卷、顾云《启事》一卷（另有所《集遗具录》一卷，内容不详）、黄台《江西表状》二卷、李巨川《四六集》二卷，薛逢《别纸》十三卷、夏侯韫《大中年与凉州书》等。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89
一卷、崔致远《四六》一卷《桂苑笔耕》二十卷、及《李程表状》一卷、《吴武陵书》一卷《刘三复表状》十卷《李磎表疏》一卷《张浚表状》一卷、还有不知撰人名的《类表(注“云亦名《表启集》”《崇文总目》题曹恩撰《宋史》卷二○九《艺文志》题李吉甫撰)五十卷,以及封敖《翰稾》八卷,后三部可能郑畋《凤池稾草》《续凤池稾草(杂有制诰,不详)各三十卷等。如再参以《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等其他目录书,则唐五代可称“为表状笺启”类的书目至少已有百余部之多(参附表3),足征此类文集中晚唐以降十分普遍。

(二) 唐五代传世表状笺启文集的品目

表状笺启类文集名目众多,但就内容而言仍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即题名为表状、奏议或论事集者,这种文集以给皇帝和朝廷的表状为主。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是朝廷重臣或中朝名士所作,如陆贽《论议表疏集》、令狐楚《表奏集》,以及《李绛论事集》《李程表状》《李磎表疏》《张濬表状》等大都应属此类。此类作品从制作者和内容看层次较高,它们与同时出品的制诰集性质十分接近。《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制诰集亦有多部,如杨炎《制集》、常衮《诏集》、权德舆《制集》、武儒衡《制集》、李虞仲《制集》、段文昌《诏诰》、崔嘏《制诰集》、刘崇望《制集》、李磎《制集》等多部。此外,还有如陆贽《翰苑集(注“云韦处厚纂”)那样的诏敕表奏合集。制诰是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之作,制诰集的作者更是其中的名士。内中不少人,如杨炎、常衮、权德舆、段文昌、刘崇望都任至宰相。而表状集的作者陆贽、李绛、李程、李磎、张濬等身份也与之相当。如前所述,制诰、表状只不过是上传下达的功能不同,它们同是政治生活的产物,在唐代的中央朝廷,它们的制作很难截然分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开，所以制诰集与表状集的作者不仅身份相同，有时也合二为一。如李磎既有制诰集又有表疏集《。 全唐文》卷四九三权德舆《 唐赠兵部尚书宣公陆贽翰苑集序》谓《 翰苑集》有制诰十卷、奏表七卷、奏议七卷、别集十五卷，其《 论议表疏集》仅十二卷，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总之出自中朝的这些表状集与制诰集同样是大制作、大手笔的代表。

不过有一点却不可否认，表状集的制作背景毕竟不完全等同制诰，这是由于它们的来源并不都是在中朝。一些表状集的作者在入朝前已有在藩镇任职的历史。例如令狐楚早年长期任河东节度使从事、掌书记①，后虽入朝为官，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等，但其《 奏议集(》 又称《 白云孺子表奏集》)的创作应包括在藩镇部分。今集虽佚，但保存下来的文作尚有《 为郑儋尚书谢河中节度使表》、《 代太原李仆射慰义章公主薨表》等，可以推测其《 奏议集》有相当部分是任掌书记时的作品。同样，曾有《 奏议集》问世的马揔，虽然亦为朝廷重臣，但一生多任外职，曾相继为淮西、忠武、天平军节度使《。 旧唐书》卷一五七本传说“他 理道素优，军政多暇，公务之余，手不释卷”所撰《 奏议集》的主要部分，应为任节镇时作。此外，更有一些如黄台《 江西表状》，从书名看即知表状来自江西。据《 新唐书·艺文志》，作者乃是僖宗时任过江西观察(使 昭宗朝升为镇南军节度使)的钟传从事，表状应代钟传所作。这种来自地方的表状集虽也名为表状，但有些在性质上显然与我们所说的下面一种文集更为接近。

表状笺启文集中的另一类较前类数量为多，它们的内容比较①《 旧唐书》卷一七二《 令狐楚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459页。
庞杂，规格较前者为低，且与前者的多出中朝相反，此类文集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地方特色极为明显。正如王重民先生所指出，类似《记室备要》《甘棠集》之类的作品从题目中即反映是出自藩镇掌书记之手，一些作品也是因为标注地名而显示了鲜明的地域性。如《汉南真稾》《吴越掌记集》《湘南应用集》等，使人一望而知这些作品产生的地区。其中《汉南真稾》的作者温庭筠曾为襄阳节度使巡官，襄阳在汉水之南，故集“称汉南”。同样《吴越掌记集》和《湘南应用集》的作者罗衮也曾从事吴越钱镠及湖南于瓌，其作品也是掌记文学的产物。这类文集规格较前类为低，除了作者的层次以外，还由于它们的内容常常不是表状或主要不是表状。这一点，从它们被名“为启事，、书词”、军书”、羽书”、羽檄”、尺题，甚至“刀笔”、别纸”、四六集”等即可得知。结合史料记载和敦煌所见表状笺启书仪文集，知这些名称下反映的内容已不是围绕皇帝和朝廷为中心，而是多为藩镇和各级官府官员所用，带有相当大的地方实用政治色彩。例如其中的羽檄、军书固为藩镇混战中所常见，而本用以形容文风快捷、犀利的所谓刀尺、刀笔者更证明是掌书记们的看家之作。从文献所记载的这类文集看，其始出现虽然自唐中（期如武元衡西川从事作《临淮尺题》），但是大量的作品多在晚唐以后。它们随着藩镇从事和掌书记们的军旅生活产生，而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动乱年代尤多。这种情况，与敦煌表状笺启书仪相一致。第二种表状笺启文集既多是掌书记们的“随计”“或“马上”之物，则此类文集的撰成基本上便是原来实用过的表状笺启集成。以李商隐《樊南甲、乙集》为例，其《樊南甲集序》称自投令狐楚门下“敕定奏记，始通今体”，后“至大中元年，被奏入岭当表记，所为亦“
多。冬如南郡,舟中忽复括其所藏,火燹墨污,半有堕落。因削笔衡山,洗砚湘江,以类相等色得四百二十三件,作二十卷,唤曰《樊南四六》。《樊南四六序》亦谓是自桂广郑亚处至剑南西川柳仲郢幕下任掌书记”,所为已五六百篇,其间可取者,四百而已。后因友人收集,恳请索要,故会前四六置京师不可取者,乃强连桂林至是所可取者,以时以类,以为二十编,名之曰《四六乙》。是知其《樊南文集》实为收集旧作而成。无独有偶,罗隐《湘南应用集序》也谈到文集的由来:咸通中,河南(公于瓌)按察长沙郡,隐因请事笔砚,以资甘旨 (“即任掌书记),及得衡阳县主簿,乞假归觐,阻风于洞庭青草间。因思湘南文书,十不一二,盖以失落于马上军前故也。今分为三卷,而举牒祠祭者亦与焉。①

从李商隐及罗隐的文集序以及前举数人制作文集的情况,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以往不曾被注意到的问题,那就是这些表状笺启集常常都是由掌书记们自己制作,而不是由他人收集的。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其中的书信都是由他们本人保存于马上军前。这些书信多是代笔,有些是公事应酬,对于个人而言,其内容并无意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从上至下,从朝廷到地方,表状笺启的官文书信也是所谓大手笔、大文章而受到重视,这是晚唐五代社会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唐人当作个人成就,看待它们并不下于诗词歌赋,有些甚至还常常被作为可以炫耀的资本和供人学习模仿的榜样。而唐五代会出现这样多的掌书记个人文集,也是与前朝的极大不同之处。

但李、罗二人的序也说明,他们的著作不过是集兵燹散失之

①《全唐文》卷八九五,中华书局影印本,第9344—9345页。
由此可以想见，今所见文献目录中的表状笺启文集及此类文作也是历次劫余仅存，是当时众多文集制作中的一小部分。敦煌文献中的表状笺启书仪文集为之作了大量补充，并提供实例引起我们的重视。当然除了此类专集外，今存正史和唐人诗文集中还有表状笺启的大量制作，如李德裕的《会昌一品集》即保存了作者这方面的重要文作。结合文集和文作，不难使人对唐代表状笺启类文章的发展产生更深的印象。

这里还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上述表状文集大多为掌书记的马上军前之作，属于旧作集成性质，且目录记载的文集已多佚失，所以仅凭目录，已很难分辨当中究竟有哪些是与《记室备要》类似已形成标准化的书仪。估计此类书仪就数量而言，恐怕比单纯文集要少。不过《记室备要》及同类敦煌书（仪如《刺史书仪》、归义军时代表状集等）出现，已足可证明它们的存在。这类在前述文集基础上产生，而又进一步程序化、规范化的书仪更加表明了表状笺启类文作和文集在晚唐五代中央地方复杂政治关系下运作的意义。它们的出现和发展也表明表状笺启类的公牍文范已是官僚社会形成和成熟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正因为如此，表状笺启类文集和书仪在宋以后依然存在。《宋史》卷二百八《艺文志》七在《丁谓集》和《宋祁集》之下各录有《刀笔集》二卷和二十卷，又有刘筠《中山刀笔集》三卷、《表奏集》六卷，范仲淹《尺牍》二卷、《奏议》十五卷，黄庭坚《书尺》十五卷等多部，类似文集应是唐五代表状笺启类文集的继续。而正如周一良先生已指出的，沿着《记室备要》系统，从两宋到（清）事实上也包括近代的官僚社会，也始终有着应用文式的文牍书仪存在。不过这些文牍大多已抽去了它们曾有过的时代政治色彩，而成为官僚文人和一
<table>
<thead>
<tr>
<th>作者</th>
<th>书名</th>
<th>卷数</th>
<th>史料来源</th>
</tr>
</thead>
<tbody>
<tr>
<td>郭元振</td>
<td>《九谏书》</td>
<td>1</td>
<td>《新唐书》卷六○《艺文志》四。</td>
</tr>
<tr>
<td></td>
<td>《崔融表集》</td>
<td>4</td>
<td>《崇文总目》卷五。</td>
</tr>
<tr>
<td>吴兢编撰</td>
<td>《唐名臣奏》</td>
<td>10</td>
<td>《新唐书》卷六○《艺文志》四。《崇文总目》卷五作七卷。《宋史》卷二○九《艺文志》八亦有同名书七卷，不注撰人。</td>
</tr>
<tr>
<td>颜师古、张九龄等撰</td>
<td>《唐初表草》</td>
<td>1</td>
<td>《崇文总目》卷五，《宋史》卷二○九《艺文志》称《唐初表章》。</td>
</tr>
<tr>
<td></td>
<td>《贺知章人道表》</td>
<td>1</td>
<td>《宋史》卷二○八《艺文志》七，《崇文总目》卷五。</td>
</tr>
<tr>
<td>释不空</td>
<td>《代宗朝赠司空大辩正广智三藏和尚表制集》</td>
<td>6</td>
<td>《大正新修大藏经》52册。</td>
</tr>
<tr>
<td></td>
<td>《郭子仪表奏》《郭子仪奏议》</td>
<td>5</td>
<td>《宋史》卷二○八《艺文志》七，并见《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一。</td>
</tr>
<tr>
<td>戴叔伦</td>
<td>《书状》</td>
<td>1</td>
<td>《郡斋读书志》卷一八。</td>
</tr>
<tr>
<td>陆贽</td>
<td>《论议表疏集》②</td>
<td>12</td>
<td>《新唐书》卷六○《艺文志》四。</td>
</tr>
</tbody>
</table>

① 表的制作参考《新唐书》与《宋史》的《艺文志》、《文献通考》、《玉海》及《崇文总目》等，并参考《唐研究》第一卷载陈尚君《〈新唐书·艺文志〉补集部别集类》北京—192页。对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9页肯定专属中书制诰类的文集一般不载。

② 按据晁氏云，“旧《翰苑集》外，有《膀子集》五卷，议论集三卷。元佑中，苏子瞻乞校正进呈，改从今名。疑是时裒诸集以成之。”又《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六著录《陆宣公集》二十二卷，曰：权德舆为序，称《制诰集》十三卷，奏草》七卷，《中书奏议》七卷，今所存者
<table>
<thead>
<tr>
<th>作者</th>
<th>书名</th>
<th>卷数</th>
<th>史料来源</th>
</tr>
</thead>
<tbody>
<tr>
<td>题武元衡西川从事撰</td>
<td>《临淮尺题》</td>
<td>2</td>
<td>《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四，《宋史》卷二〇九、《艺文志》八有不注撰人名，《临淮尺题集》2卷，应为同一书。</td>
</tr>
<tr>
<td>马德</td>
<td>《奏议集》</td>
<td>3</td>
<td>《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四，《玉海》、《宋史》卷二〇九、《艺文志》八均作20卷。</td>
</tr>
<tr>
<td>蒋偕（集）</td>
<td>《李绛论事集》</td>
<td>3</td>
<td>《旧唐书》卷一五七《马德（德）传》、《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玉海》、《宋史》卷二〇九、《艺文志》八均作20卷。</td>
</tr>
<tr>
<td></td>
<td>《类表》（亦名《表启集》）</td>
<td>50</td>
<td>《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四不注撰人名，《崇文总目》卷五题曹恩撰，《宋史》卷二〇九《艺文志》作李吉甫撰。</td>
</tr>
<tr>
<td>令狐楚</td>
<td>《表奏集》（自称为《白云孺子表奏集》）</td>
<td>10</td>
<td>《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四，《宋史》卷二〇九《艺文志》作《令狐楚表奏集》。《崇文总目》作《章奏集》，20卷。</td>
</tr>
<tr>
<td></td>
<td>《吴武陵书》</td>
<td>1</td>
<td>《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崇文总目》卷五。</td>
</tr>
<tr>
<td>令狐绹</td>
<td>《令狐绹表疏》</td>
<td>1</td>
<td>《宋史》卷二〇九、《艺文志》七。</td>
</tr>
<tr>
<td>令狐绹</td>
<td>《荐子集及谏疏》</td>
<td>1</td>
<td>《崇文总目》卷五。</td>
</tr>
<tr>
<td>崔嘏</td>
<td>《管记集》</td>
<td>10</td>
<td>《宋史》卷二〇九、《艺文志》七。</td>
</tr>
<tr>
<td>温庭筠</td>
<td>《汉南真箓》</td>
<td>10</td>
<td>《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四，《宋史》卷二〇九、《艺文志》同。</td>
</tr>
<tr>
<td>作者</td>
<td>书名</td>
<td>卷数</td>
<td>史料来源</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温庭筠</td>
<td>《记室备要》①</td>
<td>3</td>
<td>《宋史》卷二〇八《艺文志》七。</td>
</tr>
<tr>
<td>王晋</td>
<td>《使范》②</td>
<td>1</td>
<td>《新唐书》五八《艺文志》二，《宋史》卷二〇四《艺文志》三，《崇文总目》卷二。</td>
</tr>
<tr>
<td>李商隐</td>
<td>《使范》</td>
<td>1</td>
<td>《宋史》卷二〇四《艺文志》三。</td>
</tr>
<tr>
<td>李商隐</td>
<td>《樊南甲集》</td>
<td>20</td>
<td>《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四，《宋志》作《四六甲乙集》四十卷。</td>
</tr>
<tr>
<td>李商隐</td>
<td>《樊南乙集》</td>
<td>20</td>
<td>同上。</td>
</tr>
<tr>
<td>夏侯鏶</td>
<td>《大中年与凉州书》</td>
<td>1</td>
<td>同上。《宋史》卷二〇八《艺文志》七无“大中年”三字。</td>
</tr>
<tr>
<td>郭洪</td>
<td>《记室袖中备要》</td>
<td>3</td>
<td>《宋史》卷二〇八《艺文志》七。</td>
</tr>
<tr>
<td>李程</td>
<td>《李程表状》</td>
<td>1</td>
<td>《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四。《宋史》卷二〇八《艺文志》七。</td>
</tr>
<tr>
<td>刘三复</td>
<td>《刘三复表状》</td>
<td>10</td>
<td>《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四。《宋史》卷二〇八有同人《景台杂编》，亦十卷。</td>
</tr>
<tr>
<td>刘三复</td>
<td>《别纸集》</td>
<td>5</td>
<td>《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一，《宋史》卷二〇八《艺文志》七仅《别集》一卷。《崇文总目》卷五有《刘三复文》一卷。</td>
</tr>
<tr>
<td>李瑴</td>
<td>《李瑴表疏》</td>
<td>1</td>
<td>《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四。《宋史》卷二〇八《艺文志》七作《李瑴奏议》。</td>
</tr>
<tr>
<td>张浚</td>
<td>《张浚表状》</td>
<td>1</td>
<td>同上。</td>
</tr>
<tr>
<td>臧家猷</td>
<td>《羽书》</td>
<td>3</td>
<td>《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四，《崇文总目》卷五。《宋史》卷二〇九《艺文志》八作《羽书集》。</td>
</tr>
</tbody>
</table>

①《记室备要》三卷，《宋史·艺文志》记在温庭筠下，疑即敦煌所见郁知言《记室备要》。
②按此书《崇文总目》卷二“称《记开元以后使者所用章奏文牒之式，凡十二篇》”，之下李商隐《使范》性质亦应类同。
<table>
<thead>
<tr>
<th>作者</th>
<th>书名</th>
<th>卷数</th>
<th>史料来源</th>
</tr>
</thead>
<tbody>
<tr>
<td>沈常</td>
<td>《总戎集》</td>
<td>30</td>
<td>同上。《宋史》卷二〇八《艺文志》七、《崇文总目》卷五作10卷。</td>
</tr>
<tr>
<td>封敖</td>
<td>《翰槸》</td>
<td>8</td>
<td>同上。</td>
</tr>
<tr>
<td>郑畋</td>
<td>《风池棲草》</td>
<td>30</td>
<td>同上。《崇文总目》另有同人《玉堂集》5卷。</td>
</tr>
<tr>
<td>郑畋</td>
<td>《续风池棲草》</td>
<td>30</td>
<td>同上。</td>
</tr>
<tr>
<td>郑畋</td>
<td>《论事》</td>
<td>5</td>
<td>《宋史》卷二〇八《艺文志》七。</td>
</tr>
<tr>
<td>黄台</td>
<td>《江西表状》</td>
<td>2</td>
<td>《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四，《宋史》卷二〇八《艺文志》七。</td>
</tr>
<tr>
<td>李善夷</td>
<td>《表集》</td>
<td>1</td>
<td>《宋史》卷二〇八《艺文志》七。</td>
</tr>
<tr>
<td></td>
<td>《裴休状》</td>
<td>3</td>
<td>《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一。</td>
</tr>
<tr>
<td></td>
<td>《张道古諌疏》</td>
<td>1</td>
<td>《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一。</td>
</tr>
<tr>
<td>赵璜</td>
<td>《表状集》</td>
<td>1</td>
<td>《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四，《宋史》卷二〇八《艺文志》七作《表状》。</td>
</tr>
<tr>
<td></td>
<td>《咸通初表奏集》</td>
<td>1</td>
<td>《宋史》卷二〇九《艺文志》，《崇文总目》卷五。</td>
</tr>
<tr>
<td>郑昌士</td>
<td>《四六集》</td>
<td>1</td>
<td>《宋史》卷二〇八《艺文志》。</td>
</tr>
<tr>
<td>刘邺</td>
<td>《甘棠集》</td>
<td>3</td>
<td>同上。《宋史》卷二〇八《艺文志》七载“《刘邺集》4卷，又《从事》3卷”。</td>
</tr>
<tr>
<td>刘邺</td>
<td>《凤池刀笔》</td>
<td>5</td>
<td>《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一。</td>
</tr>
<tr>
<td>崔致远</td>
<td>《四六》</td>
<td>1</td>
<td>《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四，《崇文总目》卷五多一“集”字。</td>
</tr>
<tr>
<td>崔致远</td>
<td>《桂苑笔耕[集]}</td>
<td>20</td>
<td>同上。《宋史》卷二〇八《艺文志》七无“桂苑”二字。</td>
</tr>
<tr>
<td>顾云</td>
<td>《启事》</td>
<td>1</td>
<td>同上。</td>
</tr>
<tr>
<td>独孤騨</td>
<td>《玉堂集》?</td>
<td>20</td>
<td>《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四。</td>
</tr>
<tr>
<td>作者</td>
<td>书名</td>
<td>卷数</td>
<td>史料来源</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薛廷圭</td>
<td>《凤阁录事》</td>
<td>10</td>
<td>《新唐书》卷六《艺文志》四，《宋史》卷二《艺文志》七，《旧五代史》卷六《薛廷圭传》作《凤阁新书》。</td>
</tr>
<tr>
<td>王涣</td>
<td>《燕南笔谈》</td>
<td>10</td>
<td>见《唐故清海军节度使书记太原王府君[涣]墓志铭》，岑仲勉《金石论丛》。</td>
</tr>
<tr>
<td>王涣</td>
<td>《西府笔谈》</td>
<td>3</td>
<td>同上。</td>
</tr>
<tr>
<td>王涣</td>
<td>《从知笔记》</td>
<td>5</td>
<td>同上。</td>
</tr>
<tr>
<td>王超</td>
<td>《凤鸣集》</td>
<td>30</td>
<td>《北梦琐言》卷七。《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均作3卷。</td>
</tr>
<tr>
<td>郑准</td>
<td>《刘表军书》</td>
<td>3</td>
<td>《北梦琐言》卷七。</td>
</tr>
<tr>
<td>朱朴</td>
<td>《杂表》</td>
<td>1</td>
<td>《新唐书》卷六《艺文志》四，《宋史》卷二《艺文志》七。</td>
</tr>
<tr>
<td>薛逢</td>
<td>《别纸》</td>
<td>13</td>
<td>《新唐书》卷六《艺文志》四。《崇文总目》卷五作《薛逢别纸》。《宋史》卷二《艺文志》“纸”作“集”，仅9卷。</td>
</tr>
<tr>
<td>彭巽</td>
<td>《彭巽启状》</td>
<td>1</td>
<td>《宋史》卷二《艺文志》七。《崇文总目》卷五作《杂状启》，卷数同。</td>
</tr>
<tr>
<td>敬翔</td>
<td>《表奏集》</td>
<td>10</td>
<td>《宋史》卷二《艺文志》七，《崇文总目》卷五作“恭”，并另有《敬翔集》10卷。</td>
</tr>
<tr>
<td>蒋文 кред</td>
<td>《记室定名集》</td>
<td>3</td>
<td>同上。</td>
</tr>
<tr>
<td>郑嵎</td>
<td>《表状略》</td>
<td>3</td>
<td>同上。</td>
</tr>
<tr>
<td>罗隐</td>
<td>《吴越掌书记集》</td>
<td>3</td>
<td>同上。《崇文总目》卷五无“书”字。</td>
</tr>
<tr>
<td>罗隐</td>
<td>《湘南应用集》</td>
<td>3</td>
<td>同上。</td>
</tr>
<tr>
<td>张泽</td>
<td>《敬河集》(?)</td>
<td>15</td>
<td>《新唐书》卷六《艺文志》，《宋史》卷二《艺文志》“敛”作“饮”。</td>
</tr>
<tr>
<td>作者</td>
<td>书名</td>
<td>卷数</td>
<td>史料来源</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李太华</td>
<td>《掌记略》</td>
<td>15</td>
<td>《新唐书》卷六○《艺文志》，《宋史》卷二○九《艺文志》八。</td>
</tr>
<tr>
<td>李太华</td>
<td>《新掌记略》</td>
<td>9</td>
<td>《新唐书》卷六○《艺文志》，《宋史》卷二○九《艺文志》同。《崇文总目》卷五作5卷。</td>
</tr>
<tr>
<td>林逢</td>
<td>《续掌记略》</td>
<td>10</td>
<td>《新唐书》卷六○《艺文志》。《崇文总目》作1卷，《宋史》卷二○九《艺文志》作15卷。</td>
</tr>
<tr>
<td>豪云矩</td>
<td>《东堂集》</td>
<td>10</td>
<td>《旧五代史》卷六八《贺梦征传》《宋史》卷二○八《艺文志》七“征”误作“征”，书作3卷；并另有《表奏集》10卷。</td>
</tr>
<tr>
<td>张滂</td>
<td>《管记苑》</td>
<td>10</td>
<td>《宋史》卷二○八《艺文志》七，《崇文总目》卷五。</td>
</tr>
<tr>
<td>李巨川</td>
<td>《四六集》</td>
<td>2</td>
<td>《新唐书》卷六○《艺文志》四。《宋史》卷二○八《艺文志》七作《启状》2卷，疑为一书。</td>
</tr>
<tr>
<td>严虔凌</td>
<td>《表状》</td>
<td>5</td>
<td>《宋史》卷二○八《艺文志》七。</td>
</tr>
<tr>
<td>良耶</td>
<td>《九笔杂编》</td>
<td>15</td>
<td>同上。</td>
</tr>
<tr>
<td></td>
<td>《磨盾集》(?)</td>
<td>1</td>
<td>《崇文总目》卷五。</td>
</tr>
<tr>
<td></td>
<td>《杂表疏》</td>
<td>1</td>
<td>同上。</td>
</tr>
<tr>
<td>梁景</td>
<td>《四六集》</td>
<td>5</td>
<td>《崇文总目》卷五。《宋史》卷二○八《艺文志》七作《梁景表状集》5卷。</td>
</tr>
<tr>
<td>沈文昌</td>
<td>《记室集》</td>
<td>3</td>
<td>同上。</td>
</tr>
<tr>
<td>田霖</td>
<td>《四六》</td>
<td>1</td>
<td>《宋史》卷二○八《艺文志》七。</td>
</tr>
<tr>
<td>郑准</td>
<td>《四六集》</td>
<td>1</td>
<td>《崇文总目》卷五。</td>
</tr>
<tr>
<td>李琪</td>
<td>《应用集》</td>
<td>3</td>
<td>《崇文总目》卷五，《宋史》卷二○八《艺文志》七。</td>
</tr>
<tr>
<td>作者</td>
<td>书名</td>
<td>卷数</td>
<td>史料来源</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白岩(?)</td>
<td>《白岩四六》</td>
<td>5</td>
<td>同上。</td>
</tr>
<tr>
<td>林鼎</td>
<td>《吴江应用集》</td>
<td>20</td>
<td>同上。</td>
</tr>
<tr>
<td>汤显</td>
<td>《凫机集》(?)</td>
<td>5</td>
<td>同上。</td>
</tr>
<tr>
<td>罗贯</td>
<td>《书启》</td>
<td>2</td>
<td>《崇文总目》卷五。《宋史》卷二○八《艺文志》七作《罗贯启状》。</td>
</tr>
<tr>
<td>汤文圭</td>
<td>《从军稿》</td>
<td>20</td>
<td>《宋史》卷二○八《艺文志》七作商文圭，汤、商皆为“殷”（胤）之避讳。又有《镂冰录》、《笔耕词》各20卷。《崇文总目》卷五亦另有《笔耕》1卷。</td>
</tr>
<tr>
<td>赵化基</td>
<td>《止戈书》</td>
<td>50</td>
<td>《宋史》卷二○九《艺文志》八，《崇文总目》卷五。</td>
</tr>
<tr>
<td>朱浔</td>
<td>《昌吴启霸集》</td>
<td>30</td>
<td>《宋史》卷二○八《艺文志》七。《崇文总目》卷五无“昌吴”二字。</td>
</tr>
<tr>
<td>王绍颜</td>
<td>《军书》</td>
<td>10</td>
<td>同上。《崇文总目》卷五。</td>
</tr>
<tr>
<td>马氏(失名)编</td>
<td>《李洪皋表状》</td>
<td>1</td>
<td>《崇文总目》卷五。《宋史》卷二○八《艺文志》无撰人。</td>
</tr>
<tr>
<td></td>
<td>《续羽书》</td>
<td>6</td>
<td>《宋史》卷二○九《艺文志》八。</td>
</tr>
<tr>
<td></td>
<td>《周慎辞表状》</td>
<td>5</td>
<td>《宋史》卷二○八《艺文志》七。</td>
</tr>
<tr>
<td>孙光宪</td>
<td>《笔佣集》</td>
<td>10</td>
<td>同上。另有《荆台集》40卷、《巩湖编甄》3卷、《桔斋集》2卷，内容不详。</td>
</tr>
<tr>
<td>刘韬美</td>
<td>《从军集》(?)</td>
<td>40</td>
<td>同上。</td>
</tr>
<tr>
<td></td>
<td>《梁震状》</td>
<td>1</td>
<td>同上。</td>
</tr>
<tr>
<td></td>
<td>《金台亿马集》(?)</td>
<td>9</td>
<td>同上。《崇文总目》作“朱阅撰”。</td>
</tr>
<tr>
<td></td>
<td>《章表分门》</td>
<td>3</td>
<td>同上。</td>
</tr>
<tr>
<td></td>
<td>《拟状制集》</td>
<td>3</td>
<td>同上。</td>
</tr>
</tbody>
</table>
二、表状笺启书仪与晚唐五代政治

唐五代表状笺启书仪文集虽渊源有渐，但其发展深受政治影响。唐前期朝廷“以王言之制”为重，表状制作基本与王言合为一体。开、天中因边境战争频起，表状笺启制作逐渐显示其独立性，并在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形成后，作为应付诸种政治关系的掌记文而兴盛发达。文章的重心始从朝命所颁的诏制过渡到为藩镇传旨达意的表状笺启，致使相关专集不断出现，且与中朝制诰表状集形成并驾齐驱的局面。晚唐五代藩镇动乱与军阀混战，使这一学问与政治的结合空前密切，笺表“体裁的制作及相关掌记人才应运而生，畸形发展，造就了晚唐五代表状书仪文集高度繁荣的局面。

(一) 唐前期的王言制作与表状笺启

<table>
<thead>
<tr>
<th>作者</th>
<th>书名</th>
<th>卷数</th>
<th>史料来源</th>
</tr>
</thead>
<tbody>
<tr>
<td>韦庄</td>
<td>《谏疏笺表》</td>
<td>4</td>
<td>同上，同卷又有《韦文靖谏表》1卷，应为一书。《崇文总目》卷五有常庄《谏疏集》3卷，常庄疑即韦庄。</td>
</tr>
<tr>
<td>张策</td>
<td>《笺表》</td>
<td>30</td>
<td>《旧五代史》卷一八《张策传》。</td>
</tr>
<tr>
<td>李氏(失名)编</td>
<td>《金台凤藻集》(?)</td>
<td>50</td>
<td>《崇文总目》卷五，并见《宋史》卷二〇八《艺文志》七。</td>
</tr>
<tr>
<td>庚传昌</td>
<td>《金行启运集》(?)</td>
<td>10</td>
<td>同上。</td>
</tr>
<tr>
<td>陈致雍</td>
<td>《曲台奏议集》</td>
<td>20</td>
<td>同上。</td>
</tr>
</tbody>
</table>
们与制诰集同样，随着汉魏南北朝官文书的成熟化而出现，并在《隋书·经籍志》中记有多部。不过唐初以后，此类专集的制作却已经归于消歇。从《旧唐书·经籍志》所载开元四部书目中即很少见到有唐初表状笺启类文集，说明当时并不以此类制作为时尚。

表状类文集的减少无疑符合当时的趋势。《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记唐朝公式文制度虽有制敕等王言和表状笺启之作，但是在唐前期的朝廷，后者的光辉似乎被前者所掩盖。制敕是中书舍人专职，擅长者知名于时，其制作也被称为大手笔。如贞观中为太子舍人、崇贤馆学士的李义府，与太子司议郎来济俱以文翰见知，时称来、李。武则天时的凤阁舍人李峤，则天深加接待，朝廷每有大手笔，皆特令峤为之。玄宗朝又有李乂与苏颋。《旧唐书》卷八八《苏颋传》记：时李乂为紫微侍郎，与颋对掌文诰。他日，（上玄宗）谓颋曰：'前朝有李峤、苏味道，谓之苏、李；今有卿及李乂，亦不让之。'苏颋又与张说齐名。一代文宗张说，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新唐书》卷一二五《苏颋传》复曰：自景龙后，与张说以文章显，称望略等，故时"号燕许大手笔"。帝爱其文曰：'卿所为诏令，别录副本，署臣某撰，朕当留中。'后遂为故事。其后李德裕著论曰：'近世诏诰，唯颋叙事外自为文章'云。

《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766页。
《旧唐书》卷九四《李峤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993页。
《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056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燕、许者，乃以张说、苏颋之国公封号以为名“燕许大手笔”即特指其能作诏诰一类的大文章，复能润之以文采，所谓“惟颋叙事外自为文章”尔。“燕许大手笔”的产生说明诏诰制册类文已为朝野注重的中心，并出现了相关人才。开、天中知名“的王言”制作者是一批人；齐，内如张九龄文学政事，咸有所称，一时之选也。”澣论驳书诏，润色王言，；许景先自开元皆以古义谟诰为准的初”，与中书舍人齐澣、王丘、韩休、张九龄掌知制诰，以文翰见；更出色的是孙逖”，逖掌诰八年称”，制敕所出，为时流叹服。议者以为自开元以来，苏颋、齐澣、苏晋、贾曾、韩休、许景先及逖，为王言之最。

开、天时期是王言制作的高峰期。围绕朝廷和皇帝为中心，文人以能作王言为准的“为大手笔”，故保留下来的文集文作中也颇多王言。王言之外，承平之际虽亦颇多大臣的谢贺表章应时制作，但它们的性质可与王言视为一体，所以包括制诰集或表状集在内，似乎也都无独立单出之必要。

不过，唐初以来擅作表状笺启的大家毕竟还是大有人在。如唐太宗记室房玄龄”，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每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赡，初无稿草。又如薛收，为房玄龄所荐。太宗召见问以经略”，收辩对纵横，皆会旨要“，时太宗专任征伐，檄书露布，多出于收，言辞敏速，还同宿构，马上即成，曾无点窜。太宗初授天策府上将，命收与虞世南并作第一让表，竟用收者”。“《旧唐书》卷九九张九龄等传”末史臣曰”，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107页。

《旧唐书》卷一九○中《文苑中》，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037页。

《旧唐书》卷一九○中，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033页。

《旧唐书》卷一九○中，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044页。

《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460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04

园获白鱼命为献表”，收援笔立就，不复停思，时人推其二表赡而
初唐四杰中的王勃
曾为英王戏作斗鸡檄文而被高宗斥
逐②；骆宾王武则天之际参与徐敬业作乱”，敬业军中书檄，皆宾王
之词也。其所作讨武后，不檄”中 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
仅令武则天拍案叫绝，也在后世脍炙人口。而与此两人相比，陈子
昂《 上军国机要事》《、 等一谏灵驾入京书》《、 谏雅州讨生羌书》
类文章，更是气势磅礴、议论纵横不下于王言的大手笔。

当然就笺檄或书启之作而言，还是随着边境战事的升级愈
愈有用武之地《。 张曲江文集》所载开元中张九龄所作给安西、河
西、翰海、幽州、剑南等地诸军、诸使的敕书，事实上便是朝廷远程
指挥边军作战的战书，其《 贺北庭解围仍有杀获状》《、 贺破突厥状》
等贺状中，也称述了其时节度军使盖嘉运、张守珪等实地报告的军
事奏状 。敦煌S.329《 书仪镜》中“有 四海平蕃破国庆贺书”一组，
完全是唐廷与吐蕃等征战之际朝臣将士的往来书信。如果说，从
这些敕书、贺状乃至书檄中我们已不难窥见开、天中边境战事交
争、羽檄飞递的情景，那么安史乱后复杂多变的政局下此类作品的
纷繁即更是可想而知了。

①《 旧唐书》卷七三《 薛收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587—2588页。
②《 新唐书》卷二○—《 文苑上》,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739页。
③ 旧唐书》卷一九○上《《 文苑上》,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006— 5007页《; 新唐书》
卷二○一《 文苑上》,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742页。
④参见《 全唐文》卷二一一、卷二一二，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135、2147、2148页。
⑤见《 张曲江文集》卷一四，四部丛刊本。内如《 贺北庭解围仍有杀获状》称”：又
盖嘉运奏，北庭解围，仍有杀获”云云《。 贺破突厥状》亦“称 右，张守珪表奏，突厥四万
骑，前月二十五日至能讫离山。契丹泥礼等前后斩获俘馘，数逾十万”等，均为战报之
词 。”
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二)表状笺启的制作和藩镇政治关系

在前节已作统计的一百余部唐五代表状书仪文集中,大多是来自地方藩镇的作品,包括王重民先生已指出的李太华《掌记略》、《新掌记略》和林逢《续掌记略》,还有武元衡西川从事撰《临淮尺题》、李商隐《樊南甲、乙集》、温庭筠《汉南真稾》、夏侯韫《大中年与凉州书》、黄台《江西表状》、罗隐《吴越掌记集》《湘南应用集》,以及被称作"刀尺"、"刀笔"、"启事"、"四六集"等的一类著作。从其名称可以看出,安史之乱以后的表状笺启与前相比,不仅内容、规格不一,其制作也主要不是出在中朝。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别集》卷七《掌书记厅壁记》实涉此点。其文借汉魏记室文章得人之难论曰:"《续汉书·百官志》称,三公及大将军皆有记室,主上表章报书记。虽列于上宰之庭,然本为从军之职。故杨雄称军旅之际,飞书驰檄用枚皋;非夫天机殊捷,学源浚发,含思而九流委输,挥毫而万象骏奔,如庖丁提刃,为之满志,师文鼓瑟,效不可穷,则不能称是职也。"文并举窦融征讨还京师,班彪为其制表,被光武所重;及窦宪贵宠,班固、傅毅之徒,皆置之戎幕,以典文章;宪邸文章之盛,冠于当代。魏氏以陈琳、阮瑀管记室,自东汉以后,文才高名之士,未有不由于是选的史事,以衬托唐朝后期藩镇格局之"下典兹羽檄,代有英髦"的现实。

李德裕所说的汉魏记室即唐后期藩镇掌书记之职。据《通典》卷三二节度使下有掌书记一员专"掌表奏书檄",这使得代人作笺疏始成为士人进身的一项艺能。《全唐文》卷五四三令狐楚《荐齐
孝若书》在这方面颇有代。该书是向藩镇举荐掌书记人才表性的一封书启。

称：“某官至，辱垂下问，令公举一人，可管记之任者。愚以为军中之书记，节度之喉舌。指事立言而上达，思中天心；发号出令以下行，期悦人意。”这就是说，掌书记是军中专职，由于代节度使作书檄，故实际上是为节度使传声达意，这其中便要考虑上“中天心”，下“悦人意”的关系问题。所以如何妥善表达，调节把握，“是谅非容易，而可专据”的大事。基于此，令狐楚便提出他荐举之人“是学必专授，文皆雅正，词赋甚精，章表殊健”，以为“执事倘引在幕下，副于宾佐，使其驰一檄飞书，必能应马上之急求，言腹中之所欲”。

这里所“言章表殊健”一语来自魏文帝评说孔璋。从驰檄飞书和应急求、言所欲的标准看，虽然被举荐人有四大特长，但前三者不过是作文的基础，惟“有章表殊健”者才是任掌书记官必不可少的真本领。《旧唐书》卷一一一《高适传》载其曾客游河右，被河西节度使舒翰辟为掌书记，从翰入朝，盛称之于上前。“安史之乱”《与贺兰进明书》，令疾救梁宋，以亲诸军《爆发，高适；与许叔冀书》，绸缪继好，使释他憾，同援梁宋；未过淮先与将校书，使绝永王，各求自白，君子以为义而知变。是高适曾以书达意，联络诸军勤王朝廷，此正所谓战乱之“中应马上之急求”的实例。

章表书檄之功效，在唐后期藩镇体制下得到发挥，其使用亦非仅限战时。《韩昌黎集》卷一三《徐泗濠三州节度掌书记厅石记》实
书记之任亦难矣。元戎整齐三军之士，统理所部之政务，镇守邦国，赞天子施教化，而又外与宾客四邻交。其朝觐聘问、慰荐祭祀祈祝之文，与所部之政，三军之号令升黜，凡文辞之事，皆出书记。非闳辨通敏兼人之才，莫易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后命于天子。

由此可见掌书记平时要为节度使作各种文章，以应付藩镇必须处理和面对的一应政务与关系。P.4050和S.5613等卷《晚唐时河北的一件吉凶书仪》内一信称对“方足下才同王粲，丰并陈琳，辅佐元戎，运筹帷幄，发言成实，吐气生珠，州县官员，莫不仰止”，指的正是这种情况。而使“州县官员，莫不仰止”的才能实关系三大方面：其一即藩镇与朝廷之间。节度使派出在外，所谓“镇守邦国，赞天子施教化”，军国要事需向朝廷报告。除此外又有“朝觐聘问慰荐”诸礼，也是臣子对皇帝所必行。唐后期节度使所上皇帝表状，即有诸如请事、奏议、贺谢、慰哀、进献、让官、举荐等多种内容。有些笺表是表达藩镇对朝廷的忠心，如谢贺等仪；有些则是关系藩镇自身的事务、利益，需得到朝廷批准。这其中，当然还不乏给宰相、重臣的各类启状。其二是涉及“外与宾客四邻交”的藩镇与藩镇甚至边疆民族之间。平日相互照应，维持应有的礼数，固有贺官、贺节、候问起居及答谢等与对朝廷差不多名目相同的仪节，需要笺启往来；而战时或敌或友，彼此间也必须有檄书战报或军情往还，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对朝廷。其三则是藩镇内部。对于有关“所部之政，三军之号令升黜”等事，都必须取得协调。其间书状的作用关系到藩镇本身乃至国家的稳定，其重要性此处仅举三例以明之。
《旧唐书》卷一七二《令狐楚传》记令狐楚为河东节度使手书记:

楚才思俊丽，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为，颇称之。郑儋在镇暴卒，不及处分后事，军中喧哗，将有急变，中夜十数骑持刃迫楚至军门，诸将环之，令草遗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即成，读示三军，无不感泣，军情乃安，自是声名益重。令狐楚的表章不仅使德宗刮目，所草节度使遗表竟平息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暴乱，此章表能安抚藩镇由是而知。

《北梦琐言》卷五记会昌中事称：

旧说李绅相镇淮海，奏荐副使章服，累表不允。有一举人候谒，绅相知其文词，请撰一表。其略云：当道地管八州，军雄千乘，副使着绿，不称其宜。相国大喜，果以此章获恩命也。候谒的举人“当道地管八州，军雄千乘”形容李绅所领淮南之地的广阔与军力的雄壮，藉以反衬“副使着绿”品级的不合理，由此使节度使达到提升副使章服官阶的目的，此也正是为长官使“主言腹中之所欲”。可见表章做得如何，会直接影响到藩镇与朝廷打交道是否成功。

藩镇的表章之作有时还涉及国家民族问题。《旧唐书》卷一六三《卢简求传》载：“其释褐江西王仲舒从事，又从元稹为浙东、江夏二府掌书记，裴度镇襄阳，保釐洛都，皆辟为宾佐”。后相继为泾原渭武、义武、凤翔陇西、河东节度使”，简求辞翰纵横，长于应变，所历四镇，皆控边陲，属杂虏寇边，因之移授，所至抚御，边鄙晏然。”以辞翰纵横”结合丰富的应变经验沟通内外，得保绥边境，抚御夷民，表状笺启之用则无以加焉。
总之，由以上三例便可得知表状文不仅是为了解决庶务，某些时候更是协调关系的产物。而如韩愈所说，唐后期藩镇与朝廷、藩镇与藩镇、藩镇内（部或同一官府）僚属上下级之间，既已形成多元而复杂的政治层面，那么彼此间赖以疏通的表状笺启便决不可少。所以唐后期此类文章大量出现，如以《全唐文》所载唐前、后期表状笺（启）特别是代人所作）的数量相比，其相差已不啻数倍、十倍之多，可知此类文体于官私之间的意义已非唐前期可以相比。这一点显然刺激了同类文集的制作。笔者在前揭文中已说明，上述大量表状笺启书仪文集正是在唐代中期以后逐渐出现，它们的作者也多是节镇判官、掌书记一类人物。结合敦煌所见刘邺《甘棠集》、郁知言《记室备要》、相州马判官《新集杂别纸》和诸多敦煌归义军时期表状仪，以及传世如李商隐《樊南文集》、崔致远《桂苑笔耕集》等，知表状笺启书仪文集中的大部分都是围绕藩镇节度使和地方官员的需要产生的，尤其是其中应时应景的笺表谢贺仪与拜官启状等应酬文字大量出现（详本书第十四章），印证了上述关于表状笺启主要是为了应付各种政治关系的看法。

（三）翰林学士和掌书记人才互动及笺表文学

前节已说明，在各类表状笺启书仪文集中，还有一些诸如陆贽《论议表疏集》、李绛论事集》、李程表状》、李磎表疏》、张濬表状》那样的中朝之作。这类文集与同时的诏诰集并列，数量虽不多，规格却较高，它们的制作者是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乃至宰相。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的著作堪称大制作。唐德宗以前，掌诏诰皆中书舍人。德宗时，扩大了翰林机构。宪宗更将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等选入翰林院，担任起草诏诰、应制文章等任务。这些文集多为士子应制举并在中书省担任官职时所作，内容多为应制诗词、赋颂等，反映了唐代士人对朝廷的忠贞和对国家兴盛的渴望。
书舍人分成两制，各为六员，翰林学士官谓之内制，掌王言，大制诰、诏令、赦文之类；中书舍人谓之外制，亦掌王言，凡诰词之类。《册府元龟》卷五○《词臣部·总序》称：元和初，学士院别置书诏印，凡赦书、德音、立后、建储、大诛讨、拜免三公将相曰‘制’，百官班于宣政殿而听之。赐与征召宣索处分之诏、慰抚军旅之书、祠享道释之文、陵寝荐献之表、答奏疏赐军号，皆学士院主之；余则中书舍人主之。由此可知，翰林院是朝廷最高等级的文书机构，学士又号为内相，掌知一切国家机密文件的起草。其制作严格、讲究，写作水平应当是最高的，因此翰林学（士德宗以前是中书舍人）的作品不但是制诰集、也是表状集的一大源泉。

翰林学士的制作对表状集而言是来自于上的影响。但有一点须注意，即其诸种文书所及，是关系国家、朝廷政务和内外、上下的-切往来，其中也包括与藩镇的交道。所以学士和舍人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姑无论权力大小，其所掌性质已与藩镇掌记不无共同。这样一方面就要求掌制诰者必须懂得处理政治关系。陆贽的《翰苑集》大概是其中最好的代表。据说他为德宗所作的兴元赦免李希烈等四镇的诏书颁下，四方人心大悦。及上还长安明年，李抱真入朝为上言：‘山东宣布赦书，士卒皆感泣，臣见人情如此，知贼不足平也。’可见动人之深。相反如在此方面稍有疏忽，即没有资格任翰林学士。《旧唐书》卷一五七《韦弘景传》记：普润镇使苏光荣为泾原节度使，弘景草麻，漏叙光荣之功，罢学士，改司门员外郎。《资治通鉴》卷二二九兴元元（年784），中华书局标点本，第7392页。①赵升《朝野类要》卷二，参袁刚《唐代的翰林学士》《文史》三三辑，第97—117页。②
另一方面是任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者，必须要有藩镇掌书记的写作功底，故宣宗对舅郑光的书记官“有白屋同愁，已失凤鸣之侣；朱门自乐，难容乌合之人”表语尤佳，便好作翰林。而史料记载也有颇多。善作表笺的文人举子被藩镇聘为幕僚或掌书记，再入朝廷知制诰的实例。如崔元翰曾被滑毫节度使李勉辟为从事，后北平王马燧在太原，闻其名，致礼命之，又为燧府掌书记。窦参辅政，用为知制诰，诏令温雅，合于典。高郢九岁通春秋，能属文，释褐，辟河西节度掌书记，后人朝累转礼部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与常衮并掌纶诰，衮长于除书，炎善为德音，自开元以来，言诏制之美者，时称常杨焉。郑絪少有奇志，好学，善属文，张延赏镇西川辟为掌书记，德宗时入朝，无几，擢为翰林，转司勋员外郎、知李程，贞元中进士擢制诰。第、登宏辞科，累辟使府，二十年。唐纶诰与表章并重，所以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的选任为人所重。后者与唐后期科举文学尤其有关，此为治唐史者熟知。不过掌制诰的人才常常来自善作表奏笺疏的掌书记也是事实，两者实不可分。这一点，无疑会进一步鼓励表章之士成为入幕之宾。

①见《唐语林》卷(三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04—105页)，记宣宗封舅郑光妾为夫人，不受，表“有白屋同愁，已失凤鸣之侣；朱门自乐，难容乌合之人”语。后宣宗知为判官田询所作，遂有此语。周勋初《唐语林校正》作“表语尤佳，便好与翰林一官”(中华书局，1987年，第282页)。
②《旧唐书》卷一三七《崔元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766—3767页。
③《旧唐书》卷一四七《高郢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975—3977页。
④《旧唐书》卷一五九《郑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180—4181页。
⑤《旧唐书》卷一六七《李程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372—4373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12

唐后期文士如刘禹锡、王起、吕温、王质、宋申锡、崔铉、裴休、王铎、杜牧等无论是否进士出身，在入朝前，几乎均有被藩镇使府辟召的经历。精于古文，善五言诗，今体文章复多才丽的刘禹锡，从事王质元和中释褐岭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典记室，尤加礼异。南管记，历佐淮蔡、许昌、梓潼、兴元四府，后入朝，为宰相李德裕甚。崔铉礼之，事必咨决。三辟诸侯府，荆南、西蜀掌书记，会昌。此外《旧唐书》中任员外郎知制诰，入为翰林学士卷一九○下《文苑下》记李商隐先被河阳节度使王茂元辟为掌书记，后随郑亚在岭南累载。大中三年，京兆尹卢弘正奏署掾曹，令典笺奏，弘正镇徐州，又从掌书记《东观奏记》卷下称李商隐文学宏博，笺表尤著于人间。与商隐齐名的温庭筠，少敏悟，工为辞章，与李商隐皆有名，号‘温李’。

大量笺表人才的出现及其作为掌书记服务于藩镇，说明唐后期政治形势的变化已影响于文学。文章的重心从朝命所颁的诏制过渡到为藩镇传旨达意的表状笺启，或姑名之‘掌记文学’，这恐怕也是一种文化的转移。而笺表及相关人才特为藩镇地方所重，还可见前揭李德裕《掌书记厅壁记》言河东道掌记：

“暨太尉临淮王总节制之师，德裕叔父尝与斯职，寻以才识英妙，肃宗召拜监察御史。厥后仆射高贞公，今河阳节度令狐公，以人文掌辰翰；国子司业郑公，给事河南尹杜公，以才华登贵仕；继斯躅者，不亦盛欤？

①《旧唐书》卷一六○《刘禹锡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210页。
②《旧唐书》卷一六三《王质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267—4268页。
③《旧唐书》卷一六三《崔铉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262—4263页。
④《新唐书》卷九一《温庭筠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787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德裕所言高贞(公 郢)、河阳节度令狐(公 楚)、国子司业郑公( 叔)，均入朝为贵达之士。其中　
规)与给事[中]河南尹杜(公 兼 ?)“国子司业郑公”之记载即见于《 唐代墓志汇编》大中一三五《 唐故　
邵州郑使君叔规墓志有铭》：

“王(□ 父)以健笔奇画,意气名节,交马北平燧、李中书泌、张徐州建封，掌北平书记十年，笺檄冠诸府。得兼御史丞，副守北都，入为司业少仆，亦刺绛州，讳叔规。

郑叔规因文才而交游权贵，且包括郑叔规在内的几人，均由“笺檄冠诸府”的掌书记出身而升居高位颇有典型意义。德裕自己　
也以文才继其后，故其自豪感不言自明。

历来史家言牛李党争，均注意到李德裕反对进士科举”，深嫉
进士浮薄”，并且有其祖李栖筠在日家不置《 文选》”，盖恶其祖尚浮　
华，不根艺实”之说。陈寅恪先生也曾指出李德裕作“为 有唐一代　
不属于复古派之文雄”，其学术趣向不仅于个人好恶且有关家世遗　
传，也即李党重经术和家学门风的问题。但所谓“浮华”、“艺实”　
究何所指，昔贤或未多措意，这里相关文体似有必要追究。

据《 旧唐书》卷一七四《 李德裕传》,言“其 避嫌不仕台省，累辟　
诸府从事”。元和十一年，张弘靖罢相镇太(原 河东)，被辟为掌书　
记。壁记之作说明是在十四年，即其时也。穆宗即位，召入充翰林　
学士”，禁中书诏，大手笔多诏德裕草之”。由是知李德裕也是从掌　
书记而后知制诰的。

《 旧唐书》卷一四六《 杜兼传》称兼“曾 累辟诸　
府从事”，元和初，入为刑部、　
吏部郎中，拜给事中，除金商防御使，旋授河南少尹、知府事，寻正拜河南尹……元和四　
年卒于官”。故疑此处杜公者当指杜兼。

① 按 据　

②见《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三联书店，1957年，第73—76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案李德裕善作诏书表状，可见今存其《会昌一品集》，集中不仅收录了他于会昌中任宰相时自作的大量诏敕、论事状等，还有不少代人所作书，如《代刘沔与回鹘宰相书意》《代符澈与幽州大将书意》《代宏敬与泽潞军将书》等，均是内外战事中代藩镇或领兵军将所为。北梦琐言》卷五所“说李太尉破昭义，自草诏而宣付翰林，至如郑文公自草高太尉诏，皆务集事，非侵局夺美也”，是其时事实；然则李德裕与郑畋的自草诏敕，并非显其所能，而是特重其事也。

李德裕对于诏敕表章“大手笔”之重是文章与政治的刻意结合。这一点，观李商隐为其文集作序，称武宗与“之定元首股肱之契。曰我将俾尔以大手笔，麒麟阁中，霍光且图于勋伐；元洲苑上，魏收别议于文章。光映前修，允兼具美”即可证之。而李德裕执“此允兼具美”者并非仅限于自身，也用于对人材选拔《旧唐书》卷一七七《刘邺传》谓其父三复善属文”，长庆中，李德裕拜浙西观察使，三复以德裕禁密大臣，以所业文诣郡干谒。德裕阅其文，倒屐迎之，乃辟为从事，管记室。使李德裕倒屐迎之的是什么文章？《唐语林》卷三记曰：刘侍郎三复，初为金坛尉。李卫公镇浙西，三复代草表云：“山名北固，长怀恋阙之心；地接东溟，却羡朝宗之路。卫公嘉叹，遂辟为宾佐。

如论者已指出，原来刘三复就是借用当地北（固 顾）山之名胜，及地接东海的地理环境，将唐朝江山稳固，和藩镇恋慕朝廷的双重

①李商隐《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全唐文》卷七七九，中华书局影印本，第8132页。
此含义暗喻在文章之中。正所谓“表语尤佳者”，故被李德裕用为掌书记。《北梦琐言》卷六关于李德裕还有另一段为人熟知的记载：晓也，因厚遇唐杜荀鹤尝游梁，献太祖诗三十章，皆易之。洎受禅，拜翰林学士，五日而卒。朱崖李太尉奖拔寒俊，至于掌诰，率用子弟。乃曰：以其谙练故事，以济缓急也。如京兆者，一篇一咏而已，经国大手，非其所能，幸而殂逝，免贻伊耻也。制贬平曾、贾岛，以其僻涩之才，无所采用，皆此类也。从来史家论此条，都以为李德“裕率用子弟”是李党重门第的证据，或以“为奖拔孤寒”“与率用子弟”是其用人的两个方面，无关系。但是从《北梦琐言》作者这里将杜荀“鹤一篇一咏”之能及平曾、贾“岛僻涩之才，无所采用”“与谙练故事，以济缓急”“的经国大手”作对比来看，其中竟然也牵涉文体问题，即李德裕所重者，本为经世治国的表章制诰实用性大文章，所用者乃是能作此类文章，“知故事”而长于应变“的大手笔”，即韩愈所说“的闳辨通敏，兼人之才”。从前揭刘三复事，知李德“裕奖拔孤寒”“与率用子弟”在这一方面是并无矛盾且完全一致的，这与仅能一觞一咏恰恰是“艺实”“与浮华”的两种表现。由此而知李德裕的“深嫉进士浮薄”，至少原因之一是反对它仅以诗赋，而不是实用文以取（士据《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七年（833）七月记”：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经术，李德裕请依杨绾议，进士试议论，不试诗赋。结果不久即下制进士停试诗赋。所谓“议论”者正属表状类文章不可缺，这与上述

①参见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第六章“论表状文”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5—253页。
李德裕的旨趣正相一致)。无独有偶,与李德裕同样重视章表之作的竟然还有作“牛党中坚”的令狐楚。《唐摭言》卷五记曰:令狐文公镇三峰,时及秋赋,特置(三)场试:第一场杂文,第二场诗歌,第三场表檄。案三峰在唐代指华州。此处言令狐“镇三峰”者,当指其元和十三(818)年任华州刺史。“其秋赋”旨在指其时州准备选送京。表檄在杂文、诗歌之外单独被列为一种,固然城的举子与令狐楚本人有此爱好与特长有关。令狐楚为唐中后期章奏大家,前揭李德裕壁记及《旧唐书》本传已提到。旧传谓其少即学属文”,弱冠应进士,贞元七年登第”,因随父在太原,故相继为河东节度使李说、严绶、郑儋所聘,自掌书记至节度判官。上述令狐楚的作品能为德宗所辨,说明其章表已是自成一格、别有风韵。而他能在白刃逼迫之下从容作出令军士感泣、稳定人心的动人篇章,也说明在章表方面具备特殊功力。令狐楚之所作对后世不能无所影响,这恐怕也是在他以后,河东道极重掌记的原因。前揭《新唐书》言李商隐曾为王茂元、卢弘正所聘,但李商隐文才正是受到令狐楚的栽培”。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从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②

“今体章奏”即骈体章奏,令狐楚通过李商隐发“展今体章奏”,进一步证明了他对章表体裁的贡献。耐人寻味的是,令狐楚与李

《旧唐书》卷一七二《令狐楚传》,楚于元和十三年四月至十月任华州刺史,”秋赋”正在其时。

②《旧唐书》卷一九○下《李商隐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078页。
德裕虽分属两党，但对制诰表章类文体的重视却并无不同，区别在于李德裕反对专以诗赋取士的进士科举，而令狐楚却仅仅是要将表章文的考试补充融入科举。为什么政治派别如此不同的人对于同一问题会有如此的共识呢？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要否定前人关于牛李党争与科举关系的结论，而是要说明此种共识乃是来自当时社会对此类文章及相关政事人才的大量需求。中晚唐之际，实用性之章表书檄既为朝廷与藩镇间处理政事、协调关系一日不可或缺，且更为藩镇所用，故此类文章在社会上传播流行，擅长者也以此为进身之阶。唐诗人温庭筠之“发迹岂劳天上桂，属词还得幕中莲”和路过陈琳墓之“时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的感慨可谓道出了文人屈从现实的无奈。大量掌记人才的出现及其由此而宦达的历史表明，此种文章的实际社会政治功用远过诗赋。《旧唐书·高适传》曾言“而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虽或有所夸张，但执笔者正是要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文人不掌握此章表文章技能者不足以安身立命，这是当时为文的大趋势，也是从政的大趋势。李德裕、令狐楚对于章表人才的看中不过是由于政治需要而顺从这一大趋势罢了，且无论他们个人的政治观点、党派取向如何，其对此道之推崇却不能不对文体的流行和人们的追求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事实上，不少文人包括进士，由于任藩镇掌书记或相应官职，使章表之作及政治才能都得到锻炼提高，他们由地方而步入朝廷，这对科举取士和文官政治而言，不能不认为是一种有益的弥补。①
如果说安史之乱至中晚唐的藩镇体制已为掌书记文学和表状笺启文集的制作提供环境，并为其广为流传创造条件的话，那么唐末五代的藩镇动乱及军阀割据局面已使这一文学的创作与政治的结合达到空前密切的程度。特别是僖宗朝黄巢之乱以后，因诸侯争地而天下扰攘，朝廷与藩镇及藩镇与藩镇之间敌友不常，关系敏感而脆弱，战事一触即发，其间利害衡量，机谋权变，全赖善作表状书檄的文士以表达。《北梦琐言》卷五记一例曰：

唐僖宗皇帝蒙尘于蜀。朝士未集，阙人掌诰。乐朋龟、侯翮辈虽居翰林，而排难解纷之才，非所长也。高太尉镇淮海，拥兵不进，与浙西周宝不睦，表章递奏，各述短长。朝廷欲降诏和之，学士草词，殊不惬意。前进士李端有壮笔，军容田令孜知之，召而与语，授以毫翰。李仍请酒，饮数杯，诏书一笔而成，文藻之外，乃奇辩也。深称上旨，除行在知制诰，官至省郎。

虽则是诏书，却不是命令，而是充满了奇辩的和解书。朝廷周旋于藩镇之间的复杂情势，竟为李端这样的壮笔之士提供了机缘。唐末五代战乱之际，我们常常可以从各种记载中发现他们的踪迹。《唐摭言》卷十略曰：

李巨川，字下已，姑臧人也，士族之鼎甲，工为燕许体文。广明庚子乱后，失身于人，佐兴元杨守亮幕。守亮，大阉复恭养子。守亮败，为华帅韩建所擒，建重其才，奏令掌书奏凡十
余年，名振海内。

汤筼，润州丹阳人也，工为应用，数举败于垂成。李巢在湖南，郑续镇广南，俱以书奏受惠。晚佐江西钟传，书檄阗委，未尝有倦色。

李凝古，给事中损之子，冲幼聪敏绝伦，工为燕许体文。中和中，从彭门时溥。溥令制露布进黄巢首级，凝古辞学精敏，义理该通，凡数千言，冠绝一时，天下仰风。

顾蒙，宛陵人，博览经史，慕燕许刀尺，亦一时之杰。

《旧五代史》卷六○《王缄传》略曰：

王缄，幽州刘仁恭故吏也。少以刀笔直记室，仁恭假以幕职，令使凤翔。还经太原，属仁恭阻命，武皇留之。缄坚辞复命，书词稍抗，武皇怒，下狱诘之，谢罪听命，乃署为推官，历掌书记……缄博学善属文，燕蓟多文士，缄后生，未知名，及在太原，名位骤达。

唐末凡具“有燕许”文学“的刀笔”之手，即使应举不第或非进士出身，在藩镇使府也很容易找到发挥特长的掌记之位。且不仅文士是以所“谓刀尺”谋生，藩镇对此类人士也极度渴求。

《北梦琐言》卷一七：

(李)习吉，右相林甫之后，应举不第。黄巢后，游于河东，摄榆次令，李(公)克用辟为掌记，笺檄之捷，无出其右。梁祖每读河东书檄，嘉叹其才，顾敬翔曰："李公计绝一隅，何幸有此人？如鄙人之智算，得习吉之才笔，如虎之傅翼也。"其见重如此。
按据诸史记事，李克用失河中后确实兵势大受其损，不敌朱全忠。但观李袭吉此书，乃是借助沙陀军队雄猛、能与边陲外族联合以及山川地理的优势大言恫吓，以使朱全忠有所顾忌，不再苦苦相逼，两雄相斗，达到保存实力，以进为退的目的。其书不但文辞优美，且处处充满机辩，故被朱全忠欣赏也可想而知。又察《通鉴考异》卷二六二证其事在天复元(年 901)二月，并“于李克用遣使以重币请修好于全忠，全忠虽遣使报，而忿其书词蹇傲，决欲攻之”下，引《唐末见闻录》朱全忠回书“有前年洹水曾获贤郎，去岁青山又擒列将”及“镇、定归款，蒲、晋求和”语，引《唐年补录》“有天复元年五月壬午，制以朱全忠兼领河中，仍诏与太原通和。初，朝廷以全忠吞并河朔，又收下蒲津，必恐兵起相侵，乃下诏太原、夷门，使务和好。时太原意亦以全忠渐强，先以书聘“事，……
与太原曾于顷岁首缔欢盟，及其偶掇猜嫌，止为各争言气’等语。引《续宝运录》载全忠表及《大梁编遗录》《唐太祖纪年录》，都提到李克用遣军将张特持币马檄书请释憾修和好事，读之可见朝廷与朱、李三方之诏令表书往来之详，由此亦知当朱李争战之际，此类书檄会是如何频繁重要。也正是为此，故其时能够为藩’的镇行修笺表，坐了檄书’人物并不是一个而是一批。《旧五代史》于李袭吉传末记曰：自广明大乱之后，诸侯割据方面，竞延名士，以掌书檄。是时梁有敬翔，燕有马郁，华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郑准，凤翔有王超，钱塘有罗隐，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称，与袭吉齐名于时。诸人中，文称最著而与袭吉齐名者是前揭李巨川。《旧唐书》卷一九○下《文苑传》言其事更详：巨川乾符中应进士，属天下大乱，流离奔播，切于禄位，乃以刀笔从诸侯府。王重荣镇河中，辟为掌书记。时车驾在蜀，贼据京师，重荣匡合诸藩，叶力诛寇，军书奏请，堆案盈几。巨川文思敏速，翰动如飞，传之藩邻，无不耸动。重荣收复功，巨川之助也。及重荣为部下所害，朝议罪参佐，贬为汉中掾。时杨守亮帅兴元，素知之，闻巨川至，喜谓客曰：天以李书记遗我也!即令管记室，累迁幕职。李巨川景福中被韩建所擒后，仍为掌书记。传称：俄而李茂贞犯京师，天子驻跸于华。韩建以一州之力，供亿万乘，虑其不济，①语出《北梦琐言》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1页。
遣巨川传檄天下，请助转饷，同匡王室，完葺京城。四方书檄，酬报辐辏，巨川洒翰陈叙，文理俱惬，昭宗深重之，即时巨川之名闻于天下。三任掌记、名动天下的李巨川最终为朱全忠所杀，死因竟仍是以文名见嫉。同传曰：

光化中，朱全忠陷河中，进兵入潼关。韩建惧，令巨川见全忠送款，至河中，从容言事。巨川指陈利害，全忠方图问鼎，闻巨川所陈，心恶之。判官敬翔亦以文笔见知于全忠，虑得巨川减落名价，谓全忠曰："李谏议文章信美，但不利主人。"是日为全忠所害。

李巨川之死于文章固然可悲，但嫉恨他的敬翔也是文翰大家。前揭朱全忠答复李克用书辞即由其所作。

《旧五代史》卷一八《敬翔传》略曰：翔好读书，尤长刀笔，应用敏捷。乾符中，举进士不第，及黄巢陷长安，乃东出关。时太祖初镇大梁，有观察支使王发者，翔里人也，翔往依焉，发以故人遇之，然无由荐达。翔久之计窘，乃与人为笺刺，往往有警句，传于军中。太祖比不知书，章檄喜浅近语，闻翔所作，爱之……及见，应对称旨，即补右职，每令从军。翔不喜武职，求补文吏，即署馆驿巡官，俾专掌檄奏……太祖)恨得翔之晚，故军谋政术，一以咨之。

敬翔并非仅善刀笔，传谓梁祖曾问其邠、岐战事，翔剖析山川郡邑虚实，军粮多少，悉以条奏，如素讲习，左右莫不惊异，太祖叹赏久之。翔后任至宰相，曾有《大梁编遗录》三十卷，言朱梁事，与实录偕行。其与李袭吉、李巨川等显非一般文词之士，而是传所言"遭遇霸王，怀抱深沉，有经济之略"的政事人才"。刀笔"与经世治
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乃晚唐五代文学人才的特点之一。

《旧五代史》卷七一《马郁传》：

马郁，其先范阳人。郁少警悟，有俊才智数，言辩纵横，下笔成文。乾宁末，为幽州府刀笔小吏。李匡威为王镕所杀，镕书报其弟匡俦。匡俦遣使于镕，问谋乱本末，幕客为书，多不如旨。郁时直记室，即起草，为之条列事状，云可疑者十，词理俊赡，以此知名。

据说对于马郁“的十疑之书”，王镕也遣记室张泽以事实答之，其略曰：“营中将士，或可追呼；天上雷霆，何人计会。”词多不载。

岑仲勉《金石论丛》录《唐故清海军节度掌书记太原王府君（涣）墓志铭》：

府君每于中令王（公铎）之门，以子弟执加等之敬，其所知遇，亦异群伦。初僖皇之幸蜀也，时王公以相印总戎，镇临白马，仍于统制有都都之号，即羽檄笺奏，断可知矣，君于斯务，颇分预焉。又故相国太平郑（公延昌）与君有中外之密，所申奖重，情匪由私。洎先驾驻岐之年，郑公以计务兼大京兆之任，充京城招葺制置使，凡所章奏，时悉委之。所以今标袠之内，有《燕南笔藁》一十卷，奉王公也；有《西府笔藁》三卷，遵郑公也；有《从知笔藁》五卷，乃褒梁与南海途路。

①《太平广记》卷一九二《墨君和》（出《刘氏耳目记》），中华书局标点本，第四册，第1443页。
岑先生考证，王涣是《唐摭言》的作者王定保的从叔。据墓志所言，王涣还曾受知于山南西、岭南东道节度使徐彦若和门下侍郎韦昭度，在其幕中或手下任职。因此王涣也是唐末活跃于中央地方，分预羽檄笺奏，并颇有著作和影响的人物。

又《北梦琐言》卷七：唐荥阳郑准，以文笔依荆州成中（令澣），常欲比肩陈、阮，自集其所作为三卷，号《刘表军书》。

同书同卷：唐末凤翔判官王超，推奉李茂贞，挟曹马之势，笺奏文檄，恣意翱翔……有《凤鸣集》三十卷行于世。

前揭《旧五代史·李袭吉传》言李山甫事不详，或言其为乐彦祯幕客。《太平广记》卷二○三《王敖传（出《耳目记》）惟称“其文笔雄健，名著一方”，并有文集，则亦为当时作笺表檄书闻名并汇有文集者。

此外更有罗隐。《唐才子传》卷九记罗隐广明中遇乱归乡里，后投钱镠为掌书记。钱镠初授镇，命沈崧草表谢，盛言浙西富庶，隐曰：‘今浙西焚荡之余，朝臣方切贿赂，表奏，当鹰犬我矣。’镠请隐更之。有云：‘天寒而麋鹿曾游，日暮而牛羊不下。’为《贺昭宗改名表》云：‘左则姬昌之半字，右为虞舜之全文。’作者称赏。①

①岑仲勉：《从王涣墓志解决了晚唐史一两个问题》，载氏著《金石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442—443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25

罗隐事也见于《吴越备史》。罗隐为诗人，但亦为善析形势、应时处务的章表大家，其著作如前揭《吴越掌记集》《湘南应用集》等颇夥。由罗隐及上述诸人事迹，足征当时擅长表章笺书的掌记人才从南至北，遍布藩镇小朝廷之间，可谓“横行”天下矣。而惟因“笺表”文学及相关掌记人才应运而生，畸形发展，才会造就晚唐五代表状书仪文集高度繁荣和辉煌的局面。

（五）晚唐五代笺表文学形式体裁的研究和流传

晚唐五代表状笺启之掌记文学既臻大用，则在其流行过程中，必然形成重视、研究的环境。《唐才子传》卷十记沙门贯休“风骚之外，尤精笔剳，荆州成中（令InputStream）问以书法，休勃然曰：‘此事须登坛可授，安得草草而言！’中令衔之，乃递入黔中。《唐摭言》卷十记李巨川草谢表以示吴子（华融），其中有‘彤云似盖以长随，紫气临关而不度’，子华吟味不已，因草篇与巨川对垒。略曰：‘雾开万里，克谐披睹之心；掌拔一峰，兼助捧持之力。’《太平广记》卷二○（○出《罗绍威传》）记梁邺王罗绍威喜尚文学，雅好儒生：当时藩牧之中，最获文章之誉。每命幕客作四方书檄，小不称旨，坏裂抵弃，自襞笺起草，下笔成文，虽无藻丽之风，幕客多所不及。

《北梦琐言》卷四略曰：卢相光启，先人伏刑，尔后弟兄修饰赴举，因谓亲知曰：‘此乃开荒也。’……策名后，敭历台省，受知于租庸张濬。清

①并参《北梦琐言》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25页。
河出征并汾，卢每致书疏，凡一事别为一幅，朝士至今效之。盖八行重叠别纸，自公始也。从文士到藩镇节度使都极端重‘视’笔剳、书檄的制作，如论者已指出某些表状实为府主与幕僚的共同创作，且‘从吟味’、对垒‘到创造重叠别纸’一类的笺启形式，表笺的写作方式、内容是一再推陈出新的。从前揭一些例证，可知唐前期用来形容诏诰等‘王言’制作的骈‘体燕许大手笔’、燕许体文已被用来形容文士制作的表奏甚至是官场一般应用的启状笺札，所‘谓燕许刀尺’也。足见其时人们对启状笺剳一类的制作，已看得不下于王言大作，并且在写作技巧上也有意向它看齐、靠拢。另外，诸如李商‘隐今体章奏’和卢光‘启八行重叠别纸’的创造，更给时人提供了学习的榜样和创作的空间。

应当说明，表状书檄、章奏笺剳，它们的等级和使用对象、场合虽有不同，但既同属公式文，则制作方式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如唐朝文体虽有今古之争、骈散之变，但从‘燕许大手笔’到‘今体章奏’却基本均用骈体。即以李商隐而论，商隐初‘虽不喜偶对’，但书启却从令狐楚‘。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学。商隐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就今《樊南文集》所收表状书启，除如《上崔华州书》《别令狐拾遗书》《与陶进士书》等少数例外，绝大多数皆用骈偶，所‘谓樊南四六’也。这正是‘今体章奏’也即骈体公式文的实践。

唐朝的表状笺启何以仍颇多骈体？这一点应与骈体自身的变化及特点有关。正如前人所指出，骈文在六朝是唯美主义的贵族①《新唐书》卷二○三《李商隐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792页。
文学，但到唐代却因不断的改造而增加了实用色彩，且既具备骈体原来的各种优点，也具有写作的相对难度。骈体四六之句，讲究对仗气韵，文字工整简约，文雅庄重。其多用典故的特点体现作者的识见，可为执政者的参考。而改造后的行文重声势，其间或不乏军旅之气，此点尤便藩镇往还之用。故李德裕用子弟掌诰，以其谙练故事，以济缓急也。《旧五代史·李袭吉传》说“他博学多通，尤谙悉国朝近事。为文精意练实，动据典故，无所放纵，羽檄军书，辞理宏健”。可见谙练故事”、动据典故”及辞理宏健”是制作表章不可缺少的，而这些最能通过骈体以体现。

除了应用骈体文之外，表状笺启在唐五代特殊时局之下复有特殊的要求，毋庸说文章的制作快捷仍是最要的。例如乾宁中的翰林学士裴廷裕，就“是文书敏捷，号为‘下水舩’”而被人称羡。但“快”必须以戴伟华论表状文已提到的“简约”一点为前提。《旧唐书》卷一三七《于公异传》，记“于文章精拔，为时所称。建中末，为李晟招讨府掌书记。兴元元年收京城，公异为露布上行在云：‘臣已肃清宫禁，祗奉寝园，钟虡不移，庙貌如故。’德宗览之，泣下不自胜，左右为之呜咽。”此露布仅有四句，意深文要，与戴书所提到的裴度临终所上进封玉带（表一云令狐楚进宝剑）“文内府珍藏，先朝特赐；既不敢将归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间”者异曲同工，都为脍炙人口之作。而这类简切之文大概在唐末战乱之际更受欢迎。

《北梦琐言》卷七“记蜀中庾传昌舍人，始为永和府判官。文才①《唐摭言》卷一三《敏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47页。

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第六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5—253页。
敏赡，伤于冗杂。因候相国张公，有故未及见，庾怒而归，草一启事，仅数千字，授于谒者，拂袖而去。他日，张相谓朝士曰：'庾舍人见示长笺，不可多得。虽然，曾闻其草角抵牒词，动乃数幅。'讥其无简当体要之用也。'动乃数幅'的长牒长笺是令人反感的无简当体要之作，相反的例子是吴融。据说天复元（年901）昭宗借神策军将与崔胤诛叛乱宦官刘季述、王仲先，'既御楼，内翰（维？唯？）吴子（华？融）先至，上命于前跪草十余诏，简备精当，曾不顷刻。'上大加赏激。'

前揭卢光启创八行重叠别纸，'凡一事别为一幅'，或者就是为了适应清楚明了、简便实用之需。

表状笺启是朝廷章奏"和四方书檄"，是传达某种政治意图、处理诸方复杂关系的产物，故作者必须审时度势，通权达变。《北梦琐言》卷七曾谓唐末乱离，渴于救时之术。孔相国纬，每朝士上封事，不暇周览，但曰'古今存亡，某知之矣'。未审所陈厉害，其要如何，盖鄙其不达变也。审时度势是作章表的人应具有的政治敏感和政治才能，'但儒生中通变者鲜矣'是当时实情。能够兼备文字及政事之长者不易得，却是如李袭吉辈所必具。这就是前揭唐末掌书记人才为藩镇争夺的原因。而除此之外，还有戴文所言为人捉刀的技术。《北梦琐言》卷四记唐吴融侍郎策名后，曾依相国太尉韦公昭度。以文笔求知。每起草先呈，皆不称旨。吴乃祈掌武（指昭度）亲密，俾达其诚……掌武笑曰：'吴校书诚是艺士，每有见请，自是吴家文字，非干老夫。'由是改之，果惬上公之意也。'足见为人捉刀代笔，还要模仿他人文字语气，实非易事。
求和技巧。所以不但制作此类文章已成为一种独特的功夫和学
问，而且文章本身也成为文体中独具的一种模式，如何学习制作此
类新潮文章是社会广泛的需求。当然在传播过程中，章表大家的
作品就是最好的榜样。此类作品被世人引为参考，争相效法，从
《新唐书》卷一六六《令狐楚传》言“其于笺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
人皆传讽”；《旧唐书》卷一六三《卢简能传》附子知猷”，器度长厚，
文辞美丽，尤工书，落简错翰，人争模仿”；及《旧五代史》卷六○言
李袭“吉 论列是非，交相聘答者数百篇，警策之句，播在人口，文士
称之”，即可见其一斑。

也正是在这样的风气之下，才形成了表状笺启文集一旦制作
即迅速流传的局面，如《北梦琐言》卷七记蜀主王建初用冯渭掌笺
奏，冯升职后用韦庄和阆州人王保晦，都不甚满意。直到用王超，
“超以一本旧族，思偶风云。每遇飞章，言伪而辩。蜀先主爱之，以
二王书题表稿示长乐（公 冯涓），公乃致书逊谢，倍加赞赏……王超
后为兴元留后，遇害，有《凤鸣集》三十卷行于世。后又有名石钦若
者，体效其笔，为刘知俊判官……王超全集三十卷，今只见三卷，闻
于卢卿宏也。”所说即是王超文集为人模仿流传的情况。由此可见
时人对表笺文章的看重及欣赏、仿效实乃促进了此类文集的产生。
而晚唐五代的笺奏、表状文集显然是大量的。笔者从《新唐书》卷
六○《艺文志》及其他史籍中钩稽的这类文（集 详前揭文），相信只
是当时的一小部分，但从中已可窥见规模，且从作者的情况亦可证
实，此类专集自中唐至五代，制作数量的确是在不断增加，而这与
我们上面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正像朋友书仪、吉凶书仪兴起、盛行于六朝及唐前期一
代，并进一步发展为藩镇地方所需的公式文书仪。各时代有着不同的需要及关注焦点，也便有着不同形式内容的书仪和民俗礼书。但是所有新形式的产生都在追随着时代大变动的脉搏，唐代从重“王言之制”到“重燕许刀尺”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看，书仪所反映的就不仅是时尚和文体，也代表着社会政治生活大变动之下的一种新文化。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思考，那么对于此种书仪文集的制作也就绝不可以等闲视之了。
敦煌表状笺启书仪的分类与特色

敦煌表状笺启书仪在内容形式和文字方面都比较程式化，但制作来源不同，类型也有分别。其中既有来自个人收存创作和由档案自然流出的文集文钞，也有按一定规格程式创作的真正书仪，这使它们各具特色。这里仅以两件书仪为例，先审定其年代性质，再对分属的制作类型加以对比。

一、S.078v和S.1725v的史事年代及其归属性

S.078v和S.1725v是经前人作过研究的两件书仪，笔者据其内容，对书仪的年代和主人公重新加以判定，认为S.078v反映的史事在唐末，S.1725v也属唐后期表状笺启书仪，两件书仪充分显示了表状笺启书仪具备的制作特征。

(一) S.078v中的“梁王”和“太保”敦煌S.078写卷的背面，是一件失名书仪。残存文字共91行。楷书，字体小而工整清晰。计有书札22通，均属官场拜贺起居节候、求官求荐等内容。收书人有长官、仆射、著作、司马、判官、
司空、太保、元帅令公、老丈、厶官、大夫等。此卷《敦煌总目索引》仅定名“曰书牍轨范”。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一书有录“厶谬叨宰邑”、“厶忝居宰字”文，其题解据书札内“有忝命官于宰邑”、“遂忝微官于宰邑”等语，认为作者身份是某县县令，其地在河东太原府属下。至于年代，根据文中仅“避民”字缺笔，但不避虎、治、显、（龙隆）等唐代诸帝讳的情况，认为属后唐通（例庄宗同光元年闰四月立宗庙，定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及后唐本宗懿祖以下为七室，故太宗于后唐当避讳）；又据书仪录文第51至60行文字有致书某“老丈”求荐，提到“厶前年中已随常调，导致参差……去冬又至京洛，重下文书，首尾三年，当始判就”，认为后唐是五代惟一定都洛阳的王朝”，洛京”、“京洛”都是后唐人称洛阳的习语，故判定此卷作于后唐时。此外，其题解还提出录文43至47行“内蒙恩旨授，伏蒙元帅令公台造，已赐指赴任”语中的“元帅令公”是后唐秦王李从荣。因李从“荣充天下兵马大元帅”在长兴四年（933）八月辛未，本官“守尚书令兼侍中”，同年十一月，李即遇害，故书仪年代可定为后唐长兴中，其全名“为后唐河东某县令撰书仪”。

关于赵书所定书仪作者身份，笔者并无更多意见。可以补充的只是从书仪中屡见作者“自言右启丘下士，鲁国小儒”、“蹒跚、莫进[于宦]途，轲尚拘于尘土”、“及第多年，未离一尉”、“弃耕郑国，嗜学邹乡”、“卑吏爰从苦学，得继弓裘”、“出身已近廿年，入仕才经一两仕”、“偶随常调于铨衡，遂忝微官于宰邑”，知作者可能是在山东孔孟之乡求过学的儒生、进士或明经及第，但多年来仕途不顺，因此对仕宦之道看得极重，对上级长官也极尽哀求逢迎之能事。就书仪所道，其身份仅为一县令是可以无疑的。
但是，关于书仪的年代如核诸其中史事却不无疑问。该件录文第71—74行有：“伏惟监风云间气，鸾凤殊姿；谦谦有君子之岁寒，耿耿禀大贤人之节操。分忧元市，能稗政事于万机；力副梁王，并掌繁难于四镇。尚留藩屏，未驾朱轮；始期作镇山河，岂止［竹］符治郡。官”应是“力副梁王，受书”的州刺史级官吏。这“个梁王”和“四镇”，依据唐五代史料，则非朱全忠莫属。

《资治通鉴》卷二六二昭宗天复元（年901）：朱全忠奏乞除河中节度使，而讽吏民请五月癸未为帅（；

《旧唐书》卷二六四天复三年：（二月）庚辰，加全忠守太尉，充副元帅，进爵梁王。

朱全忠进封梁王的时间，《旧唐书》卷二十上《昭宗纪》和《旧五代史》卷二《梁太祖纪》或记作天复元年。又《旧史》同卷记天祐二（年905）十一月辛巳，复改封魏王。是朱全忠以梁王领四镇，不早于天复元或三年；而在天祐二年之前。作者编书仪若在后唐，则此信为朱梁事，应有避忌而删去，为何尚要保留如此宣颂之辞呢？

更应予以分析的是书仪录文第35行下致太保的一封书状。辞称：

"右今月今日得状探史佶状报，伏审太保天使到州，荣加"
宠命，伏惟庆慰。卑吏忝伏事阶墀，下情无任抃跃。太保官荣二品，位重三公，赤心匡辅于吾君，竭节保存于宗社。左擒右纵，勋高于汉代陈平；拓土尽疆，功盖于秦朝白起。故得编加渥泽，曲被皇恩；重驱斧钺于尧都，再受丝纶于晋国。奸豪摄怯，推心禀廉之威，疲瘵讴歌，鼓腹贺龚黄之化。伫见追还龙节，入拜凤池，长为梁栋之材，永作股肱之任。

此书状，赵和平“据尧都”“晋国”等词，认“为太保”是在唐代河东道辖区的太原府作节度使的。此推断或者不错。但是，这位太保是哪一位节度使呢？从书中得之，他其时不但官荣二品，位重三公，而且还“入拜凤池，长为梁栋之材，永作股肱之任”了。凤池者，是唐代对中书省的美称，“入拜凤池”，按此太保之身份，是无异说明已拜为中书令了。那么，谁是这位太保兼中书令呢？联系书中“左擒右纵，勋高于汉代陈平；拓土尽疆，功盖于秦朝白起”，则知此人势必是创有非凡业绩者。

而如“伫见追还龙节”与“重驱斧钺于尧都，再受丝纶于晋国”等语相对研之，便可发现其中还另有深意。首先，“重驱”、“再受”是指两次重复而非一次，所以“追还”者，应是指节度节钺罢而复归。其次，“重驱斧钺于尧都”固然可认为是因重授节钺而还河东，“但再受丝纶于晋国”者却并非仅指节度官告。因“丝纶”一语在唐朝常常是指封爵而非官告。例如P.3931书仪中指册命蕃王之事即“有先皇特降王臣，显颁册礼；雨露之恩尚湿，丝纶之诏犹新”之语。因“此丝纶”与“晋国”合观，只能是指封于晋国，也即爵封晋国公。查唐末被封为晋国公者有二人，其一即统帅军队镇压黄巢的王铎，其二则是身为后唐开国之父
查《新唐书》卷一八五《王铎传》,称“乾符六年，贼破江陵，宋威无功，诸将观望不进，天下大震。朝廷议置统帅，铎因请自率诸将督群道，帝即以铎为侍中、荆南节度使、诸道行营统帅，封晋国公。”王铎后因败贬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僖宗入蜀，拜司徒、门下侍郎、平章事，加侍中，复以太子太保平章事。至中和二年，乃以检校司徒、中书令为义成节度使。王铎曾任太子太保，封晋国公，复拜中书令，但他的中书令只是官职提升，非“因追还龙节，入拜凤池”，又据《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纪下》，王铎以义成军节度兼滑州刺史、郑滑观察处置使，“与尧都”无关。故作为收书人的可能性似不大。

但李克用的情况似有不同《旧五代史》卷二五《武皇纪上》称“中和三（年883）七月，晋国公王铎承制授武皇东北面行营都统”，进收京师“。七月，天子授武皇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左仆射，河东节度使。《旧唐书·僖宗纪》也记同年五月，以李克用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李克用以平黄巢功封河东节度使，这可以认为是他一入“尧都”。

此后朝廷因宰相张濬之谋讨李克用，旧史纪复记大顺元年（890）六月”，天子削夺武皇官爵“。同年十二月，李克用上表诉冤，左仆射韦昭度等议“其克用在身官爵，并请却还，仍依前编入属籍”，制从之。二年二月辛巳，李克用复检校太师、中书令、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此可称是二入尧都。且《旧唐书》卷二○上《昭宗纪》，中华书局标点本，第743—745页。
官爵均复，亦可称“再授丝纶于晋国”，所谓“追还龙节，入拜凤池”正其事也。李克用本为世居唐朝代北边陲的沙陀，曾与吐浑赫连铎争夺蔚朔之地，后率沙陀及鞑靼降唐，并为唐降黄巢，故如说“其拓土尽疆”、“赤心匡辅”并不算过誉。唐朝廷赐其父国昌姓李氏，故复官爵后又“有依前编入属籍”之说。而品味李克用的这些曲折经历，“与编加渥泽，曲被皇恩”看来也是相合的。

惟一不符的是信中“称太保”，而史料记载其复官时是检校太师。然此其或史料有误记或失记，姑且存疑。又克用曾授行营都统之职，复爵后，乾宁中“更进太师，兼中书令，邠宁四面行营都统”，都统即元帅职，联系另一书“有元帅令公”之称，书仪作者既是太原节度下的属官，则此元帅令公不是李从荣而是李克用也是说得通的。故此王铎与李克用相比，李克用更符合受书者的身份。

如所推不误，则此通书状的年代应在大顺二（年891）前后，这与前“述力副梁王，并掌繁难于四镇”之时间也是相近的。这就是说，此件书仪所载书状，多是唐末而非后唐。唐末是强藩争霸的乱世，士若求作官，不能不纷纷投靠诸雄以寻求庇护，惟其如此，才可以解释为什么朱梁与李克用会同时出现于一件书仪中。

然如书仪所涉事多为唐末，则如何解释前所云“去冬又之京洛”之“京洛”语呢？《新唐书》卷十《昭宗纪》略曰：
（天佑元年正月）戊午，全忠迁唐都于洛阳……（闰四月）甲辰，至自西都，享于太庙。乙巳，大赦，改元。
《旧唐书》卷二十上同纪《旧五代史》卷二五《武皇纪下》同记此事，由是知自天佑元年至四年朱全忠迫唐帝禅位之前，唐都应在洛阳。故“称京洛”未必是指在后唐。
不易解释的只是此书仪出现的避讳问题。避讳与立宗庙有关。唐代后期宗庙常为九世十一室,凡有新皇即位,则宗庙神主便依昭穆次序依次迁祔,而保持此一常数。根据“亲尽则毁”的原则,凡迁出之主例不再讳。但是太(祖 虎)、高(祖 渊)、太(宗 世民)三代为永桃不迁之主。所以,虎、渊、世民等字终唐之世始终应讳。此卷避讳仅“避 民”而不“避 虎”字,确不合唐法,而比较符合后唐。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书仪史事在唐代而避讳却不符的情况呢?我认为一种可能是作者整理和汇集这些书状的时代较后,且虽在后唐本人却已远离政治中心,故不讳朱梁事。另一种可能是原作与抄件不是一个时代,原作作于唐末,而抄件则在后唐,且在敦煌地区,故能保持唐末史事风貌。然此两种解释或均未稳妥,故提出质疑,以待识者正之。

(二) S.1725的年代、性质
敦煌S.1725残卷的正面,是一件综合性的吉凶书仪。内有较详细的婚丧礼俗制度。研究者已考证,此卷年代在开元以前①。S.1725的背面有两部分内容,前部为《释奠文》《祭社文》《祭雨师文》《祭风伯文》的几件祭祀文程式和祭祀所用器物、人夫,以及一件对祭祀器物加以说明的刘智刚牒。另一部分则是倒书的书启,存8首,共35行。题目为《诸起居启》《贺加官启》《贺至岁启》《贺破贼启》《蒙奏改官及与上考不许谢启》《蒙与物谢启》《牧宰初授百姓故旧及名位相亚者起居启》《有疾及马坠损

① 谭蝉雪《敦煌婚姻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3-134页;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431-433页。
赵和平认为，“从八首启文的内容来看，似表现了唐安史乱前中央政府对各地官吏有绝对影响的事实。如《贺加官启》云‘伏承天恩加荣命’，《贺破贼启》云‘伏承宣圣德，克震戎威’，《蒙奏改官及与上考不许谢启》云‘伏奉某月日敕，改授某官’等，均显示了皇帝对臣下的影响”。因此他提出此件书仪“反映的是八世纪中期以前的情况，即可能撰成于八世纪中期，约略和杜友晋书仪同时或稍早”。此外，还根据写本有省略语较多的情况，认为它可能是属于《书仪镜》一类的简本。

但是，书仪的年代与性质是否如赵和平所说呢？仔细分析这个写卷的内容，我们可发现，八首书启中，虽然有几首提到‘天恩’、‘圣德’，但是致书的对象没有一首是皇帝或朝廷，而是全部上于上司、长官。例如第一首《诸起居启》原文如下：

```
至万福，与前启同。
```

```
内名卑守有限，末由拜伏，下情无任驰恋。谨因已下依前启。
```

“内名卑守有限”，“下情无任驰恋”，明显是下级问候上级的习用语。第二首《贺加官启》所说“天恩加荣命，下情无任庆跃。名卑守有限，不获随例拜贺，伏增战惧”，清楚地说明其意在贺长官被皇帝提升。第三首《贺至岁启》的“伏惟某官公膺时纳佑”一语，同样说明了受书人地位远较自己为高。第四首《贺破贼启》是庆祝长官在“奉宣圣德”之下“克震戎威”。第五首《蒙奏改官与上考不许谢启》

赵和平《唐前期书仪》题解，载《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93年，第430页。

①
虽说明是奉敕改授或蒙注上考，"但感戴"的却是"推荐"、"超奖"自己的恩造。恩造是荐拔自己、于己有恩的上司长官，同样不是皇帝和朝廷。至于第六至第八首的《与物谢启》《牧宰初授百姓故旧及名位相亚者起居启》《有疾及马坠损起居启》也从书题到用语，无一不透露了下级对上（级或百姓对长官）的这样一种关系。由此可见，书仪所推崇和宣扬的主要不是皇帝朝廷的天威圣德，而是长官对属下的恩惠和属下对长官的恭顺、惧服、谄敬。特别是所谓破贼、牧守初授，至少是指州刺史一类官员，而"蒙奏改官"、"超次上考"更是只有节度观察等使才能有的权力。所以，与其说书仪反映了地方对中央的臣服，不如说是表现出地方长官职权之盛，而这种情况，显然不会出现于安史之乱以前。

可以对书仪年代作补充说明的还有书仪所用的贺节习语。该件书仪第二首《贺至岁启》云:

岁云，元正启祚，
名启：晷运推移，日南长至。
万物惟新。
伏惟
某官公膺时
纳麃，罄无不宜。名卑守有限，不获随例拜庆，下情无任战惧。
无职任云：名不获拜庆，下情
无任驰恋。已下与贺官启同。

注文中"的（已以）下与贺官启同"，是指下面还要附"上谨遣某官姓名位，谨附启不宣，谨启"之类的结语。对照赵和平同书录S.6537v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寮属起居第六》有《贺正冬启》云：

某启：元正启祚，万物惟新，冬至云晷运推移，日南长至。
伏惟
官位膺时纳祐，（启罄）无不宜。某乙限以卑守，不获随例拜贺，下情无任惶惧。谨奉启不宣。谨启某月日具官衔姓名启。
氏书仪在其序言中曾提到：又观夫，冬至云‘晷运环周’，今改云‘晷运推移’也。这也就是说，将冬至贺语‘的 晷运环周’改‘作 晷运推移’是自郑余庆作书仪始。郑氏书仪作于元和六年（从郑和平考）。赵和平同书曾据此证明P.39 书仪中出现‘的 晷运环周’语是在唐前期，且指出无论是大中时期的张敖《吉凶书仪》还是五代时佚名的《新集书仪》，冬至用语都‘是 晷运推移’。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认为，S.1725v的书仪是作于元和六年以后的唐后期五代呢？想来这一点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S.1725v和S.078v的时代既可以肯定皆属唐后期五代，并且其内容均不出官场中求官求迁、候问长官僚属起居寒温及谢贺启状等范围。则S.1725v与S.078v性质相类，显然也应归入‘表状笺启类书仪’。

二、敦煌表状书仪文集的类型和制作

与S.078v和S.1725v同样，敦煌表状笺启书仪也都是晚唐五代作品。但是，从以上两件书仪仍可看出一些不同，即它们的制作方式显然并不完全一致。S.078v看得出是将实寄过的书信汇集而成，只不过是隐去了作者及收书人的真实姓名。而S.1725v则是完全规范、抽象的书仪制作，无具体收书人和授书人，是符合书信格式使用要求的范文。这两种制作方法恰合于前节对传世书仪制作的说明，也反映了敦煌表状笺启书仪的制作特点。敦煌表状笺启书仪的制作大体也分两种，即一种是使用或实寄过的表状
表状书信文集属于文集性质的代表作品除S.078《v 县令书仪》外，还有刘邺《甘棠集》、相州马判官本《新集杂别纸》、S.5623《灵武节度使书状集》，归义军时期表状仪中如P.2945、P.4065、P.3151者也在此内。这一类书仪大都有具体、真实......其间与对象中有些甚至不仅是应酬，而且记载着当时的一些复杂情事。《新集杂别纸》由88首“别纸”组成。虽然某些书状已略去了收书人的姓名，但根据收书人所在地域及官称，还是看得出是由实寄书（信别纸）“合集”而成。一些别纸还保留了姓氏，如“贺邢州太傅高”“榷盐王司空”“洺州张司空”等。同样，《灵武节度使书状集》内“沙州令公”“袁州司徒”“西京太傅”“青州侍中”“引进副使薛尚书客省副使杨仆射”等也无一不是确有其人，表明这件书仪也是实寄书信或启状的集成。包括归义军的某些书信抄
吴其昱《甘棠集与刘邺传研究》，台湾《敦煌学》第三辑，第1—50页。赵和平：《敦煌本〈甘棠集〉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42

甘棠集(P.4093)件，实际也是同一性质。由于前数种文集性质比较清楚，这里仅就归义军的书信集作些分析。

敦煌归义军时期的书仪，有些其实分类上还是属于文集。此类文集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一书录有多件，包括《沙州书状稿》(P.3151)、《沙州归义军致灵州状稿》(P.2968)、《权知归

①按此卷赵书题为《沙州归义军致甘州状稿》，只有书状一件。内中提“到切知行

(1) ①

(1) ①

(1) ①
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状稿（P.2945）、表状文（P.4065）等。内容多为归义军节度使致朔方节度及甘、凉等州的书状。这些书状大致反映了沙州归义军与中原朝廷及周边政治势力的关系。其中如P.2945是一件较大书仪，共存73行。内有“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致“相公阁下”的书状、别纸七件及《凉州书》一件，提到归义军向中原朝廷派遣使者受阻的情况。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著为《归义军公文集》，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五》定为《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某某书状（稿九件）》（按“九”为“八”之误，详后）。关于留后其人，或提出是曹仁贵，状启内容反映的是曹仁贵执掌归义军时归奉后梁的事实①；或更据《凉州书》提到“前载得可汗旨授”而认为可汗是指甘州回鹘可汗，发件人是曹元德，年代应在曹议金卒后的清泰二年至天福初年（935—936前后），对此我们将在下面再加以讨论。P.4065、P.3151、P.2968等件同样记载了不少归义军努力打通与中原朝廷和周边政治关系的历史事件。

涉及书仪的制作有一点需要提到，即这里所列举的文集与上面有些区别。前揭传世文献中所见书仪文集大多都是个人文集，其中出自藩镇判官掌书记之手尤多（当然也有后人收集的合集，但数量较少）。敦煌的表状笺启书仪文集中一些从中原或京城传来李并在甘州，进奉之人尚有阻碍。伏希司徒司空早设奇计，速觅道途，得面天颜，别迎恩宠。其当道进奉一行，切望偏垂管领”。状所言是进奉使人在甘州被阻之事，则所求当不是甘州方面。笔者认为根据曹氏归义军每次进奉都得到灵州节度使的帮助，则此书状应是致灵州的。

①李正字：《曹仁贵归奉后梁的一组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一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74—281页。
②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P.2945题解，第347—350页。
《者,如《 甘棠集》《、 记室备要(》 图见插页3)、 新集杂别纸》等都是
如此《, 县令书仪》《、 灵武节度使书状集》和下面所要谈到的一些刻
刺史书仪》《、 灵武节度意制作者,如《 使表状集》等可以推测也属这
种性质。但是上所列归义军时期文状并不都是这种情况。例如
P.315《1 沙州书状稿》只是两首不署收、寄人书状的草稿,但内中提
"到 所谓前年中逈沐钧恩,远差人使,特持礼币,远届暇方;寻差使
人专赴复礼,至于中路,逢回鹘大段般次,以兹人使却回,信物之属
半遭蕃部偷劫""和 "所示勾取(弊 敝)藩入贡般次事,今差曹某等一
行上京进奉,克(副 复?)
来书"却非常具体。结合其他归义军文书
和传世史料,知是曹议金给灵武节度使的书状。不过对于为何两
状连在一起,以及是否属"于 凡一事别为一纸"的别纸性质都有可
疑。另外还有些是抄件,严格说来像是存档的文案,如P.2945前
两状末都署明" 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厶乙状上",第一状甚
至注 厶明日期七月九日。"但 乙"前却用平阙。这种情况只能说明
是别人所抄,并且曾经是存档,否则不必署官衔和日期,同时将名
字写"成 厶乙"并空字避讳,也不必注明"是 别纸"。又别纸之所以"是 别纸",不过是写在另一张纸上,这是当时书信常用
之体,只有作为文案抄在一起才有必要加以说明。同样P.4065题
记表明它"是 乙亥(年 李正己考为北宋开宝八年,975年)十一月十
六日,乾明寺学士郎杨定千"钞写的一件《 表状集》,内含归义军节
度使曹元深给后晋朝廷的表文两件和曹元忠给于阗王李圣天表文
一件 。其时代不同,作者也不一定是一人,这种东西很可能也是
由档案中流出的。

①李正宇《: 归义军曹氏〈表文三件〉考释》《, 文献》1988年3期。
但很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的文抄其实是某些敦煌表状书仪文集的原始状态。学士郎的钞写说明它们就是被作为文样流传的。又如P. 2992v，这件写卷由三件来源不同的书状组成，一件“是归义军兵马留后使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回鹘众宰相”曹元深？）状，一件“是朔方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御史大夫（张希崇）状，第三件“是兄大王（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致弟”甘州回鹘顺化可汗状。三件书状作者不同，时代不同，但抄书手是一个，原来的署名都予保留，肯定也是来自曹氏归义军的文档。虽然严格说也不能算表状文集，但这种来自公事文案的文抄也许就是某些表状笺启书仪形成的一种自然方式。

（二）虚拟或规范化的公式文牍
另一类书仪与S.1725v相似，以郁知言《记室备要》P.3723，后唐时代《刺史书仪》P.3449+P.3864等，后唐时代《灵武节度使表状集》、归义军时代的某些书仪如《归义军僧官书仪》P.3715+P.2729）和P.3101、P.2621v、S.3399、P.2652、P.3041等为代表。这类书仪属于专门制作品，有确定的名目、纲要、内容、一定的对象和场合，也有较规范和固定的程式套语。从总体上看，这类书仪不是简单的文集，而是经过提炼加工的单纯性书仪，它们作为文范的特征更加明显。例如《记室备要》三卷，“为乡贡进士”郁知言咸通七年（866）偶游于鲁”时，“为护军常侍太原王公”也即宦官监军所作。内有贺册、贺赦、贺赐等贺文多类，收书人均是无确定人称的“(startTime)”官”，说明是预先按规定场合内容设计的贺词。其上卷又有收书人是三师、宰相以下的中央、地方高级文武官，中卷则有从中尉、军容，到诸内司使、监军使、供奉官一类的重要宦官职务，即使官职
内容确定，人称也不具体。下卷十二个月的贺仪，实际是月旦贺官起居的例词。其他举荐书及赠物仪一类也是虚拟场合对象的范文。

《刺史书仪》的内容周一良先生作过全面的介绍，撰者设想利用书仪的人，有从首都到地方任州刺史的官吏，因此书仪中范文的标题有各种应其所需的名目，如给皇帝的表（到本任后谢上表、谢节料表）和（状 正衙谢状、进谢恩马状、正衙辞状多件）、给上级官吏的（状 谢状、申本道状、谢本道节度使状多件）、给同级官吏的书（ 辞诸官员书、经过州县探。总之，作者是根据前相与书多件）等刺史上任、得替过程，细致地摹拟了这类官员上对皇帝、长（官 节度）下对同级官吏等种种官场必须应对的礼仪节目中所用表状启等。其使用范围、对象、场合都是非常固定、具体的，有使人模仿的一般意义。

同样，归义军时代的某些书仪也有如上特征，它们常常是归义军内部在特定场合的谢、贺仪。如P.3101《归义军书状集》有《贺（谢）侄加官》《贺天使平善过路》《归义军僧官书仪（》P. 3715+P.2729）有《贺破贼、贺将军亦[同]》《贺破贼恩赐裹疮帛》《贺赐衣甲枪旗》等十几种贺词谢语，虽未有固定的致（贺 谢）人，却是相同的套路可供选用。另外S.3399《杂相贺[语]（》图见插页4）中的诸种贺语看得出也是归义军之官吏或幕僚应备官场迎贺之需的，有些如周一良先生所指出只是些口语的贺、谢答辞。这些固定的陈词套语要的是形式，只要仪节无误即可，并不须有特殊的风格。

①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载《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两类书仪明显有一定区别，第一类书仪更贴近文集，第二类书仪已是比较规范的范本。第二种书仪明显是在前一种文集基础上形成的，有些只是对第一种文集的进一步提炼加工。第二种书仪虽然已完成了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的转化过程，但是常常还保留有前一类，也即实用书信文的痕迹。有些甚至兼具两类的特征。在这方面，P.3931《灵武节度使表状仪》即比较典型。其书状题目用“起居”、“书本”、“正月贺”等十二月贺“谢马书”、“送物”、“贺端午别纸”、“别纸”、“表本”、“僧牒”等概括性的书仪名称，但是其中一些书范事实上仅仅是隐去了具体人称的真实旧作而非虚拟之文。赵和平已证书仪内两通表本是回鹘可汗上后唐庄宗皇帝的，其一表中所用蜀中典故与同光三年（925）灭前蜀王衍事相合，应写在同光三年以后。还有朔方节度使给回鹘可汗的书状，或
申明与回鹘的友好，奉劝作“为青海之舟航”、“玉关之锁钥”的回鹘“同风叶义”，不要阻断使者的往来和道路交通；或鼓励赞美回鹘“每慕华风，常修职贡，竭丹诚而内附，作皇唐之外臣；不惟播美于一时，抑亦书勋。此外，从书于千载”，可证后唐时期两者的关系。仪关于普照大师的游五台山“记前无垢藏，幸遇庄皇，此吉祥天，喜逢今圣”等语有庄宗庙号，也可以推知表及牒应是作“于庄皇”之后“的今圣”也即明宗朝，总之我们可以断定这件书仪的表牒书状确曾实用。至于来源，赵和平推测多为朔方节度使衙内的书启状牒之底本，其表“本可能是朔方节度幕府内判官、书记之类代甘州回鹘草拟的，也可能是草拟之后录副存档的”，P.3931号写本是朔方节度使幕府内高级幕僚所撰。笔者同意赵和平的意见，P.3931虽形式上已是完全的书仪，但内容则仍表明是前述那种来自档案而经掌书记个人收集、加工的文集。

《刺史书仪》也有某些痕迹颇费斟酌。这件书仪内大多数书范无具体主人公，但是其中《与马司徒》一首却显然有其专属性。书状内容非常具体，作书人甚至提到自己争面到京，无安（伯泊）处，如是知有小院子，厶乙差军将指引，权价赁安止，即抱怨到京未能见到马司徒，只好自己赁房屋租住事。这个马司徒是谁呢？《旧五代史》卷九○《马全节传》提到马全“节唐明宗即位，授检校司空，历博、单二州刺史。天成三年，赐竭忠建策兴复功臣，移赐郢州。长兴初，就加检校司徒，在郡有政声，俄授河西节度使。时明宗命高祖伐蜀，师次岐山，全节复任及之，具军容谒于辕门，高祖以地理

① 赵和平：《后唐时代甘州回鹘表本及相关汉文文献的初步研究》，《九州学刊》敦煌学专号，总第24期，1995年3月。并收入《唐五代书仪研究》。
隔越,乃奏还焉,移沂州刺史”。马全节曾连任刺史并加官司徒,符
合这件书仪使用者的身份;并且更重要的是他在明宗朝任过河西
节度使,这可以解释这件有着五代中原特色的书仪为什么会来到
敦煌。笔者由此推测《, 刺史书仪》“的 刺史”就是马全节。替他作
这件书仪的人可能是他的幕僚,或曾任幕僚者,也即《 与马司徒》一
首的作者。书仪收入这首书状透露了作者与马司徒的关系。作者
为马司徒作他所需要的《 刺史书仪》,也正像郁知言为王姓宦官监
军作《 记室备要》一样,是幕僚专为使主之作。

当然以上所论只是第二种书仪的情况。反过来第一种书仪如
《 甘棠集》者虽绝大多数都有具体对象,但是“像 贺诸道节察正”一
首却是泛指和可以套用的,而且其中许多是专门酬应之作,可以将
其中格式文辞转换用于同一官职的其他人身上《。 新集杂别纸》也
是如此,内中的月旦贺官和标明“了 贺冬”、“两枢密”、“节判”、“书
记”、“观察”、“客省”一类书题对象的其实也是泛用之作,与P.
3931非常相似。两类书仪发生的这种交叉反映了它们制作的共
同目的,也说明了表状笺启书仪的来源与文集的关系。

那么,总结以上介绍的两类书仪可以看到敦煌表状笺启书仪
究竟具有怎样的特点呢?

第一,敦煌表状笺启书仪属于完全的官场酬应书仪,因此无论
是使用过的书状文集还是虚拟的表状笺启,均有比较确定的使用
范围及对象,其制作也是根据使用者的需要,目的十分明确。例如
刘邺《 甘棠集》是提供陕虢观察使应酬之用,发文使主与受文对象
皇帝、朝廷用事(者 宰相贵臣)、藩镇节度使之间,是等级分明、尊卑
有序的政治关系。郁知言的《 记室备要》是为宦官监军作的,因此
它的致书对象中有大量的宦官使职《。 新集杂别纸》的收书人是围
绕相州节度使及后唐统治区域洛京、魏府及磁、邢、洺、镇、齐等州的官员,显示出后唐时代地方节镇刺史及高级幕僚之间往还应对的官场圈子。同样,归义军时代的书仪也只适用于归义军内部,其"司空"、"尚书"、"天使"、"天公主"等致书对象表明了书仪产生和使用的年代。因此,表状笺启书仪文集虽是供人们模仿使用,但它的地域时空有所限制,不是任何场合都可以照搬,这恐怕也是此类书仪品种多而风格不一的原因。

第二,敦煌所见表状笺启书仪的作者多来自地方,其中大多数应是藩镇及地方州府的幕职僚吏。如刘邺《甘棠集》、郁知言《记室备要》尤表现了晚唐掌记文学的特色,这与传世文献所记此类书仪文集制作传播的情况是一致的。由于此类书仪文集多产自地方使府,所以它们所体现的是大量地方政治生活,和地方官员所面对的复杂政治环境与各类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将在下面作进一步说明。

第三,敦煌表状笺启书仪的启状多用骈文,这一点在以上两类制作中也是共同的。它与前揭中唐以来令狐楚、李商隐等人提倡和实"今体章奏"、俪偶长短"有直接关系。《记室备要》作者说宦官监"军常以文字饰于缄章,染翰抽毫,皆成四六"可见一斑。而敦煌表状笺启书仪中不仅《记室备要》《、甘棠集》这样出自中原文笔的手笔是如此,即如边远之地的《灵武节度使表状集》《、灵武节度使书状集》乃至P.2945《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书状稿》等,也都是骈文书写和润色的文状,这与传世文献中表状笺启的制作基本一致。所以以骈文书写,可以认为是唐五代表状笺启文学的主流。不过骈文虽然有不少优点,书仪文集中也不乏文辞或优美、或犀利的佳作,但随着其制作由单纯性的文集合成向着规范形
式的书仪转化,其用词套语陈陈相因已相当程式化;加上所收录的表状也以谢、贺等各种官场酬应文字为主题,只能反映官场礼仪、官场生活上行下效,日趋形式化、固定化的特点。(三)附:S.447《3 后晋文抄》是《李崧文集》的讨论

S.4473写卷长9.57m,宽31.5cm,是一件较大的文抄。其正面由五项内容组成:一《大晋皇帝祭文》,二《大晋皇帝致北朝皇帝遗书》,三《大行皇帝谥[议]状》,四《集贤相公遭母丧尽七后[辞]起复表(》共六件并批答),五《祭文》。五种文章总计200行,字迹清晰,首尾完整,每种首行并有标题。由题目内容可知,这些文章都出自后晋公卿大臣之手,有些还假以皇帝的名义,涉及当时重大的政治事件,但在传世典籍中从未出现过。对这件文书,许福谦曾有十分深入的研究,其中关于文书的作者是一关键问题。S.4473的作者,许福谦认为并不是一个人。由于第五项《祭文》末尾行注“明 晋国天福七(年 按当作六,941)岁次辛丑十二月廿七日秦国太夫人薨背至壬寅岁二月十九日集贤相公李起复表”,已可据《旧五代史》纪传及《资治通鉴》等书很容易地得知是后晋宰相李崧,并第四项《集贤相公遭母丧尽七后[辞]起复表(》共六件并批答)也可以证明是李所为。此外许福谦根据《大晋皇帝祭文》中作者自“称 臣以雀起之前,然知不外;龙飞之后,其实无功。在太原之时,虚上相之位,才临清洛,便降白麻。自非萧何张子房之间,合在赵盈桑维翰之下”,考证此文也出自李崧之手。但对于《大晋皇帝祭文》,许福谦曾有十分深入的研究,其中关于文书的作者是一关键问题。
从通篇行文语气来看，似石敬塘临终之前自撰，或是他命人代笔而成。其实并非如此，并认为遗书对契丹用敌国礼，与景延广对契丹所持强硬态度一致，有可能是他命人代笔而成。至于《大行皇帝谥议状》，他据《五代会要·帝号》注“太常卿崔协撰”，考证认为是崔棁之误，从而否定了日人菊池英夫关于写本是《李崧文集》的判断。但是笔者认为，菊池英夫虽然证据不足，但其看法很可能是对的。由于李崧文字流传绝少，无从证明，这一点要从他的经历来分析。

《旧五代史》卷一○八《李崧传》：
同光初，魏王继岌为兴盛宫使，兼领镇州节钺，崧以参军从事。时推官李荛掌书，崧见其起草不工，密谓掌事吕柔曰：“令公皇子，天下瞻望，至于尺牍往来，章表论列，稍须文理合宜。李侍御起草，未能尽善。”吕曰：“公试代为之。”吕得崧所作，示卢质、冯道，皆称之。繇是擢为兴圣宫巡官，独掌奏记。庄宗入洛，授太常寺协律郎。王师伐蜀，继岌为都统，以崧掌书记。

李崧以魏王继岌的掌书记出身，观其所“论尺牍”一事正是前所谓表状笺启的代称。传并言继岌在蜀擅杀郭崇韬，李崧以“为今悬军五千里，无咫尺书诏，便杀重臣，非谋也”，于“是召书吏三四人，登楼去梯，取黄纸矫写诏书，倒使都统印发之。翌日，告诸军，军情稍定”。“从而得知李崧向来是代人捉刀，抒主急难，他的时代比李袭吉、李巨川辈稍晚，但章表功夫大约不分伯仲。所以，明宗朝他又任节帅范延光的掌书记，直至入朝直枢密院，改翰林学士。晋高祖时任宰相，与桑维翰并兼枢密使。晋少帝嗣位，复用桑维
翰为枢密使，与冯玉对掌枢密。由此可见，李崧一生始终参与枢机，未能离开章奏。根据他的性格，期间很容易代人写作。《谥议状》这样的大手笔，名义上由太常卿撰，但未必是崔棁执笔，倒有可能是身为宰相重臣的李崧亲为。另外李崧乃当时大儒。唐末以降，世风浇薄，时人多以丧事起复为荣，很少有人以终制为事。李崧当五代乱世之时，竟有七表辞起复优典，虽其中牵涉政治，但也足为惊世骇俗之举。《旧五代史》本传史臣曰“有李崧仕唐、晋之两朝，耸伊、皋之重望，考其器业，无忝台衡”的评论。大晋皇帝祭文》和《谥议状》皆与皇帝凶仪有关，二事归一，理辞俱赡，宜由李崧这样的高手完成。

至于《遗书》一篇，从《旧五代史》卷八八《景延广传》看来似乎确有可能是代表景延广的意图。传言“其年夏，高祖晏驾，延广与宰臣冯道等承顾命，以少帝为嗣……少帝既嗣位，延广独以为己功，寻加同平章事，弥有矜伐之色。朝廷遣使告哀契丹，无表致书，去臣称孙，契丹怒，遣使来让”，以后遂有景延广回“言先帝则北朝所立，今上则中国自册，为邻为孙则可，无臣之理”，而得罪契丹，由是与契丹立敌，干戈日寻之事。《资治通鉴》卷二八三国天福七年十二月条亦称“帝之初继位也，大臣议奉表称臣告哀于契丹，景延广请致书称孙而不称臣。李崧曰：‘屈身以为社稷，何耻之有！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胄，与契丹战，于时悔无益矣。’冯道依违其间，帝卒从延广议。”说明当时写这样的告哀书李崧是不赞成的。但少帝是宰臣与景延广共立，无表致书“称孙不称臣”是由皇帝批准的最后决议，此点李崧也无如之何，而且很可能只好秉承旨意代为作书。不过李崧当然也并非坚决的主和派，当后来两国交战之际，契丹使其瀛州刺史刘延祚诈降，晋岳寿将军王峦又有密奏，
“苦言瀛、鄚可取之状”，由此“国家深以为信，遂有出师之意”。观《李崧传》“言开运末（，李）崧、（冯）玉信契丹之诈，经略瀛、鄚，中就有责任，他反对以书渡之败，落其奸谋”，则与契丹最后一战李崧代表只是怕因此激怒契丹。

再从《遗书》的内容文笔论，这件遗书以四六行文，气势宏伟，文采灿然，是当时表状习用的文体，但措辞委婉。文中既“以果蒙皇帝深愤不平之事，亲御无敌之师；控弦云起于塞间，交锋雪飞于城下。挑战决胜，扬威纳降，雅同注海清江，救鱼烂于沸鼎；仍致变家为国，属龙飞于渺躬”等语吹捧契丹功德，表明不忘援立的旧恩；又“将临大渐，再念中原，茫茫蒸民，倏忽不可无主；桓桓师旅，须臾不可无君”和“约礼虽协于旧章，托孤终陈于盛德”来陈述不得已自立太子及拜托契丹仍给予照拂的委曲之意，显然已经试图在措辞上尽力予以弥补。且全篇一气呵成，顺理成章，不但内容无懈可击，即从文辞而言，也是当时表状文中难得的佳作。如此文章非李崧这样洞悉形势的章表大家又能出自谁手？

还有契丹与后晋反目的时间、原因也还值得进一步考虑。据《旧五代史》卷八一《少帝纪第一》载天福七年六月己卯，遣判四方馆事朱崇节、右金吾大将军梁言持国信物使于契丹，时在少帝初即位后，使节应是持了遗书前往的。但是同年八月甲子条，尚载“契丹遣使致慰礼马二十匹及罗绢等物”；同月癸酉，又“有契丹遣使致祭于高祖，赙礼御马二匹、羊千口、绢千匹。契丹主母亦遣使来慰”。这些说明其时契丹与后唐关系还不是很坏（《旧五代史·景延广传》和《通鉴》卷二八天福七年末记”契丹大怒，遣使来责。《旧五代史》卷八四《晋少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118—1119页。）
让且言‘何得不先承禀，遽即帝位？’延广遂以不逊语答之。契丹
卢龙节度使赵延寿欲代晋帝中国，屡说契丹击晋，契丹主颇然之。也
说明契丹入侵，原有一过程，很可能是先受了赵延寿的挑拨。而
天福八年九月由于景延广囚禁契丹回图使乔荣”，悉取邸中之货”，
在遣归乔荣时又以今上乃中国所立”，为邻称孙足矣”；以“及 北朝
皇帝勿信赵延寿诳诱，轻侮中国。中国士马，尔所目睹。翁怒则来
战，孙有十万横磨剑，足以相待。他日为孙所败，取笑天下，勿悔
也”的大言恫吓，才最终导“致 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决”。所以
胡三省以“为 景延广建议称孙不称臣，犹可曰为国体也；囚其邸吏
而取其货财，则误国之罪无所逃矣”。遗书是两国交恶的导火索
但不是主要原因，这其中制作者的委婉用心不细读很难体会。反
过来契丹统治者和任何少数族政权一样，也是羡艳和模仿中原汉
族制度文化的。《旧五代史·李崧传》记契丹主“有 我破南朝，只得
李崧一人而已”的说法，虽云是“由 赵延寿、张砺素称崧之才”，又焉
知不是契丹主从后晋国书中早已了解到李崧的文采和识见呢！
最后还应注意到的是S.4473本身。S.4473将五种文章抄集
在一起，但这些文章作为公、私的意义不一样，前四种文章是公文，
惟最后一种李崧的祭母文是纯粹个人所用。这件祭文附在第四种
《集贤相公遭母丧尽七后[辞]起复表(》 共六件并批答)之后，所作
虽都是为母丧，但两者不能认为是一回事，因为祭文与上给朝廷的
表和皇帝批答是无关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公私相混的
情况呢？
我们知道，朝臣上给皇帝的表状或为朝廷所作诏敕国书等用
后只可能作为朝廷的档案封存，除非个人手中还有草稿。皇帝的
答书或手诏个人可以保存，唐史料即记有朝臣临终为避祸焚毁皇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56

帝手诏及个人上章稿本事。所以表状的传播于社会一种原因是自宫中或朝廷流传和流散。但是如果从宫中或朝廷传播，怎么恰恰还有家祭文和国祭文混在一起，大臣表状、皇帝批答和私人文样共为一事的情况？由此答案只能有一个，就是这些东西与敦煌的一些文抄不同，它们是作者个人拿出来的，换言之，是像令狐楚《白云孺子表状集》、李商隐《樊南四六》那样由作者积累的个人文集。根据李崧从掌书记到翰林学士到宰相枢密使的经历、李崧本人的文才和当时社会对于表状文集类作品的追求，我推断S.4473写卷的内容，是李崧文集的部分。它的制作，是与社会同类作品的繁荣同步的。

李文崧集的发现对于传世典籍无疑是极大的弥补，其补史证史的意义许福谦文已论甚详，毋庸赘叙。而它作为表状大家的作品与刘邺《甘棠集》等也有同等作用。当然这里我们并不是一定要指认它为书仪，但是书仪的制作实际和表状集很难截然分开，李崧文集在敦煌的出现也是由于时人看中其文章的实用和优美而作为文样对待。我们这里来讨论它，不过是用来补充对传世文集的探讨，并以之作对比来说明敦煌表状类文集的不同类型和产生来源罢了。

(四)附：关于P.4997书仪的一些问题

敦煌P.4997写卷的正面，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一书的《伯希和劫经录》中题“名残状牒”，注明“二十行，内有孔太保回书全。”这件卷子的背面是一件为买羊皮的残状。正面字迹不甚清楚，残存者实为二十行，每行多者约二十字。根据内容，笔者判断它是一件表状笺启书仪。现谨具录文如下:
1. 挥之状，□（□ 邀鸾 ?）
2. 是峰云垂露之踪，事既出于遭逢，实深怀于荣激，其于□
3. 酬润，诸他并俟后挥（忙 ?）专俾 诚。盖 缘 此 游（ ?）
4. 修状陈谢。伏惟 照察。
5. 枢密安太保 孔太保回书
6. 右厶谬以荒虚，叨尘屏翰，每贡寒暄之礼，合修勤敬之仪。伏蒙 太保（府 俯）视 隆恩，曲形异顾；降荣缄 而宠（约 ?）（德 厚，（合 ?）（零 ?））以珍隆。（涕 ?）而深觉
7. 泱怀（咸 感）激。伏况 太保荣居 密位。（勿 匆=崇？）重枢机，为大国之准绳，作边藩之龟镜。岂伊（爵 ?）未敢恭（虽 ?）□ 慎，（敬 ?)
8. 载于 思辉，实未遑于安处。下情无任荣贺激切之至。谨奉
9. 起 居陈 谢，伏 惟[照 察 ]。堂 后王 别（贺 驾）以 下回 书
10. 伏以别驾德皇冠时，功（霄 庸 ?）济代，天资藻神（丰 ?）授 , 全（同14. 谋（谒 ?）□）于 紫（墀 ?），播方猷于 丹禁。伏计不逾昏晨，□思祷颂之怀，文翰匪（画 ?）伏惟。又厶忝处翰垣，增□绩效，忽蒙 圣奖，擢以官资，谅由保（鉴 荐）
细观以上文字，可以知道所残存者是三件，第一件首残，似为一谢状或谢启。后两件一为给枢密安太保、孔太保的回书，一为给“堂后王别驾以下”的回书即回信。给枢密安太保、孔太保的回书中感谢安太保、孔太保“府视隆恩，曲形异顾”，给自己写来了“荣缄”，文辞诚惶诚恐，充满了崇敬之情。给堂后王别驾以下的回书中，也是感谢对方在自己提官职时给予关照甚至保(鉴荐)”。以下者说明这件回书不是给一个人，而是可以照方办理的给予和王别驾官职相当或稍低的其他官员。在这件回书中写书人自称“忝处翰垣”，说明这个人有可能是翰林学士一类的官职。而三件书信表明，它们的内容都是晚唐五代中所常见的谢状谢启，是官场上于官职升迁之际的酬应书状。

书状中引起人注意的问题有三个，一是枢密安太保、孔太保确有其人，这涉及到书状本身的写作时间。五代姓安、孔的大僚非一，但必须是同时为枢密使并官太保者。按照这一条件去寻觅，只有后唐明宗时期的安重晦和孔循符合条件。《旧五代史》卷三五《明宗纪一》：(同光四年四月)壬辰，文武百僚三拜笺请行监国之仪，以安宗社，答旨从之。既而有司上监国仪注…(…乙未)，以中门使安重晦为枢密使…(庚子)，以权知汴州军州事孔循为枢密副使…壬寅，以枢密副使孔循为枢密使。
《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纪》：

(天成元年四月)乙未，中门使安重晦为枢密使……壬寅，左骁卫大将军孔循为枢密使。

按同光四年(年926)就是天成元年，新旧二史关于孔循官职虽记载不一，但二人几乎同时在明宗即位初任枢密使的时间是完全一致的。

但安、孔二人又是何时加官太保呢？《旧五代史》卷三六《明宗纪二》天成元年六月条“戊戌，枢密使安重晦加检校太保，行兵部尚书事如故……庚子)汴州屯驻控鹤指挥使张谏等谋叛伏诛，以枢密使孔循权知汴州军州事。甲辰，枢密使孔循加检校太保、守秘书监，依前充使”的记载，说明二人加检校太保的时间也基本同时。

不过，据同书卷三八《明宗纪四》天成二年正月己卯，枢密使、光禄大夫、检校太保、行兵部尚书安重晦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傅、兼侍中，枢密使、检校太保、守秘书监孔循加检校太傅、同平章事”，是二人已于同光二年四月一起被升为检校太傅；并且孔循因与安重晦不睦，又于天成三年二月乙未，枢密使兼东都留守任上被出为……所以本件书状小范围应当是后唐许州节度使明宗天成元年六月至天成二年四月，至迟也不会超过天成三年二月；整件文书书状的时间应当也是在此前后。

二是第三件书状的王别驾官职中“有堂后”之称。堂后即堂后官，是宰相办事机构政事堂的属吏。《旧五代史》卷八一《晋少帝纪一》天福六年秋七月戊子，“诏改西京明堂殿为宣德殿，中书政事堂为政事厅，堂后官房头为录事，余为主事。”但堂后官的名称实则唐……
已有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十一（年723）“记是岁，张说奏改政事堂曰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分掌庶政”，五房即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和刑礼房。房的设置加强了宰相机构的办事能力，但其中的办事人员仍由门下、中书两省的胥吏承担。《旧唐书》卷九九《张九龄传》记：“开元）十三年，车驾东巡，行封禅之礼。（张）说自定侍从升中之官，多引两省录事主书及己之所亲摄官而上，遂加特进阶，超授五品。”这里的两省有时也有尚书省。录事主书就是为宰相办具体事务的堂后官吏。《唐代墓志汇编》大历○○四《大唐中书省主事乐安孙府君进）墓志铭并序》称孙“进属燕然动际□□归□□迁□中书，掌事堂要，遂授京兆府录事□□除授尚书职方主事，仍直中书。才通时达，兼济之道久闻；翰博词宏，双美之名远见。遂特拜中书主事，以当职矣”，可为一证。不过逐渐地中书主书成为其中的负责人。《旧唐书》卷一○六《杨国忠传》“有旧例，宰相午后六刻始出归第，林甫奏太平无事，以巳时还第，机务填委，皆决于私家。主书吴珣持籍就左相陈希烈之第，希烈引籍署名，都无可否。国忠代之，亦如前政”的记载，德宗宰相杨炎更“有主书，吾局吏也，有过吾自治之，奈何而相侵？”的说法。《通鉴》二三七宪宗元和元（年806）八月“条堂后主书滑涣久在中书”下胡三省注谓：‘堂后主书，即今之堂后官也。”可见唐代“久在中书”的主书就是堂后官房头也即宰相办事机构的首领。这和后晋以录事为房头不同。中书门下主书、主事者官职不高。《唐六典》卷九记中书主书四人，从七品上，主事四人，从八品下；前代以来用人甚轻，唐朝以《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424页。
“流外入流，累转为之”，所以《旧唐书》卷八一《刘祥道传》载其上书曰：“有尚书省二十四司及门下中书都事、主书、主事等，比来选补，皆取旧任流外有刀笔之人。纵欲参用士流，皆以俦类为耻，前后相承，遂成故事”。但宰相机构的重要性无疑加重了堂后官即中书主书的权力。代宗宰相元载信任主书卓英倩，李辅国死，载复结内侍董秀，多与之金帛，委主书卓英倩潜通密旨。《旧唐书》卷一一九《崔祐甫传》称代宗初即位，尚委任宰相，但“以元载秉政，公道隘塞，官由贿成。中书主书卓英倩、李待荣辈用事，势倾朝列，天下官爵，大者出元载，小者自倩、荣。四方赍货贿求官者，道路相属，靡不称遂而去，于是纲纪大坏”。所以元载死后，中使董秀、主书卓英倩、李待荣等也连“带处以极法”。而德宗时久司中书簿籍”的主书滑涣，更“是与内官典枢密刘光琦情通。宰相议事，与光琦异同者，令涣达意，未尝不遂所欲。宰相杜佑、郑皆姑息之，议者云佑私呼为滑八，四方书币赀货，充集其门，弟泳官至刺史”，甚至宰相郑余庆得罪了他都被罢免。由此可知堂后官的作用之大，从而也就不难理解后唐官（吏）甚至使身居翰垣的高官为什么在升职后要感谢堂后官的道理。这个堂后官是“否房头”尚且不知，不过，其官衔竟是属于地方官系列的州府别驾，明显带着自藩镇而来的色彩，是与唐代不同之处。

三是本卷文书的性质来源问题。根据文书中书状作为官场酬应书状的内容、题名及其排列方式，笔者认为它很像《灵武节度使书状集》或《新集杂别纸》，是一件实用书状的集。“

---

①《元载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410页。
②《郑余庆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164页。
成，属于表状书仪文集制作的第一种方式。但这件书仪文集中书状年代比前两件略早，致书人又是“曾处翰垣”的官员，与前两件书仪的作者或受书人身份不符。因此与前揭书仪似不属一卷，从而也并不排除它来自中原的可能。
第六章    曹氏归义军通使中原
与五代王朝的河西经营

敦煌作为晚唐五代归义军的领属地，其社会民生与归义军的统治有直接关系，敦煌文书中出现了一大批与归义军时期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有关的资料，为归义军的研究提供了史料基础，因此该领域的研究不断取得丰硕成果。笔者以往对此方面课题关注不多，本章只是从书仪涉及的归义军与灵武节度使及中原政权的关系角度略作探讨，并对几件具体文书反映的史实提出不同看法，以求正于方家。

一 、从P.2945书仪论曹氏归义军归奉中原王朝问题

归义军政权在张氏和曹氏统治时期，始终谋求获得中原王朝的承认和支持。书仪中有“贺天使平善过路（“P.3101”）、天使至贺本使加官”、“参天使语”、“谢天使土毛”、“屈天使赴宅（“以上P.2652v）等大量书札和口头用语，都是相关官员迎接、参见、谢贺、宴请天朝即唐朝和五代中原王朝来使的种种仪目。不过在归义军的周边地区，有甘州回鹘、西州回鹘、凉州嗢末和于阗王李圣天的少数族政权，归义军与中原王朝的交往有时因这些少数族干扰而中
断。其中甘州回鹘在唐末逐渐强大，于张承奉建立金山国时期不断西侵敦煌，但在曹议金任归义军节度使后，却通过联姻和亲征与之建立了友好往来，并在其后遣使朝见中原王朝成功，恢复了与五代政权的联系。书仪于此保存了大量史料，但是由于学者对于一些书仪本身年代、主属看法不一，由此影响到对曹氏归义军与中原王朝往来事实的认识。这里仅从辨析P.2945事实入手，探讨曹氏归义军的遣使中原和灵武节度使的作用问题。

（一）对P.2945年代与主属的不同看法
P.2945写卷前残，无首题尾题。内有8件书状。其中第三至七件题“为别纸”，第八件题“曰凉州书”。此卷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著录为《归义军公文集》，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文献真迹释录》第五辑定为《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某某书状（稿八件）》并附录文。对于这件写卷，李正宇最先撰文作了研究。他根据其中的一件别纸提“到伏以边荒古戍，原本以朔北通烟，十五季来路（鲠梗），艰危（□阻）绝”，通算瓜沙地区与朔北和中原的阻绝时间，以唐光化三（年900）到后唐同光二（年924）为最长，首尾跨及25年，其他则间隔都不超过9年，因此认为书仪所说“十五季”应当在此之中。他并考证认为，朱全忠天祐元（年904）胁迫昭宗离开长安，同年昭宗在洛阳改元，敦煌并不知晓。敦煌最早的天祐年号是天祐二年，是进奏院官员回撤带回来的消息。因“此从天祐元年归义军住京人员撤回并带回京城被毁、昭宗移洛及改元天祐的”①
消息起，归义军就断绝了同中央王朝的联系，而从天祐元年下数15年则是后梁贞明四年（年918）。因贞明四年正与S.33054《观音经》题“记时贞明三年，岁次戊寅（按戊寅是贞明四年，李文已说明三年为四年之误）”相合，可以说明敦煌与后梁恢复关系约在贞明四年前后。他因此推测书状中署名“的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是曹氏归义军最初的掌权者曹仁贵即曹议金。

但赵和平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在第四件别纸中“瞻礼望日，专恃指，庶（基 几）孤（孽 笔者按：原卷似作“孤军”），全有寄托”“的孤孽”是发件人自称，其人应当是丧父不久接掌归义军的曹元德。由于曹元德去世在天福四年（年939），所以写卷的时间大致是在曹议金死去的清泰二年（935）二月以后到天福初年。包括别纸在内”，七通致某相公‘相公’书状的受件人，很可能是朔方节度使张希崇，写卷的名称也由此定为《权知归义军兵马留后使曹元德致张希崇状稿》。

赵和平所说的“孤孽”一词，仔细辨认其实“是“孤军”。这一点不足以推翻李说，且从年代上看，李正宇的推断也似较合理，但细考之下，文书本身确也存在一些不易解释的问题。其一为第三件又别纸中，吹捧朔方节度使的词句“有发身（□于？）闾望之间，高步于搢绅之内；出同威凤，势极搏雕；分（□圣？）主之忧勤，龙旌秉节；副苍生之祷祝，鸡树重栖”。“发身于闾望之间”，是指出身民间；“鸡树”的典故出自《三国志》卷一四《魏书·刘放传》裴注引《世语》曰：“放、资久典机任，献、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鸡栖树，二人相谓：

文

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关于《权知归义军兵马留后使曹元德致张希崇状稿（P.2945）》题解，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347—350页。
后此亦久矣，其能复几？人遂以鸡树指代中书省，唐人也指人中书门下任宰相。如《记室备要·贺门下令狐相公状》：“鸡树凤池，首冠台臣之位。”但唐末五代节度使带三公和平章事衔皆可敬称相公，所以这里的鸡树并非指入朝为相，结合龙秉旌节一句，所谓“鸡树重栖”指的应当是任节度使，而“且重栖”似有经过挫折再居高位之意。试想文书的表状如果是曹议金贞明中所作，则面对的朔方节度使是韩洙，韩洙父是后梁封为朔方节度使兼中书令、颖川王的韩逊，韩洙继承其父，一帆风顺，既“非发身于闾望之间”，亦无“重栖”鸡树的问题。此外，别纸中还“有况天（遐假）英□，权谋涌（浚□）。横戈而朔漠云收，卷旗而邯郸易帜。继决囊之妙算，殄秦陇之妖星，使国家再[宗庙获□]之安，大河而蕃戎自慴”等赞语，似乎是说不但在朔漠建立功业，而且有过从敌营反戈易帜之举，这与史料记载的韩洙事迹也很难具体联系。

其二是文书第七件“有云霄有隔蓬宫，昆兄季弟等伦，望企相公神旨”，这里“昆兄季弟”相提并论，似不应发生于曹议金时代。据前人考证，曹议金与曹仁贵是同一人，而他仅有兄曹仁裕（良才），但地位差得远。虽然P.4638的《曹良才邈真赞》说“他官禄居宰辅之荣，品秩列三公之贵”，前任衙内师长，位绾管内军戎，但他实际上至死不过“是衙内都押衙玉门军使”、应管内外诸司都指挥使知都押衙，这样的官衔地位不能和节度使等伦，在注重官位胜于亲情的唐五代官僚社会，也不够资格并提到“给相公”的信上去。而由此，我以“为昆兄季弟”的提法更有可能是出现在曹元德或曹元深时期。因为曹元德或曹元深任节度使兼沙州刺史时，其兄弟的地位都很高。据《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于阗传》所载高居诲《使于阗记》，提到大约天福四年到达沙州“时其刺史曹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67

元深等郊迎,问使者天子起居”,说明当时曹元深已以刺史身份代
替病重的曹元德接待来使。而据《新五代史》卷九《晋出帝纪》记天
福七年十二月丙子”,于阗使都督刘再昇来,沙州曹元深、瓜州曹元
忠皆遣使附再昇以来。"是曹元深任节度兼沙州刺史时,元忠为瓜
州刺史,二人可同遣使入贡,也说明地位接近。所以只有这两个时
期 昆兄季弟等伦"的说法才显得合理。

笔者认为,曹元德时期虽也有可能派使,但是,据《旧五代史》
卷七九《晋高祖纪”》天福五年二月丁酉朔,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议
金卒,赠太师,以其子曹元德袭其位”的一条史料,可以断定在天福
五(年 940)之前,曹议金去世的消息中原王朝始终不知道。而既然
不知道,也就无从在天福初年曹元德任使期间将朝旨宣达沙州了。
所以我认为这件文书中的表状与曹元德无关。

但是曹元深就不同了。上面说到他和曹元忠兄弟二人于天福
七年共同遣使入贡 《, 旧五代史》卷八一《晋少帝纪一》并记曰:
(天福八年春正月)庚寅,沙州留后曹元深加检校太傅,充
沙州归义军节度使。

这就是他遣使入贡的结果。此外前人已指出P.4065《表状集》中
的一件表文是曹元深所作:

臣某言:旌节官告。国信使副某至,奉宣圣旨,赐臣手诏
一封,赠臣亡父官告一道,告弟一通,焚黄一道:故兄赠太保官
告一通,告弟一道,焚黄一道者。

这件表文说明在曹元深授职后,后晋朝廷又"遣 国信使副"到敦煌
为之颁发旌节官告和父兄赠官等。

而如果P.2945文书确与曹元深天福七年通使事有关,则据史
冯晖传》称：
始为效节军士，权勇骑射，行伍惮之。
行伍出身的人，自然可称“出身于闾望之间”，而传称他一生又有几次叛变复倒戈的情况，都得到后唐或后晋皇帝的原谅。最后一次是在天福初，他在澶州刺史任上追随范延光叛变于邺，为马步都将“。寻为官军所败，晖退归邺，为延光城守。明年秋，晖因出战而降，授华州节度使、检校太傅。邺平，移镇灵武。“邺都即今河南安阳北，秦时邯郸郡地。冯晖“的反正”，使朝廷收复邺都，城池易主。旧传并谓他任命灵武是由“于(张)希崇卒，未有主帅，蕃部寇钞，无复畏惮，朝廷以晖强暴之名，闻于遐徼，故以命之”。“而冯晖后来镇抚蕃戎的办法也并不是仅仅如旧传所说是对之“厚加待遇”，或如《新五代史》卷一二五本传所说“是推以恩信”。”

《隆平集·藥元福传》“记西戎三族攻灵州，命元福佐朔方节度使冯晖讨之”，冯晖在藥元福谋划下，对敌骑数万“斩馘殆尽”的残暴事实。据此，文书别纸“横戈而朔漠云收，卷旗而邯郸易帜。继决囊之妙算，殄秦陇之妖星，使国家再[获?]
宗庙之安，大河而蕃戎自慴”。

笔者对曹议金是否通使后梁并无执见，只是认为本件文书与曹议金无关，也不能作为他通使后梁的证据。不过，如果说文书是表现曹元深天福七年通使的具体过程，我们还应结合文书情况再

参见《旧五代史》卷七八《晋高祖纪四》天福四年正月条，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025页；并参朱玉龙《五代十国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97年，第213页。
(二)书仪性质、内容的再认识

李正宇在提出文书反映曹仁(贵)贞明二年和贞明四年两次通梁的同时还提出一个观点，即文书证明曹仁(贵)确曾通使后梁成功，而使者的来访就是通梁成功的结果：曹仁贵没有因贞明二年首次通梁失败而打消通梁之志，大约贞明三年或四年春夏再次通梁，结果成功。贞明四年(秋)所款‘七月’所款，朝廷也派使臣来抚沙州。从初通失败，到二通成功，到接待来使，虽然首尾跨连三年，却不过是一桩大事的全过程而已。

荣新江也支持并重申了这一观点：贞明四年，曹议金再次遣使入朝，在凉州仆射和朔方相公的协助下，终于到达梁廷，梁朝遣使，西至敦煌，可能(师)泽(露)西天，诏宣荒裔，很可能授给了议金节度使衔。

笔者在上面已否定了文书内容与曹议金遣使的关系，而认为其主属人是曹元深。那么，可不可以将使者的来访转而认为是授曹元深节度使衔并且是曹元深前后三年通使成功的结果呢？笔者以为，要弄清这一点，首先应了解P.2945中各件书状的性质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关于书状的性质，笔者赞成李正宇关于其中第一、二件是问候起居状的看法，特别是第一件末尾‘七月九日权知归义阁下军节度兵马留后谨空使状上相公’，符合书仪规定的卑对尊的结书尾语规格，与下一状应分开。但这两状也有问题，第一件开

①李正宇《曹仁贵归奉后梁的一组新资料》，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第十一期，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74—281页。
②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七章第二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38页。
头语大概遗失，所以只剩‘了’时‘候，伏惟相公尊体万福。即日乙蒙恩，限守遐方，□□□谒，谨奉状不宣，谨状’的寒暄套话。

第二件接在第一件之后，不存在纸损遗失情况，但是却只‘有’不审近日‘尊体何似，伏愿精嘉药膳，以安社稷生灵。伏惟恩察，谨状’几句没头没脑的话，署名也只‘是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乙状上’而没有日期，与下面‘又贺别纸’、又别纸（不包括《凉州书》），基本一致。这是怎么回事呢？参照前章对书仪书体规格的分析，笔者认为，第二件不是另外一状，也不是抄者故意简化，而是第一状的补充，换言之是第一状‘的别纸’，但在第一、第二件之间漏‘了别纸’这一题目说明，所以性质关系不明。惟其如此，才可以解释为什么以下的别纸都‘加又’字，而只有这张别纸与第一状结合，并加上其他五‘件又（贺 谢）别纸’、又别纸（不包括《凉州书》），才组成一件完整的书状。

别纸的形式、用法可见本书另章。它的用法是附在公式寒暄套话的第一纸之后，用来述说正事、私事。由于唐末宰相卢光启发‘明每一事别为一纸’的重叠别纸，就打破了原来正（状第一纸）外只别加一（纸第二纸）或一状的规格，而有了一信多纸的形式。P.2945前七件状就是这一典型的重叠别纸形式。观此七件中的六件别纸虽然‘于圣造泽（漏 露）天西，诏（□ 宣）遐外’一事多有重复，有时显得罗嗦，但每一纸的确仅有一个主题，而且紧紧围绕着通使这件大事，每纸之间也有密切关联。除了第二纸是配合正（状第一纸）对收件‘人相公’健康再表关怀，以示礼貌虔敬之外，第三纸如李正宇所说是对接到诏旨‘和相公’‘非次顾录’的好意表达感激惶惧之情，说明已专遣‘节度押衙张进诚’附状前往陈谢。第四纸是赞颂吹‘捧相公’的功德，请‘求相公’对‘于今（者 朝廷）使’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臣回辙“和归义”军 兼差贺恩使人”及 般次“给予协助”,鸿恩垂造”,使”之 住回无患””、不滞行程”,表达了期望与谢意。第五纸是15年隔绝之

强调 相公”于 后,能够从中斡旋,打通关系,使得阳关道路通畅并转达朝廷宣诏敦煌的恩德。内中“ 窃聆使臣经过贵府,

深沐恩私……仰羡不及,空劳梦魂”语,应当不是李正宇所“说 委婉心情地表达了瓜沙首脑希望尽快见朝使的”,而是申述听到朝使在

对方那里获得接待盛况的欣羡和仰慕,为自己不能前往与对方欢聚感到怅惘。第六纸是解"释 相公”派遣来"的 专人"久久未归"、累

月淹留"敦煌的原因

盖缘使臣未行,所以稽迟回辙(使臣在

敦煌呆了不短时间);并对招待不周表示歉意。第七纸重申捧读" 相公"允诺与沙州 义同胶漆,负(示 誓?) 千载"的 琼缄"之喜悦心

情,希望友好关系能如嵩山沧海一般坚固持久,并期待着通使的最

后成功。因此从第一纸到第七纸是一气呵成的。内中涉及" 相公"来书,使臣来访,使”臣 回辙”即返还,沙州准备同时派遣(贺 谢)恩

使人以及前往送信的节度押衙等事件的全过程,尽管层次多,总说却都是一回事。因为当时交通不便,一次的行动就要组织一个

使团进行,书状也只能派专人随使团送出而不能随时送走,内容繁复、叙事时间跨度长"的 重叠别纸"就是这样产生的。当然,随着这

件大书状一起带走的还有写在最后的《 凉州书》,也是为了这次通

使成功而拜托凉州仆射的。

P.2945既然是由前后七纸所合成的一件书状( 第八纸凉州书

另外),那么就应该注意到前揭别纸中所"说 嶇乙忝权留后,未奉奏

闻天颜,岂(忆 意)圣造泽漏天西,诏宣遐外”的事实。结合《 凉州

书》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是由于前次通使不成功,所"以 嶇乙忝权

留后”事,还没有奏报中原王朝得知。根据后晋朝廷天福五年尚
了解曹元深代表曹元德的情况，笔者认为曹元深可能在年前后曾派使是可能的。通使虽无结果，但中原王朝可能从别的途径或"因相公"的帮助最终得知这一消息，故而先通过朔方节度使透露朝意，表达关怀，所"谓泽(。不过，漏露)天西，诏宣遐外"。不过，如说这次遣使就是天福七年的遣使则尚有一点问题。前揭《新五代史》卷九《晋出帝纪》记天福七年十二月丙子条，沙州曹元深、瓜州曹元忠附于阗使都督刘再昇来朝贡的。而据《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第三》和研究者考证，刘再昇事实上是与后晋王朝派往于阗的使节张匡邺一起回来的。张匡邺一行天福三年
十二月即自灵州前往册命于阗王李圣天，天福四年路经敦煌，至天福七年年初才返还敦煌，停留了不短时间。此事似乎与文书无关，但是文书的时间是在七月，颇疑文书第五件“右别纸”中所说“□□（□ 裴押衙？）留，盖缘使臣未行，所以稽迟回辙”。稽迟回辙的使臣就指张匡邺一行。而朔方节度使也恰好同时派人转达中原王朝的意旨和使道路通畅的保证，此即第四件右别纸所“说 遣边吏于雄藩，贵达方音，申阳关之宁谧。恃赖相公恩照，兼蒙泽（漏 露）天西，诏宣荒裔”。也即两件事是同时进行的，不能认为“稽迟回辙”使臣就一定是灵州来的，此所以沙州留后要向朔方相公解释派来的人为“何累月淹留”的缘故。两事恐不能混为一谈。而从书状的情况来看，虽然不能证明这次通使是否成功，但是沙州方面既与朔方、凉州打通关系，又组织庞大使团与使臣同行，那么组织工作应当说是相当充分。另从时间来看，七月出发，如若至年底到达京城也是合理的，这也是笔者之所以认为文书所说遣使就是天福七年曹元深遣使的原因。而由于后来这次举动成功，才最终于次年迎来了P.4065所说的国信使和旌节官告。（三）灵武节度使在曹氏归义军通使中的作用

以上只是笔者分析文书年代、主属所作的一种推测，究竟是否即曹元深天福七年遣使事尚不能完全作定论。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沙州若要与中原朝廷取得联系，必须有灵武节度使作沟通。①

① 钱伯泉《于阗国使刘再昇的国籍及出使过程探微》，《敦煌研究》1998年第1期，第96—97页。
灵武节度使的这一作用当然并不自后晋时始，《册府元龟》卷一七○《帝王部·来远门》关于同光二（年）924）曹议金得节度使有“议金间道贡方物，乞授西边都护，故有是命”之说。荣新江曾据宋本《册府元龟》卷九八○《外臣部·通好门》广顺二年十月条“记后唐同光中，长史曹议金者，遣使朝贡，灵武韩洙保荐之，乃授沙州刺史，充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处置使”，认为曹议金间道人贡，就是绕道灵州。后唐虽于同光元年，由韩洙保荐而成功到达后唐的建国，但与梁的战争还在最后阶段，唐庄宗御驾亲征，到了这年的冬十月才攻下汴京，十二月才迁都洛阳，同光二年实际是后唐政权初定之际。若非韩洙及时通知，曹议金怎么能够迅速赶来向新朝献礼？可见韩洙对曹议金入朝的功劳不小。《旧五代史》卷三一记同光二年四月己丑，充朔方、河西等军节度使韩洙依前检校太傅、兼侍中，充朔方、河西等军节度使，灵、盐、威、警、雄、凉、甘、肃等州观察使”。在此之前，韩洙只有后梁所授灵武节度使“和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傅、同平章事”的官衔。据史料记载同光二年四月正是曹议金的进贡使团已经到了洛京并献上礼物的时间，后唐政府对韩洙地方政权的承认及给他的加官显然是对他引来归义军入贡的褒奖。

当然曹议金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也可能如论者考证，自梁时已开始，但这同样离不开灵武方面的帮助。敦煌P.4638文书内有两状，一状是“给令公”的起居状，内“有谨因朝贡使往，奉状不宣”的词句；另一件是献物状，“有将陈献，用表轻怀，干渎鸿私，伏乞检纳”等语，也是给令公的。两状末“署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①

①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十章第二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12页。
守沙州长史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曹仁贵

据李正宇考证，文书大致作于贞明二年（916），而荣新江也证实曹议金自称尚书官衔不超过贞明六年（920），则曹议金于梁代已遣使入贡，令公应当就是朝贡使必经路上的灵武节度使韩洙。因此在归义军与中原交通的路上，五代灵武兼河西节度使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现已知在敦煌表状笺启书仪中，出自灵武的至少有三件，除P.2945外，还有P.393《灵武节度使表状集》、P.2539v《灵武节度使书状集》，后两件年代都在后唐。这些表状书集流散或传播到敦煌本身就说明两地区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其他书仪或书信集中也有不少涉及两者关系。例如P.3151《沙州书状稿》的一件书状中曾说到因灵武节度使远差人使，特持礼币，迄届遐（方）沙州”，故沙州也专差使人去还礼”，至于中路，逢回鹘大段般次，以兹人使却回，信物之属半遭蕃部偷劫”的情况，说明两方曾不顾回鹘的阻截密切往来。而归义军与中原朝廷的关系实也依靠灵州节度使牵连。

又如前揭P.2992v写卷中第三件，论者已确定为《长兴二年（928）二月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致甘州顺化可汗书》。内中曹氏与可汗”以兄大王”、“弟天子”相称，并提到长兴元年曹议金亲访甘州，与可汗商议两国间所有社稷久远之事”，而后双方各遣使入贡；及后唐天使与沙州使臣返还途中经甘州蒙招待，最终平安回到沙州的情况。信称”昨六月十二日，使臣（以与）当道[使]平善到曹氏①见李正宇：《曹仁贵名实论——归义军创始及附梁始探》《第二届敦煌学569页；并见荣新江《归义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1年，第551-军史研究》第二章《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的卒立世系与称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95
府，兼赍持衣赐（分信）物，并加兄大王官号者，皆是弟顺化可汗天子惠施周备。圣泽曲临，（以与）弟天子同增欢庆。《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回鹘传》和《新五代史》卷六《明宗纪》所载回鹘与曹议金均在长兴元年十二月派来使者的情况完全一致，而曹议金也在此次加官中书令。但这件事成功恐怕同样离不开灵武节度使居间操作。同卷第二件书状便记载了另一次归义军与回鹘共同入贡过程中灵武节度使的帮助，其内容如下：

道途阻僻，信使多乖……所示入守众贡人使，俱委来情。况接疆场，莫不专切。今则前邠州康太傅及庆州符太保承奉圣旨，部领大军援送贡奉使人及有天使。去八月廿一日得军前太傅书牒，云与都监牛司空已于八月十六日到方渠镇，与都监商量定取丹谦。近者九月五日发离方渠，于六日平明至土桥子应接者。当道至八月廿二日专差军将袁知敏，却赍书牒，往方渠镇咨报军前，太傅已依此时日应副讫，见已点龊兵士，取九月三日发赴土桥子接迎。于九日到府次。伏况般次行止已及方渠，兼得军前文书，合具子细披启。今差都头白行丰与居密以下同行，持状咨闻，便请可汗斟酌差兵迎取。冀因人使备情谊，但缘走马经行，不果分外施礼，虽有微信，别状批申。幸望眷私，尽垂照察。谨状。

朔方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兼御史大夫张

这个信末署名“的朔方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兼御史大夫张”就是张希崇。信中提到的康太傅就是康福《。旧五代史》卷四五《闵帝纪》清泰元（年934）正月甲午条“记前彰义军节度使康福加检校太
不过同书卷四六《末帝纪》记同年五月戊申，他已被杨思权取代。《资治通鉴》卷二七九清泰元年六月“有回鹘入贡者多为河西杂虏所掠，召将军牛知柔帅禁兵卫送，与邠州兵共讨之”一条。这在宋本《册府元龟》卷九八七便记成“诏邠州节度使康福遣将军牛知柔援送至灵武。”不过，书状既称他“为前邠州康太傅”，则当然是在他卸任之后的事。牛知柔显然就是书状中所说的“都监牛司空”。据《册府元龟》卷九六五《外臣部·封策三》记：“末帝清泰元年七月癸丑，简较（检校）刑部尚书瓜州刺史慕容归盈，转简较（检校）尚书左仆射。时瓜、沙附回鹘来朝贡，（令今）使归，固有斯命。所说正与书状为一事。书状表明了灵州节度使发兵接应朝廷援送大军，及与回鹘可汗中间联络、通报计划，以期相互配合的情况。不过，根据书状书写的时间是九月，所说方渠镇据《元和郡县志》在庆州，即灵州的东南，据状中所“说伏况般次行止已及方渠”，和计画中九月九日“到府次”，便请可汗斟酌差兵迎取“的情况，书状所说“援送”已经是回程了。可见从甘州到灵州的一段使团来往都须派兵保护，朝廷不出兵时，责任就在甘州与灵州双方了。灵武节度使帮助沙州入贡使团及给回鹘可汗的书信表明，灵武方面也是沟通中原朝廷与甘州回鹘关系的中间环节。P.3931《灵武节度使表状集》中有同光中甘州回鹘上后唐庄宗的表本两通，一通述及回鹘与唐世代友好和交往的历史，表达了依赖后唐朝
“廷便同唐朝天子,用结千秋之愿,将连万代之荣”的心情,时在同光二年之前;另一件不但说到当时已“经专差小将,远贡芹心”,蒙皇帝接见”,频令朝对,累赴设筵,兼赐优赏”的情况,而且赞颂了后唐郭崇韬灭前蜀王衍的胜利,时当在同光三年以后。两件表本在朔方节度使的文件中出现,本身就说明两者的关系,它们很可能是由朔方节度使的判官或书记代拟。另外此书仪中还有朔方节度使给回鹘可汗的《谢马书》和《别纸》数件,其中不但赞颂回“鹘从来向阙,最长诸蕃;诚青海之舟航,乃玉关之锁钥”和“每慕华风,常修职贡,竭丹诚而内附,作皇唐之外臣”;说明后唐欲依赖甘州回鹘,“俾安玉塞,北和冒顿,西接大宛,书有归心,咸来稽颡”的用意;而且感谢回鹘对“自己逾沙漠而专枉荣缄,随贡奉而别颁厚礼”,要求与回鹘保持通好,所谓“同风叶义,道路虽遥于千里,恩知岂异于一家”,自今后,或凡是经过,请祛仇隙。由此可知,后唐政权与回鹘联系的中间人和具体操作者也是灵武节度使。如无灵武一河西节度使的支持,归义军与回鹘、于阗的朝贡不可能实现,这种情况在后晋朝和曹元深任使时当然也是同样。前揭P.2945的书状给灵武节度使的书状一再说明“圣造泽(漏)天西,诏宣遐外”是“相公恩威,非次顾录”,“是”恃赖相公恩照”,就是说当时归义军和朝廷建立关系,不但要取得回鹘同意,也是必须经灵武节度使先予铺垫。因此灵武一河西是中原王朝通向西部地区的桥头堡,在中原王朝与敦煌及河西各种民族、政治势力的接洽中,来自灵武节度使方面的斡旋作用是最值得注意的。

① 赵和平《后唐时代甘州回鹘表本及相关汉文文献的初步研究》,载《唐五代书仪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31—252页。
最后，与P.2945书状有关，连带要回答的是，既然上述后唐后晋时期归义军与诸少数族的关系始终很复杂，而朝贡路上也始终需要灵武节度使帮助甚至武“力照拂”，则书状中所“说伏以边荒古戍，元以朔北通烟，十五（季）年来路梗，艰危阻绝” 的情况，也不一定是专指在后梁了。

二、P.2539v书状主人公再辨证

灵武节度使沟通河西与中原朝廷关系的作用是由其地理位置决定的。唐末以后，灵武节度使由韩逊家族世袭，据《旧五代史》卷一三二《世袭列传》，韩逊本灵州之列校也。会唐季之乱，因据有其地，朝廷乃授以节钺。后梁时累官至中书令，封颖川郡王。乾化四（年914）死，其子韩洙继之。虽为半独立政权，但与后梁、后唐及岐王李茂贞都采取通好政策。所以韩洙本人已兼有灵武、河西两使及灵、盐、威、警、雄、凉、甘等州观察使名，说明中原王朝是通过韩氏政权对河西实行羁縻统治的。这恐怕不仅是出于军事实力的考虑，也是怀来少数民族和归义军政权的需要。不过一旦中原王朝有了实力和机会，一定要将这一地区完全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下。这一点，正可由P.2539v书状证明。

敦煌P.2539v写本是一件书状集，共收书（信状）26通，除首通

①本节内容曾以《关于敦煌P.2539v书状主人公的再辨证》为名，发表于《民族史研究》第二（辑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109—124页）。但发表时由于种种原因，存在一些错误。此次重新作了校订，并有一些修改增删。
失题外，余皆有具体的收书人。多为五代之际中央、地方的高级官僚，“如 沙州令公”，“前袁州司徒”、“诸道及朝要”、“西京太傅”等。有一些甚至标有姓氏或名，“如 青州王相公”、“引进副使薛尚书客省副使杨仆射彦均”等，说明是曾经实寄过的书信集成。此件写本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五）》仅定名为《沙州令公书（等二六件）》，并附录文。近年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一书重作录校，并对其中涉及到的一些人物作了考证，认为这件文献的作者是后唐朔方兼河西节度使张希崇，写本的撰成在长兴三至四（932-933）中，故定名为《灵武节度使书状集》—。

对于赵和平有关写本是来自后唐朔方节度使的看法及定名笔者基本同意。对于其中一些收书人“如 枢密状”中的幽州节度使是赵德钧，“而 枢（密 使）”就是其子赵延寿，以及“与 四相”并称“的 河南元帅、太尉令公”是指秦王李从荣的判断，笔者也是赞成的。但是，对于书状作者是不是张希崇，笔者却持保留意见。由于这直接关系到五代朝廷通过朔方军经营河西的历史事实，故有必要对书状的主人公作更细致的探讨。

“1.沙州令公”其人及于阗来朝

本卷书状主人公甚多，其中可提供线索者，首先是标“明 沙州令公书”及“具信”、“又书”的第二、三、四通书状。此三通收书人均为沙州令公。其中第二通颇多寒暄语，内“称 辟自守边藩，每惭拙政，既披云之莫逐，实仰 德以空申。太傅令公每假 隆移，曲垂异顾。继飞等介，叠示华缄。褒称逾海岳之恩，信币比琼瑶之赐。永言感佩，岂易书绅；感谢未期，徒申铭镂之至”语气中的感戴之情及对收书人几处用平阙都反映了致书者对收书人的尊敬及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81

双方的友好关系。信末提到“今差押衙孟元立等，再申和好，复谐贵藩；有少情仪，具载别幅，伏惟俯赐鉴察”，表明了去书的目的。

所说的“有少情仪”与第三“通具信”中“右件物等，诚非珍异，仍愧纤微。况纴织以无功，雕镌而已切等语有关，说明后者即前者所谓表达情谊的赠物别幅。第四“通又书”是叙另事，与前不重复，但主要内容在其中。根据唐末五代书状信笺的书体习惯，也应当是属于第二通之后的别纸，即三通书信本为一件，一为寒暄，二为书赠物，三为叙正事。

叙正事的“又书”虽是别纸，但内容最值得关注。文称：“右伏以太傅令公名标三杰，价重四英；拥万里山河，静氛授。以望信而远匡，而恩威（而“两”而“字衍）遐伏；西戎何犷（捍）而不柔，何烟尘而敢动。伏况圣上德惟怀远，义在吊民。每观贵道之使人，实以诸藩而复异。□际或闻西州天子、于阗大王咸慕（北？）望令公司命，使人曲覃圣化，俾朝宗于洛汭，令贡奉于天庭，岂惟达外国之梯航，实乃见贵藩之功业；光辉史册，千载一时。□忝受眷遐，频聆异政，辄贡管窥之恳，（異 冀）垂允诺之恩。傥不阻于启闻，故愿竭于丹赤。细析此信，前面赞颂太傅令公威重北睡的功德，中间有相关西州天子、于阗王李圣天的一段话。此两者当分指西州回鹘可汗与于阗王。关于西州与于阗，日本学者藤枝晃曾误为一事，但森安孝夫已予纠正。荣新江亦力辩此事①，他指出曹氏归义军时

①藤枝晃《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东方学报》，京都13册2分册，1943年，第71页；森安孝夫《敦煌和西州回鹘王国》，第10—11页。以上并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十一章第四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66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代,归义军与西州间已有使者往还。据他考证,长兴元(年\textsuperscript{931})曹议金已派使护送、嫁女与于阗王,所以书状中所“说 或闻西州天子、于阗大王,咸慕北望令公司命”所表述的正是这一交往的事实,而“一个 咸”字,充分证明了曹氏归义军与二者都具有良好关系。信中关于二者提到要请令“公 使人曲覃圣化,俾朝宗于洛汭,令贡奉于天庭”,覃者延也,结合下文“ 辄贡管窥之恳,(異 冀)垂允诺之恩”,知致书者原是要借“重 太傅令公”的威望,传播中原王朝“的 圣化”,“对 西州天子、于阗大王”施加影响,作为四夷来远“的 梯航”,使之向中原朝廷纳贡称臣,从而建立蕃汉的良好关系,成“就 光辉 史册,千载一时”的功业。

这件事后来果然成为事实《。 五代会要》卷二九《 于阗(》 并参《 册府元龟》卷九六五《 外臣部·封册》《、 旧五代史》卷七七《 后晋高 祖纪》)载":晋天福三年九月,其王李圣天遣使马进荣进白玉、白氎、犛牛尾、红盐、郁金、磠砂、大鹏砂、玉装、鞦辔等物。其年十月,册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命供奉官张匡业为国信使,仍授入朝使马继荣为镇国大将军,扶风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副使、黄门将军、国子少监;张载通试卫尉卿,监使殿头承旨、通事舍人吴顺规试将作少监。"由这一记载可知,于阗与中原朝廷的正式外交关系,是到后晋天福三(年 938)才正式建立的。P.2539v的文字表明当时还只 是策划阶段。所以它的撰成应在天福三年以前,长兴元年曹议金嫁女与于阗建立亲密关系之后。如赵和平所指出,五“代 天庭”在“ 洛汭”的时代只有后唐一朝,考虑到酝酿两国来朝尚须时日的情 况,笔者比较倾向于这件书状是作于唐明宗长兴后(期 932—933前 后)到末帝清泰(末 936)以前。由于书状的内容已表明授书人是作 为中原王朝的代表向曹氏归义军“的 太傅令公”提出请求,表达朝
廷沟通西域的愿望，所以按照时限，这个人确非朔方河西节度使张希崇莫属。问题是作为收书人“的沙州令公”、“太傅令公”究竟是曹氏归义军的哪一位节度使呢？

根据李正宇等学者考证，天福五年以前实际任过曹氏归义军节度使的有三位：曹议金、曹元德、曹元深。其中惟曹元深在天福八年（943）被授予太傅衔，但不仅授衔时间太晚，且事实上他主事就职的天福四年就已经在我们说的时限以外了，当然可以不予考虑。曹元德虽于清泰二年继曹议金任留后，但在其生前不为朝廷所知，死后才被追认节度使和封赠太保。他虽自称司空，却与太傅相差太远，更没有“令公”的资格和名义。何况，他任留后数年，又没有获得朝廷承认，在蕃戎之间并不具备书状所说那样大的影响力，所以他也不会是书状的主人公。

只有曹议金，生前自称太保，死后册赠太师。据前揭《旧五代史·后唐明宗纪》，他已于长兴二年正月加官中书令，是名副其实的“令公”。敦煌P.2675v《曹议金状》末尾“用河西归义军节度观察处置营田押蕃落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兼令公御史大夫上柱国曹议金”的名衔，这个太保可能也是被后唐朝廷正式承认的。虽然议金封太傅不见记载，但太傅比太保高一级，作为河西节度使的张希崇如此称也许是出于客气和笼络，也许是由于当时这样的加官太多太滥，于是称呼起来便就高不就低；总之我推测这里的太傅令公应是曹议金。

中原朝廷联络西州回鹘与于阗王李圣天的活动在曹议金晚年开始，但是直到天福初年才最终实现，这恐怕是一①按此状应为曹议金上后唐朝廷的公文，故所称官名应是此前已正式授予。以上曹氏称号并参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一章六至八节，第95—110页。
书状集的第二十三、二十四首标明是"给泾州钤辖司空书"。第二十五首"是泾州太傅状"。这几件书状的作者,赵和平仍认为是张希崇,"而泾州太傅"就是康福。理由是此件书状25首下有注"文为述谢见示旌节官告使"。张希崇任朔方、河西两使留后在康福之后,康福后被任为泾州节度使,而长兴四年五月后唐正式授张希崇为灵州节度使。康福在朝廷正式旌节到灵武之前,曾派使者通知张希崇'旌节官告使'将达的讯息,所以张希崇回复康福一道谢状。①

但是,作为收信人"的泾州太傅"是否就是康福?问题是否如此简单?这首先要看授书人是否真是张希崇。仔细阅读上接几通书状,发现"给泾州钤辖司空"的第二通"称自当留务,予□家皆,忽蒙天恩,特赐册赠;仰承明命,殒烟难胜",语气是悲哀的。特别"是册赠"一语,值得推敲。赠者是赠官,给的只能是死者不是生者。也就是说,朝廷册赠的只能"是自当留务"的留后已死的父兄亲属。这和下面给"泾州太傅"状中所说"右自总留权,方荣哀瘵"似乎也是相合的。因"为哀瘵"一词意为哀病,一般也是形容自己有大丧才使用。结合两信内容,"知方荣哀瘵"是指自己任当留后之际,朝廷给了去世亲属册赠的哀荣,同时又颁给了节度官告。那么,朝廷为何要在授书人自当留务时即特意给其父兄册①

①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78—279页。
一般说来，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节度使死而由其子弟自行主掌兵权的情况下。朝廷所给的册赠和官告，是对新任留后节度使地位的承认，也是对其进行安抚。类似情况正可见于前揭P.4065《表状集》中曹元深的表文内容：

臣某言：旌节官告。国信使副某至，奉宣圣旨，赐臣手诏一封，赠臣亡父官告一道，告弟一道，焚黄一道：故兄赠太保官告一道，告弟一道，焚黄一道者。此通奏表，臣王父是曹议金，故兄指曹元德。也就是说，后晋朝廷在给曹元深官告的同时，也给了其父兄褒赠。同样，《旧五代史》卷七九《晋高祖纪》载天福五年二月丁酉朔，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卒，赠太师，以其子曹元德袭其位。天福五年不是曹议金的卒年，现已知他早于清泰二年死去，曹元德也于天福四年已死，后晋朝廷得到消息已晚元德之死，天福五年尚不知，但还是在给曹议金册赠的同时，承认了其子曹元德的继承权。

但是张希崇的任留后及节度使显然不同于以上性质。灵州自唐末韩逊以来，始终由韩氏世袭，直到韩澄。《资治通鉴》卷二七六天成四（年929）条曰：

初，朔方节度使韩洙卒，弟澄为留后。未几，定远军使李匡宾聚党据保静镇作乱，朔方不安。十月，丁酉，韩澄遣使赍绢表乞朝廷命帅。戊戌，以前磁州刺史康福为朔方、河西节度使。

《旧五代史》卷一三二《韩洙传》：

天成四年夏，洙卒，朝廷以其弟澄为朔方军节度观察留
后。是岁，有列校李宾作乱，部内不安，乃遣使上表请帅于朝廷。明宗命前磁州刺史康福为朔方等军节度、灵威雄警良等州观察处置、度支温池榷税等使，仍遣领兵万人赴镇，其后灵武遂受代焉。

韩洙弟韩澄《新五代史》卷四十《韩逊传》“作洙子澄”，但以名字用字的偏旁相同而言作弟当无误，两处史料中“的李宾”、“李匡宾”也为同一人。由这里可知，康福是被韩“澄”请来的，但他一到便全面接管了权力，韩氏世袭灵武的局面被结束了。

韩氏家族的继承人，唐末韩逊之后依次是韩洙、韩澄，韩洙继韩逊任使在后梁乾化四年(914)五月，距本卷其他书状时间甚远，所以还是韩澄比较合理。与此有关，应当研究的是据辑本《旧五代史》卷三九《后唐明宗纪》的一条史料：

(天成三年)七月壬子，以朔方节度使韩洙卒废朝…(…八月)辛卯，以朔方军留后韩璞为朔方军节度使、灵武雄警甘肃等州观察使、检校司徒。

韩洙死，旧、新《五代史》本传及《册府元龟》卷四三六《将帅部·继袭》都作天成四年，惟此处作三年，并载韩洙死不过月余，朝廷就给朔方颁了节钺，此不知何据。更令人奇怪的是颁给者“是朔方军留后韩璞”而非韩澄，这里的名字不同不能认为是误记。试想澄为洙弟，洙当自有子。联系《新五代史·韩逊传》误澄为洙子或非偶然，朝廷所授最初应当就是韩璞。不过《旧五代史》卷四○天成四年六月辛亥又有与《韩洙传》基本相同“的以权知朔方军留后、定难军都知兵马使韩澄为朔方留后”一条，已经任命了韩璞怎么又任韩澄？何先后矛盾如此？细读泾州太傅状亦不难发现颇有些蹊跷：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87

右厶自总留权,方荣哀瘵,虽当竭磬,未效驽鈆。忽蒙圣恩,特颁宠渥。闻命而犹疑梦寐,承恩而如寘冰霜。伏蒙太傅曲示深恩,别形厚念,远飞专介,先赐华缄;仰亏奖饰之文,弥认优容之德,荷载感泣,稽程[输]诚。谨因使回,府(赐 谨附)状启起居陈谢。伏惟俯赐鉴察。谨(录 “按 谨录”二字疑为钞写者所加)。

如前所述此件书状已注明“是为述谢见示旌[节]官告使”,说明是为谢提前通知官告使到来的。但奇怪的是道“及忽蒙圣恩,特颁宠渥”却似乎毫无喜气。试想如果这“个宠渥”本应是授给韩澄本人的,那么算得上是天大的喜事,为什么会“有闻命而犹疑梦寐,承恩而如寘冰霜”的感觉呢”? 犹疑梦寐”是说不相信是真的,此尚可勉强”;如寘冰霜”则是说自己已内心凉透如身陷冰雪中了。此正见其彻底绝望,除非不愿当这个节度使,否则岂有得节钺而心情痛苦如此者!更令人奇怪的是下面说对“方曲示深恩,别形厚念”,假若对方泾州太傅送来的是大好消息,又何必曲曲折折,遮遮掩掩,似乎掩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竟使得授书人从所“谓奖饰之意”中也能读“出优容之德”来呢?而所“谓优容之德”难道不是对犯错误者才可能有的宽容和关照吗!

总而言之,此信使人甚感不合常理。授书人毫无获得节钺的欢喜,反倒是种种的烦恼和无奈,这只能表明其中另有隐情。结合前揭史料,我推测这一隐情便是朝廷最初虽授节钺,却不是授予实掌朔方军权的原朔方兵马使韩澄而是其兄子韩璞,使之无法面对这一尴尬的事实。泾州太傅之所“以远飞专介”十万火急地先将此消息通知韩澄者,正是要他早作准备而有以应付,这也是韩澄对其“荷载感泣,稽程[输]诚”的原因。
那么这位泾州太傅是谁呢？如上所述授书人既是韩澄而非张希崇，收书人自然也不会是康福。相对于韩澄任留后的时间，我推测这位帮助韩澄的太傅有可能是泾州节度使李从昶。

（二）灵武、泾州地方权力的转换及五代朝廷的河西经营

泾州的状况与灵州非常相似，唐末以来始终是由原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及其子弟世袭掌权。《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同光二年（924）记“正月，岐（王李茂贞）闻帝入洛，内不自安，遣其子行军司马彰义节度使兼侍中继曮入贡，始上表称臣。"不久李茂贞卒，后唐即以李（继从）昶代兄从曮为泾州留后，朝廷寻加节制"《旧五代史》卷三二《后唐庄宗纪》同光三年五月也记“戊午，以凤（州）衙内马步都指挥[使]李继昶为泾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后唐明宗最初也对其兄弟采用拢络政策，李继曮、继昶的改名不完全是由于避庄宗子李继岌之讳《。资治通鉴》卷二七五天成元（年926）九月壬午，赐李继曮名从曮"。胡注"：以子行待之也。"李继昶任使一直到天成四年，但是此后逐步改变。据同书卷四○《明宗纪》，其年七月丙戌，泾州节度使李从昶移镇华州，以冀州刺史李金全为泾州节度使”，李继昶被向东内徙，接替他的李金全与之已不是一家。稍后《，资治通鉴》卷二七七长兴元（年930）凤翔节度使兼中书令李从曮入朝陪祀，三月壬申，制徙从曮为宣武节度使”的记载，说明朝廷借其入朝之机，也使其内调。李氏兄弟的内迁，是朝廷逐步结束西北地区半独立政权《旧五代史》卷一三二《李从昶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742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标志，而泾州真正由朝廷命官也正在此时。李继昶家族的世袭与韩氏家族的世袭状况几近相同，所辖地域又相连接，可谓“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且天成三年或四年正是李从昶将被或已被移往华州，交出李氏世袭割据的地盘之际，给灵武的诏令下达时他应当还未离开泾州，而从自己家族的利益出发则必然关心邻镇灵州的去向，由此对韩澄有照应是可以理解的。加之他所在州又在灵州东南，故能将所得知不利于韩澄的官告内容提前告之，信中也自然暗含着对韩澄的同情。此所以韩澄谓“之曲示深恩”，并“以泾州太傅”旧名称之的原因。

至“于泾州钤辖司空”，则从官名看比“太傅”略低。钤辖者，约束也。宋代有州兵马钤辖，当从五代发展而来。此处钤辖也为武官。书中说“他早怀济世之谋，夙蕴佐时之业，荣分重寄，上赞侯藩”，其中一“赞”字说明他不是节度使但为其助手，并承担很大的责任。此人看来有可能也是李氏子弟，且为藩镇要职。给此人之书同样说明朔方与泾州关系密切。

以上分析如果正确，那么可以认为朔方留后韩澄主掌兵权之际，曾受到泾州镇李从昶的关照。而几封书状所反映的基本上是朔方河西与凤翔泾州为后唐明宗朝廷全面接管以前的状况。韩、李的关系正来源于他们共同的处境。据论者考证，凤翔一镇当李茂贞全盛之际，领岐、陇、泾、原、武、秦、成、阶、凤、邠、宁、庆、衍、鄜、坊、丹、延、梁、萍等二十州。天复二年（902）与朱全忠战败被围，梁、萍入于蜀；迄五代，邠、宁、庆、衍、鄜、坊、丹、延八州先后为梁所有，秦、成、阶、凤四州又入于蜀，茂贞仅保有岐、陇、泾、原、武、渭而已。逮至后唐明宗时，李从曮的凤翔镇更是只领凤翔、岐、乾、陇及自置从县扩大的良、晏、匡等州。
泾、原、武、渭等州则是早在庄宗时即分给李从昶。长兴元（年 930）
朝廷派朱弘昭取代李从曮后，其原置良、晏、匡等州也奏改为县①。由此可见，凤翔李氏的势力是在被逐渐削弱的。这个削弱基本上
是以李从曮和李从昶分别被内徙（同光四年七月，李从昶移镇华
州；次年三月，李从曮改宣武节度使）为告终的。
同样，灵武的韩氏统治也几乎被同时结束，虽然这个结束是以
韩洙死、李匡宾作乱，韩“澄 表启朝廷命帅”为契机的。但如前所论
后唐朝廷在其中是作了手脚的。前揭史料言李匡宾乃军校，其作
乱使朔“方 部内不安”。而据《 旧五代史》卷九一《 康福传》也说韩澄
（原文）以人情不协，虑为所图，上表请帅“。使朔方镇
“部内不安”、“人情不协”的原因是什么呢？朝廷的节钺先给韩璞
而不给韩澄，后又命韩澄为留后代韩璞是问题的关键。这样作的
结果是领兵者得不到朝廷节钺支持而实无指挥兵权，又制造了矛
盾，其势必导致朔方内部军乱，逼使韩澄不得不在控制不住的情
下 上表请帅”，而朝廷则借机彻底接管权力，结束这一地区半独立
的状态。当然这里不完全排除朝廷最初不清楚韩澄已自掌军权而
按惯例让前任节度使之子世袭的可能，但是故意为之的可能性更
大，而且不管怎么说，朔方的军乱是由后唐朝廷两次任命造成的，
事情发展的最终结果也是后唐朝廷坐收渔利。
因此，由上述情况得知，在后唐明宗天成末至长兴初，朔方河
水西及凤翔泾陇曾有一事实上的权力交替。在这个过程中，中原李
氏朝廷派官完全取代了自唐末以来一些家族的统治，这应当是涉
及这一地区政局的重要变化。此变化以往未被史家所充分注意，
①朱玉龙：《 五代十国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97年，第223—224页。
但它事实上影响着中原朝廷的权力向西部延伸。将“泾州太傅状”与“沙州令公书”放在一起分析，可以看出后唐明宗政府关于西北边的经营分两步走，第一步即借机彻底接管回收关中诸镇，结束家族统治与半独立状态。这其中灵武、泾州地方权力转换的信息已委曲透露“在‘泾州太傅状’中。第二步是以朔方河西重镇作为中原政权在西部的桥头堡，以朝廷所派任的节度使作为全权代表，发展与归义军的关系，并通过归义军沟通与回鹘、于阗的友好往来，实现西北边境的道路通畅与和平安宁。这一意向“在‘沙州令公书’中也很突出。在这两步中，朔方河西也即灵武节度使的作用始终极其关键，这一点也在其他书仪如P.3931等反映出来。而后晋朝与沙州及于阗的通使应当说也是继承后唐政策的结果。因此P.2539v书状集对西北边疆政治史、民族史无疑是重要的补充，因而也是它的价值所在。

（三）其他书状的主人公和书状集的作者、性质问题

1. 书状的主人公说明致书者不是一个人

通过上面的论证还可以说明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书状的授书人虽然都是灵武节度使，却并不是一个人，除已论者之外，其他书状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其任使，还有“虽淴汗渤海乍喜于新恩，而凤阁鸾台尚虚其旧位。伫再亲于黄阁，当永福于苍生”诸句。所“谓 凤阁鸾台尚虚其旧位”当指原来是在中央任宰相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而 伫在亲于黄阁”则是为之祝愿企盼，希望早日回到中央。这个太尉王相公是谁呢？查五代史料及朱玉龙编《五代十国方镇年表》, 符合其中条件的只有后唐青州节度使王建立。《旧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纪五》：“(天成三年)十一月，青州奏，节度使霍彦威卒。甲午，以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判三司王建立为青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这说明王建立正是以太尉任使，并且任使以前是宰相。任使以后虽仍带同平章事衔，但“与亲于黄阁”的宰相还是不相同的，《旧五代史》卷九一本传说“他 天成四年，出为青州节度使。五年，移镇上党，辞不赴任，请求退居丘园，制以太子少保致仕，建立自是郁郁不得志”。所记任青州节度使时间不同，但以退为进，想回朝廷的心情看来与书状所说不谋而合，因此这个青州王相公应是王建立，书状时间应在天成三年末到四年初。书状集中还有一“件 青州侍中状（第九通），大致是一件写于残暑”之际的起居状,无甚具体内容。此侍中是否仍是王建立呢？查《旧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纪七》称“（长兴元年）三月丙子，鄂州节度使王晏球移镇青州。四月，青州节度使王建立加侍中，移镇潞州。”王建立虽加侍中，却已移镇潞州。而据同书卷七六《后晋高祖纪》，王建立再镇青州已是天福二(年 937)的正月，且在同时或者至少五月已前他的官名已由侍中改为中书令了, 写于夏末的起居状似乎不应再称他为侍中, 故此侍中未必是王建立, 据史料我推测有可能是长兴元年接替他任使的王晏球。
王晏球为天平节度使，与赵德钧并加兼侍中。《旧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纪九》（长兴三年七月），青州节度使王晏球加兼中书令……八月辛亥，王彦球卒，废朝二日。据前王晏球任青州节度使是长兴元（年930）三月，其时已为侍中，并任此官一直到长兴三年七月。因此侍中指王晏球可能性较大。

（2）薛尚书、杨仆射彦均均有其人
书状集的第二十通收书人注明“引进副使薛尚书、客省副使杨仆射彦均”，内容为贺“荣奉新恩，宠膺异级”。引进副使与客省副使为五代重要使职，藩镇入朝觐见及与中央联络事宜等均由其掌管，故借祝贺升迁为由以联络感情、铺垫关系很可理解。其中薛、杨二人借助史料不难找到线索。

薛姓尚书而任引进副使者，见于《旧五代史》卷一二八《薛仁谦传》：薛仁谦，字守训，代居河东……仁谦谨厚廉恪，深通世务，梁邺王罗绍威甚重之，累署府职。唐庄宗即位于魏，授通事舍人。梁开平中，聘于吴，得使乎之体，迁卫尉少卿，引进副使，累加检校兵部尚书。长兴中，转客省使。这段记载说明，薛仁谦在长兴中转客省使之前，官职是检校兵部尚书兼引进副使。这与文书中的职务是非常吻合的。

客省副使杨彦均之名不见正史记载。但《旧五代史》卷九○《杨彦询传》：杨彦询，字成章，河中宝鼎人……彦询年十三，事青帅王师范，有书万卷，以彦询聪悟，使掌之……洎师范见杀，杨师厚领邺，召置麾下，俾掌宾客。唐庄宗入觐，复事焉。同光元年冬，从平大梁，升为引进副使。将命四川及淮南称旨，累迁内职。明宗时，为客省使，检校司徒。”
为藩镇掌宾客,至后唐中央任引进副使、客省使仍未脱离此业。传
虽未言其曾任客省副使,但从引进副使到客省使”,累迁内职”,这
其中不排除以仆射任客省副使的可能。且杨彦询任使的时代与薛
仁谦相同,均、询字虽不同而音近,我颇疑本为一人。由此推测其
二人任副使也即书状的时间大体应在天成末至长兴中。
(3)安司徒、张太保的推测
第二十二通书状题“为 新除西京留守安司徒,陕府张太保同”。
其内容亦属祝“贺 荣奉六恩,光膺宠命”之类充满谀词套语的贺官
仪。授书人自“称 嶷谬以幽微,贺叨戎寄,仰清风而日久,限紫塞以
程远”,紫塞也是朔方的习用语,说明授书人身份应是朔方河西
灵武节度使。
由于五代有两西京,所以弄清收书人安司徒为谁必须首先确
定 西京留守”何指。据史料所载,西京一为后唐同光元年十二月
所定,称长安;一为天福三年十月所定,称洛阳。按照本卷其他书
状已考年限,此处之西京无疑当指长安。而这一点与“ 陕府张太
保”任职的时间也是相合的。
查五代史料与《方镇年表》,五代时期的张姓陕州节度使只有
三人,后梁的张宗奭、张归厚和后唐的张延朗,其中张宗奭虽拜太
保,但与张归厚均不在所涉时限,且后梁无西京,故惟张延朗有此
可能。据《旧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纪五》记”:天成三年(闰 九)
月乙丑,陕州节度使李从敏移镇沧州,以宣徽南院使张延朗为陕州节
度使。”又同书卷四一《明宗纪七》”(:长兴元年)三月,壬午,陕州节
度使张延朗移镇许州,加检校太傅。”史籍未记张延朗官为太保,但他
移镇许州兼检校太傅,此前职应是比太傅官低一级的太保。
但是如认为这里的陕府太保是张延朗,亦非绝无问题。因相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95

2. 书状的性质与撰集者

如果以上推论属实，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些时间、授书人不同的书状会被纂集在一起而形成一部文集呢？这里便涉及到表状笺启类书仪文集形成的方式和过程。前节已经说明，敦煌表状笺启类书仪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实用过的表状笺启书信集成，以P.4093刘邺撰《甘棠集》为代表；一种则是虚拟收书对象并按照相应格式要求制作的标准书仪，以P.3723“乡贡进士郁知言撰”《记室备要》为代表。P.2539v正是类似于《甘棠集》那样的书仪，它的每件书状都有具体对象，除了贺词套话之外，
不少也都有具体内容,看得出是由实用书状而收集。不过,书仪中也有一些诸如《朝要书》《延州汝州凤翔陕府侍卫左卫月旦书》《礼宾引进内省书》等无具体收书人的套用书辞形式,说明这件书状集已是比较规范,有意作来供人模仿的书仪,而不是单纯文集了。

既然是有意制作的书仪,那么涉及到P.2539v书状授书人不统一的问题也就不难解释了。因为正像《甘棠集》一样,P.2539v的内容都是为节度使致中央和地方藩镇大僚及相关要职所用,是按照灵武节度使的口吻和意图制作的。但它们的制作者或纂集者却不是某一节度使本人,而是后唐时代长期在灵武镇任职的某一幕僚。其制作和随手过录纂集的目的是作为本人或使府在撰写此类书状的参考和模式。而由于时间跨度长一些,所以就出现了书授书人甚至不是一个的情况,而这种情况状的指使者与晚唐五代文献所录及敦煌的其他一些表状笺启书仪也有一致之处。这样,这部书状集实际仍然是一部掌书记文集了。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在提到本卷书状集各件的致书一方时,多用“了授书人”而不是撰作者一称,就是为了区分两者的不同,不过这一点当然不影响对整个书状的判断。从书状的收书人官衔已可以看出,一方面灵武节度使不仅联络着西部的敦煌,而且密切关注着中原朝廷和东部地方势力的变化。其触角通过沙州,西向延伸至西州和于阗,东向更铺展至凤翔陕府、长安洛阳、青齐魏博,并且不放过任何一个向朝廷权要和各方“诸侯”贺官及送礼达意的机会。由此可见地方当权者是怎样精心地编织着政治网络,计划和铺垫着自己的政治前程。另一方面也可以再次注意到,灵武是一个如何东西贯通、左右逢源的指挥前哨和战略要地,这也就无怪乎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后唐明宗朝廷要将此地完全收归朝廷掌握了。而本件《灵武节度使书状集》不但馈送了这些信息，且无意中透露出当时西北边疆复杂政治纷争与民族交往的具体史实，对于研究者来说，却毋庸说是意外的收获。
敦煌三大类书仪的发展是既有先后，又互相关联的。敦煌朋
友书仪的前身是月仪，月仪在书仪中最早出现，也最早退出历史舞
台。朋友书仪继承月仪的两种文体，保持了四言句与骈体文的优
美格式，而朋友书仪关于年、月、季候的传统用语与起居礼仪等，也
“随年序凡例”“及月旦贺官”的内容被吸收入吉凶书仪或表状笺启
书仪中。
吉凶书仪扩大了月仪的内容。它将年序凡例、内外族、四海及
僧道、妇女书仪等综合为一体，并涉及婚丧礼俗、社会交往、朝廷仪
制与官场仪范等各个方面，从初唐至中唐，内容不断丰富。晚唐之
际，书仪内属于官场酬应的部分不仅单独立目，并不断扩大，从而
成为表状笺启书仪的一个基础。
表状笺启书仪虽然可以从吉凶书仪的发展轨迹中找到线索，发
现与前两种书仪相续复相关的内容；但是，又可以从尺牍的形成
追述其作为官文书体的渊源，从魏晋南北朝的文集制作中发现它们最早的雏形。因此它既是循旧，更是创新，是官文仪范在新政治形势需要下的发展和创造。由于这类书仪相当部分是属于实用书信集成的特点，使大量相关藩镇政治、民族交往等史实通过其中的官仪文范得到反映。

总之，不同类型的书仪兴盛发展有其时代性，它们彼此间既相因相成、相互派生，内容又各树一帜、别具侧重。虽然它们占据主导地位的时间不同，却并不防碍它们因彼此均在某方面适应了时代的要求而同时并存于某一历史阶段。

除了书仪之间相互派生、相互包容的特点，我们在书仪的发展中还应注意到另一问题，这就是论者已指出的中原文化圈与书仪内容形式变化的关系。

从敦煌书仪的形成来看，它们的情况大体又可以分成三种。其中的一种即是完全从京城或中原内地传入的书仪。这类书仪除了上面已指出的表状笺启书仪中《甘棠集》、《记室备要》、《新集杂别纸》之外，还包括吉凶书仪中的《唐前期武则天时期?书仪》、杜友晋《吉凶书仪》、《新定书仪镜》、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及《晚唐河北吉凶书仪》等。它们完全或基本上保持了中原地区的面貌。诚如识者已论，敦煌文化的主体即来源于中原文化，这类书仪是书仪中的正统，它们构建了敦煌书仪的模式和基础，使敦煌的书仪乃至礼仪文化不脱离唐五代国家而独立存在。

第二种书仪是对第一种书仪加以改造而成。它们中的典型如《朋友书仪》、《书仪镜》、张敖《新集吉凶书仪》、《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及晚唐五代《新集书仪》。它们的特点是大量吸收了中原书仪的形式内容，甚至保留了原来的框架，但是却屏弃了实用性不高的……
敦煌书仪的发展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直接从中原传入的，这些书仪受到中原礼仪及书辞用语的影响。第二种是敦煌周边及本地自行撰写的书仪，包括吐蕃占领初期的《汉族书仪》、灵州节度使表状集、书状等。这些书仪或由敦煌所在地及周边的一些实寄书信及官府公函纂集而成，或按照各种官府规定的官文口语仪式而作，它们完全是为敦煌本地或西北地方政治、社会生活服务的。在相关形式、礼仪内涵方面，仍须参照中原礼仪及书辞用语，故其书仪的制作类型范畴，仍然没有超出传统书仪的范围。第三种是纯属敦煌周边或本地自行撰作者。其中如S.1438v《吐蕃占领初期汉族书仪》、灵州节度使表状集、书状（此两件也可以算作是在二、三种之间）以及上述归义军时期表状集、杂谢贺语等。这些书仪，或由敦煌所在地及周边的一些实寄书信或官府公函副本纂集而成，或是按照各种官府规定的官文口语仪式而作，它们完全是为敦煌本地或西北地方政治、社会生活服务的。由于在相关形式、礼仪内涵方面，仍须参照中原礼仪及书辞用语，故其书仪的制作类型范畴，仍然没有超出传统书仪的范围。
《礼记·中庸》称："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 礼用以别尊卑贵贱,是古代国家维护等级秩序、宗法关系所必须,且作为国家存在的精神支柱,与用于治政的律令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

唐朝国家在礼制上虽然继承隋朝,但在太宗贞观、高宗永徽一显庆和玄宗开元中都曾数次制定新礼。其中开元礼尤综合前朝,为有唐一代的礼仪大典。此外,唐太宗贞观中令孔颖达撰《五经正义》,《礼记》为其中之一。而包括《仪礼》《礼记》《周礼》在内的三《礼》,唐前期已被分别列入明经、进士的考试内容,唐德宗贞元中更将三《礼》、五礼单独列为考试科目。对于礼的重视和教育是毋庸置疑的。

与唐朝廷对礼的重视相应,且受魏晋南北朝世族制的影响,唐朝始民也有重礼仪的风尚。但是礼仪是通过怎样一种方式向全社会普及呢? 学校教育与礼经和朝廷正礼的习学固然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然而对一般民众而言,仅有这种方式就显得很不够了。上古礼经文义艰深、佶屈聱牙是众所周知的,非专门习学不易弄懂;朝廷礼书,也未必在普通百姓中公布流传。据《唐会要》卷三五记
开元二十一（年733）敕，要“求诸州县学生，专习正业之外，仍令兼习吉凶礼，公私礼有事处，令示仪式”。这说明吉凶礼仪式既是在习学经书“的正业”之外，也不是完全来自朝廷礼书。从敦煌遗书中可以发现，有关三《礼》的文献仅P.2500、S.621等数件《礼记》残卷，而唐朝正式制定的礼（书如贞观礼、开元礼等）竟一件也未见到。可见唐朝在一般民众中传播礼仪的方式，主要地不是依靠礼经和朝廷正礼的传习。

那么，如何填补在礼仪普及和礼制教育方面的空阙呢？敦煌书仪的大量出现，至少部分地回答了这一问题。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不少书仪抄本后面有被寺院中郎、学士署名的题记，有些还抱怨生活待遇低下，说明书仪是经学士抄写，或作为其学习课本而流入社会的；还有一些书仪是和佛教文范或其他文范抄集在一起流传的。S.6537v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序称“人之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此识才通明于仪礼，是以士大夫之家，吉凶之重用。而诸礼经繁综浩大，（杂卒？）而难以检寻。乃有贤士撰集纂要吉凶书仪，以传世所用，实为济要。"清楚地说明吉凶书仪就是简化礼经，使诸礼仪通俗易懂、为人所用的一个途径。吉凶书仪中包括大量相关婚丧礼仪和其他仪则方面的具体内容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它们和其他一些俗礼书被正史的目录书归在礼书类，而在敦煌文献中，有二十余种、九十余个卷号之多，这也充分显示了它们的实用价值和受人重视的程度。因此可以说，吉凶书仪和其他俗礼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唐人礼仪教育方面的不足。

敦煌的朋友书仪、表状笺启书仪在史书的分目上，虽然没有被列人礼书类，但这也不影响它们在传播和普及礼仪方面的作用。除教人写信、针对不同对象和场合需要制作书牍之外，它们还从各
自的内容和细节，教人处理朋友情谊、尊卑关系，体现唐代社会所需的各种仪节规范。特别是表状笺启书仪，随着唐后期藩镇制度的形成和社会官僚化程度的加深，官牍文书的写作愈益受到重视，在这类迎合官场交谊、官场酬应制作的书仪和文集中，渗透着各种等级制度与仪节规范，从而大量补充了官场礼仪之缺，这是古礼经与朝廷正式礼书所达不到的。以下即从不同方面对书仪所体现的礼书内涵作具体分析介绍。
第七章    吉凶书仪溯源
——家礼的形成和书仪制作

吉凶书仪在三种书仪中, 是最典型的礼书, 所涉及的礼, 从形式到内容, 可以认为是多层位、多方面的。但是相对于朝廷的钦定五礼和某些有关国家社稷、朝廷仪制“大”制作而言, 它却有着面向家族和社会民间, 而以家族为出发点的意义。因此家族的礼法, 是它产生的根基和依据。

但是家族的礼法来源于何处? 以经学为渊薮, 产生于魏晋, 而光扬、延续于南北朝隋唐的世族家礼家仪解决了这一问题。世族的家礼形成不但影响朝廷制礼, 且与书仪的制作相辅相成, 在中古时代达成了全社会礼仪教化的共识。

一、古礼与家法相结合的吉凶书仪制作背景

吉凶书仪中所见到的礼, 大体分属三个层次: (1) 古礼, 即属于《周礼》《仪礼》和《礼记》释义的三《礼》范(畴; (2) 朝廷制礼, 即前代或当代朝廷所定五礼; (3) 世族或士族家礼。其中以世族或士族家礼, 即家法的形成对书仪的制作影响最为直接, 那波利贞《唐代社
对此已有论述，近者史睿也撰文具体地分析了吉凶书仪的起源与东晋南朝礼俗特别。由于家礼的儒学渊源及其是世家礼法的关系对朝廷治礼的影响，所以家礼同古礼与朝礼自然融摄，形成三者杂糅密不可分的情况。

（一）家法的来源及书仪制作
正史的目录书于史部仪注类记载吉凶书仪的同时，也著录了不少由朝臣官吏或民间人士个人制作的其他俗礼书。本书在前章介绍吉凶书仪时，即同时介绍了诸如《赵李家仪》《徐爰家仪》和《新仪》《文仪》等多种。这类俗礼书中，明显有不少是与私家礼法有关者。如《新唐书·艺文志》所记唐人著作仅从题目看便不下于五（种《杨炯家礼》十卷，孟诜《家祭礼》一卷，徐闰《家祭礼》一卷，贾顼《家荐仪》一卷，卢弘宣《家祭仪》一卷）。同书卷一九七《循吏·卢弘宣传》称：

弘宣患士庶人家祭无定仪，乃合十二家法，损益其当，次以为书。

知卢弘宣的《家祭仪》乃是吸收了十二“家（家祭）法”的成果。

五代钱易《南部新书》戊部记曰：
王师鲁在孔戣幕中，尝言曰：‘半臂亦无文，房太尉家法不

①那波利贞《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第一编，创文社，东京，1974年，第64页。
②姜伯勤《唐礼与敦煌发现的书仪》，见《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礼乐篇上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427—431页。
③史睿《敦煌吉凶书仪与东晋南朝礼俗》，载《敦煌文献论集》，2001年，辽宁人民出版社，第394—417页。
在研究魏晋以降吉凶书仪的制作和内容时，也发现与“家法”有密切关系。《宋书》卷四二称王导曾孙、宋齐之际有佐命功的王弘说：

“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为王太保家法’。《王弘》《隋书》卷三三《经籍志》史部仪注类记有他所撰《书仪》十卷。‘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无疑是他所撰《书仪》的内容，由此可见王弘制作的书仪‘与家法’有关。

家法可以认为是家庭常用之礼法。《新五代史·刘岳传》说郑余庆书仪是‘采唐士庶吉凶书疏之式，杂以常时家人之礼’。敦煌S.6537《大 曰唐新定吉凶书仪》郑氏自序也称自己‘是询诸士林，或裨家训’，则家训乃遗诸子孙之家教，实也即家人之礼而与家法有关。因此家法乃书仪制作的基础，认识书仪则必须首先了解士族作为道德和教育标准的家法。

1. ‘家法’一词的渊源、变化

‘家法’词，始见于汉代，但其初仅指家学而言。《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称：

‘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07

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

卷六《孝冲帝纪》：

(本初元年)夏四月庚辰，令郡国举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诣太学。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受业，岁满课试，以高第五人补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属、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经者，各令随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当以次赏进。

按据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儒生为《诗》者谓之《诗》家，《礼》者谓之《礼》家，故言各随家法也。”同书卷四四《徐防传》记防赞成章句之学，上书以“为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章怀注“诸经为业，各自名家”；卷五一《左雄传》言雄上言郡国举孝廉”，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章怀注“儒有一家之学，故称家法”。由此可知，家法是指在汉代儒学昌盛之后兴起的各家门派专学。所以鲁恭因讲诵《鲁诗》，其后拜为《鲁诗》谶博士，由是家法学者日盛。

杨统父春卿，临死戒子统曰：”吾绨袠中有先祖所传秘记，为汉家用，尔其修之。”统感父遗言，辞家从犍为周循学习先法，又就同郡郑伯山受《河洛书》及天文推步之术”，后作《家法章句》。经学大师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其后范晔祖父宁传授生“徒并专以郑氏家法云”①《后汉书》卷二五《卓鲁魏刘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73—874页。②《后汉书》卷三十《苏竟杨厚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047页。③《后汉书》卷三五《张曹郑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213页。
家法还可以泛指任何一种家传学问或家学传统。后汉司空陈宠曾祖父“咸成哀间以律令为尚书”，父躬又以律令为廷尉监。宠少习家法，辟太尉鲍昱府……昱高其能，使掌天下狱讼，所平决无不厌伏。宠以律讼多错，不良吏得因缘生轻重，乃为撰科条辞讼比例，使事类相从，以塞奸源。其后公府奉以《魏书》卷四七《卢玄附为法》。”

卢谌传》：初，谌父志法钟繇书，传业累世，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迹。渊习家法，代京宫殿多渊所题。《文苑英华》卷八一六权德舆《太宗飞白书答诏记》："(卢)元卿工为篆隶八分诸书，且其家法保而藏之久矣。《玉海》卷四"五唐真草书屏、八体书屏、书谱"条：京兆西明寺金刚经有钟王欧虞褚陆诸家法。"是不但律法，后世也习惯将诸家书法称为家法。但是自魏晋以后，家法亦愈来愈多地被用来专指家族礼法。

《晋书》卷四五《刘毅子暾传》：暾妻前卒，先陪陵葬。子更生初婚，家法，妇当拜墓，携宾客亲属数十乘，载酒食而行。"这里初婚妇当拜墓之婚礼仪俗是刘家所行，故称家法。又《魏书》卷四九《安同传》称同在官明察，长于校练，家法修整，也是指家内讲究礼法。《册府元龟》卷七九四《总录部》专设家法一门，称易曰：'家人嗃嗃，悔厉吉。'传曰：'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盖夫闺门之内，德范所出，位在乎正，治尚乎严，故能致恭肃之美，流敦睦之誉。古之君子，莫不先内治，而后施于有政者也。乃有礼同宾馈，法如官司，进止有(尝常)，体貌无懈；繇是少长咸叙，孝慈兼笃，茂亢宗之德，蔼王家之训，耸人伦之瞻仰，著方来之模楷，非夫仁厚成。
性德义居质者亦何能及是哉”云云,更一望而知所论为家内之礼的宗旨,可见家法用指家内礼法也是由来有渐。

《宋书》卷五五《傅隆传》有云:（元嘉）十四年,太祖以新撰《礼论》付隆使下意,隆上表曰:“臣以下愚,不涉师训……原夫礼者,三千之本,人伦之至道。故用之家国,君臣以之尊,父子以之亲。用之婚冠,少长以之仁爱,夫妻以之义顺。用之乡人,友朋以之三益,宾主以之敬让。所谓极乎天,播乎地,穷高远,测深厚,莫尚于礼也。其乐之五声,《易》之八象，《诗》之《风雅》，《书》之《典诰》，《春秋》之徽婉劝惩,无不本乎礼而后立也。其源远,其流广,其体大,其义精,非夫 叡哲大贤,孰能明乎此哉。况遭暴秦焚亡,百不存一。汉兴,始征召故老,搜集残文,其体例纰缪,首尾脱落,难可详论。幸高堂生颇识旧义,诸儒各为章句之说,既明不独达,所见不同,或师资相传,共枝别干。故闻人、二戴,俱事后苍,俄已分异。卢植、郑玄,偕学马融,人各名家。又后之学者,未逮曩时,而问难星繁,充斥兼两,摛文列锦,焕烂可观。然而五服之本或差,哀敬之制舛杂,国典未一于四海,家法参驳于缙绅。诚宜考详远虑,以定皇代之盛礼者也。”

傅隆这一段关于礼的论说涉及经学的延传，所“谓 诸儒各为章句之说”。但是,他认为《易》《诗》《书》《春秋》之徽婉劝惩,无不本乎礼而后立也”,也即礼学乃经学之灵魂,又经学之传本因士族名家;所以他所“论 国典未一于四海,家法参驳于缙绅”之家法”事实上已从家传经学而转至礼学。
两晋南北朝以来，礼法为以士族主宰的门第社会所重。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惟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是经学，它与政治的关系就循其东汉以来通经义、励名行以致从政的一贯轨辙，而经学中，礼仪又是根本。礼法有赖世族延传，世家大族须在其从政的实践中将古礼的礼义与朝廷定礼和其世传家法家礼融为一体。所以两晋（特别是东晋以后）南北朝，一方面是士族与礼家人士不断展开对礼仪的研讨，用古礼的基精神指导现实世界和朝廷礼的制作；另一方面，结合古礼传统及现实需要的世家大族家礼家学形成，也往往独树一帜。王弘的“王太保家法”正是其中一例。又同书卷二四《王准之传》，记琅琊王氏王准之曾祖彪“博闻多识，练悉旧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谓之‘王氏青箱学’”。两王氏的家法“或青箱学”是其家族数世以来逐渐形成的，但具有世族家法家学、仪风仪节的并非仅琅琊王氏。前揭《册府元龟·总录部·家法》门内摘录史书各条，如后汉李守通“父为人严毅，居家如官廷”，晋何曾性至孝，闺门整肃，自少及长无声乐嬖幸之好，南齐王延之“家训方严，不妄见子弟。虽节岁问讯，皆先冠”，后魏李敷兄弟敦崇孝义，家门有礼。至于居丧法度、吉凶书记，皆合典则，为北州所称美”；均可见士大夫家法之一斑。又《南史》卷①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三联书店，1957年，第71—72页。
二八《 褚彦回传》“称 彦回美仪貌,善容止,俯仰进退,咸有风则”。《北史》卷三二《 张冲传》”,冲母戴颙女,有仪范,张氏内取则焉。《三国志》卷一八《 李通传》注引王隐《 晋书》称“(,李)秉尝答司马文王问,因以为《 家诫》。前人总结此类著作自汉朝开始就有多种,如班昭《 女戒》、 杜恕《 家诫》和马援的《 戒兄子严敦书》、郑玄的戒子书等。而今存北齐颜之推《 颜氏家训》,正是此类书的代表。

2. 唐代的家法、家仪

到了唐代,一些世族人士仍以重视儒家礼法相标榜,所“谓 家法”、“家仪”也随着世族的沿袭而为某些士君子和旧世家所继承。如《 新唐书》卷一○○《 张知謇传》称张氏兄弟五人”,皆明经高第,晓吏治,清介有守,公卿争为引重。“知謇自高宗朝始历十一州刺史”。知謇敏且亮,恶请谒求进,士或不才冒位,视之若仇。每敕子孙“经不明不得举’,家法可称云。《 旧唐书》卷九九《 萧华传》称“ 华谨重方雅,绰有家法,人士称之”。萧华乃兰陵萧氏,祖上即贞

①周法高《: 家训文学的源流》,台湾《 大陆杂志》卷22第2、3、4期,1961年。
《新唐书》卷一二二《韦陟传》：
陟字殷卿，与弟斌皆秀敏异常童……陟甫十岁，授温王府东阁祭酒、朝散大夫。风格方整，善文辞，书有楷法，一时知名士皆与游……性侈纵，喜饰服马，侍儿阉童列左右常数十，侔于王宫主第。穷治馔羞，择膏腴地蓺谷麦，以鸟羽择米，每食视庖中所弃，其直犹不减万钱，宴公侯家，虽极水陆，曾不下筋。常以五采笺为书记，使侍妾主之，其裁答受意而已，皆有陟唯署名，自谓所书陟楷法，字若五朵云，时人慕之，号郇公五云体。然家法修整，敕子允就学，夜分视之，见其勤，旦日问安，色必怡。稍怠则立堂下不与语。虽家僮数十，然应门宾客，必允主之。

韦陟是武则天至睿宗朝宰相、中书令韦安石之子，虽生活豪侈而家法修整，从其训导子孙就学及应对宾客等，知其家法乃大贵族京兆韦氏世传家仪家规。又《大唐传载》言：开元、天宝之间传家法者，崔沔崔均之家法。《唐代墓志汇编》大历○六二《有唐朝散大夫守汝州长史上柱国安平县开国男赠尉卫少卿崔公皑墓铭》谓崔皑尝戒子监察御史浑、陆浑主簿沔曰：‘吾之诗书礼易，皆吾先人于吴郡陆德明、鲁国孔颖达重申讨核，以传于吾，吾亦以授汝。汝能勤而行之，则不堕先训矣。因修家记，著六官适时论。’崔皑即崔沔之父，家记之修，可证其家法有传授。此后直到崔沔之子，德宗宰相崔祐甫仍被称是家以清简礼法为士流之则，士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13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此外，又如《韩昌黎集》卷二一《送郑十校理序》：
郑生涵，始以长安尉选为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俭守教训，好古义施于文辞者……今生始进仕获重语于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门者，可进贺也。

郑涵即郑余庆子，父子均能行其家法。

《文苑英华》卷八八九权德舆《赠右仆射王光谦神道碑》：
幼而岐嶷，长而淳懿，絜矩慎独，抱仁戴义；闳深博辩之学，稽古礼文之事，炳然含章，靡不通贯。至若文舒之清休廉实，处仲之剖析玄微，安期之宏恕，怀祖之沉静，合是家法而躬行之。

据墓志言墓主王光谦是晋王坦之后代。王坦之为太原王氏，文舒以下，俱是学养深厚的王氏子孙，①则墓主也是能继承其家法者。而权德舆不但在所著文中常常称道他人家法，②也通过为其家族人士作墓志赞颂权‘氏代以儒门四科为家法’，家法休声贻于后昆。③权德舆《再从叔故试大理评事兼徐州蕲县令府君有方墓志铭》《再从叔京兆府咸阳县丞府君达墓志铭》，文苑英华》卷九五九、卷九六○，中华书局影印本，第5042、5047页。
结合，大有化俗之用。家法甚至还能通过某些人士部分地保存于唐末五代乱世，懿宗宰相萧仿子廪，咸通三年进士，后为京兆尹。僖宗再幸山南，嗣襄王僭立，自洛避地河朔”《新五代史》卷五七《王延传》"称延为人重然诺，与其弟规相友爱，五代之际，称其家法焉”《新五代史》称杜氏：又十有四世岐国公佑显于唐。又九世至于祁公。其为家有法，其吉凶祭祀斋戒日时币祝从事，一用其家书。自唐灭，士丧其旧礼，而一切苟简。独杜氏守其家法，不迁于世俗。盖自春秋诸侯之子孙，历秦汉千有余岁，得不绝其士谱，而唐之盛时，公卿家法存于今者，惟杜氏。②唐末五代之际，世族社会已走向衰亡，但时人对家法仍如此看重，以至于《新唐书》卷七一《宰相世系表》称：唐为国久，传世多，而诸臣亦各修其家法，务以门族相高。其材子贤孙不殒其世德，或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或终唐之世不绝。呜呼，其亦盛矣。然其所以盛衰者，虽由功德薄厚，亦在其子孙。可见家法在一定程度上仍被视“为门族”的标志；家法不存，门族便衰，子孙能够继承家法世德，才是士族延续和昌盛的保证。由此不难得出，家法是世族社会的灵魂，而通过家法，世族文化遗留的影响是深远的。①《旧唐书》卷一七二《萧廪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482页。②《欧阳文忠公集》卷三一，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简编本。
家法既被称之为家法，则首先是以家内礼法为原则。它其实包括了儒家修身齐家的各个方面。《文苑英华》卷四五八韩仪《授李成庆夏州节度使制》：“门下：夫有大功德于天下者，必庆垂私门；赏延于公室者，必传家令……以忠孝为身经，守谦直为家法。”卷八三一梁肃《京兆府司录西厅卢氏世官记》：“御史中执法，范阳卢公，用直清之德，掌中邦宪，恭慕之道用宏家法。”卷八九二韦贯之《南平郡王高崇文神道碑》：“奕世以礼义传家法。至公七叶无分居异财，化行于乡党。”《元氏长庆集》卷三○《诲侄等书》：“汝独不见吾兄之奉家法乎！吾家世俭贫，先人遗训，长恐置产怠子孙，故家无樵苏之地。”《文苑英华》卷九五二权德舆《房州刺史崔（公述）墓志铭》：“代有文行懿德，为北州冠族。公夷雅温粹，安舒廉静，于座右铭得含元之妙，于政论得理道之奥；以之修身，以之莅官，盖家法积厚，而公能践之之故也。”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一二一则曾夸赞说：“仆尝览《柳氏训序》，见其家法整肃，乃士流之最也。”这里“的训序”，大概就是柳公绰传附其孙柳玭的戒子弟书，其中也具体地谈到家法，称：予幼闻先训，讲论家法。立身以孝悌为基，以恭默为本，以畏怯为务，以勤俭为法，以交结为末事，以气义为凶人。肥家以忍顺，保交以简敬。百行备，疑身之未周。三缄密，虑言之或失。广记如不及，求名如傥来。去吝与骄，庶几减过。莅官则洁己省事，而后可以言守法，守法而后可以言养人。直不近祸，廉不沽名。廪禄虽微，不可易黎甿之膏血。榎楚虽用，不可恣褊狭之胸襟。忧与福不偕，洁与富不并。比见门家子
孙，其先正直当官，耿介特立，不畏强御；及其衰也，唯好犯上，更无他能。如其先逊顺处己，和柔保身，以远悔尤。及其衰也，但有暗劣，莫知所宗。此际几微，非贤不达。

从柳玭所说大致可以看出，柳氏的家法是以古礼和儒家学说倡的孝悌、恭默、畏怯、勤俭等为本的。魏晋以来的大族家法以经学为深厚基础。虽然各家传授不同，注重点不一，但遵守古三《礼》的原则是一致的。当然它还有许多新发展，如史睿即指出《礼东晋南朝士族家法的变化，认为东晋南朝的士大夫家族礼法是一个新起点，它既不同于两汉时期河北、江南的旧礼法，也不同于西晋兴起于洛阳的新风尚，而是南渡侨姓和江南土著礼法冲突、融汇的。而这结果，尤以南朝为新礼法发展的重要阶段”一新礼法除以标明身份等级制的丧服礼为核心外，还有许多诸如莅官守法、廉洁奉公“及逊顺处己，和柔保身”等具体行事之道。结合《颜氏家训》一书，知“家训”讲论的家法内容不但包括家族上下内外行止起居、婚丧吉凶、教子课孙、理家处世的各个方面，而且涉及风操、学问乃至音辞、杂艺等诸多个人素养，是士大夫立身行事的准则。其书卷二《风操第六》特别言道：

吾观礼经，圣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诺，执烛沃盥，皆有节文，亦为至矣。但既残缺，非复全书；其有所不载，及世事变改者，学达君子，自为节度，相承行之，故世号士大夫风操。而家门颇有不同，所见互称短长；然其阡陌亦可自知。

“家门颇有不同”的士人细微风操方面尤为残缺礼经所不见或

①史睿《敦煌吉凶书仪与东晋南朝礼俗》，载《敦煌文献论集》，2001年，辽宁人民出版社，第399页。
因此家法可补古礼、正礼之缺，并且在士族看来，家法的原
则是永远的，它可以不受世变的干扰，可以遗诸子孙，流传万世。
当然这里说到家法，南朝士族之新礼法固然重要，但在陈寅恪先生
所指出隋唐礼制的三源中，来自东魏北齐即唐代所谓山东士大夫
崔、卢、李、郑者也不可忽视，特别在一些传统的道德方面。此点已
见于上面的一些举证。而如《 颜氏家训》本身就是对南"北 家法"的
吸收和扬弃，所以北方风俗对书仪制作的影响也在其中。
那么，具体到士族人士如何以家法指导吉凶书仪的制作呢?
从敦煌书仪可以知道其中有二。第一，吉凶书仪是以家内事务为
主，以家族礼法和家庭教育为关注的目标，所以它的各项书题和内
容安排本身就体现了这一要求。例如早期的吉凶书仪以内外族书
仪分量最重，九族亲属依远近亲疏一一排列《。 颜氏家训·兄弟》以
为":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
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自兹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焉，
故于人伦为重者也，不可不笃。"内外族书仪的根本意义在于世族
人士对于敦睦九族的提倡，事实上也应看作是大族形成后应酬家
族事务和处理内外上下家族关系的一种需要。此外吉凶书仪中多
列有婚丧礼仪的仪目，这些礼仪亦是士族大典，最为家族所不能忽
略。它们虽然原则上或者形式上仍同古礼，但具体行事则有各自
的特点，正是当时所"谓 丧际冠婚，家犹异礼"的表现。又如《 颜氏
家训·风操》对于当时南北流行的称谓、避讳等法有大量的评述，并
特别指出"，江南轻重，各有谓号，具诸书仪。"今所见吉凶书仪皆有
吉、凶凡例的书题《， 新定书仪镜》末引有卢藏用《 仪例一卷》，内容
正是所"谓 轻重"，谓号"的集中说明，这是士族家礼在细节上的反
映。书仪的凶仪部分有吊书祭文多种，应是出自当时流行的唐人
“家祭礼”、“家荐仪”。郑余庆《元和书仪序》称在书仪制作过程中曾“询诸士林，或裨家训”，仪目并专设《门风礼教第十六》一项，这项内容可惜已经阙失，不然一定可以见到不少士族家庭行事的礼仪细则和范例。

这里还可以妇女书仪为例。前章已指出它与魏晋南北朝以来士大夫阶级重视妇女教育有关，是世家大族提倡妇女礼仪壸范的结果。史书记载大族妇女有才学修养者甚多，家法家学的延传和她们很有关系。《南史》卷二一《王融传》：“母临川太守谢惠宣女，性敦敏，教融书学。”《魏书》卷三五《崔浩传》载浩(母范阳卢谌孙女)“朝夕养舅姑，四时祭祀，虽有功力，不任僮使。”又“恐后生无知见，而少不习业书，乃占授为九篇，文辞约举，婉而成章”。崔浩之母有才学又孝顺贤达，《初学记》所记崔浩的《女仪》和前述“作家祭法”恐怕就来源于其母。所以女仪也是家法、家仪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颜氏家训》一书虽不设妇女专章，但《治家》等节也多言其事。其中比较南北妇女特点和优劣，提出：“妇主中馈，惟事酒食衣服之礼耳，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干蛊；如有聪明才智，识达古今，正当辅佐君子，助其不足，必无牝鸡晨鸣，以至祸也。”可见他认为妇女的活动范围只应是家内而不是外务。另外他提到“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唯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尤能说明妇女书仪专注于婚姻之家和南朝风俗的关系。

南北朝大族关于妇女教育的思想和方式大概也延及唐代。《唐代墓志汇编》天宝○七四《大唐颖川郡夫人三原县令卢全善故夫人陈氏墓志铭并序》褒扬陈氏“在娣姒之间，著雍穆之称，无小无大，皆得宜之，知己知微，不俟终日。中外懿密，向五十家，莫不宗其德礼，重其仪法”；同书天宝一○九《唐故卫府君刘夫人合葬铭并序》：“刘夫人时为夫人……”
序》也称赞刘夫“人孝侍舅姑，宾待君子，礼接姻党，慈训长幼，谓之施孟母之不死也，岂简翰所得行焉”。据说，这些妇女的榜样竟能够起到所“谓门闾可式，乡党称悌，安土忘贫，满堂常乐，和之至也；中表闻义而相睦，吉凶习礼而臻仰”的作用①，是知世俗对妇女的要求，仍以母仪壶范和孝道为第一。可以相对照的还有当时流行的宋若萃《女论语》和《太公家教》等书。今所见《女论语》有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男女、营家、待客、和柔、守节十二章，而两书中也多有妇女足不出户和宜室宜家一类行为②劝导。这与《唐代墓志汇编》大中一二二（唐故颖川陈夫人墓志铭并序）“夫人少习诗礼，长善笔札，自孩提至笄年，不履堂阈”、同书大中一二八《有唐卢氏故夫人墓铭并序》“夫人习礼言诗，尤专《论语》，崇奉释教，深昧佛经，诵读讲磨，咸得要妙。洞知音律，不学而能，笔札雅琴，皆所尽善”所赞美的一类笔札才能结合，无疑会影响书仪的制作。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曾指出，敦煌书仪中妇女书仪致书对象大体仅限于父母、兄嫂、丈夫、公婆、妯娌等娘家和夫家亲戚，范围仍是家族内外，这与提倡妇仪女德及使妇女维护家族和睦的宗旨是一致的。

第二，吉凶书仪是通过家法的原则确立尊卑等级，提倡孝道而教人应对吉凶与各类社会关系，并通过具体引用先贤著作或陈述作为依据。当然所谓家法与古礼或朝廷礼也不见得完全一致，不过惟其如此，它才更具有影响力。由于各家家法虽不一定形诸文

①《唐代墓志汇编》大历0六三《有唐安平县君赠安平郡夫人王氏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804页。
②周凤五《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研究》第三章附录《太公家教与女论语》，台北明文书局，第63—64页。
字，却十分具体，在民间就比其他两者更具有现实性、可操作性，所以一经传抄实行，便举世景仰，视为楷模。北史》卷一六《柳元景传》称“他凡诸称谓，四方书疏亦如之”可见一斑。世族行事”和”家法”于是乎成为全社会共同的标准，而这正是书仪制作的基础。通过书仪，世族之礼便得到贯彻普及。

正因为如此，不但世族人士成为书仪的制作者，且各家书仪也具备不同的取向及特点。随着时代对礼仪的需要，其内容还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此即杜友晋《新定书仪镜》引卢藏用《仪例一卷》所说“暨齐梁通贤，颇立标统。然而古今之变，文质不同，江南士庶，风流亦异。致令晚生后学，无所取则。聊因暇日，纂述诸仪，务存简要，以裨未悟，士大夫风范盖在是矣”。后来的书仪需要不断对以前的书仪加以总结和修改，但是书仪在反映变化或者纠正某些偏差谬误时也同样以世族行为习尚或前贤之说为准的。杜氏《吉凶书仪》外族吉书仪《与表弟妹书“》外表兄姓名、某氏表姊敬报”一语下注云：亦云呈，然《颜氏家训》甚非此敬字，不合卑处用。时所共行，未即可废，今用之。“表明曾参考《颜氏家训》而对时俗之用采取了有保留的态度。《新定书仪镜》的凶仪凡例在“将奈何”之语改“为罪苦”时指出：（隋《李家仪》亦改此奈何，虽轻丧亦全除语。恐时或未尽依行，故阙疑，以待胜识。”此《李家仪》应即《隋书·经籍志》载之《赵李家仪》《仪例一卷》否定旧仪与小重云眷仰及眷属”之意，举齐太尉王仲宝《让吏部表》及桓（渊？）辞婚于太祖之语，说明眷字不可施于小重，也是以大家仪体为范。同件续接《通例第二》在叙述大量称呼用语的等级规定之后说明：已前皆勘酌诸仪，兼采士流称谓，详（量？）轻重为纲纪吉凶之要，无逾此矣。自此之外，殆关性灵，不假凡庶。”意思是说，除与性灵，也即由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个人表达情绪自我发挥的成分之外，其他一切相关轻重和作为纲纪的内容事实上都是参照了士族礼法。

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在节候赏物中记有节日某些习俗，似乎也是源于世家大族的风习，或者至少是保持一致。例如书仪称八月一日赏点炙杖、朱椀子，九月九日赏茱萸树、菊花酒。

《太平御览》卷二五《时序部》中已指出，《卢公☆馈饷仪》八月旦上承露盘，赤松子柏上露为囊以膏面皮。古人用点炙杖，以梨枝为之，及银盏中有朱砂银枝子也”，卷三二引同书凡重阳日，上五色糕，菊花枝，茱萸树，饮菊花酒，佩茱萸囊，令人长寿也”，都与书仪所记有相似之处。其中八月一日的朱砂银盏很可能就是书仪所“说朱椀子”，与点炙杖都是有来历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卷三三引同书凡腊日上澡豆、纸及头膏、面脂、口脂，除无纸一项外其他与书仪全同。澡豆之用早见于《世说新语》等书，与面脂、口脂大约都是贵族用物，唐朝当腊日要将其物赐大臣《全唐文》卷二四二有李峤《谢腊日赐腊脂口脂表》，内“称因三冬之吉庆，造六宫之脂泽；糅之以辛夷甲煎，燃之以桂火兰苏”，说明当时宫里是三冬炮制护肤用品。由此得知赏物也是从世族到宫廷，再传播于社会的。卢公家范》的作者乃范阳卢僎，其书在《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有载。郑氏书仪与《卢公家范》的不谋而合，说明确是以世族家礼规范社会仪俗。其书序言并在诸家仪礼中突出了京兆杜氏，可能也是因出自京城的杜氏书仪比较能够代表当时取向，更具大家风范之故。

世族的家法和因此而建立的吉凶书仪虽具备了各自的特点，但其制作并不是自我封闭的。事实证明，因袭了优美学业的世家大族，不但以古三礼为基，也常常参举家法、旧仪指导朝廷制礼，
如曾有书仪问世的南齐王俭，齐高帝代宋，大典将行，礼仪诏策，皆出于俭。《南史》卷二二本传称“其弱年便留意三《礼》，尤善《春秋》，发言吐论，造次必于儒教”，朝仪旧典，晋、宋以来施行故事，撰次谙忆，无遗漏者。所以当朝理事，断决如流。《陈书》卷二一《卢奂传》记卢奂“当侯景新平，每事草创，宪章故事，无复存者。奂博物强识，甄明故实，问无不知，仪注礼式，笺表书翰，皆出于奂”。又如博陵崔氏崔浩、崔休等都曾为北魏朝廷治礼。《北史》卷二四《崔休传》记“休转长史，兼给事黄门侍郎，参定礼仪。帝曾阅故府，得旧冠，题曰‘南部尚书崔逞制’，顾谓休曰：‘此卿家旧事也。’”（以魏齐）禅代之际休子，参掌礼仪。一门婚嫁，皆衣冠美族，吉凶仪范，为当时所称。其子赡才学风流为后来之秀，孝昭帝除为太子中庶子。赡专在东宫，调护讲读及进退礼度，皆归委焉。太子纳妃斛律氏，敕赡与鸿胪卿崔劼撰定仪注，主司以为后式。

世族人士将传统仪式和世族家礼融入朝仪，使得朝廷正式制定的吉、凶、军、宾、嘉五礼实质上也成为具备家法成分的士礼。《宋书》卷一五《礼志二》：元嘉二十九年，南平王铄所生母吴淑仪薨。依礼无服，麻衣练冠，既葬而除。有司奏：‘古者与尊者为体，不得服其私亲。而比世诸侯咸用士礼，五服之内，悉皆成服，于其所生，反不得遂。’于是皇子皆申母服。’这便是朝廷礼制向士礼靠拢的一例。而从唐朝也不难发现朝廷礼制与家法结合的实例。《旧唐书》卷七三薛收等人传称赞几位唐初朝廷的礼学大家，其中颜之推“孙师古家籍儒风，该博经义，至于详注史策，探测典礼，清明白在躬，天有才格”，代为河西右族的令狐德“棻贞度应时，待问平直。征旧史，修新礼，以畅国风；辨治乱，谈王霸，以资帝业”。可见朝廷治礼本与家学渊源不分，所以古（礼三《礼》）、朝（礼吉、凶、军、宾、嘉五礼）实质上也成为具备家法成分的士礼。
军、宾、嘉五礼)和家(礼书仪)三者有机结合，实已融为一体。从所见南朝王弘、王俭等王谢之家始，至唐朝郑余庆、裴茞、裴度等郑裴大姓止，吉凶书仪的制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几为世家大族所垄断，而这些大族人士，又往往是称名一时、参与朝廷制礼的宿儒大德，这在中古门第社会未破坏之前是一个很突出的现象。

two, the government ceremony penetrated into the book of etiquette.

The funeral Book of Etiquette and the funeral Book of Etiquette, despite being centered on the family, the culture of the scholar-gentry was abundant. When the nobles did research on the three Codes of Conduct, set up the Five Rites, and compiled the Book of Etiquette, the ancient ritual spirit and government ceremony in the Book of Etiquette could not help but be reflected. They were able to see that there were many books of etiquette in the funeral examples and in marriage, which often followed the ancient ritual meaning, and often cited ancient ritual words as a basis, such as S.1725《 唐前期书仪》 and P.2622 张 劲《 新集吉凶书仪》 in the funeral part about funerals copied the 《 礼记》 (详" 丧礼程式")。 Since Zhang Jingtian's book of etiquette was largely based on the Yuan and Zheng family's book of etiquette, the two books of etiquette actually showed the ancient ritual修养 of the Tang dynasty.

However, the ancient ritual was always treated as a principle, and the government ceremony was more direct and specific in guiding the book of etiquette. Particularly, the Tang dynasty had made many changes in the government ceremony, and the风尚 and content of the book of etiquette were bound to be directly affected.

(一)唐前期礼的制定和书仪中的礼律

唐初制礼自唐太宗始。《 唐会要》卷三七《 五礼篇目》称武德初，郊祀享宴，悉用隋代旧制”，至贞观初，诏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徵、礼官学士，备考旧礼。著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礼五篇，总一百三十八篇，分为
贞观礼虽于古礼及隋礼改变不多，但它已奠定唐礼基础。特别是贞观十四年改定丧服制，进一步提出“礼所以决嫌疑，定犹豫，别同异，明是非者也。非从天降，非从地出，人情而已矣”，及所谓“随恩以厚薄，称情以立文”，更开唐朝变礼违古之风尚。高宗永徽二年（650），“又以贞观礼未备”为由，诏太尉长孙无忌、中书令杜正伦及李义府、许敬宗等重加缉定，勒成一百三十卷，二百二十九篇。此即显庆三（年658）所上显庆礼。高宗自为之序，诏中外颁行焉。由于显庆礼其文杂以令式，而义府、敬宗方得幸，多奉旨傅会。事既施行，议者皆以为非，所以上元三（年676），诏复用贞观礼，仪凤中，又要求并依周礼行事。由是终高宗世，贞观、显庆二礼兼行。而有司临事，远引古义，与二礼参考增损之，无复定制。武则天在位，又对宗庙、祭祀、籍田、丧服等五礼内容多所改制，而上述改礼内容多被后来的开元礼所综合。新唐书》卷十《礼乐志》称开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喦上疏，请删去《礼记》旧文而益以今事，诏付集贤院议。学士张说以为《礼记》不刊之书，去圣久远，不可改易，而唐贞观、显庆礼，前后仪注不同，宜加折衷。关于贞观礼制定时间，《唐会要》记作贞观七年，但高明士《论武德到贞观礼的唐朝立国政策的研究之一》考证为贞观十一成立。文见台湾《第二届国际唐代学会议论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1214页。第1159页②《新唐书》卷十一《礼乐志》，旧唐书》卷二一《礼一》，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08页《；仪志》，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17页。③《旧唐书》卷二七《礼仪志七》，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019页。④参见《新唐书》卷十一《礼乐志一》，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09页《；唐会要》本，第308-卷三七《五礼篇目》，中华书局，国学基本丛书本，第670页。
以为唐礼，遂下诏令学士撰定。至开元二十(732年)由萧嵩奏上，是为一百五十卷的《大唐开元礼》。从贞观礼到开元礼，是唐朝逐步以本朝礼取代古礼、旧礼的过程。其中的变礼内容也在同时代的书仪中留下痕迹，它便是残存在书仪中的礼律令式。例如S.1725唐前期书仪中“礼及令”一栏，在丧服制下载明了给假的四种情况。其中对“于继母改嫁、父为长子”等，规定“准礼齐衰期，给假卅日，葬五日，除服三日”；对于“高祖、曾祖”等规定“准令齐衰三月、五月，大功九月，并给假廿日，葬三日，除服二日”，以下递减。对照《唐六典》卷二“吏部郎中员外郎”下凡内外官吏则有假宁之节”条，知所“准令”者实即假宁令，内容且与《大唐开元礼》卷三《杂制·序例下》所载假宁令完全相同，说明是唐前期制度。对于书仪将假宁令置于礼后的作法，姜伯勤先生提出是显庆“礼其文杂以令式”的反映，并指出五服制度是礼与令的一个重要交叉点。而与令文相配套的服制，已经可以看到某些贞观十四年改礼后的内容，内关于礼制的不同记载反映了其时礼制尚不确定的情况(详本书第十二章)。

除了用假宁令反映丧服礼外，成于开、天之际的P.3637《新定书仪镜》凶仪部分“内族[服]图”及“律五服”两项说明文字。内族[服]图”下注云：凡三年服，十二月小祥，廿五月大祥，廿七月禫，廿八月平裳。凡周年服十三月除，大功九月除，小功五月除，细（缌）麻三月除。“凡”字是法令术语，其下应是令式的原文“。律五服”又规定说：《丧葬令》，称三年，廿七月[服]，匿，徒二年。称周，
十三月服，匿，杖九十。称小功，五月服，匿，杖七十。称缌麻，三月服，匿，杖五十七。两项内容概括了律令两方面关于为内族服丧的丧服时限及要求。律令是对礼的法律强制，书仪称引丧服律令的记载，有力地说明国家制度对社会礼俗的指导和干预。这件书仪的三幅内外夫族服制图，还以简单明了的方式记载了开元礼制定前后的变化。其中曾祖、父在为母、舅甥、嫂叔等服都与朝廷礼制内容相关，很可以看出书仪的制作，是参照朝廷开元礼前后变化（的详第十二章）。

书仪对于朝廷礼仪的重视还反映于笺表制度，对此我们将在官场礼仪部分再作介绍。

（二）贞元、元和的礼书再兴

《大唐开元礼》全面吸收贞观、显庆礼加“以折衷”，是有唐一代的辉煌礼典。但《开元礼》并不是变礼的结束，因为一方面它的修订使唐太宗以《今唐礼》代《古仪礼》《礼记》的原则得到发扬，变礼违古的作法在朝廷和社会阻力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开元礼》的制作与《唐六典》的制作有相似之处，是唐玄宗宣扬文治武功的产物。虽然制作的初衷是折衷两部前朝礼典，但它修订的时间至少持续六年之久；且受安史之乱影响，《开元礼》似始终未能正式向民间颁布。直到德宗朝，仍然“不列学官，藏在书府”，星周六纪，未有明诏施行，以至于“于效官者昧于郊庙之仪，治家者不达冠婚之义”，导致礼制变更多变而混乱，所以贞元元和时期出现了诸多①参见《唐会要》卷七六《开元礼举》，国学基本丛书本，第1396页《；全唐文》卷六（二）"代郑相公请删定施行六典开元礼状》，中华书局影印本第6326页。
恢复之举《新唐书》卷五八记这一时期的公私礼书有颜真卿《礼乐集》十卷、韦渠牟《贞元新集开元后礼》二十卷、韦公肃《礼阁新仪》二十卷、王彦威《元和曲台礼》三十卷（其后又有《续曲台礼》三十卷）、王泾《大唐郊祀录》、裴瑾《崇丰二陵集礼》等。从“新仪”、“后礼”、“集礼”等名及史籍记载看，这些礼书在部分复旧的同时，也大量增加了开元以来变礼的内容。如韦公肃《礼阁新仪》是记开元中至元和十年的沿革损益。元和十三(年818)八月，太常博士王彦威上《曲台新礼》，集开元至元和仪制；此后，“他又采元和以来至长庆典礼故事不可者，益以王公士民昏祭之礼，为《续曲台礼》三十卷”。

这些礼书后来大都作为朝廷正式行礼的借鉴和参考，显示了它们的仪注作用。

贞元、元和礼书的一个特点是其内容具体实用。为了向民间推出，也采取了与书仪结合的形式。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是反映这一倾向最全面的著作，说明与朝廷活动同时，也在酝酿制作向民间普及吉凶礼教的综合性大型书仪。本书上编已介绍，郑氏书仪的三十项仪目，包括传统的妇女、僧道等家族、朝廷、官场面面俱到，很能说明中唐时代的礼仪特色。在朝廷仪制方面，除诸色笺表、国哀奉慰外，又有诸如《公私平阙式第三》《祠部新式第四》等相当独特的内容。

平阙是写文章时遇到某些名词要提行另写，或空格缺字。平指平出，即抬头；阙指阙字，是文章中对某些人事示敬的一种方式。平阙并非唐人的创造，在各种官文书中对于皇帝的称呼称号和有

①参见《唐会要》卷三七《五礼篇目》，国学基本丛书本，第671页；《玉海》卷六九，江苏古籍和上海书店影印浙江书局本，1988年。
而唐朝定为制封朝廷的尊美之辞要抬头的作法已见于汉代。见于《唐六典》卷四礼部郎中条，记“作凡上表、疏、笺、启及判、策、文章，如平阙之式”。与《唐六典》的开元平阙式相对，敦煌P.2504《天宝令式表残卷》也著录了天宝时代的平阙式，包括“平阙式”、“不阙”。而本件书仪所载至少式“新平阙令”、“旧平阙式”四种应为元和平阙式。郑氏书仪中的平阙式分为公私两种。公者，涉及皇天后土、宗庙社稷等关于帝王与国家的各类语词。与开元、天宝式比较，可以发现郑氏书仪在原有公平（阙即抬头或平出）词汇中增加了“大道、至道”等，在阙字的词汇中也增加了“睿哲、丝纶、禁苑”等二十余新词，总的说须平阙的词汇扩大了。敦煌书仪本身的应用也有发展过程。从较早期的P.390《武则天时期（？）书仪》内《庆正冬表》“陛下”一语下便注明“此须平阙”，在“阙庭”下注明“此须阙”二字。同件中见到的平阙还有圣略、天威、制书等，杜氏《吉凶书仪》内凶表启中见到的有大行皇帝、圣情、谥皇帝、陛下、大行皇后、尊某位王（公指皇后亡父，亡母云尊夫人）、睿情、圣怀、敕、制书、圣朝等，《书仪镜》有圣上、圣恩、天恩等，大致与开元、天宝式规定相差不远。但晚唐五代显然是沿着元和的趋势继续发展，除以上词汇外，仅《记室备要》就有册命、徽号、鸿猷、皇威、圣历、邦家、社稷、字样，郑氏书仪已非原本而应为大和抄本，故平阙式是大和式。但抄本只应在原作基础上。
宝历、国风、明制、昌运、宗社、圣祚、乾坤、圣谋、台首、唐虞、皇情、尧舜、英贤、圣虑、东宫、君、帝帏、宠泽、朝论、圣泽、皇王、国恩、天眷、睿泽、圣旨、宠锡、彤闱、圣颜、帝心、天意、金殿、玉阶等数十种，可以说有关皇帝和朝廷的形容词语无不在其内，这当中词汇的创造自然不能免除文学色彩，但说到平阙，恐怕早已冲破了格式的约束。这种情况和唐朝避讳的发展其实很相似，即避讳和平阙都是从开始的小范围和有局限性发展到一种滥用，并且不仅涉及皇帝的公平阙和避公讳是如此，私平阙和避私讳也在其内。

私平阙是用于家庭内外和尊者的。在郑氏书仪中出现了如“高祖、曾祖、祖、翁婆、外族、耶娘、兹（慈）颜、尊亲、尊体、动作、起居、寝（善膳）、伯叔姑舅姨、桑梓、坟垅”等“家私书疏准式并平阙”的诸多词汇。又在这些以下，列举诸如“墓所、（营茔）所、殡所、坟土、墓侧、（告？）人、考妣、家君（？）、先代、所贴、所符、高门、曾门、大门、昭穆、兄姊、诲示、告勒、问及、示问、勾当、处分、（丞承？）家、阀阅、动静、履体、尊者、所履、丈人、丈母、庭训、庭闱、恩造、□寿、命□、高命、感慰、永感、永慕、长者、仁惠、仁（兹慈）、（兹慈）流、雅旨、徽猷、雅致”等四十余词，由于有脱文不明其意，但据唐后期书（仪如张敖书仪）涉及这些词是在可不用平阙与不用之间，推测是属于私家酌情平阙的范围。

私平阙在唐以前的家私书疏中可能已有之。王羲之有“日月（如驰，嫂）背弃再周”一帖，末有“痛贯心膂，痛当奈何，计”语；又有“慈颜幽翳垂三十年”一帖。清人认为两帖应合之。理由是“慈颜以母故，越行耳”。然特意提行或阙字的作法传世唐人法帖中并不多见。开天书仪则有之。杜氏《吉凶书仪》的《与外祖父母书

---

①《淳化阁法帖考正》卷六，王澎撰释文，沈文骞校定，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刻本。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31

外伯叔祖附之》“在不审翁婆”下注“云并平阙”，在《与极尊书》不审尊体何如”的“尊体”下注曰”并平阙之。继父称号，父友称丈人，师尊临时所称”是对尊长者应用平阙。但如对耶娘、伯叔姑舅姨及对亡人等却都未用或具体注明用平阙，是私平阙的用法尚不甚严格。另外很明显，在同件书仪百官给皇帝的期亲丧奉答敕慰表、谢父（母或期亲）丧蒙赠表中，官员提到自己的父祖亡人都是不用平阙的，这可能也是有些类似公所无私讳的道理。开、天以后私平阙的词汇却显然增加。例如《新定书仪镜》中，实际见到的平阙就有耶娘、丈人丈母、亲家翁母、妻姨舅（姑返书称刳郎厶娘”也平阙）等，阙字也有俗人称僧人“的阇梨”、妻对夫“称次郎”（“如五郎”）、媳妇称公婆“的 大君大姑”和对长辈用“的动静”“动息”等慰问语。凶仪凡例还特别说“明凡凶书，论亡者无问尊卑，皆为行首平阙，以幽明有异，重亡者也”。但从书仪所引卢藏用《仪例一卷》和《通例第二》《四海吊答第三》的部分，都不曾谈到吉仪或凶仪对致书对象和尊长的平阙问题，似乎表明当时对私平阙规范还不是很严格。所以郑氏书仪中“准式”的“私”平阙就显然进了一步，它可以说是法制的延伸，说明元和时代致力于国家统一，民间的礼仪也被规范化。

不过唐后期平阙词汇在具体运用中仍不是很固定，据论者关于墓志中平阙的研究，无论公私两者都带有时代的政治色彩和特征，特别是越到唐后期，私平阙中除了家族之外，用于上司长官的情况也越来越多，这反映了礼的平民化倾向。敦煌文献中也可并见黄正建《平阙与唐代政治》，载韩国《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纪念唐史论丛》，1995年，第141—154页。
以证明此说。其中用于上司长官的“官”平阙，在郑氏书仪虽没有从朝廷礼制作特别规定，但上述私平阙中的一些词汇如所贴、所符、告勒、示问、勾当、处分，乃至恩造、仁惠、雅旨、徽猷等事实上已涉及到。在此之前，从《书仪镜》的一些边将往来书信中已见到称对方官位、官名一定要抬头阙字的情况，郑氏书仪以后显然已不止于此。如郑氏书仪在僚属起居启中特注“明 凡启中有起居字,得通融上头平阙”,可见僚属对长官,已类同于子孙对家内尊长。而从唐后期五代书仪中,可发现不仅对长官的官称,且一些相关形容和指代词都要平阙或阙字,如恩眷、殊怜、恩顾、知眷、眷(爱 见《记室备要》)、台阶、台旗、台(幢 见《新集杂别纸》)、吹嘘、剪拂、保荐、起居、功勋、阶砌、台慈、台严、台恩、台庭、台遇、台旨、钧命、钧诲、仁德、恩荣、周眷、照察、英聪、陶(铸 见《刺史书仪》)等,其中用平阙最多的是《刺史书仪》,几乎形容长官的一切词汇都要抬头阙字。特别是对节度使,发现不仅是对面称呼须平阙,甚至在提“到 节度使”三字时也用平(阙 见《新集书仪》“中 附本道节度使起居”、每到州郡见节度使礼”),反映了藩镇政治下“的官”平阙特点。

“祠部新式第四”记载了两项内容。一项是关于高祖以下九庙帝后的忌日,说“明 右件国忌日并废务行香。自大和元年今上帝登九五,复令京城七日行香,外州府百[姓]行香行道”。郑氏书仪是元和所作,但是忌日内竟“有 宪宗元和圣文神武法(大 天)应道皇帝(按此用尊号)忌正月廿七日”“、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 按此用谥号)忌正月廿二日”之文,“且 大和元年”又是文宗登帝位的年号,只能说明书仪不是原本,而所谓新式乃是在钞写中增加了大和制度。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州，并宜国忌日行香。"在此之前，敦煌P.2504卷天宝令式有"国忌”，明令宣帝以下九庙帝后忌日”，京城七日行道，外（一亦？）七日，并废务”；章怀太子、让帝、孝敬帝及后忌日则"是设斋、废务”。《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鱼朝恩传》记章敬太后忌日，百僚于兴唐寺行香《。唐会要》又记开成四年十月户部侍郎崔蠡"奏国忌行香，事不师古”，请予罢废。时武宗初即位，敕旨准行；至宣宗即位予以恢复，直至唐末昭宗忌辰，百僚仍赴寺行香，太常请为永式；是唐后期除武宗一朝国忌都有行香。S.563《7诸色篇第七》“有国祭·睿宗皇帝忌”，P.2854留下了河西节度使张议潮奉为先圣某皇帝（睿宗）及为先圣恭僖皇（后唐穆宗皇后）举行远祭行香文，也为制定度的实行留下佐证。

国忌行道、行香关系唐人宗教信仰，此即武宗敕所"说近代以来，归依释老，徵二教而设食，会百辟以行香，将以仰奉圣灵，冥资福祐”，是利用宗教乞求冥福的一种仪式。但是将此内容列入书仪主要不是从宗教出发。国忌须遵从唐朝的九庙之制。九庙玄宗时定尚有宣帝、光帝等，皆见于天宝令式。但永贞（初805年）据礼仪使杜黄裳礼官王泾等奏仅以太祖景皇帝、高祖、太宗祔庙为万世不迁之主，以下父死子继，按昭穆依次祧迁，保持九庙之数，成为唐后期祔庙的一个原则。书仪的九庙帝主就基本反映了这一原则。

只是文宗与穆宗是兄弟，穆宗方死，文宗没有办法将他从宗庙中取出，于是就只好将太祖暂且取消，仍合九庙之数。国忌行香体现唐朝现行国家宗庙制度的最高权威，须官员百姓遵守执行，所以书仪①参见张广达《：“叹佛”与“叹斋”》,载《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第68—69页。

②《旧唐书》卷二五《礼仪志五》,中华书局标点本,第954—956页。
才将之列入。
书仪的明确国忌还有化俗之意。唐代的国忌、私忌家国一体。私忌是父母的忌日,开元假宁令规定“给假一日,忌前之夕听《。 封氏闻见记》引沈约《 答庾光禄书》,以“为 忌日制假,还”应是
晋宋之间,其事未久。“又引颜之推”言 忌日感慕,故不接外宾,不理
庶务。(不 必 ?)能悲怆自居,何限于深藏也”,以为不能徒具形式。
《 唐律疏议》卷二六《 杂律》规定”:诸国忌废务日作乐者,杖一百;私
忌,减二等。”但是唐人不知或不能严肃对待忌日的实有不少《。 朝
野金载》卷四记国忌日因众人聚会,考功令史袁琰充录事勾当,竟
”判 曹司繁闹,无时暂闲,不因国忌之辰,无以展其欢笑”,公然把国
忌当成公堂欢聚的日子。而德宗时驸马郭暧等皇亲国戚更因代宗
忌辰 。所以书仪强调忌日也是强调礼于宅中饮酒作乐被贬官
法。P.2622张敖《 新集吉凶书仪》称,地方官“员 或遇父母忌辰,如
官者,至前一日晚衙,令官典申状请假:' 厶
乙 牒
厶官 ,厶明日远祭,
伏请准式处分,谨牒。厶年 厶月日厶官姓名牒。'请假讫,即别厅下
帘幕,巾而不栉,敬念读经,思惟惨怆。令子弟勾当设斋。至晚衙
后,烧钱财讫,兄弟子侄于中门外(娶 聚)泣,相慰即散。如有亲故
宾客相慰,但俛首嚬感微泣,不用高声。”可作家忌仪式参考。
郑氏书”仪 祠部新式”第二项内容是关于正月十五上元、七
月十五中元、十月十五下元“的 三元日”准令格”休假”,并宫观行
道,设斋役金龙“的规定,由此在下面征引假宁令的详赡令文。关
于假宁令《, 唐六典》卷二吏部郎中条《、 太平御览》卷六三四《 治道
《 唐六典》卷二尚书省吏部,中华书局标点本,1992年,第35页。
《 唐会要》卷二三《 忌日》贞元十二年五月诏,国学基本丛书本,第449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35

部·急假》及敦煌P.250《4 唐天宝令式表》都有记载，仁井田陞《 唐令拾遗》据此复原为开。书仪中元七年和天宝二十五年假宁令的假宁令主要取与节假有关的内容。与开天假宁令比较，可发现有不少增改。例如三元日原定各给假一日，改上、中元增为三日；“寒食通清明”原定四日，改作七日；此外，”玄元皇帝降诞二月十五日，今上降诞日”，并准敕休假一日”；二月一日中和节、二月八日悉达逾城日、四月八日佛诞日等“也 准令休假各一日”。其中，皇帝的诞节休假，实自开元十七年始。三元节的出现与道教有关，玄元皇帝即老子的诞日也在天宝五年因陈希烈上奏而定②，道教及佛教节日明显在唐后期受到重视。“寒食通清明”是由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敕改休假四日为五日，贞元中增为七日的③；二月一日中和节也是因德宗认为“以晦为名，非佳名色”，才由李泌上奏，改以取代晦日，并与上巳、重阳合为唐后期三令节。书仪引假宁令称“准敕”、“准令”、“准令格”等，清楚地反映了制度修建的过程。

书仪以令式反映朝廷礼制，表明了唐礼与令式不可分，而且存在着以礼入格式，以后式破前式等问题，说明礼制是在不断修改。书仪征引令式意在用朝廷制度引导百姓生活，所以只是引用令式之与书仪、与官民百姓生活有关者，如引平阙式、祠部式都很典型。书仪在引述假宁令时，中间还插有许多节令习俗，夹叙夹议，与假

《 唐令拾遗》，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第732—736页。
《 唐会要》卷八二《 休假》，国学基本丛书本，第1519页。
《 唐会要》卷八二《 休假》，国学基本丛书本，第1518页。
《 类说》卷二《 中和节》，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本，1993年。
关于节假详细变化及来源参见丸山裕美子《 唐宋节假制度的变迁》《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中华书局 2001年 第366—373页。
宁令融为一体，显示出书仪的通俗性及与民间结合的另一面。郑氏书仪由于是大臣礼官所作，又记录了诸多朝廷礼仪令式，所以它的官方色彩似较以往书仪为浓厚，在当时和后来都受到重视。祠部式中大和式的出现，说明修改者也是可以接触朝廷令式（P.2622）张敖《新集吉凶书仪·凶仪卷下》尚有关于三品至庶人坟高的规定以‘及人居父母及夫之丧而嫁娶者，准律文徒三年，各令离之；若居周之丧而嫁娶者，杖一百’的律条，应也抄自郑氏书仪。故后者实具备了类似正式礼书的意义，在礼崩乐坏的唐末五代，便常常被作为参照。可见书仪在郑氏之后已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正式礼书，这当然也是因晚唐五代朝廷无正式制礼而造成的。
吉凶书仪是仪注性质的礼书，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教人如何依照应有的方式写作书信。与此相关，书仪所面对的乃是复杂的家族关系以及多层次的社会关系。其内容种类如果不算用于朝廷皇帝的吉凶笺表，又有内外族、妇人、僧尼道士、四海书仪等，如何在不同的书信中，通过种种等级、程式乃至于语词、称谓以体现亲亲和尊尊之意，不消说是礼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掌握了这些仪范，从世族社会到官僚社会的某些礼仪要素也就十分清楚了。

一、书仪的制作程式与等级规定

书仪的制作程式决定于它所要体现的等级序秩。在家族内外决定尊卑等级的是长幼亲疏，但在社交场合是官品高低，这是中古社会颠扑不破的原则。书信的种种写作格式，乃至于信首信末的月日称呼、信封的封题包装，无不显示着等级的重要性。

（一）书仪对象和等级的确立

围绕家族形成的内外族是吉凶书仪的首要对象，即包括父、母、（妻夫）族的一切五服内亲属，杜氏《新定书仪镜》中有三幅丧服
图对这些亲属可作说明。常见的内外族吉凶书仪致书对象是祖父、母、父母、伯叔姑、兄弟姊妹、子侄孙及外祖父母、舅姨、表兄弟姊妹、妻、妻父母、女婿等。妇女书仪致书对象是妇女的娘家与夫家亲戚,如己父母、兄嫂、夫、夫父(母)、妯娌等。这两种书仪显示了从男女两种角度出发的家族关系,有很大的实用意义。僧道、四海书仪针对唐人社会生活的外部对象,其应用自然十分广泛。书仪对象一旦确定,书信的等级便随之形成。《新定书仪镜·通例第二》称“凡书于极重处不可自言感恩,直叙重者之意。于极轻处只自叙,亦不论轻者之心。于平怀处及小(重 轻)则彼此俱论。”下文又将(大 极)重称为尊长,轻者称为卑下;大重或极重(致尊长)、小重、平怀、小轻、极(轻 致卑下)即内外族中被规范的五等。根据书“仪凡父之党称尊,兄之党称长”的规定,其家族内外的轻重原则,相当程度上是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亲疏及年辈高低,按照这一规定家族内外凡父兄、祖父母、外祖父母辈都应当是大重,但是实际上也要根据情况在程度上有所区别,这一点在凶书仪中体现得更明显。《新定书仪镜·四海吊答第三》谓“凡五服哀辞惟有三等,重、中、轻,重者父母、嫡孙承重为祖父母;中为祖父母、外祖父母及诸尊长等;轻为儿女弟妹及诸卑幼等,间虽有服制异,而哀辞同也。”其重、中、轻者,须视死者年辈及与服丧者关系而定,近而高者为重,否则为轻,其中年辈尤为重要。同样的等级规定,在四海书仪“被尊”、“稍尊”等名义所代。如前已指出P.3442《吉凶书仪》便有四海吉书仪五首,分别为极尊、稍尊、平怀、稍卑与极卑五等,对象包括远亲尊长、朋友和己所从事、交往的官员等,其中论尊卑年辈亲疏和官品混通而言之。不过到了《书仪镜》的《四海书题》,“其重书”、“次重书”都是以官位定
高低（重书特别标明是宰相至三公九卿等朝廷重官和节度使太守等地方要职，已见前述）。P. 3502v张敖《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赐官阁下”、“乙状书题样”的五种封题规格“为绝重云：谨谨上”、“乙官封”、“次重云：谨通上”、“乙状封”、“次云：通上”、“乙状封”、“次云：通送”、“乙敬封”。从“谨谨上”到“通送”，封题形式虽基本一致，但根据官品，称呼从阁下以下依次递减，表达尊敬程度的用语亦不同。因此有亲者论以血缘亲疏及年辈的“轻重”，无亲者论以官爵高下“的“尊卑”，成为开、天以后书仪之常规。

（二）书范常式和写作规格
书信的写作围绕尊卑等级而进行，不同的书仪已有固定的模式。就一般书信而言，不外信函及封皮两部分。信函的格式是由写信双方的关系而定。给尊长或平怀以上的信函一般以自称开头。例如杜氏《吉凶书仪》之《与外祖父母书外伯叔（□祖）附之》，首“称言名”，以下“是违离稍久，私恋恒积”，“孟春犹寒，不审翁婆尊体起居何如”之类寒暄问候起居语，然后是一些祝愿及自叙的话，最后“谨言疏不备，名再拜”或“某氏外孙女再拜”结束。如果尊长对晚辈则不称名而直言其事。例如同件书仪的《与子侄孙书》，开头就“是不见汝久，忆念萦怀”，结尾也不称名而“是翁婆耶娘次第伯叔姑告”，上对下的气势一望而知。凶书仪如告哀、吊答书等无外乎叙亡人之死，表达悲哀之情，其书仪处处以亡人为重。用语不同，但开头结尾却有许多相似之处。唐人下对上或表恭敬的书信，信首称名是一般习惯，亦是相沿汉魏以来传统。较早的书信即“有某某致某”，即由致书人拜上收
书人的形式。如司马迁《报任安书》：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这句开头语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被省称“为少卿足下（正像李陵《答苏武书》也称子卿足下）一样显然多未仿照此式，反倒是将收书人省去，惟剩作书人自称了。而在特别郑重的场合，也可以保留古式。如《法书要录》卷十的一帖：
十一月四日右将军会稽内史瑯玡王羲之敢致书司空高平郗公足下皆其例。唐人于此种书法亦有继承。如《文苑英华》卷六七○萧颖士《为邵翼作上张兵部书》称月日，应武艺超绝某乙谨上书侍郎公执事（卷六七二韩愈《与于襄州书》称七月三日，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谨再奉书尚书阁下），李华《与弟吉书》也以三兄报汝开头。唐人取此式似有复古之意，不过这种称呼比较正式，其形式虽魏晋隋唐皆有，但不见于书仪，可能是由于它不够简约而不适宜家族和社会上一般书信的应用，所以就有了信首仅用自称的省略。这种形式南北朝以来最多，见于书仪正说明它的普及性。

民间所用吉凶书仪大体都少不了寒暄语。寒暄语是书仪程式化的一部分。吉仪如给长辈则先要说一些“违离稍久，私恋恒积”或“者旷奉稍久，延系唯积”之类的话表达想念之情，然后结合季候用语问候起居平安，用“伏惟××万福”或“伏愿动止康和”之语表达祝福安康之意，最后是报告自己和家人的近况。给小辈的信有些客套话可省，但仍要通过祝福以示关怀。凶书仪在重叹亡人或表达悲哀之情后，也要“有孟春犹寒，不申尊体如何”的问慰和适当合理的祝愿。由于这些寒暄语是根据身份和关系的不同挑选用词，所以其间有“有孟春犹寒，不申尊体如何”和适当合理的祝愿。由于这些寒暄语是根据身份和关系的不同挑选用词，所以它们的用词有许多不同。例如，给长辈的书信中可以使用“违离稍久，私恋恒积”这样的寒暄语，而在给小辈的书信中则很少使用。
寒暄本身已是一种固定的礼数。如传世唐人法帖《褚庭诲书》内“有辞奉后不辱问,实增驰系。初寒,惟动履休胜。庭诲推(前按推前即推遣,详后)耳。(末由)展拜。悠悠下情,惟珍厚”的祝问与开元杜氏《吉凶书仪》的内外族、四海书仪寒暄方式、用词极其一致,可详下语辞的讨论。褚庭诲即开元时人,书仪的寒暄语反映了同时代实用书信的风格。

书信一般都有结尾语。周一良先生注意到,唐人书信末尾常有“谨空”二字,后在日本尺牍中也常见,指出它的意义是卑者对尊者致书,尊者在纸尾答复,称为。中村裕一也分析了空批反海、冈仁和颜真卿书札,及书仪中的各种谨空、敬空语的应用查《世说新语·政事第二》一条谓王导:“丞相末年,略不复省事,正封箓诺之。”余嘉锡笺疏引《文选·晋纪总论》注中刘谦《晋纪》应詹表谓:“元康以来,望白署空,显以台衡之量;寻文谨案,目以兰薰之器。”“望白署空”当“即谨空”后的尊者批反,是有身份、有贵族气度的表现。所“以谨空”之语至晚起自东晋。这种公文之后长官或尊者批反的作法很可能一直延续到唐后期官吏的别纸。李匡文《资暇集》卷下提到:“大僚纸上题签,起于丞相李赵(公李吉甫)也。元和中,赵公权倾天下,四方缄翰日满阍者之袖,而潞帅郗士美时有珍献。赵公喜,而振武别纸则附于(潞按此句似应改“而潞之别纸则附于震武”)。时阿跌光(进李光进)帅麟,览盈幅手字,知误,画时飞还赵公。赵公因命书吏,凡有尺题,各令签记以还,故于今①《淳化阁法帖考正》卷四,乾隆三十三年(1768)兰斋刻本。周一良《: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原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后收入《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③中村裕一《:唐代官文书研究》,中文出版社,1991年,第492—507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成风也。这段话大致是说，李吉甫把泽潞的别纸放到该给振武的信中去了，所以以后就有了大僚纸上题签、签记以还的作法，说起来其实仍是尊者批反。但是就谨空语本身看，唐代似乎不仅用于官场，也不一定要用于尊者。如杜氏《新定书仪镜》用于给亲属特别是妇女之间。《书仪镜》重（书卑对尊）、次重书（稍卑对稍尊）不见用，但答（书尊对卑或稍尊对稍卑）却都用了，不知是否属唐代的一种变化。

除谨空之外，根据开元杜氏《吉凶书仪》，一般给尊者或平怀以上的书信还常常用谨言疏不具、谨白疏不具（凶书仪”是谨白疏鲠塞不次”、谨言疏悲塞不次”等）之类语加上名再拜”、名白”一类的署名结束。这与官场酬应书状中常见伏惟照察”、谨奉状起居不宣，谨状，月日姓名状上自然不同。但是到了后来，官僚习气影响民间，某些民间书信也很可笑地模仿起官文体裁，弄得书信看起来都像官牍。例如杜氏《吉凶书仪》妇人《与夫之祖父母父母书》称：即日新妇蒙恩有（限”有限”衍）末由拜觐，伏增驰悚，伏愿珍重。今因信往，谨言疏不备。大新妇再拜。”但是到了晚唐河北的一种吉凶书仪》”中妇人书题上翁婆状”，差不多的话就变成了伏惟照察。拜觐末由，伏深恋结。谨因使，谨奉状不宣。次第新妇再拜。”敦煌S.76v”有宗绪与从表兄状二通”，其一状末也用阁下谨空了伏惟照察不宣从表弟潘复状拜上秀才十三兄”语。欧《与陈员外书》论其时代”将状牒之仪，施于非公之事”的情况，认为其原盖出唐世大臣，或贵且尊，或有权于时，缙绅凑其门以傅响者，谓旧礼不足为重，务稍增之。然始于刺谒，有参候起居，因为之状。及五代，始傅以候问请谢，加状牒之仪，如公之事。然只施于官之尊贵及吏之长者。其伪缪所从来既远，世不根古，以为当
然。居今之世，无不如此而莫以易者，盖常俗所谓积习已牢，而不移，今人所称正是官牍流于民得以更之也。俗的过程。不过从书仪看至少晚唐时代已不“止施于官之尊贵及吏之长者”，而是普通百姓皆习染之。

吉凶书仪的信函之下往往列有封题。封题是信封上的题签，注明收信人和寄信人。一般的情况是以右或上为尊。如前揭第一信属卑对尊。封题有两行文字，一行“称 谨封”，另一行“称 外翁婆名言疏，女[云]某氏外孙女言疏疏”上题收信人尊称，下（即小字注文）署己前几名讳。尊对卑则反之。如同一书仪的《与外甥孙书》封题“是 封外孙外 发云”两行，右是翁婆姨舅书“和 某乙省 作为尊长的写书人自称，左为对方即卑者名讳，省、发都是尊对卑不客气的用语，充分反映了上下尊卑之间的区别。但是情况不同规则亦不完全一样。例如男方方向女方求婚的通婚书封题就是男方在右而女方在左，只是称女方“的 谨谨通某姓位公阁下（左行）比男方自署“的 郡姓名白书”（右行）位置稍高一些。答婚书则女在右下男在左上，两家署名位置恰好相反。这种安排和同件书仪中《与稍尊书》相同，不知是不是否暗喻男女两家相对平等而抗礼的一种表示。

书仪中各种等级的公私信函封题写法还有很多。除了要特别注重官称等级之外，也都须讲究封题在信封上的位置甚至包括信封的折法。如P.2646张敖《新集吉凶书仪》吉“仪（寮 僚）属起居启状等”的封题样，以竖线划格分成两行，中间又有横线分为两栏。右一行上栏“称 谨上 官位”，下栏紧接“为 阁下 厶官阶厶乙启封”，另一行空。右上与右下角各有折线一道，似乎暗示应予①《欧阳永叔集》八《居士外集》卷一六，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简编本。
周一良先生曾将这种做法与日本古代书札中见到的切放式、切悬式等缄封方式作过比较，推测唐代可能是用折封方式，把上下向后折的部分用浆糊粘住，拆封以后，封皮上正面和背面的字偏向一侧，封皮的另一边还可裁供使用。至于封皮中间的横线，周先生提出不知是否与日本‘切放式’或‘切悬式’的长条纸纽有关，而不认为是《启札青钱》所说红线束腰式的礼仪性装饰。但是封皮上的横竖线似乎固定了收寄双方题署的位置，并且不同书信封

---

①周一良《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载《唐五代书仪研究》，第336—337页。
皮角上的折线方向和位置不完全相同，似乎是在捆扎的同时另有吉凶其他用意的分别，而不像是简单的粘贴或折封。关于此，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另据周先生考证，书函的封皮并不是有如今天的信封，预先糊制好筒状纸袋备用，而是写成后才求“纸缄封”，即把信整个封起来，因此封皮较大，甚至可以“废物利用”。又指出封皮原本是一层，但据传世司马光《书仪》有重封的形式，其重封的意义是报平安。这种重封实则《书仪镜》中《四海书题》“的重书”已见使用。

阁下其封“题行官位姓名状上封”一行下小字注云“重谨谨上位公封，官位姓名状。至厶所，去皮送厶官。”重书在书信中规格最高，所以用重封的意义看来主要是表示郑重。为何要“去皮送厶官”？推测除讲究形式和包装外，也是为免里面一层弄脏、弄坏或遗失。所以在长官看时，便须把外封去掉。当然最高规格的礼书还有蜡封甚至以木函缄装者，蜡封可见P.3900《唐前期书仪（武则天时期）》中《庆正冬表》，在题函面语下注曰“函侧右畔题云：谨上京都神都门下。已下表头尾题函并与此同。其有表进者，印蜡上，其行军头出使无印者蜡封上全函，其□官及使人在外应奏事者，但修状进其（□状）如前。”木函缄装者在书仪中见到的也只有给皇帝的表状和民间的通婚书，而且都是在唐后期。S.6537v郑氏书仪“诸色笺表第五”有“封表极式题表极式”“上四方馆牒式”和“转牒式”三种相关公文程式。其中“封表极式”是讲表的笺封。先标明封题“是某道节度观察刺史阶勋封姓名（录？）上中书省馆奏事”，说明

①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载《唐五代书仪研究》第59—61页。
②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定补》，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32—233页。但题表函面语应与奏事状分开，故此处不取下文。
表是递上中书门下的。然后告知包装必须将“表从后紧卷至头，勿令心空”，加有封题的一色纸纳表纸数入黄杨木做的函内“约?”多少，遣之讫，安表纳函中。“再加三道线缚面上”，系定以白蜡填之，火炙，刀子削平，当心书“全”字。书了“全”字的表函最后还要着一片盖板，重三道缚之，以防磨损，与四方馆牒一起放入毡袋，布裹封题发遣。严密的包装，充分地显示了这个极式隆重性。至于婚礼中通婚书的礼函大概也可代表民间的礼仪极致，其质地和包装都与此有相似之处，可详见本编婚礼节的论述。

二、卑辞、敬语的使用及其改革

书仪的语词称谓是吉凶书仪凡例一项的中心。书仪的等级性更多地是从语词称谓的用法上显示区别。唐前期的语词称谓基本延续南北朝，但在开、天前后已经开始了某些改革创新，这些改革创新结合四海类书仪的增加，不仅有如前人指出的礼制用平、趋轻的简约化、庶民化特征，而且某些词汇的使用也有着趋于官僚化的色彩。

(一) 卑辞、敬语和书仪中的一些特殊词汇

以上信函和书封的写法都涉及一些用语问题。《颜氏家训》称“江南轻重，各有谓号，具诸书仪。按照尊卑轻重区分称谓乃至语辞，是书仪具备的一项重要内容。吉凶书仪的吉凶部分大都有凡例、纂要诸目，对它们的用法有集中说明，而在每件书信应具体运用的场合也有明确的区分。书仪语词运用的一个特点是不同等级之分。书封的"谨谨上"、"敬谨上"等。
“谨上”、“通上”、“通送”常常只是一字之差，但两个“谨”字尊敬程度超过一个“谨”字，“上”又高于“送”，表达的含义尊卑有别。信函内的用语也是如此，对不同关系的人须以不同的词汇表达敬意或关怀之情。《新定书仪镜》“通例第二”称：“凡书末，尊行皆告，长皆报疏，长加敬字；舅云问疏，加丈人云敬，谓女婿云白，平怀云谨咨，小重云呈、云疏，皆为姑族以上”。"尊行"、长两句指上对下，其他则是下对上，不同的词汇相对的等级关系不一。书仪在选择词汇时便很注重的是表达的准确性，即必须根据尊卑等级而显得不卑不亢。凡下情不（具）不宣、伏惟、伏愿珍重等语，通施尊长，自叙皆蒙恩……凡惟仰、驰系、旷奉、辞奉、安悆、奉问等语，皆是平怀施小重，自（外）外衍叙亦可云推免。凡倾仰、枉问，白书、勤仰、咨叙、翘企、所履清适、休宜、敬重、敬厚等语皆平怀，自叙得云诸弊等语。凡如宜、佳适、佳致、叙对等语皆小轻。论卑下云佳键、无恙。凡忆念、佳宜、不多、不悉皆施卑下。"这些都是根据等级规定的书辞用语。同样，在表达悲哀时，也要用语言暗示分寸。一些自虐的词语如攀号、荼毒、号天叩地、无状罪逆、不孝酷罚一类是专用于父母之死的，决不能用于其他亲属甚至是祖父母，而即使是自己心爱的子侄孙死也只能用仓卒、夭折、陨逝、夭逝、悲痛等语，说明用礼有节。又如凶仪规定无父称孤子，父在无母称哀子等，但这只可以孝子对父母自言，或被他人指孝子之称，给九族亲的告哀书或吊仪中就不能用了，说明要注意对象场合。

书仪语辞运用的另一个特点是有谦敬之别。对己自贬自抑，用谦辞、卑语；对人则须加颂扬，用嘉词、敬语。如伏愿、伏惟、拜觐和诸弊少理、下情一类只能用于自己；而佳致、胜常、胜豫、尊体、所履清适等语用于对方，是一般礼则。所以即使是尊者对卑者或平
书仪的套词套语除有上述已论述的吉凶尊卑、对人对己场合的不同，又可以按表达含义区分。比如有些词语是专门用于开头结尾的，如言、白、咨、报、告、再拜等；有些词是形容离别的，如旷奉、旷觐、阙展、违奉、违离；有些是表达祝愿的，如伏惟、伏愿、动止静悆、安悆、胜常、安和、康豫、休宜、佳适；有些词是表达想念恋慕的，如驰系、翘企、翘轸、驰结、驰恋、延咏；有些则是表达敬仰和赞颂的，如惟仰、倾仰、诚仰、敬重、敬厚等。书仪中表示悲哀、慰问等专用语也各不相同。以下仅对一两种较少见而用法不甚为人所知者略作解释。

1. 支福、支胜等

《新定书仪镜·凶下》（《书仪镜》同）凡例五十条有曰：凡前人有大功以上服通吊书，极尊云支福，次尊云支豫，稍尊云支胜，平云支适、支常、支祐，卑云支度、支遣。

按：从凡例可知以上词语为吊书所用，相同处是均“含支”字。“支”，赵和平录文“作友”，然据司马光《书仪》卷九《与居忧人启状》“孟春犹寒，起居支福”下注曰“支者言其毁疾，仅及支梧也。称尊云动止支胜，平交云所履，降等支宜。支福、支和[大]重，支祐小重，支宜、支适小轻，支立大轻”。“是友”当作“支”字与（福 福分）、（豫 安乐）、（胜 佳胜）、（适 安适）、（常 恒久）、（祐 保佑）、度（度过、安度）、（遣 排遣、度越）等相组，意思是慰问居忧者，希望其丧中能够支撑，获神灵福佑，平安度过灾难。如同卷中《吊遭父母
《丧书》：春初寒，惟动止支胜。《吊小祥大祥及除禫》：春中已暄，惟动静支祐。《吊起服从政》：季夏毒热，惟位次郎动静支豫。《吊兄姊亡书》：春(慕 暮春)暄甚，惟动静支胜。“本家的告哀书也可用，如《父母丧告兄姊书》：孟春犹寒，伏惟哥姊动止支福。《伯叔丧告父母书》：孟冬渐寒，伏惟耶娘尊体动止支祐。”这些例证表明上述词汇可以用于内外族和非亲属，并有相应的尊卑等级(但具体使用有时不甚严格)。其中支胜、支福较常见，传世欧阳修《文忠集》卷六九《与杜论祁公墓志书》：伏承暑热，孝履支福，深慰企想。“李纲《梁谿集》卷一二八《与岳少保第一书》：伏惟哀慕之余，孝履支福。“朱熹《晦庵集》卷三三《答吕伯恭》：伏审已经练祭，哀慕如新，即日溽暑，孝履支福。”同卷另一答吕书又有：比日中夏少雨，伏惟纯孝感格，体力支胜。支福、支胜等是规定用于亲属和丧家的安慰祝福语。从《新定书仪镜》和《书仪镜》中可以看到，吊丧书的答书不用“支”字语，而是“以惟动静兼祐”或“惟动静兼胜”表达祝福之意，是支福等不得用于非丧之家，更不得用于吉仪。2. 蒙恩、蒙推免、蒙免、推免、推遣等唐开元以后的吉书仪中常常见到“蒙恩”一词。如P.3422《吉凶书仪》之《与外祖父母书外伯叔附之》：伏愿寝膳胜常。即日耶娘安和，名蒙恩，拜觐末由，伏增恋结。“同卷《与极尊书》：伏愿胜亦云动若别有事意，随止胜常。即日蒙恩时便言，豫他皆(放仿)此。拜谒未期，伏增延。结。“书仪镜·四海书题·重书》：伏惟官位公尊体动止万福。即此蒙恩，蒙恩之下所论。如有事意，即于海书题题·通例第二”凡[下]情不具、不宣、伏惟、珍重等语，通施尊长。自叙皆蒙恩”，知蒙恩乃是守有限，拜奉未由，云云。结合《新定书仪镜·通例第二》凡[下]情不具、不宣、伏惟、珍重等语，通施尊长。自叙皆蒙恩”，知蒙恩乃是
致尊长或与极尊（重）书问候和祝福对方后自叙状况的语言。蒙恩，直叙即得蒙恩惠之意。由于是对尊长的客气话，实际可译作“今托福”或“承蒙关照，一切都好”之语。

蒙恩有时又可作“蒙推免”。张敖《新集吉凶书仪·与四海稍尊书》”

“伏惟位尊体（以蒙恩。下阙字）尊体动止万福。蒙推免，拜伏，云云。”是“知蒙推免”与“蒙恩”意相近，同卷《与四海未相识书》与之略同。蒙恩推免”之说，则“蒙推免”当同，只是用“了即此位”是“蒙恩推免”的简化。不过“蒙推免”似等级稍低，不仅用于“稍尊”，即同卷《与四海平怀书》也用此语，此或因唐后期礼法不甚讲究之故。

“蒙推免”之进一步简化“即蒙免”。同卷《俗人与僧人书》《僧人答俗人书》都有“即此LA蒙免”之说。S.1438《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之汉官书仪》中一信称：“伏惟动静康豫，位蒙免，云云。”P.4050晚唐吉凶书仪一状称：“寒温，惟动纳珍胜，某蒙免。”《与夫书》”即此大君大姑动止万福，男女等无恙，儿蒙免。“司马光《书仪》卷一《上稍尊时候启状》”某即日蒙免，（未末？）由觐展。“《妇人与夫书》”妾即此蒙免。“蒙恩一词为什么又可说成是“蒙推免”或“蒙免”？

“察张敖书仪既可转用“蒙免”或“蒙推免”以代“蒙恩推免”，则前二者本由“蒙恩”与“推免”两词合并而成。推免原为推辞、退让意。宋《五灯会元》卷一八”师乃曰：‘须起个笑端作么，然虽如此，再三不容推免。’”金《刘知远诸宫调·知远走慕家庄沙陀村人舍第一》”老儿询问，潜龙不能推免。“引伸当为过得去、过得还好之意。所以推免一词在书仪也可单用，如《文苑①参廖殉英《:刘知远诸宫调校注》，中华书局，1993年，第6、29页。
“粗胜推免”意思是“大致上都很不错”，由于是平辈之间，所以就不说“蒙恩”之类的话了。

类似的词语在书信中又有“推遣”等，如《书仪镜》一状：“朝夕微寒，惟履佳也。仆推遣。”P.344《吉凶书仪·与稍卑书》“仆粗推遣耳”下注曰：“近书云，仆之情状，不言可悉”，也是“某诸事平常”之意。同书仪《与稍尊书》“名推遣”下又注亦云“推常、推度”，与推遣意当相近。而在平常、过得去、不言可知的意义上又有“常遣”、“常度”（见《书仪镜·四海书题》）。“遣免”等。

魏博田仆射弘正《答魏博田仆射书》道：“季冬极寒，伏惟仆射尊体动止万福。即日愈蒙免。蒙恩改执事，不任感惧。”朱熹《韩集考异》卷六注曰：“诸本无蒙免二字，今从阁本。今按蒙免者，蒙（田）仆射之庇，而得遣免也。连上文为句，蒙恩者，蒙上之恩而改职事也。连下文为句。”其解“蒙免为蒙田之庇得遣免，正是唐宋之际上述用法之确解也。从书仪上述成例来看，这类词语不但用于家族中问候长辈，更成为官场寒暄的习用语。这些用语附之以上述谦辞敬语依据官品尊卑的等级制运用，是书仪在庶民化之上，又带上了官僚化的特征。

关于书仪的称谓还要注意到吉凶书仪中表示悲哀的一些特殊用法。如《新定书仪镜·通例第二》称：“父母并无云永感罔（感）极，或云（众）重感。”又同件《凡例廿八首》称：“凡父亡称孤露，无母称偏露，父先亡母后亡亦称孤露。”这些词汇大概南北朝以来已有，本


来是用来形容父母丧亡，如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三记隋少帝“诏悯予小子，奄绍否愆，哀号永感，五情糜溃”《太平广记》卷七《葫芦生（出《原化记》）”：初似喜，少顷惨容曰：‘姑事韦家，不书仪则常见于告丧幸，儿女幼小，偏露。’慰哀或形容父母丧亡不久的情况。如P.4050和S.5613《晚唐河北吉凶书仪》中一《贺年书》道：改年，永感惟同。又一书道：他乡永感罔极。凝寒，惟动用清畅。后来便逐渐成为反映家庭状况的代名词，用于简历，特别是说明举子身份的登科记中。不过对父母一方亡者改为偏侍，父母俱在为具庆，称某某下《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李峣及第，在偏侍下。主司也连带有此说。又记：宝历年中，杨嗣复相公具庆下，继放两榜。同卷《记名》记进士宴有“名大相识”，注“云主司在具庆”；次相识”，注“云主司在偏侍”。可见它们已是唐社会所普遍接受和习知的固定用语。今传世南宋《绍兴同年小录》进士履历都有此项，“如永感下第十二”、“偏侍下第九”或“具庆下第五”等，后面数字为行第《宝祐四年登科录》也同，只是又增加重（庆祖父母、父母俱在）、严（侍父在）、慈（侍母在）、双侍（父母在或一方非亲生？）等词，这种作法一直延至清代，推其发端，恐怕就是自书仪而转用。

（二）“旧仪”的沿用和创新

吉凶书仪中凡例部分的用语是魏晋特别是东晋以降历代相沿的，但从唐前期吉凶书仪来看，唐朝在继承前朝传统的基础上一方面力图纠“正流俗”，一方面也在尝试创新。这一点于开、天时期的《新定书仪镜》最突出。这件书仪中的凡例和征引黄门侍郎卢藏用《仪例一卷》等部分有不少批评“旧仪”之处，这个旧仪，姜伯勤先生
认为“主要指南朝以来直至……史睿也唐初裴矩之世的旧有书仪”等均与东晋南朝礼俗有关，说明唐前期书仪继承南朝礼俗较多。而除了前举否定“旧仪与小重云眷仰及眷属”，而“定眷字不可施于小重”和下面章节将要谈到的删改旧仪复书之外，综括前人所论，还有以下一些值得注意处。

其一：
凡称奈何者，相开解语。旧仪云：不孝奈何，酷罚奈何，斯乃自抑之词，非为孝子痛结之语，只可以吊孝者称奈何，受吊者未宜自开解。今重丧吊答并删改为罪苦。余凶书服轻得依旧仪。

按：这段话出自杜氏《新定书仪镜》凡例中。称奈何本是一种伤痛无奈之语，不仅用于书仪，也用于口吊和送葬。在送葬时亡人亲属要唱“着奈何”一类的薤露之歌，是周一良先生在《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一文中已指出的，这在某些唐人墓志中犹有反映。而唱奈何正是对悲痛情绪的宣泄。杜氏大约认为孝子报丧只应表示悲痛，不能自己给自己排解以淡化作为子孙“的罪责”，所以在告哀书中改“为罪苦”。称“罪苦”而不“是奈何”，在《新定书仪镜》和由郑余庆元和书仪改编的张敖书仪都是一样，可认为是遵从了开元杜氏书仪改革。

其二：

(1) 姜伯勤：《唐礼与敦煌发现的书仪》，见氏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礼乐篇》上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427—431页。
(2) 原载《文物》1985年第7期，收入《唐五代书仪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85—301页。
旧仪谓父为大人，谓母称上下，父曰大人，诚所易言；母称上下，未识所因。比访之通人，亦未能晓。尝试思念之：古人谓父母皆为大人，前汉张博、后汉崔邠咸有其此语；又加上下者，别父为上，母为下耳，故通云大人上下。后人不达其本，至于无父谓母亦为上下，殊失本意，今亦刊正。

按：此语在卢藏用《仪例一卷》中，是为追本求源，改正称谓语的不合理处”。上下”只能用于父母并称以作区别，而不能用于母亲单称。这个称呼和江南俗称的关系史睿已指出。但这里特别申明要改称，事情看来很小，仔细分析却似乎暗喻对母亲的尊重和女性地位的改善。卢藏用在武则天长安中任左拾遗，历中宗睿宗朝，曾任黄门侍郎。玄宗先天中坐托附太平公主配流岭表，至开元初卒。他在政治上应是投靠武则天、太平公主一系《。旧唐书》说”他性无挺特，多为权要所逼，颇隳公道”那么，像武则天定服制父在为母服三年一样，《仪例一卷》中的母称“从上下”改“为大人”，是否也可以认为是卢藏用本人迎合时代风尚与他政治追求的刻意表现呢?

其三：

旧仪从父兄与弟书末称名，亦此为昆季本多，每房自论行第〔，不〕加名无以分别。至于通计长幼，次第素定，岂烦加名以自疏外，今亦不取；其堂舅从祖并准此。

按：此条也见《仪例一卷》，是为以行第代(名详本书第十章)，也是唐社会士庶流行行第风尚下的一种改革。

其四：“
旧仪从父存不得云公,当[为]侯,皆是爵位,尊崇前人之意。

近代皆云公,无复侯者。行之既久,今不(敢取?)

按:此条也见《仪例一卷》,为卢藏用依从相沿已久的流俗改旧仪。按士大夫间被以侯称多见于魏晋滥封公侯以后,而东晋南朝犹多。如《世说新语·言语第二》“记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云云”,周侯即周觊也。《晋书》卷六六《陶侃传》记王敦指陶侃曰”:若无陶侯,便失荆州矣。”同书卷七四《桓彝传》言彝使将军俞纵守兰石。纵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报。吾之不可负桓侯,犹桓侯之不负国也。”当面又可称侯或君侯,逐渐也衍为敬称。同书卷七三《庾亮传》记陶侃谓庾亮曰:”君侯修石头以拟老子,今日反见求耶。”《世说新语》同篇记中朝小儿为父乞药”,主人问病,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虐?'”君侯”或”尊侯”者,即敬称,不必是侯。《梁书》卷五○《文学下》言刘峻著论为中山刘沼致书难之,后乃为书以序之”曰刘侯既有斯难,云云”者,也是敬称。此种称呼唐文人仍有沿用。如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李侯有佳句,往往有隐铿。”韩愈《送殷员(外)侑序》:”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迁尚书虞部员外郎。”《送杨少(尹)巨源序》:”然吾闻杨侯之去,丞相有爱而惜之者。”但侯之作为敬称是否”因父存不得云公”则未可知。唐书仪随世俗而约定皆可改称公,是因为这种称呼至少隋唐以降已非常用。
其五：
旧仪与僧尼道士书题云稽首及和尚（南），以代咨白再拜；俗书题既不称再拜，僧书岂得遂云和南？今依（仪）皆云白书等，随轻重而言。
按：此条也见《仪例一卷》。和南是佛教用语，来自梵文vana-（意为敬礼）。《南海寄归传》曰：“古云南牟，即是敬礼……众云伴淡或云伴题。此云稽首，亦云礼拜，亦云敬礼，讹云和南。《一切经音义》卷七三婆南条曰：“或言和南，皆讹也。正言槃淡，此译云我礼也”。稽首与和南是两晋南北朝以来俗人给僧尼书信常用语，与俗书仪咨白再拜等敬语意义相当。淳化阁帖所收《卫夫人书》、《梁尚书王筠书》首末语皆云和南。褚遂良家侄至一帖知和有承法师道体安居，深以为慰……褚遂良顿首和南。南一语使用已久。咨者本有商量征询意，故咨白便成为表述的谦辞。如《宋书》卷二《武帝纪中》，刘裕讨司马休之，休之故吏韩延之报刘裕书：“但康之前言有所不尽，故重使胡道咨白所怀。《梁书》卷三一《袁昂传》，元昂作书称：君问礼所归，谨以咨白。《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皇太子下令曰：‘摄太傅、申国公士廉，朝望国华，仪刑攸属，寡人忝膺监守，实资训导。比日听政，常屈同榻，庶因咨白，少袪蒙滞。但据案奉对，情所未安，已约束不许更进。太傅诲谕深至，使遵常式，辞不获免，辄复敬从。所司亦宜别以一案供太傅。’士廉固让不敢当。以上‘咨白’都是谦语，不过其用法介乎小重和平怀之间，且可单用。如《通例第二》规定凡与兄书云白疏。①参见《淳化阁法帖考正》卷四、卷五，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兰斋刻本。
……"再拜稽首",本身就是大礼重仪。吐鲁番出土高昌书仪表明，再拜语至少是用于兄姊以上，而杜氏《吉凶书仪》则再拜语是规定用在"大重"性质的《与极尊书》中。书仪说俗书题既不称再拜，僧书岂得云'和南'，大概是与僧书仪的等级有关。因为"用和南"必须与"再拜"者对等，够不上大重或极尊者就不用，所以今(依仪)皆云白书等，随轻重而言，这也可以认为是书仪在礼仪上追求平等和降重趋轻的一面。

除以上凡例外，在书仪的某些具体书法上，还可以看出唐人对"旧仪"的改造。例如《吉凶书仪·妇人吉书仪》中《与夫书》于信末"内白"称"妇人夫天者，谓倚之如天。既云夫妻齐体，未可尊卑悬隔。旧仪称新妇将为大重，今略之。"这里姜伯勤先生注意到，妇人给丈夫的信中自称已由原"来大重"等级"的新妇",改为"平怀"施"小重"或"平怀"级别"的"内白""、"谨白"等，认为这是开元间女性在礼制中相对于士族家礼而稍有改变的一种反映。因此包括上述各种语词、称谓的轻重变化和下面将要论述的书体改造等在内，适应唐社会变化，并与内容相配合，已呈现出姜先生所说礼制用"轻"的简①

注：①姜伯勤：《唐礼与敦煌发现的书仪》，见氏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礼乐篇》上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28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唐开天书仪确实已在继承南北朝书仪的基础上，开始形成了自己的新规律、新特征。
第九章  书仪的书体形式及应用

以往从传世史籍中见到的书信，大多是首尾单一，内容不重复的一纸单书。敦煌书仪中却出现了双重首尾，内容含义又是多层次的复书体，单复书格式体裁的出现和形式变化在朋友书仪、吉凶书仪和表状笺启书仪中都有表现，只不过，前二者在开元、天宝后复书的形式已得到改革，表状笺启书仪却通过别纸的形式而使复书实际上仍在唐五代官僚社会大量使用。结合传世文献，可以知道书仪书体的简化有着长期的过程，复体作为一种繁缛的礼节，其兴衰同样追随着中古礼仪发展的大趋势。

一、吉凶书仪中的单、复书

关于单、复书的说法首见于开元、天宝时期的几件书仪。其中P.3442杜友晋《吉凶书仪》凶仪凡例称：凡复书以月日在前，若作单书，移月日在后，其继吉?书尾语也移在后。

同是杜氏撰的《新定书仪镜》见P.3849照抄此段语，且它的“四海吊答书仪廿首”书题见P.3637下有双行小字（注与《书仪镜》同）曰：“亡故”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诸仪复书皆须两纸,今删为一纸,颇为剪浮。但重叙亡人,兼申孝子哀情,参验古今,亦将通体,达者裁择,安敢执焉。书仪的末尾部并录引《卢藏用仪例一卷》说:

古今书仪皆有单、复两体,但书疏之意本以代词,苟能宣心,不单复。既能叙致周备,首(未)合宜,何必一封之中,都为数纸。今通婚及重丧吊答量留复体,自余悉用单书。重旧仪每一封皆首末具载,非直遂作类(累)①,稍亦疑(贻)晤(误)晚生。至于题目轻重,须有准的。其间主旨,便量事宜,悉不录,直书其要。

书仪有单书与复书两种体例的问题,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一书关于《新定书仪镜》的题解已指出(按:亦见于同书《作者自序》),并从上述说法中总结出四点印象:(一)书仪旧有单复两体,在杜友晋编定书仪后,已改为除通婚书及重丧吊答量留复体外,其余书疏皆用单体。由于杜友晋作书仪是在开、天年间,所以文书本身已将复书向单书转化的时间揭示出来了。(二)复书是为两纸或两纸以上,而单书仅一纸而已。(三)区别单、复书的简便办法,即复书月日在前,单书则月日在后;复书尾语在中,单书尾语在后。(四)根据以上三点,以杜氏书仪《通婚书》和《子亡父母告孙儿书》为例,复原出复书、单书各一通,形式恰与以上特征相合,可证其不同。赵文认为,"由旧仪皆用复书,到卢藏用、杜友晋时改成除通婚书和重丧吊答外悉用单书,可以说是唐代书仪向简便实用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赵和平提出的单、复书问题，是有关唐代书仪形式体裁的一个很重要的发现，读后使人颇受启发。文中所论两种书仪的特点和区别无疑也是正确的。但是，如仔细对照、比较敦煌写本书仪中各类书信的体裁，可发现就单、复书，特别是复书的使用范围及形式变化问题，尚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一)复书在改革前后的应用范围

唐初的复书继承魏晋南北朝，对象不同的各类吉凶书仪大致都有应用。但是自卢氏、杜氏书仪之后，改为只有通婚书和重丧吊答“量留复体”，因此在开、天时代的杜氏书仪中，仍可以见到这两种书仪的大量复书形式，并了解到复书针对“重丧”的使用原则及与单书的不同。而传世书仪文献和吐鲁番书仪的记载，则提供了此前复书的一般应用状况，与开天以后吉凶复书减少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

1、杜氏书仪“重丧吊答”中的复书和单书

赵和平提到单复书曾以通婚书为例，但敦煌写本书仪中可供参鉴的复书并非仅止《通婚书》一种。据上录《新定书仪镜》今通婚及重丧吊答“量留复体”，知通婚书和丧葬吊答书是保留复体时间最长的，同时也是应用复体最多的。那么，何谓重丧吊答？除了通婚书外，杜氏书仪中有没有关于重丧吊答方面的复体书仪呢？

本书上编曾据前人的研究，说明敦煌题杜友晋撰的书仪有《吉凶书仪》和《新定书仪镜》。此外，另有《书仪镜》S.329与S.361一件，在内外族吉凶书仪的部分有不少与《新定书仪镜》完全相同，有可能是抄撮后者的内容。三者中应以《吉凶书仪》年代为最早，
《新定书仪镜》略晚《书仪镜》更晚一些。但三者时间均应在开元到天宝，《书仪镜》与《新定书仪镜》无疑是在《吉凶书仪》的基础上编定的。周先生曾指出“镜”字可能是“假为一览之意，遂用为纂要或简本之称。两卷本《吉凶书仪》删节之后，就成为一卷的《书仪镜》。不过三种书仪纂写的年代既然是从早到晚，在书仪的体裁形式上便不可能完全一致。如仔细阅读三者中编纂最早的《吉凶书仪》中《内族凶书仪二十一首》与《外族凶书仪一十七首》两组告哀、吊答书仪，可发现这些凶书仪的形式，大致分两种。一种即如下述：

父

[1]父母丧告答祖父母、父母书

女云

某月日名

女

言：无状招祸，祸不灭身，上延耶娘。攀号擗踊，五内縻溃，烦冤茶毒，不自堪忍，不孝罪苦。伏惟哀悼抽父亡告母云哀摹摧割，

母亡告父云哀恸抽切。何可胜忍。（末）由拜诉，伏增号割，绝，谨言疏

荒迷不备。名再拜。

各具论名言：耶娘以某月日忽婴某疹病状。冀渐瘳损；何图不蒙，

亦云奄灵祐，以号天某月日奄遘凶祸。钟弃背。叩地，贯彻骨髓，肝心屠裂，无所逮（逮）及。无状罪苦，荼毒罪苦。伏惟悲悼哀痛，

父亡告母云哀摧抽恸，

母亡告父云悲痛抽割。何可堪居！孟春犹寒，不审尊体起居何如？名不若得书即云，奉某月

能死亡，假延视息，不奉近诲，伏增荒灼，

日示，伏增号恋

伏愿珍和，

寻续言疏。谨言。

[2]舅姨丧告答外祖（及父？）母书

某氏

月日名言：外氏凶祸，某姨舅倾背，悲痛抽切，不自胜忍。

①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二），载《唐五代书仪研究》，第53—70页。
此两通书仪，形式相同，都是文字分为两段，前段“以月日名言（根据写书人与收书人年辈身份不同，有时也称名白”、“敬报”等）为首，”至名再拜（有时也称谨白）为止；后段另起（行同样的情况也有用空格以示分别者），开头亦称名言，末仍称名言（或名白”、“敬报”等），惟无月日耳。这两段文字是不是同属一件书仪呢？或以为，既称告答书，就应当既有告书，也有答书，因此前段如是告书，后段即是答书。后段的名言前无月日字样，乃是因文字脱落之故。但是如能再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前段与后段致书人口气完全一致。如第一件《父母丧告祖父母、父母书》，前段致书人既称耶娘，后段仍称耶娘，丝毫不像祖父母、父母得书后，写给报丧儿女或孙儿女的答书。而且第一段显然是报丧之后宣泄痛伤之情，第二段则是进一步说明父母的病况和死因，这就更不可能是答书了。至如认为第二段脱落月日，则类似形式的书仪在杜氏《吉凶书仪》中非止一件，情况均完全相同，不可能是件件遗落。因此有理由认为，这类书仪的前、后两段同属一件，也即同属凶仪的报丧或告哀书信。由于形式、语言大体相同，所以告答书二者往往仅录其一，另一件即被省略了。这里如再将此类凶书仪与吉书仪中的《通婚书》或《答婚书》相对照，便可以看出两者的共同之处。
通婚书

通婚书，亦云次第娘所以敬礼。皆两纸真书，往来并以函封。若未相

倾属良深。

郊，每深倾属

月日，名顿首顿首。虽近。

叙既久，

孟春犹寒，体履如何？愿馆舍清休。名诸疹少理，言展未即，

惟增翘轸。愿敬德厚，谨遣白书不具。姓名顿首顿首。名白：

弟 妹侄孙云弟某乙，侄云

第某息

弟[第？]某兄弟某子。随言之

某令淑

未有伉俪。承贤若干女乙，

[有闻？]，愿托 高媛，谨因姓 某官位，敢以 礼[请]。姓名 白。

(以下封题略)

答婚书形式略同。此婚书第一段首“书 月日名顿首顿首”，其末则

“有 谨遣白书不具，姓名顿首顿首”等结语。第二段仍“以 名白”开

始，“以 姓名白”。结束。与上述凶书仪作比较，除了由于性质不同

而用语有别外，其形式完全可以说是同出一辙。而根据赵和平所

总结的复书月日在前、尾语在中等特点，知上述两例凶书仪也如同

婚书一样，是典型的复书。它们“以 月日名（白 或曰名言、名报等）

为开始语，以诸“如 谨言疏荒迷不（备 或“曰 鲠塞不备”、悲塞不次”

等语），名再拜”一类的结语在（中 实则是第一纸之末），末则只有

“ 名白”、“名言”之类的重复而不再注明月日。这样的复书之所以

分为两段，正是因为传统的复“书 皆须为两纸”之故。

凶仪中的告哀书信，还有另一种形式，也见于杜氏书仪中：

[3]子侄及孙丧告答尊长书

名言云白。非意（食 仓）卒，某子侄（发 夭）折，悲念伤悼，不

恸自 胜 任（ 忍）。伏 惟 哀 念 伤，仍可为怀。痛当奈何，痛当奈

盛

何！

幼

子侄 年，冀就成立，何期奄致斯祸，悲悼伤切，不能自

已。伏惟哀恸抽割，何可堪处。痛当奈何！当复奈何！孟春

祖父母

父母用起

犹寒，不审尊体何如？ 居字。即日名如常，未[末]由拜
此种形式正如赵文所指出的，是月日在后，结书尾语也在信末的典型单书。

下面，我们根据上述形式将杜氏《吉凶书仪》中的告哀书列表区分。

表4：单复书形式统计（表一）：杜友晋《吉凶书仪》内族凶书仪

<table>
<thead>
<tr>
<th>书仪名称</th>
<th>开首语</th>
<th>中间结语</th>
<th>第二开首语</th>
<th>末尾结语</th>
<th>形式</th>
</tr>
</thead>
<tbody>
<tr>
<td>祖父母丧告答父母伯叔姑书</td>
<td>月日名言</td>
<td>谨言疏悲塞不备，名再拜</td>
<td>名言</td>
<td>名言</td>
<td>复书</td>
</tr>
<tr>
<td>祖父母丧告答祖父母书</td>
<td>月日名言</td>
<td>谨言疏悲塞不备，名再拜</td>
<td>名言</td>
<td>名言</td>
<td>复书</td>
</tr>
<tr>
<td>祖父母丧告答兄弟姊妹书</td>
<td>日月（日月）妹（名？）白（告弟妹云，某兄某氏妹报）</td>
<td>谨白书（告弟妹云遗书）悲塞不次，名再拜</td>
<td>名白（报）</td>
<td>名白（报）</td>
<td>复书</td>
</tr>
<tr>
<td>父母丧告答祖父母书</td>
<td>月日名（女云某女）言</td>
<td>谨言疏荒迷不备，名再拜</td>
<td>名言</td>
<td>谨言</td>
<td>复书</td>
</tr>
<tr>
<td>父母丧告答伯叔姑姨舅书</td>
<td>阋</td>
<td>阋</td>
<td>阋</td>
<td>阋</td>
<td>阋</td>
</tr>
<tr>
<td>父母丧告答兄弟姊妹书（同产附之）</td>
<td>月日名白（弟妹云兄姊报）</td>
<td>谨白疏荒迷不次，名再拜（弟妹云遗书荒迷不次，某兄某氏妹报）</td>
<td>名白（报）</td>
<td>名白（报）</td>
<td>复书</td>
</tr>
<tr>
<td>父母丧告答同堂再从三从兄弟姊妹书（诸卑幼附之）</td>
<td>月日名白（告弟妹云某兄名，某氏妹报，与子孙及侄云告①）</td>
<td>谨白疏（弟妹云遗书）荒迷不次，名再拜（报，告）</td>
<td>名白（报，告）</td>
<td>名白（告、报）</td>
<td>复书</td>
</tr>
</tbody>
</table>

①
<table>
<thead>
<tr>
<th>书仪名称</th>
<th>开首语</th>
<th>中间结语</th>
<th>第二开首语</th>
<th>末尾结语</th>
<th>形式</th>
</tr>
</thead>
<tbody>
<tr>
<td>父母丧告答妻书</td>
<td>月日名白</td>
<td>遗白书荒诞不次,名白</td>
<td>名白</td>
<td>名白</td>
<td>复书</td>
</tr>
<tr>
<td>夫丧妻丧告答儿女书</td>
<td>月日耶娘告</td>
<td>及书哀咽不次,耶娘告</td>
<td>耶娘告</td>
<td>耶娘告</td>
<td>复书</td>
</tr>
<tr>
<td>伯叔祖父母丧告答父母父母姑书</td>
<td>月日名言</td>
<td>谨言疏缄塞不备,名再拜</td>
<td>名言</td>
<td>名言</td>
<td>复书</td>
</tr>
<tr>
<td>伯叔祖父母丧告答同堂再从伯叔祖姑书(亡者子某,再从兄弟姊妹附之,通亡者之孙)</td>
<td>月日名言(兄姊云白,弟妹云报)</td>
<td>谨言疏(兄姊云白书,弟妹云遗书)哀咽不次,第名再拜 (兄姊云白,弟妹云报)</td>
<td>名言(白,报)</td>
<td>名言(白,报)</td>
<td>复书</td>
</tr>
<tr>
<td>伯叔父母姑丧告答祖父母父母伯叔姑兄姊妹书(告答弟妹,诸卑幼附之)</td>
<td>月日名言(兄姊云白,弟妹云报,诸卑幼云告)</td>
<td>谨言疏(兄姊云白书,弟妹云遗书,诸卑幼及遗书)哀塞不备(伯叔姑兄姊妹)及诸卑幼并云不次)①</td>
<td>名言(白,报,告,报)</td>
<td>名言(白,报,告,报)</td>
<td>复书</td>
</tr>
<tr>
<td>伯叔父母[姑??]丧告答堂从兄姊及外兄姊妹(谓亡者之子,诸弟妹附之)</td>
<td>月日名白(告弟妹云,第兄,某氏子报,某氏妹白。告外弟妹云,内兄名,某氏内表妹敬报)</td>
<td>谨白疏(遗书)悲哀不次,名再拜(告弟妹云,第兄,某氏子报,某氏妹白。告外弟妹云,内兄名,某氏内表妹敬报)</td>
<td>名白(报,敬报)</td>
<td>名白(报,敬报)</td>
<td>复书</td>
</tr>
<tr>
<td>兄弟姊妹丧告答祖父母父母伯叔兄弟书</td>
<td>月日名言(兄姊云白)</td>
<td>谨言疏(兄姊云白书)悲哀不备(伯书姑兄子云不次),名再拜</td>
<td>名言(白)</td>
<td>名言(白)</td>
<td>复书</td>
</tr>
<tr>
<td>兄弟姊妹丧告答诸卑幼书</td>
<td>耶娘伯叔告(与弟妹书云报)</td>
<td></td>
<td></td>
<td></td>
<td>单书</td>
</tr>
</tbody>
</table>

① <br> ①“按:此下原书仪仅一”
<table>
<thead>
<tr>
<th>书仪名称</th>
<th>开首语</th>
<th>中间结语</th>
<th>第二开首语</th>
<th>末尾结语</th>
<th>形式</th>
</tr>
</thead>
<tbody>
<tr>
<td>兄弟姊妹丧告答侄及外甥书</td>
<td>月日某伯叔姑告(告外甥云某舅,舅母,某氏姨问)</td>
<td>送书悲塞不次,某伯叔某氏婶告</td>
<td>伯叔姑告(问)</td>
<td>某伯叔姑告(问)</td>
<td>复书</td>
</tr>
<tr>
<td>姊妹丧告答姊妹夫书</td>
<td>月日名白</td>
<td>謹白书猥塞不次,姓名白(父无云顿首顿首)</td>
<td>謹白书猥塞不次,姓名白</td>
<td>謹白书猥塞不次,姓名白</td>
<td>复书</td>
</tr>
<tr>
<td>女丧答亲家舅姑书</td>
<td>名顿首</td>
<td></td>
<td>謹白书猥塞不次,姓名顿首,月日</td>
<td></td>
<td>单书</td>
</tr>
<tr>
<td>女丧答女婿书(侄女婿同)</td>
<td>名顿首</td>
<td></td>
<td>謹书悲塞不次,名顿(侄女婿云姓名),月日</td>
<td></td>
<td>单书</td>
</tr>
<tr>
<td>子侄及孙丧答尊长书</td>
<td>名言(告兄姊云白)</td>
<td></td>
<td>謹言白疏猥塞不次(祖父母云不备),名再拜,月日</td>
<td></td>
<td>单书</td>
</tr>
<tr>
<td>侄亡子女书</td>
<td>謹言</td>
<td></td>
<td>謹再拜</td>
<td></td>
<td></td>
</tr>
</tbody>
</table>

<table>
<thead>
<tr>
<th>书仪名称</th>
<th>开首语</th>
<th>中间结语</th>
<th>第二开首语</th>
<th>末尾结语</th>
<th>形式</th>
</tr>
</thead>
<tbody>
<tr>
<td>外祖父母丧告答母及姨舅书</td>
<td>月日名言</td>
<td>謹言疏悲塞不次(母云备),名再拜</td>
<td>名言</td>
<td>名言</td>
<td>复书</td>
</tr>
<tr>
<td>外祖父母丧告答兄弟姊妹姨舅[之?]子书</td>
<td>月日名白(弟妹云某兄某氏甥,表弟妹云外甥,姨兄,某氏表甥敬报)</td>
<td>謹言疏悲塞不次,名再拜(弟妹云某兄某氏甥,表弟妹云外甥,姨兄,某氏表甥敬报)</td>
<td>名言(报敬报)</td>
<td>名言(报敬报)</td>
<td>复书</td>
</tr>
<tr>
<td>舅姨丧告答外祖及(父?)母书</td>
<td>月日名言</td>
<td>謹言疏猥塞不备,名再拜</td>
<td>名言</td>
<td>名言</td>
<td>复书</td>
</tr>
<tr>
<td>书仪名称</td>
<td>开首语</td>
<td>中间结语</td>
<td>第二开首语</td>
<td>末尾结语</td>
<td>形式</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舅姨丧告答舅姨之子书</td>
<td>月日名白（与弟妹云[某兄]名某氏状敬报）</td>
<td>通直疏（弟妹云遣疏）猥塞不次。表弟姓名（某氏表妹）再拜（与弟妹云表兄姓名、某氏表妹敬报）</td>
<td>名白</td>
<td>名白（敬报）</td>
<td>复书</td>
</tr>
<tr>
<td>姑姨姊妹夫丧告答姑姨姊妹书</td>
<td>月日名言（姑云云白，妹云报）</td>
<td>谦言疏（姑云白疏，妹云遣书）猥塞不次，名再拜（某兄妹报）</td>
<td>名言（白、报）</td>
<td>名言（白、报）</td>
<td>复书</td>
</tr>
<tr>
<td>内外表姨兄弟姊妹丧告答内外祖及父母姑姑夫姨姨夫书</td>
<td>月日名言（姑姨夫云名白）</td>
<td>谦言疏（姑、姨夫云白疏）猥塞不备（姑、姨夫，舅、舅母并云不次）名再拜（姑、姨夫云姓名，女云某氏女）①</td>
<td>名言（白）</td>
<td>名言（白）</td>
<td>复书</td>
</tr>
<tr>
<td>外孙外甥丧告答外族书</td>
<td>名言（白、报、告）</td>
<td></td>
<td>谦言（白）疏（遣书）猥塞不次，名再拜（白、报、告）。月日</td>
<td></td>
<td>单书</td>
</tr>
<tr>
<td>妻丧告答妻父母伯叔姑书 ——告书</td>
<td>名言</td>
<td></td>
<td>谦[白]记（疏？）猥塞不次。名再拜（妻伯叔姑云侄女夫姓名再拜），月日</td>
<td></td>
<td>单书</td>
</tr>
<tr>
<td>妻丧告答妻父母伯叔姑书 ——答书</td>
<td>名言</td>
<td></td>
<td>谦言疏猥塞不备，名再拜，月日</td>
<td></td>
<td>单书</td>
</tr>
<tr>
<td>内外兄弟妇丧告答[答]兄弟书（亡者之夫）</td>
<td>月日名（妹）白（某兄某氏子报）</td>
<td>谦言疏（弟云遣书）猥塞不次，名再拜（兄姊妹报）</td>
<td>名白（报）</td>
<td></td>
<td>复书</td>
</tr>
</tbody>
</table>
按：杜氏《吉凶书仪》的内族凶书仪部分，目录云21首，实则仅19首，对照少《父母丧告答伯叔姑姨舅书》及《子侄及孙丧告答亡者子女书》2首。外族凶书仪部分，也不是17首而是15首，其中且包括2首答书。因此，两表所列书仪共34首（件），其中单书9首，余25首为复书。比较单书与复书的应用不同，发现用复书者，多为以下两种情况：（一）死者于致书人或收书（人）有时是双方尊长，如《祖父母丧告答父母伯叔姑书》《父母丧告答兄弟姊妹书》《夫丧妻丧告答儿女书》《吊女婿遭父母丧（书孙女、孙女婿附之）》等。（二）死者于致书人为同辈也即所“谓平怀”，同时收书人于致书人亦为同怀或长辈，如《兄弟姊妹丧告答祖父母父母伯叔》等。

<table>
<thead>
<tr>
<th>书仪名称</th>
<th>开首语</th>
<th>中间结语</th>
<th>第二开首语</th>
<th>末尾结语</th>
<th>形式</th>
</tr>
</thead>
<tbody>
<tr>
<td>新妇丧父母告答子孙书——告书</td>
<td>耶娘告</td>
<td></td>
<td>及书便答不次，耶娘翁婆告①</td>
<td>单书</td>
<td></td>
</tr>
<tr>
<td>新妇丧父母告答子孙书——答书</td>
<td>名顿首顿首</td>
<td></td>
<td>谨遣白书猥亵不次，名顿首顿首，月日</td>
<td>单书</td>
<td></td>
</tr>
<tr>
<td>父母丧告答妻父母书②</td>
<td>月日名白</td>
<td>谨遣白书猥亵不次，名白</td>
<td>名白</td>
<td>名白</td>
<td>复书</td>
</tr>
<tr>
<td>吊妻父母遭父母丧书（伯叔姑附之）</td>
<td>月日名言</td>
<td>谨白记之猥亵不次，名再拜（妻伯叔姑云侄女夫姓名再拜）</td>
<td>名白</td>
<td>名言</td>
<td>复书</td>
</tr>
<tr>
<td>吊女婿遭父母丧书（孙女、孙女婿附之）</td>
<td>月日名疏（妻母云号疏）</td>
<td>谨遣书猥亵不次，名疏</td>
<td>名疏</td>
<td>名疏</td>
<td>复书</td>
</tr>
</tbody>
</table>

①原文无“月日”字样，当为误脱。
②按原卷此一书题惟余“母丧”、“答妻”四字能识。赵和平补为此名。但“父母丧”不当置于外族，姑存疑。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相反，用单书的情况则为：
1. 死者与致书人是卑幼，或至少是平怀略低，如《妻丧告答妻父母伯叔姑书》（这里将妻看作“比平怀”略低）、《外孙外甥丧告答外族书》、《新妇丧父母告答子孙书》。
2. 死者与致书人皆为卑幼，如《女丧告答女婿书》。

当然，这里也有比较复杂的情况，即当死者与致书人为平怀而收书人为卑幼时，则可用单书和复书两种形式，如《兄弟姊妹丧告答诸卑幼书》和《兄弟姊妹丧告答侄及外甥书》。这里恐怕要依死者与收书人的亲疏关系而论。此外，杜氏《吉凶书仪》在内族凶书仪之末还补言曰：“凡卑幼丧告答卑幼，其义可悉，更不具载。至如内族丧告外族，看吉书仪轻重，以意量之。于缌麻袒免之情，比于四海，据其尊卑，少加亲密。”由是可知，凶书仪的书体形式必须据死者身份、年辈，及与告哀人、告哀吊答对象彼此诸关系而定，其基本的原则是死者于活人是尊长用复书，否则是单书。因此总的来说，复书规格比单书为高，用复书是示隆重、崇敬之意。

这里还应看看《新定书仪镜》与《书仪镜》两者关于凶书仪单、复书的应用与处理。由于《新定书仪镜》与《书仪镜》年代晚于《吉凶书仪》，所以在诸如复书的书体形式上已有一些改革（详后），但如仍“将月日在前”作为复书的一个标志的话，那么可以看到此两文书中凶仪单、复书区分如下表。
<table>
<thead>
<tr>
<th>类别</th>
<th>《书仪镜》</th>
<th>形式</th>
<th>《新定书仪镜》</th>
<th>形式</th>
</tr>
</thead>
<tbody>
<tr>
<td>五服告哀书</td>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父母表告兄姊书</td>
<td>复单</td>
<td>父母丧告兄姊书</td>
<td>单单</td>
<td></td>
</tr>
<tr>
<td>父母丧告弟妹书</td>
<td>单单</td>
<td>父母丧告弟妹书</td>
<td>单单</td>
<td></td>
</tr>
<tr>
<td>子亡父母告孙儿女书</td>
<td>单单</td>
<td>子亡父母告孙儿女书</td>
<td>单单</td>
<td></td>
</tr>
<tr>
<td>长亡父母告次女书</td>
<td>单单</td>
<td>长亡父母告次女书</td>
<td>单单</td>
<td></td>
</tr>
<tr>
<td>祖父母丧告父母书</td>
<td>复复</td>
<td>祖父母丧告父母书</td>
<td>复复</td>
<td></td>
</tr>
<tr>
<td>伯叔丧告父母书</td>
<td>复复</td>
<td>伯叔丧告父母书</td>
<td>复复</td>
<td></td>
</tr>
<tr>
<td>父母亡告祖父母书并(及?)告兄姊书</td>
<td>复复</td>
<td>父母亡告祖父母书并(及?)告兄姊书</td>
<td>复复</td>
<td></td>
</tr>
<tr>
<td>长儿亡父母告次儿书</td>
<td>单单</td>
<td>长儿亡父母告次儿书</td>
<td>单单</td>
<td></td>
</tr>
<tr>
<td>四海吊答书仪</td>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吊遣父母丧书</td>
<td>再单</td>
<td>吊遣父母丧书</td>
<td>单单</td>
<td></td>
</tr>
<tr>
<td>吊小祥大祥及除禫</td>
<td>单单</td>
<td>吊小祥大祥及除禫</td>
<td>单单</td>
<td></td>
</tr>
<tr>
<td>吊起服从政</td>
<td>单单</td>
<td>吊起服从政</td>
<td>单单</td>
<td></td>
</tr>
<tr>
<td>吊兄姊亡书</td>
<td>复复</td>
<td>吊兄姊亡书</td>
<td>复复</td>
<td></td>
</tr>
<tr>
<td>吊姑亡书</td>
<td>复复</td>
<td>吊姑亡书</td>
<td>复复</td>
<td></td>
</tr>
<tr>
<td>吊弟妹亡书</td>
<td>复复</td>
<td>吊弟妹亡书</td>
<td>复复</td>
<td></td>
</tr>
<tr>
<td>吊妻亡书</td>
<td>单单</td>
<td>吊妻亡书</td>
<td>单单</td>
<td></td>
</tr>
<tr>
<td>吊亡子侄外生孙亡书</td>
<td>单单</td>
<td>吊亡子侄外生孙亡书</td>
<td>单单</td>
<td></td>
</tr>
<tr>
<td>内族吊答书仪</td>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姑兄姊亡吊父母伯叔书</td>
<td>单单</td>
<td>姑兄姊亡吊父母伯叔书</td>
<td>单单</td>
<td></td>
</tr>
<tr>
<td>弟妹亡吊次弟妹书</td>
<td>单单</td>
<td>弟妹亡吊次弟妹书</td>
<td>单单</td>
<td></td>
</tr>
<tr>
<td>侄生(甥)亡弟妹吊伯叔书</td>
<td>单单</td>
<td>侄生(甥)亡弟妹吊伯叔书</td>
<td>单单</td>
<td></td>
</tr>
<tr>
<td>外族吊答书仪</td>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父母吊子三殇书</td>
<td>单单</td>
<td>父母吊子三殇书</td>
<td>单单</td>
<td></td>
</tr>
<tr>
<td>彼此重服相与书</td>
<td>单单</td>
<td>彼此重服相与书</td>
<td>单单</td>
<td></td>
</tr>
<tr>
<td>重服内寻常相与书</td>
<td>单单</td>
<td>重服内寻常相与书</td>
<td>单单</td>
<td></td>
</tr>
</tbody>
</table>
按：从上表所列书仪名目，可看出《新定书仪镜》与《书仪镜》比《吉凶书仪》增加了吊答书的内容。但是，在单、复书的用法上依然遵从传统。其《内外亲族吊答书》《四海吊答书》基本上是本着与《五服告哀书》相同的原则，只是四海吊答书定单复更依从被吊慰（人）与死者的年辈关系，而与致书人无关。《内外亲族吊答书》则不但要看吊书人、收书人与死者的年辈关系，也要看吊书人与收书人彼此的年辈关系。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当收书人年辈在吊书人之上时，无论死者身份高低多用复书，如侄甥亡弟妹吊兄姊即是如此。对比《吉凶书仪》中《子侄及孙丧告答尊长书》用单书，似已有所不同。另外《五服告哀书》将《父母丧告兄姊弟妹书》中兄姊与弟妹作了区分，长于己者用复，幼于己者内容虽与原来无变，“但月日”移在后同单书，也是与原来书仪的不同之处。

由以上分析，再来“看今通婚及重丧吊答量留复体”一句中的“重丧吊答”四字，就会有更确切的理解。吊答者我们已知是包括告丧及吊唁往来书仪。那么何谓重丧呢？赵和平指出重丧是“重
者，父母，此语是来自前揭杜氏《新定书仪·嫡孙承重为祖父母》镜·四海吊答第三》凡五服哀辞唯有三等：重、中、轻的一段话。细细品味这段话，所说重、中、轻是“指哀辞”，也即书仪的表达，不是指五服的重轻。哀辞的重轻不完全依五服的重轻而定。“如儿女弟妹及诸卑幼”，服制虽不一定全同，哀辞却同属轻者。所以间虽有服制异，而哀辞□同也”一句话中的阙字处，依文意应为略、则、皆之类。除了最重的父母、祖父母外，在五服之内，又“是尊长”重于卑幼。不过这里哀辞对于从重者规定的范围很小。如果不是嫡孙承重，则作为祖父母的齐衰之丧竟也不在其内，这似乎远远不能包括敦煌写本书仪中复书涉及的范围。按照杜氏吉凶书仪，这个范围是五服之丧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均在其内。如内族告哀书中“的伯叔祖父母丧”即属小功，外族中“的内外表姨兄弟姊妹丧”即属缌麻。因此所“谓重丧吊答”中的重丧是比较广义的。不过重丧当然也不是指其中全部。一个量者，充分说明它要在五服之内有所选择。而这个选择的标准除了父母、祖父母重服之外，显然便是上所论年辈重于亲疏（如伯叔祖重于妻子儿女）。也即复书的使用，实际是包括了五服哀辞的重、中两等。这是一个必须重视的事（实以后《新定书仪镜》《、书仪镜》五服告哀、吊答书数量虽有减少，但事实上只是内容有所简化，其范围及用复书标准均无太大变化）。这样总结起来，所“谓重丧吊答”的复书，便一般应用于两种情况：A. 死者是服丧告哀（人致书人）或被吊慰（人收书人）的五服尊（长如祖父母、叔伯）及平怀稍尊亲（属如兄姊）；①赵和平：《新定书仪镜》题解，载氏著《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告哀对象或被吊慰(人/被书人)是告哀人或吊慰(人/致书人)、同时也是死者的五服尊长及平怀稍尊之亲。

2. 其他吉凶仪中的复书应用

根据杜氏书仪的规定，复书形式一般仅用于通婚书和内、外亲族的重丧吊答，但这只是改革后的情况。据上揭《新定书仪镜》中所“称”诸仪复书皆须两纸，今删为一纸”说明“在删为一纸”之前，“诸仪”都有用复书的，而且复书之用，显然并不始于唐代。

今存最早复书或者就是在前揭《朋友书仪》中已论到的西晋索靖《月仪帖》。《月仪帖》形式上每月二通，一通“以某月具书，君白”开始，末尾“以君白”结束；一通首尾语皆“用君白”。上通结合月份叙寒暄语及遥思朋友之情，下通则夸赞朋友才德或再叙朋友契阔。两通内容绝不重复。将此两通的开头结尾语与上揭吉凶书仪中的复书相对照，知《月仪帖》完全符合复书的特征。《月仪帖》的复书可能影响于敦煌的《朋友书仪》,所以《朋友书仪》后十二月仪中也以重复的用(语例如一月内两次重“复 孟春犹寒”)含糊地保留复书的形式，故可视为复书的遗存。

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右军书记》载王羲之诸杂帖。集这些杂帖本为书法，故有些似是碎简零函，帖与帖间自然排列，首末不甚分明，很难辨别区分。但是从信函的内容和结构分析，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运用复书的痕迹。如此书卷十有二帖云：

七月十六日羲之报，凶祸累仍，周嫂弃背，大贤不救。哀痛兼伤，切割心情，奈何奈何。遣书感塞，羲之报。

顿首顿首，亡嫂居长，情所钟奉。始获奉集，冀遂至诚，展其情愿，何图至此？未盈数旬，奄见背弃，情至乖丧，莫此之
追寻酷恨，悲惋深至，痛切心肝。当奈何奈何！兄子茶毒，备婴，不可忍见，发言痛心，奈何奈何，王羲之顿首顿首。

此二帖在原书中并未排列在一起，但显然都与嫂亡有关。首帖报告嫂亡，并称嫂“为周嫂”。次帖仍是叹恨嫂亡，并更深刻地道及沉痛之情：追寻酷恨，悲惋深至，痛切心肝。“此帖”中居长的亡嫂应即前帖中的“周嫂”。“周嫂”即期嫂，唐人避玄宗讳，改期为周。以长嫂为母，故为之服（期周）而称（期周）嫂，恐是魏晋风尚。而从第二帖接续第一“帖重叙亡人”的情况看，内容上下连贯，并且第一帖月日在前，第二帖无月日”，结书尾语“在中的情况也符合敦煌书仪所说，所以我怀疑这两帖本是一件复书。复书在前代当然也不仅用于告哀类的凶仪，它似乎也可用于家人、朋友的日常通信。同上书同卷又载以下三帖：

九月二十五日羲之顿首，便陟冬日，时速感叹，兼哀伤切。不能自胜，奈何。得七月末时书为慰。始欲寒，足下常疾，比何似，每耿耿，吾故不平，复忧悴，力困不一一。王羲之顿首。

旦极寒，得示。承夫人复小咳，不善得眠，助反侧，想小耳。念足下犹悚息，卿可否？吾昨暮复大吐，小噉物便尔，旦来可耳，知足下念，王羲之顿首。

延期官奴小女，并得暴疾，遂至不救。愍痛心，奈何。吾以西夕，至情所寄，唯在此等，以禁慰余年。何意旬日之中，二孙夭命。日夕左右，事在心目，痛之缠心，无复一至于此，可复如何，临纸咽塞。
遂至不救。事似有关，故断为一件。信中之两“处王羲之顿首”也似将信断为三纸。比张彦远《法书要录》晚的宋《淳化阁帖》，所见惟剩中间一帖，故字迹已无从比较。惟三帖是否一件，尚待证实。由于年代久远，张彦远所录法帖或遗失，或被打散而形成错简。但我颇疑，其中复书并非一、二件，如果细心辨认，或许会发现更多。如果以上推断成立，则至少晋人已开始使用复书。魏晋是世族大族方兴之际，其讲究门风，修饰礼法事无处不有，故于书信中创置这种讲究形式的复书体极有可能。只是从极少的范例中还看不出当时应用单、复体的界限，特别是一般吉仪如何用复书的情况不甚清楚。

但是，吐鲁番出土的72TAM169：(26b)高昌吉凶书仪中却在这方面有所补充。这件书仪仅残存吉书十首（内一种仅存2行，无书题）。在保存书题的九首中《相闻仪》《与伯书》《与叔书》《与姑书》《修兄姊书》《与外祖父书》等包括朋友和尊长在内的六首均用复书，但在《与兄弟子书》《与弟妹书》《姑与兄弟子书》长对少的三首中则用单书。复书形式可以书仪所载下面二首为例：

甲乙

甲
与伯书
言疏。
二月四日拜疏，言：便及春中，伏惟增怀。渐暄，不审伯尊体何如，不奉动止，下情（倾）驰。即日己自慎所行，谨言疏不备。己再拜。

己言，违离易久，忽便秸（记）载，仰恋之心，不知为辟（即）日事悠然，奉见未期，益增驰结。少适，伏愿珍重。伺信更承动静。己言。

乙
与伯书
题云伯（坐座）前
言疏。
二月四日拜疏，言：便及春中，伏惟增怀。渐暄，不审伯尊体何如，不奉动止，下情（倾）驰。即日己自慎所行，谨言疏不备。己再拜。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即日某蒙恩,仅白疏不如。不奉近告,驰(约?灼?)具。某再拜。

某白:即日耶婆万福,伏宁侍省,分违转久,驰情日结。山(海?)川缅邈,奉集未期,望途涕恋,惟兄珍重。信使出(?)再拜。

上两件复书也是第一纸开头用“如某月某日拜疏,厶(言或某白)”,末用“厶(言或某)再拜”;第二纸则首末皆“以厶(言或某白)”的形式,正是月日在前、结书尾语在中,与前揭凶仪复书完全一致,而且复书的对象也是尊长。这就无怪乎杜氏《吉凶书仪》要“说至如内族丧告外族,看吉书仪轻重”而定了。吐鲁番出土的这件高昌书仪反映了唐以前传统的复书应用,可以想见,在复书被限制使用以前,各种吉书(仪包括月仪或朋友书仪一类)都有习用复书的情况。复书应当是魏晋南北朝及唐初流行的书体。

在杜氏《吉凶书仪》之后,除了通婚书“和重丧吊答”外,上述复书形式已经很少见了。而礼学人士对于凶书仪中使用的复书形式也在逐步予以改革。敦煌S.6537v元和中郑余庆所编《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序文就批评杜氏书仪道:

然吉凶两纸多从依之者,何也?或因死丧且贵于宁戚;悲号之际,情岂假于(烦繁)文。矧乎邦家尚修单表,何哉士庶偏用复书。今则错综旧词,较量新礼,虽裁成一纸,亦毕尽哀情。说明郑氏对复书改革更加彻底,且至少凶仪复书已全部改“为裁成一纸”的单书。是不是这样呢?由于写卷残毁,原目录所列举的“四海吊答书第十七”、“内族告哀书第十九”等多已不可见。不过根据郑氏书“仪采其的要,编其吉凶,录为两卷”的大中时期张敖
《新集吉凶书仪》，还可以多少反映它的面貌。上面已说明，这件书仪吉仪部分的通婚书已是单书体，而《凶仪卷下·四海吊答书仪》（S.2622）内《吊人父母经时节疏》、《吊人翁婆叔人父母丧疏》、《吊人姑兄姊》及答书等也已由复书改为月日在后的单书，说“明四海吊答书仪”已全部采用单体。不仅如此，原来大量用复书体的内外族告哀书仪，也在保留“月日在前”规格的同时，简化了内容和层次，使之基本等同单书（详下）。这表明单书体的使用已愈来愈普遍。不过，至少到唐晚期，我们还不能说复书的形式及影响已全部消失。因为婚书用复体的情况在别的书仪尚有存在。何况“月日在前”这一规格，在凶书仪中仍有别单书，而这一点则是我们下面所要着重讨论的。

（二）内外族吉凶复书的形式变化

唐代开、天以后，吉凶书仪中复书的使用逐渐减少，但复书的减少是通过复书向单书转化的过程完成的。这一转化，自开、天至中晚唐不断进行，其中不仅有着裁成一纸的改革，也有着层次内容的合一与简化。于是复书与单书合流，并结合以书首人称从主体（致书人）向客（体受书人）的变化，成为唐代实寄书信中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1. 告哀吊答书从繁复到层次合一

上面业已说明，敦煌写本的杜氏《吉凶书仪》在有关通婚、丧葬的书仪中大量应用了传统的复书形式。而所谓传统，即是月日在前而结书尾语在中，并“且一封之中，都为数纸”，每一封皆首末具载”。“明四海吊答书仪”在以上形式方面并无变化，但如与同件文书
所载内外亲族吉书仪比较,就可知道这种复书形式已经不再用于一般除通婚书、答婚书以外的其他吉书仪。这证明了《新定书仪镜》所说的"今通婚及重丧吊答量留复体",也即不同于过去什么书仪都可以用复书了。但这"今"者是什么时候呢?

尽管杜氏书仪有了这"今通婚及重丧吊答"的变化,但我推测它并不自杜友晋开始。这牵涉到本文前揭杜友晋《新定书仪镜》引卢藏用《仪例一卷》的一段话,即他对书仪"能宜心",不在单复,既能叙致周备,首末合宜,何必一封之中,都为数纸"的看法。这段话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当时无论何种书仪皆可用复书体的不满。而他的改革,很可能就是区分了单、复体的用法,划分了"通婚与重丧吊答"量用复体的范围。至于杜氏《吉凶书仪》中那种复书的形式及范围的确定,也不过是继承了他的做法。

那么卢藏用的改革又在什么时间呢?据《新唐书》卷七三上《宰相世系表》,卢藏用出身范阳卢氏,亦为重视门风礼法的世家大族。两《唐书》本传说他工篆隶、能属文",当时称为多能之士"。武则天长安中,擢为左拾遗。中宗神龙中,累擢中书舍人,后历任吏部、黄门侍郎,并兼昭文馆学士。先天中坐依附太平公主,配流岭表,开元初起为黔州都督府长史,未行而卒。他的主要活动是在武则天、中宗、睿宗朝。仪例》题衔为黄门侍郎,据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卷一○考证,卢藏用自吏部侍郎转黄门侍郎在景云元年(710),至二年即改官尚书左丞。因此他作《仪例》的时间应在睿宗朝,而复书体的用法变化,也至少应在此前后开始,当然这一变化还只能算是唐代复体变化的最初阶段,这个阶段持续到杜友晋作《吉凶书仪》的开元中、后期,恐怕尚无更大的变动。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80

仪》中照搬了卢藏用的规定，而在婚丧书仪中采用了传统的复书体，但之后以他的名义作的《新定书仪镜》和抄其内容的《书仪镜》却对此加以进一步的修订。现将《吉凶书仪》、两《书仪镜》和张敖《大唐新集吉凶书仪》中均有的《父母丧告答兄弟姊妹书》两《书仪镜》是《父母丧告兄姊书》，告弟妹用单体)抄录于下，以资比较。

[1]杜氏《吉凶书仪·父母丧告答兄弟姊妹书》:

弟 妹 云

无状招祸，祸不灭身，

月日名白：

兄姊报。

上延耶娘。攀号擗

弟 妹

卒奉凶讳，攀

云念。

踊，五内屠裂，烦冤茶毒，不自胜忍。伏惟

号

崩绝，痛贯骨髓，由何可堪忍。不孝罪苦，酷罚罪苦，未[末?]弟妹云集 弟妹云，遣书不次，

又

拜诉，

云聚洩

倍增号绝。谨白疏荒迷不次

某兄某氏姊报

。名再拜。

具陈患状，并论

报：

冀渐瘳损，何图

名不蒙

白耶

医疗患有加增。

灵

娘违和，

祐，以某

月日奄钟弃背。号天叩地，无所逮及，肝心縻溃，不自堪忍。

伏惟念攀慕擗踊，荼毒难居。无状罪苦，祸酷罪苦。孟春犹寒，

弟妹云、汝

吾

气力何似

不审体履何如？名

不自灭亡，假延视息；号思所履，触

报。

目崩绝，无复生赖。名白

[2]杜氏《新定书仪镜·父母丧告兄姊书(》《书仪镜》同):

月日名言：罪逆深重，祸不自灭，上延耶娘，攀慕无及，五内摧裂，不能堪忍。惟奉凶讳，号天叩地，五情縻溃，何可胜任（忍 ?) 酷罚罪苦。

耶娘违和，冀渐瘳(预 豫)，何图不蒙灵祐，以某月日奄遘

凶丧，日月流速，奄经厶节，追慕永远，触目崩绝，酷罚罪苦，酷罚罪苦！孟春犹寒，伏惟哥姊动止支福。厶不自死灭，苟存视

息，未[末?]由号诉，倍增殆绝。因使附白疏，荒塞不次。厶再

拜。
以上抄录的三件书仪虽题目相同，内容相类，且皆“有月日在前”的复书特点，但形式显然已很不一样。其中第二件与第一件相较，明显抽去了原来中间部分的结书尾语，而“将谨白疏荒迷不次”、“再拜”之类的结语套话移到了书信的最后，三个“名白”，也只剩下了开头的一个。这个改变看似简单，却完成了从原来复书皆须两纸“到今删为一纸”的改革。这是因为原来的结书尾语在中间及三个“名白”的存在，正是为了区分两纸。按照复书，凡从第一个“名白”到中间结书尾语的部分应为第一纸，这个第一纸先报告亡（父母）的去世，申诉自己的痛苦无奈心情。从第二个“名白”到第三个“名白”则是第二纸，这个第二纸可以报告亡人的生病经过及死亡原因、死亡时间等，此所谓“重叙亡人”，并再次宣泄痛苦，问候收书人。但中间的结书尾语及第二个“名白”取消，表示第二纸与第一纸已合并为一纸，这应当是杜氏《新定书仪镜》也包括《书仪镜》文字相同部分）比之卢藏用《仪例》及他自己的《吉凶书仪》所作的进一步改革。这项改革虽然看似简单，但是从两《书仪镜》开始，唐代复书书体的变化，却可以

①“奉（谨奉）状力疏”句，赵和平录入文为“（奉谨奉）力状”，此处据《敦煌宝藏》P.2622改。

[3] 张敖《新集吉凶书仪·父母亡告兄姊弟妹等》：

“无状招祸，祸不灭身，上延耶娘，去无月日：

膳寝违和，冀渐平复，何图以无月日奄从弃背。号天叩地，无所逮攀慕号绝，茶毒难居。不孝罪苦，酷罚罪及。伏惟苦，未[末]由拜慰，伏奉谨（谨奉）状力疏

增号绝。荒迷不次，再拜。
说是走上了新的阶段。新的变化产生无疑会有一渐进的过程。从杜友晋《新定书仪镜》批评将复书多纸改为单“纸颇为剪浮”,申明其改革“是参验古今”,“是达者裁择”来看,当时社会上恐怕已有用这种改良复体的了。杜氏《新定书仪镜》只是不拘一格,顺应潮流罢了。严格地说,他所做的只是将这种新形式的书仪纳“入大雅”的规范,使之成为登堂入室的仪制。当然这种变化从开始悄然兴起,到最后写入书仪,都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在开元时代的《吉凶书仪》中尚未见到,而在年代至少是天宝以后的《新定书仪镜》及《书仪镜》中才终成定式的原因。

复书形式的变化写入书仪后,可能会得到更快的普及。这在敦煌社会自然也不例外。不过《新定书仪镜》或《书仪镜》对复书的改革尚是初步的。上录第二件书仪本无分段,笔者抄录时是为了区分层意而分成两段。根据分段与第一件书仪作比较,可发现第二件文字虽略有简化,但原有的两重意思或曰两纸内容仍予保留。取消中间结语和“名白”以后,只是简单地将两部分捏合在一起。这样,复书的实质便尚无变化,而一纸之中,即不无重复表达之嫌。像这样虽取消中间结语但实际上仍完全保留复书内容的凶仪我们在S. 1438《v 吐蕃占领初期的汉族书仪》中也有所见。这件书仪年代说法不一,但笔者比较倾向于近年论者据藏文书推测应作于沙州陷蕃七年后即贞元三年(787)的看法①。这件书仪中也有两通“复”书。一通是父母亡给兄长的告哀书,内容如下:

①杨铭:《一件有关敦煌陷蕃时间的藏文文书兼及S. 1438v〈书仪〉》《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
这首告哀书由于是实寄书信，所以叙事述情语要比上述书仪多一些。但是仅就内容、书写形式用语而言，与《书仪镜》及《新定书仪镜》几完全一样；惟首“言姓名”而不“言白”，末“称顿首顿首”与杜氏书仪略有差别。从两次“的酷罚罪苦”来看，此首凶仪仍保留着复书的两层含义。

另一通是给僧人的吊慰书，同样是用了两“重哀痛奈何”来重叙亡人”的改“良复书”，由其“中大师”、阇梨”的称谓看，是为一位高僧去世而作。令人感到不寻常的是，作书人不仅用了如上形式，而且竟在信末用了“了孤子某顿首顿首”和哀叹父母死亡“的“惟攀慕号擗，五内屠裂”一类词语。据杜氏《新定书仪镜》凡例“，凡无父称孤子，父存母亡称哀子”，知孤、哀者除父母亡外是不可随便称的。作书人将自己称作孤子，是“将大师”视作父亲了，所以才用了复书形式，而且表现得如丧考妣。上面所举的复书仅用于内、外亲族告哀吊答，或用于朋友、官场彼此重亲吊答，尚未见有用于和尚的，对和尚执孝子礼更是少见。其形式内容只能说明敦煌社会礼仪文化受佛教影响的特征。不过，这两通吊书的出现，却说明杜氏书仪对
复书所作的改良形式长期以来都在使用，并影响着敦煌。更进一步的复书变体则是从上揭张敖的《新集吉凶书仪·父母亡告兄姊弟妹等[书]》中看到的。新的复书变体显得十分简约。从形式看，这件告哀书虽仍然保留着“月日在前”的复书传统，但除此之外，已无与原来复书相同的特征。它除了继承杜氏将中间结语移向后的变革外，在文字内容上也作了相应处理。原来的两重表达已简化为一层，先叙亡人之死，继而安慰生（人收书人），表达彼此痛苦的心情。文意一气呵成，感叹词也不再有所重复。这样的复书在形式内容上其实已等同单书，只是由“月日在前”，而在告哀书仪中保留着“月日在后”单书不同的使用规格，从而多多少少保持一点传（统 两者用法区别略同《新定书仪镜》及《书仪镜》）。因此复书至此，已可以认为是走上了书体变化的第三阶段。以上变化虽在张敖《新集吉凶书仪》中有所表现，但由于张敖书仪是自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采其的要而成，所以反映的其实是郑氏书仪的内容特点。它证明了以往学者关于唐代单复书的变化是由卢藏用、杜友晋开始，而由郑余庆完成的观点。不过书体变化至此，并不是说复书就此杜绝，完全不再使用。事实上单、复体交替使用，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对这一点《通婚书》及别纸的出现都可以说明。2.通婚书的两种形式

《通婚书》复体向单体的转变，已可见于杜友晋《新定书仪镜》。敦煌P.2619写卷是一件残书仪。这件书仪的分栏形式及多行文字均与P.3849号写卷对应相同，因此已被谭蝉雪女士和姜伯勤先
往来皆须以函封，无函者可用纸。虽近未久，答书准此。弟云，亦云，兄，随时称之。未有伉俪，婚媾。《按：当作妹》，子任言。侄令淑有承第（贤？），闻，愿孙任言。若干女（亦云）敢希，高媛，谨因某。名，敢结。名诸弊少理，言展未由，惟增翘轸，愿敬德，遣白书不具。姓名顿首。《答函书》

阔展，倾展良深。既久，孟春犹寒，体履如何？愿馆舍清休。名第，名，息名，随来书云，愿。言之。未有姻婚媾。好，谨因行人某姓名，敬承来命。名诸疾弊，言叙尚赊，但增倾眷，愿敬（勖？），还白书不具。姓名顿首。郡姓名白书

题云：姓官位阁下，前书同。

①参见谭蝉雪《敦煌婚姻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页；姜伯勤《唐礼与敦煌发现的书仪》，载氏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仪》基本相同,但形式显然已不一致。根据我们上面已说过的单复书特点,这件书仪已是彻头彻尾的单书。它虽然没有确定月日的位置,但置于原书体中间部分“的名诸弊少理,惟增翘轸,愿敬德遣白书不具。姓名顿首”已移到了书尾,并且不再“有名白”的重复。经这样一改,两纸便自然合为一纸;而且由于婚仪复书两纸内容,一纸寒暄,一纸论婚,本不重叠。故从复到单,是一步到位。文字简洁流畅,比杜氏对于凶书仪的改革,显得更加彻底。而同样形式的简体婚书,在后来大中时期张敖的《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P.3502背)也有所见,其通婚书“以"顿首顿首"开头,末"称月ën日ë郡ë状ë官位阁(下按此似含封题)”,答婚书也大体相同。且此两通书仪与上录P.2619两通形式基本一致,文字也大同小异。由于月日明标在后,更证明了是单体书仪。它们的出现,说明杜氏之后,婚书的单体形式也在流行。不过,很可能是由于婚仪毕竟比较隆重、特殊,所以直至晚唐婚仪复书仍有使用。总之依据郑氏书仪纂集的张敖《新集吉凶书仪》并没有采取他在《新集九族尊卑书仪》中的相同做法,吸收后来的婚书单书形式,而是保留了以下另一种复书(式 P2646):

通婚书
－顿首顿首:阔叙既久,倾临(瞩目良深)。
如未相识,即云久(岁徽猷)末由展觌,倾幕之至,难以名言时候,伏惟位动[止]万福[,愿]馆舍请如前人之妻,[清]休。
即不(同用)此语即此蒙推兑(免)增翘轸。
或弟或侄别纸:弟(第)几男任言之。
“按蒙推兑”“乃蒙推免”之误,意即蒙恩取其改革”
或妹、媾。承侄女贤女，(弟令淑有闻,四德兼备，愿结高援，谨第)因媒人氏，敢以礼请。脱若不遣，听嘉命。氏白。

通婚书照旧词分两段，答婚(书略)也是同样。第二段题“称别纸”。别纸毋庸说“乃别用一纸”，即婚书须两纸。而将此两纸婚书与杜氏《吉凶书仪》的婚书加以对比，便发现两者在形式内容上都基本一致，惟一不同的只是以上婚书未注明月日，所以实质上，这件婚书仍是传统复书。

同样“用别纸”的婚书复书我们还在P.3909《今时礼书本》残存“论通婚书法第一”、“论女家答婚书第二”中见到。这件文书中的婚书寒暄语略减，但别纸论婚依旧。年月或年月日竟均书于两纸之后，可见民间书体格式有时会出现一些混乱而不甚规范。

不过，此件礼书对婚书“有公使卿大夫以上男女”和令长已下及庶人使用的分别。这个分别只在文字用语，而不在改变书体形式。

由此我推测，唐后期通婚书虽已有单书，但官民用复体的情况仍相当多，且历时甚久，而这也是复体向单体转变及单、复体走向合流的必然过程。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唐代复书变化应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最晚自睿宗时开始，延至开、天，反映在卢藏用《仪例》、杜友晋《吉凶书仪》中，即是约束了复书的使用范围，使之只能用于通婚书和重丧吊答;第二个阶段应自天宝以后，至于贞元、元和，以《新定书仪镜》和《书仪镜》为号召，复书在这一阶段形式发生了自两纸、多纸改为一纸的转变，其结书尾语的位置也发生了相应变化;第三个阶段自郑氏作《新定吉凶书仪》的元和年中始，复书在形式结构上已进一步简化，并向单书靠拢，甚至完全转变为单书，这在大中张敖《新集吉凶书仪》中已有诸多反映。在吉凶书仪中复书仍有使
用而逐渐减少并与单书合流。唐末五代应是这一阶段的继续。

3.单复书的合流及与传世文献的比较

吉凶书仪的复书经过改造后，除“月日在前”这一点与原来的单书就没有区别了。其实原来的吉书仪或一般的通信中，本来就有这样的形式存在。例如吐鲁番72TAM169:26（b）高昌吉凶书仪中的单书大体就是如此。其中《与弟妹书》首“称题云某官弟，六月某报”，“称题云某官弟”是封题，“六月某报”便是写信时间和自称。同样《与兄弟子书》首“称题云某省，七月某告”，“称题云某省”是书题，“七月告某”便是“月日在前”加自称的形式。

高昌书仪的吉仪单书形式也是继承魏晋南北朝而来，同一形式在传世文献中可见多例。如《法书要录》卷十载王羲之一帖云：“六月十九日羲之白，使还得八日书，知不佳，尔何耿耿。仆日弊而得此热，匆匆解白耳。力遣不具，王羲之白。”又如《淳化阁帖》卷二录魏钟繇书：“十二日繇白，雪寒，想胜常。得张侯书，贤从帷帐之悼甚，哀伤不可言。疾患自宜量力，不复一一，繇白。”此外，同书录晋侍中郗愔书、晋太傅陈郡谢安书、宋中散大夫羊欣书、梁萧思话书、陈[晋]朝陈逵书等也都有极相类似的形式。这种形式“与月日在后”的单书相比，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显得更加郑重一些。前述《新定书仪镜》在征引卢藏用《仪例》关于书疏之兴，其来自久的叙述中，未言魏晋，却在“少（卿任安）、子（长司马迁）”之下，直叙“暨齐梁通贤，（赖颇）立（标？）统”。但就传世史料来看，至少魏晋之际，已有书仪的诸多形式，至于齐梁是否在书体
方面更有改造,则有待进一步发现和证实。

敦煌所见各类朋友书仪、内外族吉书仪中,所用单书大都是月日在后。但是月日在前的情况自唐前期至后期皆有之。《文苑英华》载此类书信甚多,绝大多数用于给长官或地位较高之人,也有用于朝廷上书。如卷六七三王勃《上绛州上官司马书》"称月日,龙门百姓某谨再拜奉书于司马上官公足下")、卷六六九权德舆《与黜陟使陈谏议书》""某月日,试秘书省校书郎权德舆上书阁下")、白居易《为人上宰相书》"二月十九日某官某谨拜手奉书献于上公执事")等等,语气均显得较为恭敬。当然这种用法并未有绝对的范围界限,但与我们前面所"说重丧"书仪尊长"者月日在前"的情况却似乎是相通的。

此外月日在前却是单书体裁的,还有从敦煌书仪及传世唐人文集中所见各类祭文。如杜氏《新定书仪镜》中有《父母初薨尊祭文》《三日小殓祭》《七日大殓祭》《堂上启柩将葬祭》乃至春、夏、秋、冬四时祭等。这些祭文多"以维年月日"开头,如《春祭》首称":维年月朔日孤子名等敢昭告于亡考之灵",末称"敢荐甘新,伏惟尚飨"。张敖《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嫁娶祭文》首"称维厶年月日某乙,谨荐少牢之奠,敢昭告于先灵之神",末"称谨以单酌,伏惟尠歆飨。再拜"。《新集吉凶书仪·夫祭妻文》"维年月朔岁次厶日辰,厶官厶乙谨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亡妻厶氏夫人之灵……谨以清酌之奠,幸愿卿兮降歆,尚飨。相同形式的祭文见于唐人文集如韩愈《祭马仆射文》《祭十二郎文》等。此类祭文的应用相当广泛。总之传统复书仪简化之后,与上述单书仪形式已没有太多不同。这进一步证明了单复书的合流。而我怀疑,杜氏对复书仪的改造,也正是因为这类月日在前的单书仪本来存在,可以参照之
以上我们较多地注意了唐代书仪单复体和月日的签署位置问题。那么书仪在形式上，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变化呢？前节已说明唐人书仪信首往往“以名白”“名言”“或顿首顿首”开言，这样事实上显得十分呆板。“名”“或”乃写书人自称自言，表示客气，而不是像今天的书信是称收书人。从传世文献得知，唐人的这一习惯是上继魏晋南北朝。前录《法书要录》及《淳化阁帖》即多如此。但是正像汉人书信可以省“称少卿足下”“子陵足下”一样，唐人逐渐地也有以呼收书人为主，或直呼收书人的情况。如《文苑英华》卷六七○于邵《与郭令公书》信首直“呼汾阳王令公阁下”，白居易《与刘苏州书》直“呼梦得阁下”，《与杨虞卿书》“称师皋足下”，而他的《与微之书》四月十一日夜，乐天白：微之，不见足下面已三年矣，虽仍以自称开头，但直呼微之，想念朋友之心已跃然纸上。同样，杜牧《与池州李使君书》亦直“呼景业足下”。这种称呼，显得直截了当，亲切自然，一般用于熟人友朋，似乎可以体现唐人热情平易的交友风范，它给呆板的书仪格式也注入了一丝活跃的气息。而这种形式，虽尚不能称之为当时书仪之主流，却显然是后代书仪之滥觞。因此，唐朝书仪自复书向单书简化，形成复书与单书合流，并结合以书首人称从主（体致书人）向客（体受书人）的变化，便完成了从古体书仪向近体书仪的转变与过渡，这也许就是我们应该把握的唐代书仪基本规律之一。
时，另一种复书的形式却出现并逐渐频繁化了。这就是在晚唐五代某些敦煌书仪中常常见到“的别纸”。这一书信形式的出现，引起了学者的注意。赵和平通过对《新集杂别纸》的考释，提出“别纸是一种有别于正式公文，如表、状、牒、启等正式公文程式的公私信；梁太济先生认为是一种篇幅短函的泛称”小用于私人之间交。近年陈静《“别纸往的书牍文体”考释》一文对别纸的源流演变作了更全面细致的考察。他提出，从古籍使用的情况看，“别纸”大有四种用法：1.另外的纸，另一张纸；2.另一封信；3.复书第二纸的别称；4.文件的附件，多指书信的附件。他的考察，无疑使对别纸的认识深入了。别纸的用法究竟是否完全如陈静所说，其意

(一)别纸的来源和意义

以上陈静所说别纸有四义，其中作“为另一封信”的含义，是以魏晋南北朝史料为依据的。但笔者认为，根据文书和文献“别纸”除了作“为另外的纸”的本意之外，从它出现时始，便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一封书信的另件或另纸，也就是上述第三第四意的综合。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第二》裴松之注引《吴历》：曹公出濡须，作油船，夜渡洲上。权以水军围取，得三千余人，其没溺者亦数千人。权数挑战，公坚守不出。权乃自

①赵和平《新集杂别纸的初步研究》，载《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253页。
②梁太济：《别纸“委屈”及其他（桂苑笔耕集〉部分文体浅说》，第二届韩国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1997年，杭州。此处转引自陈静《“别纸”考释》。
③陈静1999《“别纸”考释》《敦煌学集刊》年第1期，第105—114页。
来，乘轻船，从濡须口入公军。诸将皆以为是挑战者，欲击之。公曰："此必孙权欲身见吾军部伍也。"敕军中皆精严，弓弩不得妄发。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公见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权为笺与曹公，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别纸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语诸将曰："孙权不欺孤。"乃（撤）军还。

这里的别纸，陈静引王世贞《尺牍清裁》指出是孙权《与曹操》尺牍显然是对的，但认为"是相对于孙权给曹操的第一封笺而言的另一封信"则似乎根据不足。在这一点上可作参考的是同书卷六十《吴书·贺全吕周钟离传第十五》，内言鄱阳太守周鲂被命密求山中旧族名帅为北敌所闻知者，令谲挑魏大司马扬州牧曹休。鲂答，恐民帅小丑不足仗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亲人赍笺七条以诱休：

恪未显其一曰："鲂以千载徼幸，得备州民，远隔江川，敬 ，瞻望云景，天实为之。精诚微薄，名位不昭，虽怀焦渴，曷缘见明？狐死首丘，人情恋本，而逼所制，奉觌礼违。每独矫首西顾，未尝不寤寐劳叹，展转反侧也。今因隙穴之际，得陈宿昔之志，非神启之，岂能致此。不胜翘企，万里托命。谨遣亲人董岑、邵南等托叛奉笺。时事变故，列于别纸，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远民之趣，永令归命者有所戴赖。"
别纸"的滥觞。这里别纸既专指同一书信之另纸，如于同一时代的孙权给曹操"的 别纸"应当是相同含义而不"指 另一封信"。以此类推，南史》卷四二《 豫章文献王嶷传》中豫章王嶷让居邸给太子"的 别纸"也是同样。其原文曰:

又启曰":北第旧邸，本自甚华，臣往岁作小眠斋，皆补接为办，无乖格制。要是柽栢之华，一时新净，东府又有此斋，亦为华屋，而臣顿有二处住止，下情窃所未安。讯访东宫玄圃，乃有栢屋，制甚古拙，臣乃欲坏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于前，且补接既多，不可见移，亦恐外物或为异论，不审可有垂许送东府斋理不？"上答曰":见别纸，汝劳疾，亦复那得不动，何意为作烦长启事。"竟不从。

这里皇(帝 齐武帝") 答曰"的一段话《，南齐书》卷二二同人传"作 茹亮今启汝所怀及见别纸，汝劳疾亦复那得不动，何意为作烦长启事"。陈文认为，所"说 别纸"是指萧嶷在上述让屋的长启之外另作的《 疾笃启》。据同传，萧嶷死前确曾作《 疾笃启》，但那已是永明十年(492)，而《 南史》和《 南齐书》本传记上件让启却是在永明元、二年。据《 南齐书》传称其永明元年上手启已"有 自倾以来，宿疾稍缠，心律恍惚，表于容状，视此根候，常恐命不胜恩"语。所以" 劳疾"未必是"指 疾笃"。另外据让启中"有 前侍幸[萧]顺之宅"语，根据史料所载萧顺之死的年代，作启时间即使不在元、二年，也不会超过永明八年。因此，别纸不会是指《 疾笃启》，而是指让屋的

①按萧顺之死于永明八年，见《 资治通鉴》卷一三七，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296页。
那么，为什么要称让启为别纸呢？这是因为，让启可能是萧嶷同时上齐武帝书中的一件。例如上揭永明元年手启就是因其授官“领太子太傅，解中书监，余如故”而上。启中说“道 陛下同生十余，今唯臣而已，友于之爱，岂当独臣钟其龙遇。别奉启事，仰乞恩照”，所谓“别奉启事”也是别纸。试想授官当有谢表，或按规定有其他公文程式。然启中言事，甚及于私，与固定格式的公文体例不合，故别附于外，于是便有了所谓别纸。作为“烦长启事”的让启情况大体相类。这种公文之“外别纸”的使用也许就是所谓齐梁通贤，颇立标统”之一吧。

（二）别纸和重叠别纸在晚唐五代书仪和文献中的应用

关于别纸的具体运用，陈文已引述P.3906书仪所说：“凡修书，先修寒温，后便明体气，别纸最后。”并指出别纸应当放在寒暄时节天气、问候身体平安的礼仪之后，而且要与这些套话分开，另成一个部分，按照这一规定，别纸其实是和吉凶书仪中的吉仪复书很像。例如前揭吐鲁番出土高昌书仪中的《与伯书》前纸“有便及春中，伏惟增怀。渐暄，不审伯尊[体]何如，不奉动止，下情（倾？）驰”语，就是专门用于“修寒温，明体气”的。此外更有前揭通婚书。如陈文已指出，敦煌P.3909《通婚书、今时礼书本》中已明确“将别纸”作为通婚书和女家答婚书的复书第二纸，而它的前一纸，本来也是“修寒温，明体气”的，正式求婚的意思都是放在第二纸当中。所见还有P.3691《新集书仪》中的《弟子
与和尚书》一首，”在 违离已久，无任驰结。时候，伏惟和尚尊体动止万福，即日厶蒙恩，（未 末）由顶乙，无任恋结，谨奉状不备。厶和南”等寒暄语下也注明”：余具别纸中。”《月仪》或者《朋友书仪》大体也不违背这一原则。索靖《月仪帖》正月具书””的大蔟布气，景风微发，顺便绥宁，无恙幸甚……企伫难将，故及表问”都是寒暄问候语，而下纸才轮到畅叙友情和对朋友渴想之意。由此看来，复书、别纸不过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称呼罢了。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原来的吉仪复书并无太大分别。不过，由于”如 孟春犹寒，伏惟某官尊体动止万福”一类套话尽人皆知，所以在书仪中便往往可以省略，尽”剩 别纸”作为主要内容这样别纸便有了独立而特殊的作用，它们的写法当然也就可以自成格局而有创作的余地了，而且别纸的内容大多不重复，这又是它它们与固定格式的复书不尽相同之处。正是由于有此特点，所以别纸不仅是在魏晋南北朝，而且在唐后期五代也是更多地出现在官牍文范，即表状笺启书仪中，甚至成为某种官文书范的别称《。新唐书》卷六○记有薛逢《别纸》十三卷（《通志》卷七○又载有《薛逢刀笔》一卷）薛逢，《新唐书》卷二○三《、旧唐书》卷一九○下有传，言其曾为河中节度使崔铉从事，后人朝历侍御史、尚书郎，官至秘书监。今《全唐文》和《唐文拾遗》仅存其文十六篇，内有书、启等十三篇，均不”以 别纸”为名。不过，这些书启大都直叙其事，并无寒暄问候语，如《谢西川白相公寄赐新诗书》直”言 伏蒙仁恩，猥垂下顾，兼赐新诗三十首《，上崔相公（鉅）罢相启》也是从头即慰罢相事，不知是否有省却第一纸问候语
①陈静《：”别纸”考释》《，敦煌学集刊》1999年第1期，第105—114页。
“的 别纸”在内。此外标明别纸的，还有传世如崔致远《桂苑笔耕集》中《上座主尚书别纸》《贺除礼部尚书别纸》《济源别纸》《迎楚州行李别纸二首》等多首。

敦煌表状笺启书仪中，也有大量散见于起居、贺官、贺节、赠物和其他用于各种场合的官文别纸。其中确实有不少是删去了修寒温、明体气客套话的专门叙事之文。例如P.4092《新集杂别纸》有《贝州司空》一首，开头即“是伏以司空定难功高，平戎绩著，散庑金而不惭往哲，碎玉壶而宠迈昔贤；故得迭住宸襟，允膺殊渥”；虽有吹捧，但非寒暄，可以说是直入贺官“正题”的。又如P.3931中灵武节度使致甘州回鹘的书状别纸，都是涉及与回鹘关系的具体事实。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全部，同是《新集杂别纸》“月旦贺官”即不是如此。例如“三月”一首“道伏以画鸭嘉辰，斗鸡令节；柳坼而黄莺显瑞，花鲜而（白）鸷呈祥。伏惟司空贾寇齐声，龚黄并价；夙著治民之绩，久彰及物之（仁 下略）”，内中虽“无明体气”，却不少叙节令的“修寒温”。可见别纸的内容并不是绝对不写套话，而是可以根据情况要求所定，其用途也不一，有的只是为了表示贺节、贺官的郑重，如上述给节度使、朝廷大僚等“月旦贺官”及“贺端午别纸”“贺正别纸”（P.3906、P.3931）；有的是赠物，“称寄信别纸”（P.3906）“具信”（P.2539v）；有的就是切入主题的奏事或具体谈事了。

官场中奏事或谈事采取别纸形式，原因之一是官文的格式、用法严格。表是表，状是状，（奏 启）事是（奏 启）事，不能混为一谈。这一点其实P.3900《唐前（期 武则天时期？）吉凶书仪》已有反映。此书仪在给皇帝《庆正冬表》的题函面【语】中说“明应奏事者，但修状进其【状】如前”，并在下面记述了奏事的格式：
略述事

由。

某年某月日    敕遣臣勘当

某事    某事

前件事

如无制敕荷处分自须奏事者,依前头上

某年月日具臣姓名进……状后年月日

建事由;右已下叙述委曲讫,云谨状

具

官姓名状。

这件奏事状附于表后,但与表不相连,后且要另具月日官名,可见

与表不是一回事,很可能是要别纸书写。给皇帝的表状、奏事需要分开,给官员特别是长官的公文也有

同样的讲究。如陈文所示,晚唐五代别纸于官场奏事启事的也特

别多,恐怕就是由于有这样的需要。另在公文奏事之外,又有私事

私情的表达,就更需要放到另纸之上了。本书在《书仪的礼书规格

及诸种程式》一章中,曾引用李匡文《资暇集》卷下提到元和中,李

吉甫将批阅过的别纸送错地点之事。别纸后被李光颜退回”,赵公

(李吉甫)因命书吏,凡有尺题,各令签记以还,故于今成风也。”其

"中 别纸"明谓属"于 尺题",应在正式的公文之外,附着于公文,故

称别纸。别纸可以用来说私话,当然也可为另外叙事,如何表达非

常重要。这是官场中替代不了的,所以才在唐后期表状笺启书仪

中盛行。

别纸并不一定是正书外仅加一纸《。北梦琐言》卷四称唐宰相

卢光”启 受知于租庸张濬。清河出征并汾,卢每致书疏,凡一事别

为一幅,朝士至今效之。盖八行重叠别纸,自公始也。”这”种 凡一

事别为一幅””的 八行重叠别纸”无疑使官场奏事更加清楚、方便,

所以它的流行并不奇怪。问题”是 重叠别纸”是什么样子呢?笔者

在前面章节中,已说明P.2945《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状稿》

中的前七书就是一件重叠别纸。这件书信的第一状有” 相公尊体

动止万福”一类的问候语,末尾有日期,毫无疑问”是 修寒温、明体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气“的正状。第二状只“有不审近日尊体何似，伏愿精(嘉加)药膳，以安社稷生灵。伏惟恩察，谨状”几句没头没脑的话。由于署名“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而没有日期，与下面的“又贺别纸”“又别纸”基本一致。所以虽然没有注明“别纸”，但显然应为前状之补充而与下面数纸一致。惟其如此，才可以解释为什...
波，难逾巨壑。今则已依曲浦，暂下飞庐……候过残腊，决撰行期。"这是说明遇风浪不得不停留的苦衷。第五首称：某启，自叨指使。惟欲奋飞，必期不让秋鹰，便能截海；岂料翻成跛鳖，尚类曳泥。虽慎三思而行，且。既劳淹久，合具启陈。"这是再乖一举之度表达了不能成行的无奈，最后并"用 笼鹄无失，藩羊自安，惟愿时然后行，必当利有犹往"之类的话以自解，示将随遇而安。总之，五首所言都是出海之事，有一定的时间性和过程，但主题、中心为一，前后贯通。出海时不大可能随时派人送信，如果我们判断的不错，那么有时重叠别纸的使用是可以记载一段以来发生的事情。须知卢光启创造重叠别纸就是当" 清河(张濬)出征并汾"之际，则由于征战之际通信不便也应是重叠别纸产生的一个原因。晚唐五代常常出现动乱局势，书信有时恐怕不是很方便寄出，只能随时写下一并送到。敦煌P.2945卷尤能说明这一问题，试想其时道路不通，朝贡如不组织使团且无各方保护则不能到达。在这种情况下，又怎能一次次派人送信?灵武使者长期逗留敦煌和七件书状别纸的时间跨度长由此不难理解，而这也正是重叠别纸使用的意义所在。由于史料阙失和记载不明，我们在文献中发现的别纸还不是很多。但是我怀疑有些书启虽然从名称及形式看都是一纸单书，实际却是无开头语而直叙其事，去掉了第一纸寒暄的复书。关于这一点，我们确实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明和发掘。不过有一点是值得思考的，即魏晋南北朝发展起来的复书本有民间和官场的两种功用，但唐以后民间吉凶书仪中复书形式的应用不断减少，表状笺启书仪和传世文献中的官牍别纸却是逐渐增加。这就是说，一方面贵族创造的烦琐礼仪随着庶民社会的发展需要走向简约，但是另一方面新的繁文缛节却又在业已成熟的官僚社会中滋生发展,
中古社会的礼仪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矛盾中递进,书体的变化也是如此。不过,形成两纸或多纸“别纸”并不是以往复书的简单重复,而是有着实际内容并体现着时势的特殊要求,在这一点上,别纸的频繁使用显然不能简单地认为完全是一种倒退。
官称与行第

官称和行第是唐社会最习见的礼仪性称呼。这两种称呼魏晋南北朝都已有之，但不如唐朝盛行和普遍。除传世唐五代正史、诗文、小说等文献资料可作说明外，敦煌书仪中也存在着大量官称行第的应用。这两种称呼既可联称，又可并用；既可用于亲属，又可用于朋友及长官僚属之间。它们在某些场合表示郑重谦敬，在某些场合却显得客气亲切，其流行自然与中古社会士族避讳的风习有关，而除此之外，还体现着人际关系中的不同含义。书仪关于官称和行第用法的显示及说明，进一步丰富了人们的认识。

因官爵而生的官称和来自家族的行第并称连用，反映了唐人对仕宦和门第两者并重的价值观念。在重视婚宦的关中、代北贵族取得政权，和唐太宗修《氏族志》“以崇我唐朝人物冠冕”之后，唐社会已日益发展为一个官本位的社会。“氏族之盛，实系于冠冕”的意识不仅主宰了统治阶级的观念，也主导了庶民百姓的世风。但是受南北朝影响，在唐人的心目中又是官族并重，官婚与族望俱美。很有趣的一个对比是：官称是从官场波及家内，而行第却是因家族影响官场乃至社会。两者传播方向相反，反映社会变化却一致。因此官称与代表家族的行第并行，两者互相烘托，成为唐社会礼仪标准在称呼上的一个特殊表现。
一、官称、官称别名的使用与官员敬称的等级变化

官称是对官员称以官名，虽不始于唐朝，但唐朝的称法最多而滥，以致发展为各种官称别名，天宝以后尤为多见，并在晚唐五代形成社会风尚。敦煌书仪的大量使用官称，以及官称别名随着年代愈向后愈增多，虽不无避讳之影响，但更是唐人热衷官场生活的反映。

敬称用于书信自两汉已兴，魏晋南北朝至唐相沿为习。敦煌前后书仪也均在官员的官称或官称别名后加以敬称表示身份，但前后书仪敬称使用意义并不相同，随着唐社会礼仪下僭和庶民意识的上升，其高称等级不断下降，称用范围日益扩大，成为一种自然的趋势。

（一）官称的普及化

官称在唐代社会十分普遍。《唐语林》卷四的一条记载唐朝人说：

开元以后，不以姓名可称者：燕公、许公、鲁公。不以名而可称者，宋开府、陆兖州、王右丞、房太尉、郭令公、崔太尉、杨司徒、刘忠州、杨崖州、段太尉。位卑而名著者：李北海、王江宁、李馆陶、郑广文、元鲁山、萧功曹、独孤常州、崔比部、张水部、梁补阙、韦苏州……元和后，不以名可称者：李太尉、韦中令、裴晋公、白太傅、贾仆射、路侍中、杜紫微。位卑而名著者：
其中无一例不是以官(名 包括职、散、勋、爵)称呼。尽管称官名汉
魏以来已颇流行,如刘豫(州 备)、谢太(傅 安)、王右(军 羲之)之类,
但像这样一概以官名为标记,前代却无如其比。可见有官者称官,
在唐人已是习惯。官称的流行,应当与魏晋以来大族避讳的礼法有关。避讳向
以避国(讳 皇帝)和避私(讳 父祖名等家讳)为两大原则,特别是私
讳在大族的提倡下已发展为恶闻己讳和不犯他人之讳。而唐人不
仅在各种场合习惯于避私讳,更注意“在 公所”中避长官之讳,以免
影响到自身仕进。所以唐人称呼官名,使用范围可以非常广泛。
但呼官名既是避讳的需要,也是对官员身份、地位的显扬,比之直
呼其名显得更加尊重。如唐高祖对裴寂”呼为‘裴监’而不名。当
朝贵戚,亲礼莫与为比 唐太宗也呼虞世南”为“虞监”,谓“虞监。”
博闻、德行、书翰、词藻、忠直,一人而已,兼是五善” ,其意也旨在
尊敬和褒奖。当时朝廷内外无论尊卑,上至宰相,下至令史,互相
间多以官(称 有时须加敬称)。发展到称官名即可用于下对上,也
可用于上对下及平辈之间;既可用于正式场合,也可用于私下交
往。唐人应和酬酢的诗文,多“以 (赠 送、和)某官”为题,甚至亲朋
近属也要在诗作中标明官称,如李白有《 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
南》 ,孟郊有《 陪侍御叔游城南山墅》 ,权德舆也有《 送韦起居老

①张泽咸、李斌城等《: 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第四章第八节《 避讳》,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98年
②《 旧唐书》卷五七《 裴寂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287页。
③刘向撰,程毅中点校《: 隋唐嘉话》卷中,中华书局,1979年,第16页。
④《 全唐诗》卷一七一,中华书局重印本,第1758页。
⑤《 全唐诗》卷三七五,中华书局重印本,第4210页。
这类题署，反映官称是从官舅百日假满归嵩阳旧居》场扩大到家内，其意义已不止于避讳，而是清楚地表明唐人在日常生活中对官职的看重。敦煌书仪中，更不乏官称的使用，并且这种称呼法同样适用于家族内外。只不过在书仪是尊卑之分更加讲究，自称"则凡尊长统称吾，小重平怀皆称名"，即除尊长对卑下可自"称吾"，其他都应自称名以示谦恭。他称或互称则以官位和官名，而且大都是书于封题之上。例如杜氏《吉凶书仪》中《与表丈人及表姑姨兄姊书》，封题对表丈（人或表兄）"称谨封某姓位丈人兄……坐前"《，与表弟妹书》封题"为谨外内兄、姨兄姓名书某氏表姊、姨姊书封按：以上为自署名)简某姓位弟、某氏妹"。姓位"就是姓和官位，可见对收书人有官应称官。同件书仪有《四海吉书仪五首》，内除《与极尊书》封题称对"方某姓官位座前"，之下自"署某官姓名白记"，余四首封题也都是自称名而对收书人称官或官位。例如《与稍尊书》称侍者"谨姓名白书封谨通某姓官位，稍尊前人称侍者"《，与平怀书》"称谨姓亦云修承封谨通某姓官左名白书右，若稍尊前人称侍者"，即与稍卑或卑者书也"是书简姓某官"或"送某官"一类。不过，"称官位"比"称官"显得更隆重一些，推测官位"是指官名全称，"而官"就可能是简称或某种职名了。称官或官位才显出对对方的尊重，在书仪中是突出的。致书人对自己和收书人均署称官位的情况只出现在特别郑重的场合。前揭《四海吉书仪五首》中只有《与极尊书》的封题是署上自己官职的。而杜氏书仪同卷通婚书的封题"郡姓名白书谨
谨通某姓位公阁下，某官郡姓名白书（自称）下，特别注明若尊前人卑不用某官。由此可以知道，当对方官位高于自己，或为特别表示敬重，则在称别人官位的同时自己也要署明官职，否则不须如此。

以上所说都是封题的情况。唐人信内的自称如前所说是称某（或厶）称名，但也有例外。例如《与妇书》内“有月日位姓名状通语”，位就是自署官职。传世书信中如是呼对方，则多以官称敬称；如为表郑重或报告性质则自己也署上官名。前者如权德舆《与郭令公书》开首“称汾阳王令公阁下”《，与李尚书书》“称某顿首尚书姨夫阁下”。后者如张九龄《上姚令公书》首“称月日，左拾遗张九龄谨奏记紫微令梁公阁下”，韩愈《与于襄州书》首“称七月三日，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谨再奉书尚书阁下”。虽然月日是否署在前面的形式不同，但官称称用的原则略同书仪。官称还可以与行第对称或连用，更可以见出两者的同异，关于此请详见“行第”节的论述。

（二）中晚唐书仪中的官称别名和官场文化

唐人在以官称相呼的基础上，又派生出许多别名。唐参寥子（高彦休《阙史》卷上引孔“子必也正名”说举而论曰”：近世逢掖耻呼本字，南省官局则曰版图小绩、春闱秋曹；北省官位则曰紫微貂蝉、侧坡夕拜，未曾正名其名，岂宣父之本意也。”他所说南省官局

①《文苑英华》卷六七○，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447、3449页。
②《文苑英华》卷六七○、卷六七二，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445、3457页。
之版图小绩、春闱秋曹分指尚书省的户部、吏部和礼部、刑部诸司，北省官位之紫微貂蝉、侧坡夕拜则指中书、门下二省的中书舍人、散骑常侍和谏议大夫、给事中等官。类似之官府官名别称甚多，无须一一考辨，但从文献看，高氏所"说近世"朝廷喜用官称别名的情况唐初已有之，而自开元天宝以后渐盛。大致是作于天宝以后的《书仪镜》S.329+ S.321)中《四海书题》列重书对象"是相国、左右丞相、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六尚书、三公九卿、节度使、太守"，其中相国指宰相，左右丞相据《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同），乃开元元年改尚书仆射称，"但天宝元年，复为左右仆射"。书仪内涉及的人事多为天宝(末"详行第"节)，则左右丞相虽沿用已是别称。而如侍御则是侍御史的简称，同时也是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的别称。同件书仪《四海平蕃破国庆贺书》内的书状也出现了诸"大夫五郎"、给事三郎子"、侍御弟"等用及别名或简称的称呼，不过其时所见远不如后来丰富。传世文献特别是诗文和笔记小说都呈愈来愈多之势。如中唐赵璘《因话录》、李肇《唐国史补》等书已注意到台省官多用别名。而唐末五代人王定保的《唐摭言》和孙光宪《北梦琐言》，提到的官称无论高下大部或几乎全部用别名指代，王、孙二人都曾任地方节镇幕僚，所记是当时朝野和地方风俗共用别称的印证和实录。前揭高彦"休必也正名乎"的议论，应是有感而发。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一"五官称别名"条则列举别称数十种并说"明唐人好以他名标榜官称，今漫书于此，以示子侄之未能尽知者"，也可见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晚唐五代官称别名在书仪中得到证实。敦煌P.4093《甘棠集》、P.372《记室备要》、P.409《新集杂别纸》等晚唐五代表状笺启中，都有大量官称别名的使用。其中《记室备要》甚至在一些贺官仪题目下特注明别名，如《贺左右仆射》下注“左右揆”《，贺侍中》下“注亦名(代按代即大)貂”《，贺散骑常侍》下“注亦名左右貂蝉”《，贺御史大夫》下“注一名亚相，中丞”《，贺补阙》下“注一名补衮”《，贺六尚书》“注兵部夏官、刑部秋官、礼部春官·春闱、吏部天官、工部冬官·地官”。注文可证当时的这些别名、代名是与正式官名并行着的。

别名从某种意义上是对原来官称及其来源的一种说明。所以唐人在诗文特别是授官制诰中多用官或官署别名指代官职，这似乎也成为一种点缀和文学修养。如《全唐诗》卷一四九刘长卿《落第赠杨侍御兼拜员外仍充安大夫判官赴范阳》《肃穆乌台上，雍容粉署中》句，即以乌台和粉署对称，指代主人公官职所在的御史台和尚书省。《全唐文》卷六六三白居易《柳公绰罢盐铁守本官兵部侍郎制》“司马贰卿，佐平邦国。”中“司马贰卿”又称小司马，与兵部尚书称大司马相对，即兵部侍郎别名。所以相应在表状笺启书仪用骈文书写的贺官文中，也有同类的写法。如《甘棠集》卷二《贺裴相（公休）加户部尚书》“称礼闱光于历践，（贩版）图宠于兼荣”，礼闱和版图分喻裴休曾荣任礼部和新加户部尚书。《贺使馆魏相（公謩）状》称“南宫高位，以资爰立之荣；东观新恩，更切具瞻之望。”南宫和东观也是用来形容魏謩的兵部尚书和兼修国史之职。

书仪中所用官称和官署别名大多可与传世文献相印证，有些可补其阙。如《甘棠集》所提到的官署别名还有三（台泛指尚书省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08

黄(枢及御史台) 中书门下)、仪(曹 礼部或礼部司)、鸡(树 中书省)、凤(池 中书门下,指入相)、仙(曹 尚书省司)、宪(台 御史台)、西(掖 中书省)、两(掖 中书、门下省)、兰(绪 秘书省)、谏(垣 指中书门下谏官职署,书仪具体指任散骑常侍)、冬(曹 工部或工部司)、柏(署 御史台)、蓬(山 秘书监)等;官称别名则有司马 ( 兵部尚书)、紫(微 中书舍人,也可指中书省)、八(座 六部尚书)、独 坐或独(步 御史中丞)、十(连 节度、观察使)、双(游 中书门下长官)。

《记室备要》中也有中唐以后侍(御 监察御史或殿中侍御史)等出现的特殊别称如护(军 宦官监军)、西院直(公 枢密承旨)等。内“西院直公”之作为枢密承旨别称,乃在于其所在枢密院有东西之分。《资治通鉴》卷二六三昭宗天复五年(903)于正月戊申“条以)王知古为上院枢密使,杨虔朗为下院枢密使”下胡注曰”:枢密分东西院,东院为上院,西院为下院”。“西院直公”与《甘棠集》中代表中书门下两省(或其长官)的“双游”一名在传世文献中均很少见到,说明晚唐人随意创造和使用官称别名的情况更普遍。

①按三台汉代指尚书、谒者、御史三台,见《初学记》卷十一《尚书令第三》及《通典》卷二四《职官六·御史台》,但魏晋以后谒者之职已并入中书,故唐之三台已主要指尚书省及御史台。《文苑英华》卷三八一常衮《授赵涓给事中制》”:历践三台之列,曾参二陕之佐。《权载之文集》卷三一《秘书郎厅壁记》”:魏晋之际,秘书与中书,或分或合,故云职近日月,宜居三台之上。”则中书似已不在三台之内。

②按“西院直公”作枢密承旨解见赵和平《〈记室备要〉的初步研究》,载《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第260-266页。

③按双游一词见《甘棠集》卷三《上高尚书启》“迹参兰绪,风标更称于双游”和卷四《贺李谏议除给事状》“光膺宠命,践双游之副贰”,其解见《赵和平《敦煌本〈甘棠集〉研究·〈甘棠集〉校注》,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第137页。

④按三台之列,两掖思游之语,见《故中大夫守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桂州本管都防御经略招讨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乐安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孙府君[成]墓志铭并序》”:进转司勋员外郎,以诏勋爵国之懋赏,能守司存,发明草议,一台归妙,两掖思游。”此“两掖思游”当双游之确解,即中书门下之谓。
唐人好用官称别名无疑来自于他们对官职和官场生活的热衷。尽管各种别名具体来源不同，称用的场合也不完全一致，但比正式的官称显得亲切自然，又寓含官职本身特殊的意义和唐人对它们的褒贬，所以这种称呼能够很快普及。例如唐中期以后吏部二十四司官职轻重变化很大。《唐国史补》卷下谓某些别称：“旧说吏部为省眼，礼部为南省舍人，考功度支为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饭从者，号比盘。二十四曹呼左右司为都公。省下语曰：‘后行祠屯，不博与之相应，又‘有 祠部为冰中行都门；下行刑户，不博前行驾库。’厅，言其清且冷也”之类的。二十四司中省眼、振行等以其说法职繁事要受人青睐，而原来按前中后行排列的职司在人们心目中地位便有些颠倒，更不用说像祠部这样无关紧要的机构就完全成了没人爱去的清冷衙门。人们还“用 走卿”、“忙卿”来形容九寺中比较忙碌的太府、司农，而“用 睡卿”、“饱卿”称道相对闲散的鸿胪、光禄；官品虽高，但贵而无用、官绪清冷的散骑侍郎甚至被称“作 貂郤”、“貂脚”，官品不高的御史们却因纲纪所在为人瞩目，按官(品 从监察里行到侍御史)和敢于说话的程度而被依次给予辣椒、生姜、萝卜和脆梨一类的谑称。从这些别称的出现不仅可以

①赵璘《因话录》卷五《徵部》，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1957年，第101页。
②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一五《官称别名》，上海古籍出版社，第795—796页。
按光禄职当供食，鸿胪有典客署与客馆，负责接待蕃夷宾客，则“饱”、“睡”二名或也与其供职食、宿二事相关。
③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2页。
④见《太平广记》卷二五五《贾言中》出《御史台记》，原文为“时义云：‘里行及试员外者，为合口椒，最有毒。监察为开口椒，毒微歇。殿中为萝卜，亦曰生姜，虽辛辣不为患。侍御史为脆梨，渐人佳味。迁员外郎为甘子，可久服。或谓合口椒少毒而脆梨毒者，此由触之而发，亦无常性。唯拜员外郎，号为摘去毒，欢怅相半，喜迁之，惜其权也。’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983—1984页。”
了解制度的变迁，也不难窥测唐人以追求官职为中心、为乐事的生活情趣，从而使人想见到官场礼俗中生动活泼的另一侧面。值得注意的是，唐朝的官称别名除带有（公 如相公、端公、明公等）、（老 如堂老）、（长 如院长、曹长）等敬称者和其他少数例外，一般不作为互（称 即对面称呼）使用，并且唐朝别名仍以朝衔居多，这也是唐五代书仪遵守的惯例。另从唐代的官名别称来源看，除部分出自唐人杜撰，相当多数是取自前朝官名及某些传统说法。例如秘书监称东观乃是因汉旧称，而侍中和散骑常侍分称大貂、小貂则是因其朝服“以貂尾为饰，侍中服之则左貂，常侍则右貂”。貂尾据说“是赵武灵王胡服之制”，秦灭赵，得其冠，赐侍中焉。至唐则散骑常侍“分左右，隶门下、中书省。皆金蝉、珥貂，左散骑与侍中为左貂，又散骑与中书令为右貂，谓之八貂”。每种官名常有其深厚来历，因此，官称别名也是历代逐渐形成的官场文化的一部分，对于其名称本身及与官职机构相关的沿革过程，尚需有更深入的研究。

（三）官员敬称的时代色彩

敬称最初大约使用于家族内外之信笺，父母云几前，尊长云座前。但是与官品相配合，也有属于官场相呼或其他公私尺牍专用的敬称。《书仪镜》四海书题：“称：内外文官三品云阁下，左右丞（相 按此下疑有脱字）、节度使云节下，五品云记室，已下侍者左右。唯执事之语，不论重平并通用；内外武官三品云麾下，太守管军亦云麾下、节下。折冲以下无管押与文官五品以下同。”就是不同品级有不同敬称。这些敬称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与官称一起使用，它们是时人必须识别和掌握的礼仪。其所
代表的等级性是很分明的。敬称并不是唐人的发明。《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阎乐前即二世数曰：'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为'

《集解》引蔡邕曰：'群臣士庶相与言，曰殿下、阁下、足下、侍者、执事，皆谦类。'又《汉书》卷一下《高祖纪下》：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应劭释曰：'陛者，升堂之陛。王者必有执兵陈于阶陛之侧，群臣与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以达尊之意也。若今称殿下、阁下、侍者、执事，皆此类也。'

由是可知，此类'由不敢指斥'而'因卑以达尊'的称呼早已有之。

但敬称的使用随着时代而变。例如《新定书仪镜·通例第二》中：'有凡刺史云节下，将军云麾下，有爵及五品已上云记室，小重云侍者，平怀左右[云]足下，[在位云执事]'，明显与《书仪镜》有别，应当是相沿唐以前称法。例如刺史云节下可上溯魏晋刺史领兵而加持节的制度。如《晋书》卷八四《殷仲堪传》载殷仲堪作书与谢玄称：'愿节下弘之以道德，运之以神明'，时谢玄为冠军将军、徐兖等州刺史，并'有都督诸州诸军事'之名。《宋书》卷七七《柳元景传》谓王玄谟使垣护之告元景曰：'今余东岸万人，贼军数倍，强弱不敌，谓宜还就节下协力当之。'时元景官抚军将军，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使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等。

后来则发展为刺史无论领兵与否也都有持节之号。如《通典》卷三二《州牧刺史》论沿革所说：'魏晋为刺史，任重者为使持节都督，轻者为持节，皆铜印墨绶，进贤两梁冠，绛朝服；领兵者武冠……自魏以来，庶姓为州而无将军者，谓之单车刺史。凡单车刺史，加督进一品，都督进二品，不论持节、假节。'又《旧唐书》卷四四……
《职官志三》称：初，汉代奉使者皆持节，故刺史临部皆持节。至魏、晋，刺史任重者，为使持节都督，轻者为持节。后魏、北齐，总管、刺史则加使持节诸军事，以此为常。隋开皇三年罢郡，以州统县，刺史之名存而职废。而于刺史太守官位中，不落持节之名，至今不改，有名无实也。至德之后，中原用兵，大将为刺史者，兼治军旅，遂依天宝边将故事，加节度使之号，连制数郡。奉辞之日，赐双旌双节，如后魏、北齐故事。按唐朝继承汉魏以来制度，这里《旧唐书》所说刺史加使持节或持节至今不改的情况，应当是指天宝以前。”《大唐中大夫使持节湖州诸军事湖州刺史封公墓志铭并序》，开元五五为《大唐故朝议大夫使持节密州诸军事守密州刺史》，开元一○○墓主“称唐故正议大夫使持节武州诸军事行武州刺史”等，如此之类甚多。所以刺史称使持节是刺史称节下一名的依据，《通例第二》可认为是相沿唐以前至唐前期的习惯。

唐初沿袭旧制的同时，使持节的加授实际上已开始发生变化。《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志四下》称：武德初，边要之地置总管以统军，加号使持节，盖汉刺史之任……七年，改总管曰都督，总十州者为大都督。贞观二年，去大字，凡都督府有刺史以下如故，然大都督又兼刺史，而不检校州事。其后都督加使持节，则为将，诸将亦通以都督称，唯朔方犹称大总管。边要之地的总管、都督加使持节应当就是《旧唐书·职官志》所说节度使奉辞之日，赐双旌双节的滥觞，所以《书仪镜》节度使云节下所反映的是天宝以后制度。这一点，左右丞（相即左右仆射）等官名的出现也可以证实。因此某些礼仪敬称是随制度而变的。

敬称的变化不仅有着指称对象职名不同的问题，也有着对象
范围等级的改变。例如《新定书仪镜·仪例第二》“是有爵及五品已上云记室”，到了《书仪镜》则变“成五品云记室”。而元和郑氏书仪在僚属起居第六”中规定“凡前人官至郎中已上，并须云阁下；员外[郎]已下至县令，并云记室。如赐绯云记室，赐紫云阁下，六品以下云执事”，记室竟包括七品县令；另外《书仪镜》的三品云阁下”到这里也可以“是官至郎(中五品)以上”，是敬称的使用对应等级在逐步降低，高品已无特衔，而反过来，对普通官员的称呼却越拔越高。

这种变化在传世文献也有印证《。刘禹锡集》卷十《答道州薛郎中论书仪书》以为“：夫礼之文为著定，宜尊宜卑，犹四方上下左右前后，称谓一立，古先圣贤所不敢移。”但事实却是因他任御史，“四方诸侯悉以书来贺，校其礼皆驳不同。唯洪州牧李常侍巽、潭州牧杨中丞凭始言执事，其他如仪而同在宪司者，咸以二牧为不逊”。刘禹锡贞元末人为监察御史，是正八品，按旧仪称执事并不错。但同列多以为不敬，是因为习惯上执事已是对身份较低者的称呼。可见这时的敬称的使用已比较混乱。除个别固守旧礼法的士族外，大多是从流俗就高不就低。

又如阁下一词，本已从三品扩大到五品，中唐时还可以呼节度使《。旧唐书》卷一四二《王武俊传》言武俊为恒定节度使李宝臣下兵马使，谓宝臣曰：“今阁下有功尚尔，寇平后，天子以幅纸诏召置京下，一匹夫耳，可乎？”但是后来阁下的用法却相当随便。赵璘《因话录》卷五指出，古者称三公或郡守为阁下，前辈也呼刺史太守为节下，但是“近日官至使府御史及畿令，悉呼阁下。至于初命宾佐，犹呼记室；今则一例阁下，亦为上下无别矣。其执事才施于举人，侍者只行于释子而已；今又布衣相呼，尽曰阁下。虽出于浮薄
相戏，亦是名分大坏矣”。民间“则中表疏远卑行，多有座前之目”。张敖《新集吉凶书仪》P.2646)，除规定内外族及非内外族都可用几前、座前等称外，所“说高位如重即言阁下，如是节度使亦云节下，武官即云麾下，平怀亦[云]记室，此亦侍者、执事，余任临时酌量轻重行用”，也是含混其词，什么是高位已无具体标准。而他则说，阁下者从平怀已上的《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P.3502v)并通言之，近年来多于书状中(相饶?)。记室如是要(识职?)即言之。执事、侍者，已上并往还平怀书通言之。足下、左右所止，已上如前人卑小并可言之。节[下]、麾下，已上如是节度使及将军武官班官，并通言之。"阁下、执事等称竟都可以用"于平怀以上，是高称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和赵璘所说正相符合。对于敬称套用由严格趋向混乱，赵和平认为是反映出唐王朝由盛至衰，礼崩乐坏的过程。但是这个礼崩乐坏只能说是世族礼仪的破坏，更准确地说是随着唐代官品泛滥，打破"了士庶之际，相去天渊"的尊卑"名分"之制，统治阶级的来源扩大，礼仪下僭于上，庶民化的程度加深，才造成这方面越来越不讲究的现象。

二、书仪中的行第之称与行第

②普及的庶民影响

行第本为家族内子(弟女)的排行，但在唐社会成为最流行的①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略论》，载《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杜，1995年，第9—10页。

②本节以论文发表时原名《敦煌写本书仪中的行第之称 兼论行第普及的庶民影响》，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此处对与前面章节有重复处略作删节，文字内容也略有修订。
已故唐史学家岑仲勉先生曾专作《唐人行第录》一书，对史籍中出现的唐人行第作了大量考订。受此启发，笔者也已撰写《从唐代碑志看唐人行第》一文，通过碑志和其他史料，讨论了行第的称用普及状况、排行方法及相关原因、社会基础，认为唐人称呼行第在朝廷权贵、文臣武将、官人士子乃至一般百姓中都很普遍，并不是某一阶层的专利；行第的称用亲切自然，不但和官称同样与唐人避讳有关，也是适应唐社会礼俗人情的需要。而行第既有依祖、曾排行，也有按高祖以上房族排行的方法，它的称用，代表着世家门阀的家族习惯和门第族望观念从朝廷官场向着民间社会的普及和发展。与唐代习俗相应，书仪中的行第之称也是大量的。通过书仪，不仅使我们进一步了解行第的某些称用规范和原则，也使得在此基础上，能够继续研究它在流行过程中对全社会的影响乃至唐人观念的转化问题。

（一）吉凶书仪中的行第之称

唐人喜称行第的习俗，在敦煌写本书仪中有充分反映。如题“为京兆杜友晋撰”的《吉凶书仪》P.3442中内外吉书仪部分，便至少有六通用及行第。其一通依内容及次序应为《与弟妹书》，仅余两行，录于下：

与弟妹书
次弟兄封次第
妹云某氏姨（妹？）省
兄姊书
右云名省

①《唐研究》第二卷
347—372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2页。
前一“行次第兄”三字注于信末，而第二“行封次第兄姊书”显而易见为书仪的封题部分“。次第”即指寄信人之行第也。另外五通比较完整，为便于说明此处也仅录首尾及书题部分：

[2] 与子侄孙书

谨

不见汝久，忆慎念缠怀……好自爱慎。

娘次第伯叔姑告。

女云某氏女发

名

女云某氏 外伯叔祖名言：违次第女。离云违觐。稍久，思恋恒积……今因信往，谨言外伯叔祖云。

疏不备名再拜。某氏外孙女再拜。

谨 封

外翁婆几前

[4] 与舅舅母姨夫书母之外祖父母及姨舅附之

名言：违远稍久，驰系唯积……伏愿珍重。谨言疏不具。名再拜。亦云表外甥表侄、姨侄、姨弟等。

谨 封

名言疏，某氏外甥、外孙女言疏次（弟 第）舅舅母姨祖座前。

[5] 与表丈人及表姑姨表兄姊书：

名白：旷奉稍久，延（？）系唯积……谨白疏不具。表弟姓亦云表外（生 甥）、名再表侄、姨侄、姨弟等。
外甥、内外弟、姨弟侄姓名白疏。

某姓位丈人兄某氏侄次第姑姨座前


名言

稍久,驰系唯积……伏愿珍重。

觐,(妹 姊姊云白

[148]云 旷奉。

伯叔(姊 姑)云姊云 侄女夫姓名再

拜,姊

今因信往,谨    附白记不宣。

不具。 云妹夫姓名再拜。

谨 封

名白记。与伯叔姑云次第伯叔某氏

姑座前,姊云

府君夫人座前某氏姊前,侄女〔 夫〕

以上五通书仪中均"有 次第"字样,每封信"有 谨封"两字者,则

谨封以上为信正文,以下为封题部(分 第一行亦为书

题。按据《 新定书仪镜·通例第二》,凡题书,"对 子孙云发")。行 第

根据需要或用于信首、信末的自称,或用于封题中对收信人的称

呼。由于唐人的行第来源于家族内兄(弟 或姊妹)的排行,所以亲

友间相称行第十分自然,当然行第还要与年辈等结合起来,附之以

伯、叔、兄、姊、姑、姨、舅等称。这在唐人内外亲族的吉书仪中已是

一种十分常见的称呼法。除了上述书仪外,同是题为杜友晋撰的

《 新定书仪镜(》 P. 3637等,"在 妇人书题廿首"内还载有两通夫妻

往来书仪,也十分典型:

与夫书:

拜别如昨,炎凉数变,不枉翰墨,无慰驰情。秋中差凉,惟

[98]①此书题赵和平《 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原录作" 与妻父族书妻姑姊附之",本

节作论文发表也照录。但致书人首称" 名言",下注曰":伯叔姑姊云白"。且封题写作

[46]" 府君夫人座前",似主旨是给丈人丈母之书,伯叔姑姊皆附着援例而已。伯叔姑姊皆

父族非母族,故如"作 父族"而附之不通。疑书题当作" 与妻父母书妻[伯叔]姑姊附

之",方与内容相和,故此处暂以意改。
五郎动静兼胜，即此大君大家动止万福，男女等无恙。未由宾月日厶氏白事

（？）觌，但增驰系。因使，不宣，上次良谨状。

执谨空

谨上        次郎执事厶氏内白封

答书：

使至辱书，知上下通善，稍宽离忧。冬初微寒，惟次娘子动息兼胜，男女等佳致。限以王事，宣展未由，但增倾注。因月日位姓名状通还使，略此无喻。谨状

位姓名状

侍者封至厶所通状      次娘子

此两书书末提行另写者皆为书题，内“中次”“同次第”，也即行第意“。次郎（“泛指”）、五郎（“具体）是妻呼夫，而“次娘子”则是夫称妻。同件书仪中男及次娘子（与妻父母书）道及自己与妻也有“畲子蒙恩”、对妻家人“有丈人丈母座前，次姊再拜，（嫂）参问阿语。丈人丈母答信则称女“儿次娘子佳致”，“有次娘侍巾栉，善事舅姑及厶郎”语。男子《与妻姨舅姑书》致问候“如次姨动止康悆”，《与同门书》亦称妻姊夫妇“为次姊姊夫”，是妻族亦兼可相呼行第，这与上面所“录与妻父母书妻[伯叔]姑姊附之”称伯叔姑行第是一致的。

前揭《新定书仪镜》“录黄门侍郎卢藏用《仪例一卷》”，内中说到：

旧仪从父兄与弟书末称名，亦此为昆季本多，每房自论行第（，不）加名无以分别。至于通计长幼，次第素定，岂烦加名（疏）以自外，今亦不取。

这里是说信末署名“。亦此为昆季本多，每房自论行第”，是指按同
父所生小排行而言"。至于通计长幼,次第素定",就是指从父兄弟间或族内的大排行了。由于唐人多是按同祖同曾、甚至同高祖排行,所以从父兄弟间就不用在行第之称外再加名以显得生分。卢藏用作这样的改变,正是唐人行第通行以大排行论称的一种反映。

行第既被书仪作者列为规定之称,且它在书仪中又如此大量并自然而然地出现,那么行第之称在书仪中的使用是不是完全带有一定的对象场合而非随意。我们知道,行第之称作为家内称呼至少可以追溯到东晋南北朝,拙文《从唐代碑志看唐人行第》已举《世说新语·俭啬》第二十九"王丞相俭节"条王导称子"为大郎",及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三七官"条言及《南史·武陵王纪传》与《梁书·河东王誉传》中纪与誉呼湘东王绎"为七官"事为例。又《颜氏家训》卷二称":凡与人言,言己世父,以次第称之……凡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则以夫氏称之;在室,则以次第称之。"又道":凡亲属名称,皆须粉墨,不可滥也……父母之世叔父,皆当加其次第以别之;父母之世叔母,皆当加其姓以别之;父母之群从世叔父母及从祖父母,皆当加其爵位若姓以别之。"粉墨"二字,王利器以为应从卢文弨说解作修饰①,可见行第之称即使用于家内,也有一定的对象场合而非随意。书仪的作者卢藏用、杜友晋已知是生活在行第已普及的武则天、中宗、玄宗时代,但他们的书仪显然亦不能认为是简单地追随流俗。诚如论者已指出,出身于世家大族的卢氏、杜氏所作书仪,是士大夫们的生活指南与行动准则,所"谓士大夫之风范〔盖〕在是矣",书仪对于礼法的实用指导意义,远远超过了它作为写信模式的需要。

①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93页。
行第作为称谓，也是礼法的一部分。例如杜氏《书仪镜》和《新定书仪镜》在四海吊族云娘家，《附书》的《吊弟妹亡书》文中称凶故无恒，《新定书仪镜》妇人书题廿首内《与婶娘书》封题曰谨封次伯任称。两处注文中“的婶云娘家，族次新妇状云娘家”与有郡名任称”语，都说明行第作为家内称呼仍是与姓氏门第、与郡望联系在一起的。这又一次证明行第是门第与族望的标志。因此在某些时候，它与姓氏族望一起使用，是可以显示身份的。这样一来行第之称便有着两种作用，其一是表示对于自己或他人家族、门第的敬重，其二是说明或突出称呼者、被称呼者的身份地位。而由于有着这样的作用，行第的称用便有着不同的使用方法与对象场合。尽管我们所见到的行第之称既有尊长对卑幼，也有卑幼对尊长，其方式范围与《颜氏家训》所说已未必一致，但在书仪中何时可用以及用在什么地方却仍是颇有分寸的。以前揭杜氏《吉凶书仪》中的六通书仪为例。六通书仪中，第三、四、五、六首都是属于晚辈给长辈，也即卑幼给尊长的。这四首惟外孙女因是非本家或为表示特别郑重，给外祖父母和外伯叔祖的信是“以某氏次第女”开头，其余在书仪的开头部分都对收信的尊长自称名，信末也无不是用自称名而言再拜的形式。信中涉及涉及到自己的亦是称名而不称行第。反之，“在谨封”以下的封题部分，对于收信方的尊长却要称以行第，如次第伯叔姑等。但六通书仪中的前两封《与弟妹书》、《与子侄孙书》是属于长对少或尊对卑的。所以信末作为写信人的兄姊、伯（叔或祖）自称行第，对收信人却用了“名省”、“名发”这样上对下的语气，与后四封截然不同。联系《颜氏家训》所说对己之世（父伯叔）与父之世叔（父伯、叔祖）须称行第的情况，给人的印象是行第之称除为分别次第外，还相对显得
尊重，相反一般为表示谦卑才称名。这一点仍与避尊者讳的原则相一致，也或许就是《家训》所"谓"粉墨"之原意。无论如何，在家族内外，长少之间，以上原则是不能被颠倒的。

在吉书仪中，必须用及行第的还有通婚书。杜氏《吉凶书仪》中的《通婚书》用的"是两纸真书"的。求婚的一方必须复书形式弟云弟某乙，侄云弟[弟某]兄弟某子。在第二纸"[第二纸]"，的名白"之下说"明名第某息某乙也即己子或弟、侄的行第，以及要求对方的某女。而答婚的一方，也要妹侄孙在随言之。四德无闻"之类的客气话中清楚答婚书第二纸相"应第某女地道及女儿的行第。求婚答婚用行第来说明缔结婚姻的双方是哪一子哪一女本是必须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答婚书》中还指明求婚方的家长在书左右名白时，可"以云号，亦云次第娘，所以敬礼"，也就是说家长在自署名时，也可以称号和行第"。号"自然是指男子，而次第娘者固指妇女。这一点要和书末的封题"郡姓名若尊前人，白书即云某郡官姓名。阁下""谨通某姓位公"两行结合来看。上一行是求婚的一方自称，下一行是称对方。小字注中"的前人"仍指求婚对象也即对方家长。按照通常的惯例，求婚方的家长要称呼对方的官称，无官也要代以相应的位号。而在署明自己的郡望姓名之外，也可以加上官封，这是为了表示郑重，更是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敬，表示地位配得上对方。既然自称可以"用号"和"次第娘"代替官名，说"明号""和"次第娘"的意义与官称差不多，也是在极正式的场合特表尊敬的。

由于无论是何种场合，男子都可以称郡姓官爵装点门面，而妇女却无官可称，除了道姓氏行第之外便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书仪①赵和平《新定书仪镜》题解，载氏著《敦煌写本书仪研究》，第371—375页。②原文"作侄云弟某兄弟某子"，前"一弟"字应"作次第"之"弟"。
中便常常可以见到男子称官号和妇人对呼行第的情况。如前举《吉凶书仪》中《与表丈人及表姑姨表兄姊书》封题，便“是某姓位丈人兄”“和某氏姓次第姑姨座前”并（称当然，这只是对长辈，对小辈的外甥、弟、侄便直呼其名了），可见“次第”与“官位”可以相对而言。更有意思的是前举夫妻互通书仪。妻子给丈夫的信尾及封，都是称丈夫“为次郎执事”，并用了给尊者“的谨空”语，而己仅称姓显得语气、地位稍卑。丈夫给妻子的信称妻“为次娘子”，而己则署“官位姓名”。“其位”与“次”者似暗相对应，并喻夫之地位尊重，口气虽谦而不卑下，末尾且“无谨空”语。相对之下夫仍高于妻，其微妙处若非仔细比较体会，则不得而知。

也正是出于表示身分的内涵，故妇女称行第场合更较男子为多。《吉凶书仪》中的妇人书题一类中颇有妇人与家族内外通信中相称行第的情况。《新定书仪镜》“在妇人书题廿首”下注云：若修吊书，即于内外族吊书，依尊卑改换首尾取用，首云“次第新妇娘言”，尾云再拜，不得云顿首等语。“次第新妇娘言”是结婚后妇女的自称，并不限于是日常问候的吉书还是告哀吊丧的凶书。其中次第者，据《吉凶书仪》“中妇人吉书仪”与夫之祖父母父母书》“对大新妇”之首称注“谓以夫之（弟第）数称次（第）”，知是以夫之行第论数。妇人《与夫之祖父母父母书》首“称（大即次第）新妇言”，末“称大新妇再拜”《。与夫之伯叔父母姑姨姊书》也如是，惟“末大新妇”下还要注明姓氏，又封“题谨封右边云次大新妇姓言疏，夫（云之）姊云白记第家某氏姑姨家座前”，即对夫家长辈亲戚也随丈夫称行第。《与夫之妹书》同于姊，末“称大新妇姓白”，封题则“曰大新亦云次第妇姓白书，谨咨某氏次第娘子前”，称其
妹为次第娘子，则是以之在娘家行第论。当公婆与儿妇答书时，也“有某氏次新妇”，阿家书至某所付某氏次新妇的结阿家告语和封题称妇之行第。

“次第新妇”既是已婚妇女在夫家的称呼，并一般用于公婆及夫之平辈、长辈亲属前，其所用场合、对象与妇女在娘家所称“次第娘”便是不同的。如杜氏《吉凶书仪》的妇人吉书仪《与姒书妻》之兄，中，《用“了二娣”“、大姒”这样与的自称，封娣题中书也”咨有谨通大姒前”或“谨还亦云二娣左右”这样的用语。新定书仪镜》略有些不同，只是称嫂“为次伯母”，自称“为某氏次新妇”，嫂答书亦称弟媳“为某氏次叔母”，自称“即某氏次伯母”。其中“以次”称行第的性质是一样的。妯娌间是以妇女在夫家之次第互称，可见对夫家戚属以夫家论，不过互称之姓氏即妇女娘家本姓。妇女给本家的兄嫂或弟妇书信称呼则要随本家。《新定书仪镜》的妇人《与嫂书》中对兄嫂称次哥次嫂，嫂之行第自以兄论。末“言谨状某嫂侍者月日某氏次姑状通”，封题“曰谨通某氏次嫂侍者某氏次姑书至某所通送某氏嫂封”。嫂答书也称对方“为次姑”。同样《，吉凶书仪》中有妇人《与弟妇书》，除依兄弟次第称弟妇“为次第新妇”外，自称也是“某氏次第姑”“或次第姑”是妇女在娘家的行第，而某氏者，却是夫家之姓氏。这与上面所说的称呼法截然相反。已婚妇女用夫家姓氏而兼娘家本族行第，符合《颜氏家训》所“说已嫁，则以夫氏称之；在室，则以次第称之”，而两者结合，正是唐代妇女婚后在娘家的称呼。韩愈“有祭周氏侄女（二十娘子）文”“，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都是祭本家侄女、侄孙女。

①《韩昌黎集》卷二三，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1933年。
因此，称用夫家次第抑或娘家次第，完全要根据妇女交往、修书的对象是夫家还是娘家戚属而定，正式场合也与妇女究作为哪一方代表出面有关，这一点在书仪中也是比较易于辨别的。

行第由于来自家族，因此，凡与家族事务有关和必须表明本人作为家族成员身份的事常常要用及行第。婚丧嫁娶即家族中最大事务，因此除通婚书一类，丧仪中的告哀、吊答书信也都有称用行第的问题。十分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书仪中常常对亡人称呼行第。如杜氏《吉凶书仪》内外凶书仪类《伯叔祖父母丧告答祖父母父母姑书》称：月日名言：祸出不图，次第翁婆倾背。《伯叔父母姑丧告答祖父母父母伯叔姑兄姊书告答弟妹，诸卑幼附之》称：月日某氏次第姑名言：……某伯倾背。同样《兄、兄弟姊妹丧告答祖父母叔、伯叔某氏次第姊倾背》《内外兄弟妇丧告〔答〕兄弟书亡者之夫》称次第嫂倾逝新妇殒逝。对死者是男子的也可以官位相代，如《内外表姨兄弟姊妹丧告答内外祖及父母姑姑夫舅姨姨夫书》：姓某位某氏姓弟妹云兄。次第姊倾逝殒逝。“《定书仪镜》夫祭妇”称年月朔日官位姓名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癸(祭)于厶氏次娘子之灵“，妇祭夫”称〔惟〕年月朔日厶氏新妇以少牢之奠敬(癸祭)于故官位次郎之灵“。传世唐人祭文也多如是，如白居易《祭苻离六兄文》称：维贞元十七年某月某日，从祖弟居易等，谨祭于苻离主簿六兄之灵。《祭乌江十五兄文》：惟贞元五年七月七日，从祖弟居易，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乌江主
祭十二兄文》月日,从父弟某官某乙,谨十五兄之灵。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十二兄故虢州司户府君之灵。《祭滂文》则用“惟年月日,十八翁十八婆卢氏,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二十三郎滂之灵”的语气①,即作为长辈不仅对孙滂称行第,其自称也以行第。行第并经常与官位合称,亲属之间竟也是如此,成为唐人称谓中一个十分鲜明的特征。

从《吉凶书仪》及《新定书仪镜》的内外(族或称五服)告哀书仪和祭文中都可以看到,在行第的称用方面,其长少、尊卑间仍有一定的规范和界限。如长对(少包括兄姊对弟、伯叔姑对侄等)、尊对卑称呼行第或名均比较随意,自称也可以用行第,如次第伯叔姑兄姊等。但少对长,一般应呼行第兼敬称,己则以称名为多。平辈之间,虽可以行第相呼,但是年少在下者,语气稍示谦卑,自称名时也较多。因此在内外家族之间,行第属于较尊敬之称。这一点在吉凶书仪以及各种妇人书仪中是一致的。不过在敦煌后来的书仪中,这些区别已不是十分明显。如在敦煌写本大中时期张敖《新集吉凶书仪》中,虽《夫与妻书》夫尚自称“伏惟(弟第)某娘子动止康和”,“某状通某娘子(右)右”诸语,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凡原“以次”或“次第”标注者,”代替,如《妻亡告妻父母伯叔等》书称:不图凶祸,“某娘丧逝”,”某娘子盛年”;口吊仪”中“姑亡吊姑夫”称“某姑倾逝”,“姊妹亡吊姊妹夫”称“某姊妹云”,”称姨倾逝”,吊人姨舅”称”贤某舅某倾逝”,吊人女婿”称”某郎某倾逝”。由“于某”既可以代姓、代名,也可以代行第,所以何时用行第
何时用姓名界限已不十分清楚，说明唐后期敦煌社会行第的应
用已不十分讲究。何以如此？张敖书仪已知是从元和时郑余庆等
《大唐新定吉凶书仪》行第之称已极为普及，那么，是不是这种不加区分的方式是行第流行后
逐渐滥称滥用的结果呢？抑或是唐后期社会士族式微、礼崩乐坏
的反映？两种可能兼而有之。不过，当一种事物被普及之后，它便
常常会失去本身原有的意义和内涵，而这一点或正是行第之称虽
愈来愈多而滥，但尊卑上下之称用界限却愈来愈不分明的最主要
原因吧？

四海平蕃破国庆贺书”的主人公和行第
行第虽来自家族排行，但由于它既可表明身份，又可取代名字
而表达敬意，故称用已不限于家族内外、五服之中。从唐人的实际
生活可以看到，行第之称除了用于称呼亲族戚属，也被广泛地应用
于官场、友朋之间。敦煌写本书仪于此也可提供范例，如《书仪镜》
和《新定书仪镜》“四海吊答书仪”部分，有《吊起服从政》书，内有
“惟位次郎动静（？）豫”，末“称姓名顿首，位次郎服前”，即去书称友
对方的官位行第，答书也同样。又如《吊兄姊亡书》《吊弟妹亡书》
末也同“有姓名顿首”及“谨通姓名位次郎服前郡姓名（疏或郡姓名
慰）封”的封题“。官位次郎”的合称固然是一种比较客气的称法，
当然对于相识朋友，也可直接呼行第，如《新定书仪镜》“五服告哀
书”有《彼此重服相与书》，末题“孤子姓名顿首 月日 姓次郎服
前”《；重服内寻常相与书》，末题“孤子姓名顿首 月日 次郎服
前”。从书仪名称“相与”一词及书中口气看，这两封书仪并非属
五服告哀书仪，而是朋友书仪。朋友间彼此称“呼姓名次郎”、次郎“。
吉书仪这方面的成例更多，而且也有规律可寻。以《四海书题》中给朝廷要重官员的“重书”为例。值得注意的是这件重书与它“答书”在称谓和用语方面都截然不同。重书称对方为“官位公”，末题和封题也“官位公阁下”或“官位公阁下”，己称亦是署名官职并加上姓名。对人对己均未加行第。从称呼和书中“奉状”、“谨状”及封题中用了两个“谨”字的“谨谨上”语气来看，写信人对收书人显得极为恭敬、郑重。相反，答书的语气却显得宽容随便，书自“某（某）”，末及封题虽署官位，但对对方称呼“姓位郎”或“姓位次郎”也即官称之外，还可加以行“第郎”称，其居高临下的语气十分明显。

如何解释用不用行第的分别呢？其实关键只在收书人之地位。按规格重书相当于《吉凶书仪》的“与极尊书”，反之，答书即相当“于与卑者书”。官场中对极尊者为表郑重，一般不当面直呼行第（当然相熟相近者又可除外）。但是高对低、长对少称呼行第及压郎却相对随意，且颇有亲切感。这就是为什么重书去书内不见称行第，而答书中却出现行第之称的缘故。

次重书的规格比重书低一级，它的级别相当于《吉凶书仪》的“与次尊书”，而答书即相当于“与稍卑书”。杜氏《书仪镜》将《与僧尼书》《与妻父母书》《与亲家翁（母）书》《与妻姨舅姑书》等都归于这一类。次重书内也有官场往来之范例。其去书除“伏惟公尊体动止万福”一类套语外，末亦说“明题如前重书”。答书内除“惟官次郎动息兼胜”语外，末亦“月日姓位次郎侍者 谨空”及“月日官姓名状封”的署名和封题。其相互称呼及后者“用 谨空”语基本同于重书。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28

书原则。惟去书用语不如重书隆重，答书口气更加和缓、亲近，显示二者地位差距不如重书之远。而行第之称在相当于“与稍卑者”的答书中一再出现，尤可起到示亲切及融和感情之妙用。

重书、次重书等级之外，按照规格还有平书。平书应是给同辈、地位相近或较低之朋友的。平书的行第称更随意，前揭凶书仪《彼此重服相与书》《重服内寻常相与书》即属这一类。而在这方便，吉、凶书仪也应是一致的。

对于传世文献中所载唐人于官场、友朋间相称行第的情况，我在前“揭碑志”一文已有过论述。拙文曾举多例指出，唐人见面称行第而避免称名是与避讳有关。书仪当然也是严格地遵从着这一当时的礼仪习惯。不过官员称用行第如上所说又有其特殊意义和方式。一般而言，唐人现实生活中，虽有唯论交谊，不计年辈地位，直呼行第的情况，不过总的来看，官场中行第仍基本上服从于官位，此点书仪规制也是如此。而由于行第可与官称连称并用，亲切之中，不失敬意，所以写信的双方，又可视交谊而定，不必完全受书仪规格的限制，这在《书仪镜》的“四海平蕃破国庆贺书”中也有相当多的成例。

“四海平蕃破国庆贺书”是杜氏《书仪镜》中很特别的一部分内容。它不见于《新定书仪镜》，而且与这件书仪的某些部分体例也不甚合。它所收载的书信，并不仅仅是一些格式套语，而是涉及到一些具体的事件和人名地名，关系到唐与吐蕃等外族在西域的战事。荣新江先生曾据此提出《书仪镜》是一件安西书仪，其作者也不是杜友晋的意见。笔者认为此点尚值得继续探讨。就信件本身①荣新江《: 孰煌本《书仪镜》为安西书仪考》，载《潘石禅先生九秩华秩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267—273页。
由于书的主人公们彼此以官名及行第相称，从称呼及所书事件便不难断定他们是主持、策划或者亲自领导这些战事的高级军政长官。例如其中一封言道：“将军某乙至，奉（少书）问及，不胜悚恋。孟冬渐寒，伏惟知监后，中丞公动止万福。某乙不才，滥蒙驱（策），（榷权）知监后，中丞公动止万福。某乙不才，滥蒙驱（策），（榷权）知监后，中丞公动止万福。某乙不才，滥蒙驱（策），（榷权）知监后，中丞公动止万福。某乙不才，滥蒙驱（策），（榷权）知监后，中丞公动止万福。某乙不才，滥蒙驱（策），（榷权）知监后，中丞公动止万福。某乙不才，滥蒙驱（策），（榷权）知监后，中丞公动止万福。某乙不才，滥蒙驱（策），（榷权）知监后，中丞公动止万福。某乙不才，滥蒙驱（策），（榷权）知监后，中丞公动止万福。某乙不才，滥蒙驱（策），（榷权）知监后，中丞公动止万福。某乙不才，滥蒙驱（策），（榷权）知监后，中丞公动止万福。某乙不才，滥蒙驱（策），（榷权）知监后，中丞公动止万福。”

此信开头用“了奉（少书）问及，不胜悚恋”、“伏惟中丞公动止万福”之类的套话及问候语。信中提到自己，“称某乙或某乙位”，也即自称名或加上官位。末“称奉状先贺……不宣，谨状”。按据杜友晋《新定书仪镜》引卢藏用《仪例一卷》诸规定，知伏惟、不宣诸语均用于下对上、卑对尊，而诸如驰恋、恋结、悚恋之类的用语，书仪中也是统施于尊长的。据前揭《书仪镜》中重书及次重书的格式，重书中称呼收书人应“是官位公”，则此书也较符合重书规格。但不同的是，信中在“称中丞公”同时，还表达“了忽闻二兄全师而还，抃跃无喻”欢喜心情，对取得的胜利加“以二兄良谋，一举骁雄，群戎荡涤，自己降则刀（升刁）自驾，数百年秋林胡无（束东）顾之心。在四镇斗）不击；衡中，圣上罢西（轸畛）之望。某乙位者，诚如是言哉！寻于路旁拜庆，谨遣（卒？）某乙将少及武士鞋袜等，奉状先粮贺。未间，但增快志。不宣，谨状。”
“公”，应当是从受其驱使的官职地位出发，而称其行第“为二兄”，却是凭借着彼此的交情“中丞”即御史中丞的简称，它在安史之乱以前，往往是资深的边镇长官节度使的兼官。根据二兄身为中丞而统兵取得西域大胜的情况，颇疑这“个二兄也就是另一封信中行第与之相同“的二郎”。其信曰：

使至辱问，深慰驰情，孟秋尚热，伏惟公动止胜悆。某乙幸推遣，(?)事意，前状具即此将军违和，竟未痊损。西(蕃)呈。二郎远涉巍途，实当难弊。伏承擒获生口数百余人，吐蕃投降，莫知崖际。且未动甲兵，凶丑来宾；勃律小蕃，灭亡在即，丞良谋，凡所知闻，莫不欣即。此皆圣恩远俻(被?)播?)中庆。各限王事，拜贺(未末)由，谨因王惟翼赴军，谨奉状不宣，谨状。

此信对收信人的问候伏惟公动止胜悆”，称公而非官位公，显然是用了稍低一等的次重书规格。但信中既推功中丞良谋，又称赞二郎远涉巍途，实当难弊，伏承擒获生口数百余人”，说明公非但即是中丞，也是实地领兵作战的二郎。作书人自称将军违和，又说与对方是各限王事，拜贺(未末)由，说明其地位相差未远，也可能是在另一地指挥作战的别一军镇长官。由于信中提到与吐蕃作战及勃律小蕃，灭亡在即事，荣新江提出其或指天宝六(年747)高仙芝灭小勃律，或指天宝十二年封常清平大勃律，然尚不能肯定。笔者以为，仅就信的内容而言，两者固皆。

①按：前揭荣新江《敦煌本〈书仪镜)为安西书仪考》一文，认为原信“中且未动甲兵，凶丑来宾”一语中的且未当作且末”，故信中事也与高仙芝天宝八载战播仙或封常清天宝十三载破播仙事有关。然据上下文意，似仍作且末”通。且信写于勃律小蕃，灭亡在即时，不可能又涉及播仙，今不取。
有可能。高仙芝在平小勃律途中与吐蕃进行过大战，是两《唐书》本传及《资治通鉴》等史书明确和详细记载了的。封常清平大勃律的经过，《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二载末也简略提及：

是岁，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击大勃律，至菩萨劳城，前锋履捷，常清乘胜逐之。斥候府果毅段秀实谏曰："虏兵羸而屡北，诱我也；请搜左右山林。"常清从之。果获伏兵，遂大破之。

"菩萨劳城"，《唐书·段秀实传》作"贺萨劳城"，然段传及《通鉴》对"于虏兵"均无特别说明。据《新唐书》卷一四六下《西域传》下，大勃律直吐蕃西，与小勃律接"且役属吐蕃"。唐朝军队如攻大勃律，也必与吐蕃接锋。前锋履捷，常清乘胜逐之，如指吐蕃是可能的。

但是高仙芝及封常清二者究竟为谁呢？据《旧唐书》卷一○四《高仙芝传》，仙芝破小勃律时，官为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灭小勃律后，"方制授鸿胪卿、摄御史中丞，代夫蒙灵詧为四镇节度使"，所以，如果我们关于信中中丞"即二郎"看法是正确的话，则带"兵实当难弊"者便不会是高仙芝。相反，据同卷《封常清传》，天宝十一年（752）封常清平大勃律之前已为安西副大都护，摄御史中丞，持节充安西四镇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传又载仙芝被监军边令诚所杀，时常清已先死：

仙芝又目常清之尸，谓之曰："封二，子从微至著，我则引拔子为我判官，俄又代我为节度使，今日又与子同死于此，岂命也夫！"遂斩之。

"其封二"一称，与二郎、二兄行第恰好相合。如所推不谬，则统兵的中丞是封常清的可能就更大些。上述两封书信看来也皆与平勃
律事有关，不同的是，由于唐距勃律绝远，其中一封写于他初取胜（“七月”），而另一封则已经是他即将返还的“孟秋”“孟冬”（“十月”）。其间相距三月有余，正是从大勃律回安西在路上的时间。来回则超过二百日，也即前揭第一信中提到的“权知监后，已经廿旬”。信主人任留后的时间与大使出征的时间显然是一致的。至于攻勃律所需要的时间，则可从《高仙芝传》中记仙芝攻小勃律的时间推算：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拨换城，又十余日至握瑟德，又十余日至疏勒，又二十余日至葱岭守捉，又行二十余日至播密川，又二十余日至特勒满川，即五识匿国也……约七月十三日辰时会于吐蕃连云堡……天宝六载八月，仙芝虏勃律王及公主趣赤佛堂路班师，九月，复至婆勒川连云堡，与边令诚等相见。其月末，还播密川，令刘单草告捷书，遣中使判官王廷芳告捷。根据上述记载，则从安西至播密川，约需八十日左右，至特勒满川，已超过百（日《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六载也记“作百余日”）。此后作战至取胜还播密川，大约又有近三月。这样加起来已经是近二百日，还没有计算从播密川回安西的时间。前揭书仪记取胜的季节与仙芝取胜的时间差不多。大概都是春夏之交出发，孟秋取胜，至冬方能返还。而根据这一计算，信中封常清的军队在孟冬之际大概已过了播密川、葱岭守捉，也即距安西镇已不算太远了。在仙芝、常清所率安西四镇与诸国的交战中，与大小勃律征战是费时最长者，其余诸国，包括播仙、石国等，苦则苦矣，但时间却用不着半年以上（这一点只要查阅一下史料记载及地图位置，计算一下距离、路程便可以了解了）。
此外，笔者认为信主人公更可能是封常清，还因为两信不但用了诸如“天恩远（俻 或圣恩远俻）”之类几乎相同的赞语，而且所“说且未动甲兵，凶丑来宾”及胜“后圣上罢西轸之望”也与史料记载封常清平定大勃律的经过及学者所论封氏任职节度使时期的西域形势更加相近。

总之，我们根据两信的官称行第及信中的修辞书法等，推断其事件的主人公有可能是封常清，从而其书仪的年代是天宝末（年成书年代可能更晚一些）。由此可知，除了信中提到的历史事实，写信的行第官称格式等，同样可以启发我们去了解这些书仪的来龙去脉。

除了二兄、二郎外，《四海平蕃破国庆贺书》中又有“大夫二郎子”、“大夫五郎”、“太守二郎”、“给事三郎子”等官名与行第的合称。这些称呼显示了收信人的身份地位，尽管我们尚未能将史书中记载的人物一一对号入座，但从信的内容仍能得知他们无一例外是开、天中活跃在安西北庭的高级官吏和将领。正像我们前面已谈到的，由于对收信人的称呼是行第加官称，所以，即使官职地位甚高，但书体格式却不一定受重书、次重书的限制，而是完全因通信双方的地位差距和关系而定。例如“给大夫二郎子”的信，即用“惟大夫二郎子所履清畅”的平怀间问候语。但“给大夫五郎”的信即用“伏惟大夫五郎动止胜悆”的重书或次重书格式。后一封信语气虽极为客气，但看得出通信双方是同在一镇或相邻。

①参薛宗正：《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两书均指出封常清安定西陲的功绩。王书尤指出封常清任使时“唐朝对吐蕃的反击取得了全面胜利，唐朝在西域的势力也达到了极盛”，与信中所赞大体相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34

二镇的指挥官。信内“有某乙罪酷,亡过周载,触目摧裂,痛贯心魂。不孝奈何!时逝奈何!远承平贼破国,皆是五郎深谋,此之一切,实为善代,下情不胜悲庆。有限不获远迎,专于路左拜贺”语,似乎表明作书人正在服丧,故他感“谢大夫五郎”的出征,认为是代替了自己应尽的职责。二人的官职、地位似乎大体相当。称“呼大夫”而缀“以五郎”,正可显示其地位的平等与关系的亲密。同样,“给太守二弟”与“给事三郎子”的信也大体如是,称呼尊而不疏,语气谦而不卑。作书人或年、位比对方略高,或是平怀所与,充分的体现了四海书仪中行第使用的规则及特点。

《四海平蕃破国庆贺书》中行第之称的大量出现,进一步反映了唐官场中称用行第的普遍性。笔者在以往的文章中曾谈到权臣、阉宦喜他人称己行第的习俗。现在看来,此习俗开、天中也已在边将中流行。传世史料如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等所记德宗建中之际河北三镇将帅如王武俊、朱涛、田悦等以行第相呼,正为此世风之延续。而用官称缀以行第这一令今人或感到十分别扭的称用法,在唐人却极其自然。行第置于官称之下,最能反衬其官族并重的心理,也最能体现对他人的尊重。官以耀族,而族复烘托官位;在推崇、恭维对方官位的同时,亦不无因称行第而感到的友情。这或许便是行第官称联用之内涵所在吧?

(三)敦煌社会的行第习俗

地理位置偏于河西一隅的敦煌社会在礼仪风俗方面深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书仪无疑是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作为礼仪规范本的书仪,既可反映风俗,又不无指导、转移风俗之妙用。敦煌写本书仪中,既有那么多关于行第的正式称用法,则敦煌社会行第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35
的普及便是顺理成章之事。
不少敦煌卷子及其他资料中的行第之称表明，敦煌社会行第之称既不限于官民，其普及也是多方面的。例如S.381写卷背面有两件是祭文，其一为《僧惠绎妹什娘子等祭表姊什二娘文》，其二为《十二娘祭婆婆文》7有《癸未年十二月九日李进晟任八，娘等祭弟十四郎文》其形式、用语及祭人祭主称行第的情况，完全与敦煌写本书仪的规定相符，说明书仪所规定的各类文体乃至行第称用法已被敦煌社会普遍接受。
敦煌社会相称行第的情况还见于一些社司转帖、官府寺院财
物入破历、买卖借贷契约等官私文书中的官、俗人名。如S.6214乙卯年四月十八日社司转帖，有阴五郎、索三郎等人。P.4716转帖。S.6233年代不残片，“有兄弟社帽子久子大耶七郎子平水”（明公元九世纪前期）付诸色斛斗破历内有”六月三日，付安三娘粟贰，溥”。“□月四日，付黑女五娘青，溥。十日，付黑女及六娘子青麦共陆硕，溥。”类似之例颇多，不能一一枚举，但名字与行第常常混同使用，似乎没有一定之规。
户籍、差科簿及官府土地文书中，行第的使用较少，特别是户内人口，甚至是属“于黄、小”的男童、女童，也都用名（字 有时看得出是呢称或小名）而不用行第，这可能是为了避免混淆之故。惟有① 《英藏敦煌文献》卷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8—169页。
② 《英藏敦煌文献》卷一27页。
③ 《英藏敦煌文献》卷—○，第195页。
④ 转录自唐耕耦《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343页。
⑤ 《英藏敦煌文献》卷—○，207页；并参唐耕耦《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174页。
妇女作当户的户主，也有用行第称的。如S.514背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大历四年手实，“有户主宋二娘，年柒拾贰岁”、户主李大娘，年肆拾肆岁”，这给我们了解其行第的排行问题带来困难。不过，涉及到户口的文书也有一些例外，可以使我们多少得窥其一二。如《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所录有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唐年代未（详八世纪中期）河西支度营田使户口给谷簿计（会？）》。这件文书内营田户中，“有户陈崇之五十六，妻张十八，女九娘九，女什一娘二”及“户康敬仙三十六，妻石十三，姊大娘五十六，女什二娘十一，女毛毛九，女妃娘十五，男进兴六，女娘子四，男进光一”两户比较突出。每一户人名后的数字是年龄。陈崇之户“女九娘”似是长女而称九娘，当然不可排除九娘前尚有姊已出嫁的情况，“但九”前如还有八个女儿皆嫁的情况似不大可能。康敬仙“户女什二娘”放在首位，虽然按年龄还“有女妃娘十五”在前，但排行显然也“与什二”对不上，这就说明敦煌的百姓行第不一定是按同父出生的小排行，而有可能是已经按照祖、曾以上的大排行。

S.542v是一件沙州寺户放毛女娘名簿。令人惊奇的是，这件名簿中有曹八妻、赵八娘、梁什一、康四娘等近三十人是以行第称者，约占总人数八分之一。敦煌寺户中的放毛女娘自然属于下层民众。但其中行第次第较高者，有赵什七、郭什八、高廿娘等。根据敦煌所见户籍簿，户内有子或女十数人的大户很少见。尽管

①《英藏敦煌文献》，卷一，第214、219页。外
②《英藏敦煌文献》卷二25—28页。
从传世史料得知，唐普通百姓中行第也有结拜性质的。但这里的行第次第颇多重复。如称“十一”者即有李、梁、赵、马、石等五人，因此这种可能性不大，说明还是族内排行。杨际平等著《五一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一书曾论及敦煌社会汉唐以来的家族组织是本着五世而迁的小宗宗法原则，如这一时期的墓志普遍记高祖以下至曾、祖、祢四代，士族之家立家庙者以四庙奉高、曾、祖、祢四代，修谱亦遵循五世易迁原则划分宗枝世系关系，皆是其例。而这一点显然亦影响到家族的结构和排行第，并且其作法亦不限于士族。例如《唐天宝六载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内载有程姓住户六户。杨著根据起名习惯推论，认为程什住程仁贞兄弟曾祖程智，与程思楚兄弟曾祖程信可能是兄弟，也即程什住、程仁贞与程思楚三户是同曾关系。另三户程大忠、程大庆与程智意。按照同祖同曾关系建立的家族即其排行至少是同祖关系的。所以敦煌文书中会出现上述按家族排行的情况。这种排行方式渗入一般百姓，进一步反映了世家大族的家族观念对普通民众的影响。

这里顺便要提到的是，吐鲁番文书虽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但贞观十四(年640)平定高昌后，中原文化对吐鲁番地区的渗透显然增加了。行第之称在吐鲁番社会同样普及，例如阿斯塔那206墓出土的《唐课钱帐历》与《唐质库帐历》是有关民间钱物借贷典当的文书。在大量的课钱人名中，诸如郭二、刘八、孟五、高四。①以上并参杨际平、郭锋、张和平著《五一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岳麓书社，1997年，第153—188页。②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五册，第277—340页。并参陈国灿《从吐鲁番出土的“质库帐”看唐代的质库制度》，载《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316—343页。
阿姑、何七娘、马四娘之类的行第之称极为多见。由于墓主张雄之妻入葬时间为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可证此前行第在吐鲁番社会也已流行。此外，丹丹威里克出土于阗文书《唐大历某年女妇许十四典牙梳等物举钱契》末“署举人女妇许十四年廿六”《，唐大历十七年（782）闰正月行官霍听悦便粟契》末署名有“同便人妻马三娘”“同取人女霍大娘”。同样《唐建中三（年782）七月健儿马令庄举钱契》末举钱人署名也“有同取人母范二娘”“，同取人妹马二。行第在这些文书中出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域地区的汉化影响。

行第的称用在某些场合确实带有一定的随意性，或出于普通人民交往的方便，无特别的讲究及要求。但是，有些场合却不同。从敦煌资料中可以发现，凡是涉及到丧葬、祭奠或施舍做功德的情况，称用行第就愈多。丧葬、祭奠的称用，前述书仪已有规定。而施舍与做功德，大都与对佛教的信仰有关。敦煌莫高窟唐、五代时期一些家族窟中的供养人题记即很有代表性，此处仅举五代曹议金所建98窟及议金妹夫张淮庆所建108窟为例，将有关曹议金姊妹及女、孙题记列表如下：

供养人窟内排列位置略

①于阗文书并见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42—547页。
②表参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32—38、51—52页；并参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载《敦煌丛刊初集五》），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第86—95页；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第88—99页。
按据108窟题记，'姊第十四娘子'与'故姊普光寺法律尼念定'分别为东壁门北侧供养人像列南向第二身、第四身题名。疑念定即98窟'第十五小娘子'，而中间所缺第三身依次应为98窟所题之'第十六小娘子'。

按据上《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108窟东壁左第二身女像空。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记曰"第二身，高五尺五寸，回鹘公主装，题名剥落"。姜亮夫《瓜沙曹氏世谱》载《敦煌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第957页)认为应是议金妻回鹘李氏。然同列第一身"题敕受汧国公知即李氏，则第主是北方大回鹘国圣天可汗□□汗..."已二身应为其身份较尊贵的女儿。又据61窟曹议金共8女。列在前者一为于阗皇后曹氏，另一即"甘州圣天可汗天公主"。由于于阗皇后曹氏之像在108窟已列入主室东壁右侧，故此处当为另一女甘州回鹘公主。

<table>
<thead>
<tr>
<th></th>
<th>98窟题名</th>
<th>108窟题名</th>
</tr>
</thead>
<tbody>
<tr>
<td>姊第十四娘子一供养</td>
<td>姊第十四娘子一供养</td>
<td></td>
</tr>
<tr>
<td>98窟题名</td>
<td>108窟题名</td>
<td></td>
</tr>
<tr>
<td>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记曰&quot;第二身，高五尺五寸，回鹘公主装，题名剥落&quot;。姜亮夫《瓜沙曹氏世谱》载《敦煌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第957页)认为应是议金妻回鹘李氏。</td>
<td>甘州圣天可汗天公主？</td>
<td></td>
</tr>
<tr>
<td>姊第十五小娘子一供养</td>
<td>108窟题名</td>
<td></td>
</tr>
<tr>
<td>姊第十六小娘子一供养</td>
<td>108窟题名</td>
<td></td>
</tr>
<tr>
<td>姊第十七小娘子一供养</td>
<td>108窟题名</td>
<td></td>
</tr>
<tr>
<td>姊第十八小娘子一供养</td>
<td>108窟题名</td>
<td></td>
</tr>
<tr>
<td>大朝大于阗国大政大明天册全封至孝皇帝圣天可汗天公主，题名 □□²</td>
<td></td>
<td></td>
</tr>
<tr>
<td>女第十二小娘子一供养</td>
<td>侄女第十二小娘子一供养</td>
<td></td>
</tr>
<tr>
<td>女第十三小娘子一供养</td>
<td>侄女第十三小娘子一供养</td>
<td></td>
</tr>
<tr>
<td>女第十四小娘子一供养</td>
<td>侄女第十四小娘子一供养</td>
<td></td>
</tr>
<tr>
<td>女第十五小娘子一供养</td>
<td>侄女第十五小娘子一供养</td>
<td></td>
</tr>
<tr>
<td>女第十六小娘子一供养</td>
<td>侄女第十六小娘子一供养</td>
<td></td>
</tr>
<tr>
<td>女第十七小娘子一供养</td>
<td>侄女第十七小娘子一供养</td>
<td></td>
</tr>
</tbody>
</table>

① 甘州圣天可汗天公主？
② 姊第十四小娘子一供养

表7:敦煌曹氏女供养人行第表
第98窟是曹议金的家族窟，供养人内曹氏女眷，包括姊妹、女、孙基本都依行第排列。其行第与108窟所列亦基本一致。108窟被议金妹及妹夫张氏称“为侄女”者，即98窟所列之议金女。结合另一曹议，知这些女眷在61窟中大多是以金子元忠所建61窟封号，如谯郡夫人、谯县夫人的身份出现，其人物也能与98窟、108窟相对应。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98窟无论曹议金姊妹或女、孙，其次第似乎都是“自十一”开始而依次下数，不知是不是一种巧合。曹议金究有多少姊妹不得其详，但其女见于98窟者总有8人，据知唯有嫁作于阗国皇后和归册甘州回鹘圣天可汗天公主的两位，因身份特殊置于其他供养人之前而未按行第叙列。参较与曹氏有关其他洞窟，都未见曹议金还另有其他女儿。此外，敦煌第85窟为晚唐浔阳郡翟僧统开建。其东壁南侧北向第一身题名“新妇小娘子一心供养出适阴□”。

<table>
<thead>
<tr>
<th>与曹议金关系</th>
<th>98窟题名</th>
<th>108窟题名</th>
</tr>
</thead>
<tbody>
<tr>
<td>女弟十五小娘子一心供养出适陈氏</td>
<td>侄女弟十五小娘子一心供养出适陈氏</td>
<td></td>
</tr>
<tr>
<td>女弟十六小娘子一心供养出适慕容氏</td>
<td>侄女弟十六小娘子一心供养出适慕容氏</td>
<td></td>
</tr>
<tr>
<td>孙女</td>
<td>第十一小娘子延胜一心供养出适阴□</td>
<td></td>
</tr>
<tr>
<td></td>
<td>第十二小娘子延荫一心供养出适阴氏</td>
<td></td>
</tr>
</tbody>
</table>

①参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20—25页；史岩《敦煌石室题记》，第147—154页；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第131—136页。
娘子即(□ 今)河西节度使谯郡曹尚书长 曹尚书女一心供养。即曹议金。据第98窟中供养人题记其女第十一小娘子与第十四小娘子都出适翟氏。如果不算那两位身份特殊者,且根据序数,则第十一小娘子就应当是85窟所说的“长女”。曹议金的孙女即以“延”字排行者,在98窟唯延胜、延荫分为第十一、十二小娘子。但在61窟包括名延隆、延荫者总有七人。虽未排行第,然延荫仍列第二。98窟为曹元德所建,61窟为曹元忠所建。61窟中延荫等对元忠多“称 侄小娘子……”惟一女“称 女小娘子延……”。此女从榆林第12窟供养人题名。颇疑第98窟得知,应为曹元忠长女延鼎中延胜、延荫乃曹元德女,其排行序数也是亲姊妹相连的小排行。曹氏女儿的排行为何“自 十一”而始不得而知,它是不是曹氏家族的一种特殊排列法尚值得继续研究。

除曹氏外,敦煌张氏、索氏、李氏等巨族望姓及其他上层人士在各洞窟内的女姓供养人以行第题名者亦不在少数。它说明在建窟造像做功德的场合,妇女以行第代名虽不能说是一种必须,但至少可以说已是一种习惯。其作法也同样不限于大族。P.3047文书是一件吐蕃占领时期的施入疏与施入历。施入历即敦煌百姓向寺院施舍钱物的登记簿。施舍人有男有女,不少人也是用行第称,如内“有 孙公子施发四(箭 剪)入行像……张五妻施褐衫一领入行像……郭大娘施发一大剪入行像……曹二娘施发一剪,七郎子施红衣兰一……左十二施油二升为合家平安……史十二施衫子一……

①《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29—30页。
②参谢稚柳《 敦煌艺术叙录》462页;姜亮夫《 瓜沙曹氏世谱》,载氏著《 敦煌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66页。
施入历不仅记载施舍人及其钱物，而且有为父及子等这样的记载。从本件残存的《佛说弥勒上生兜率天经》及其他敦煌施入历得知，这些施入历应当就是施入疏的简编。百姓施舍图的回报，所以施舍的东西做什么及为何人要通过疏郑重其事地向寺院说明，并被寺院用历一一记录下来。内中自称行第，也不能视为随意。因为如果是造碑造像，包括行第在内，其内容常常要被镌刻下来。这就是我们在传世的金石碑刻铭文中见到的造碑像人或施舍助缘人题记。例如《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三九录高宗永隆二年(681)雍州好峙县佛弟子强三娘，为亡口及父婆男女眷属，敬造弥勒世尊观□音地藏二菩萨，及镌般若多心经题记；同书卷五○录先天二年(712)五月五日，信女秦四娘，为亡母敬造供养的佛像题记；同书卷三二龙门山王怀忠等七人造像题名，内有阮四娘、王大娘、张四娘等。类似题名题记我在《从唐代碑志看唐人行第》一文中未有涉及，但在传世碑刻铭题中实则俯拾即是。而敦煌洞窟的题名题记与敦煌卷子中的施入疏、施入历当然也是这样一中中原流俗传入的反映。

应当指出，南北朝至隋代的这类题名题记中，妇女多用名姓或只用姓。高宗、武则天以后，称行第者才渐多而普遍。这与我们以前所说传世文献和墓志中行第大量出现的年代是一致的(上举永隆二年例，即是年代较早的例证)。而佛龛造像及金石碑刻中的行第题名既有个人与一家一姓之内的，也有民众集体捐资助缘的情况。直至唐后期，称行第仍是妇女较多而男子较少。对于妇女题名署称行第，似乎也不能作随意甚或没有名姓解。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43

卷二二录有唐开元七年李神珖功德庙碑一件，其右侧上端题记有：薛珙瓒妻李大娘、故人□□□妻常、王侍封妻李五娘、伊文□妻赵二娘、伊岂百妻李三娘、李思慎妻南□娘、伊方德妻李大娘、李思太妻魏男知、卢阿留妻李六娘、徐德智妻李三娘、徐思忠妻□□娘、徐务其妻李大娘。

碑的左侧上段题记：
古(故)人李真宝、李立德妻平阳郡伊氏、妻王氏第一列。
李立德妻平阳郡伊氏、李玄成妻平阳郡伊氏、李赵生妻河南郡赵氏、张洪太妻赵郡李氏、伊智慧妻赵郡李氏、徐崇谨妻赵郡李氏第二列。

看得出来，此碑右侧上段作为妻属的女姓全称行第，而左侧上段则全用郡望。何以如此不得而知，但行第可以比照郡望的意义似乎不言自明。由于做功德事原其本意总是牵连着家族，杨际平等在讨论敦煌家庭与家族关系时，即论述到敦煌的家族窟作为聚族的一种组织形式和敬祖祭祖加强家族观念的意义。而妇女主中馈无外事无官位，于家族的从属地位自然也更突出。所以署称行第，显然有上面所说重其家族意义在。另外这样作似乎也是为了避免公众场合，妇女被他人随便道及名字的不尊重。试想用一般化的姓与行第去代替有个性化的名字，妇女的一切因而被隐藏在家庭的幕后，这恐怕也是封建道统希望和发展的需要吧？

总之，敦煌及其他传世碑刻文献都反映了唐人，其中特别是妇

①《石刻史料新编》第1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第8195页。
②杨际平等《: 五一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岳麓书社,1997年,第153—188页。
女在参加与个人、家庭信仰及命运有关的宗教事务时题名署称行第的情况。晚唐五代，这种情况已相沿而成惯例，且在某些地区尤甚。例如我们从《两浙金石志》所录载的唐大和九年（835）余姚龙泉寺碑，开成二年（837）始建、大中五年（851）重修的仁和龙兴寺碑，会昌元年（843）与三年分别修建的归安天宁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大中十一年金华法隆寺经幢，唐咸通二年（861）始修、宋太平兴国二年（977）重修的萧山觉苑寺经幢，唐咸通七年修、宋开宝二年（969）重修以及秀水精严寺经幢，后晋石屋洞造像题名等《江苏金石志》所录载的唐丹阳普宁寺钟铭、晚唐泰州衡阳寺经幢、等一系列碑刻铭题的题名人来看南唐谦公安公构造残碑记，其中的女姓施舍助缘人已基本上全用行第。这说明就整个唐帝国范围而言，无论是地处偏远的西北敦煌，抑或是文化发达的江浙形胜，在行第的称用方面都有着几近相同的习俗。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闽中金石略》卷二载十国闽主王曦所建坚牢塔题名。此塔共八层，各层分有王曦及其后妃、子女题名。内“从大闽国后李氏十九娘”、闽王亚澄越国夫人余氏十三娘”到福清公主二十六娘”、福昌公主王氏二十七娘、建安公主王氏二十八娘、同安公主王氏二十九娘”、贤妃尚氏十五娘”，无不特别注明行第。闽帝室的这种称呼，非常集中地反映了唐至五代自上而下对行第的极端重视。所以五代以后，行第习俗也被宋、辽、金、元各朝延续，而且碑刻题名中不仅妇女，即男子也出现了更多的称行第现象《吉金贞石录》。

①分见《两浙金石志》卷二、卷三、卷四，载《石刻史料新编》第14册，第10230-10275页。
②分见《石刻史料新编》第13册，第9595-9598、9607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及《江苏载后金大安二(年1210)钟款金石志》载元《南翔寺忏观堂庄田记》即此方面之极好例。另外宋以后有行第排行次第，极高者，如元《南翔寺忏观堂庄田记》功德上荐，男子除故次兄徐十五秀才，故祖五三承事，故父九五承事外，又“先祖管千五承事”。千五“之千”字，并非行第实数。又承王曾瑜先生示知以南宋《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及《宝祐登科录》两种③，录登科进士名录，详载诸人行第。其中除有于行第上加百、千、万等(字如文天祥即“称第千一”)的，复有加茂、重、季、仲等各种字样至少五十余(种“如第重二”、“第季三”等)。宋以后的行第如此排称，显然已经是采用了后世常见的所谓宗族房眷内，按一辈一字排行计数的方法。但是，其用字是否有规律，并且与上述所见敦煌及传世史料中唐人排行第的方法究有何种不同及联系，目前尚不能解释，应当是我们今后研究行第需着重解决的问题。(四)关于行第观念的再探讨敦煌写本书仪中有关行第之称的使用及其他敦煌资料所反映的行第流行情况，进一步证实了行第称呼自士大夫向平民社会普及的途径和方式。在这方面，敦煌社会不过是整个唐代社会的缩影。我们虽然无法断定敦煌地区最初普及行第的确切时间，但是，从敦煌社会习俗文化深受中原汉文化习俗影响，及开、天杜友晋书仪及时传入敦煌的情况看，敦煌地区行第的流行并不见得比中原

①《石刻史料新编》第12册，第9353—9356页。
②《石刻史料新编》第13册，第10050页。
③分见《四库全书》第44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48—409页；第451册，第47—118页。
笔者以往已谈到过士族门阀观念对行第普及的影响。此点书仪的传播，也可以证明。作为书仪撰写人的卢藏用、杜友晋等，无疑会将其世家大族所重之礼法门风、家族观念融入其关于行第的概念及使用，而这一点也正是他们影响于世人之处。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将行第的流行完全归因于大族的影响。因为士族按房排次第的情况魏晋南北朝已存在。然彼时行第及行第之称不在一般百姓中普及，而是到了隋、唐之际，特别是武则天以后才流行并逐渐显得随处可见，其必有适应当时社会需要及一般人民性格心理的一些因素。换言之，唐代行第的流行有唐代的特点，在它流行过程中普通百姓的愿望及意识便不可能不渗透其中。例如本文前面从杜氏五服内吉凶书仪及《四海平蕃破国书》谈到的官位与行第相对、官职与行第并称的情况其实已反映了唐代一般人民的门第观念与追求。对此如果还可以说是受士族影响，那么在人际交往中称呼行第却完全有着普通人民对它的理解及爱好的内。

（李靖与张氏）将归太原，行次灵石旅舍。既设床，炉中烹肉且熟。张氏以发长委地，立梳床前。靖方刷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驴而来。投革囊于炉前，取枕欹卧，看张氏梳头。靖怒甚，未决，犹刷马。张氏熟观其面，一手握发，一手映身摇示，令忽怒。急急梳头毕，敛袂前问其姓。卧客曰：“姓张。”对曰：“妾亦姓张，合是妹。”遽拜之。问第几，曰：“第三。”问妹第几，曰：“最长。”遂喜曰：“今日多幸，遇一妹。”张氏
遥呼曰："李郎且来拜三兄。"靖遽拜，遂环坐。故事很清楚地说明常人初见面即互通行第以代名讳的习俗。但是仔细分析一下，这样做的意义还不止是出于避讳和礼貌。上述故事中的三人初不相识，且虬髯客对张氏甚至故作挑逗轻薄之举，以激起李靖的愤怒和注意，一场争斗似乎马上就要发生。但一旦经张氏主动上前，"敛袂"通姓氏行第，立刻"便兄"妹相呼，热络起来，不但化解了初时的戒备和敌意，而且三人竟围席而坐，最终甚至成为生死不渝的朋友。透过其中兄、妹的称呼，武人、侠妓的英雄豪杰之气不由尽收眼底。其中之故事虽然关乎唐初大臣名将李靖，但不难看出，利用称行第联络感情、结交朋友很附合下层社会人民那种豪爽热情的天性。

《太平广记》卷一五三《崔朴》（出《续定命录》）是另一性质的故事。记代宗大历中户部侍郎杨炎得罪，贬道州司户参军。按照制度，自朝受责，必须立即驰驿出城，因此杨炎不得归第，将贬谪之事通知有病的妻子。等杨炎到了长安附近的蓝田驿后，急切中遇到素昧平生的县尉知邮务崔清，请求代为请假，以回家探望妻子，得崔清允诺。但因不为制度所许，崔清遂以缺马为由，请京兆府宽限杨炎程期。他"并自出俸钱二十千，买细毡，令造毡舁，雇夫直诣炎宅，取炎夫人"，还叮咛夫人务必连夜赶到，直至接来与炎偕往。杨炎对此有何表示呢？

炎执清之手，问第行。清对曰："某第十八。"清又率俸钱数千，具商於已来山程之费。至韩公驿，（炎）执清之袂，令妻

①《太平广记》卷一九三，中华书局点校本，1961年，第1446页。
出见，曰："此崔十八，死生不相忘，无复多言矣。"……后二年秋，炎自江华除中书侍郎，入相，还至京兆界。问驿使："崔十八郎在否？"驿吏答曰："在。"炎喜甚。顷之，炎迎谒于前，炎便止之曰："崔十八郎，不合如此相待。今日生还，乃是子之恩也。"仍镳而行，话湘楚气候。因曰："足下之才，何适不可，连老夫今日可以立致，柏台谏署，唯所选择。"

就故事发生的本来情节而言，杨炎在遭到远贬的危难之际，受到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崔清的救助，且崔清所作是尽其所能，而不是一般的照顾。这就使得地位曾经是高高在上的杨炎与崔清之间发生了异乎寻常的亲密关系，从萍水相逢，到执手问行第，到让妻子与之相见，称"为死生不相忘"的"崔十八"，二者之关系、感情逐步发展。杨炎的感激溢于言表，而一"声崔十八"，似乎抹煞了二人间相去甚远的年龄、地位差距，说明在某些时候，行第已不止于表示亲切，而是看作患难亲情的兄弟、骨肉之交。当然在这则故事中，杨炎与崔清的关系随着杨炎地位的升降，并不是没有变化。有趣的'是当杨炎复职还朝，路经崔清处，虽尚能记得其人，但对他的称呼已"从崔十八"变为"崔十八郎"，其自称亦"为老夫"，明显的已有居高临下之意。而且故事的结局，也是说杨炎忘恩负义，没有兑现提拔崔清的承诺，以至到了再贬崖州之时，过蓝田而招崔清不至，使杨炎唯遗咎悔，认为自己是在交友之道上受了惩罚。不过，当着杨炎对着崔清握手呼行第的一刹那，看得出他还是放下了架子，其内心的感佩也是由衷的。

行第之称，可以缩短人们交往中的距离，增加彼此的感情，表达兄弟兼至交的情谊，所以一旦称行第，竟会有战场上化敌为友，政争中前嫌冰释，甚至一方为另一方奔走经营、扶危济困无所不至
之事。而权臣借称行第结党营私，进士举子、文人学士亦凭此加强同辈间之联盟已是我们曾经谈到的。无论如何，行第之称在人们的社交中是太重要了。即使萍水相逢，一称行第，亦会显得亲切、自然。而如位尊德重称位卑年幼者行第，更是很给面子的表示。无论在感情上、礼仪上，都给人一种超乎等级地位关系平等的感觉。

《旧唐书》卷一五八《郑余庆传》记：“姑息德宗时，宰相杜佑、郑中书主书滑涣，杜佑甚至私呼滑涣‘为滑八’。因公务私呼滑八是很不严肃的，似乎也有损的宰相身份。但是滑涣虽位损杜佑、郑卑却炙手可热，所以杜佑等不得不低意善视之，也即不惜绛尊纡贵加以拉拢。

《旧五代史》卷七二《张承业传》：庄宗酣饮，命兴庆宫使李继笈为承业起舞。既竟，承业出宝带币马奉之。庄宗指钱积谓承业曰：‘和（哥按指继笈）无钱使，七哥与此一积，宝马非殊惠也。’承业谢曰：‘郎君歌舞，承业自出己俸钱。此钱是大王库物，准拟支赡三军，不敢以公物为私礼也。’庄宗不悦，使酒侵承业……太后闻庄宗酒失，急召入。庄宗性至孝，闻太后召，叩头谢承业曰：‘吾杯酒之间，忤于七哥，太后必怪吾。七哥为吾痛饮两巵，分谤可乎？’庄宗连饮四钟，劝承业，竟不饮。张承业是后唐权阉，为后唐主理军需财计。传言：‘自庄宗在魏州垂十年，太原军国政事，一委承业。而积聚庾帑，收兵市马，招怀流散，劝课农桑，成是霸基者，承业之忠力也。’张承业作为后唐宫中
“老敕使”和家奴，与庄宗及太后的关系非比寻常。而他以主计身系国家命脉，也不惧怕庄宗。庄宗想从承业手中取得钱财，不是要之以君主之威，而是呼“以七哥”之称，动以兄弟之情，希望承业能为此感念自己的厚意。

高者向低者称行第，是为了联络感情，向对方表示不计地位尊卑。而值得注意的，却正是唐五代人在称行第时有意无意抹煞等级尊卑界限“平怀”之情，和那种在交往过程中所流露的热情豪侠之气，才代表了其时社会人士所独有的社会风范。写成于晚唐时期的《虬髯客》使人感觉到的，也是唐士君子的豪迈之风。行第的称呼，应当正是适应着这种气质与社会交往的需要。不过，唐五代人在称行第中所不知不觉透露出的平等意识、豪侠举止，在今人看来，实则已不免搀杂了一些下层社会所谓哥们意气的江湖习气在内这一点，即使权臣皇帝利用行第之时也未能免俗。它与南北朝之际世家大族所拥有的简慢自重、骄贵轻人形成鲜明对比。这表明，行第在向社会普及的过程中，已逐渐溶入了不少普通平民的习俗心态和意识追求。而这些新的观念，不仅影响百姓，也同样影响官场士人。这使行第称用的意义范围已大大超出了其原有的界限。因此可以说，通过行第这个小小的事物，不但反映了文化传播由上而下的过程，也反映了在这一过程中由下及上的反影响，这应当是事物发展形成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

前些年，曾读过詹森著《世家大族的衰落 唐末宋初的赵郡李氏》一文。文中讨论何以能幸存于胡人入侵及朝代交替时期，①载Arthur F. Wright等著、陶晋生等译《唐史论文选集》，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0年。
并且至少在四百年国家极度扰攘混乱中变成中古统治阶级中最成功的集团之一的赵郡李氏，竟在唐末宋初之际全然崩溃瓦解的原因。他认为唐代的世家大族与传统时代后期的家族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它们的衰亡不是指家庭内一些主要分子被杀，或被人夺去田产及被子孙挥霍光了祖产。“唐代的赵郡李氏并不是一个附着性强、而范围狭小的亲属集团。”虽然过去他们曾拥有坞堡田地，并控制很多荫附户，但是到了唐末一切都不再如此”，在唐末，赵郡李氏就只是一个观念。故所有能毁灭它的，就是要毁灭这个观念。“他们和老家的关系已然断绝，亦没有类似庄的氏族制度”。因此，赵郡李氏的毁灭是一个经济的、社会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心理的过程。"詹氏所谓心理的过程，就是观念破坏的过程。论称行第从纯然的士族习俗到里巷市民的意态渗入其间，无疑正是所谓心理观念破坏的一个部分及方面。

谈到这里，关于行第流行于隋唐之际的原因还有另一点补充。我们知道行第之称起先是盛行于士族官场，这一点除了已谈到的门阀观念影响之外，似乎还不应忽略国家统一这个大的背景和前提。隋唐以前的南北朝社会，士族圈子很小。特别是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使朝廷政治为几个大家族所把持。官员的出身门第既有相当严格的等级界限，且亦为彼此所十分了解。但隋、唐建国后的情形则不同了。南北朝的志士仁人相继汇聚于国之都城中，《隋书》卷六七《裴蕴传》谓："及陈平，上悉阅江南衣冠人士。"同书卷七五《儒林传》尤记隋廷来自四方的饱学宿儒。其略曰：

何妥字栖凤，西（城）域人也。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妥少机警，八岁游国子学……江陵陷，
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学博士……高祖受禅，除国子博士，加通直散骑常侍，进爵为公。

兰陵萧陔者，梁鄱阳王恢之孙也。少封攸侯。梁荆州陷，与何妥同至长安。

房恽远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也。世传儒学……齐南阳王绰为定州刺史，闻其名，召为博士。周武帝平齐，恽远首应辟命，授小学下士。及高祖受禅，迁太常博士。

马光字荣伯，武安人也。少好学，从师数十年，昼夜不息……开皇初，高祖征山东文学之士，光与张仲让、孔笼、窦士荣、张黑奴、刘祖仁等俱至，并授太常博士，时人号为六儒。

以上仅是从各地征召学士中的一部分。类似情况颇多。而不同类型官员中，其出身、来源也十分复杂。隋初用人之际，取士不限一域一途，这和南北朝小朝廷的作法已大相径庭。唐代更有所拓展，特别是科举制兴盛之后，朝廷用文治，大开官职场，地域、阶级的局限进一步被打破。各式各样的人组建了新的官僚社会，彼此的家世、身名需重新认识了解。而行第与家世、身名一起，是帮助彼此熟识的手段和工具。随着官场中相识的过程，行第便很容易被作为称呼，并形成习惯。因此可以说，行第虽与旧世族习俗相关，但它在以世族为中心的社会转变为官本位的社会过程中，仍找到了生存的土壤并有着新的贡献。

行第在由士族官场向庶民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如上所述既迎合并着唐人官、族并重的心理，迎合着其官场、社交的需要，复溶入普通人民的爱好追求，因此可以说，行第的流行因素是复杂的。不仅

①《樊川文集》卷一《冬至日寄小侄阿宜》，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9—10页。
如此，各地各阶层的人对行第的理解未必相同，而不同地域的人对行第所作的诠释也会不一样。很难认为重冠冕、重贵戚的关中、代北人与重婚姻、重人物的山东、江南人对论称行第有相同看法及感觉。特别是隋唐朝廷建在长安，统治阶级的基础又是“关陇集团”的人士，朝廷中流行的行第之称很难说无地域之影响。上面说到唐人称行第实已超出家庭氛围，而有着异姓间称兄道弟的内涵，其固源于社会下层之影响。但唐人的喜好结拜异姓兄弟，本身即有地域的、甚至是民族文化的特征。

颜氏家训》卷二《风操第六》：

四海之人，结为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义敌，令终始如初者，方可议之。一尔之后，命子拜伏，呼为丈人，申父友之敬；身事彼亲，亦宜加礼。比见北人，甚轻此节，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观貌，不择是非，至有结父为兄，托子为弟者。此段话清楚地表明，南北朝之际”，北人”结为异性兄弟就是非常普遍，非常轻易的事情。

唐崔令钦《教坊记》一则略曰：

坊中诸女，以气类相似，约为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辈。有儿郎聘之者，辄被以妇人称呼，即所聘者兄见呼为新妇，弟见呼为嫂也……

儿郎即聘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奔云”：学突厥法。”又云”：我兄弟皆怜爱，欲得尝其妇也。”主者知，亦不妒，他香火即不通。

“香火兄弟”“共尝其妇”事谓”之学突厥法”。而结异“姓香火兄弟”本身就是胡俗。胡人“之香火兄弟”情甚至超过亲兄弟，所以北朝行路相逢，便定昆季的习俗不能不说是有胡人气味。池田温指出，结异姓兄弟事北朝至宋元极多见，而敦煌文书中也见到有……
异（。另外敦煌还有强调异姓互助的“兄弟社”，但姓结为兄弟凭
池田先生认为两者不甚一致）唐朝后期结义之风最甚，而武人宦官
养义儿义子成风也因此可得解释。宦官的行第即因其结拜次第论
数。唐后期武人如田悦、王武俊、朱滔辈相称行第，似也不无某种
“香火情”在内。南北风俗交融之际，此种社会心理及习俗存在影
响甚大，《虬髯客》与《崔清》两则小说，亦不免令人感到与以前揭
此暗合。池田先生文中并引证谷川道雄有关“兄弟结义是贵族社
会解体过程中出现的新结合模式，跟假父子结合有不可分的关系”
的结论。参考这一结论，使我们感到行第之称的流行，虽最初可
能受东晋南朝世族风习传染，但是，到唐代以后是否逐渐与北俗思
维模式之下产生“的兄弟情结”产生内在的联系，并因此起到推波
助澜的作用，却是值得深思的。

要之，小小的行第之称盛行于大唐帝国，惟有对其时深刻的文
化背景进行综合的、融汇贯通的分析并加以充分的了解，也许才能
找到唐人于它的情结所在。

①池田温《关于唐宋时代的结为兄弟凭》，载《唐代的历史与社会》，武汉大学出
版社，1997年，第473—497页。
②见谷川道雄：《北朝末—五代的义兄弟结合》，《东洋史研究》39卷2号，1980
年。
在诸种礼仪中，婚丧大事与百姓关系最密切，也最为民间所重。所以面向社会普及礼仪的吉凶书仪除各种婚丧礼书外，也往往将婚丧仪典列作专目。结合敦煌书仪中记载的婚丧礼仪，可以看到，书仪一方面仍将《仪礼》《礼记》记载的古礼作为经典和纲领性的依据，一方面却对之提出了名同而实异的新解释。有些仪式或者规矩虽然保留，却根据社会的习俗，或重或轻，予以增减，古礼新仪杂糅，构成了唐社会的特有时尚。

一、婚礼仪俗
敦煌书仪有关婚丧礼俗的记载十分丰富，20世纪60年代初赵守俨最先结合敦煌书仪和其他史料记载，对唐代婚姻礼俗作了细致考索，年代中，周一良进一步考证书仪中记载的唐代婚丧礼俗之仪程细节，并与古礼、开元礼相对照，进行了更全面的研究。此后谭蝉雪集中敦煌婚姻史料的《敦煌婚姻文化》一书，也

① 赵守俨《唐代婚姻礼俗考略》，原载《文史》第三辑，1963年；收入《赵守俨文集》，中华书局，1998年，第13—31页。
② 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原载《文物》1985年第7期；收入《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87—301页。
以下仅综合书对相关资料和敦煌婚姻形式作了归纳补充，仪记及前人论述对婚礼仪典略作介绍。

（一）通婚书与婚礼程式
敦煌吉凶书仪中，与婚礼有关的内容基本可归纳为两项，一项是与婚礼有关的文件与书函，包括通婚书、贺婚书、嫁娶祭文等；另一项是婚礼程式和仪节。两项内容分散于不同的仪目中。其中通婚书等多见于内外族吉书仪，而有关婚礼的内容或则专门立项，如郑氏书仪即另“婚礼仪注第十四”一目；或则塞入通婚书、嫁娶祭文等下，如张敖《新集吉凶书仪》，两者的内容正可互为说明和补充。

通婚书与答书形式已见于前述。一种是杜氏《吉凶书仪》中“皆两纸真书，往来并以函封”的复书。它的内容是男家向女家求婚，说明是某某子求配某某女，然后是女家作答，都是一纸寒暄，一纸言正事。另一种是杜友晋《新定书仪镜》残（卷P.2619）和张敖《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出现的单书。两种形式在唐后期并存。《新定书仪镜》还有《下函六礼仪》《纳函书》（P.2619）等残目及《嫁娶祭文》（P.367），前二者内容已不详。

通婚书的规格、形式很不寻常。P.2646张敖书仪称通婚书“切须好纸，谨楷书，紧卷于函中。函用梓木、黄杨木、楠木等为之。函长一尺二寸象八节，函阔一寸二分象十二时，函板厚二分象二仪，函盖厚三分象三才，函内阔八分象八节”。尺寸有象征意义的函盖好后，“即于中心解作三道路子，以五色线缚”。写在面上的①谭蝉雪《敦煌婚姻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全”字,中间有一“个 全”字,意义不详,但封题“署 全”字者书仪中只见有婚礼的纳徵版和给皇帝的题表函(面详后),其隆重性可知。

通婚书为何要用黄杨木等上好的木质包装并用最高规格的礼函呢?原来,通婚书是须男女双方隆重递交的婚姻凭证。婚姻的程式古名六礼,即《仪礼·士婚礼》疏所说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和亲迎。在行六礼之前。通婚书先遣媒人通辞,称为“下达”可能是下达的结果,也即求婚实际已被接受,所以要有一个正式仪式。张敖《新集吉凶书仪》P.2646、P.3284)记通婚书要由男“方 亲儿郎有官及族中拣两 [才]貌者充使及副使”,骑着不著鞍辔、青丝作笼头、红线缠骔尾的细马两匹递送,并带二细婢随同函舆,附之以五色綵、束帛、钱舆、猪羊、酒面、野味、果子、酥、油盐、酱醋、椒姜葱蒜等各色礼品,送至女家。而女家也有“受函仪”。须先于堂前铺床置案,安置香炉、水碗、刀子各一。待礼物列于中庭,宾主双方依位立好,遂有一套跪送跪接通婚书函之仪。然后“主人升堂,案上取刀子开函取书读,读了,如无父母则微泣三声”等到一切仪式结束,主人才与函使相见庆贺,并设酒饭款待,送衣服匹段给函使,可见送通婚书是正式订婚,大概日后还要保存,所以才如此讲究。女家答婚书是否另有仪式,尚不得而知。

除通婚书外,敦煌文献和书仪中记载婚礼程式及相关书式也都有古礼的影响。例如S.1725记“纳采问名用昕(按书仪释昕为①《仪礼疏》卷第四《,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961页。
旭日始出之时,亲迎用昏,大略皆秉古意。这件书仪记婿父命子亲迎“时 父告子曰往迎汝妻”和女婚“前 (父 与母)戒女敬之慎之”,内容基本同于《 仪礼》和开元礼,而S.573《4 婚礼文() 按此应为一书仪记女方之(父“主”)与前来亲迎的女婿之间拜礼的一套程序,和主“翁 敢请”“固请”“终请”女婿升阶,女“婿 敢辞”“敢固辞”“敬承命”的三揖三让之节,正与古礼式和开元礼无差。成婚的当夜,男家女家要各自告祭祖先,开元礼称为告庙。这是嫁娶祭文的由来。嫁娶祭祖也是古制《, 礼记·曲礼上》称”:男 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故书月日以告君,斋戒以告鬼神。”据S.1725卷“的 成礼法”,男家斋祭先人的仪式在亲迎以前举行,于中庭置席安祭盘,宣读祭文,将某子年已成立,要迎娶某氏成礼的情”况 昭告先灵”,大约意在对祖先有个交代“。三献讫,再拜,辞先灵了,即于堂前北面辞父母,如偏(露 指父母一方死亡),徵哭三五声。”女家祭祖和宣读祭文的情况也大体相同。P.3502张敖《 新集诸亲九族尊卑书仪》在祭文后加了一段话,大意是说时人修书“或 乱说闲词,用事不当”,或 头尾俱重,心中语轻”,书仪列此类书式,不过“是 略举大体”,给人们一个端正的榜样罢了。古礼规定妇人成婚后次日晨要拜见舅姑(公婆)。S.1725书仪记舅姑升堂的座位方向及新妇献果脯、拜与舅姑答拜的方式基 自“同于古礼。史载贞观中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王珪使公主行此礼,以为可以成国家之美。建中元年礼仪使颜真卿奏,
郡县主见舅姑,请于礼会院过事,明日早,舅姑坐堂,行执笲之礼”,其形式基本同于书。另外舅姑已亡者又有“庙见”之仪。仪《仪礼·士昏礼》” 若舅姑既没,则妇人三月,乃奠菜。《礼记·曾子问》” 三月而庙见,称来妇也。择日而祭于祢,成妇之义也。”根据孔子对曾子问的解释,未经庙见而死之女是不能迁于祖庙,而只能“归葬于女氏之(党 母家),示未成妇也”,即不承认是新妇。所以庙见实际无所谓公婆在否而是一种认祖的仪式。S.1725书仪在“何名不相识”下加入此仪”:答曰:异财之妇,义须以礼亲迎,入室三月之中不出拜见,每旦遣宣言,女子通参舅姑起居。舅姑答曰:谢新妇,须劳顿。自经由三月,始出庙见。”庙见并非虚有其事《。唐代墓志汇编》开元四九三《唐故荥阳郑宾妻博陵崔氏墓志铭并序》记述”:年有十九,归于荥阳郑宾,未。墓志未言是及庙见,而婴沉痼否归葬母家,但是同书天宝二二二《唐颖川郡司户韦元逸故夫人赵郡李氏墓志铭并序》即说道墓”主 嫁而疾,七十有一日,终于家”,未及三月庙见”,故仁母诸兄,痛其未成礼于夫之门,不荣食于夫之禄,归葬党地,哭有余恨”。”可见庙见与妇见舅姑同样都是唐社会遵守的旧规。

从一些有关婚礼的程式和内容,也可以看到后来在说法和制度上的一些变化。例如S.1725解释“何名六礼”是所谓“雁第一,羊第二,酒第三,黄白米第四,玄 第五,束帛第六”,即完全以纳采纳徵中的礼物之名取代原来的六礼。其中“雁第一”是古礼规定婚礼要以雁为贽,亲迎也有奠雁之仪。如果说书仪解释婚礼为何用

---

(1) 参见《通典》卷五八《公侯大夫士婚礼》,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654页《; 唐会要》卷八三《嫁娶》,国学基本丛书本,第1530页。
雁“以雁知避阴阳寒暑,似妇人之从夫”及雁知逐寒暑,雍雍雁声,知取其和顺之意,上下和睦之家”是取《仪礼》郑注及毛诗注,那么解释婚礼用羊谓“汉末之后然始用,羊羔在母腹下胡跪饮乳之志(态?)。妇人产子,彼有恭敬之心,是故婚礼用羊”,却完全是后来之制了。姜伯勤先生曾提出书仪“的六礼”是出自北朝系统的通俗《公侯士大夫婚礼》记晋太康八(年287)

解释,但是《通典》卷五八束帛,加璧、乘马。大夫用玄束帛,加有司“奏王侯婚礼玄羊”,并奏古者“诸侯加大璋。可依周礼改璧用璋。其羊雁酒米玄如故”,是上“述六礼”至少晋时已用《。唐会要》卷八三《嫁娶》,记太极元(年712),左司郎中唐绍上表,“称士庶亲迎之礼,备诸六礼,所以上承宗庙,事舅姑”;以下批评障车之“俗多集徒侣,遮拥道路,留滞淹时,邀致财物;遂使障车礼贶,过于聘财,歌舞喧哗,殊非祝感”,将障车的邀致财物与婚礼“的备诸六礼”相比较,认为“是过于聘财”,可见六礼实指聘财,也即古礼的纳徵《。太平广记》卷一六《杜子春(》出《续玄怪录》)也道”:卢生备六礼,亲迎为妻”。“备六礼”是“为亲迎”,是唐人理解的六礼也即书仪所说的聘财六礼。

由于婚礼除亲迎外,比较实质性的内容就是纳财礼的纳徵,所以上1725卷中对于纳徵之礼记叙特详。所用“玄束帛”虽然处处不脱旧规,但相对具体通俗,具有可操作性。纳徵礼物由媒人送去,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说明纳物的数量尺寸包装外,还特别指出要有秋木做的纳徵版两块”,长尺二,广五寸,厚三分”,象征千秋、十婿父名二月、五行、天地人。一块版上书明“君有嘉命则室也,厶敬依

①姜伯勤《:唐礼与敦煌发现的书仪》,见氏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礼乐篇上编,第435—436页。
束帛羊雁旨酒”、谨遣某官姓某乙再拜”先曲，玄及纳徵三行；

另一版却“要半肠之内，凿作卯头，裹三道白线缠之，(如加)蜡封其线上，注作‘全’字，题云‘某官人门下合姓顿首叩头’，或云白书。任意一法，全无咨。”有蜡封“和全”字封题的显然也是最高规格，对比《通典》卷五八记东晋王堪六礼仪，于版上各方书礼文、婿父名、媒人正版中，纳采于版左方。裹以阜囊封章，白绳缠之，(如加?)某官某君大门下封，某官甲乙白奏，无官言贱子。礼版奉案承之。

酒羊雁缯采钱米，别版书之，裹以白缯，同著案上，也是两版，内容写法颇有相通之处，可以知道这类婚礼仪注大致是采用魏晋以后大族创作的制度。

(二)婚礼中的唐代民俗

S.1725书仪对于纳徵的重视，是和后世的重财礼分不开的。

魏晋以后，“古六礼”的程序事实上已有简化，如《通典》卷五八记北齐一品至三品娉礼，即上述玄束帛羊米等纳徵之物，惟加绢锦采等数量较多。纳采纳徵作为纳聘并在一起，财礼之物也可能随通婚书一起送到女家，如前揭张敖书仪那样，至少一般百姓是如此，这也是书仪为何不再以古礼名六礼的原因。此外古礼的纳徵只有象征意义，而真正的财礼却要丰富得多。《颜氏家训·治家第五》说“到近世嫁娶，遂有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较锱铢，责多还少，市井无异”的情况，说明买卖婚姻在世族已成风习。

唐初禁崔卢李郑等七姓十一家大族不得自为婚姻，但这倒促成他们在婚姻中索“取陪门财”。《通典》同卷记显庆四年十月因李义府上奏，诏“令天下嫁女受财，三品以下至八品，从三百匹到五十匹限制不等”，皆充所嫁女赀装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门财”；但民
间婚姻财礼之风未必受限制。敦煌S.4609《邓家财礼目》计有各种绫绢锦缎及制作的衣物数十种，并有油酥、麦、羊、驼、马等，充分显示了敦煌富家财礼的奢华。

财礼送到女家后，两亲家大概还要见面《新集书仪》中引有《新定唐家礼亲仪》，内称“凡两亲家先未相识，各自称名，然始相拜【拜了】，女家先谢云：‘乙卑门小女，触事未闲，有幸得事亲家高门，不任感慰。’男家答云：‘乙愚息，素无才学，有幸得事亲家翁高门，不任感慰。’以下则是关于两家交换财礼后‘与平(怀)朋友’相贺语，到了这个时候便离与礼不远了。

书仪关于婚礼的许多记载其实也是掺入了民风。例如《礼记·昏义》记奠雁”：婿执雁入，揖让升堂，再拜奠雁。“到了张敖书仪(P.3284、P.2646)则谓”：升堂奠雁，令女坐马鞍上，以坐障隔之，女婿取雁，隔障掷于堂中，女家人承。将其雁以红罗裹，五色绵缚口，勿令作声。奠雁已后，儿家将物赎取放生。如无雁，结彩代之，亦得。“结合敦煌壁画中的婚礼图，知奠雁之俗确实有之，只不过图中所用之雁或置于新郎新娘面前的地毯，或为侍女抱着，并未出现。

书仪所说的场面从书仪还知道具有象征意义的雁已用鹅取代。S.1725特别点明“女婿抱鹅，向女所低跪，放鹅于女前”。民间雁不易得《初学记》卷三○《雁第七》引《广雅》和扬雄《方言》，都说雁即鹅或仓《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上》记贞观二十年吐蕃使禄东赞上书，“称‘夫鹅犹雁也，臣谨冶黄金为鹅以献’，作金‘鹅高七尺，中实

①蔡伟堂《关于敦煌壁画〈婚礼图〉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1990年第1期，第55—59页。
酒三斛”是雁、鹅本有渊源，以鹅代雁可能早就如此。婚礼必须是民间有的东西”，羊雁旨酒”大概都是北方地区盛产，羊酒尤然，所以书仪强调的礼品也有结合民俗的一面。

书仪中为前人已注意到的还有诸如青庐、撒帐、祝愿之俗及婚礼细节。唐代亲迎之礼须于屋外另设帐，《封氏闻见记》卷五《花烛》条提到婚嫁“有卜地安帐”，且“上自皇室，下至士庶，莫不皆然”，这个帐就是青庐。S.1725记男女双方行同牢盘“、连瓢共饮”的合卺之礼及答拜后，即引新妇入青庐”，在青庐内男东女西坐“。P.2646张敖书仪则说“凡成礼须在宅上西南角吉地安帐”，行奠雁礼“后同牢盘，合卺杯，帐中夫妻左右坐”。”青庐相传是北朝遗风，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称“今士大夫家昏礼露施帐，谓之入帐，新妇乘鞍，悉北朝余风也。《唐会要》卷八三建中元年十一月颜真卿奏“近(代婚礼)设以毡帐，择地而置，此乃元魏穹庐之制。”但据学者考证，至少汉魏之际已有之。青庐又被称为百子帐，《南齐书·芮芮传》及《南史·夷貊传》皆有记载。宋人程大昌《演繁露》卷一三有考证，“为唐人婚礼多用百子帐，特贵其名与昏宜，而其制度则非有子孙众多之意”，并引白居易毡帐诗，“为制出戎虏”，大抵如今夹顶圆亭子，而用青毡通冒四隅上下，便于移置耳”，实即今之蒙古包。

毡帐铺设好后要“有撒帐”之仪。撒帐除了撒些金钱果子，还要说些诸“如伏愿成纳之后，千秋万岁，保守吉昌。五男二女，奴婢成行。男愿总为卿相，女即尽聘公王。从兹(咒祝)愿已后，夫妻寿命延长”之类的(咒祝)愿语(P.2646)。这类咒愿语在敦煌文书①赵守俨《唐代婚姻礼俗考略》《文史》第三辑，另收入《赵守俨文存》。
中十分多见,内容无非富贵绵长、子孙昌盛的吉庆话,大概不止撒帐,婚礼中也要由赞者唱道。这类记载及其他诗文史料所见下婿、催妆、障车、却扇等俗一起,展示了唐代婚礼的热烈场面。

书仪中有关贺仪的内容不多。古“有婚礼不贺”之说,但是既“要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不贺便是不可能的。敦煌S.4700卷是一“件阴家婢子小娘子《(荣亲客目)》,实即阴家女儿办婚事的客人名单。阴家是大族,客人包括“翟使君(刺史)”和“曹家众兄弟”等敦煌官员及上层头面人物数百位,可见场面浩大。与这类婚礼相应,张敖书(仪 P.2646、P.3284)“有贺慰儿家父母语”、“贺慰女家父母语”及答语,大概是客人参加婚礼的口头致辞。S.32《9书仪镜》有《贺四海婚嫁书》《贺四海婚姻书》各一件,却是未能参加婚礼人的道贺。P.3931《新集书仪》平怀相贺“有儿婚”:伏承贤郎君与厶氏亲姻,已过财信,伏惟感慰。”答语云“:啇乙愚子,素寡才德,公家不以蓬门,许为姻娅,啇乙不任感慰。”原来是两亲家对贺。还有专门贺女家“伏承小娘子与啇氏亲姻,财讯已过,奉助感慰”和答“语啇乙女子已手某家礼定,不任感怆”,都是祝贺婚姻成功的礼词。

最后还要提到唐人婚姻中的两项民俗。其一即周一良先生已论之男到女家。S.1725卷在解释妇女与夫家通信“相识曰书,不相识曰疏”时,曾说到“:近代之人多不亲迎入室,即是遂就妇家成礼,累积寒暑,不向夫家。或逢诞育男女,非止一二。道途或远,不可日(别?)通参舅姑。”所以虽已成礼,“却与夫党原不相识”。这种①《通典》卷五九《婚礼不贺议》,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671页;《礼记·曲礼上》,《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238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65

情况，似乎和《颜氏家训》卷一《治家第五》所“说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惟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的情况有些相似。而唐代妇女与母家关系密切，妇女可能有种种原因长期居住母家①，甚至婚姻也在母家。唐宰相元载及剑南节度使韦皋微时都有依倚妇家的历史《。太平广记》卷一七○《苗夫入（》出《云溪友议》)记韦皋妻张(氏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女”)垂泣而言曰：'

明韦郎七尺之躯，学兼文武，岂有沉滞儿家，为尊卑见诮。'

谓婚姻在女家。但这种依倚妇家豪势可能与书仪所说民风不同。周先生曾指出敦煌《下女夫词》记载的婚礼过程都在女家，而张敖书仪在宅中安(帐青庐)竟也是“由女家铺设帐仪”，这种风俗在西北很可能是受少数民族影响。

另一项即冥婚，又称婚。S.1725答“何名嬒婚者”曰”：男女藻饰，未有聘娶，男则单栖地室，女则独寝泉宫，生人为立良媒，遣通二姓，两家和许，以骨同棺，共就坟陵，是在婚嬒也，一名冥婚也。'冥婚延续的时代很久，清惠士奇说”：周曰嫁殇，汉曰娶会，唐曰冥婚。'据学者考证，三国以降士大夫即颇行此礼，北朝亦承此俗，而唐朝冥婚之风似乎更甚。以至天子朝臣，都有行冥婚的，如中宗为懿德太子崇润

至忠殇女为婚，韦后为其弟聘萧至忠殇女为婚，代宗为承天皇帝琰聘兴信公主亡女张氏，谥恭顺皇后；见于碑志如显庆五年660)尚书都事故息颜子与文林郎刘毅故第二女冥婚，垂拱元年685)故昌平县开国男天水赵"君爱求胜族，冥婚刘氏"，神功元年十月大周故右翊卫清庙台斋郎天官常选

①陈弱水《：试探唐代妇女与本家的关系》，台湾《史语所集刊》，68本一分。
②见赵翼《：陔馀丛考》卷三一《冥婚》，中华书局，1963年，第649—650第155—158页。
冥婚是生者对死者的慰藉。据S.1725书仪，冥婚须男女家各自为祭文。此外知记有冥婚或冥婚书的至少还有P.3637《新定书仪镜》和S.6537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冥婚书和答书在杜氏书仪是一纸单书，"但题如吉法"，形式与通婚书相似，只不过加"些春花未发，秋叶已凋"之类的词语使人知道是用于阴间罢了。冥婚直到后唐明宗时才觉得不合理，而提出"婚吉礼也，用于死者可乎"，要求刘岳对郑氏书仪加以删改。但是在此之前冥婚始终写入大族书仪，说明它一直作为传统习俗被上层社会所接受和传播，这一点与当时社会现实是一致的。

通上所述，可以知道书仪关于婚礼仪俗基本是以古礼为框架，而纳入魏晋以来制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以体现唐代北方民俗为主，三者有机地融为一体。但前期书仪依据古制或礼法较多，后期书仪反映民俗和地方色彩更重，说明唐代在婚姻礼制方面以俗代礼的情况是越来越多的。

二、丧礼程式和吊祭

古代的丧葬内容复杂，丧事的举办涉及到丧制、服制和衣制的问题。丧制的服丧期限又由后二者决定。S.1725《唐前期书仪》□□□"称斩练祥。衰三年，服廿五月。廿五月大祥。（禫下阙）"，P.3637杜友晋《新定书仪镜》的凶仪部分有注曰："凡三年服，十二月小祥，
廿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二十八月平裳。凡周年服十三月除，小为父母的斩衰三年。《丧服传》郑玄礼注。唐朝自贞观至开元丧制均依郑玄礼，书仪与此一致。但是据论者考证，敦煌社会习俗三年丧制为三十六个月，于此不符，说明各地民俗本不一致。敦煌书仪从前期到后期都是二十七月，可能因为敦煌所见吉凶书仪主要是来（自或集自）中州礼法之故。

丧礼是以办父母的斩衰、齐衰丧为主。办丧事与相关吊祭的仪式在古《仪礼·丧服传》中已有规定，是历代相沿丧制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唐前后期吉凶书仪中多有相关仪目。敦煌S.6537v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的凶礼仪注第十六，便可能是这一部分的总名。年代在它之前的S.1725《唐前期书仪》对此也有较多叙述。

S.1725对丧礼的说明以父母之丧为中心，依次叙沐浴、小殓、大殓、殡、成服，孝子杖节、庐墓、悲哭、练祥及奔丧等制。文字十分简略，有些只是一语或数语带过，语言也相对通俗，基本上看得出是摘抄或是简化《仪礼》《礼记》的内容。‘凡丧，父母浴于中霤；中者，北堂小殓者，附体衣大殓者，单衣屋脊下也。小殓于户内，裳，口含珠玉。二日大殓于衾被著棺中。户牖之前，三日而殡”一段，基本上源于《礼记·檀弓上》《仪礼·士丧礼》和《礼记·王制》而稍加修改。其中，中霤的解释与孔颖达所‘释中霤，室中’①。②
也。《礼记·奔丧》的文字演化而来。书仪强调以丧事为重的宗旨。S.1725说：“凡丧礼，以丧为主，朝廷以爵为重，乡党以齿为先。丧制不问轻重尊卑，服者则在家者遭父母之丧，不问长幼，尽在家。举行丧礼，则“以九族省吊奔丧法”为重仪。如论者所言，吊孝是士大夫社会交往礼节之一和家庭教育的必修功课，所以书仪将有关丧事的重点放在这里。其具体奔丧或省吊的对象包括内外五服至亲。内族是父母、儿女、同堂伯叔父母兄弟、再从兄弟称奔丧”，自三从以下、五从以上”便行吊礼了。外族有女婿吊妻父母、妻祖父母、妻伯叔母，外（甥）外孙吊外祖父母、姨、舅母、及吊出嫁姐妹、出嫁女等。其吊仪区别在于表达悲哀的程度和方式。例如哭的方式有坐哭、立哭、跪哭，自外哭、入门哭、至门哭、望门哭、入村哭、望乡哭、望国哭，哭三五声、五六声、十余声、哭尽哀的不同；又有执手、拜灵、如何站位等等，完全依据服制的远近亲疏而定。其中“执孝子手”多处提到。P.3691《新集书仪》“称重孝之子擗踊。若平怀，手执之。若尊重，以两手扶之。”所说平怀执手与S.1725见到的情况一致，与P.2622张敖书仪“称唯尊者执卑者手”则有不同。周一良先生指出执手是东晋以后风俗，而唐代则于细节有发展①，史睿也指出哭的讲究与南朝
开元礼承古礼礼俗有关“有宾吊”“亲故哭”之仪，这里只是在仪注方面具体化了，且文字简明易懂，正可以备一般百姓随时参考。

书仪的吊哀书、祭文等是为丧礼服务的。《新定书仪镜》和《书仪镜》的吊书包括内外族和四海吊答书，内容文字与告哀书对等，只是重在吊唁。除吊初丧，也包括吊祥、禫变除等。与吊书同时又有吊礼上用的口头吊答辞。《新定书仪镜》即“有内外族及四海吊答辞”廿首，内含吊人父母、吊伯叔兄姊各类戚属。吊辞一般只有吊答书中的几句，如《吊遭父母初丧辞诸尊人同》称“凶舋无恒，尊夫人崩背。惟攀慕号擗，荼毒难居，哀苦奈何[！哀痛奈何]”以下类推，用语依对象而有区别。这种吊辞在元和郑氏书仪中，又被冠以“□吊仪礼第廿四”之题。借助张敖书仪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名目也至少“有吊人父母亡、吊人翁婆、吊人经葬、吊人经时节、吊人伯叔父母姑”等十几种场合对象，语言也是被简化为一两句的吊辞，“如尊丈人、丈母倾背，伏惟攀慕号绝”“日月易流，安厝永毕，奉助哀慕号绝”等。另外吊的名目之多显然已不完全能用开元礼规范。

①史睿《敦煌吉凶书仪与东晋南朝礼俗》，载《敦煌文献论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13—414页。
"江南凡遭重丧,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吊则绝之"的风俗有关,即重初死之吊。但《颜氏家训》也说南人冬至岁首,不诣丧家;若不修书,则过节束带以申慰。北人至岁之日,重行吊礼"。据此诸节日吊者应是北方民俗,则至少唐后期五代书仪已融入北方色彩,而。所以吊仪的发展大概如追七吊等已是佛家的仪式也是唐五代礼仪世俗化地方化的一种表现。祭仪在唐代看来是很受重视的,本书上编在介绍吉凶书仪时曾谈到家祭礼一类的俗礼书出现,而祭文在《新定书仪镜》中也可见多种,如有关父母丧葬程序的初薨祭、三日小殓祭、七日大殓祭、堂上启柩将葬祭、车出祭、下棺(祭张敖书仪称"为启柩祭",此下并"有葬行至桥梁津济祭"),临圹(祭张敖书仪又"有掩圹祭")、近神(祭张敖书仪"称葬毕迎神祭文")、春夏秋冬祭、祥祭、迁葬祭、除服祭,以及针对各种不同对象的父祭子、夫祭妇、妇祭夫、祭兄姊、合灵祭、冥婚祭等。祭文中多"有惟年月朔日某某昭告于某某之灵"或以少(牢或清酌)之奠谨祭于某某之灵等语,与传世祭文大同小异。其中父母丧祭或依时令祭者不少可以印证古礼、开元礼,但明显比开元礼的规定更清楚甚至烦琐。内如迁葬、夫妻合灵等又是常见的唐人风俗,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大量实例。由于葬事中心在于提倡孝道,所以书仪记载的葬和祭均以父母三年丧为中心。另外从书仪看,越到唐后期礼仪的描述越通俗具体。张敖书仪记有父母下葬一日的全部过程及相关祭礼:

① 史睿《敦煌吉凶书仪与东晋南朝礼俗》,载《敦煌文献论集》,第411页。
② 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中的唐代婚丧礼仪》,载《唐五代书仪研究》,第296—297页。
至吉日，主馔设祭，祭文在后卷中。三献讫，孝子哭再拜，至夜排车入门东，比，挽郎持翣振铎唱歌，及排比车舆。盟器陈于南垣，魂车于门外左右。比庭祭讫，柩出升车。少顷，以薄帛吊□魂车里，□奄勒则掌事升柩上车，以刍□（绳）车，两边以之，勿摇动，则以帛两匹属挽郎引之，持翣振铎，唱薤露之歌。柩车到墓，亦设墓屋，铺毡席，席上安柩，北首。孝子居柩东，北首而哭临设祭，祭文在后卷中。三献讫，孝子再拜号踊，抚棺号殒，内外俱哭，则令僧道四部众十念讫，升柩入圹。掌事升棺入圹安置讫，即闭仪门。圹掩讫，于坛上设馔，祭后土。这一程序，与开元礼葬日“的将葬陈车位”“、陈器用”“、进引”“、引（灵车）”“、出升车”“、遣车”“、到墓”“、入墓”“、掩圹”“、祭后土”等内容基本相似，可以看出这个抄自郑氏书仪的葬礼在相当程度上是遵行朝廷仪制。但是叙述过程比开元礼通俗详细，便于时人效法参照。其中有些内容，如说到挽郎牵引“车持翣振铎，唱薤露之歌”者开元礼不曾有，却是相沿已久的民俗。《初学记》卷一四《挽歌第十》记”干宝《搜神记》曰：’挽歌者，丧家之乐，执绋者相和之声也。挽歌词有薤露、蒿里二章，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精魂归于蒿里。故有二章。’至李延年乃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者歌之。”不过从书仪及墓志记载已看不出其中的分别。另外书仪说到墓上哭临设祭，还“要令僧道四部众十念讫”，才能升柩入圹，关闭仪门。请僧念经儒家礼仪所无，但在当时官民葬礼已很普遍，可见书仪所记乃是礼俗结合。郑氏书仪既名这部分“为凶礼仪注”，明显是将古礼和开元礼的精神具体化了。
另外从唐代丧葬和吊祭来看，是很注重官职和等级性的。陈戍国指出，在开元礼中，自饭唅至祔庙之祭不同官爵之间皆有差别，这种差别是按一品、三品以上、五品以上、六品以下分为四个层次。丧葬的等级是由官品决定的。唐朝无论吊、祭对死者称呼大都标明官职。《新定书仪镜》凶仪有《题旐文》一首，内“称维太岁厶辰厶月厶日具官郡县乡里姓名府君之神旐”，先具官职，后具郡望。并解释说：“[晋]徐广云：今时人题旐，或多不安年号，但安（言）郡而已。若妻亡从夫之爵，妾从子之位，厶夫人之神旐……旐者，明亡人有官爵。”旐即魂幡，徐广所在的晋朝世族社会题旐本重郡望。但是书仪却谬用其言作依据，归结为专书官爵。张敖《新集吉凶书仪》所“记三品已上坟高一丈二尺，五品已上坟高九尺，七品已上，九品已上坟高六尺，庶人坟高四尺”，就是官品等级的丧葬制在书仪中的反映。它虽属唐后期之制而与开元礼不同，但仍清楚地说明官僚制度对民间丧葬的限制和影响。

①陈戍国《: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第二章七节《李唐丧葬礼(仪二)》，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52页。
②陈戍国指出此制与《唐会要》卷三八《葬》所载开元二十九年正月敕所载三品、五品、六品以下坟高相同。参其书第154页。
第十二章 丧服制（上）

丧服制度包括服制和衣制。服制是历来变化最多，亦最为礼家所关注的问题；中古丧服礼之变革在相当的程度上也是通过服制来反映的。衣制则是由丧制和服制所决定，服制轻重和丧制长短以及服丧期间祥、禫变除各节对衣制都有影响。敦煌书仪中关于唐代丧服制度的记载和论述最丰富，特别是出现了有关服制和衣制的两种丧服图，是以往在传世史料中所未见的，为研究唐五代的丧服礼提供了重要的补充。这里的讨论是以笔者旧作为基础，围绕和依据几件书仪及丧服图所反映的礼仪年代和内容，说明唐代丧服制度变化的规律特点，并追寻这一变化在中古礼制发展中的意义。考虑到相关论述较多，篇幅较长，故分作两章。本章主要讨论P.4024和S.1725所反映的丧服仪制和P.2967杜佑《丧礼服制度图》为主。①

①本节原以《敦煌S.1725与P.4024写本书仪的撰成年代与贞观丧服礼》为题发表于《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83—294页。此处内容、文字均有修改。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五服和服衣制度。P.4024书仪并存有子目二：“丧服仪（第十代）”、“服衣仪第十九”。尽管两件书仪都没有书札出现，但是对两书仪的性质，近年学者在整理和论述中都给以肯定。不过对于书仪的撰作时代，论者却有不同意见。笔者认为，对年代的确定涉及书仪所载礼制的问题，而书仪中的服制正反映了贞观变礼对于朝廷和民间的影响。

（一）S.1725与P.4024写本书仪的年代和礼

在相关S.1725与P.4024写本书仪的讨论中，最早注意到写卷年代与礼仪关系的是谭蝉雪女士。她根据S.1725卷中无嫂叔之服的条例、关于舅姨的丧服规定、父在对母服的处理，以及开元礼避玄宗讳而本卷不避等四条意见，得出S.1725卷“是初唐旧礼，而且很可能是中原流入之作”的结论。之后，姜伯勤先生撰文肯定了谭蝉雪的看法，并进一步讨论礼的具体年代，提出S.1725号写卷既反映了贞观礼，也反映了显庆礼。理由是卷中的《礼及令》一栏，除服制外还同时载明假宁令关于各种情况下给假日数的规定，体现“了《显庆礼》‘其文杂以式令’的特色”。

如按照这一看法，则写卷的年代应定在高宗显庆以后。从卷子的各方面情况看，这样确定年代似不无道理。但S.1725所反映的究竟是不是显庆礼呢？在这一方面，似乎内容应比形式更加重要。唐初承袭隋礼，至贞观十一年才改行新制③。但新礼在旧礼

① 详见谭蝉雪《敦煌婚姻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② 姜伯勤《唐礼与敦煌发现的书仪》，见氏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第421—425页。
③ 参见高明士：《论武德到贞观礼的成立 唐朝立国政策的研究之一》，载台湾《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1159—1214页。
在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开始针对丧礼中嫂叔服和舅服等问题提出修改。按照他的要求，魏徵、令狐德棻等与礼官定议：

“今谨按曾祖父母，旧服齐衰三月，请加为齐衰五月；嫡子妇旧服大功，请加为期；众子妇旧服小功，今请与兄弟子妇同为大功九月；嫂叔旧无服，今请服小功五月；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旧服缌麻，请与从母同服小功。”

修改的服制，不仅有嫂叔服、舅服，还有曾祖服及嫡子妇、众子妇服。对其定议，太宗下制称可，因此推测当时的决定会以令、式形式发布，作为原贞观礼的补充。而显庆制礼，也会将上述内容正式补入。又高宗即位后，还有姜先生提到的舅为甥报缌麻改小功的问题。据《唐会要》卷三七显庆元（年656）九月，礼官长孙无忌提出贞观中八座已“议舅服同姨小功五月，而今律疏舅报于甥，服犹三月”问题，要求予以改正，并修改律疏，实行“舅报甥亦小功”，还提出嫡子应为庶母服缌麻，都得到批准。由于显庆礼虽从永徽二（年651）始修，但至显庆三（年658）正月五日方奏上②，故长孙无忌提出的内容也必定会被写入显庆礼。所以要想得知S.1725写卷是否反映了显庆礼，并进而确定年代，必须看看上述所有这些定议，是不是都在卷中出现。同样，对于P.4024礼仪年代的确定也应如是。由于两卷中以P.4024所载丧服制更清晰、规范，且S.1725卷的内容与P.4024卷多有相似及相关之处，为了便于说明和对比，这里，我们先来弄清P.4024卷所载礼制的年代问题。

①《唐会要》卷三七《服纪上》，国学基本丛书本，第672—674页。
②《唐会要》卷三七《五礼篇目》，国学基本丛书本，第670页。
贞观改礼前的《丧服仪》部分，是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的五服顺序排列，依次说明每一类作为本服、义服和妇人为夫家服等不同的服属对象，以及降服与殇服的范围等级。本服即男、女按丧制规定本来应服的正服。义服乃是正服之外，为报恩义或情谊的加服。正服、义服和妇人为夫家服关于上述问题都有较明确的规定。

其一是曾祖服，卷中“齐衰三月”有：

众孙之服同孙女，虽出不敢降。

曾祖父[母]、曾同居者、继父同居。

曾祖父母仍与高祖父母并列于齐衰三月中。按据《通典》卷九十《五服年月降杀》叙服制沿革，知周代以降惟有齐衰三月，无五月制，齐衰五月乃贞观十四年为曾祖所特加。因此有无齐衰五月乃是判定年代的一个标志。而此中的曾祖齐衰三月，显在贞观十四年以前。

其二是舅甥服，卷“中缌麻三月”内有：

母之女之姊妹、兄弟、男女男女。

说明甥为舅服缌麻，舅报甥亦缌麻。而卷“中小功五月”则有“外祖父母从母”一条，可见姨服小功，舅与姨不等同。如太宗所述旧礼之规定。

其三是嫡子妇与众子妇，大功九月“本服下有：

舅、外孙男女、外甥男女。

①“高祖父”，P.402原作小字注，此处依文意改与曾祖同。
从父昆弟、同堂兄弟、祖为众孙……舅姑为妇。

舅姑为妇是为何妇?参同卷妇人为夫家服大功有“姑为嫡子妇”,小功“有 姑为众子妇……嫡孙妇、嫡曾孙、嫡玄孙妇”,小功本服也。嫡子妇在则无嫡孙有“妇。”知大功九月的“舅姑为妇”应是众子妇、嫡孙妇,而妇”前尚脱“一 嫡”字。嫡子妇服大功,众子妇、嫡孙妇等降嫡子妇一等服小功,显然应为贞观十四年以前服制。

三者既均为贞观十四年以前服制,那么是否可确定为贞观十一年礼?此处尚应注意嫂叔服的问题。嫂叔服的处理,本卷似有不同。其“齐衰期”服内有:叔少孤,为服□□□养及为(嫂)养之,所以继父婚为立同居期、祀之恩。然服,叔亡(孤叔)不为(嫂)期右(三 二?)条为义服。“孤叔为(嫂)期”的一条似与贞观礼相悖。然义服仅为恩服,孤叔为嫂期”是小叔将有抚育之恩的长嫂作母看待,此非同一般。一般情况下,继父同居如前引文可服齐衰三月①,那么嫂叔如何呢?

检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此卷录文,大功九月本服下有“兄弟之妇”一条。本服无分男女,若如是则有伯叔为娣姒,也即叔为嫂服大功了。然对照原卷胶片,发“现 兄弟之妇”乃 兄弟子妇”之误录。按据《通典》,周制以降兄弟及兄弟子皆属期亲,本“卷 齐衰期”条亦“是 昆弟、昆弟子”皆入。两者既皆服期,则似乎兄弟之妇与兄弟子妇同降一等服大功也都是可以的。然一字之差,却涉及两种概念。如兄弟子妇,是(伯 叔)翁姑为侄妇,辈分类如翁姑为……
子妇,非所谓嫂叔服,不牵扯回避问题。是兄弟子妇而非兄弟之妇,看似不合理,却符合传统原则。又据《唐会要》卷三七《服纪上》贞观十四年秘书监颜师古议曰:

至如舅姑为妇,其服太轻。冢妇止于大功,众妇小功而已。但著代之重,名义特崇;馈奠之勤,诚爱兼极,略其恩礼,有亏慈惠。犹子之妇,普服大功;己子之妻,翻成减降。今谓冢妇(周)服,众妇大功,既表授室之亲,又答执笄之养。叔仲之后,诸妇齐同,则周给齐平,更无窒碍矣。颜师古所"谓犹子之妇,普服大功;己子之妇,翻成减降",正指众子妇服低于侄妇的情况。所以魏徵与令狐德棻等才定议":众子妇旧服小功,今请与兄弟子妇同为大功九月。"此也足资为旧礼大功九月含兄弟子妇而非兄弟之妇的证明。

不过,大功九月虽无兄弟之妇,本卷缌麻本服"在众孙女、从孙兄弟侄(孙)妇。"下却仍载"有昆弟妇"一条。这样如从男子角度而言,便仍不能避免嫂叔之服了。然此条亦不无可疑,因嫂或弟妇依辈分乃为兄弟子妇之姑、侄孙妇之祖姑,尽管按"照叔嫂不通问"的回避原则,可能有意降低丧服等级,但祖姑与孙妇列为一等,却未免所降过低。又如从妇人角度而言,已有上面本服的为兄弟子妇服大功,何以反为兄弟妇服缌麻呢?又同卷小功五月妇人为夫家服中也有"为夫之昆弟妻姒娣是,亦妯娌"的明确记载。是妇人尚为夫之昆弟妻服小功,何以其夫反服缌麻呢?此皆不可解之处。故疑文中于此有误记。①如《开元礼》虽规定嫂叔小功报,仍低于兄弟子妇的大功服。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丧服中如有叔为嫂的正服，则嫂一定要为“叔 报”。但前义服条中特别申明“叔亡嫂不报”。义服既然不报，正服也即本服当然不报。此处要解释的是卷中妇人为夫家服大功原文“夫之昆弟 子姊妹 姑为嫡子妇”一条。此条按原文断句，或为“夫之昆弟 子 姊 姑为嫡子妇”。若是，则嫂需为叔服大功。但此前妇人为夫家期服内有：“姒娣。亦妯……夫之昆弟妻 孀孙。妇人需为夫之昆弟妻、昆弟孙乃至从父昆弟子服小功，中间却独少了从父昆弟。这里显然不能认为是有所遗落，而是故意回避。同样，下“文 妇人为夫家期降小功五月”“的 夫之昆弟之子 下殇、夫之 下殇 子女”也是只有昆弟子、女而不及昆弟。昆弟、从父昆弟既当回避，则有矛盾者惟前大功一条。考虑到大功本服条“有 兄弟子妇”，故疑妇人为夫家服大功原文“夫之昆弟 子姊妹 姑为嫡子妇”内“姊”当“为 妇”。这是书仪本身钞写之误。而原文应断“为 夫之昆弟子妇、姑为嫡子妇”，问题便迎刃而解。这样，妇人为夫之昆弟子、女无主后服期，为夫之昆弟子、女下(殇——)

注：（1）“无后主”当作“无主后”，可参见同卷齐衰期“女嫁无主后，谓无夫及孙”条。《通典》卷九九亦“有 为姑姊妹女子子无主后者服议”一章。并参P.4024录文校释。
11岁)降期服为小功(殇 上、中殇应服大功殇,参原卷关于殇服规定),为夫之昆弟子妇服大功,为夫之昆弟妻、昆弟孙、从父昆弟子服小功,级级递减,方显得顺情合理。而其中为昆弟妻、子、孙服而独不为昆弟或从昆弟服,亦才与前所说“叔亡嫂不报”原则相合。此条原则既已成立,则一般情况下,叔不为嫂服也应成立。因此,上述未排除嫂叔服“的为昆弟妇”列入服缌麻,显然是矛盾与不合理的。而如将它作为误记,P.4024写卷所反映的基本上便可以认为是嫂叔无正服而仅有义服之礼了。尽管如此,P.4024写卷关于嫂叔服给人的印象仍不无含糊不清之感,特别“是孤叔为嫂期”一项比较突出,而它是否贞观礼乃问题之关键。按据《唐会要》卷三七《服纪上》明记唐太宗谓嫂叔无服,并且魏徵、令狐德棻等与礼官议曰:《礼记》曰:‘兄弟之子,犹子也,盖引而进之也;嫂叔之无服,盖推而远之也。’《礼》:继父同居,则为之期;未尝同居,则不为服。从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为服。或曰:同爨缌麻。然则继父之徒,并非骨肉之亲,服重由乎同爨,恩轻在乎异居。故知制服虽系于名,盖亦缘恩之厚薄也。或有常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劳鞫养,情若所生,分饥共寒,契阔偕老,譬同居之继父,方他人之同炊,情义之深浅,宁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爱之同于骨肉;及其死也,则曰推而远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推而远之为是,则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为是,则不可死而同行路。重其生而轻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终,称情立文,其义安在!这里魏徵等所论虽为古礼,却特别‘将’劬劳鞫养”、“分饥共寒”之嫂
与同居之继父、同炊之舅母姨夫相对比，论述生爱同骨肉，死推而远之的不合情理，说明对嫂不如继父等，也表明当时并无义服之制。否则，如贞观礼已有明文，何以专论长嫂对小叔之劬养，又何以言报嫂不如继父，甚至不如舅母姨夫呢?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孤叔为嫂期”者，不在贞观十一年所制定的礼文之内，当然，它也不在魏徵等所述《礼记》、《仪礼》等古礼之内。“孤叔为嫂期”既非周制古礼，又不属贞观十一年新礼，那么，它究竟源于何处，又究属何礼呢？

按据《通典》卷九二“叙嫂叔服”沿革引魏太尉蒋济《万机论》，以“为嫂叔无服误据小功章”，因《礼记·小功章》“有娣姒妇”之文，蒋济认为古者本为嫂叔服的省文互体，言弟并及嫂矣。娣姒者，兄弟之妻相名也。盖云夫之昆弟，昆弟之妻相与，皆小功者，但却被汉儒误以为是嫂叔无服。此为尚书何晏、太常夏侯泰驳难，而中领军曹羲复申蒋济议，以为敌体可服，不必尊卑，缘情制体，不必同族，何独不可缘亲而服嫂！可知关于嫂叔服争议魏晋以来早已有之。特别是晋袁准《正论》称，或人云嫂亲者也，长嫂少弟有生长之恩而云无服者，近非古也，殆秦燔诗书之所失也；及晋太常成粲所云嫂叔应有服，作传者横曰无服，蒋济引‘娣姒妇’，证非其义。论云《丧服》云，兄弟服妻降一等，则专服夫之兄弟，固已明矣。尊卑之服相侔，服无不报，由此论之，嫂叔大功可得而从等议论，更为嫂叔服提供了依据。

因此，尽管嫂叔服的改革未见魏晋南北朝朝廷正礼，但民间私下实行确属有之，特别是“报长嫂少弟有生长之恩”的“孤叔为嫂期”尤有形迹可寻。《晋书》卷三二《后妃下·康献褚皇后》记孝武帝
为从嫂褚皇后服齐衰期，亦因其冲年褚后曾临朝称制。又太学博士徐藻议以为：‘资父事君而敬同。又礼云‘其夫属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则夫属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以齐衰，母之义也。’可见当时兄父嫂母是通得过的。此外，笔者曾在王羲之《杂帖》中发现一件关于嫂亡忌日的感伤书信（按此信与前复书章中所示悼亡信亡主当为一人）。内有‘六月二十七日，羲之报：周嫂弃背，再周忌日，大服终此晦。感摧伤悼，兼情切剧，不能自。’本书前揭有胜语关单复书的章节中已说明，周嫂‘期嫂’即‘期嫂’，当为唐人避讳所改。呼为期嫂，很可能是从兄服而呼，但更可能是视长嫂如母，故为之服期的称（呼所谓‘大服终此晦者’）。无论如何，从信的称呼到语气内容，都说明不是为‘嫂无服’。又《旧唐书》卷二七《礼仪志》记贞观改礼魏徵等议复曰：

且事嫂见称，载籍非一。郑仲虞则恩礼甚笃，颜弘都则竭诚致感，马援则见之必冠，孔伋则哭之为位。此并躬践教义，仁深孝友，察其所尚之旨，岂非先觉者欤？但于其时，上无哲王，礼非下之所议，遂使深情郁乎千载，至理藏于万古，其来久矣，岂不惜哉！

可见嫂叔服在民间早有基础，而魏晋以来此尤为士族所接受。论者曾谓此与其时士大夫礼玄合流、缘情制礼的思想取向有关，说明这种并不合于古礼及朝廷礼制的丧服制是长期存在于士庶社会的。

①《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二》《全晋文》卷二三，中华书局，第1589—1590页。
②余英时《名敦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缘情制礼》，载氏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7—435页。
或者也正是这一点可以使我们全面了解书仪礼的来源。书仪不是朝廷正式礼书，所以，除了适时记述相沿古制及朝廷礼令外，也会有一些民间俗礼存在。特别是唐前期吉凶书仪的作者往往是世家大族，其作品很难不受士族风习的影响。从上述分析看，P.402“孤叔为嫂期”一条便很像是沿续魏晋俗礼而在贞观正式定礼之前的士族家礼。

更应当提出的还有本卷书仪所反映的母服问题。其“齐衰三年”条下有:
父没嫡母、庶母、所后母、慈母、继母。
“齐衰杖期”条有:
父在为子(出按“为子出”似当作“子为出母”)、父卒母嫁、父在为继母、父卒继母嫁、父在继母嫁无服、父在为庶母、为人后为本父母，父在为慈母、庶母出嫁。

以上关于母服的集中和诸多条例，反映了书仪作者对母服的重视。但这类母服在《仪礼·丧服》并不都有明确规定。所以魏晋以致南朝，涉及“诸母”的争议最多，特别是庶母问题。庶母有庶生母和非生母之分，即以庶生母而言，《仪礼·丧服》惟“有为父后者为母(缌麻)”和“庶子在父之室，则为其母不禫(“不禫”即不为服期)的模糊说法，但后世发明其意，认为应同嫡子。如《通典》卷九四《士为所生母服议》引晋司徒答解遂问曰“士之妾子服其母，与凡人同。”但这只是士礼。同卷引徐邈答谢静云“汉魏以来，通用士礼，庶子父在，为所生(周期)，心丧三年。如诸侯大夫之子乃厌降，而近代所不行。”所“谓诸侯大夫之子乃厌降”，说的是《仪礼·丧服》按照西周分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84

封制等级规定“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为母妻”大功九月”和“大夫以上为庶母无服”等。对以上礼则,汉儒戴德、郑玄等均有不同。这些不同的解释说法加上《仪礼》另有“慈母如母”等制，使得后世实行起来往往各取所需，临事而定，特别是对王侯公卿的母服造成困扰。如晋朝太元中太常车胤曾两次上言提到“自顷开国公侯,至于卿士,庶子为后者,服其庶母,同之于嫡,违礼犯制”的问题。直到刘宋元嘉中,才因南平王铄所生母吴淑仪薨,有司奏以“比世诸侯咸用士礼,五服之内,悉皆成服,于其所生,反不得遂”,于是皇。这说明庶生母服制已逐渐统一子得“皆申母服”。“父在服期、父死三年”的士礼”。唐代贞观礼和开元礼的制定,都未言及庶生母的改制,说明这些礼制的统一问题在唐以前已基本解决。同样还有诸如慈母、出母、所后母等问题也是如此。此件书仪如此重视和详细说明母服,似乎也能够反映对于魏晋南朝以来风习的吸收。

如果以上推测成立，那么如“上孤叔对嫂期”和其他书仪中关于嫂叔服的一些模糊记载，便应当看作是贞观十一年以前的东西。这样，此卷的年代即应较早。支持这一点的还有卷中关于殇服的规定，其言长、中、下殇及无服之殇曰：右并从期服降为大功，长殇九月，中殇七月，下殇七月，下殇五月，已下节级降之。若齐衰之殇，中从上，大功之殇亦中从(大 上)，小功之殇中从下。妻夫之亲服大功之殇中从下，小

①参见《通典》卷八一《天子诸侯之庶昆弟及庶子为母服议》，卷八二《诸王出后降本父母及所生母服议》，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204页、2228—2230页。

②《晋书》卷二○《礼志中》，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28—629页。

③《宋书》卷一五《礼志二》，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01页。
功之殇亦中从下。按此中所记来源应是古礼，"除 下殇七月"恐为误记，余皆可见于《通典》卷一《五服年月降杀之四·大功殇服九月七月》所记古周制。唐制于此不过简单承袭，此也可见于《大唐开元礼》之规定。这一点同样说明，书仪受古礼影响，保存古礼较多，这也应是贞观中期以前的情况。另外，结合本卷中"为服□□□养及为婚为立祀之恩"的"婚"字，已写"作"婚"而不"是"，但"世叔父母"的"世"字并未作缺笔或婿改字，证"明"世民"二字在避与不避之间，且不违"反"二名不偏讳"的原则，此卷的年代或即在贞观，也与上面的推论不相矛盾。又从P.4024卷"中丧服仪（第十八）"、服衣仪（弟）第十九"的子目，可以推测它是一件较正规的吉凶书仪。周一良先生曾提到《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载有裴矩、虞世男按旧志亦言裴矩撰《大唐书仪》十卷，并据《旧唐书·裴矩传》记裴矩与虞世男合撰《吉凶书仪》，参按故实，甚合礼度"，推测裴矩书仪不仅有书札，而且包括礼仪法度。周先生的这一推测，或者恰可以证P.4024写卷与裴矩书仪应有的某些内容十分接近。又从传中得知，裴、虞作书仪在武德初，其所反映之礼仪应当是"朝廷草创，未遑制作"的"隋代旧制"和当时风习，而这与P.4024写卷的内容也比较相合。因此若假定它就是裴矩书仪在贞观中的一个抄本，不是很
有可能。当然这仅是推断,但关于P.4024书仪礼的年代确定为贞观十一年以前应问题不大。下面我们再来探讨S.1725写卷及礼仪的年代问题。

2. S.1725写卷中的两种礼仪

S.1725写本书仪所反映的丧服仪制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面部分仍是按五服轻重分类排列,依次为斩衰服第一、齐衰期三月等)服第二、大功服第三、小功五月第四、缌麻三月第五。由于齐衰三年并入斩衰,"故服第二"未加齐衰字样。后面部分仍以类分述五服服属对象,不同的是冠"以礼及令"的标题,表述一种服制,都附以假宁令关于给假日数的规定,此即姜伯勤先生所"说其文杂以式令"。在此前后两部分之间,又有丧服衣制物事,哭拜吊丧仪式规格等内容插入。两部分叙丧服制似有一定重复。但前后对照,却发现颇多异同。这里先分析前面部分的丧服仪制。

S.1725前部丧服叙制大体同于P.4024卷。其五服每种之类,虽数量、内容互有参差,但总的来看,贞观十四年改礼的几则均没有反映在内。"如服第二"中"有孙为高祖曾祖齐衰期三月",说明曾孙仍为曾祖服三月而不是五月。又如大功正服内有"为嫡夫大功九月"。"嫡夫"何谓?或认为应是姑夫之误,但姑夫服制,不见于礼则。其实这"个嫡"字不误,惟"将夫"改作"妇",方才得其正解,而由此知舅(姑公婆)为妇仍服大功九月而不是期。

舅服与嫂服在此部分均无涉。缌麻三月服有"为外舅三月缌麻报"。论者或认为即是舅甥三月报的反映。然此条下尚有"为女夫三月缌麻报",将此两者与P.4024对照,发现与其"中妇父《礼记》谓之母、外舅姑女婿"两条恰相符合。按据《尔雅·释亲》"妻之父为外
《礼记·坊记》也称：'昏礼，婿亲迎，见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故此处舅实指妻父，而非言舅服。据本卷小功服内"有 为从母小功五月"条，从母即姨。言姨而不言舅，似对舅服有意回避或不作严格规定。但以上说明，这部分礼条至少尚未修改。

S.1725前部与P.4024的一点不同是关于殇服的处理。该卷是将殇服分散并入各类服中。由于殇服属降服而非正服，所以一般大功殇在大功正服之上，小功殇在小功正服之上。S.1725便因此将大功殇列入期服下，而将小功殇列入大功下。这样便出现了期服二十种之中，亦包含有大功殇的情况，"如 男女不问嫡庶，长殇中[殇]皆为服大功九月"。同样，大功服十三种中也出现了七种小功殇服。值得注意的是，此七种中，六种皆为小功五月，"惟 继他人后者为本生兄弟长殇中殇小功七月"，而下"文 小功五月第四"中也出现了"为从父姊妹出嫁小功七月"条。唐制小功正服殇服均无七月之制，故赵和平认为"七"乃五之误。但联系P.4024卷关于殇服七月的规定，则或者为唐人对古制的误记或错误模仿，其出现亦非偶然。

S.1725前部还有一些P.4024所没有的内容。如"斩衰第一"有 诸侯为天子斩衰三年"，"服第二"中"有 族人为宗子齐衰三月、庶人为天子、国官（为）国君并齐衰三月"。此四种并非属内外族服制，其渊源是古礼的规定《。仪礼·丧服》原"有 诸侯为天子"、臣为君"、公士大夫众臣为君"斩衰三年，"和 丈夫、妇人为宗子"、庶人"为天子"、国官（为）国君"的依据。但是后者显然经过了汉魏以降对古礼的改造《。通典》卷八八记晋《丧葬令》："王及郡公侯之国
者薨，其丞尉，皆服斩衰，居倚庐”，但国相官属长史及内史下令长。

同时规定“葬讫服除”，这是国官为国君服丧的明证。此条在《开元礼》斩衰三年义服中仍有保留，亦注“明布带绳履，既葬除之”，与此卷“齐衰三月”固不甚同，但更可以证明魏晋分封制实行后属吏对国君服属关系的延续。至于庶人为天子，汉魏至唐诸多更变，但古礼与唐以前制度杂糅的影响是明显的。

S.1725前部礼虽无嫂叔服，但也有个别条目与唐礼及古制均不相符。如斩衰第一有“妇为姑翁齐衰三年”。按妇为姑翁即舅姑服齐衰期在古礼有明确规定，唐礼亦相沿未改。且据史料记载，妇为舅姑服三年是在五代后唐至宋才正式入礼。但竟于此卷出现，说明民间早已自行其是。

又如服第二“中孙为祖父母齐衰期”下注云“祖（父）母为嫡孙服大功，庶孙服则小功”。按据《通典》记古周制及《开元礼》，祖父母为嫡孙均服（期），为庶孙服大功，历代秉承此，也未闻曾有改。同作卷下边礼及令部分，嫡孙亦在“右准令齐衰期给假卅日”之内，而庶孙与本生兄弟、本生姑姊妹在室者一起，明属大功。故此条显而易见与“上妇为姑翁齐衰三年”均为书仪采自民间的俗礼。

除此个别内容外，总的来看，S.1725前半部所反映的礼还是古礼和贞观改制以前的礼，特别是曾祖服入齐衰三月、嫡妇人大功及对殇服的处理原则等，与P.4024基本相同。尽管众子妇、舅甥服无涉，但从上述内容仍可断定其服制应在贞观十四年改礼之前。

①见《通典》卷九○、九一《五服年月降杀》,标点本2465、2491页《;大唐开元礼》卷一三二,民族出版社影印本,第622—623页。
由于其中还兼杂古礼，或者根本就是贞观十一年唐朝正式定礼前
后民间今古礼杂行的情况。其所反映的礼，年代应与P.4024相差
不多。

但是S.1725的“礼及令”部分便与前部有明显差异了。这部
分丧服礼的服制与假宁令的规定同时并列，相辅相成。从一个方
面看，礼的内容像是为令的规定作注解；不过总的看，“礼及令”似
都是与前部之丧服制作对比，或为之作补充。这个补充的丧服制
与前部相比异同颇多。但如就以上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加以比
较，可发现它在某些方面尚未违背贞观十四年以前礼的原则。

其一“如 继父同居”条，入“右准令齐衰期给假卅日”之内，下
“文 右准令齐衰三月”又“有 继母不同居”条。按此条“与 齐衰期”第
一“条 继母改嫁”显相矛盾。因改嫁者尚服齐衰期，何以不同居便
服三月？故此处云“母”为“父”之误。继父同居服期，不同居服齐
衰三月，与《仪礼·丧服》规定相符。按此条在S.1725前部分服制
中未能反映，但很可能是遗落而非取消。魏徵等改礼奏议明确提
到其时有继父同居服，故此条显为唐礼吸收古礼的内容。

其二是嫡子妇与众子妇。嫡妇“在 右准令齐衰三月、五月、大
功九月并给假廿日”内，但排列在较后位置，“与 本生姑姊妹在室
者”、“同堂兄弟”等为先后，故知其服为大功无疑，而众子妇则明入
小功。

其三，嫂叔无文，与同卷前部丧服制同。

其四，殇服仍并入各类正服中，只是大功殇列入大功，小功殇
列入小功，与本卷前部礼微异，但与《开元礼》的列入方式基本一
致。

但是以下几条“礼与令”却与本卷前部及P.4024规定明显不
一、“是右准令齐衰三月、五月、大功九月给假廿日”内已明确增加“齐衰五月”内容。按此条排列“有高祖、曾祖父母、女在室及嫁为高祖、曾祖父母”等“齐衰五月”乃贞观十四年为曾祖父母专设，该条已反映了此内容。

二是舅服同姨。在小功五月中“有亲姨亲舅”文，然下之缌麻服中，亦“有舅、舅之子”文，是舅服小功与缌麻两存之。“但两姨兄缌麻亦麻，则似乎舅为甥报弟姊妹、外生皆在缌未改变。”

三是凡古礼有而唐礼没（有“如诸侯为天子”之类）的内容已全部取消，亦“如孤叔为嫂期”、“妇为姑翁齐衰无民间所流行之俗（礼三年”之类）。

综上可见“礼及令”中的礼已是完全规范的唐礼范畴。但是据上述同异分析，由于有嫡子妇大功、众子妇小功，又有继父同居期而无嫂叔服，是此礼中尚有一部分是贞观十一年礼的内容；但齐衰五月、舅服同姨的出现又是贞观十四年所增加或改变的礼则，这说明以上礼文不会早于贞观十四年。

礼文既不早于贞观十四年，而看得出对贞观礼有所修改，那么，会不会是高宗朝重新制订的显庆礼呢？上面已提到《唐会要》卷三七记显庆元（年656）九月，礼官长孙无忌要求“将舅报于甥，服犹缌麻”改“为舅报甥亦小功”，并“因庶母古礼缌麻，新礼无服”而提出“今请依典故为服缌麻”，均得到批准，故应于显庆礼有所表现。但前者已知卷中并无修改，而后者据长孙无忌所言“庶母之子，即是已之昆季，昆季为之杖期，而已与之无服”，是为非生母的庶母行服“。士为庶母缌，以名服也”，本是《仪礼·丧服》的规定。从本卷看，其前部有“妾子立为后者，为本生父母缌麻，亦缌麻三月”
“礼及令”既非完全是贞观十四年改礼，又不像是显庆礼，其究属何礼呢？

笔者认为，“礼及令”文实际上反映了贞观改礼后，丧服礼制尚不十分确定的情况。按据前述贞观十一年以前，唐朝所行为隋礼。贞观十一年制礼，基本精神仍因其旧。最多只是取消一些唐朝认为已不合用的古制，以将礼制规范化、整齐化。至贞观十四年，才明令提出修改曾祖服和嫡子妇、众子妇、舅服，增加嫂叔服等，开始从具体礼条和精神原则上对原来的礼制加以改革。这些修改后的礼文，固然会以敕令的形式发表，但是前后敕令的不一致就可能造成社会上遵从和使用礼仪方面的混乱，从而有着礼并古礼、今行的情况。诸如上述礼文中提到的舅服缌麻、小功两存即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而这种古今礼兼行并用的混乱情况实际不仅贞观朝及高宗即位初有之，即显庆礼颁布后也仍然存在。前已指出因朝野对显庆礼的不满，导致上元、仪凤中“或依贞观年礼为定”，“或依周礼行事”以致礼司用礼毫无准凭的情况。其势必造成民间传布礼令更加自行其是的结果。S.1725“礼及令”吸收贞观十四年改制的一些礼则，却又取消嫂叔服并保存一些古制，是与这一段的情

①参见第七章第一节《古礼与家法相结合的吉凶书仪制作背景》，并参《唐会要》卷三七《五礼篇目》永徽二年条。国学基本丛书本，第670页。
况相符合的。结合卷中避讳，不仅“民”字未现而“婚”字皆改同，且P.4024卷中“世叔父母”，本卷皆作“伯叔父母”，复“”，其改字及二名偏讳的情况同霜葉”之“葉”字也已改“作皆符合高宗显庆以后制度。考虑到避讳也可能由后人抄卷所改的情况，我们将此卷定在贞观后期至高宗朝更稳妥一些。它的撰成时代显然晚于P.4024。

对于卷子年代的确定，仍只是一推测。但仅就内容而言，则如将P.4024和S.1725前部的礼称作是贞观十一年定礼以前不甚规范“的贞观前（含俗礼因素较多），而“礼及令”称作是改制后礼的贞观后礼”似乎比较恰切”。贞观后礼”广义上也是贞观礼，从贞观前礼到贞观礼再到贞观后礼，P.4024和S.1725两卷为唐初丧服礼仪的变化提供了真实的依据。

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篇》曾总结隋唐之礼的继承关系，指出“唐高祖时因全袭隋礼，太宗时制定之显庆礼，亦不能脱此范围，玄宗时制定之开元礼，乃折中贞观、显庆二礼者，故亦间接袭用隋礼也”，这本是事实。从P.4024和S.1725所反映的“贞观前礼”来看，它吸收上古礼的成分较多，关于士庶礼则尚无很确定的变化，可能即是隋礼的风貌。而其礼则亦显然多为贞观礼所继承。但书仪本身也反映“了嫂叔服”一类魏晋以来民间改礼的影响，它们应是贞观十四年改制之部分依据。至于从书仪所见之“贞观后礼”，也并非完全反映改制内容，而是似乎在旧制与新礼间依违徘徊。这说明当时在是否全行新礼问题上仍是不确定和存在阻力的，并从史料得知，显庆礼颁布后，矛盾也似乎更突出且贯彻更不彻底，不顺利，某些贞观以来所改礼则据史料记载也始终处于论争之中。此后，制度的变更因帝王的旨令而扩（大如武则天提出
尽管如此，贞观礼毕竟是唐朝初步建立的一代礼典。《书仪》所反映的礼的变化，也说明礼的新原则正在步步向全社会推广，它预示着中古礼仪的变革必将继续下去，并将向着纵深的方面发展。

（二）关于服衣制度的一些问题

丧服衣制配合五服制度形成，根据不同等级确定丧服形制式样、质地面料、缝制精粗等。对此《仪礼·丧服传》有详细解说，唐代略同古礼。《通典》卷八七《五服成服及变除附》载周制丧服并称：“大唐之制，杖绖升缕皆约周礼，直书其仪，历代通儒皆有著述，开元之制最为详备。”此外按照丧制规定，三年服要服够二十七个月，中经小祥、大祥、禫祭而服除。周年丧实际也有祥、禫诸节。因此衣服制度不仅有始丧成服，也有随着祥禫祭祀时间推移，丧服逐渐减轻、直至全除的问题，此即《通典》所“说变除”之法。
为斩衰裳三升布，升之有缨冠辟续。苴麻为绖，外子曰苴。首绖围九寸，左本在下。左本者从外来而首在腰围七寸二分，左绞垂至膝，两结相去四寸。绞麻为左。以代带。革带。四股绖皆左，围五绳。父苴竹为杖，围寸，结偶于前，父是阳，竹节生于外，圆七寸二分，长象于天，故与父以竹为杖菅履外纳。心齐，本在下，查《通典》卷八七《五服成服及变除》载古制：周制，丧服斩衰裳，苴麻、杖、绞带、冠绳缨、菅履者，谓既殡音厄。成服，斩衰裳三升，（苴？）绖大搹九寸，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为腰绖，大七寸二分，绞垂两结间，相去四寸。竹杖大如腰绖，长齐心，本在下。绞带大五寸七分半，偶结于前，皆三重四股故之。三重。冠六升音，外纳其余外也，条属右缝，菅履外纳。必。按《通典》此据《仪礼·丧服传》。与书仪所载丧服相比，除绞带围尺寸略有不同，几乎完全一样。其他丧服与古制比较也只有用布粗（细“升”代表用布粗细，一升八十缕，升少者布粗，升多者布细）和尺寸的少许差异。‘如服衣仪’‘中小祥除首绖，练八升布为冠’，则古制为七升布。齐（衰三年）裳四升布，冠七升布，古制则裳四升，冠六升。形制的相似说‘明服衣仪’与古制变化不大。这个‘服衣仪’如用在唐初其来源应是隋制，惟有疑者是期服‘的祥练’问题。查《隋书》卷四九《牛弘传》言：以比较，可以看出所‘载杖绖升缕’的形制方面确同古制。如斩衰‘服服衣仪’男子之服：冠六升，右缝，通阙（屈？）绳为武，垂弘以三年之丧，祥禫俱有降杀，期服十一月而练者，无所
象法，以闻于高祖，高祖纳焉。下诏除期练之礼，自弘始也。练即小祥所服练冠，也因此小祥之祭被称为练祭。古礼服三年丧者祥祭或练祭当于死者丧周年后举行，规定“十三月练冠”。服期年丧者丧期仅为一年，故练祭便定为十一个月举行。《礼记·杂记下》：期之丧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通典》卷八七《小祥变》在周制三年丧的小祥后也指出：又云：（周期）之丧，十一月而练，自诸侯达诸士。可见杜佑也认为是周礼。汉魏以来多行此制。但牛弘大概认为它与三年丧相比有些不伦不类，所谓“无所象法”，故奏明隋文帝下令除之，是隋始除期练之礼。本《服衣仪》在齐（衰三年）下尚有小祥除首绖，练九升布为冠，缨武亦如之。妇人除腰□绖，右祥禫变与斩衰同的規定。但齐衰杖期衰五升布在叙丧（服缺十余字）后，仅“有右绖杖祥禫（与）三年同，逾月复平常”的含糊说法。祥禫者也可理解为大祥与禫祭，是否包括期练不甚明确。不过期练毕竟是古制。《开元礼》卷一三二在齐衰服下注明：（齐衰）杖周者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逾月除，复常，禫变节皆与斩祥衰同。其十一月小祥等制与《礼记·杂记下》全同，说明唐礼在期练问题上又恢复了古制。开元礼来自显庆礼、贞观礼，那么这一古制是否在贞观礼已恢复或名义上恢复了呢？抑或唐初即仍行古制，此卷尚莫能明。然杜佑既谓“大唐之制，杖绖升缕皆约周礼”，则唐礼在衣制方面尽复古礼也是可能的，惟时间问题尚待考证。除了此点之外，隋唐服衣仪恐区别不大。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96
升。齐衰服头绖七寸二分，(要 腰)绖六寸二分，冠七升，衰四升。大功九月服，头绖五寸二分，冠十五升，衰十五升。此衰服制度记在书仪的前半部，恐也属隋及唐初之制。其中除斩衰服头绖九寸三分比P.4024规定的九寸略大，余皆同。齐衰腰绖六寸二分未见P.4024记载，但冠七升、衰四升亦同。惟大功服差异较大。其用布十五升粗细程度已接近常服(斩衰三年二十五月大祥即服十五升布为衣)，且据古礼及开元礼，大功正服皆为衰裳八。用十五升布是不可能的，因此推测此中有误记。而将两卷服衣制与《开元礼》比较，发现接近处亦极多，如斩衰头绖、小祥练冠用布、齐衰三年冠、裳等。因此唐丧服衣制总体而言大约还是承继隋制和古礼，并无特别发明。

唐前期书仪虽然基本依从古制，但具体操作显然并不甚严格，从上述P.4024和S.1725两件书仪所记丧衣尺寸已可见出此点。尺寸的差异除了制度变化的因素外，某些时候还有时人的笔误和对制度不了解的问题。结合下面所要谈到的P.2967卷杜佑丧礼图可以知道，事实上在开元礼制定的前后，唐人在丧服衣制上常常已经是既不懂、亦不全然按照古礼办事了。对照大中P.2622张敖《新集吉凶书仪》卷下可以知道，到了后来，唐人在书仪中基本是以世俗常见之物来说明丧礼服饰，取代古丧服艰涩难懂的内容。例如P.2622在父母初丧后的吊礼下记载：

朝有哭，如有宾吊，即于堂中换衰绖著纱帽子，出堂受慰……从亡后来年死日，谓之小祥，即预造布衣换之，衫袴一切

①参见《大唐开元礼》卷一三二，民族出版社影印本，第624页《通典》卷八七《五服成服及变除附》，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393页。
稍轻初丧……内外皆哭,别人与换衣服,号哭尽哀……从亡后廿五月月尽是也,预造禫衣服。其衫以布,幞头帽子,及粗？一切衣？并深灰,白皮濑鞋腰带？三绔（龆）……设祭讫,别人与换衣服讫,内外止哭,再拜……六十日满,即脱禫衣服,着幞头,蓝铁腰带,至月中则任着寻白襴衫,黑常吉衣服,是为礼制中也。上面的记载是斩衰三年从初丧到终丧之间的服制。唐制规定的三年丧制在以郑氏中原书仪为本源的张敖书仪中并无变化。但根据古礼规定,服丧各个时期特别是祥、禫变除之际的衣制最不易掌握,所以书仪在这方面十分细致。纱帽、幞子、布衣和粗头、白皮濑鞋、白衬衫、黑幞头、蓝铁腰带等,都是唐人习见习用之物,衣服的颜色质地也很具体。从用料质地和颜色来看,唐人重丧小祥以后,丧服便逐渐接近常服,其中幞头、衫均为唐士庶比较普通的穿戴。《新集书仪》引《新定唐家礼凶吊仪》叙云:“夫吊孝之礼并是衫麻鞋《。《丧礼》曰:白袍麻靴非吊孝之礼也《。《论语》云:羔裘玄冠,故不合吊也。说明吊孝亦不可穿袍着靴及皮裘大冠等富贵华丽之服,而用衫麻鞋朴素者代之。銙是腰带间的饰物,即銙扣一类。腰带的质地“、銙“的数目标志身份的等级高低,按制度规定蓝铁腰带晚唐是庶人或无品小吏之服,銙则庶人常服数目为七。由于即使是官员,父母之丧也要去官行服,所
无论士庶当此际没有区别。而腰带的銙数甚至低于庶人常服的一半,也可以见出古礼父母死丧孝子当自我贬损之意。濑鞋未,但粗絁明显为质料较差的丝织品,加之仍多用黑白见记载色,表明即使恢复常服,哀思仍须不断减轻,这是符合古礼精神的。总之,按照张敖书仪或者说实际上是郑余庆书仪所规定的丧服,已经是与唐人日常生活贴近,能为一般人所理解和接受的丧服制度了。这与P.4024和S.1725只记丧衣古制已有很大不同。这部分与丧礼和吊祭的内容一起,在郑氏书仪中恐怕应属“于凶礼仪注”。不过郑氏书仪除了有这些迎合或反映现实的俗礼,还“有衰服制度”“、丧服制度”等反映古制或朝廷礼令的内容,表明元和时的大臣和大族礼家人士对于礼俗是兼而顾之的,他们仍试图使两者取得协调,并以古礼指导现实。但是到了张敖书仪则基本仅取与现实相关“的仪注”,说明当时的唐社会,特别是地方上礼仪更趋于实用化,古礼或开元礼的古典性质对于一般人民是不合用了。这一点,通儒必须了解。既然如此,贞元、元和的礼学大家们又是如何对待古礼和开元礼的基本内容,并将之与现实相结合的呢?读了配合《通典》制作的P.2967卷杜佑《丧礼图》及其说明文字,我们对此便会有另一方面的了解。此“处濑”疑“通禷,。“注”:师出征伐,禷于上帝。姑存疑。
父君、嫡孙为祖、嫡孙为曾祖、嫡孙为高祖、所继父为长子、
妾为君、女在室为父、女嫁反在室为父。[2]

父没嫡母、庶母、所后母、慈母、继母、祖没嫡孙为祖母、嫡孙为曾祖母、
嫡孙为高祖母、母 [3]。为长子、妾为女君之长子、出(嫡 适)女为父母
父卒母嫁、父在父在为子出[4] 为继母、父卒继母嫁、
父在为庶母、为人后为本父母、父在为慈母、
父在继母嫁无服、
庶母出嫁。

祖父母、祖母出嫁无服。庶祖母、昆弟(子 子衍》、昆弟子、嫡孙、在室姑、在室姊妹、
在室昆弟子[5]、女嫁无主后,谓无夫及子孙。嫡曾孙、嫡玄孙、姑姊妹无主后、夫为妻。[106]
高祖舅姑、曾祖舅姑、已上谓承嫡妇。舅姑、夫之昆之子、夫之昆弟之女无后(主 主后[)6]
夫之[在]室昆弟女[7]、夫之在室女嫁及在堂、庶子妇为庶姑、札谓之皇姑。妾为女君。

从父昆弟、同堂兄弟、祖为众孙、出适姑、出适姊妹、出适女、在(堂 室)从父姊妹[10]
、出适兄弟女、在(堂 室)孙女、兄弟子妇[11]、同母异[父]兄弟、为人后者为在堂

(三)附:S.1725和P.4024写本书仪丧服部分
文及校释
1 录文
P.4024:
6丧服仪 [第十八?]
7斩衰三年①
8齐衰三年
9齐 衰 杖 期 心 丧 三 [年]
10齐 衰 期
出嫁不降,
11右是本服。
12 右妇人为夫家期服。
13继父同居期、 孤叔为嫂期,
14右 [8]。
（三 二 ）条义服
众孙之服同
6齐衰三
孙女,虽出月高
不敢降。 众孙之服同
祖父母 曾祖父、
孙女,虽出不敢降。
曾同居
继父同居。者。
18大 功 九 月

P.4 024原“文 衰”皆“作 缞”,为与全书其他部分统一,此处录文皆改“作 衰”,以
下《 开元礼》《、 通典》同此。
舅姑为妇。室姑姊妹降，无父母、祖父母、从祖父母、堂伯叔兄弟、从堂伯叔兄弟、表堂兄弟、从表堂兄弟、表兄弟、从表兄弟、子、孙、曾孙、玄孙、嫡孙、出(嫡适)父姊妹、同堂姊妹、出(嫡适)孙女众子妇、嫡孙妇、嫡子妇。
从父昆弟、兄同堂兄弟、侄(孙)昆弟妇出(嫡)从妇。18祖众孙女、从孙妇、父母同堂姑姊妹。、出(嫡适)姊妹母兄弟女之之,男女。3外甥5从孙女男女、孙女、舅外孙兄弟男女、外男女。36内兄弟姊妹,父女婿、母外舅子。从母兄弟姊妹、子。《礼记》姨之舅之谓之内兄弟姊妹、妇父女。20始死及灵筳祭奠并与成人同,唯不复魄及(喻?\[21\])。丧事3,不并神主。即虞而除灵坐。三岁已下数以瓦棺,葬于办而葬园而无奠事[22]。41凡十九至十六为长殇,十五至十二为中殇,十一至八岁为下殇,七岁已下为无服之殇。2343右并从期服降为大功,长殇九月,中殇七月,下殇七月,已下节级降之。右齐衰之殇,中从上;大功之殇,亦中从大(上);小功之殇中从下。妻夫之亲服大功之殇,中从下,小功之殇亦中从下。47叔父、姑姊妹、兄弟、女子、弟子,48右期长殇服为大功九月,中殇七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长女
殇。

长中
嫡曾孙
殇。

长中
殇。

长殇 长、
中殇。

26
长殇
长殇、
中殇。

长
中殇。

52
t父
中殇。

53
之
gu女子出嫡(適)为本亲殇小功五月。

54
gu夫之昆弟之子、
夫之昆弟之女、

55
妇人为夫家期降下殇小功五月。

56
gu长
gu中殇、
中殇、
gu长

57
孙
父
gu从父、昆弟、
下殇。

58
gu
殇。
中殇、

59
殇。
下殇
gu从父姊妹、
从母、

60
昆
下殇。

61
昆
下殇。

62
昆
下殇。

63
叔父
下殇。

64
右
女子出嫡(适)降本亲缌麻三月。

65
服衣仪(弟 第)十九
八十

服衣裳三升布,
为升。

66
武,垂缨冠

67
辟

子曰

。外

。苴麻为绖

苴。
左本者，从外面首在左下。

68腰绖围七寸二分，左绞垂至膝，两结相去四寸。绞麻为四股，围五寸69带，结偶于前，绖皆左绳。父苴革带。竹为杖，围七寸二分，长与心齐，象于天，故父以竹为杖。菅履外纳本在下，妇人之绖71连裳，不杖，无绳带竹竿，其绖带及履如男子。三月虞祭变练，衰裳改绖；小祥除首绖，练八升布为冠缨武亦如之；妇人同去首绖；大祥除衰裳去绖杖，十五升布为衣，缟冠，素缨，革带。妇人除衰裳，去绖，衣履如男子。禫服375如平裳4。齐衰裳四升布，冠七升布，右缝，布缨武冠，内牡麻绖带。首绖围七寸，右本在下，绳缨五分，首绖去一分以为腰绖，围五寸。母以桐为杖，大如腰绖，通圆之长与心齐，本桐是阴在下。节生于内，故母78小祥除首绖，练九升布为以桐为杖。冠，缨（武亦）如之，妇人除腰绖，右祥禫变除与斩衰同。齐衰杖期衰五升布，右绖杖祥禫[与]三年同，逾月复平裳，
麻带绳去浮垢，不绝其本。下殇同。

事其

斩衰三年，服廿五月大祥。褅月。
期十三月大功长殇。

不杖期十三月正月。大功服九月，九月。中殇七月，下殇入五月。小功五月衰裳断本为绖带，首绖围七升半，有藻麻断本为绖带，首绖围

服制度。凡衰外削当(下残)

S.1725：(前缺)子为父斩衰三年、诸侯为天子斩衰三年、父己之长继子斩衰三年。
人后者亦服斩衰三年。妻妾为夫并斩衰三年。女出嫁在他家□所遗(遣)还。

为父母斩衰三年。妇为姑(?)翁齐衰期三年者,父死母为长子亦同齐衰三年。长子者十一岁以上子,嫡子承胤之重,是以母为三年。

父在为母齐衰期,出妻之子为「母」齐衰期。出妻之子所以迫服,母子无绝期道,是以故期。继与父在母出嫁为服齐衰期,服同。为伯叔父母齐衰期,夫为妻齐衰期,父为众祖[父]母为嫡孙服大功,庶孙服则小功。兄弟相为齐衰期,继人后者为本生父母同居者齐衰期,姑妇(姊)妹出适人无丧主者为服齐衰期,出(嫁?)以其无子,女君为故期服。应九月,妾为女君齐衰期,妾无服。女(服为?)祖父母出嫁亦齐衰服(期?),不降。族人为宗子齐衰三月,庶人为天子、国官[为]国君并齐衰三月,孙为高祖曾同居合爨者齐衰三月,孙为高祖曾祖齐衰三月,女子出嫁未出嫁者皆为曾祖齐衰同。大功殇服为未成[年]者。凡死年十九至十六已上为(上长?)殇,十五至十二为中殇,十一[至]八岁为下殇,七岁已下皆为无服之殇。
一月，哭之一日；子生一岁，哭之十二日。及至七岁，男女不问嫡庶，长殇中殇皆为服。

大功九月。唯天子无齐衰、诸侯无大功以下之服。

大功服 第三 十三种 姑姊 妹及 适人者 为服 大功 九月，从父兄弟为服大报。堂兄弟继人后者还为本生兄弟及在室姑姊是。

妹大功九月，为嫡子、孙下殇五月，兄弟姊妹下殇小功五月，为男女下殇小功五月，妇为夫之伯叔长殇小功五月，妇为侄长殇中殇小功五月。继他人后者为本生兄弟长殇中殇小功七(五?)月，为同堂兄弟姊妹长报、报。

从祖父母者，小功 七种 为从祖父母为小功五月报，祖之五月第兄弟。从从祖兄弟祖小功五月报，兄[弟]者，三从为再从兄弟小功五月报。为从父姊妹出嫁小从父姊妹者，继人后功(七五)伯叔之女。

者为本生姑姊妹适人者小功五月。外孙为外祖父母小功五月，为从母小功五月，从母姊妹缌麻三月第五十种族宗者，祖之孙为族宗祖父母缌麻三月，从母(从母衍)同堂 兄弟是[48]。
族兄弟者，为族兄弟缌麻三月，报，从叔（兄、兄弟）。
庶孙之中殇缌麻三月，为从母长殇缌麻三月，从母从兄亦如之。妾子立为后者为本生（父、庶？）从母兄弟，亦缌麻三月报。
亦如之，妻为外舅缌麻三月报，为女夫缌麻三月报。
内外兄、弟、姊、妹并相为（报、服缌麻三月报），外兄弟姊妹，内，舅之儿女；兄弟姊妹出，出姑之儿女；从母姊妹，姨之女。
嫁亦，外祖父[母]为外不降。
孙缌麻绖七寸二腰，三月。斩衰服头绖九寸三分，要（分，冠六升，衰三升，齐衰服头绖七寸二分）。要（要）绖六寸二分，冠七升，衰四升，大功九月服，头绖五寸二分，冠十五升。（下略）
礼及令             继母改嫁、父为长子、祖父母、父所生庶母、伯叔、兄弟、众子、侄儿、侄女、嫡孙、本生父母报、姑姊妹、在室女、无主姑姊谓假父、妹、伯叔母、继假子，各父同居大功已葬五日，除右准令上亲。齐衰期给假卅日。
服三日。高祖曾祖父母、女在室及嫁为高祖曾祖父母、继母（父？）不同居、子长殇中殇、姑姊妹长中殇、兄弟长中殇、嫡孙长殇中殇、侄儿侄女长中殇、女嫡（适）人者、姑（姊适）人者、姑（妹适）人者、本生兄弟、庶孙、本生姑姊妹在室者、嫡妇、同堂兄弟、同堂姊妹在室者、

大功九月并给假廿日，齐衰三月五月，葬三日，除服二日。

男女下殇、叔下殇、嫡孙下殇、姊妹弟下殇、姑姊妹下殇、本生兄弟长殇中殇、同堂兄弟姊妹长殇中殇、从祖父父祖兄

兄弟孙女在室者、同堂伯叔、<br>

孙女适人者、外祖父母、本生姑姊妹(嫡适)人者、亲姨亲舅、从祖祖姑祖姊、从祖姑姊妹在室者、父同堂姊妹

出适不降。<br>

右依令小功五月给假十五日，葬二日，除服一日。<br>

庶孙丈夫妇人下殇，再从兄弟长殇、同堂兄弟下殇、本生兄弟下殇、侄丈夫妇人下殇、同堂姊妹下殇、<br>

姨长殇、同堂兄弟子长殇、兄弟孙长殇、同堂姑长殇、再从妹长殇、<br>

本生同堂兄弟长殇、三从兄弟、三从姊妹、出无服。族曾祖父、曾祖兄弟、族(曾曾衍)祖父、祖同堂兄弟

再从伯叔、同堂姑、再从姊妹、女适人为同堂叔、外孙、
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曾祖玄孙、祖姑、祖姊妹、两姨兄弟姊妹外生、姑子、舅之子、本外（生外）祖父母、曾祖姑、曾祖祖同堂父再从姊妹、族姊妹。兄弟孙女适父再从族母、兄弟妻。曾祖兄弟妻。人者、族曾祖母、祖同堂兄族祖母、弟妻。

庶孙姊[妇]、女适人者为同堂伯叔母、庶子为嫡母之兄弟乳（女）母、女婿、妻父母，

右准令缌麻三月给假七日。出降服，给三日。

2. 校释

[1] 本录文参照缩微胶卷及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赵书已出校者不再出校，仅对明显有误及意见不同者加以说明。

[2] 女嫁反在室为父，“反”字赵书误录“及”，按此条可见《大唐开元礼》卷一三二斩衰三年正（服民、民族出版社影印洪氏公善堂本，2000年，第620页），指已嫁而返住娘家者。如录为及，则与前“之女在室为父”及“下齐衰三年”中出（嫡适）女为父母重复。


夫及子孙'条改。按此源于《仪礼·丧服》'条。传曰'无主者，谓其无祭主者也。'

'据上下文意补。'

'三条者，此中仅有两条，疑有脱文或三为二之误。'

'高祖父母'原为小字与注文不分，此处改与曾祖父同。'

'在堂从父姊妹'，堂'当作室《，仪礼·丧服》期服'有昆弟'，注云'昆，兄也；为姊妹在市室亦如之。'(《十三经注疏》第1105页)为人后者降本亲一等，故服期。开元礼》卷一三二大功服也'有为人后者为其姑姊妹在室者报。'下在堂孙女'、在堂姑姊妹'同。'

'兄弟子妇'，赵误录'为兄弟之妇'，据缩微胶片改。'

'父'字据上下文意补。'又同母异父兄弟'与'为人后者'之间，赵录文无句逗。按此两者无关，应分开。'

'夫之昆弟子(姊、妇)、姑为嫡子妇'，赵录文原断'为夫之昆弟，子、姊、姑为嫡子妇'，与礼制不合，详见正文。'

'此处赵录文'为夫之出嫡、昆弟女出众孙'，按'嫡'即'適'(适)，据上下文意改';出众孙'，疑'出'字衍。'

'子出(嫡、适)犹期不降'，'子'疑为'女'之误。'

'在室从祖母'、从祖母'无在室者，且与下'注同堂姑'不符。疑原文'母'为'姑'之误。'

'按此行原皆为小字，'但嫡孙妇'下不属注文，故改'同夫之昆弟妻'等。'

'从孙妇'为孙辈，故原'文'兄弟侄妇'当'为兄弟孙妇'之误。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9] 据同“条”族父母”注为“父之再从兄弟”，故再从兄弟之女即族女，之当为女之误。

[20] 唯不复魄及喻“喻”，原卷不清，当为喻之误。按据《大唐开元礼》卷一五“○三殇”，谓三殇之“丧灵筵、祭奠、进食、葬送、哭泣之位与成人同”，唯不复魂，无含，事办而葬，不立神主”，意与本卷（同前第722页）。又“复魄”即“复”或“复魂”，同书卷一四二释“复”曰“始死则复”。“又曰“复谓招魂复魄（第678页）是死者初死之际呼叫名字的一种招魂礼，上古时已有。《礼记·丧大记》称“复而后行死事（《十三经注疏》，第1572页）也即复礼行方举办丧事”（唅含）“也是人死后将饭米及珠玉纳其口中的一种仪式《通典》卷八四《丧制之二》称“周制：典瑞大丧供饭玉、含玉。舍人供饭米，诸侯以璧，大夫以珠，士以贝，实于笲（竹器）。米，君以粱，大夫稷，士粱，一豆实于筐（标点本第2286页）其仪式见于《礼记·杂记上》《十三经注疏》第1557页）。开元礼》卷一三八及卷一四二并记此礼，曰“含，赞者奉盘水及笲，饭用粱，含用璧，升堂……含者洗粱、璧实于笲，执以入。祝从入北面，巾先覆面，将徹枕，去楔，受笲，奠于尸东。含者坐于床东西面，凿巾，含，当口凿之纳饭含于尸口。即含，主人复位，楔齿之柶与浴巾同埋于坎（同前第656、679页）。

[21] 丧事（辦”办”），赵录作“辨”误，据《开元礼》卷一五（○第722页），参注[20]。

[22] 园“国”，赵误录“作”国”误。此处据《大唐开元礼》卷一五“○三殇”“三岁以下敛以瓦棺，葬于园，又不奠”改。按《通典》卷九一《五服年月降杀之四·大功殇服九月七月》引吴徐整问射慈答曰：“哭之无位，礼，葬下殇于园中。则无服之殇亦于园也，其哭之就园”
[23] 此条“两冠”字，第“二冠”字当“为笄”。按据《通典》卷九一《五服年月降杀之四》引周“制丈夫冠而不为殇，妇人笄而不为殇”。

[24] 此处赵和平原断“为叔父姑姊妹兄弟子”。按据《通典》卷九一《开元礼》卷一三二大功殇均有叔父、姑姊妹、昆弟诸条，应分开。“又女子”者不通，按据《通典》《开元礼》同条也均有“为子女子子之长殇中殇”，女子子即女，子女子子指子女或儿女。故疑此处本应“作子女子子”。

[25] 此处赵录文原断“为姑姊妹女子、子”不通。其第孙女殇“二子”字当移前。按《大唐开元礼》卷一三二斩衰三年“内女子子在室为父”释女子子曰：“女子子重称子者，有别于男子”。女子子即女儿意。又此处“长女殇”亦不通，疑原文误，应“作长中殇”。

[26] “为”字据上下文意补。

[27] 按“叔父昆弟”不通，据文意当“作从父兄弟”是。

[28] “通绳为武，垂缨冠辟续”，“垂”，赵书误录“为重”，“阙绳为武，垂下为缨，著之冠也”。按此可见《通典》卷八七《五服成服及变除》释斩衰服有“通屈一条绳为武，垂下为缨，著之冠也”。又《开元礼》卷一三二斩衰冠亦曰“右缝，通屈一条绳为武，垂下为缨冠”。武指冠上的结带，即郑玄所谓冠卷也，用于冠之约束（见《礼记·玉藻》注疏《十三经注疏》第1476页）。

[29] “菅履外纳”，菅履《仪礼·丧服》《通典》《开元礼》皆作菅屦，菅屦即草鞋。《仪礼·丧服》贾公彦疏：“菅屦者谓以菅草为屦。”《开元礼》卷一三二“外纳，纳其余于外”（同前第620页）。

[30] 此“句三月虞祭，变练衰裳改绖”疑有误，虞祭不得服练，
唯小祥方可服。虞祭，既葬而祭称为虞。《礼记·檀弓下》：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十三经注疏》第1302页《释名·释丧制》：既葬，还祭于殡宫曰虞。谓虞东安神，使还此也。又据古礼，士三月葬父，故曰三月虞。详《礼记·檀弓下》注疏。虞祭《通典》卷八七《既虞饯尸及后当改服。卒哭祭》谓祭礼结束，尸出大门，哭则止。……丈夫说带于庙门（外原注：既卒哭，当变麻，受以葛），妇人说首绖不说带。（标点本第2370—2371页）又同卷《五服成服及变除》云：三月而卒哭，男子受以六升布为衰裳，七升布为冠，缨带亦如之。一辟博三寸，偶结于前，藨屦内纳，葛绖。《通典》卷八七《五服成服及变除》云：十三月小祥而练，除首绖，受以七升布为缞裳，练冠素缨，中衣黄里，为领袖，缘以练带，绳屦无，其腰绖缩一股去之。标点本第2391页）据此则虞祭应变麻为葛绖，非练也。[3]练，八升布为冠”，赵录于升、布处加句逗，误。按八升非练之多少，乃布之粗细耳。服重者升少，服轻者升多，通以八十缕为一升计。小祥是父母丧事周年后的祭礼。《仪礼·士虞礼》：期而小祥。郑玄注云：小祥，祭名。祥，吉也。《十三经注疏》第1176页《通典》卷八七《五服成服及变除》云：二十五月大祥，朝服缟冠。既祥，改服十五升布深衣，领袖缘皆然。缟冠素纰，素中衣，领袖缘带皆然。去腰绖，弃杖，白麻屦无絇。《通典》卷八七《五服成服及变除》与此处略同。[3]绖”字据上下文意补。
禫是除丧服的，《仪礼·士虞礼》：中月而禫。郑玄祭礼。注：中，犹间也；禫，祭名也，与大祥间一月。自丧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淡淡然，平安意也。《十三经注疏》第1176页）《通典》卷八七《五服成服及变除》：二十七月而禫，玄衣黄裳而祭。祭毕，更服朝服，以墨缨，缟带，缘中衣。吉屦无经白纬为冠而革带得佩纷帨之属，如其平常。三年之丧至此而结束。

牡，赵录误“北”。此据《开元礼》卷一三二齐衰三年绖带条改。牡麻乃大麻之雄株，又称枲麻。《仪礼·丧服》：牡麻者，枲麻也。《礼记·檀弓上》：司寇惠子之丧，子游为之麻衰牡麻绖。又贾公彦疏称：云牡麻者，枲麻也者，此'枲'对上章苴，苴是恶色，则枲是好色。故《间传》云：'斩衰，貌若苴；齐衰，貌若枲也。'（《十三经注疏》，第1103、1285页）

与”字阙，据上下文意补。

按此处赵录“作 练梓”。按据《通典》卷八七《五服成服及变除》引周制“有十三月小祥而练”（标点本第2391页），疑此处当“作 练祥”。

按斩衰无母服，母当齐衰三年，此“处 母”字疑衍。

此处赵录原“作 长子者（土 士？）以上子”，按据同卷15—16行叙殇服：十一[至]八岁为下殇，七岁以下皆为无服之殇。十一以下者，以年幼不被当“作 承胤之重”的长子是可能的。故此处应“作 十一是，非 土”或 士”者。

“母”据上下文意补。

“嫁”字，原卷偏旁半残，赵录“为 家”，此据上下文意及微缩胶片改。

按此“条 为”字阙。据《仪礼·丧服》斩衰三年“有（臣为）
写,故应删,小"注从母兄弟姨之子"应移于该条之下。兄"、姊"二字据上下文意补。第一"报"字与第二"报"字意重复,疑衍。据上文,继母改嫁尚服齐衰,不同居却仅服大功,不通,故疑为继父之误。继父不同居服齐衰三月合于礼文,详见正文。"准令齐衰三月五月"的"齐衰"下赵录误多"一"期字,此处据缩微胶片改。"侄丈夫妇人"者,赵录误"为侄女夫妇人"按"丈夫妇人"意即男女。开元礼卷一三二小功五月成人正服"有为舅及从母丈夫妇人报"。注曰:"母之兄弟姊妹。"又同条殇降服"有为侄丈夫之长殇",下注曰:"出嫁姑为之服。"从祖父父祖兄弟,赵录误断"为从祖父、父祖兄弟"。按从祖父父祖兄弟指从祖父(父之同堂兄弟)与从祖父祖(祖之兄弟),参见《开元礼》卷一三二小功五月成人正服。为嫡母父母从母,赵录误断"为嫡母、父母从母"。按庶子为嫡母应服齐衰,非缌麻也,此处是庶子为嫡母之父(母外祖母)、姐(妹)从母(即姨)服。开元礼卷一三二有:"为嫡母之父祖兄弟从母",注:"谓妾子为嫡母之父母及兄弟姊妹,嫡母卒则不服。"又同卷缌麻三月"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注谓:"若无嫡母及嫡母卒则申,妾子不服外祖父母、舅、从母等。"丈夫",赵录误"为女夫",参见注[55]。丈夫",赵录误"为女夫",参见注[55]。
二、敦煌所出杜佑丧服衣制图

与郑余庆元和书仪P.2967卷是从贞元中淮南节度使杜佑所上《唐礼图》十五卷中节选的丧礼服制度一卷，姜伯勤先生曾对此件文书有过简略介绍。此卷中列有绖冠裳裙之图，每幅图下有文字详解，行文用语规范，释制度与《通典》接近。文中多次引述开元礼《仪礼·丧服》郑玄注及魏晋以降名家礼著，是敦煌卷子中所见关于唐代丧衣制最专门、规范和相对完整的著作，与《通典》和开元礼相比，更加详明而直观，是唐中期以后丧衣服制礼式的代表。

（一）《唐礼图》的发现及两种丧服图的渊源

敦煌P.2967文书是一件图文并茂的写卷。此卷《敦煌遗书总目》本节作为论文发表时原名《敦煌所出杜佑丧服制度图与郑余庆元和书仪》，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5—215页。此处内容略有删改。

姜伯勤《敦煌社会文书导论》第一章《礼仪》二《P.2967丧礼书对〈开元礼〉的变通》，台湾新文丰出版社，第22—23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题曰：小册子，丧服图，并注曰：引有《开元礼》、杜佑《丧礼图》等。《敦煌宝藏》则径题名《丧礼服制度》。按此件写本为双页对折小册子形式，前后均残，但以单页计文字尚存十二页，共七十一行。每隔数行兼有插图一二幅。从写卷内容可以知道文字是对丧衣各部所作的制度说明。从卷首残存的几行尚可以清楚地看出此卷的来历：

1. 误为古今服变广狭制，以致差谬。今见
2. 淮南节度使杜佑进上新制《唐礼图》十卷，其有《丧礼服制度》一卷，精不差，轻重合宜，当穷本书理，深得其宜。故
3. 持此以匡时要

以上叙述，说明此件乃是照抄淮南节度使杜佑《唐礼图》中的一卷《丧礼服制度》，由于它对于丧服制理解深切，又能“精不差，轻重合宜”，所以持此以匡时要，也即解决人们现实中关于丧服的疑问及需要。

写卷中提到的杜佑是为人熟知的中唐大儒。结合两《唐书》纪传，知杜佑任淮南节度使是自贞元五年末至贞元十九年之间。如杜佑果有《唐礼图》一书，则无疑应上于此期间。但遍查诸目录史书，均未见有记载，则杜佑是否确作过《唐礼图》尚不能肯定，不过就内容看，此书引证古礼、开元礼及诸儒论礼之书，释礼清晰，语言规范，语气之间，颇有决断，并有古今对比，显出对于唐礼与古礼

① 此处“匡”原误录作“达”，特作修正。
② 参见《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卷一三《德宗纪》。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的融会贯通,由于礼义艰深,断非一般儒生可以创造得来,所以如
说它是杜佑之作,并非没有可能。《旧唐书》卷一四七本传称杜佑:
性嗜学,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初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房馆以为才过刘更生,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贞元十七年,自淮南使人诣阙献之。杜佑将刘秩《政典》扩大为《通典》,从而成为制度类通史的开先之作,此为研究者所悉知。不过值得玩味的是传中言杜佑对刘秩《政典》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的几句话。翻阅《通典》二百卷,其中礼典百卷,乐典七卷,计总一百零七卷,超
过《通典》全书总量的一半。由此可见,礼乐乃是杜佑扩大刘秩《政
c典》的主要部分,则杜佑于礼乐的重视及该博即可由此充分得知。

《唐礼图》十五卷,顾名思义即知是为礼配图之作,那么,如果是杜
佑所作,则与《通典》一书应当是互补和一致的。查杜佑上《通典》
在贞元十七年,则《唐礼图》之上也应在此前后,其最晚应不超过贞
元十九年。由于《旧唐书·经籍志》乃五代转录开元盛时四部书,不
记此书是很自然的。但是宋人欧阳修、宋祁所修之《新唐书·艺文
志》也未见记载,说明此书至少五代或宋时已佚。因此《唐礼图》其
名及其书部分内容在敦煌文书中得以发现,对于史料学和目录学
而言,无疑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唐礼图》是图说性质。从浩瀚的文献目录中可以得知,我国
古籍中配有图谱或图录的实在不能算是太少。如《隋书·经籍志》
的经部图谶类、史部地理类、子部兵法类、天文类、历法类、五行类、
医药类等，都颇多配图的著作。图可以达到直观的效果，对于理解某些艰深难懂的书籍尤有必要。今礼图书见于目录最早即《隋书》卷三二《经籍志》所载郑玄及后汉侍中阮谌等撰《三礼图》九卷。此书清人有辑佚本，但唯题阮谌作，且所辑者仅有文字而无图。《玉函山房辑佚书》作者马国翰释阮谌据《三国志·杜畿传》裴松之注引《阮氏谱》，谓谌字士信，徵辟无所就，造《三礼图》传于世，以为盖郑注三《礼》遂为之图，阮复因郑图而修之，故世只称阮谌《三礼图》，而隋志推本而题之也。又《三礼图》魏晋以降非止一家。《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载有夏侯伏朗《三礼图》十二卷（按此书也见于《旧唐书·经籍志》）和张镒《三礼图》九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宋人聂崇义被旨纂集《三礼图》，以郑康成、阮谌等六家图刊定。《玉海》卷五六记此谓周世宗诏聂崇义参定郊庙器玉，崇义取隋开皇中敕官修撰的《三礼图》再加考正。宋太祖建隆三（年962），表上[。窦俨为序曰，聂崇义博采三礼旧图，凡得六本，凡旧图之是者，则率由旧章，否者当理。弹射其新图凡二十卷，附于古今通礼之文。]由于六家图说均已不传，所以清人王谟《汉魏遗书钞》所辑阮谌《三礼图》，一以聂氏篇目为次。《三礼图》既以三《礼》为中心，则其书的图录自然是综合性的。凡古礼所及宫室车舆、衣裳冕弁、尊爵俎豆、金石丝竹大约无不在内，而所录器物也必关乎朝觐、聘问、射乡、食飨、

①见《郡斋读书志》卷二《礼类》《三礼图》二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7—78页，并参《文献通考》卷八《经籍考·经部》《三礼图》二十卷，注引（陈振孙）氏《直斋书录解题》称聂图盖用六本考定（《文献通考经籍考》上册，上海华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13—214页。②金溪王氏刊本，经翼第二册。清嘉庆三（年1798）。
今所见清人辑佚的《三礼种种仪节图》有"冕服"、"后服"、"冠冕"、"官室"、"射侯"、"族旗"、"祭玉"、"匏爵"、"鼎器"、"尊彝"、"丧器"等诸多项目,便足徵以上推断是无误的。杜佑的《唐礼图》从名称和卷数上看,也是综合性的,其书之写作意向以《三礼图》为渊源应当是不错的。不过《唐礼图》是以唐礼为基本内容及核心,也即所针对者乃唐代现行之吉、宾、军、嘉、凶五礼,其在内容编排上必然与《三礼图》有所区别。本卷"丧礼服制度"作为内容之一便可以说明。而这种以当朝礼为中心的综合性礼图据目录记载在唐朝以前尚无先例。由此可见这件礼图在礼书方面也是独具创造性的,它足以证明唐人对当代礼、本朝礼的重视超过前朝。《隋书·经籍志》经部除了综合性的礼图之外,又有专门性的礼图。这类礼图中也恰巧以丧礼服图为多,据名称判断有十余种。其中有王俭、贺游、崔逸各撰《丧服图》一卷,不知名人撰《五服图》《五服图仪》《丧服礼图》各一卷,又郑玄注、贺循撰"及开府仪同三司蔡谟撰《丧服谱》各一卷,"而"贺游"之名不见记载《。《晋书》卷九一《崔游传》称"崔撰丧服图,行于世",是贺游当为崔游之误。此外隋志还"在《丧服要记》一卷,蜀丞相蒋琬撰"下注曰":梁有《丧服变除图》五卷,吴齐王傅射慈撰,亡。"在崔逸撰《丧服图》一卷下也注曰":梁有《丧服祥禫杂议》二十九卷,又《戴氏丧服五家要记图谱》五卷《,丧服君臣图仪》一卷,亡。"可见所谓丧服图、丧服礼图类的书已逐渐亡佚《。《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的开元盛时书目"仅录谢慈撰《丧服天子诸侯图》二卷,崔游撰《丧服图》一卷,及蔡谟、贺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422
循各撰的《丧服谱》一卷。《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礼经类所录也。只有这么多，不过在卷五八史部仪注类又增张荐《五服图》一卷，仲子陵事亦见《文苑英华》卷九四。《尚书司门员外郎仲居墓志》，“其邃于礼服上下古今仪制，著《五服图》十卷，自为一家之言”。张荐书新志已注明亡佚。前面已经简单地说到，敦煌《丧礼服制度》是有关丧衣各部的图解及制度说明。那么，以上文献记载的丧服图或五服图是不是与之性质内容完全或相似的著作呢？由于今唐以前丧服图、谱类著作均已不见，故其内容多已不可知。唯清人《汉魏遗书钞》及《玉函山房辑佚书》等各辑有吴射慈《丧服变除图》一卷，按射慈即谢慈”。玉函山房”作者引裴松之注，谓“其撰丧服图及变除，盖二书也”，七录》合之，并认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载《丧服天子诸侯图》一卷已非梁时旧本。但今之两种辑本内容多重复，来源也多自《通典》，内容并多是就丧服变、除各节与徐整问答的形式。仅从辑本已看不出“图”究竟为何物，更看不出与丧衣服的关系。由杜氏书仪中的丧服图，可推测以上诸经籍、艺文志中的丧服图、谱或五服图有相当部分是属于丧服的五服制度图。今存南宋车垓的《内外服制通释》即可作一证明。该书卷一《服制图》载各类服制图分十四种。在内外亲族关系方面虽远较杜氏书仪所列复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423

杂、完备,性质却是完全相同的。但除五服制度图外也应有衣服图的存在。今见南宋人杨复继、黄幹所著《仪礼经解续》卷一六《仪礼丧服图式》即“有五服图”与“五服式”的区别。前者仍为五服制度图,后者总、衣、履等,根据服丧者却是丧服的衣服制(式)包括笄人的不同列表说明并附以图示。同样,就唐人而言,杜佑《通典》在叙礼沿革中,也是“将五服缞裳制度”与“五服年月降杀(即五服制度)”分开叙述的,而他所照录的《开元礼》“五服制度”中也同样包含服制与衰裳的两方面内容。P.4024书仪中“丧服仪”和“服衣仪”也是如此。两种图分示两种内容,而这一点由于P.2967“唐礼服制度”的发现更得到证明。从这件卷子清楚地看到对于每一种丧服从名称、式样到质地尺寸的细微规定和示意图,是对于丧衣礼服最清楚明白的说明。它和一目了然的五服服制图结合到一起,在解释、普及艰涩难懂的丧服制度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二《)丧礼服制度》可能被郑余庆书仪收入的推测
talk to here,似乎这件《丧礼服制度》在名称和内容方面已无疑问,但这里却还有一个问题并未解决,那就是据此卷开头语,这件“小册子”不过是从杜“佑 新制《唐礼图》中抽出的一卷,也就是说,并非是杜佑原书,而是特别移出以作它用,所谓“持此以匡时要”的。

将原书节选出移作它用,自然可以是单行本。但“是持此以匡时要”的用语却十分可疑,因为这类用语使人不能不联想起糅正礼与民俗为一体的书仪。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称:“人之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此识材通明于仪礼。是
这段话"在 采其的要"而成的P.2646晚唐张敖《 新集吉凶书仪》中
照搬,只是文字略有简化①。郑氏书仪又道:
因兹采彼群仪,按诸礼经,洒翰之余,采掇时要,取其研
妙,遗言有章。
书仪的目的之一是普及礼仪。礼有正、俗之分,但从上述说法
看来,正礼、俗仪在书仪是同样的重要。书仪一方面要吸收礼经
(《 仪礼》《 礼记》等)和朝廷定礼,一方面又要注意汲取时代流行的
世俗礼仪,杂糅之以向民间推广。所以,所"谓 采掇时要"、以达时
要"、以传时(廿 世),实为济要",说的都是一回事。婚丧制度是书
仪中绝不可少的内容。而如果按照这一逻辑推测,那么杜佑的这
一卷礼书,不是被作为单行本而是被吸收入某一书仪是完全可能
的。
如果这一推测正确,那么杜佑"的 丧服制度"会被置于哪一件
书仪呢?按照前述时间的推算,我们知道只能是贞元、元和中的书
仪,而且,作者既"有 今见淮南节度使杜佑进上新制《 唐礼图》十五
卷"之语"和 精粗不差,轻重合宜,当穷本书理,深得其宜"的相当有
身份且具深度的评价,说明他绝不是普普通通的等闲之辈,而是与
杜佑同时,颇有地位资格的朝廷大臣,否则岂能轻易就见到杜佑" 进上"的 新制《" 唐礼图》,又岂能用如此的口气进行评呢?更何

①此句"两 则"字P.2646张敖《 新集吉凶书仪》"作 即",吉凶之重用"以下简作
况，当时虽无今“天著权”的问题，但能够将杜佑礼书整卷收入者，也不能视作平常。总括以上几点，可以认为，此书必须是贞元元和年间规模较大，级别较高，甚至带有一定官方色彩的综合性书仪，是可以容纳朝廷各项新定体制的吉凶书仪。按照这一线索去追寻，可以发现贞元、元和书仪非止一种，见于《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记载的有《郑氏书仪》二卷以及裴茞《内外亲族五服仪》二卷《书仪》三卷，其下注曰“朱俦注，茞，元和太常少卿。”此外，志还记有裴度《书仪》二卷，时间似也应在元和以后。在这些书仪中，应以郑氏书仪等级最高。郑氏书仪应即前述S.6537v郑余庆《新定大唐吉凶书仪》。本书前面已经介绍，郑余庆“谙练典章，朝廷礼乐制度有乖故事，专委余庆参酌施行”，朝廷仪制，吉凶五礼，咸有损益；书仪的制成虽在元和，但经长期酝酿，并出自众多礼官学士的研讨，故实际创作不妨看作是在贞元元和之间；又规模较大，有朝廷的授意及支持，为官场运作而制作的目的和色彩十分浓厚。耐人寻味的，是此件书仪序言中称：
其（线笺）表更加录要，切在其中，并合（模？）吉凶凡例，诸色仪注及内外诸色吊答，并更加录衰服制度图等，亦新标记。而似乎作为呼应，其凶仪部分目录“有衰服制度[第]廿六，凶仪凡例第廿七，五服制度第廿八，妇人出嫁为本家父母服式图第廿九，公卿士庶内外族殇服式图卅”。两处文中所见“衰”字，赵和平录文解“作丧”，而我认为依字形当“作衰”。作“衰”作“丧”似①见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第480—483页，惟“衰”字录不同。
乎全通，问题在于，所“说”衰服“或”丧服“制度”图，是否即前述五服制度图呢？观其目录中既“有”五服制度第廿八”，则衰服与“五服”置于两节自然有所不同。如有五服制度图者，该当放在五服制度内才是，这样衰服者必移作它用。由此我推测目录中“的”衰服制度“[第]廿六”者有可能用于说明衣制，从而与序言中“的”衰服制度“相合。《大唐开元礼》有关丧衣也“称”衰裳制度”，故此处如作“衰服”，可能性就更大一些。

“外五服制度第廿八”下“是”妇人出嫁为本家服式图第廿九”“和”公卿士庶内外族殇服式图第卅十”。如将此两图名称与前述敦煌杜友晋《新定书仪镜》的三幅丧服图对照一下，可以发现它们在内容上是不同的。杜氏书仪内族服图”、外族服图”、夫族服图”的三幅图并未涉及妇女娘家父母及殇服（即为未成年者服）的问题，这后两幅像是为之作补充。考虑郑氏书仪在序言中特别提到“已行用七十（八七八十？）[年]矣”的京兆杜氏书仪，作为继承者的姿态是明显的，故刻意为之补充不无可能。不过就其两项名字是“服式图”而“非”服制图”而言，是丧服式样而非服制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因此，就名称的一致性来看，郑氏书仪所说加录“的”衰服制度图”应主要“指”衰服制度(第)廿六”中可能有的服衣图，或还包括第廿八、廿九两节“的”服式图”，而不是五服制度图。而如果说第廿六卷内容就是将杜佑“的”丧礼服制度”一卷移入，则从书仪本身“对”衰服”的强调，及其年代背景规格的共同性，都是讲得通的。加上郑余庆书仪也在敦煌流传的情况，其根据或许就更多些了。

当然“说”丧礼服制度”这件文书就是郑氏书仪的一部分，还仅仅是一种估计和推测，根据尚不十分充分。因为诚如学者所论，贞
元和是一个修礼书盛行的年代。除了郑余庆、裴贞元、元和中修订的礼书还有许多，如颜真卿《礼乐集》、《大唐元陵仪注》、韦渠牟《元和曲台礼》等。这贞元新集开元后礼》、王彦威《衰服制度》的图说特色及其与现实的关系

杜佑在《通典》的礼典部分，以一以贯之的方式，先叙礼的沿革，再述唐代之制。其书卷八七《五服成服及变除》和《五服衰裳制度》在由重至轻依次叙“述 周制(《仪礼》)五服及重丧祥禫变除之际丧衣的衣制服式同时，大量征引了汉晋以降礼家郑玄、马融、葛洪、杜预、崔凯等人的论述。此外，又在《斩衰丧既葬缉衰议》中介绍了南朝晋宋诸儒有关衰裳的讨论和某些变化。至于唐朝，只说“大唐之制，一据《丧服(》按指《仪礼·丧服》)之文，具开元礼”，并没有更多的解释。

根据以上编排，可以得知本卷内容包括丧衣各主要部分，从首、腰至身体各部的服制均有。叙述的方式，与《通典》略不同，是按衣服的服用内容从头至尾分部，而各部多以斩衰、齐衰服为主，兼及大小功缌麻。与开元礼对照，斩衰、齐衰服中提到的衰（冠、衰裳、冠、缨武、緌等）、绖（带、首绖、腰绖、绞带）等基本都全，有些如绖带中的绞带虽未见图，但也有文字说明。还有《通典》卷八七和《开元礼·五服制度》在最后部“分衰裳制度”中提到的辟领、腰、衽（即负板）等丧衣各部此卷也都有详细说明，所不见者只是《开元礼》等已无，估计应在下面部分，只是由于卷子礼文及杜佑《通典》所提到的屦、杖、残阙而遗失。

在叙述上述内容中，至少有三次提到《开元礼》，文字与现存《大唐开元礼》大同小异，说明其中的丧衣服制是基本遵从开元礼的，有些只是作了较为通俗化的解释。例如负板一物，《开元礼·衰裳制度》只有“负广出于适寸”，“和负，在背者；适，辟领也。负出于辟领旁一寸”的简单说明。但卷中负，在背上，谓负板也。广一尺，下至胫，过领一寸，便显得更加清楚明了。据《通典》卷八七《五服衰裳制度》引古周制道：又取布方尺八寸，置背上，上缝著领，下垂之，谓之负。经云：‘负广出于适寸。’郑云：‘负， 在背上者也。适，辟领也。负出于辟领旁外一寸也。’今据辟领广尺六寸，负各出一寸，故知尺八寸。’这里所言经云是指《仪礼·丧服》,而郑云即郑玄注。由此得知《开元礼》文及杜佑《通典》的解释都是自《仪礼》经文及郑注。卷中的精神一致，但解释比《通典》更简略易懂。只是根据卷中辟领也是一尺六寸，知所谓过领一寸的负板也应是广一尺八寸而不是广一尺。估计此处是钞写者有脱
按《仪礼·丧服传》郑注云：首绖象绳[缁]布冠，类以国(围?)也。又云苴麻大扼，扼围九寸。

又一处是第廿四、廿五行以下言绖带等：郑司农云：麻在首及在腰皆为[谓]之绖。绖，实也。又《三礼义宗》云：男子重首，妇人重腰，绖服之法先除重。

此“处 郑司农云”即郑玄注《三礼义宗》为梁崔灵恩所作。崔灵恩《南史》卷七一《儒林传》有传，称“其少笃学，遍习五经，尤精三《礼》三《传》”，所撰《三礼义宗》三十卷。《唐会要》卷一二《飨明堂议》圣历元年引王方庆奏议，称《三礼义宗”》但捃摭前儒，因循故事而已”，则《三礼义宗》内容似乎主要是总结及补充前儒之说。

此外 P.2967卷复引崔凯论丧服制度曰：又按崔凯《丧服变除》云，子为父十三月小祥。小祥，小吉也，故衰除负板及心前衰。则大功已下不合衰之义明矣。

按：崔凯其人不见传录，惟《隋书·经籍志》卷三二记有《丧服难问》六卷，题崔凯撰。隋志将书系于宋庾蔚之、张耀撰著之下。《通典》引书或径“作 宋崔凯曰” ,知崔凯为刘宋时人。清《玉函山房辑佚书》卷二三辑其书一卷，材料均源自《通典》，共十七节。然《通典》引其文不称其书名“为 难问”，而是或“曰 崔凯丧服驳”，或“曰 宋崔”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丧礼服制度》释礼，以郑玄注兼杂汉魏以迄南北朝诸儒论议著述的作法与《通典》释礼的方式如出一辙，这似乎进一步证明了本卷与《通典》的关系。而以郑注为主的做法也基本同于《开元礼》。郑玄本为贞观中所定二十二贤之一，代用其书，垂于国胄，配享孔子庙堂。礼以郑玄为准的也是太宗与孔颖达等所定。以上做法说明这一基本取向在唐朝是相沿得到贯彻的。这也是该文叙礼的一个突出线索，这一线索对于了解唐礼对于古礼的继承沿革关系很有价值。《四库全书总目》作者关于《周礼》曾借郑樵引孙处之言，认为周公之为《周礼》，亦犹唐之显庆开元礼，预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实未尝行也。此言其实是大可商榷的。就P.2967卷所反映的《开元礼》衰裳制基本采用古礼经及汉儒释义而变化不大，并且又这样能为后来学者所大量征引，则说明唐之显庆、开元礼不能说其实未尝行也。但显庆礼、开元礼毕竟是朝廷正礼，是庙堂之礼。它和民间所行之礼的差距，在P.2967卷也有反映。第廿二至廿四行：《传》：绞带象革带，腰绖象大带。葛洪《丧服变除》云：今之孝子腰绳即绞带，其来久矣。按：此处为葛洪对《仪礼·丧服传》绞带的解释。葛洪事见①《通典》卷六九，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915页；卷七九，第2144页；卷八三，第2258页。②《唐会要》卷三五《褒崇先圣》，国学基本丛书本，第636页。
按《开元礼》云斩衰之冠正服义服所用六升[布](古 右)缝,通屈之(二 一)条绳为武,垂下为缨,所(为 谓)条属于冠绖上,今都无此绳缨武之制,于义全乖。

第三三至三四行:
总用妇人,以六升布为总,总用束发,今无此制。

《开元礼》继承古礼经所规定的绳缨武之制及妇人“用总”,也被简化掉了。这说明《丧礼服制度》的原意虽然是为了贯彻古礼的礼意或开元礼原则,但也不能不承认,礼经或者开元礼的某些丧礼衣服制度现实中已部分不照办甚或完全不实行了,礼在现实中已在逐步地改变。对此,姜伯勤先生曾“以P.2967丧礼书对《开元礼》的变通”作解释,并提出丧服礼仪演变的趋势是“一些旧制渐渐变除,一些地方用制渐轻”。但是丧礼衣服的改变不是孤立的。笔者将于下面说明,丧服的五服制度在唐后期五代与开元礼也有极大的不同,这已导致朝廷正礼发生较大的变化。丧衣礼与五服制的变化恐怕是同步的。尽管唐后期五代丧衣礼未必像五服制那样被敕令修改,但它事实上的改变恐怕不可否认。本卷《丧礼服制度》便有所证明,这也是它的贡献之一。由于它一

①《通典》卷八七,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390—2391页。
②姜伯勤《敦煌社会文书导论》,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第22—23页。
方面用较通俗的语言解释经传或朝廷正礼,一方面对比古今不同,这样便将正礼与民俗结合起来,突出了学以致用,以匡时要的目的,对于上所说被收入书仪的可能性又是一点补充。

最后还要说到的是,P.2967卷虽然字迹较为工整清晰,但错字谬误却分明不少。我们在注文部分已一一指出其错字及脱漏之处。某些脱讹甚至是严重的。例如“绞垂两结”的“垂”字原卷竟误为“重”,大功、小功及其下的冠缨武之制竟全部遗失,衰裳部分的文字脱落已使之到了文义难通的地步。这些错误并不仅仅反映钞写人的疏忽,或传写过程中的遗误,而是至少说明了钞写人本身对礼的不理解及望文生义,证明古代传至唐代社会的礼与现实世界脱节的问题已十分严重。艰深的庙堂之礼、服器诸用不但不能为普通百姓掌握,就连身为一般乡野学人的知识分子也难于理解了,这真是礼的悲哀。而这种情况与《旧唐书》卷一八五下《杨旸传》所“言杨常叹《仪礼》废绝,虽士大夫不能行之”看来也是完全一致的(按杨旸开元中任国子祭酒)。所以礼在唐朝虽然已被一再的简法、普及,或因书仪一类的礼书而作通俗性的宣传,但就总的过程看,它最后还是不免于衰落。近年日本学者副岛一郎撰文提出中唐儒学自礼乐说向仁义说转变的观点,认为丧礼学急速衰退及古礼不为士人所重的问题,与六朝以来门阀制衰微和士阶级构成的变化有关。其说固极具启发,然而除此之外,礼本身的高雅脱俗、艰涩难懂恐怕也是变化的原因之一吧。①

① 副鸟一郎《中唐儒学的演变及其背景》《集刊东洋学》第77号,1997年。
附：P.2967卷《唐礼服制度》的录文和校释

1. 录文（附图）

误为古今服变广狭制，以致差谬。今见淮南节度使杜佑进上新制《唐礼图》十卷，其有《丧礼服制度》一卷，精不差，轻重合宜，当穷本书理，深得其宜，故持此以匡时要。

按《开元礼》首绖大九寸，左绖带。十三月小祥，别除之。五分首绖去一以为腰绖，大七寸二分，绞两结去令人并。

各四寸无别也。

按《仪礼·丧服传》郑注云，首绖象绳缁布冠，类以国围也。又云苴麻大扼中指至大指为扼。此言中之制，其降杀大小但通人之形，亦不先以九寸为限。如童子当室者，亦取小童中指至大指如之。
九月，绖以绳缨。

无缨，绖带腰大四寸六分中殇皆七月，绖带与大功同，腰绖大九寸九分与小功，（藻澡）麻同断本以绖为绖寸七分，腰绖大二寸九分，布带吉屦，自齐衰以下皆以布为绖，《传》云，绖带象革带，腰绖象大带。葛洪《丧服变除》云，今之孝子腰绳即绖带，其来久矣。郑司农云，麻在首及在腰皆为之绖。绖，实也。又《三礼义宗》云，男子重首，妇人重腰，绖服之法先除重。义具《丧礼》，此不备载之。

按《开元礼》云，斩衰之冠，正服、义服冠同六升布。右缝，通屈之二（一？）武，垂下为缨，所（为谓）条属于绖缝上。今都无此绳缨制，于义全乖。童子已下当室者则免而杖之也。

总用妇人，以六升布为总。总用束发，今无此制，今幞头或得其意耳。《礼》云十三月小祥，除首绖，练八升布为冠，缨武亦如之。妇人练总，除腰绖。廿五月大祥，布缟冠，小祥，首绖大三条绳为
妇人缟緦。廿七月禫祭，玄冠皂缨，

齐衰正服、义服，

杖周及不杖周冠同七升，

布以

衰衣，按《开元礼》云，衰外削幅，裳内削幅，幅为三袅，袅犹（摄禊）也，削犹杀也。若齐衰已下则裳外削融。

负，在背上，谓负板也。广一尺，下至胫，过领一寸。

又云辟领一尺六寸，谓辟领一边开四寸，量之有八寸，别一尺六寸也（图12）

衰长六寸，博四寸，当心缀衣。（图13）

衣带（？）下七尺，腰也，广一尺，长七尺，用布半幅为之，以掩裳之上际也。（图14）
55 衽二尺五寸，谓袖中也。是袖第二节。

56 属连袂二寸，倍之四尺四寸，两袂共用布八尺八寸，此士之制。大夫已上移之三尺三寸，倍之六尺六寸。两袂共用布一丈三尺二寸也。

(图15、16)

29 [裳]，前三幅后四幅，幅为三襵，通以一条绳贯之。裳者，衣下曰裳，今俗谓之裙，若用全而为之，一幅为两幅，前三幅后四幅，则广狭合其制矣。齐衰以下并以为之腰带。

(图17)

64 按《仪礼·丧服》，度自缌麻已上，其制与斩衰同，但以布精麄（粗）为降杀耳。愚以大功已下无心前衰及负板，何也？言衰者，衰摧也，言孝子衰摧之义也。故今至小祥，衣冠带履（屦？）悉除渐轻耳。又按崔凯《丧服变除》云，子为父十三月小祥。小祥，小吉也，故衰除负板及心前衰。则大功已下不合衰之义明矣。

71 礼总言其同，不言其异者，略之也。

2.校释

“绖带”二字，据《大唐开元礼》卷一三二《五服制度·斩衰三年》绖带（补民族出版社影印洪氏公善堂本，第620页）。绖带是丧服结在头上或腰间的麻带，按据《仪礼·丧服第十一》郑氏注：“麻，以之丧服。”
在首绖皆曰绖，绖之言实也，明孝子有忠实之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第106页。

据《大唐开元礼》补，同注[1]。按此处意即首绖之长去五分之一为腰绖长。

重垂之误，见《大唐开元礼》，同注[1]。按绞垂两结之绞，意即绞带。《仪礼·丧服》郑注云绞带象革带。贾公彦疏曰：案《玉之形制云，肩革带博二寸。吉备二带，大带申束藻》衣，革带以佩玉佩，及事佩之等。今于要绖之外，别有绞带，明绞带象革带可知。按此处绞带亦麻制。《礼记·杂记》上小敛，環绖，公大夫士一也。"下，唐孔颖达疏曰：知以一股所谓缠绖者，若是两股相交，则谓之绞。是知绞带与绖带之别。《十三经注疏》第1097、1556页。

据《开元礼》，各[1]。按据《仪礼·丧服传》郑氏注，此句作首绖象缁布冠之缺项，万有文"库十通"本《通典》卷八七《五服成服及变除附》第476页和《开元礼》卷一三二《斩衰三年·绖带》皆作首绖象缁布（开元礼"无冠"字）之頍。"（頍，中华书局点校本《通典》改作頍项）。按頍乃古代用以固冠的发饰。《诗经》卷一四《小雅·頍弁》：有頍者弁，实维在首。《十三经注疏》第481页《后汉书》志第三十《舆服志下》：古者有冠无帻，其戴也，加首有頍，所以安物，故诗曰'有頍者弁'，此之谓也。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670页。又《仪礼·丧服》贾公彦疏曰：曰首绖象缁布冠之缺项者，案士冠礼，缁布冠，青组缨属于缺。郑注云'缺读如有頍者弁之頍'。缁布冠之无笄者，著领围发际，结项中隅为四缀以固发也。此所象无正
文，但丧服法吉服而为之。吉时有二带，凶时有二绖，以（要腰）绖象大带，明首绖象頍项可知。以彼頍项为吉时缁布冠无笄，故用頍项以固之。今丧之首绖与冠绳缨别材而不相缀，今言象之者，直取绖法象頍项而为之。至于丧冠亦无笄，直用六升布为冠，一条绳为缨，与此全异也。（《十三经注疏》，第1097页）按据此本“句 绳”乃“缁”之误”，国字不清，似“为 围”字别体”，类以围三字，似“为頍项”之释意。

苴麻大扼《仪礼·丧服传》原“作苴麻大搹”。郑注曰：“盈手曰搹。搹，扼也，围九寸。（《十三经注疏》，第1097页）是搹作扼也通。此处似乃郑玄文之释意。

绖带”二字，据《开元礼》卷一三二《五服制度·齐衰三年》“绖带”（补引同注[1]，第621页）。

按，据杜佑《通典》卷八七《五服成服及变除》及《开元礼》卷一三二《五服制度》皆“无半”字，疑衍。

据《开元礼》卷一三二《五服制度·成人九月》引同前第624页）及《通典》卷134《开元礼纂类·五服制度》标点本第3444页），五寸七分”下多“一半”字。

长殇及未成人“未”字，参同注[10]。

中殇皆七月，绖“六”字处，原空。据《开元礼》补，参同注[10]。

据《开元礼》胫“字无，疑衍”。“绖腰”二字疑当作“腰绖”。

腰绖大九寸九分”，按小功绖带尺寸不当大于斩衰、齐衰及大功。据《开元礼》卷一三二《五服制度·小功成人》引同前第624—625页）与《通典》卷一三四《开元礼纂类·五服制度》中华书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第3444—3445页，小功腰绖大三寸七分，据改。

此处原“作 其缌麻藻麻同断本为”，意不明。据《 开元礼》卷一三二小功 “语，下注曰”：澡谓去其俘条“有 澡麻带（绖 绖带?）垢，不绝其本。”又缌麻条“作 澡麻断本以为绖（‘引同前第624、627 页），下‘接 首绖大三寸七分”。故疑有脱字，并据改。

布“字据文意补。

按此“处 二”当“为 一”，见《 开元礼》卷一三二《 五服制度·斩衰三年”衰冠（‘引同注[1]第620页），并见《 仪礼·丧服》郑注（‘引同注[1《 十三经注疏》第1097页)。

[17《] 仪礼·丧服传》“有 条属右缝”（语 见同注[17】），据“此 绖”当“作 缝”。条即绳也《。 礼记·杂记上》”：丧冠条属，以别吉凶。注 “条属者，通屈一条绳若布为武，垂下为缨，属之冠（‘引同注 racially）。《 十三经 注疏》第1554页）。

[18《] 布”字，据《 开元礼》卷一三二《 五服制度·斩衰三年”》 总论节制”（补 同注[1]第620页)。

[20《] 开元礼》卷一三二《 五服制度·斩衰三年”》 总论节制“有” 妇人缁緦，衣履如男子，逾月复平裳”语。此处有脱误，据改。

[21《] 左缝“者，《 开元礼》卷一三“二 齐衰三年”作 合缝”《。 通 典》卷一三四同条”作 右缝（‘标点本第3438页)《。 仪礼·丧服》郑注引《 礼记·杂记》曰”：丧冠条属，以别吉凶。三年之练冠亦条属右 缝，小功以下左缝。”据此则“作 右缝”是。按缝即缝合处《。 礼记· 檀弓上》”：古者冠缩缝，今也衡缝。（ 《 十三经注疏》第1097页、 1282页）

[22《] 冠”、“缝”二字，据《 开元礼·齐衰三年》（补 同前第621 页)。按《 仪礼·丧服》郑玄注斩衰三年外 外者，冠前后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郑而出缝于武也。《仪礼·既夕礼》冠六升,外谓缝著注”：“疏”：武谓冠卷……若凶冠,从武下向外缝之,谓之外跸。”

“厌”即向内。又“内厌缝之”，压、伏。

《礼记·曲礼下》“苞履。报衽，厌冠，不入公门。”注：此皆凶服也。

…

“《十三经注疏》第1161页，1258页）

[23开]《开元礼》卷一三二缌麻三月条“有右降、正、义服冠衰同十五升”语。此处齐衰下不见大功、小功及缌麻，“疑同十五升”上有多阙文。按据《开元礼》同卷,大功正、降服冠同十升，义服冠十一升；小功正、降服冠同十一升，义服冠十升，各有不同，与此十五升并非一（事详《大唐开元礼》第624—625页）。升指布粗细，升越高者布越细《。仪礼·丧服》郑玄“注布八十镂为升，升字当为登。登，成也。令之礼皆以登为升，俗误已行久矣（《十三经注疏》第1097页）

[24]按据《通典》卷八七《五服衰裳制度》引周制释负板，“谓今据辟领广尺六寸，负各出一寸，故知尺八寸”，是“一尺”下尚“脱八寸”二字。存（疑见标点本第2394—2395页。并详本节正文）。

[25]“寸”据上下文意补。按此处《开元礼》文为“适博四寸，出于衰。”适即辟领。又注文曰“博，广也。辟领广四寸，则与阔中八寸。两之为尺有六寸，出于衰者，旁出衰外。”与此卷意略同（《大唐开元礼》卷一三二，第627页）。

[26]“衰”字，据《开元礼》补，参同[25]。

[27]按《开元礼》文曰“衣带下尺。”注曰“衣带下尺者，腰也。广尺，足以掩裳上际。”据此“则衣带下七尺”之“七”字似为衍文。又《开元礼》仅言（广宽）未言长，故此“处长七尺”者姑存疑。参同[25]。
属连袂二寸，意不通。据《开元礼》，当“为袂属幅，衣二尺有二寸”。注曰：“属犹连也。连幅谓不削。”参同。

裳”字据文意补。

《通典》卷八七《五服衰裳制度》引《仪礼》丧服经“云裳内削幅，幅三袧”，及郑玄注“胹谓辟两侧空中央也，凡裳前三幅后四幅”，又加按语曰：“按称幅不必全幅，盖中破为之。故《礼记·深衣篇》云‘制十有二幅，以应十二月’，是六幅交解之也。”此“一幅为两幅，前三幅后四幅”之意。参同。
唐前期贞观、显庆、开元礼制定后，并没有使丧服制的改革停步不前。相反，唐后期五代的服制相对开元礼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使中古服制从具体原则到精神距离上古服制愈来愈远。敦煌P.3637《新定书仪镜》的丧服图记录了这些变化。本章以敦煌写本中的丧服图为基，主要通过对图中所“谓”新人”服制年代、来源及中古丧服制演变全过程的探讨，揭示丧服在中古发生巨大变革的原因和社会基础，从而对中古礼制的发展得出规律性的认识。

一、敦煌P.3637《新定书仪镜》中丧服图年代质疑
丧服的五服制度对一般人民而言是复杂而不易掌握的，因此配合服制的普及，能够使人一目了然的又一种丧服图在P.3637《新定书仪镜》中出现了。《新定书仪镜》大致可以确定是开、天时代产物，论者曾经注意到，丧服图中的服制有不少与开元礼相同的内容，证明开元礼制确已经通过书仪深入当时中下层社会。但

①陈戍国《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2—193页。
在敦煌写本P.3637卷的杜友撰《新定书仪镜》凶仪的开头部分，置有包括内族、外族和妇族在内的三幅服制图。三幅服图简明扼要地出示了三种情况下的亲属关系及五服行服范围（图一一三）。三种丧服图是三种范围内五服制度行用的具体说明，其中内族服图一望而知是为本（族）本家亲属服丧所作。这幅图“以（己）身”即服主为出发点，向上、下各延四代，加自己为九代，也可以说五代。其最上为高祖，最下为玄孙，左右并延及三（从高祖）内男女血亲。其服丧的时间长短、服制重轻依血缘关系由近而远递减，自斩衰、齐衰、大功、小功而至缌麻，其在丧制上所表现的血亲服属关系及遵守原则应当说正是论者已指出的“五世而绝”的小宗宗法，也即《通典》卷六○嘉礼五》引《礼记·大传》所“谓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也”；及卷七二《嘉礼一》七》引《礼小记》“谓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血亲毕矣”。按照小宗宗法，亲亲上不出高祖，下不过玄孙，旁及此范围内的戚属，从自己算，皆为五世。超出这个范围，便亲情已尽。
图三 [妇为] 夫族服图

图注:
(1) 伯叔小功五月: 此栏 P.3688 和 P.3849 “作 伯叔母 大功”。赵和平《 敦煌写本 书仪研究》已作校勘，然其图录“作 伯叔母 小功五月 [周大功]”则有误。按此图体例，该栏应为男性亲属，其配偶只得于小字注中出现。又伯叔之服不当低于在室姑，故当据 P.3688 和 P.3849 改。

(2) 此“栏 再从”据它栏皆“为 再从”。按据此图体例“再从”即“再从”之意，两者无别。

(3) 堂兄弟小功五月: 此栏小字注“内 五”当“作 九”，赵录已据 P.3688 和 P.3849 改。

(4) 堂姑女小功五月: “姑”据 P.3688 和 P.3849 当“作 侄”。按：据此图左右对称原则，右同行相对“为 堂侄”，故此栏应“作 堂侄女”。

(5) 孙小功五月: P.3688 和 P.3849 两“卷 小功五月”均“作 大功九月”。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446

(6) 姨小功五月，在室大功九月：P.3688和P.3849两卷注文“在室”下有“新人”二字。

(7) 夫伯叔九月：此栏与“[妇为]夫族服图”同栏重复。按“外族服图”之“外族”当指母族与妻族。此图母族中独缺舅氏。赵和平录文已指出右侧一行三栏在P.3688与P.3849不同，作两（行 原为竖行）：

缌麻三月，新人小功五月
小功五月，新人缌麻三月。三月。

“知夫伯叔”之栏乃舅与舅母之误，可能是原卷错抄。

缌麻三月，新入（8）“外生”栏注“有）外甥小功五月：据[6]引P.3688和P.3849小功五月”字，与此不同。

(9) 夫伯叔母缌麻三月：此条同行为夫侄、夫妯娌，以位置似当“为夫侄女”，疑为原卷错抄或误置，“按夫伯叔母”在《开元礼》与伯叔同，均服大功九月”。夫侄女”在《开元礼》在室服周，出嫁服大功，均与此不同，姑存疑。

庙当毁，其主当迁”，当然也就无须服丧吊孝了。外族服图从内容看，是男子为母族和妻族服丧。服丧的范围上及外（祖父母）和妻父母，下至外孙和女婿，旁及姨舅姑子外甥。图的中心是“妻”，是与男子关系最密最近而非同姓的戚属。所以唐沿古制男子为妻“服齐衰期”也即期服或周服，高于对其他外族亲属的服丧级别，相当于对祖父母、伯叔父母及兄弟服丧的等级、规格，正取所谓“父子一体、夫妻一体、兄弟一体”之意。

(7) 妇为夫族服图”是妇女为丈夫及其亲属的丧服图。其中心是“夫”，图中规定妇女为其夫及夫父母服斩（衰齐衰）三年的重丧。此外，服丧的对象还包括丈夫的（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弟姊妹）及兄弟（妻妯娌）、侄与侄妇等。

丧服图的好处是服制与血缘关系对应清楚，轻重等级变化规律十分明晰，使人一目了然，对于介绍和普及艰涩难懂的丧服制度功不可没。从书仪可以了解到，这一服制丧服图与前章介绍的服衣丧服图是两种不同的制作。今唐以（前含唐）丧服图、谱的著作

①杨际平、郭峰、张和平《: 五一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岳麓书社，1997年，第154—156页。
均已不见。惟有书仪之丧服图得以保存，能够弥补和印证史料之阙。杜友晋《新定书仪镜》在敦煌卷子中尚有其他抄本，其中P.3688和P.3849两件断片也保存其丧服图全部或部分。利用几件残卷对P.363《新定书仪镜》中丧服图进行校订之后，可以看到其中有不少条制可以从开元礼找到依据，但是仔细观察，还不难发现一些新的问题。例如在内族服图横第四行右第一栏：

周，妻小功，新人大功。

(1) 兄弟

外族服图横第二行中间一栏：

缌麻三月

(2) 妻父母，新人小功五月。

依P.3688和P.3849校订后的同行左栏是：

小功五月，在

(3) 姨室〔新入〕大功九月。

(4) 舅母小功五月，新入缌麻三月。

横第四行：

缌麻三月，新入小功五月。

(5) 女婿

此外，据P.3688和P.3849，同图横第三行右栏“外（生甥）”下也注明：

缌麻三月，新人小功五月。

以上各栏，注文中都“有新人”字样，标明在丧服礼制上新、旧规定的不同。这“个新人”是什么时间呢？将上述诸条逐一与《开元礼》查对①，发现除了外（生甥）条“的新人小功五月”尚可与《开元礼》成人小功五月“的为舅及从母丈夫妇人报（“从母”即姨，丈

① 以下有关开元礼服制均见《大唐开元礼》卷一三二，民族出版社，影印洪氏公善隆堂本，第620—627页。
夫妇人”仍指舅姨,指男女无分,均要与甥互为对方服小功)对应之外,其余则无“一 新人”与《 开元礼》相合,而且除舅母小功五月一条不符外,其“余 新人”之前的旧制反倒多同于《 开元礼》。比如兄弟(妻 即嫂)与姨在《 开元礼》皆为小功,妻父母与女婿则古礼《、 开元礼》皆缌麻。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图“中 新人”之制不是《 开元礼》。以上五条之外,丧服图中虽未注“明 新人”,但与《 开元礼》明显不相符合的条目还有不少。例如上录第二条“中 舅大功九月”,与《 开元礼》规定的为舅服小功五月也是不相合的。此外又有如下栏目:

( 6)高祖缌麻三月。据《 开元礼》,高祖服在齐衰三月。
( 7)曾祖小功五月。据《 开元礼》,曾祖服在齐衰五月。
( 8)伯叔小功五月。此条据P.3688和P.3849作“ 伯叔 周,母大功”。按据《 开元礼》,伯叔母同伯叔,俱服齐衰(周 周同期,下同)。
( 9)兄女小功五月《。 开元礼》,兄弟女在室服周,出嫁者服大功。
(10)孙小功五月《。 开元礼》,为嫡孙服周,为庶孙大功九月。
(11)曾孙小功五月《。 开元礼》,曾孙与玄孙同,均为缌麻三月。
(12)外祖大功九月《。 开元礼》,为外祖服小功五月。
(13)夫父母三年《。 开元礼》,妇为舅姑服周。此处“ 三 年”,应分别为斩衰三年和齐衰三年。
(14)夫兄弟大功九月《。 开元礼》,小功五月服有“ 嫂叔 报”。故为夫兄弟同兄弟妻,均在小功五月。
15) 夫伯叔母（缌麻三月。《开元礼》，为夫伯叔母与伯叔同，均服大功九月。此条以在图中位置，疑为“夫侄女”之误，然夫侄女在《开元礼》，出嫁服大功，在室服周，亦与此不同。

16) 夫侄女小功五月。《开元礼》，为夫兄弟之（子男女同报）“在齐衰不杖周，即周服。

17) 夫侄妇缌麻三月。此条《开元礼》未详。然据《唐会要》卷三七《服纪上》记太宗“言犹子之妇，普服大功”，及魏徵议“请与兄弟子妇同为大功九月”，此《开元礼》未闻有改议，故仍当为大功服。

按：以上两种情况相加，与开元礼不同者共涉及十七条十八项（其中舅条内含两项）。其中内族七项，外族和妇为夫族分别为六项和五项；除内族服图的曾“祖小功五月”和高“祖缌麻三月”本应为齐衰五月和三月，是未对丧衣服制加以区分而相混，及少数条目也可能有原卷错抄的问题之外，其余多数显然属于服制本身的变
化。这些变化就内容而言，不仅包含了唐初以来就一直有所争论的姨舅服、嫂叔服，还包括了以往未曾有过改议的诸如伯叔母、舅（姑）、父（父母）、外祖、妻父母、女婿、夫伯叔母、夫侄等服，涉及的对象十分广泛。可以肯定地说，丧服图由于这些不惟与古礼有异，与《开元礼》已自不同的变化①，所反映的显然已不完全是开元礼了。

（二）丧服图服制的年代问题

那么，为什么写成于开、天时期的杜友晋《新定书仪镜》会出现

①转用《唐会要》卷三七《五礼篇目》王彦威语，国学基本丛书本，第671页。
不完全是开元礼制的丧服图呢？根据卷子的情况，当然一种可能是书仪作者杜友晋本人依据民间所行丧服礼修改。书仪不是朝廷正式修订的礼书，它所反映的内容容有民间礼俗而与朝廷正礼有别。而事实上，书仪也是正、俗两者结合的产物，所以出现一些不同是正常的。但是，唐朝是官本位的社会，根据我们所见敦煌其他写本书仪（如P.4024与S.1725两件唐前期书仪）记载的礼制虽也含俗礼，但是大多数成分仍与古《仪礼》及唐朝现行礼制相符。杜氏书仪如果是产生于盛唐时期，那么，作为世家大族的杜友晋怎么可能对当时还制定不久的《开元礼》毫无顾忌而加以大肆修改呢？更何况，书仪所“用新人”一词不像是随意指民间的变化，而是指正式的制度。由于诸“条新人”之制大都“是新人”以前同于《开元礼》，而新人以后有变化，所以像是用后来制度取代《开元礼》。开、天时代似不可能再对《开元礼》有这样大范围的修订，故推测另一种可能性是后人在钞写原书时，根据当时所行礼制对原有的丧服图作了修改。这种修改的痕迹甚至还保留在个别地方，比如上面已指出的P.3688和P.3849关于外甥注“曰缌麻三月，新人小功五月”，就很可能是原丧服图的内容。当时依据新定的《开元礼》这样写，后抄者未改，所以就出现了惟此“条新人”之制与他“条新人”之制时代不符的情况。进一步的问题是《新定书仪镜》丧服图的年代，即与《开元礼》不符的所谓“新人”之制究产生于何时呢？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之。案《五礼精义》，贞观十四年，魏徵等议，亲兄弟之妻请服小功五月。今所司给假差谬为大功九月。大常博士段颙称：“自来给假，元依令式。若云违古，不独嫂叔一条。旧为亲姨服小功，令式今服大功；为亲舅旧服小功，今服大功；妻父母缌服，今服小功；为女婿为外甥缌服，今并服小功。此五条，在令式与古不同，未审依马缟所奏，为复且依令式？”

清泰三年兵部侍郎马缟的上疏引起太常礼院对于服制是执行当朝令式还是恢“复古制”的疑惑。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马缟和段颙所提出的嫂叔服及亲姨舅、女婿、外甥等服，竟无一不与上述《新定书仪镜》中“的新人”之制相合。这说明，至少后唐清泰三年以前已行此制。

又《宋史》卷一二五《礼志二十八》关于丧服制记曰：妇为舅姑。乾德三年，判大理今尹拙言：“按律及《仪礼·丧服传》《开元礼仪纂》《五礼精义》《三礼图》等书，所载妇为舅姑服周；近代时俗多为重服，刘岳《书仪》有奏请之文。《礼图》《刑统》乃邦家之典，岂可守《书仪》小说而为国章邪？”判少卿事薛允中等言：“《户婚律》：‘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各离之，若居周丧而嫁娶者，杖一百。’又《书仪》：‘舅姑之服斩衰三年。’亦准敕行。用律敕有差，望加裁定。”从中得知后唐刘岳作《书仪》，对“于舅姑之服”曾有奏请之文。宋人因此认为妇为舅姑服三年“乃后唐始定”。按此三年制也见于前述丧服图。若果如此，“则新人”制当与刘岳有关。

按刘岳其人，新、旧《五代史》有传。《册府元龟》卷五六四《掌礼部·仪注》称其在后“唐为太常卿，文学之外，通于典礼。明宗天
成中奉诏撰《新书仪》一部，文约而理当，至今行于世。但新史对他评价不高。其书卷五详本传记明宗因对郑氏书仪有起复、冥婚之制不满，乃诏岳选文学通知古今之士，共删定之。岳与大常博士段颙、田敏等增损其书，而其事出鄙俚，皆当时家人女子传习所见，往往转失其本，然犹时有礼之遗制。其后亡失，愈不可究其本末。其婚礼亲迎，有女坐婿鞍合髻之说，尤为不经。公卿之家，颇遵用之。至其久也，又益讹谬可笑，其类颇多。

此外，欧阳修在《归田录》卷二中也有差不多相同的批评：刘岳《书仪》婚礼，有女坐婿之马鞍，父母为之合髻之礼，不知用何经义。据岳自叙云：以时之所尚者益之。则是当时流俗之所为尔。岳当五代干弋之际，不暇讲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时世俗所用吉凶仪式，略整齐之，固不足为后世法矣。然而后世犹不能行之。

这里欧阳修对刘岳《书仪》的批评，似乎并没有涉及到其凶仪方面的具体内容。但是，刘岳《书仪》是奉诏选文学通知古今之士，共删定郑余庆《书仪》而成。如果确乎是苟取一时世俗所用吉凶仪式并被令式所取的话，则修改丧服的变礼便至少可以提至明宗初即位的天成年（间926—929年）。

但新制是不是明宗所定仍有疑问。因为宋朝臣认为妇为舅姑斩衰三年始于后（唐明宗）的根据只是刘岳曾有奏请之文，而且也没有提到其他条目。检《五代会要》卷八记清泰三年右赞善大夫赵咸乂驳马缟之议曰：太宗文皇帝……因览同爨有缌之义，遂制嫂叔小功之服，列尊圣贤已为故事，传于令式，加以大功。今马缟奏论以为错
谬。况缟昔事本朝,暨至梁室,曾为博士,累历岁年,今始奏陈,未为允当。

后唐承唐为号,赵咸乂语中所"说 本朝"自指唐朝。查《 旧五代史·马缟传》,说"他 少嗜学儒,以明经及第,登拔萃之科。仕梁为太常修撰,累历尚书郎,参知礼院事,迁太常卿"。至后唐任国子祭酒,已八十岁了。提到服制中为兄弟妻服大功的内容。只说"是 不知何人议改,而置于令文"。但观赵咸乂对他的批评,分明是对他自唐人梁,再入后唐",累历岁年",却对令式中早经实行的制"度 今始陈奏"有所不满。

又《 五代会要》同卷复记尚书右仆射刘昀等集议曰:

"伏以嫂叔服小功五月《, 开元礼》《、 会要》皆同。其令式正文内,元无丧服制度,只一本编在假宁令后,又不言奉敕编附年月。除此一条,又检七八条令式,与《 开元礼》相违者,所司行已多年,固难轻改。

也是说后唐末帝当时行用的丧服制已是时日已久,相因成习了。以上说法不免令人疑惑。因为如果上述与《 开元礼》不符的丧制是明宗所定,那么,时距清泰三年马缟上疏不过数年《。 旧五代史》传虽然指出马缟上疏时已年老昏眊",于事多遗忘",但为什么同时身为朝廷重臣的刘的、赵咸乂等也一句不提明宗,反而说是令式中的丧"服 又不言奉敕编附年月"呢?而且即使马、刘不知,怎么按前述《 新五代史·刘岳传》所说,与刘岳一起,曾亲身参加修订《 书仪》的太常博士段颙竟也不言,反而态度依违于令式"及 古制"两者之间呢?

更应当指出的,是前述赵咸乂对马缟的批评虽尚含糊,但《 旧
五代史·马缟传》在引述诸博士议论时却直言道“律令，国之大经。马缟知礼院时，不曾论定，今遽上疏驳令式，罪人也。”据上引同传文，马缟“参知礼院事，为太常少卿”正是在梁代而非后唐。这样，“累历岁年”者便可以理解为这些与《开元礼》不符的制度至少梁代就有。或者，保守的估计是，这些礼制正式入于令式，不会晚于梁唐之际。

正式实行于梁唐之际“新”令因马缟上疏而引起争论，据《五代会要》卷八，刘昀等最终还是决定嫂叔服并诸服纪，请依开元礼为定。如要给假，即请下太常依开元礼内五服制度编附令文，并且得到批准。但是否真作修改值得怀疑。因为不久后晋代唐，晋高祖明令“”，所以应唐明宗朝敕命法制，仰所在遵行，不得改易。改制可能成为空文。据上揭《宋史》卷一二五《礼志二十八》乾德三年（年965）文，是梁唐之制实可能沿用至宋。但时距北宋建国不过数载，朝廷已有重修礼制之意。又《宋史》卷九八《礼志一》称宋太祖“即位之明年，因太常博士聂崇义上《重集三礼图》，诏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学之士详定之”。上述尹拙议恐即出于此。又志称“开宝中，四方渐平，民稍休息，乃命御史中丞刘温叟、中书舍人李昉、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卢多逊、主司员外郎知制诰扈蒙、太子詹事杨昭俭、左补阙贾中、司勋员外郎和岘、太子中舍陈鄂撰《开宝通礼》二百卷，本唐《开元礼》而损益之。既又定《通礼义纂》一百卷。”是北宋开宝中，又基本上恢复了开元礼。不过据《宋会要辑稿》礼三六之一四天圣五年（1027）四月二十三日翰林侍讲学士孙奭言“伏”。

（1）《旧五代史》卷七六《晋高祖纪二》，中华书局标点本，第991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见礼院及刑法司、外州各报守一本衣服制度，编附入假宁令者，颠倒服纪，鄙俚言词，外祖卑于舅姨，大功加于嫂叔，其余谬妄难可遽言。臣于《开宝正礼》录出五服年月，并（见）现行丧服制度，编附假宁令，伏乞详择，雕印颁行。

可知虽然宋初已制订《开宝通礼》，但直到仁宗时，礼院与刑法司、外州等关于丧服制仍不统一，并且其中的许多内容仍在延续着五代梁唐之制，可见其影响是深远的。

所以《新定书仪镜》虽为开、天中杜友晋的作品，但具体到我们所见P.3637（亦包括P.3688和P.3849）写卷却很可能是唐后期五代人的抄件。他们在钞写的同时，根据当时服制修改了原丧服图。当然“从新人”一词的含义出发，此件成于梁、唐之际的可能性很大。如赵和平已指出的，卷中避讳仅避到玄宗，代宗等讳皆不避，说明后抄者是直接转录开、天成书。这和我们的结论也是没有矛盾的。由此根据现有材料，丧服图或者P.3637写卷年代问题的讨论或许也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三）《新定书仪镜》中丧服新制的来源

但是得出以上结论并未能使我们完全心安，因为问题到此并没有全部解决。卷中的丧服图表明，开元礼制的确已被作了大量的、也可以说是极为重大的修改。给人的印象是，凡属唐初以来就遇到的敏感问题，如姨舅服、舅姑服、嫂叔服等等，无不有所涉及，而且所改据知已被正式纳入假宁令内执行，这说明确曾有过至少一次的修礼过程。如果定礼者并非唐明宗，或者大多不是由唐明宗，那么这些礼则又是出自何人，其来源为何呢？五代丧乱，图籍遗失，故宋人引制，惟知来自后唐，却不知梁唐政权皆藩镇体制，乱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中草创。所有宗庙祭祀婚丧避忌诸法，只能是继承前朝，萧规曹随，陈陈相因；而未遑制礼作乐，重建新制。所以朱全忠通一登基，便宣布“凡曰轨仪，并遵故实。姬庭多士，比是殷臣；楚国群材，终为晋用。历观前载，自有通规，但遵故事之文，勿替在公之效。”①

不仅朱梁如是，后唐庄宗、明宗更将建国看作是承唐正朔、唐祚中兴，所“谓袭三百年之休运，继二十圣之耿光”，事事处处比仿唐朝，这就使得五代礼令必然沿袭唐朝。只不过使用中对数百年前相沿的令式也还是要作些修订统一。据《五代会要》卷九《定格令》，记梁开平三（年909）十月，敕令太常卿李燕、御史司宪萧倾及张衮、崔沂、王鄯、崔诰等人，共删定律令格式。至四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新删定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一十卷，律并目录一十三卷，律疏三十卷，共一百三卷，请目为《大梁新定格式律令》，颁下施行，从之。“时距后梁建国不过数年，所删定”的卷帙浩繁的律令等自不会是梁代本身创建而只能是来自唐朝。而据同卷后唐天成元年（926）九月二十八日御史大夫李琪奏，知当时因为发现“伪梁格并目录一十一卷，与开成格微有舛误”，所以后唐朝廷定令仍用开成格。

按据《新唐书》卷五六《刑法志》，开成格又“称开成详定格”，乃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刑部侍郎狄兼謩采开元二十六年以后至于开成制敕，删其繁者所订。此后至宣宗时，又有左卫率府仓曹参军张“戣以刑律分类为门，而附以格敕”，修成《大中刑律统类》。至长兴四（年933）六月，后唐朝廷复命御史中丞龙敏“等详定《大中统”

①《旧五代史》卷三《梁太祖纪三》，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8页。
②《五代史》卷三八《唐明宗纪四》，中华书局标点本，旧第517页。
类》，后唐末帝及后晋天福中，所行乃唐明宗敕命法制，其以唐法制为依据也是可以肯定的。

律令是如此，那么礼的情况如何呢？五代关于礼的记载很少，但就仅有的史料而言，仍然可以看得出是“称故实”。例如《五代会要》卷八《丧葬上》天成元年御史台关于官民百姓丧仪逾制的奏文中，便多“有伏请自今已后，并准故事施行”，兼得左右巡使状抄录到丧葬格例，以“及奉敕今后文武两班及诸司官吏，并诸道经商客旅，凡有丧亡，即准台司所奏故事施行”等语，说明后唐所行只是故事，能找到作为依据的也只是早先的丧葬格例。这些故事、格例的时间想必已是甚久。更应提到的是天成二年御史中丞卢文纪奏文，其文进一步针对敕文更检详前后敕格，仔细一一条件，分析奏闻的要求及御史台所定丧礼品级，不厌其详地转述了唐元和（六三）（年811）十二月刑部侍郎兼京兆尹郑元关于丧葬仪制和长庆元年（821）浙西节度使李德裕关于葬礼逾制的奏请。文中奏明台司伏请令文及故事不载者，令更条，也即请求依唐元和礼制对丧葬品级条例再作补充修改。这说明五代特别是后唐丧葬制度受到唐后期礼制的很大影响，这一点与律令的情况并无太大的不同。所以具体到丧服礼的变化无疑应从唐后期寻求根源。

这里应当指出，从萧嵩开元二十（年732）上《大唐开元礼》之日，这部礼书就成为唐朝统治者奉行之礼制的法典与基本依据。但是《开元礼》的产生本身就是唐初以来变礼的结果。自《开元礼》初上到唐朝灭亡又超过一个半世纪之久，我们不能想像在这样长①按《旧唐书》卷一四六《郑元传》，郑元元和三年（808）由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判度支迁刑部尚书兼京兆尹，四年五月即卒官。故疑此“处六年”当作“三年”，刑部侍郎当为尚书之误。
唐朝统治者们能够完全执行《开元礼》而不加以任何修改，特别是与士庶生活都极为密切的丧服礼。而史料记载其实也已表明，即使是在《大唐开元礼》逋上之初，对于丧服礼的修订就已经开始，例如《唐会要》卷三七《服纪上》载开元二十三年正月玄宗召集礼官学士，敕令“对服纪之制，有所未通”之“处详议具奏”，当时便有礼官提出将外祖的小功五月服改为大功九月，还有增补舅母缌麻、堂姨舅袒免等服，结果除外祖服外，其他两项都被通过，增加了《开元礼》所没有的内容。同卷并记神龙元(年705)五月十八日，韦后曾“表请天下士庶出母终者令制服三年”。此条并未收入开元礼，但至天宝六(载747)正月十二日敕文却规定“：五服之纪，所宜企及，三年之数。以报免怀。齐斩之纪，虽存出母之制；顾复之慕，何申孝子之心？其出嫁之母，宜终服三年。”这说明，开元礼以后实际执行中的礼制还是通过皇帝敕令不断有所变动。

当然，礼仪方面更重要的变迁还是发生在安史之乱以后。战乱使盛唐礼乐遭到毁灭性打击。而战乱后再度取得统一的唐政府，既有着重整威仪的迫切愿望，也有着对于废阙之礼再加补充的需要。这一点，在试图通过武力裁抑藩镇，加强中央集权的德、宪两朝尤为突出。所以贞元、元和成为“变礼”的时代。研究者曾对这一变礼的时代背景及表现给以充分注意。其中，姜伯勤对贞元元和中《大唐郊祀录》《礼阁新仪》《曲台新礼》和后来的《续曲台礼》等重要礼书的编纂及其与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的关系加以探讨，指出这一时代变礼迭出、仪注兴革的特点。
赞同姜先生的意见，与此有关，具体到本文的丧服制度，应当也“是 变礼”牵涉书仪的内容之一。

诚如论者早已指出的，贞元、元和中承“变礼”之责的，应首推韦公（肃《礼阁新仪》作者）、郑余庆等人。后者据《旧唐书》卷一五八本传，“对 朝廷仪制，吉凶五礼，咸有损益焉”。既然“对 吉凶 五礼”均有触及，则丧服制度也应在其内，而且，相信其“对 吉凶礼仪”的“损益”，应在先前制作的书仪中已有反映。或者不妨说他的《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就是对五礼改革的实践和推广。前揭郑余庆自叙宗旨，表明“要 采彼群仪，按诸礼经，洒翰之余，采掇时要，取其研[妍]妙，遗言有章”。也就是说，不但要吸收杜友晋等所撰旧书仪的精华和遵守礼经的原则精神，也要“采掇”现实中的新变化。两者的结合，便“是 取其研[妍]妙”。从郑氏书仪已见内容可知，郑余庆虽为世家大族，却并不抱残守阙，他的《书仪》是通权达变的。由此推测，他在凶仪部分的五服制度方面，很可能“也 采掇“了 时要”，从当时的情况看，并不是没有这样的社会基础。

《唐会要》卷三八《服纪下》略曰：

贞元十一年，河中府仓曹参军萧据状称”：堂兄侄女子适李氏，婿见居丧。今时俗妇为舅姑服三年，恐为非礼，请礼院详定垂下。“详定判官前太常博士李岩议曰”：谨按《大唐开元礼·五服制度》，妇为舅姑，及女子适人为其父母，皆齐衰不杖周……以此论之，父母之丧，尚止周岁，舅姑之服，无容三年。“据此”，妇为舅姑服三年”在贞元中也已经很普遍，当时虽认“为非 礼”，但已有将它“从 时俗”交付朝廷正“式 详定”的要求。尽管没有被正式通过，但到了郑余庆重定《书仪》之际，会不会将之吸收或补
不过《书仪》并非正式礼书，而且郑余庆等究竟吸收了多少俗仪亦很难知晓。所以单纯从其《元和新定书仪》去推测唐五代礼仪的变化自然还是不够的。抛开郑氏制礼及《书仪》不谈，从渐变的观点去看，也许继郑氏之后，王彦威所作《曲台新礼》和《续曲台礼》两书的内容更有价值。《唐会要》卷三七《五礼篇目》载王彦威在元和十三年上《曲台新礼》疏中，不但声明自开元礼制定至元和"的十余年"中，法度沿革，礼有废兴，或后敕已更裁定，或当寺别禀诰命，贵从权变，以就便宜。国家每有礼仪大事，则命礼官、博士约旧为之损益，修撰仪注，以合时变"；且公然宣称己"所集开元以后，至元和十三年奏定仪制，不惟与古礼有异，与开元仪礼已自不同"。所以王彦威的这部书是反映它不同于古礼和开元礼的"仪注"之"新"的，也是强调它合乎时变的。

如果说《曲台新礼》已如王彦威所称"是五礼之仪式，或旧仪所不载，而与新创不同者，莫不次第编录"，且"以集开元二十一年以后，至元和十三年正月五礼裁制敕格"，即汇集朝廷吉凶令式格敕为主的话，那么《续曲台礼》就走得更远。据知这部书"是又采元和以来至长庆典礼故事不载者，益以王公士民昏祭〔丧葬〕之礼"，也即收录范围扩大到民间非正式的婚丧礼俗。据《玉海》引《中兴书目》称《续曲台礼》，其目录成三十卷，应约旧章，始从变礼以商榷沿革，新说旧规，实于首篇，详为注释，嗣续前事。这样两部包含"旧仪新创"、新说旧规的礼书，对于朝廷民间的实用价值，
毋庸说是极高的。它们无疑有着关于丧服礼甚多的变化。应当说，无论是《曲台新礼》抑或《续曲台礼》在礼书的等级规格上，都不能与玄宗敕命修撰，开元二十年由宰相萧嵩总而上之，《大唐开元礼》相比。正“式颁所司行用”的《大唐开元礼》，据王彦威宣称自己的书“不唯与古礼有异，与《开元礼》已自不同”，及所谓“礼科者，名数之总，与仪注相扶而行者，阙一不可。臣今所集，备礼科之单复，具供给之司存，使谒者赞引之徒，官长辟除之吏，开卷尽在，按文易征”；知他的书就是为给《开元礼》作仪注，而且是用于庙堂之上，是给礼官作参考的。而据王彦威“太常检讨”的礼官身份，和其将《曲台新礼》谨诣光顺门奉表以闻，伏乞裁下“及”被从之的情况看，知这部书当时是被作为官书正式接受了。这就无怪乎后来宣宗大中朝有百官家庙先取礼司详定”，余并准《开元礼》及《曲台礼》为定制的敕令，及僖宗光启中也“乱离之后，旧章散失，礼院凭曲台。礼欲以三太后附飨”之事。所以《曲台新礼》虽未像《开元礼》那样正式颁行，但既被引用过，便说明它也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续曲台礼》如何，史料未详，亦未载其成于何时。但所采之事既至长庆，则其书至少成于长庆末，或甚至会到敬宗、文宗朝。观《旧唐书》卷一○七《王彦威传》称“其每议礼事，守正不阿附，君子称之”，弘文馆旧不置学士，文宗特置一员以待彦威，知文宗是很器重王彦威的。所以直到文宗朝，他虽然不再任礼官却仍“以本官兼史馆修撰”，而且由“于通悉典故”对于仆射上事仪注等发表意见，从而在礼制方面仍然发挥着作用。

①见《唐会要》卷一九《百官家庙》，国学基本丛书本，第391页；《册府元龟》卷九三《掌礼部·奏议二一》，中华书局影印本，第7094页。
人们往往不曾注意到的是，文宗时代也是贞元、元和之后又一个‘变礼’的高潮。近年姜伯勤曾从大和中宰相王涯受命文宗，于礼令加以整备以应社会变动和政局之需的角度提出这一问题，并认为王涯令式礼改革与己卯政治革新失败关联，象征着公元九世纪末唐代盛极一时的礼与令已走向‘后开元礼’和‘后开元令’时期，而作为这一时期代表作的诸如《曲台新礼》《续曲台礼》由于收入元和以来制令敕格，所以‘使礼典已逐渐敕令化’

姜先生所说礼典敕令化事实上涉及到自古礼到唐礼的根本变化，但是与此同时，还有礼令结合的实用化社会化问题。从上面论述可知，郑余庆、王彦威一方面是吸收了许多新定敕令，但另一方面也吸收了不少时俗，他们是对上至朝廷郊庙、下至民间婚丧的礼仪作出巨大改革者，而王彦威的礼书尤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他们‘的新礼’有些早经制度规定，有些则是约定成俗，丧服礼的变化应是后者成分居多。但是，服制的变化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五代令式的呢？这里推测可能有两条。

一、开成格敕。根据文宗对王彦威的重视，有可能下敕将其所定丧服新制吸收入格式。本文前面谈到，朱梁所‘修新定律令格式’不过是删除唐法令而成，‘其伪梁格’‘与开成格’相比也只是‘微有舛误’。后唐明宗以后，更是根本改行‘开成格’。那么王彦威之变礼，就有可能通过开成格敕进入五代。

但是，如此设想似乎仍有疑问。即开成年间虽由宦官决事，皇

①姜伯勤《王涯与中唐时期的令与礼》，载郑学檬主编《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2—72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463

帝也受到胁迫，但朝廷礼制尚在《开元礼》的权威性也尚在。何况后经宣宗朝，更是处处追羡开元盛世。如果礼典到格式都已（对开元礼）作了重大修改，那么何以文宗以后的历朝士大夫都绝无反响？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二是作了众多修改的服制入敕令，应当是在唐朝完全礼崩乐坏之际。据《新唐书》卷十一《礼仪志》载礼院引《曲台礼》定太后附飨事的具体年代是大顺元（年890），证明唐朝礼令的真正丧失是在僖宗光启以后。这使朝廷对于重大事务处理包括假给制在内，都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中。在这种情况下，设使将《曲台礼》这些约定成俗、于官场民间已有一定基础“新说旧规”一起塞入令式，以应一时之需，其恐怕是不会有、或者是顾不上会有人提出非难的了。而如果真是如此，五代人所说服“制只一本编入假宁令，又不言奉敕编附年月”的问题也许就找到了最恰当的解释。因为乱世应急令式已无规范，又被人在乱世中传抄下去，于是便丢掉了令式始行的年代，也丢掉了令式始行的依据。按照这一逻辑推断，这种可能似乎更大一些。

以上只是根据唐后期五代礼的发展趋势对《新定书仪镜》中丧服图礼制的来源问题作一些揣测。而这一问题与前述丧服图的年代又是相关的。总的结论是，丧服图的制作以及含有相同服制的假宁令不管怎么说已经“属开元后礼”了。它的初行虽可能是在梁唐之际或甚至唐末五代初，但对“新”礼的追溯却至少应始自唐后期。在这方面，贞元元和以后乃至文宗开成以前郑余庆、王彦威等人的变礼活动应被予以充分的注意。正是他们总结开、天以后的礼令制敕，并附之以士民婚丧礼俗，才可能使唐五代的丧服礼仪从民间到庙堂产生深刻的变化。虽然我们尚不具备有充分的证据
以获得确切的结论,但在对年代断限及体制来源的追踪过程中,仍不难发现其中变化的轨迹,从而对唐晚期五代丧服礼制的发展脉落及其变化内涵有一比较清晰的认识。

二、唐五代服制的总体发展与中古礼的定型

探讨唐五代丧服服制的变化过程,涉及到对中古礼制的认识问题。借助丧服图可以了解到,唐前期经贞观、显庆、开元礼的修订,对古士庶丧服礼则作了重大的修改,从而在丧服方面建成具有唐代特色的一代新典。唐后期五代继续沿此发展,但过分背离了古礼原则,故宋初又基本回归开元礼,完成了中古丧服服制的变革。

唐五代丧服服制的变革,是在继承魏晋南北朝变礼基础上完成的。它反映了唐五代人视唐礼与古礼价值等同的观念变化,和追求变革、不断更新礼制的时代风尚与社会思潮。礼制变化的本身,也体现了随着时代发展及顺应民情需要,不断吸收时俗创建新礼的过程。

(一)唐宋之际丧服制发展的再回顾

丧服图所反映的既是晚唐五代礼,那么根据它的内容,无疑可以使我们对这一时期礼制变革之大有充分认识。不过,变礼毕竟是逐渐的。为了认识这次变化的程度和意义,同时了解唐宋之际丧服五服制度变革的总体过程和趋势,还有必要将丧服图的内容与在此期间历次变礼的主要内容再加回顾。前已说明,唐朝在制定
开元礼之前,已有贞观礼和显庆礼。北宋建国后,曾制定《开宝通礼》,宋徽宗时,又有《祭服制度》与《政和五礼新仪》。由于北宋前期朝廷所制丧服礼多已遗失,故本文这里只能将唐代以上数次服制变礼《五代会要》等所见后唐服制及大致可以反映北宋元丰以前制礼的司马光《书仪》相关内容与敦煌杜友晋书仪中的丧服图同列表如下,并与《通典》卷八八至九二《五服年月降杀》所载古周制(实即《仪礼》)相对照,以资比较。

### 表8:中古服制变化表

<table>
<thead>
<tr>
<th>服丧对象</th>
<th>古礼(《仪礼》)</th>
<th>贞观礼</th>
<th>显庆礼</th>
<th>开元礼</th>
<th>丧服图</th>
<th>后唐礼</th>
<th>司马光《书仪》</th>
</tr>
</thead>
<tbody>
<tr>
<td>高祖</td>
<td>齐衰三月</td>
<td>同古礼</td>
<td>同贞观礼</td>
<td>同贞观礼</td>
<td>齐衰三月</td>
<td>同开元礼</td>
<td></td>
</tr>
<tr>
<td>曾祖</td>
<td>齐衰三月</td>
<td>齐衰五月</td>
<td>同贞观礼</td>
<td>同贞观礼</td>
<td>小功五月</td>
<td>同开元礼</td>
<td></td>
</tr>
<tr>
<td>母</td>
<td>父在期(周)</td>
<td>父死齐衰三年</td>
<td>同贞观礼</td>
<td>在同为齐衰三年</td>
<td>同开元礼</td>
<td></td>
<td></td>
</tr>
<tr>
<td>畜母(父妾有子者)</td>
<td>齐衰三月</td>
<td>无服</td>
<td>齐衰三月</td>
<td>同显庆礼</td>
<td>同开元礼</td>
<td></td>
<td></td>
</tr>
<tr>
<td>伯叔母</td>
<td>期(周)</td>
<td>同古礼</td>
<td>同贞观礼</td>
<td>同贞观礼</td>
<td>大功九月</td>
<td>同开元礼</td>
<td></td>
</tr>
<tr>
<td>兄弟妻</td>
<td>无服</td>
<td>小功五月</td>
<td>同贞观礼</td>
<td>同贞观礼</td>
<td>大功九月</td>
<td>同丧服图</td>
<td></td>
</tr>
<tr>
<td>夫兄弟</td>
<td>无服</td>
<td>小功五月</td>
<td>同贞观礼</td>
<td>同贞观礼</td>
<td>大功九月</td>
<td>同丧服图</td>
<td></td>
</tr>
<tr>
<td>兄弟女</td>
<td>在室期(周)</td>
<td>出嫁大功九月</td>
<td>同古礼</td>
<td>同贞观礼</td>
<td>同贞观礼</td>
<td>小功五月</td>
<td>同开元礼</td>
</tr>
</tbody>
</table>

①按:表所列仅包括史料中记载较明确的内、外、夫族五服。有些如庶生母、嫁母、出母等古制有参差而汉魏以来有争议的内容未列在内(。宗子服在《大唐开元礼》中已明确取消。)司马光《书仪》中较开元礼增加缌麻有“如为夫之从父兄弟子之妇”,“为甥之妇”等,因不涉及主要变化未得列入。舅(姑)夫父母由于服制基本相同,故均列为一项。
在前揭章节中，笔者曾经一再说明贞观和显庆变礼的情况。史料记载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制礼之初，仅改隋礼二十九条，但所定吉、宾、军、嘉、凶五礼涉及到礼仪的次序已有变化。《通典》卷四一《礼一沿革一》，但前古以来，凡执礼者，必以吉凶军宾嘉为

① 高明士：《论武德到贞观礼的成立 唐朝立国政策的研究之一》，收入台湾《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1159—1214页。
今则以嘉宾次吉，军凶后宾，庶乎义类相从，终始无黩云尔”，是凶礼的位置已从五礼中一贯的排名第二改为排名第五。然就丧服本身尚未闻有改定之议。变礼是在贞观十四年，才由太宗与颜师古、魏徵、令狐德棻等定议改曾祖父母、嫡子妇、众子妇及舅服，并增加嫂叔服，作为正式礼仪的补充。由于同在贞观年间制定，故我们这里暂将这些变礼的内容，同纳入贞观礼的范畴。

继贞观定礼之后，上于高宗显庆三年（658）的显庆礼，也因长孙无忌所奏改舅为甥服及增庶母服。这些条目与贞观改制及武则天于上元年中提出的父在为母服等变革被《大唐开元礼》全部吸收入内。

《大唐开元礼》于开元二十一年（732）撰成颁下。就丧服礼而言，它使唐前期的新礼则成为定制，从而为礼制变革作了总结。但是如前所述开元礼并不是唐朝变礼的结束。前揭元和十三年王彦威上《曲台新礼》，强调《开元礼》制定至元和法通沿革，礼有废兴”、“贵从权变，以就便宜”；而他与郑余庆等所修礼书或书仪，对于这些新的仪注是作了记载和补充的。因此具体到丧服图所反映的礼制，也应是对此开元以后乃至五代变礼的吸收。前揭《五代会要》卷八《服纪上》载清泰三年左仆射刘昫等针对马缟上疏议，指出在后唐假宁令下”，所司行已多年”而与开元礼不符的服制内容，除“嫂叔服”外尚“有七、八条令式”，可见其不同者尚不止于已见的几条。但这恐怕还不是一种严格和完全的统计，而且即使数量不及丧服图之多，却仍可说明唐后期五代对于服制约束愈来愈小的趋势，这与丧服图是一致的。由丧服图可知，某些服制如嫂叔服、姨舅服等已是在贞观、开元礼的基础上一变再变，而更多的却是贞观、永徽、开元礼所未曾涉及的项目。因此丧服图的最终出现，可
认为是唐初特别是唐中期以来不断变礼的结果。唐五代通过一次次变礼，使丧服礼制距离古礼经的规定要求愈来愈远，并日益脱离其轨范而发展到极致。

笔者已推测丧服图为五代初或梁唐之际的产物。而据《五代会要》卷八记载，后唐朝臣关于马缟上疏，最终的决定“嫂叔服并诸服纪，请依开元礼为定。如要给假，即请下太常，依开元礼内五服制度录出本编附令文”。但是否成为事实不得而知，因不久后唐即为后晋所代。后晋高祖曾下令“应明宗朝所行敕命法制，仰所遵行，不得改易”。那么丧服制度与假宁令是不是也会仍按明宗。所以从史料得知，对朝制办理呢？后汉、后周皆未及改礼而亡于五代混乱礼制的调整还是到了北宋建国以后。前揭《宋史》卷九八《礼志一》记太祖时，所撰《开宝通礼》二百卷，本唐《开元礼》而损益之。当天圣五（年1027）侍讲学士孙奭奏“请于《开宝正礼》录出五服年月，并见行丧服制度，编附假宁令”时，得到批准，也说明此后之服制应主要从开宝礼。朱熹认为开宝礼“多本开元而颇加详备”，全体是开元礼，但略改动。这一点对服制也适用。徽宗大观中又颁定《祭服制度》十六卷，后复修《政和五礼新仪》。前者已佚，后者朱熹评价不高，内凶礼十四卷中亦未见服制记载。据说此书后为《中兴礼书》取代。从《宋史·礼制》及《宋会要辑稿》等书记元丰以前朝臣议服制，所依据者主要为《五服年月敕》《开宝通礼》及与之同时编定的《通
礼义纂》等，亦兼参古(礼《仪礼》《礼记》)及开元礼。其中只见有少数内容的变化，如“子为嫁母”条，据《开元礼》“有父卒母嫁及出期之子为母皆报”服齐衰杖（周期），父卒为父后者为嫁母无服“的规定。而《宋史》卷一二五记景祐二（年1035）朝臣却因郭稹为改嫁之母解官行服事，据《通礼·五服制度》及《通礼义纂》引刘智《释议》提出疑议。时仁宗因朝臣所议诏令“自今并听解官，以申心丧”。这种无分情（况为父后，非为父后）一律听解官行服的做法实际上已不同于开元礼的规定。

此外，前已说“明妇为舅姑”服吸收入五服制度在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又一次提出讨论。《宋史》同卷记此事，引判大理寺丞尹拙言指出妇为舅“姑近代时俗多为重服”和判少卿事薛允中言，此条执行“中用律敕有差”的矛盾。但是最后右仆射魏仁浦等二十一人上奏议为此作了结论：

谨按《礼·内则》云：若事舅姑，如事父母。则舅姑与父母一也。而古礼有期年之说，至于后唐始定三年之丧，在礼为当。况五服制度，前代增益甚多……至今遵行。况三年之内，几筵尚存，岂可夫处苫块之中，妇为绮纨之饰？夫妇齐体，哀乐不同，求之人情，实伤理本。欲望自今妇为舅姑服，并如后唐之制，其三年齐、斩，一从其夫。

“妇为舅姑”服既经此认定，相信后来是正式入于礼制的。除以上两条外，宋人还有嫡孙承重为祖母、子为生母等的讨论，但与《开元礼》似皆出入不大。其余未见有疑难，并贞观、开元礼所改诸条，也可能恰如魏仁浦等所说“是至今遵行”，即基本参照开元礼而未加改动。可见宋初对于开元礼的修改是很少的，以后《政和五礼》相信也大体如此。即今所见南宋《庆元条法事类》卷七十七所载《服
制格》，虽“于 母服”方(面 继母、嫁母、出母、乳母等)有若干补充，但对开元礼之基本内容仍予以充分保留。所以本章前表录司马光《 书仪》服制各条，除妇为舅姑服斩衰或齐衰三年等个别内容，以及甥服兼采古礼和开元礼外，其余大多与开元礼一致，应看作是北宋前期礼制的真实反映。

宋初定礼既基本否定了五代之制而不违背开元礼精神，则宋初的丧服礼制可以认为是开元礼的回归。而由于唐以前士庶内外服制基本上是依行古(礼 主要为《 仪礼·丧服》),所以这一转变又可以认为是中古时代的开元礼终于可以取代古礼经而作为丧服的基本原则立足。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甚至影响到明清。由此唐宋之际丧服礼的变革至宋初可谓告一段落。

(二)礼的发展与唐人的观念变革

1. “三 礼”和 五礼” 礼经与史部仪注之学的分合同异

敦煌丧服图的发现，弥补了唐后期五代礼制之阙，使我们得以对唐宋之际的丧服服制变革作一较为全面的观瞻及回顾，并进而得知在此期间，古礼经所规定的士庶内外族五服制度已经历了从未有过的自内容至原则精神的极大变化。丧服礼制由于这样的变化，完全可被视作是中古史上最大的革新之一。但是，这样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呢?前人在讨论贞观。至开元礼仪变化时往往提出对(郑 玄)、(王 肃)之学的择从问题①。

①金子修一《: 关于魏晋到隋唐的郊祀、宗庙制度》, 载《 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 第337—386页。
丧服礼条的变化能与此联系者很少，而这一点我认为涉及社会的发展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值得注意的是，唐朝距离上古社会已经相当遥远，但是由于礼的延续性，人们在改制之际，仍然常常要“将古礼”作为依据和参考，并“将古礼”与“新礼”进行对比（如前举长孙无忌称“庶母，古礼缌麻，新礼无服”）。这种做法本很自然。但是，唐人是如何看待“由三礼（《仪礼》《礼记》《周礼》）组成的古礼经，以及作为唐代现行礼制的吉、嘉、宾、军、凶五礼”，即当时当代所“谓新礼”、“今礼”，却是问题的关键。而要了解这一点，则必须对唐代以前礼的制作沿革有一基本认识。

春秋之际，礼学由于孔子的提倡而复兴。在东汉以后兴起的以《仪礼》《礼记》《周礼》为内容的三礼研究中，丧服礼逐渐受到重视。由于《仪礼》中《丧服·子夏传》的存在，使有关丧服的研究独树一帜，自汉魏以降，关于丧服礼的研究代有其人，南朝尤甚。故皮锡瑞有“论古礼最重丧服，六朝人尤精此学，为后世所莫逮”之说。这类著作在《隋书·经籍志》中一般说被收入礼经类，计不下五十余种，超过三礼研究著作总数的三分之一。

以汉儒为开先而以礼经为对象的传统丧服研究，是以解经、释经为主要任务和内容的。其书种类虽多，但无不是就礼经本身阐发其微言要义。所追求者，乃是对于经文或先贤传释的确切理解。所以就传统的观念而言，礼经应当是被当作指导现实世界的最高准则和真理来对待的。但是由于古礼玄远而艰涩难明，所以在对古礼研究的同时，历朝各代也均存在着礼经原则与现实世界相脱节的问题。欧阳修在《礼记》记载中提到：“孔子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
《新唐书》卷一一《礼乐志》中指出：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

为说明这一点，他对比了上古时“代宫室车舆以为居，衣裳冕弁以为服，尊爵俎豆以为器，金石丝竹以为乐；以适郊庙，以临朝挺，以事神而治民”，以及上至朝觐聘问、射乡食飨，下至里闾田亩、吉凶哀乐，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礼”；“与后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车服器一切用秦”，及将名物藏于有司”，其朝夕从事，则以薄书、狱讼、兵食为急”。“

三一代礼乐是与当时社会需要结合，作为理想、信仰及价值、行为准则，落实于国家治政，融化于人民生活，而后世礼乐却成为虚设，所谓“事物名数，降登揖让，拜俯伏兴”不过“是礼之末节”，全然违背了以礼治国，以礼化俗的本意，人们已不了解礼乐的本质何在。这是三代前后礼乐的最大区别。

然而三代礼乐没落后，如何解决应时所需诸“如朝觐、聘问、射乡、食飨、师田、学校、冠婚、丧葬”等实用礼仪的缺乏呢？《新唐书·礼乐志》以此回答说”：自梁以来，始以当时所行傅于周官五礼之名，务立一家之言。”

梁武帝天监初制定五礼一千余卷，《梁书》《南史》记传中均有记载。《隋书》卷六《礼仪志一》亦称：梁武始命群儒，裁成大典，吉礼则明山宾，凶礼则严植之，军礼则陆琏，宾礼则贺旸，嘉礼则司马褧。梁武帝制五礼之前，已有南齐王俭制定吉、凶、宾、军、嘉五
五礼虽因周官而名，却显然是针对当时朝廷所需各项礼仪而定。梁五礼其实不过是继南齐之后，进一步将国家各项实用礼仪分门别类而整齐化，并不是历朝制礼的开端。严格说来，类似制礼的方式至少秦汉已开始。据《汉书》卷四三《孙叔通传》，言通上言高祖“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为汉礼，于是高祖使“之遂定仪法，未尽备而通终”。至东汉曹褒，更是慕叔孙通行事，在章帝的授命之下，“之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

曹褒之后，为本朝制礼者代有其人。论者已指出，在此之上形成的五礼体系用于国家制礼实践始于魏晋之际。沈约《宋书》卷一四《礼志》及《通典》卷四一《礼序》均备叙魏晋以降历朝制礼的情况，从中不难得见自“魏以王粲、卫觊集创朝仪”直“至隋文帝（命）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的沿革过程。而与此有关《隋书》卷三三《经籍志》载卫敬（仲宏《旧仪》四卷《中兴仪》一卷、晋成安太守傅瑗撰《晋新定杂仪注》四十卷，及不知名《晋尚书仪》十卷《封禅仪》六卷《宋仪注》十卷等共59部、2029卷，皆隋以前著作。

这里需要提请注意的是，此类礼书虽然是针对某一方面制礼，但从秦汉开始，却均大多标有“仪”或“仪注”之名。这种情况直至梁武帝定五礼仍复如此。《隋书·经籍志》在“《梁吉礼仪注》十卷和《南齐书》卷九《礼志上》，《后汉书》卷三五《曹褒传》，《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的五礼制度化》,《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27—51页。
《梁宾礼仪注》九卷“后注曰：贺旸撰。案：梁明山宾撰《吉仪注》二百六卷，录四十五卷。陆琏撰《军仪注》一百九十卷，录二卷；司马褧撰《嘉仪注》一百一十二卷，录三卷；并亡。存者唯《士》疑衍）、吉及宾，合十九卷。从此中作者名字及其书卷数，与《梁书·武帝纪》对照，知所谓五种仪注即五种礼也。五礼之名，可以别称为仪注。更重要的是，虽然在梁以后，一些为朝廷正式制定的礼仪书籍已“有礼”名，如《陈吉礼》《陈宾礼》及隋牛弘等修《隋朝仪礼》等。但无论是否标有礼名，却一概都被《隋书·经籍志》收入史部仪注类，而不是经部礼类，这是为什么呢？按五礼的入于仪注，涉及学术史的经史分部问题。章炳麟《国故论衡·原经》曾指出“经史自为部，始晋荀勖”。然据《隋书·经籍志》荀勖虽始分四部，且丙（部即史部类）有所谓旧事“、杂事”等，对礼之划分却尚不太清楚。后之目录，或分四部，或“称七志”，关于礼书仍未见有明确划分。惟今存阮孝绪《七录》，“其纪传录”内已“有仪典部”，“与经典录（内含三《礼》类著作）完全分离”后《隋书·经籍志》应即吸收了此种做法。阮孝绪《七录》作于梁武帝普通（中520—527年），也就是说，大体在武帝定五礼以附会周官之名之际，“其三《礼》”、五礼“于学术史上的定位已经明确”：三《礼》“乃礼中之经，而五礼“乃礼中之史耳。单就这一点而言，两者的划分又不仅仅关系到学术史，而且涉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六六，中华书局，第2247页。
及古人对后世制礼的看法。此问题其实已为研究者所注意。姜伯勤曾从书仪出发谈到仪注与礼学的密切关系，并谈到它只能"被 视作经学中礼学的因时制宜的一种变通"的作用。又举卫宏的《汉旧仪》为例，认为仪注内容涉及到五礼操作中制度的细节变化及上书时的语言规范和文字规范①，所论十分正确，但尚不足以回答为什么全部五礼类著作均被收入仪注。因为后世的礼书虽然更重视指 导行为的仪制而不是礼的原始精神，但它们被收入仪注却并非完 全是由于其具体化。礼书的具体化在上古礼中已经存在。钱穆先 生在《国学概论》第一章《孔子与六经》言礼乐时指出"：《论》《、孟》言礼，皆明礼意，著于行事，不在简策。"既注重行事，"则 礼"便从来不能脱"离 仪"而独立。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周礼仪笺注的《礼记》又何尝不能认为是仪注呢《? 仪礼》丧服"的 子夏传"又何尝不 能认为是仪注呢? 仪注与礼在内容上并不一定截然有别。所以， 将五礼类著作入于仪注实际上代表了传统的划分观念，涉及到如 何看待三代以后制礼，如何为全部五礼类著作定性的问题。而在 这一点上，姜先生关"于 因时制宜的一种变通"的说法似乎更接近实 质。对此《隋书·经籍志》作者有关仪注类著作的一段议论也叙述甚 明。其文在概述仪注之兴对"于 上下亲疏之别"、进止威仪之数的 意义及三代典章兴废和叙叔孙通、曹褒等定朝仪、汉仪下继曰：是后相承，世有制作。然犹以旧章残缺，各遵所见，彼此 纷争，盈篇满牍。而后世多故，事在通变，或一时之制，非长久 之道，载笔之士，删其大纲，编于史志。而或伤于浅近，或失于 ① 姜伯勤《: 唐礼与敦煌发现的书仪》,载氏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礼乐篇 上编,第425-427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未达,不能尽其旨要。遗文余事,亦多散亡。今聚其见存,以
为仪注篇。

从这段议论中可以看出《隋书·经籍志》作者的思想。按照所
述观点,历代所作五礼,无论其怎样相关朝廷体制,却只不过是赖
以"补旧章残缺"和各执己见"的通变之宜"或一时之制,非长久
之道,也就是说,由于一味适应现实而存在着临时性及不确定性。
它们"既浅近"而"未达",便只能备当代之需,不足为万古之训,从
而与作为一贯和根本指导的礼经有着决然不同的体用之分。它们
的出现,只有"史"的意义,而无"经"的价值,是不具有如同"三
《礼》"那样永久权威性的。所以,它们才被列入所"谓仪注",被作
为具体的指导而不是原则的纲常来对待。这是《隋书·经籍志》作
者的看法,也代表了儒家的传统观念。

大约正是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宋儒欧阳修、宋祁等在《新唐
书·艺文志》中,也将诸如赵彦深《北齐吉礼(》七十二卷)、高颎等
《隋吉礼(》五十四卷)、牛弘、潘徽等所撰《隋江都集礼(》一百二十
卷)和唐朝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徵等撰《大唐仪礼(》一百卷),长孙
无忌、许敬宗等撰《永徽五礼(》一百三十卷),武则天《紫宸礼要》
(十卷),萧嵩等撰《开元礼(》一百五十卷),韦渠牟《贞元新集开元
后礼(》二十卷),王彦威《元和曲台礼》《曲台续礼(》各三十卷)等
官修与其他五礼类书籍完全入于仪注。

但是,也应看到,恰恰是在将五礼类书籍入于仪注的同时,唐
五代人的观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非常有趣且值得重视的一件事
是,我们若将《旧唐书·经籍志》与上述两书志作一比较,便会发现
其中的微妙差别。因为《旧唐书·经籍志》虽然也有礼经类和仪注
类著作之分,但却将当时三部隋唐重要的官修礼书,即隋炀帝时代
《旧唐书》的《江都集礼》、房玄龄《大唐新礼》与武则天《紫宸礼要》与其他五礼类书籍完全分开，而将它们赫然置于礼经类著作的最末。这样的一点小小的不同或会被认为微不足道，是五代修书史臣在不经意中所发生的混乱。但是，它却分明向我们透露出这样一种信息，那就是《旧唐书》的作者们对待隋唐礼书与礼经的看法，似已不像前二者那样有明显的界限。而如进一步检索，还会发现问题其实并非真的出在五代人身上。因为《旧唐书·经籍志》所载并非五代所修官藏书目。据《旧唐书》卷四六该志序曰，玄宗时曾整理内库图籍，至开元七年，诏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及四部书成，九年十一月，殷践猷、王惬、韦述、余钦、毌煚、刘彦真、王湾、刘仲等重修成《群书四部录》二百卷，右散骑常侍元行冲奏上之。自后毌煚又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唐后期虽又对图籍屡加搜求，但仍复散失。所以《经籍志》称：今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以表艺文之盛。是《经籍志》所录乃开元书目。《旧唐书·经籍志》所录既开元书目，则反映的自然也是唐人分类观念。其时《开元礼》尚未修订，但唐人既然将本朝皇帝主持定立的《大唐新礼》《紫宸礼要》及与本朝制礼有着直接渊源关系的隋《江都集礼》放置于三《礼》类书籍之内，那就显然不是简单的抬高，或偶然的混淆，而是摆明了要将两者加以并列。对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开元礼》的修订来作证明。①

①《旧唐书》卷四六，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975页。

睿《北②关于唐礼与隋《江都集 周后期至唐初礼制礼》的渊源关系，参见史 的变迁与学术文化的统一》《，唐研究》第三卷，1997年，第171页。
《新唐书·艺文志》在《开元礼》一百五十卷下注曰：开元中，通事舍人王_transport_请改《礼记》，附唐制度。张说引喦就集贤书院详议。说奏：《礼记》，汉代旧文，不可更，请修贞观、永徽五礼为开元礼。"命贾登、张烜、施敬本、李锐、王仲亚、陆善经、洪孝昌撰辑，萧嵩总之。

这段记载是修开元礼的缘起。文字在《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一（》亦概见《通典》卷四一《礼序》)略有不同：为礼仪使，开元十年，诏国子司业韦转运掌五礼。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喦上疏，请改撰《礼记》，削去旧文，而以今事编之。诏付集贤院学士详议。右丞相张说奏曰："《礼记》汉朝所编，遂为历代不刊之典。今去圣久远，恐难改易。今之五礼仪注，贞观、显庆两度重修，前后颇为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与学士等更讨论古今，删改行用。"制从之。

两处记载都未讳言王喦请删改《礼记》，附以唐礼的请求。《礼记》虽为汉儒所传，但"为历代不刊之典"。而面对这样一个无异于向礼经权威挑战的大胆提议，张说虽然不赞成，却毕竟采用了重修五礼以取代《礼记》旧文的做法。这说明，在一些唐人的心目中，朝廷新修礼仪不仅在现实行用中可以取代古礼，而且在本质和意义上与古礼已经区别不大。

《大唐开元礼》修成后，一种说法是当时只令宣示中外，后来也未有明诏施行。但据《旧唐书·礼仪志》，是修成的开元二十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年九月,"已 颁所司行用焉"。相信所"谓 未有明诏施行",只是未能
像律令那样,下制使全国百姓一律服从。对于《 开元礼》,史家曾有
" 由是唐之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用之,不能过也"的评价①,因此
在它颁布的同时,对国家政治和民生的影响已不能低估。前揭杜
友晋《 新定书仪镜》"中 新人"以前之制基本同于开元礼的情况对这
一点已经可以说明。

事实上唐后期国家还试图通过科举考试来加强开元礼的实用
性及权威性。德宗贞元二年( 780)将开元礼正式列为举选科目。
《 唐会要》卷七六《 贡举中》载其年六月十一日敕称:
开元礼,国家圣典,列圣增修。今则不列学科,藏在书府,
使效官者昧于郊庙之仪,治家者不达冠婚之义,移风固本,合
正其源。自今已后,其诸色举人中,有能习开元礼者,举人同
一经例,选人不限选数许习。但问大义一百条,试策三道,全
通者超资与官;义通七十条,策通两道者放及第;已下不在放
限。其有散官能通者,亦依正官例处分。

唐德宗时将开元礼列为学科,是为了"将 国家盛典"向朝廷和
社会普及,使之作为齐家治国之准则。同卷并记贞元九年五月,朝
廷又"将 三《 礼》"从明经中分出,也单列为举选科目,同时规定":其
习开元礼人,问大义一百条,试策三道,全通者为上等,大义通八十
条已上,策两道以上,为次等,余并准三《 礼》。"" 余并准三《 礼》"表
现为习学待遇、考试标准大体一视同仁,无分轩轾,而且事实上也

①  参见《 旧唐书》卷八《 玄宗纪》,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98页《; 新唐书》卷十一《 礼
乐志》,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09页。
是年满之日，一例授。开元礼既受到这样的重视和刻意发官，扬，则在唐人心目中的意义，也“非仪注”一词可以概括。唐人对于本朝礼的尊崇，理所当然为五代人继承。《旧唐书·经籍志》的记载表明五代人并没有对唐人将本朝五礼入经的做法提出异议。《旧唐书》领衔作者是后晋史臣刘昫，但这部书自后唐时已开始编修。后唐奉唐为正朔，后晋承后唐制度，采取这样一脉相承的做法本不奇怪，而在礼制思想上的认同也早在清泰中朝臣马缟上疏时便体现出来。前揭《五代会要》卷八《服纪》记刘昫等在关于嫂叔服及其他令式与开元礼相违者，所司行已多年，固难轻改的议论下复曰：若当议事，须按旧章。今若鄙宣父之前经，紊周公之往制，隳太宗之故事，废开元之礼文，而欲取差误之近规，行编附之新意；称制度且为大典，言令式又非正文，若便改更，恐难经久。臣等集议，嫂叔服并诸服纪，请依开元礼为定。这里，开元礼显而易见已是五代人取则的标准，而“且隳太宗之故事，废开元之礼文”竟与鄙视淆乱周公孔子的往制前经混为一谈。可见，唐礼与古礼经价值等同的概念在五代人是更其明确。将原本应列“为仪注”的本朝之礼等同礼经至少，唐五代人表现出的是如此。这无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其时人们的观念之变。关于这一点，下文还将进一步说明。而我认为，它正是唐朝变礼的思想基础。

①李锦绣《唐代教育史中的几个问题》《文史》四十四辑，中华书局，1998年，第137—139页。
唐五代丧服礼制虽然发生了极大变化，但“三礼”所代表的上古三代礼既然被作为我国古代社会的理想蓝图与治国纲领、原则存在，那么它的行用便具有一定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任何礼则及观念的变化都不可能是一朝一夕产生。且虽“然三礼”研究强调师古，“而五礼”修订强调为今，但两者之间并无根本的对立和矛盾；反而是一而二，二而一，互为依托，相附相承。唐五代的丧服礼便是千百年来对于礼经的继承与沿革。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曾提出隋唐之礼概出南北朝三源，及唐贞观、显庆、开元礼一脉相承之说，此就继承而言；但既出三源，则也必然承袭其中的变化。那么具体到丧服礼魏晋以降都有哪些变化呢？对照古礼（经《仪礼·丧服》），我们可发现除了前揭服制变化表中所列条目，还有如“诸侯为天子”“臣为君”“公士大夫之众臣为君”这样一些涉及西周春秋王公卿士贵族等级制以及有关妻妾、嫡庶的一些内容也已不见于开元礼，它们在贞观十四年改定服制时根本未见提到，说明在唐初定礼时原本就是没有的。对照开元礼，可知有些是被取消，有些是被归（并如公卿、大夫同于士，妾同于妻、庶同于嫡等），应当是在隋以前就被解决了。它们的解决，涉及汉魏以来士大夫的种种争论，并关系到皇帝丧礼渐“进权制”，和王侯宗室服制渐同士庶等问题，对于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但由于与士庶礼改革相关不大，故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内。至于士庶丧服制本身，则只要是礼经规定明确的，正式订礼一般改动甚少。但涉及礼经规定不甚详明，却又较为敏感的问题，如与“母”有关的诸如嫡、庶、慈、继、嫁、出、乳、所（后承嗣）母服制的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处理，即往往成为礼家争执不下的焦点，或因皇帝制令而予以修改。这些固然反映了出身不同的士大夫的要求，并已为后世改礼预留余地，但毕竟于礼经本身尚触动不大，且私自违礼尚要受到处罚。这就说明从上古发展而来的丧服礼，在魏晋南北朝之际所完成的基本上还是自贵族等级制向着士庶礼的统一，其做法也只是调和而非直接的非礼改经。

尽管如此，某些关于士庶礼问题的提出和争论也还是值得注意。其中比较突出的即是姨舅服与嫂叔服。姨舅服属外亲，古礼规“外亲之服皆缌”“当此以名加也”，又别为姨服小功，“是以尊加也”。古呼姨为“从母”，姨以故与舅服不同。《通典》卷九二记晋袁准为此提出批评说：“从母小功五月，舅缌麻三月，《礼》非也。”“舅之与姨，俱母之姊妹兄弟，焉得无服！”认为姨被“称从母”，“是以假转乱而遂为名者也”。

嫂叔服比姨舅服引起了更多的争论。本书第十二章在讨论时曾指出，《通典》卷九二引魏太尉蒋济《万机论》关于《礼记》嫂叔服有误；及曹羲、袁准、成粲等也认为“何独不可缘亲而服嫂”，“和长嫂少弟有生长之恩”、“嫂叔大功可得而从”等议论。但对其说历代多有非议。刘宋庾尉之批评蒋济、成粲“排弃圣贤经传，而苟虚树己说，可谓诬于礼也”。今论者已指出其时变礼之论与玄学清谈或不无关系，更反映了士大夫任诞不羁，不遵礼法与当时社会缘情制礼的一些要求。这些要求加上某些违礼逾制的①见《晋书》卷七一《卞壶传》及《通典》卷九四《父卒继母还前继子为服议》，并见神矢德子《晋时代违礼审议 严礼主义的性格》，东洋学报68卷3、4号，1987年。

②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7—435页。关于六朝变礼与玄学清谈的关系，余英时认为并非出于谈辩名理的兴趣，而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门第社会的一些实际问题。
实际做法，使礼经的权威性无疑会产生进一步动摇。尽管它们在当时朝廷议礼的过程中还只是一股暗流，对后世的影响启发却不容低估。清人《玉函山房辑佚书》有《丧服经传袁氏注》一卷，提到袁准另著《袁子正论》，列儒家，虽非本注之文，而发明丧服议，实出一人之手，而自成一家之言。又指出其嫂宜有服之说，即蒋济《万机论》以娣姒报妇为嫂叔服之证言。此说与其关于继父服、乳母服和姨舅服等的种种议论及批评，皆不免勇于臆断，开后人改经之渐。

“改经之渐”四字可谓一语中的。从根本上说，魏晋人并没有能够对士庶丧服制的礼则作正式的修改，却把这一任务留给了后人。但正是在以上事实及观念渐变的基础上，才迎来了唐五代丧服礼的真正改观。变礼的最初主持者，就是唐太宗，应当说，太宗是能够对礼经公然提出批驳，并使之落实于朝廷正礼的第一人。前述贞观十四年太宗示意所定嫂叔、舅、嫡子妇、众子妇诸条无一不是对礼经原则的重大修改。须知道的是，这次礼则的改变已不仅是针对皇家礼仪，也不仅是填补经传中空白模糊之处，而是涉及那些在士丧礼中明白无误的千古礼条。唐太宗在提出上述问题时，曾直截了当地指斥礼经的规矩“理为未得”，而魏徵、令狐德棻等在此授意下，也公然说古礼姨舅服“是循名丧实，逐末弃本，盖古人之情，或有未达，所宜损益，实在兹乎！”又嫂叔服，更是“因上无哲王，礼非下之所议，遂使深情郁乎千载，至理藏于万古”。品味其意，岂止是宣称自我做起，简直是将改礼视作对古礼谬误的纠正，对古来被埋没的真理的发扬。这就比前人常言的“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更进一步。
因此丧服礼在贞观时的修改重定，事实上是真正地破了非礼改经之戒，特别是在内外（妻 夫）服制方面，可以说是打开了变通之门，这应当是礼制发展中的新突破和质的飞跃。此后显庆礼、开元礼也正是沿着这一趋势走下去，在继承魏晋南北朝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新特点，使大唐帝国建立了万象更新的一代礼典。

不难想像，在开元礼制定的前后，虽然还有一些援引古礼以非今制”，事不师古，有伤名教”、何以祖述礼经”之类的议论，但终于被君”臣 取类新礼，垂示将来，通于物情，自我作古”的宣言所淹没。而自此以后，扬古斥今的议论愈来愈少，所以至元和十三年王彦威上《曲台新礼》时，对于这部书所集仪制”，不惟与古礼有异，与开元礼已自不同矣”的自我标榜，更说明唐人是以变礼为骄傲，是主张古为唐用而绝不以标新立异为嫌的。变礼、违古的合理性被全社会所认同，并逐渐取代古礼指导现实而无疑义，这在唐代与前朝自然不能同日而语。

唐人对于非礼改经的认同以及不断更新的要求是其制礼颁礼过程中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实。它与前”述 礼经与史部仪注之学”中所论及的尊崇本朝礼的价值观念也是相符合的。然而唐人为何会如此呢？若追究此点可以认为开放的大唐社会本身即存在着反传统的空气。朱子曾"谓 唐源流出于夷狄”，夷狄者，重母家，且不设男女、嫂叔之防。出身既杂胡夷血统而又深受胡汉文化双重影响的唐朝统治者如唐太宗，在面对所谓姨舅服、嫂叔服等一些特殊问
在改礼时便更容易摆脱旧儒家观念的束缚。不过改礼不是简单的修改具体礼则而是向传统的权威挑战,此点最终能够被朝廷士大夫及社会所接受,并且使变礼之风在唐中期以后愈演愈烈,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谈及此点,我认为即不能忽略当时的社会思潮与学术取向。

《旧唐书》卷一八九下《儒学下·王元感传》：

长安三年,表上其所撰《尚书纠谬》十卷《、春秋振滞》二十卷《、礼记绳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经》《、史记》稿草,请官给纸笔,写上秘书阁。诏令弘文、崇贤两馆学士及成均博士详其可否。学士祝钦明、郭山恽、李宪等皆守先儒章句,深讥元感掎摭旧义,元感随方应答,竟不之屈。凤阁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几、右史张思敬,雅好异闻,每为元感申理其义,连表荐之。寻下诏曰："王元感质性温敏,博闻强记,手不释卷,老而弥笃。掎前达之失,究先圣之旨,是谓儒宗,不可多得。可太子司议郎,兼崇贤馆学士。"魏知古尝称其所撰书曰："信可谓五经之指南也。"

案:王元感乃武则天朝四门博士,曾提出三年丧礼应服三十六月,而反对汉儒的二十五(月 大祥,至禫为二十七月)之说,遭到张柬之驳斥,未能实行。但观其义及所上书名为"纠谬"、"绳愆",知所"谓 掎前达之失,究先圣之旨"目的明确。故陈寅恪先生曾将其与(谈)助、赵匡、陆质等人同称为唐人"的 解经别派"。此别

①见《新唐书》卷二○○《儒学下·王元感传》,第5666—5668页；《唐会要》卷三七《服纪上》长安三年条,第679—80页 。
②王永兴、李锦绣整理《: 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之部》,中华书局,1989年,第208页 。
虽然并非完全是一回事,但从反传统的意义上却显然不无相通之处。而王元感由于受到魏知古、徐坚、刘知几等大儒支持,申理其义,连表荐之,甚至被举为五经指南,知在朝廷上是颇有号召力的。他挑战前贤的思想观点既然能被有声望的正统学者所接受,由此也就不奇怪竟会公然怪,为什么开元中王请改《礼记》而不以为忤了。

解经别派的批判意识不仅在唐前期广有市场,且其思想也通过啖助、赵匡、陆质等人延传到唐后期。从前章论敦煌社会实行三十六月而不是二十七月来看,他们的某些理论在民间也有实践和基础,所以别派的兴起并不奇怪。《新唐书》卷二○○《儒学下》称:‘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诎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曰'孔子意也’,赵、陆从而唱之,遂显于时。’啖、赵、陆等的思想影响并不下于王元感,而且从史料看属于这一派别的不是几个人而是一批人。同传还介绍说:‘大历时,助、匡、质以《春秋》,施士匄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茞 据《唐国史补》卷下及《唐语林》卷二,应“为裴茞”之误)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而士匄、子陵最卓异。’施士匄《春秋传》,文宗以为是“穿凿之学,徒为异同”;仲子陵“以《通难》示诸儒,诸儒不能诎”,可见也均“为别派”。

关于解经别派批判前达,实开宋儒之先河的意义已为陈寅恪先生所指出,近年多有学者论述其学术与新儒学运动及唐宋新春秋学的关系。
用。而此派活跃的本身即反映了学术空气的自由，反映当时的社
会思潮从根本上就是不排除异己和赞同推陈出新的。虽然“解经
别派”主旨在解经，但解经与当朝制礼不可分。十分具有讽刺意
味的是，如对比《新唐书》卷五八《史部·仪注类》所列诸家新礼新仪，
其书卷五七《经部·礼类》的最末正排列着诸如王元感《礼记绳愆》、
陆质《类礼》之类批注古礼的经典著作。则此新旧、破立之间的关
系，岂非可以从中获得启发吗?

从史料还可以得知，某些“解经别派”或新儒家、礼家事实上也
已参加了本朝的制礼及政治活动。如前述之裴茞，据敦煌S.
6537V郑余庆撰《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序所说，即在与之“共议时
用，要省吉凶礼仪”的同僚之(内裴官衔司勋郎中)《。新唐书·艺文
志》也记裴茞有《内外亲族五服仪》。除裴茞外，在郑氏书仪所记议
礼者中，还“有中书侍郎同(评平)章事陆(贽?)”和“司门员外郎韩
愈”。韩愈作为古文运动的提倡者和新儒家的开创人物固为人所
共知，“而陆贽”者或认为即陆质之误记。因官名不符，此处姑置不
论。然陆质作为一名激进人士参与制礼并活跃于贞元、永贞政坛
也是事实《。旧唐书》卷二八九下本传言其原名陆淳，“因
素与韦执谊善”，故于顺宗即位后被征为给事中、皇太子侍读，并因避讳改赐
名质。曾因入侍，而为执谊“潜伺(上即宪宗，时为太子)意”，遭到
怒斥”，质惶惧而出，未几病卒。《“资治通鉴》卷二三六贞元十九年
(803)亦载王叔文“密结翰林学士韦执谊及当时朝士有名而求速进
者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定为死
友”。可见他是永贞革新集团内的重要人物而与二王、刘柳辈意气
相投。由此也说明唐后期解经别派的追求学术文化更新及礼制变
革，与激进的政治革命都是互不可分，而具有连带关系的。这一革
新的潮流迎合朝廷加强礼制的需要，事实上成为朝野人士的共识，以致虽然后来二王集团失败，也不会影响到变革本身。因此，礼制的变革所体现的实在是时代政治、社会观念之变，它顺应着封建王朝统治之兴衰，与阶级升降、门阀制式微、科举制勃兴等诸多因素转相结合，所起到的作用正是开宋人之先河，‘是开启赵宋以降新局面’的①。

不过，这里说到唐五代礼与宋礼的关系，有一点尚须明确，那就是社会观念的变化虽然促进了丧服礼制的改革，但具体到唐代的开元礼与五代礼尚有不同，即开元礼上承显庆、贞观和隋礼，“谓唐礼不亡则隋礼犹存”，它对由隋礼因袭下来的古礼经仍有基本的继承，其所改礼制仍有限度。而五代礼受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其变化已脱离了开元礼的规制，并有着完全从俗制礼的特点（详下）。所以它毫无约制的内容既不是‘掎前达之失，究先圣之旨’的解经别派的初衷，也不可能被复古维新的宋代新儒家和后来的理学家所接受。欧阳修作《正统论》，将五代之君归为贼盗之属，作《新五代史·冯道传》“以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作为对五代国家道德之评价。司马光也对此加以发挥，指出“天地设位，圣人则之，以制礼立法，内有夫妇，外有君臣”是“人道之大伦也”，苟或废之，乱莫大焉。他们“正人伦”的看法很有代表性，而五代礼法即因此被作为乱世之法予以取缔亦自不待言。

①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96页。  
②《新五代史》卷五四，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11页。  
③见《欧阳永叔文集》卷六六，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简编本。  
④《资治通鉴》卷二九一显德元（年954），中华书局标点本，第9510—9513页。
上面已谈到，丧服礼的滥变趋势即由宋人所遏止，表现在《新唐书·艺文志》也是“在仪”与“礼”的分类方式上完全采取了传统的做法。但宋人“虽复古”，关于丧服礼却仅恢复到开元礼为止。朱子语类》卷八四记胡叔器问四先生礼，朱子答曰”：二(程 程颐、程灏)与横(渠 张载)多是古礼。温公则大概本《仪礼》而参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温公较稳，其中与古不甚远，是七、八分好。”此语被《书仪》的评价。但结合前揭朱熹《四库全书》用作对司马光关于开元礼和开宝礼的说法，又可以认为是对后二者的评价。因为就丧服礼制而言，所“谓今之可行者”，应当就是开宝礼吸收开元礼改革的内容。时代变了，无论从精神内容、实际操作，完全的复古都是不合乎潮流的。开元“礼与古不甚远”而能够参合古今，最合乎儒家所谓中庸之道，亦最能够与变化中的中古社会体制观念取得一致，这大约就是它最终能够取代古礼而被宋明专制皇朝作为朝廷正礼的最主要原因吧。

(三)唐五代的“正礼”与“时俗”礼乐昌明是时代兴盛的象征。自古以来，礼的制定也从来是在国家强大或政权相对稳定之际。制礼的目的无一不是为了提高中央集权的威望，这一点汉高、光武、梁武帝都不例外。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的修礼，虽都有其私心及特殊的政治目的，但以帝王权威定难决疑，以今非古，以今代古，没有强盛的国家政权则做不到。订礼改礼固然常常出于帝王意志及朝臣礼官之反复论议，然而与古礼不合的内容依据何在呢?尽管太宗、玄宗修订礼仪均欲显示大唐威仪，但礼则的提出并不可能凭空杜撰。更何况礼的实
行需要落实于国家制度与人民生活，它的权威性持续性不能否定。礼则如突然改变如何能被社会所接受呢？或者换言之，改礼的基础究竟何在？

《旧唐书》卷二七《礼仪志七》载侍中魏徵、礼部侍郎令狐德棻奏议曰：

臣闻礼所以决嫌疑，定犹豫，别同异，明是非者也。非从天降，非从地出，人情而已矣。夫亲族有九，服术有六，随恩以厚薄，称情以立文。

同书同卷记龙朔二(年 662)八月所司奏，司文正卿萧嗣业嫡继母改嫁身亡，请申心志，既而有敕曰：

虽无嫡母，终是继母，据礼缘情，需有定制，付所司议定奏闻。

《唐会要》卷三七《服纪上》载上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武则天上表请“定父在为母服三年”曰：

夫礼，缘人情而立制，因时事而为范，变古者未必是，循旧者不足多也。

“称情以立文”“缘情而立制”是改礼的借口，但它可以说明顺从“人情”在制礼中的需要。所以礼与人情不可分，人情向来是制礼的一个依据。但是人情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社会发展了，人情也要变，于是久而久之，便形成为不同于礼的所谓“末俗”“时俗”，即国家正式礼制之外的俗礼。这种情况古已有之。如前章所举《晋书》卷二○《礼志中》记太常车胤两次上言论当时王公卿士“庶子为后”者不行礼”经庶子为母服缌麻三月“的规定，而“是各肆私情，服
其庶母，同之于嫡”，顷年以来，各申私情，更相拟袭，渐已成俗。车胤以为，“此末俗之弊，溺情伤教，纵而不革，则流遁忘返矣。"纵而不禁，则圣典灭矣。”流遁忘返”、圣典灭矣"的结果是末俗"终将影响国家体制。晋宋之际皇子们的做法，迫使朝廷不得不一次次改礼，最终将三月、九月之服改从一年、三年之礼，使庶侔于嫡，贵贱无别，虽然这并不合乎古礼精神。嫂叔服与姨舅服的疑惑在人们头脑中也是长期存在的，上面所提到的魏晋以来关于嫂叔无服的批评就"是 缘情制礼"在社会现状中的反映。不过所谓缘情制礼在最初恐怕还主要是影响民俗或俗礼，而俗礼入正更多还是在唐五代，从敦煌书仪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前已述明，P.4024的" 丧服仪"中" 孤叔为( 嫂)期"的内容与唐初礼及古礼是不相合的。在基本符合唐初礼的内容中加进了这些不合的礼条，只能认为是书仪在基本采用朝廷正礼的情况下，也吸收了俗礼的某些成分。这样来解释，还有S.1725中所"见 妇为姑( 妲 翁)斩衰三年"的丧服"。妇为舅姑"，在古礼和开元礼都规定服齐衰期。但是我们在上面已引述过《 宋史》卷一二五关于朝臣议妇为舅"姑 近代时俗多为重服"以及准敕"定 舅姑之服斩衰三年"的记载，都提到"了 近代时俗"和 今时俗"不按礼制的问题。具体的实例还见于《 唐代墓志汇编》开成○一七《 唐前左金吾卫录事参军崔公慎经夫人陇西李

余英时提出嫂叔服所以在魏晋时代成为问题，与汉末以来累世同居的风气流行有关。他还举例说明由于玄学家提"倡 称情直往"的风气渗入礼法，所谓缘情制礼便成为礼学方法上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和依据。见《 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1—435页。
氏墓志铭并序》称道墓主"夫人以柔闲慎淑闻于家,年十三,归崔氏,奉舅姑修萍藻事,闺阃之德,称于姻族。明年以舅司空公师淮南,夫人随夫侍行,未周岁,有姑之丧,服纪哭踊之宜,无亏于孝道,再期之制未没而司空公即世。"墓主崔夫人李氏死于文宗大和七年(833),此前曾随夫为姑"行 再期之制",即服三年二十七月丧。崔、李都为大族,李氏之服大概不仅由于孝道,也是"因 时俗"特别是大族都行此礼。

书仪在基本依据朝廷正礼的前提下,也会不断地吸收一些民间俗礼,说明这些俗礼是长期存在的。《全唐文》卷六二七吕温元和中《代郑相(公余庆)请删定施行〈六典〉、〈开元礼〉状》便提到了当时百"姓丧祭冠婚,家犹异礼"的情况。家犹异礼"自然"是缘情制礼"的产物,而俗礼和正礼既同时被书仪汲取复推向民间,也足见民间在执行丧服礼时,就是二者兼行的。所以俗礼自然也就具有相当的市场和影响力,特别是书仪作为普及社会的礼书,修书者一般均是世有阀阅的士大夫。其所行之礼不仅代表了庶民,更反映了士大夫对俗礼的重视和承认。这样久而久之,便理所当然地造成了修改礼仪的要求和需要。

从书仪还可以看出,国家礼仪不但通过律令,也通过这类礼书来影响民间。但礼只是指导原则而非律令,所以在不影响制度的场合,民间就可以按所"谓 时俗"、人情"来办事。这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便形成两者兼存并蓄、相附相依的条件。最终,某些俗礼也就成为正礼。不过,正像我们上面已经谈及的,从唐前期书仪所见之俗礼是不多的,而开元礼更说明俗礼人为正礼的内容数量也是有限的。这也表明国家礼仪指导民间是比较规范,比较有权威性的。
但是杜氏《新定书仪镜》中丧服图所表现的却是俗礼入正愈来愈多的情况。当然从以往的惯例看，我们所举出的十多项内容不见得都是五代正礼，其中可能还有一些仍属俗礼或时俗范畴。但这同样反映“日益不受正礼约束的倾向。俗礼的大量入时俗正，及书仪所反映的民间习俗愈来愈脱离正礼的情况，一方面说明唐五代国家动荡之际，礼作为国家权威象征的作用下降了，所谓“礼崩乐坏”不过是国家政治影响礼俗和人民社会生活的一个结果；另一方面，世族制较前更明显、更迅速地衰落，士庶界限模糊，一些原来较传统的标准、理念进一步被破坏，礼则的制定便带有愈来愈多的随意性。时俗支配礼制的成分增加，这应当也是其时礼制变迁更深层次的原因。

从唐五代丧服的俗礼入正，我们还可以发现丧服变礼的某些特点和趋势。丧服制度是以血缘的远近亲疏为标准、为中心的，所谓“随恩以厚薄，称情以立文”)魏徵等语)，是离不开这一层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唐开元礼》不但按亲疏尊卑划分服制，而且在每一类服制中，都引申古义“正服”、“义服”、“加服”、“降服”来区别其间的关系”。正服”、“义服”的区别未见于《仪礼》，但见于唐贾公彦《仪礼·丧服》义疏。其始于何时尚不得而知，但唐人以之区别关系和性质显然有助于执行服制的程度。就四种服中的前二种而言，正服除继母、慈(母此二种以与父的关系而加)外，基本上均是内外直系血亲或血缘关系较近者。如祖父母、父母、伯叔姑、兄弟姐妹、子女、外祖父母、姨舅等。而义服则大多是非血缘关系或血缘关系较远不正者，如夫妻、舅(姑公婆)继父、妯娌、嫂叔、伯叔母、同母异父兄弟姊妹等。从本书所列丧服变化表来看，正服有变化者在全部二十三(项不计高祖)中只占十(项曾祖、母、兄弟女、嫡孙、庶孙、
曾孙、外祖、舅父、姨母、外甥),在丧服图不同于开元礼的十八项（实为十六项,应除去高祖、曾祖)中正服所占比例更小,说明非血缘关系的变化余地和机动性似乎更大一些,执行礼制也就更灵活些。

此外如仅分析丧服图,可以看出它针对开元礼的变化有两种,即一种是服制超过开元礼规定,此可称为丧服逾制或增制,其中如姨舅服、舅姑服、嫂叔服、外祖服、妻父母服、女婿服等;另一种情况恰好相反,是服制低于开元礼制度,此可称为丧服降制,如孙服、伯叔母服、夫伯叔母服、夫侄及夫侄妇服等。其中孙服已知在三件写（卷P.3637、P.3688、P.3849）中或作小功五月,或作大功九月。按据前揭S.1725文书所载前一部分礼制中有“孙为祖父母齐衰期”条,下注曰:“祖母为嫡孙服大功,庶孙服则小功。”则与丧服图似比较一致。因此我怀疑俗礼也早就是如此。比较两种情况,除个别条(目 如曾孙相对曾祖,亦由缌麻增至小功),就长少之间而言,为长辈服丧逾制增制者(多 如姨舅、舅姑、外祖等),为少辈降制者多(如孙、夫侄、夫侄妇等)。就男女之间而言,在对等的情况下,则是为女性降制者(多 例如舅、姨虽同加至大功,但姨却有在室与不在室之分,是姨服反低于舅;又如伯叔母自期服减为大功,夫伯叔母竟从大功减至缌麻,与此同时伯叔与夫伯叔却未曾减少;侄服期不变,但兄女即侄女却降至小功五月)。因此前者可说是反映了社会尊老敬(长 其中也有唐前期改制的影响)的习俗和心理,而后者则说明了妇女地位的相对降低。尤其是后者,结合妇为舅姑服三年终成正礼,即妇女为公婆服丧超过娘家父(母 女出嫁为父母降服齐衰期),加上为女婿服从缌麻改小（功 虽然同时男子为妻父母也改服小功对等),都反映了夫权的加重。夫权加重、妇女地位下降是
唐宋之际的明显变化，丧服礼顺从这一趋势，从敦煌丧服图也得到了印证。

总括上述，可以看到唐前期由于贞观、显庆和开元礼的制定，在士庶丧服制方面已有了自内容至原则的变迁。这一变化在唐后期五代继续扩大，以致与古丧服礼的规定面目全非。至宋初方加以整顿，最终基本恢复而略同开元礼则，从而完成了中古丧服服制的变革。

唐五代丧服礼的改革，体现着君主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也体现着唐朝在全面继承综合南北朝文化传统之上的革新精神。但礼的变革也与民俗不可分“缘情制礼”曾经是魏晋士大夫的追求，因此俗礼“、时俗”与正礼长期并存。唐朝在变化过程中已有引俗入礼的成分，而五代则进一步将俗礼取代正(礼 古礼)。正礼、俗礼在时代变化下的不断结合，导致礼进一步庶民化，由此也成为唐五代礼形成之最大根源。

礼，作为时代民族的精神寄托与象征，作为统治者的治国原则与为国民树立的行为规范，它的发展的一切细微方面，无不体现了时代的精神特色。研究这些细微的变化，对于它的背景给以恰如其分的解释，我们就会对传统的历史文化有多一分理解。这是研究古代史所必须，也是敦煌丧服图给予我们的启示。

三、附: 唐前期丧服改礼中的帝王意志与北朝风习

以往人们在讨论唐代礼制变革时，大多都注意到唐初改礼吸收南朝礼仪的成分。但是，在南北朝统一基础上形成的唐朝的礼
仪文化并不是单一性的。如综合观察唐朝变礼的具体背景,有一个事实便不可否认,即贞观中是由于唐太宗对服制的修订,才真正地打开了变通之门。唐代变礼的发展及人们精神世界观对变礼的认同本身显然与帝王的提倡很有关系,而帝王的改礼却都有其个人的及政治、文化的因素。谈到这一点,即不能忽略唐前期来自北朝系统方面的一些习俗及影响。

(一)唐太宗朝舅服和嫂叔服的改革缘起

任何时代礼仪的微小变革都要经过人们的争议,丧服礼的服制是历代讨论最多的问题,唐朝五礼制定过程中自然不能避免。但有一点很不一般,即唐前期丧服制的变革并不一定是由礼官个人提出,经过讨论在五礼的正式制定中完成,而是常常由帝(王或皇后)提出后随时予以补充的。对此,人们已注意到的是武则天。

《唐会要》卷三七《服纪上》:

上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后上表曰:"夫礼缘人情而立制,因时事而为范,变古者未必是,循旧者不足多也。至如父在为母只服一期,虽心丧三年,服由尊降。窃谓子之于母,慈养特深……若父在为母止一期,尊父之敬虽同,报母之辞有缺。且齐斩之制,足为差减,更令周以一期,恐伤人子之志。今请父在为母终三年之服。"遂下诏依行焉。当时亦未行用,至垂拱年中,始编入格。

《仪礼·丧服》规定"的父在为母服期"武则天改"为父在为母服三年"。关于母服的争论虽然魏晋南朝已时而有之,但其中多是关系嫡庶问题,这样无视礼经而从根本上提高母服的做法在前代不
但没有，更不曾由帝王提出。但是公然修改礼经的做法其实唐太宗已开其端。《唐会要》同卷“贞观十四年，太宗从容谓礼官曰：‘同爨尚有缌麻之恩，而嫂叔无服。又舅之与姨，亲疏相似，而服纪有殊，理未为得，宜集学者详议。’由此可见唐太宗也是将自己的意思明示礼官让他们具体操作。据《旧唐书》卷二七《礼仪志》记颜师古、魏徵、令狐德棻等人奏称：‘臣等奉遵明旨，触类旁求，采摭群经，讨论传记。或引兼名实，无文之礼咸秩，敦睦之情毕举，变薄俗于既往，垂笃义于将来，信六籍所不能谈，超百王而独得者也。诸儒所守，互有异同，详求厥中，申明圣旨。’可知他们曾为太宗之说绞尽脑汁，遍寻理论依据。而他们的议论和最后拟定的礼（条嫂叔、舅、曾祖、嫡子妇、众子妇服）也不过是完全遵旨办事和为太宗提供补充，显而易见太宗的意志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唐太宗、武则天改礼是帝王意志的结果。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他们要使用帝王权力改变丧服礼条？武则天的事似乎比较容易解释。众所周知，古丧服制中“父在为母服期”相对“于父死为母齐衰三年”和父服斩衰三年（无论母在与不在）丧期为短，不但是为了照顾父亲的感受，也是从男尊女卑、父重于母出发的，此即《仪礼·丧服传》所谓“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但是武则天的三年服几乎将父母服制拉向平等的地位，这一做法显然是反传统的。它的原因当然不是武则天本人有父在母服的问题要解决，也不是对平民百姓真正“有恐伤人子之志”的同情（这一点虽然是改礼最好的依据和借口），更不是简单地追求男女平等的社会效应；就家国制的社会而言，帝后就相当于天下臣民的父母，男女之别、父母之别在根本上限制了武则天的权力，所以她提高丧服中“母”服的
等级即等于暗示皇帝与自己的皇后地位同尊,内外二圣。这一解释在以往学者已有公论,由此言之,丧服制的变革并不仅仅关系服制本身。

这样对照起来,我们对于唐太宗的改革也不能看得太过简单。《唐会要》记太宗事特别用“了从容”二字,给人的印象,似乎太宗是在闲居不经意中顺便提出的。然而作为皇帝一语不得轻出,何况对于历代遵从、有着权威性的礼经而言,其改动怎么可能是随意的?尽管魏晋以后如嫂叔服、姨舅服屡被争论,但毕竟历朝礼文迄无正式修改。那么为什么太宗提出时却一无反对和争论意见,这就很令人生疑了。从某些迹象来看太宗的改礼也不是师出无名。

首先来分析嫂叔服。嫂叔授受不亲是礼之大防,嫂溺且不得援之以手,所以古礼嫂叔无服。但嫂叔服是最敏感的问题。弄清这一问题,必须了解皇帝的私心所在。太宗在提出嫂叔服时强调缌麻之恩”,但是如果仔细注意一下,可以发的“是同爨尚有改革嫂叔服的依据与其最后的结果却不甚一致。因为当魏徵、令狐德棻定议时将嫂叔服“和《礼》,继父同居,则为之期”比较,说出的“道理也”是“或有长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劳鞠养,情若所生,分饥共寒,契阔偕老,譬同居之继父,仿他人之同爨”,但最后“嫂叔旧无服,今请服小功五月”却不管是否同居和鞠养,而是落实到一切嫂叔头上的。而且,”从”情若所生,分饥共寒“语及费尽心机找到的且事嫂见称,载籍非一的前世郑仲虞、颜弘都之类所“谓”躬践教义,仁深孝友等例①,显然是拉近了嫂叔的感情距离。问题在于,群臣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给君主的建议提供说得

①《旧唐书》卷二七《礼仪志七》,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00页。
过去的理由。但是其中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仅片面从礼条和学术之争理解是不够的，这里当然要看看太宗本人怎样处理嫂叔关系。

《旧唐书》卷七六《太宗诸子传》：

曹王明，太宗十四子。贞观二十一年受封……显庆中，授梁州都督，后历虢、蔡、苏三州刺史。诏令继巢刺王元吉后。

高宗为什么要让曹王明继巢刺王元吉后？这一点《新唐书》卷八十本传说得很清楚。曹王明，母本巢王妃，帝宠之，欲立为后，魏徵谏曰：‘陛下不可以辰嬴自累。’乃止。《资治通鉴》卷一九八也记此事，只不过继嗣巢王的诏出自太宗：

（贞观二十一年八月）丁酉，立皇子明为曹王。明母杨妃，巢刺王之妃也，有宠于上；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为皇后。魏徵谏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寻以明继元吉后。

说出继之诏源自太宗而不是高宗，比较合理。《旧唐书》卷七六记：

赵王福，太宗第十三子也。贞观十三年受封，出后隐太子建成。”说明太宗是将两个小皇子分继被他诛戮的两位兄弟。据同传及《新唐书·后妃传》，赵王福的母亲也是杨妃，史料未载与曹王明母为一人，赵王福为何出继隐太子不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太宗以子出继，是对其死去兄弟的某种补偿，既显示宽大为怀，也是对原来行为的一种掩饰。值得注意的是，文德皇后死于贞观十年，巢刺王妃虽然做不成皇后，但贞观十四年前后仍应该是她受宠之时。曹王是太宗幼子，直到贞观二十一年才受封，其中的一个可能是晚生，另一个可能是一直没有决定如何处理这一尴尬的事实。所以最后的办法竟是将杨妃生的孩子还给元吉，让他与另一幼子赵
王福分别出继，以达到一举两得，瞒天过海的目的。真实的情况不得而知，不过无论怎样，辰嬴之累毕竟堵不住世人之口。"欲比德唐虞"的太宗，不仅弑兄屠弟，且将弟妻据为己有，这至少在汉族礼法上是通不过的，否则魏徵不会动辄有此说。这一点，恐怕也始终是太宗的心病。所以，如果在礼法上能够消除一些叔嫂的界限，使得问题不显得那么敏感，那么大逆不道，大约正是皇帝的私心企望。明乎此，结合史料记载上述大臣对改礼众口一词的谄媚之语，便知道大臣礼官对于太宗的真正意图是清楚的，所以就用不着再以礼争，再费无用之口舌，而所"谓从容"二字也正可反见太宗之考虑长久和用心之深了。

其次再来分析舅服。太宗的两条建议中，舅服的提出可能含更多的政治色彩。《仪礼·丧服》规定"外亲之服皆缌"，但是外祖姨小功，以名加也"。父母小功，以尊加也"；姨、舅同是母之兄弟姊妹，关系本来平等，姨却因"有从母"之名得服小功，这个规定古来如此，早有人提出它不合理，太宗提出增加舅服是以此为由，但中心却不是为此。讨论其真实的原因，同样不能排除皇帝自身的因素，而涉及此点，则有必要了解一下唐皇室与舅族的关系。

唐太宗的母家是窦氏。《旧唐书》卷五一《后妃传》：高祖太穆皇后窦氏，京兆始平人。隋定州总管、神武公毅之女也。太穆皇后早死，但由于她的缘故，窦氏在高祖未取得政权之际便参与其反隋活动，为之征讨天下，武德、贞观中更是一门贵盛。其中太穆皇后从父兄窦威，武德元年拜内史令。《旧唐书》卷六一《本传》称：威奏议雍容，多引古为谕，高祖甚亲重之，或引入卧内，常为膝席。又尝谓曰：'昔周朝有八柱国之贵，吾与公家咸登此职。今我已为天子，公为内史令，本同末异，乃不平矣。'威谢曰：'臣家昔在汉朝，再为
外戚，至于后魏，三处外家，陛下龙兴，复出皇后。臣又阶缘戚里，位忝风池，自惟叨滥，晓夕兢惧。高祖笑曰：‘比见关东人与崔、卢为婚，犹自矜伐，公代为，同传载窦威兄子轨，曾帝戚，不亦贵乎！’

任秦州总管，益州道行台左仆射，屡平叛乱，并从太宗讨王世充于洛阳。虽为人残酷多杀，却仍得优容，官至益州、洛州都督，子奉节尚高祖女永嘉公主。

又有太穆皇后从兄抗，与高祖少相亲狎，武德元年为纳言。高祖听朝，或升御坐，退朝之后，延入卧内，命之舍敬，纵酒谈谑，敦平生之款。常侍宴移时，或留宿禁内。高祖每呼为兄而不名也，宫内咸称为舅。常陪侍游宴，不知朝务。次子静，贞观中任夏州都督、民部尚书，孙逵尚太宗女遂安公主。抗第三子诞尚高祖女襄阳公主，高祖诸少子荆王元景等未出宫者十余王，所有国司家产之事，皆令诞主之。

窦氏在唐朝前期始终保持了贵戚的地位，与李唐形成的家族姻亲关系实非一般。直到睿宗良娣、玄宗母昭成皇后窦氏也是窦诞之孙，甚至昭成弟子锷，又尚玄宗女永昌长公主。所以《旧唐书·窦诞传》称：‘窦氏自武德至今，再为外戚，一品三人，三品以上三十余人，尚主者八人，女为王妃六人，唐世贵盛，莫与为比。’

皇帝的舅家如此，而在贞观一朝，皇后的舅家和（弟，太子舅）家就更加特殊。《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记高士廉为渤海蓨人，父祖皆仕齐为显宦。大业中，为制礼郎。士廉妹先适隋右骁卫将军长孙晟，生子无忌及女。晟卒，士廉迎妹及甥于家，恩情甚重。见太宗潜龙时非常人，因以晟女妻焉，即文德皇后也。太宗于高士廉十分器重，以士廉是文德皇后之舅，素有才望，甚亲敬之。及将诛隐太子，士廉与长孙无忌并预密谋。在六月四日玄武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门之变事件中，高士廉甚"至 率吏卒释系囚，授以兵甲，驰至芳林
门，备与太宗合势"。所以太宗" 升春宫，拜太子右庶子"，即位后
任至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尚书右仆射申国公、摄太子太傅；
诏图形凌烟阁。曾为太宗撰《 氏族志》"，凡一百卷，诏颁于天下，赐
士廉物千段。"(  贞观)二十年，遇疾，太宗幸其第问之，因叙说平
生，流涕歔欷而诀。"死后太宗甚至欲亲临其丧。当大臣劝阻时，太
宗曰":朕之此行，岂独为君臣之礼，兼以故旧情深，姻戚义重，卿勿
复言也。"高宗即位，追赠太尉，与房玄龄等配享太宗庙庭。子履行
尚太宗女东阳公主。

至于太宗与长孙无忌的情分更在高士廉之上《。 旧唐书》卷六
五本传称无"忌 河南洛阳人，其先出自后魏献文帝第三兄"，祖、父
数代事魏、周、隋。无"忌 少与太宗友善"，当李"渊 义军"初渡河之
际，无忌即往长春宫谒见，后" 常从太宗征讨"。在太宗与太子建
成、齐王元吉夺位的过程中，他更是不遗余力"。无忌请太宗先发
诛之。于是奉旨密召房玄龄、杜如晦等共为筹略。"当六月四日，他
与尉迟敬德、侯君集等九"人 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平之""，太宗
升春宫，授太子左庶子"。即位转吏部尚书，以功第一，进封齐国
公，实封三千户"。太宗以无忌佐命元勋，地兼外戚，礼遇尤重，常
令出入卧内。其年，拜尚书右仆射。"尽"管 或有密表称无忌权宠过
盛"，但太宗不听。在无忌和文德皇后的一再请求下，太宗虽解除
无忌的仆射官职，但当亲祠南郊之际，竟"然 命无忌与司空裴寂同
升金辂"，以示荣宠。贞观七年册拜司空"。十二年，太宗幸其第，
凡是亲族，班赐有差。十六年，册拜司徒。十七年，令图画无忌等
二十四人于凌烟阁。"上述窦氏、高氏、长孙氏的事迹为治唐史者熟知，所以不厌其
详不过是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唐“初舅氏”与朝廷的关系。上述三氏均是北朝大姓，李唐与他们结为姻亲，本有聚合政治势力、结为政治集团的意义在内，而他们在唐朝夺取政权和太宗诛戮兄弟的过程中，也明显起到了核心作用，所以他们不是皇帝一般意义上的依靠。观高祖与窦轨关于北周八柱国和窦氏“代世为帝戚”的议论，及高士廉、长孙无忌策划参预玄武门之变，功第一，被分命为太子左右庶子，知他们实为皇帝最得力的心腹，最借重的力量。皇帝并通过他们组织联络其他个人和势力，其间即使说不马，共天下，彼此间生死与共、相互依仗的形势也是不容置疑的。而长期的患难无疑使君臣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亲上作亲的关系，唐太宗所“谓故旧情深，姻戚义重”，正反映了这种政治和感情的双重含义，也说明了“舅”族在太宗心目中的分量和地位。它的重要并不亚于本族，联系太宗使高士廉修《氏族志》，其实已无异于宣示这种宗族与政治的联合是高于一切的。由此知太宗的提高舅服等级是从推崇舅族地位出发的。

那么具体这一变化“对舅”本身的意义何在呢？或认为，会对帝后舅族的叙官用荫有所影响。但是法令法律对此原有保证。据《唐六典》卷二吏部郎中员外郎“条凡叙阶之法……有以亲戚”下注曰”：谓皇亲缌麻已上及皇太后周亲，正六品以上叙；皇后周亲，从六品上；皇祖免亲、皇太后小功、缌麻、皇后大功亲，正七品上；皇后小功，缌麻亲、皇太子妃周亲，从七品上。其外戚各依本服降二等叙。”
根据同书卷二应议者期以上亲及孙疏议曰：八议之人，荫及期以上亲及孙，入请。是帝后的舅及兄弟家本属当叙当荫之列。升为小功对他们的家族、戚属未必有太大影响。何况以‘上舅’家因与皇帝的亲密关系及元勋的功劳早就跃居九重，飞黄腾达，无须借重一般的法令，所以太宗的目的显然并不在此。

但是，‘从缌麻’到‘小功’毕竟是一种血缘等级的提高，是戚属身份和亲密关系提升的一种认证。而如果说律令已保证了舅族的政治利益，《氏族志》又确定了舅氏的家族地位，那么服制的变化就是作为精神理念的礼法对于舅族重要性的伸张和最终肯定。它对于唐初舅族姻戚对皇朝的贡献和作用暗喻着深刻的褒扬，其中舅族获得的崇高礼遇是很难具体估价和用语言形容的。
丧服,甥为舅缌麻,舅报甥亦同此制。贞观年中,八座议奏,舅服同姨小功五月。而今律疏舅报于甥,服犹三月。谨按傍亲之服,礼无不报,己非正尊,不敢降之也。故甥为从母五月,从母报甥小功;甥为舅缌麻,舅亦报甥三月,是其义矣。今甥为舅,使同从母之丧;则舅宜进甥,以同从母之报。修律疏人,不知礼意,舅报甥服,尚止缌麻,于例不通,理须改正。今请修改律疏,舅报甥亦小功。"又曰":庶母,古礼缌麻,新礼无服。谨按庶母之子,即是己之昆季;昆季为之杖期,而己与之无服,同气之内,吉凶顿殊;求之礼情,深非至理。今请依典故为服缌麻。"制从之。

这次的丧服改革是在显庆礼制订的过程中,由修礼官长孙无忌提出的,它完全符合修礼程序,内容也只有不多的两条。但是看得出两条之中是"以 舅报甥"服为重点的。尽管长孙无忌是以从母(姨)报甥为根据的,似乎很顺理成章,但是这条建议本身既出自作"为 皇帝舅"的长孙无忌之口,问题就不是如此简单了。因为如果太宗提出的舅服小功立足"于 皇帝甥"对舅的推崇,那么站在长孙无忌的立场上,提出舅要反为甥报服,强调的就是甥的地位和舅对"皇帝甥"的报答了。

长孙无忌为什么要主动提出舅报甥的问题呢?这里涉及到高宗与长孙无忌的关系。贞观十七年太宗废太子承乾,立晋王治,事实上便把他托付给长孙无忌和其他大臣。此事在史料记载中非常富有戏剧性。《旧唐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称:"其年,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晋王,而限以非次,迴惑不决。御两仪殿,群官尽出,独留无忌及司空房玄龄、兵部尚书
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此，我心无憀。因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无忌等惊惧，争前扶抱，取佩刀以授晋王。无忌等请太宗所欲，报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谓晋王曰：汝舅许汝，宜拜谢。晋王因下拜。太宗谓无忌等曰：公等即符我意，未知物论何如？无忌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伏乞召问百僚，必无异议。若不蹈舞同音，臣付陛下万死。于是建立遂定，因加授无忌太子太师。寻而太宗又欲立吴王恪，无忌密争之，其事遂寝。

太宗以死相要，在试探中与长孙无忌等演了一场戏。结果是长孙无忌在立李治为太子问题上明确表态，使太宗最终下定决心。这说明长孙无忌在立太子问题上有大功。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记吴王恪事曰：上疑太子仁弱，密谓长孙无忌曰：公劝我立雉奴，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奈何！吴王恪英果类我，我欲立之，何如？无忌固争，以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邪？无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储副至重，岂可数易！愿陛下熟思之。上乃止。由于长孙无忌一再保护太子，以致太宗临死还向无忌托孤，要无忌和褚遂良二人对太子善辅导之，并向褚遂良交代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谗人间之。所以褚遂良曾谓自已卒与无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渐，独臣与无忌同受遗诏。而长孙无忌与高宗的良好关系也维持了数年。其间高宗显庆三年。
宗始终还是将无忌当作元舅尊崇着的，直到永徽六年（655）在立武则天为后的问题上与无忌反目。史载当他与褚遂良等面折庭争无效，武氏终于得立后，褚遂良被贬为潭州都督，他与高宗的关系也出现裂痕：“武后以太尉赵公长孙无忌受重赐而不助己，深怨之……许敬宗屡以厉害说无忌，无忌每面折之，敬宗亦怨。武后既立，无忌内不自安，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

显庆二年（657）应当正是长孙无忌“内不自安”的日子。从彼时到许敬宗等诬奏其谋反、逼令自尽只有两年时间。其间无忌虽保留高位，但褚遂良、韩瑗、来济等同列或已得罪被贬，或已岌岌可危”，屡请去位”，无忌在朝中已十分孤立。他再也不能以元舅的荣耀自居，相反只能采取低调。无奈何利用修礼官的职位提“出 舅报”服，以暗示自己对于皇帝甥仍然保持着忠心和尊敬，换取皇帝对他的宽容，也可能就是他最后的挣扎。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所“谓 修律疏人，不知礼意”的《 唐律疏议》，正是他本人领衔所修。与其说“他 悟”到了这个失误，不如说他是借助于此以表达过去以元舅高高在上、狂妄自大的忏悔，这种并不实际的暗示对他个人命运已无多大补救，但是唐皇朝的舅甥关系或许从此已开始了微妙的变化。

丧服服制的修订与皇家内部的亲戚关系和人事有关，还表现在《 唐会要》卷三七《 服纪上》所记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关于礼制的争论。值得注意是此次修改服制，也是由玄宗先下敕，再由礼官上奏集议的。且有趣的是，这次舅母和堂姨舅服的问题是以前从未提出过的。当太常卿韦根据玄宗意旨上奏请加外祖大功、舅姨同

（①《 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四年，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312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508

为小功,“和 堂姨舅疏降一等,亲舅母从服之例,先无服制之文,并
望加至袒免。望付尚书省,集众官吏详议,务从折衷,永为典则”
时,太子宾客崔沔、礼部员外郎杨仲昌、户部郎中杨伯成、左监门录
事参军刘秩都提出了反驳的意见,甚至认为堂姨舅等“服 何以祖述
礼经乎”!但是议奏后玄宗却谓侍臣曰”:朕以为亲姨舅既服小功,
则舅母于舅有三年之丧,是受我而厚。以服制情,则舅母之服不得
全降于舅,宜服缌麻。堂姨舅古今未制服,朕思敦睦九族,引而亲
之,宜服袒免。”在玄宗的一再要求和启发下,侍中裴耀卿等最后上
奏曰:

陛下体至仁之德,广推恩之道,将宏引进,以示睦亲,再发
德音,更令详议。臣等谨按《 大唐新礼》,亲舅加至小功,与从
母同服,此盖当时特命,不以轻重递增,盖不欲参于本宗,慎于
变礼者也。今圣制亲姨舅小功,更制舅母缌麻、堂姨舅袒免等
服,取类新礼,垂示将来,通于物情,自我作古。则群儒风议,
徒有稽留,并望准制施行。

玄宗敕“批 从之”。从整个事件的过程和结果来看,改礼由玄
宗亲自发动,解决的中心是舅母缌麻和堂姨舅袒免服。群臣虽然
几乎一致不同意,却拗不过玄宗。所以最后只好是不理群儒之议,
就照皇帝的意思办了。

但是玄宗为什么要改此两服制,特别是堂姨舅的
“ 袒免”?

说丧服“制 亲族有五,服术有六”,但袒免亲事实上已在斩衰、齐衰、
大功、小功、缌麻五服之外,是血缘关系中最远的,已经基本上没有
服丧的问题了,对于一般人民而言,规定这种服制本身就没有多大
意义。不过,对于皇帝就不同了。据玄宗说改此服制“是 思敦睦九
逃避。据前引《唐律疏议》卷一，只有皇帝的议亲才包括袒免以上亲。但据疏议袒免“亲据礼有五：高祖兄弟、曾祖从父兄弟、祖再从兄弟、父三从兄弟、身之四从兄弟是也”，所说都是父系亲属，并不包括母系。玄宗规定堂姨舅袒免，显然是要将母系亲属也划入可以享受荫、议的范围，因为据前揭《唐六典》吏部，叙官“有其外戚各依本服降二等叙”的规定，外戚同样有所优惠，而且比这更重要的是取得“皇帝袒免亲”的身份，它的法外好处和意义又是不可估量的。

然而玄宗又为什么如此照料母家亲戚呢？这一点似乎也不难从他自身的遭遇找到原因。《旧唐书》卷一八三《外戚传》：

（窦）孝谌，刑部尚书诞之子，昭成顺圣皇后父也。则天时，历太常少卿、润州刺史。长寿二年，皇后庞氏被酷吏所陷，诬与皇后呪诅不道，孝谌左迁罗州司马而卒。子希瑊、希求、希瓘，皆流岭南。神龙初，随例雪免。景云年，追赠孝谌太尉、邠国公，希瑊袭爵。玄宗即位，加赠孝谌太保，希瑊等以舅氏，甚见优宠。希瑊累迁太子少傅、豳国公，寻卒。希球官至太子宾客，封冀国公，开元二十七年卒。及卒，谥曰靖。希瓘初赐爵毕国公，后改名，初为左散骑常侍，及希球卒，因授开府仪同三司。玄宗以早失太后，尤重外家，兄弟三人皆国公，食实封。子锷，又尚玄宗女永昌长公主，恩宠赐赉，实为厚矣。

《唐代墓志汇编》天宝一四○《大唐前赵郡司士参军王昔故妻扶风窦氏墓志铭》：“曾祖诞，皇朝驸马都尉；祖孝谌，皇朝太常卿；父希瑊，皇……”
朝太子少傅司空邠国公。司空即帝之元舅，宠章锡命，贵极人臣，或以女尚妃，或以男降主，他人之所少，我家之所多。几见凤凰之楼，尽成冠盖之里。

《旧唐书》卷五二《后妃传》：
肃宗张皇后，本南阳西鄂人，后徙家昭应。祖母窦氏，玄宗母昭成皇太后之妹也。昭成为天后所杀，玄宗幼失所恃，为窦姨鞠养。景云中，封邓国夫人，恩渥甚隆。其子去惑、去奢、去逸，皇姨弟也，皆至大官。去盈尚玄宗女常芬公主。去逸生后，天宝中，选入太子宫为良娣。后弟清又尚大宁郡主。由以上史料，看得出玄宗对姨舅家的戚属可谓恩礼备至，而唐皇室与窦、张两家结成的这种姻戚关系甚至因此延续至代宗朝。玄宗幼年丧母，不得不依倚外家，并为窦姨所鞠养，种种恩宠赐赉应当视为是玄宗对母家的一种还报和补偿。不过，以上戚属都是玄宗的亲姨舅或其子女，不涉及堂姨舅。玄宗坚持“推恩”堂姨舅，私下里却更有一种可能是为了武惠妃。武惠妃是则天从父兄恒安王攸止女，在王皇后被废后获得专房之宠。开元十四年之际玄宗欲立惠妃为后，但为朝臣上疏反对，理由之一是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惠妃再从叔武三思、从父武延秀“皆干纪乱常，天下共疾”；之二是恐怕惠妃有子影响太子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武氏虽然曾被封王，但在中宗朝败后已被视作国仇，不能再以武则天的亲戚取得身份。惠妃的出身决定她不能做皇①参见《唐会要》卷三《皇后》，国学基本丛书本，第27—28页；《新唐书》卷七六，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491—3492页；《旧唐书》卷五一《后妃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177—2178页。
开元二十三年前后她正阴谋使己子取代太子《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二年即记武惠妃宠幸倾后宫，李林甫因宦官言，愿尽“力保护”其子寿王为太子事，至二十五年太子瑛等三子一日被谮杀。太子母家不能是国仇，惠妃在此阴谋过程中涉及到如何改变自己也即寿王母家出身的问题。所幸从皇帝这边论，武则天的从父兄就是中宗、睿宗的堂舅。可以想见，以武惠妃的受宠和“宫中礼制，一同皇后”之地位，提出这一要求不会遭到拒绝，从此惠妃父也即寿王母家就是堂堂的皇帝袒免亲了，这对于为寿王谋求太子地位是何等有利！从唐朝当时的情况看，采取这种解释也许更接近事实。

最后，还要提到的是出母、嫁母服的改制《唐会要》卷三七《服纪上》：神龙元年五月十八日，皇后表请天下士庶出母终者，令制服三年。至天宝六载正月十二日敕文”：五服之纪，所宜企及，三年之数，以报免怀。齐斩之纪，虽存出母之制；顾复之慕，何申孝子之心。其出、嫁之母，宜终服三年。

出母是父亲的出妻，嫁母是父死再嫁之母，都是与父亲或是本来的夫家脱离关系者《仪礼·丧服》规定“出妻之子为母期，”但出妻之子为父后（者即承嗣者），则为出母无服《。传》解释说”：与尊者为体，不敢服其私亲也。”说明还是以父亲为重的。本生嫁母没有提，但是“有父卒，继母嫁，从为之（服期）”一条，则生母改嫁自然也是服期。武则天改母服没有包括出母、嫁母，韦后的改制进一步扩大了母服的范围。韦后企图效法武则天临朝称制，母服的扩大同样表明了她欲显示皇后地位的尊贵和无视夫权的野心。

但是这一
条却是唯一一条丧服改制未入开元礼的。《开元礼》卷一三二《五服制度·齐衰杖周》规定“定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为母，皆报”，完全同于古礼，看来无视夫族也是通不过的。但是天宝中又将出母、嫁母纳入三年，真正的原因和直接背景不详。无论如何这一改变又一次提高了母服的独立性，它对于母和母族的地位毋庸说是进一步的改善和保证。

（三）母服舅服的改制“和”恒代遗风”的延续

从以上与帝后有关的服制改革来看，追究其中原因当然应以政治为第一位，观唐太宗、高宗、武后、玄宗无不是如此，他们的改礼都有从个人出发的因素，以朝廷政治的需要为前提，因而每次服制的改变便有具体的契机，解决的问题也是有针对性的，礼条所折射的实际上是某些人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关系问题，所以研讨礼制改革决不能认为仅是空洞意味的礼而忽略其中的现实政治因素。

但是，深入一步，我们还会发现问题并不仅仅是如此。因为所改服制中如果不算嫂叔服，那么母服和姨舅服则是涉及最多，也是最重要的两项内容。就以姨舅服的舅服而论，唐初的帝后舅族不仅与李唐皇室有着自北朝以来就逐渐建立起来的深厚的家族关系，也亲身参加了反隋和皇帝即位夺权的斗争，他们凭借功劳和家族的影响在朝廷中取得举足轻重的、甚至是士族领袖的地位。他们参与皇帝的家事，甚至管理皇族子孙诸王、国司家产。如果注意一下，还可发现他们中有不少人都任过太子官职，其意义即在于以“舅”之亲协助、帮衬太子。而“舅”之地位在太宗朝尤重，是太子的册立如果没有“舅”的承诺便几乎不能成功，观太宗在长孙无忌表...
后妃的势力是从部族而生，北魏拓拔氏在取得政权前需要借重依靠母族妻族，而取得政权后则忌讳后族制约君权。所以道武帝曾经成功离散贺兰、独孤两个外戚部落，而实行强力扼制母后的子贵母死之制。其目的，一是不使妇人干政，一是不使外家为乱。
两者互相联系，而且都是成功的。但是到北魏宣武帝之后，母后专权的问题仍有发生。北魏文明太后、高齐娄太后等太后临朝专制都很突出，北朝的外戚问题也远比南朝为重，这是因为重旧家或母家的习俗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宋书》等南朝各史皆不设外戚传，相反北朝各史除《周书》外，都有《外戚传》，说明外戚问题始终在影响廷政治，至少，外戚作为一种势力，可以单独划分为一个门类。据《北史》作者李延寿统计，诸史入于《外戚传》的有二十余家。而外戚的首选除了早期部族首领更有鲜卑勋贵、功臣将领，乃至于某些汉族高门。他们往往是或者曾经是皇朝政治军事的依靠力量，北朝朝廷与他们的联姻也是为了借重其门第和族望，这样北朝的婚姻就成了人们常说“关中之人尚冠冕、代北之人尚贵戚”的结合。观高齐家族与斛律氏的婚姻，斛律氏一门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宠之盛，当时莫比”，富贵如此，女为皇后，公主满家”；及周武帝、隋文帝、唐高祖分娶北周八柱国之一独孤信三女，便知道这种政治和门第婚姻的结合是多么密切。然而以上还仅是就皇后而论，如将范围扩大到皇帝嫔妃、宗室诸王妃主的娶嫁就更其明显了。自北魏始，汉族大族如崔、卢、李、郑，也无不与鲜卑皇室亲缔联姻，此问题为前人所多论，不是本文要述的重点，但是从中可以知道“贵戚”与“冠冕”结合的门第婚姻，是北朝婚姻的主体。它的前提无疑仍是重视母族妻族，而它的结果当然是更易促

①田余庆《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载《国学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②《北齐书》卷一七《斛律金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19—228页。
③《周书》卷一六《独孤信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63—268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515

成尊重母家和舅家的习俗。由此言之，北朝外戚之重应是母系社会遗俗加上门第婚姻政治的产物，所谓“子贵母死”并不能限制永恒的延续。

以上北朝的影响在隋及唐前期的宫廷政治中明显是存在的。隋文帝跃之初，献后便相推毂：炀帝大横方兆，萧妃密勿经纶。①关于隋文献皇后跋扈干政中的地域血缘与民族文化底蕴已为学者所论②，而母后与舅权之重在唐初也是突出的。且不言武则天与韦后的问题，即唐高祖窦穆皇后与太宗长孙皇后也都参与了反隋及夺权的活动，长孙皇后在内外政事上尤有发言权。至于舅的问题，则当高宗将长孙无忌贬死后，舅的地位固不能和以前相比，但武则天本家武氏和舅家杨氏权势仍贯穿武后甚至中宗朝。《新唐书》卷一百《杨执柔传》谓执柔为杨恭仁从孙，武后母，乃恭仁叔父达之女。及临朝，武承嗣、攸宁相继用事。后曰：‘要欲我家及外氏常一人为宰相。’乃以执柔同中书门下三品。"可见武则天心目中是有依倚本家和舅家意识的，所以在立太子问题上也总是摆不平夫（家己子）和本（家武氏子）的地位。史载武则天将中宗废为兰陵王，是因他不仅以岳父韦玄贞为侍中，而且当宰相裴炎固争时，竟说“出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的话来，说明武则天防范的也是中宗与皇后家势力勾结为一体。外戚的问题在玄宗朝还表现为前述武惠妃急于改变出身和杨国忠兄妹专权跋扈，而当李林甫、杨国忠谋对太子李亨不利时，妃兄韦坚首先得罪，后

①《北史》卷八〇《外戚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670页。
②王光照《隋文献独孤皇后与开皇世政治》《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73—85页。
③《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光宅元年，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417—6418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总起来说，良娣杜氏父有邻也借故赐自尽，这一切都有内在联系。陈寅恪先生在分析唐朝政治与婚姻的关系时，提出唐代史以安史之乱为分界，前期之最高统治集团表面上虽为李氏或武氏，但自高宗初年至玄宗末世，历百年有余的实际掌权者，乃是“以李、武为其核心，韦、杨助之黏合”的牢固复合团体；这一团体所“以宰制百年之世局”，与太宗婚姻观“念不仅同于关中人之尚冠冕，兼具代北人之尚贵戚”有关。甚至陈、隋覆灭以后，其子孙犹能贵显于新朝，正是由“于隋、唐皇室同为关陇胡汉之集团，其婚姻观念自应同。李武具代北之特性也”韦杨婚姻集团是关中、代北婚姻观念的产物，包括极端重视皇后、太子的出身及皇帝、太子与母家、舅家的联合等等，完全承袭北朝。所以事实上，他们“的黏合”与胶固同时也可以说是关中代北母系社会文化遗俗重母家、重舅家的产物，两者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此外分析唐朝帝后与他们的舅家或母家保持亲密关系和往来的原因，个中自然还不乏感情因素，产生这种感情的基础之一也是由北朝延续下来在生活上特别是遇到困难时依倚、求助外家的习惯。《魏书》卷八三上《贺讷传》记前秦灭代以后，献明贺后曾携子拓拔珪逃奔兄贺（讷 贺兰部）未果，转投与拓拔氏世为婚姻的独孤部。拓拔珪得其庇护，后再投舅氏贺讷，并终借重其力以建国的事实。据同传称”，后刘显之谋逆，太祖闻之，轻骑北归讷。讷见太祖，悚喜拜曰：‘官家复国之后当念老臣。’太祖笑答曰：‘诚如舅言，要不忘也。’于是贺讷不顾弟染干的反对于国中立之为主，‘使太祖登代王位于牛川’。

《旧唐书》卷一○六《李林甫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238—3239页。

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37—240页。

① ②
困难时依倚舅氏，得位后不忘舅氏乃人之常情，魏太祖拓拔珪的话很典型。虽然后来他为了巩固政权而削弱舅氏的部族。生活中投靠舅氏的例子其实很多。以唐人而论，《旧唐书·高士廉传》记长孙晟卒后，士廉迎妹及甥于家，恩情甚重，并做主将甥女文德皇后嫁与太宗。又同书卷五一《后妃传》记高祖太穆皇后窦氏，后母，周武帝姊襄阳长公主。后生而发垂过颈，三岁与身齐。周武帝特爱重之，养于宫中。时武帝纳突厥女为后，无宠，后尚幼，窃言于帝曰：‘四边未靖，愿舅抑情抚慰，以苍生为念。但须突厥之助，则江南、关东不能为患矣。’……及周武帝崩，后追思如丧所生。隋文帝受禅，后闻而流涕，自投于床曰：‘恨我不为男，以救舅氏之难。’

唐朝的两位皇后都曾养于舅氏之家，其中窦后虽不属于投靠性质，但看得出与舅氏感情深厚，以至于可能影响到李渊日后的反隋。两位皇后的养于舅氏不能看作是偶然现象，联系玄宗失母后，也不是交给伯叔父母而是由姨母抚养，就很令人深思了。台湾学者陈弱水曾谈到唐代妇女在丧偶以后或因其他情况（如动乱、亲情、生活遇到困难等）返回本家或兄长家长期居住的现象，但是其中也涉及男子赡养寡居姊妹的问题。例如玄宗时人崔义邕墓志说他‘虑姊之孀立，忧甥之多艰，公室素贫，尽禄无匮’，白居易称赞杨虞卿‘奉寡姊，亲护其夫丧；抚诸孤，誓毕其婚嫁’，出身博陵崔氏的崔皑，奉养寡嫂及姊‘群甥呱呱，开口待哺，公之数子，咸孺慕焉’，都由崔皑抚养①。既然涉及到养甥，那就并不是只有妇女才‘回娘’家。就长孙无忌和玄宗而言，他们

①陈弱水《试探唐代妇女与本家的关系》《史语所集刊》68本1分册，1997年。所转引史料，并见《唐代墓志汇编》，第1667、1802页《全唐文》卷六七四《与杨虞卿书》，中华书局，第688。
都曾在外家居住过不短的时间。这种情况，大概在北方地区尤多，
以上所举诸人就是北方士族。那么，除了亲情之外，是不是可以说
这其中也同样是有一些北朝习惯和遗风呢？如果是这样，则唐朝
皇帝的改服制也就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再进一步分析，唐前期皇帝提出的改革舅姨服是涉及外家和
母族的，舅姨服、唐姨舅服和母服都是属于母系亲属的，说到底也
都是关系妇女的。比较其他诸项改制，除了曾祖父齐衰五月一项
之外，也都是或多或少与妇女有关，而且也都是反传统的。例如贞
观中颜师古提“出至如舅姑为妇，其服太轻，冢妇止于大功，众妇小
功而已”是略其恩礼，有亏慈惠”，且既“然犹子之（妇侄妇），普服
大功”，所以要求实“行冢妇周服，众妇大功，既表受室之亲，又答执
笲之养”，获得通过。这项改革实现了公婆和媳妇服制对等互报，
似乎很合理，但这种平等并不合乎汉族传统礼法。所以到了唐后
期五代，为舅姑服竟提高到三年，甚至超过已嫁妇女为自身父母
服，正是反其道行之。而追究唐初舅姑为妇服的提出似乎也不是
无故《新唐书》卷七○《王珪传》：
时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礼有妇见舅姑之仪，自近代公
主出降，此礼皆废。珪曰：今主上钦明，动循法制。吾受公主
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遂与其妻就席而坐，令
公主亲执笲行盥馈之道，礼成而退。是后公主下降有舅姑者，
皆备妇礼，自珪始也。

王珪是贞观宰相，朝廷大儒，是意欲以礼法立朝纲者。但本传
说他“是太原祁人也，在魏为乌丸氏”，由他来立规矩正风俗可能有
特殊意义。因他所“说近代”公主不拜舅姑应始自唐以前，大概还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519
是源于少数族风俗的北朝制度。公主不拜舅姑是表明皇家的威仪和尊贵，似乎很自然，但这里反衬出一种不受约束的现象。唐朝妇女总的来说地位较高，在家可与丈夫分庭抗礼，作为媳妇也不是太低下，当然贵族妇女更甚，这种风习也来自北朝。治礼的颜师古、令狐德棻等均北朝士族，受北朝的观念薰习更深，这是其提高妇服的基础。另外仅就公主而言，唐朝公主不光不拜舅姑，在朝中也有威权，太平、安乐公主是典型的例子。太平公主操纵朝政、干预废立与牟润孙氏所述汉代长公主之宫中地位高及景帝姊馆陶公主、武帝姊平阳公主的情况很有些相似，则女性地位高的母系社会遗俗在唐朝恐怕还并不止于以上母、舅诸端。史载鲜卑少数族本有嫂叔收继婚的传统，如《三国志·乌丸鲜卑传》裴注引《魏书》称："父兄死，妻后母执嫂；若无执嫂者，则己子以亲之次妻伯书焉。《晋书》卷九七《四夷·吐谷浑传》："父卒，妻其群母；兄亡，妻其诸嫂。" 吐谷浑也是鲜卑别种。与此有关，北朝皇室宗亲中庶母子、叔嫂通奸的事件不胜枚举，而与之相比，唐太宗的行为并不过分。考虑到以上种种，都是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则如果说舅服（包括舅母）役服、妇服及无视叔嫂授受不亲的嫂叔服等的最终修订，并不完全是对南朝议礼、改礼的单纯继承，也是长期积累的北朝少数民族习俗最终对开放的大唐礼制的影响及对汉族传统礼仪在思想观念上的渗透，或许不算是一个不切情理的解释吧！

总之，礼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的原因。唐代的政治和文化是复杂的、多元的，作为政治文化和精神文明核心的礼也会随着这一政治的变化及多元文化的形成而不断调整。对此，我们不能仅

①谢宝富：《北朝婚丧礼俗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6—58页。
仅关注于礼文本身或者某一方面的影响。以上的论述决不是企图否定前贤关于唐礼与南朝礼仪继承关系这一大论断，而只是尝试从更切实更全面的方向去把握礼仪变革，由此也是对唐代礼俗特色的更完善的解释。
第十四章    表状笺启书仪

和官场仪制

一、从敦煌书仪中的表状笺启看唐五代官场礼仪的转移变迁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礼仪象征着宗法君主制的权威，这一权威精神体现于礼则的每一个细节。但是，唐代社会的官僚化及后期政治结构自中央集权向藩镇体制的过渡，导致宗法君主本位的礼则主体发生了某些变化。这一变化，反映在敦煌书仪中有两个趋势：一个趋势，就是本书前面已论述过的，从唐前期到后期吉凶书仪中表现官僚体制的内容愈来愈多，以致逐渐发展为专门的表状笺启书仪；另一个趋势，则是表状笺启书仪中，以藩镇为中心和官场应酬为主体的官文书范逐渐取代以皇帝为中心的笺表成为这一类书仪的主流，甚至这些书范在形式内容方面也完全模仿笺表。透过笺表形式内容的下移与普及，便不难明瞭，在上述体制变化过程中，唐五代官僚社会的礼仪正在发生着下等同中央的变迁与转移，这是唐朝礼仪发展中一个十分引人注意的现象。
1. 唐前期的笺表制度

本书上编业已指出，唐前期吉凶书仪除反映民间婚丧礼俗、节庆仪规之外，也以笺表制度来突出朝廷仪制。在唐“朝下之所以达上”的公文中，以表的规格最高：表上于天子，其近臣亦为状。①

P.3900《唐前期书(仪武则天时期?)》中“有笺表第二”的题目，内含《庆正冬表》《庆平贼表》《庆封禅表》《庆赦表》等多种表式。以《庆正冬表》为例：

冬至即言晷运此须环周，日南长至平阙。此须阙纳祐，与天同休，罄无不疑。臣限所守，不获称庆阙庭二字，不胜悦豫臣之至。谨遣所部某官喜，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谨(言?)。某年某月日官臣姓名上表。

表文中颇多套语，但将此表及其他表的内容名目与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发现它们正属唐朝前期最常见的笺表范围。而关于此种礼仪性笺表之上，唐朝本有严格的规定。《唐会要》卷二六《笺表例》称：

景龙三(年709)二月，有司奏：皇帝践阼，及加元服，皇太后加号，皇后皇太子立，及元日，则例：诸州刺史都督，若(一)敦煌书仪与传世文献所见的笺表制度

臣名言：元正肇祚，万福惟新。伏惟陛下膺乾某乙奉表以闻。臣某诚欢诚

①《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中华书局标点本，1992年，第11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京官五品已上在外者，并奉表疏贺；其长官无者，次官五品以上者贺表，当州遣使，余并附表，令礼部整比，送中书录账总奏。“……

（开元）十一年七月五日敕：三都留守、两京，每月一起居；北都，每季一起居；并遣使。即行幸未至所幸处，其三都留守，及京官五品已上，三日一起居。若暂出行幸，发处留守亦准此并递表。”

以上笺表是皇帝即位及立后立储等大事规定中外群臣所上的贺表与日常起居表。同样的规定也约略见于《唐六典》卷四礼部郎中的记载，其中关于元日说：

凡元日大陈设于太极殿，皇帝衮冕临轩……皇太子献寿，次上公献寿，次中书令奏诸州表，黄门侍郎奏祥瑞，户部尚书奏诸州贡献，礼部尚书奏诸蕃贡献，太史令奏云物，侍中奏礼毕。然后，中书令又与供奉官献寿，时，殿上皆呼万岁。

可见元日上表也是庆典中的一项仪式。此外《唐六典》关于起居还有关于车驾巡幸及还京……行从官每日起居，两京文武职事五品已上三日一奉表起居，三百里内刺史朝见，东都留司文武官每月于尚书省拜表，及留守官共遣使起居，皆以月朔日，使奉表以见。中书舍人一人受表以进。北都留守每季一起居“……”的规定，说明奉表贺起（居当皇帝外出或外官不能见到皇帝时）等同朝见，同样是一件相关朝廷礼制的大事。

在开元前后节日的贺表中并没有规定冬至。但冬至朝贺同于元正，贺表似乎相沿南北朝而约定俗成，所以我们在敦煌书仪及
在各种贺表之中，祥瑞作为重传世文献中也时有所见。《唐六典》同上卷略称：

凡祥瑞应见，皆辨其物（名），若大瑞、上瑞、中瑞、下瑞皆有等差。若大瑞，随即表奏，文武百僚诣阙奉贺；其他并年终员外郎具表以闻，有司告庙，百僚诣阙奉贺。

是祥瑞也要按等级随时或于年终（元日）一总奉贺。唐前期贺正、起居、祥瑞等渊源已久，而贺正、起居及贺皇帝践祚、加元服，皇太后加号，皇后皇太子立等皆属于开元五礼嘉礼。传世文仪有五十的内容。除上述内容外，还有如《贺雨表》（宋璟《史记》）、《百僚贺雪表》（李峤《史记》）、《贺封禅表》、《贺赦表》、《代百官贺明堂成上礼表》（崔融）、《贺太阳不亏状》（苏颋）、《贺大衍历表》、《贺破土蕃状》（张说）、《贺破突厥状》、《贺麦登状》、《贺论三教状》（张九龄）、《贺拜南郊表》（王睃）、《贺加天宝尊号表》（李邕）等一类贺表贺状。这些表状虽然有相当多数

①见《初学记》卷四《岁时部下》元日第一”与冬至第十二，引何充《谢正表》及沈约《宋书》，自魏晋正、冬皆有贺（仪 中华书局，1962年，第62—64页）。

②《唐六典》卷四礼部郎中员外郎条，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11—112页。

③分见《全唐文》卷二○七，中华书局影印本，2091页；卷二四三，第2454页；卷二一七，第2195页；卷二一八，第2203—2208页；卷二五六，第2589页；卷二二三，第2251—2259页；卷二八九，第2931—2934页；卷二九八，第3018页；卷二六一，第2649页。

④“非时”贺在规定上表的内容之外。可参见《唐会要》卷二六《笺表例》会昌五年八月，提到庆贺“的问题。国学基本丛书本，第506页。
不出五礼的规定。如贺封禅、贺明堂、贺南郊、贺雨雪、贺麦登等是服从吉礼的，上面未提到的贺祥瑞也可以看作是对吉礼中各种祠祀活动的响应。贺破士蕃、破突厥当与军礼诸仪相连，贺赦亦属嘉礼。据《唐六典》的体例，凡下往往是律令格式中式的内容，所以前述一些规定，大致应属礼部式，它们使礼令的执行具体化。由此可知，贺表必须事出“有因”，也即必须服从礼仪需要，而不能看作是随意的。

在《唐会要》与《唐六典》所载笺表的规定中，我们未见到有关凶仪的内容。但是敦煌P.3442杜友晋《吉凶书仪》却列“有表凶仪一十一首”，名为《国哀奉慰嗣皇帝表》《山陵毕卒哭祔庙奉慰表》《国哀大小祥除奉慰表》《皇后丧奉慰表》《皇太子丧奉慰表》《皇后遭父母丧奉慰表》《皇期亲丧奉慰表》《百官遭忧奉答敕慰表》《百官期亲丧奉答敕慰表》《百官谢父母丧蒙赠表》《百官谢期亲丧蒙赠表》，从名称可知是皇家与百官遭丧相互慰问，（臣妾）上于君主的奉慰表、（谢或奉答）敕（慰或封赠）表等。此外又有规格稍低的《启凶仪四首》：《皇后丧慰皇太子启》《皇太子有期亲丧奉慰启》《百官遭忧奉答令启》《百官有期亲丧奉答令启》，致书对象是

①据《唐六典》卷四《礼部》载五"礼一曰吉礼，其仪五十有五"。其中除郊庙礼仪外，又有祀风伯、雨师、灵星、司中、司命、司人、司禄，祭五岳、四镇、四海、四渎等神，故可认为"与祥瑞"相应。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11页。

按《唐六典》卷四《礼部》载五"礼三曰军礼，其仪二十有三"，有二曰宜于太社，三曰造于太庙……七曰露布"等。据《新唐书》卷一六《礼乐志》：其宜于社，造于庙，皆各如其礼而一献……其凯旋，陈俘馘于庙南门之外，军实陈于其后……贼平而宣露布。其曰，守宫量设群官次。露布至，兵部侍郎奉以奏闻，承制集文武群官、客使于东朝堂，各服其服。奉礼设版位于其前……中书令受露布置于按……中书令取露布，称有制。群官、客使皆再拜。遂宣之，又再拜，舞蹈，又再拜。兵部尚书进受露布，退复位，兵部侍郎前受之。中书令入，群官、客使各还次（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85—386页）"贺胜之状应从之而生。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526

太子、诸王、公主,表的内容形式可见其中的《国哀奉慰嗣皇帝表》:

妾皇太后丧云

大行言:上天降皇太后。崩背,万国攀臣名姓,大行皇帝号？]

无姓臣妾大后云

妾不须此率土号奉讳号踊, 伏惟陛下攀慕。

若无天地肝心摧裂。

臣语。

慕号绝,圣情难居。臣妾限所守,不获星奔,五情縻厝,不任感慕之情。谨遣某官臣姓名奉表以闻。臣名诚惶[诚]恐,顿若父在云稽首稽首商量已,

首顿首,具名吉仪他皆(放 仿)此死罪死罪。

按:表文至此结束。但下尚"有妇人修表不须诚惶诚恐已下语,直云谨言,他皆(放 仿)此"的注语。知其他表文,形式内容大同小异。

前述杜友晋《吉凶书仪》约作于开元中将以上表的名目与《唐六典》卷四《礼部》所载开元五礼凶仪对照,可发现有些内容尚在其中,"如皇帝为小功(已以)上举哀(此处仅为期亲)、皇后举哀吊祭",及大臣三品以上、四品以下、六品以下及王公以下丧等。

《通典》卷九六《开元礼纂类》也有"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为父母祖父母举哀"之条。这些都与吊哀表直接有关。但皇帝、皇太子之丧却不在其中。据《新唐书》卷二十《礼乐志》:周礼五礼,二曰凶礼。唐初,徙其次第五,而李义府、许敬宗以为凶事非臣子所言,遂去《国恤》一篇,由是天子凶礼阙焉。天子凶礼阙焉,但果真遇有其事而礼仍不可少。故书仪中仍保留了慰哀表的内容,这实际仍是从唐初甚至唐以前继承下来的五礼之仪。由此可见无论吉凶笺表之作均与国家庙堂之礼相关。给皇太子的启虽按制度降等,但内容形式大体相同。

见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二)》,载《唐五代书仪研究》,1995年,第71—93页;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P.3442书仪题解,台湾新文丰出版社,1993年223—233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527

属于吉凶仪的笺表，比较常见的还有谢（表或谢状）。唐会要》卷二六《笺表例》天宝十载751）十一月五日敕，提到“比来牧守初上，准式附表中谢”，规定“自今已后，诸郡太守等谢上表，宜并附驿递进，务从省便”。可见谢官本是朝廷礼制。传世文献中多见谢官谢进爵增禄表状，如《谢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状》《谢知制诰状》（张九龄）《谢兄除太常丞表》（苏颋）和《谢加赐防阁品子课及全禄表》（李峤）。另一种是谢恩谢赐物表状，如《谢赐冬衣表》《初七谢恩表》《迁祔谢恩表》此外又有《谢免罪表》也属谢恩（陈子昂）《谢赐碑额表》《谢赐药表》（张说）《谢撰攀龙台碑蒙赐物表》《谢端午赐物表》《谢腊日赐腊脂口脂表》（李峤）《谢赐食状》《谢赐蕃口状》《谢赐马状》（张九龄）

敦煌唐前期书仪中此类谢表谢状未见，现仅举《张曲江文集》卷一五《谢赐衣物状》以明其例：

右，高力士宣敕，赐臣衣及器物等。张九龄不孝苟存，企及礼制，天恩以忝枢近，赐问再临，衣服珍器，殊当宠赐。臣有何力，可以叨滥。渥泽至深，诚效已竭，惟有微命，不知所图，无任感戴惶悚之至。

很明显，谢表并不一定属五礼规定的范畴，但它们同样为朝廷礼仪所必须，而且也是以皇帝的恩德为核心，这是唐前期表状不言而喻的共同特点。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贺、谢及奉（慰）哀表尚不是唐前期上皇帝礼仪笺表的全部。在它们之外，又有诸如国家民

①参见《全唐文》卷二八九，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936页；卷二五五，第2584页；卷二四六，第2491页。

②参见《全唐文》卷二一○，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127、2128页；卷二二三，第2254、2255页；卷二四六，第2490、2492页；卷二八九，第2936、2937、2939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族交往间蕃国以表状形式上于唐朝廷的国书(此属宾礼)以及让官表、劝表、荐表、进物(表状)等,中村裕一对其中的内容形式作,
此处不赘论。但可能是由于它们和谢表过详细介绍一样,更多地涉及国家政治和朝廷体制,不在一般所谓的吉凶五礼范围之内,
所以在唐前期吉凶书仪中这类笺表很少见到。

2. 唐后期五代笺表制度的变化

唐后期朝廷的笺表制度不但始终继续,且内容、名目都有增加。敦煌S.6537v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在“诸色笺表第五”部分,即有《贺正表》《贺冬表》《贺册皇帝表》《贺册太子表》等。
其中《贺册皇帝表》不见于唐前期,能“册皇帝”者,必得有太上皇。宪宗为顺宗“所册”,郑余庆书仪又是元和中所作,所以增加的贺表便反映了永贞元和政治下特殊的礼仪需要。

唐后期节日贺表明确增加了冬至。《唐会要》卷二四《受朝贺》“记贞元四(年788)十一月十三日,中书侍郎李泌奏:'冬至受朝贺,请准元日,中书令读诸方表。'敕旨:'宜依。'”《五代会要》卷五《受朝贺》后唐天成三(年928)十月二十一日条,记中书“奏冬至日,文武百僚以东上阁门拜表称贺仪注”;援引开元八年中书奏敕和永泰二年十一月诏、建中二年敕等关于冬至朝贺之仪,及李泌奏得到敕准的情况,要求遵照唐朝旧制”,永为常式”。因此冬至贺表在唐后期五代已经制度化。除元正、冬至外,节日贺仪据知又增加了端(节)、秋分、寒食、立夏、立秋、中秋、重阳等。郑余庆书仪中并有《秋分贺表》《寒食贺表》《立夏贺表》《立秋贺表》《中元节贺表》等。在五代时,这些节日特设之贺表已不再限于时令,而多属一般吉礼性质。郑余庆书仪中所载,即有《中元节贺表》《九日重阳贺表》等。郑书仪所载,则为庆贺之表。

①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第三章第二节之四《状的用途》、之五《状的样式》,及附节二《关于疏》,汲古书院,1991年,第419—458页。其中对状、疏的形式、用途作了复原和解说《。状的用途》一节尤涉及到谢状、贺状、荐举状、进贡状、杂奏陈请等内容,可作参考。
午、重阳。唐后期按照规定，在以上节日及皇帝降诞日地方均应有贺表贺仪。传世文献中来自藩镇的这类庆贺表状颇多，其中一个明显不同是唐前期多半只见皇帝向大臣颁赐，后期则藩镇贺仪伴随进献却成为一大特色。如《全唐文》卷五四二令狐楚有《元日进马并鞍辔状》《端午进鞍马等状》《贺冬至进鞍马弓剑香囊等状》《降诞日进银器物及零陵香等状》《降诞日进鞍马等状》等，当作于任河东节度使时；李商隐则不但有《为荣阳公端午谢赐物状》，更有《为荣阳公赴桂州在道进贺正银状》《为荣阳公进贺端午银状》《为荣阳公进贺寿，均为代桂广观昌节银零陵香麂靴竹靴状》等察使郑亚所作。这与R.4093刘邺《甘棠集》中为陕虢节度使高逸作《贺元日御殿表》《端午进马并鞍辔状》《寿昌节进马并鞍辔状》和《谢端午衣表》十分一致，说明节日进献和皇帝赐物是礼尚往来同时进行的。唐后期藩镇进献盛行，R.4093中还有《进鹞子状》数首，并不都是节日所用，所以节日进献不过是藩镇按常规进献的一部分罢了。

在藩镇贺表受到重视的同时，从书仪发现表的封装和递送方式也有所强调。R.3900《唐前期书仪武则天时期？》在《庆正冬表》的题函面“语某官臣姓名上表”下只简单注明表函应如何题署及蜡封及蜡印。既没有涉及怎样包装，也没有说应怎样递交，似乎这些都非常简单，无需强调。但是S.6537v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在这方面却要讲究得多。论者已注意到，在这件书仪的《诸色笺表第五》部分，作者不仅列举了多种表式，而且用三件牒文附以说明具体地告知表的封装和递交方式。其中的一件“封表极式①《全唐文》卷七七三，中华书局影印本，第8054一8055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在本书第八章中已作介绍，这是表的封装格式，也是最高等级公文。从中可以看到，表不但要用黄杨木盒函封，而且要线缠蜡填，放入毡袋，几道包装之后布裹封题发遣，显得极为缜密。另两件一为上四方馆牒式，一为给表状送达沿途州县馆驿的转牒式。这里转引录文如下，为明示牒文，应属注文的部分改小字。

外官每上表，如上（袋太字）即云牒上右春坊。皆牒上四方馆。表函壹封印全，为某事牒。前件表笺函印全，递至都上四方馆，请准式引进者。谨录上，谨牒。某年月日典名牒。转牒式：敕某道节度观察等使转牒上都已来路次馆驿，表函一封印全，为某事牒。前件表函印全，上都四方馆牒在毡袋内，今递至上都，伏请准式送上四方馆，不得（晷？）刻所递此牒，□事者须转牒上都（本）停留者，以送上来路次州（县）驿馆者讫。谨牒。某司年月日典名牒。

按此两件牒文是为表章事知会四方馆和沿途馆驿，可以看作是地方送达章表和公文的附件，其中所说四方馆是中央接收文书的机构。据《隋书》卷二八下《百官志》及《通典》卷二一《职官三》等史料，都载隋炀帝置四方馆，隶鸿胪寺，以待四方戎夷使者。另置谒者台，即诸方通表，通事舍人受事之司。到了唐代，废谒者台，

①原“卷路”下原“有次驿表”三字，似已勾删。按此处基本根据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录文，但对阙字、错字处及标点有增补修正。

②宋敏求《长安志》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本。
将四方馆隶中书，凡四方贡纳及章表皆受而进之《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明确指出这个改变的时间在武德初，所以四方馆唐初以来就是四方章表的送达和集中处。宋敏求《长安志》卷七指出四方馆在长安太极宫宫城外，承天门街之西宫城之南，第二横街之北，与中书外省东西相邻，地方表章通过馆驿递送先到四方馆既而送达中书是一条比较正常的途径。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牒文要在郑氏书仪中出现？推测原因有二：元和中，朝廷志在削藩，所以一方面强调中央权威，旧制得以重申；另一方面，在中央与地方交接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地方的复杂因素。章表本身应有保密性，并且一地章表的送达需要他地的配合，否则就有被耽搁和置换的可能，这种情况在唐史料中也曾见到。因此除了严密包装之外，强调公文的送递和接收也是使笺表顺利到达的保证。
确，但唐后期却常常不是如此。《唐会要·笺表例》武宗会昌五年（845）八月御史台奏便专门强调了诸道节度支州的贺表，奏称：

"应诸道管内州，合进元日、冬至、端午、重阳等四节贺表，自今已后，其管内州并仰付当道专使发遣，仍及时催促同到。"奏中还规定："除四节外，非时别有庆贺，使司便牒支郡取表状，急递至上都，委留后官进奏。"

武宗时为什么要如此强调节度支郡的节日贺表问题呢？《唐会要》于此条特别说明："旧例，支郡不贺者，即不用聚表贺奏。"足见"在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专奏事"的藩镇格局之下，节度支州的表贺制度早已不实行。所以针对这一点，奏中不但规定上述贺表"如阙事，知表状判官，罚本职一月俸料。发表讫，仍先于急递中申御史台"，而且要求支郡表须在使司表"后待齐到，一时付递中书发遣"。贺表是地方恭奉中央的明白表示和应有仪节，也是取得直接联系的渠道，武宗朝急于改变支郡不上贺表的状况，正反映了朝廷试图削抑藩镇和加强中央集权的努力。

但是武宗朝的一纸诏令，恐怕很难扭转长期以来形成的趋势。虽然从传世文献看唐后期笺表数量并未减少，特别是贺表中以贺破贼、贺平藩镇"的非时贺"，贺正冬、端午、皇帝千秋节等附之以进奉的献物表状都有增加。但是也应看到，许多（贺或慰）表其实早已超出朝廷礼仪规定的范围。例如刘邺《甘棠集》的表状中，有《贺除濮王充成德军节度使表》《奉慰西华公主薨表》等，贺王慰公主薨的内容显然都不在唐前期的仪制内。传世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卷一为高骈所作表状也有《贺建王除魏博表》《贺封公主表》及《谢宣慰状》《谢诏奖示进奉状》《谢诏止行墨敕状》等，名目内容都因事而定。从这些表状我们有理由认为，唐后期特别是唐晚期
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它们是藩镇与朝廷维持表面关系或相互打交道的一种产物。朝廷更重的是藩镇对中央的态度。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下，节度使支配下的诸州支郡贺表便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装饰。

后梁之际，这种情况似乎有一点改变。《旧五代史》卷六载梁太祖出行时进起居表略曰：

（乾化元年）十月辛亥朔，驻跸于相州，宰臣洎文武从官并诣行宫起居。户部郎中孔昌序赍留都百官冬朔起居表至自西京，诸道节度使、刺史、诸藩府留后，各以冬朔起居表来上。十一月辛巳朔，上驻跸魏县，从官自丞相而下并诣行宫起居，留都文武百官及诸道节度使、防御使、刺史、诸藩府留后，各奉表起居。

梁太祖出行时的起居表，是包括了节镇和刺史等主要地方长官的，这很有一点像是唐开、天时的盛况。但是到了后唐，特别是明宗时代，又渐渐复唐旧规。

《册府元龟》卷六一《帝王部·立制度二》：

明宗天成元（年926）七月辛未敕：三京、诸道节度团练防御使、刺史、文武将吏、州县职员皆进月旦起居表。起今以后，除节度使、留后，团练防御使，唯正、至进贺表，其四孟月（‘旦’据《五代会要·笺表例》补）并可止绝，式叶旧仪。

《五代会要》卷四《笺表例》：

（天成）三年七月二十一日敕：今后天下诸州刺史及系属节镇、团练、防御使，除应圣节、冬至、端午外，谢上及每月起居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534

庆贺章表,并付本道封进。其余公事,准往例,节度、观察使誊覆奏闻。”

后唐敕令提到“月（旦 每月初一）起居”和“四孟月旦”，其“四孟”者应即唐“朝 季一起居”的旧制;还明确了从唐后期继承下来皇帝诞节、冬至、端午等庆贺及谢上等礼。但比较前后两敕,却发现在天成元年已规定的州刺史等地方官员应上节日、月起居庆贺章表,到下天成三年却改“为 并付本道封进”,至“于 其余公事”,更由节度观察使 誊覆奏闻”;这说明在藩镇体制和节度使权力没有改变的情况,所谓州郡官员的笺表仍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保留。所以实际上,在晚唐五代由地方官员编写的吉凶书仪中,笺表一项大都被取消,而诸如《 甘棠集》等表状笺启书仪中虽仍保留着内容较为丰富的笺表,但若与下面将要论述的各种官牍相比较,数量便显得微不足道了。

（二）从笺表到启状 贺谢诸仪的降格与普及

1. 以礼仪性官文为主的趋势

在观察唐五代笺表制度的同时,我们已注意到在开、元以后敦煌书仪中出现的另一项内容,这便是官场往来文范。本书上编在讨论吉凶书仪时,曾指出杜友晋《 吉凶书仪(》P.3442《)、 新定书仪镜(》P. 3637等)及不知撰人名的《 书仪镜(》S.329+S.361)三件书仪在四海书仪方面的发展和变化。其中《 吉凶书仪》在四(海 朋友)书仪方面内容并不突出,比之年代略晚的《 新定书仪镜》却不仅属于朋友性质的书仪增多,而且出现了诸如《 重贺官书》《、 贺正冬启》《、 贺平贼书》《、 贺及(弟 第)书》《、 贺加官表书)》《、 贺雨书》《、 喜晴书》等一类明显是官场往来而总题“为 四海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535

庆贺书题"的吉书仪。与此相应,凶书仪中也已有了《 吊起服从政》
( 即所谓夺情复官)之类的内容。变化更大的《 书仪镜》,则不但几
乎完全被"以 四海"为题的书仪所占领,表现着唐人社会生活的
扩大,而且内中更有着直接涉及官事、政治和官场庆慰的《 贺四海
加官秩书题》《、 四海平蕃破国庆贺书》,和尊卑等级极为严格、以
" 重书"、次重书"显示官员身份的《 四海书题》。

唐代后期,在吉凶书仪中所反映的这些官场酬应痕迹更为明
显。前揭郑余庆《 大唐新定吉凶书仪》虽然一方面以相当篇幅突出
朝廷仪制和令式,但另一方面也以《 (寮 僚)属起居第六》及《 典吏
( 史)起居第七》等仪目表现僚属对长官的礼仪。唐大中张敖《 新集
吉凶书仪(》 P. 2646等)和晚唐五代《 新集书仪(》 P. 3691等)已无上
于皇帝的笺表,而只保留了僚属上于长官的启状部分,并且这部分
也从郑氏书仪原来只有《 起居启》《、 贺正冬启》《、 贺人改官启及如
( 加)阶》等数种仪目增为数十种。由于这类启状对象是从上司、长
官到四"海 朝友",并且是以前者为主,所以明显地脱离"了 朋友"氛
围,而充满着下属恭礼上级和官场内相互逢迎的特色。从书仪看,
这类文范的内容和重要性显然已完全取代了笺表。虽然张敖书仪
与《 新集书仪》从作者和内容都可以认定基本上是属于带有敦煌本
地色彩的书仪,它们以启状取代笺表的做法或者不能完全代表中
原内地的情况。但是,一方面围绕求官求职,官场往来已成为唐人
生活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在唐后期中央集权日削、藩镇势力日
盛的形势下,不但地方长官对僚属的任用支配增强,且地方政治也
围绕节度使府为中心展开,并形成藩镇与藩镇、地方与中央的错综
复杂关系。因此官仪的受到重视便不是敦煌一地的特色而是带有
普遍性的大趋势。
在上述吉凶书仪所录官文表状书仪中，有一个特点十分突出，这就是作为官员礼尚往来的文范，是以贺仪、谢仪为主体，其内容几乎无不是贺加官、贺节、贺起居、贺喜（庆如中原来使）谢官、谢赐等，这一点，也可以用专门的表状笺启书仪予以说明。表状笺启书仪周一良先生定“义是涉及各方面公私事务的书仪”，由本书前编的介绍也可得知，这类书仪虽然各自的使用对象、范围、制作途径、方式不尽相同，有些是实用过的书信集成，有些则是依照某种模式和习语制作的标准书范；但作为官场酬应的性质万变不离其宗。如刘邺《甘棠集》，无论是前三集代陕虢观察使所作，抑或是第四集自左拾遗充翰林学士任上所作，包括致皇帝及中书门下、宰相个人、朝廷要员、僚友、节度使的表状书启等，均由谢贺仪组成，全集收书状等88首，内中有贺官及贺节、贺赦等仪58首（包括诞节进物状），谢赐谢官等仪10首，共占全部书仪的四分之三以上。与《甘棠集》相类似的P.37“23乡贡进士郁知言《记室备要》，现存约百数十余首表状书启中，除最后三首属荐官，余皆属贺、谢（仪多数为贺官，少数为答谢）。

同样，P.393《1灵武节度使表状集》有《（贺）起居》《、正月贺》等十二月贺《、谢马书》《、贺端午别纸》《、贺端午》《、贺官》等书题及内容，S.078《v县令书仪？》亦有《贺官》书题及多通书状。至于五代归义军时期称名《杂相贺》《、诸杂相贺》的书仪更是以谢官、贺官为主体。例如S.339《9杂相贺[语]》有《贺本使语》《、参天使语》《、贺赦文》《、赐物谢语》《、端午日贺扇》《、贺破贼语》《、城中有祥瑞贺语》、《贺雨》《、贺雪》《、贺加指麾使谢语》《、谢僧统都衙》《、贺天公主语》《、诸亲眷谢来答语》，内中除《参天使语》“内时候，伏惟常侍尊体起居万福”等语说明是参见起居，其余从名字可得知皆属谢、贺。
又如赵和平定为是唐咸通时代的一件《归义军僧官书仪》P.3715，P.2729》也有《贺破贼贺将军亦[同?，《贺破贼恩赐裹疮帛》《贺立德政碑》《贺画影麟台》《贺赐防秋兵马》《贺赐征马》《谢改授僧官》《《谢奏紫》《谢与兄弟奏官》、谢得衣服匹段》《贺谢奏授京城内外临坛大德》等诸多贺、谢之名。因此可以认为，贺、谢等礼仪性书仪成为晚唐五代表状笺启书仪的主体。

2. 贺、谢官仪与笺表形式、内容的雷同及其程式化
在敦煌表状笺启书仪中，“以官”为对象的贺仪数量明显超过给皇帝的笺表，而贺仪之中又以郑余庆书仪已列及的贺人改官升迁“的‘贺官’仪为最多，这一点，在《甘棠集》《记室备要》及类似敦煌书仪中都很突出。唐后期五代社会，一方面朝廷和皇帝已不是官僚生活惟一或主要的中心，特别是在地方藩镇；另一方面，一切围绕官场中的政治关系、政治活动而运转，官职的升降固然为时人瞩目且成为个人生活中最值得关注的内容。所以，以贺升迁为主要内容的贺仪增加并不奇怪，这既是为了维持某种关系，以达到相互提携或被长官照拂的目的，也是官僚社会中逐渐形成的礼仪需要。而这类贺仪中除了歌功颂德、钦贺对方得官外，常不“乏‘叨’蒙委任，常感恩私，抃跃之诚，实倍常品（《甘棠集·贺魏相公加礼部尚书》）‘忝承眷爱，忻抃伏深（《记室备要·贺节度使》）之类套话。但是这样一来，贺仪的中心便从皇帝转移‘到‘官’。

贺仪的对象或中心转移还可以贺仪与笺表名目的相同来说明。本书在讨论《朋友书仪》的月仪发展时，曾涉及到表状笺启中的月旦起居仪。如P.393《1 灵武节度使表状集》有从《正月贺》始，二月、三月，直到《十二月[贺]》的贺仪。每首贺仪的内容前部都是
与月份相关的节气景致用语，加上祝福升迁或者是官运亨通的吉祥话，首首如此，官或尚书。同样性质的贺仪还有，对象都是仆射、司空、尚书等。《记室备要》下(卷 P.3723)和《新集杂别纸(》 P.4092)。只不过《记室备要》是依《月令》按孟、仲、季来区分春、夏、秋、冬四季的，“如孟春月”、“仲夏月”等，每一月都有多通应时应景问候平安的贺仪。而《新集杂别纸》则是将十二月仪与元正、冬至两首共同列于知闻来往别纸八十八首”中的最前部，称之为月旦贺官，其文亦多赞颂祝福之语，其授书人则是仆射、司空、尚书等。从这“些月仪”末尾常用“的谨专奉状起居”，对照郑余庆元和《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和张敖《新集吉凶书仪》中的《僚属起居(启状)》、《典史起居启》和相应十二月景致用语，知这类十二月贺或十二月仪，便是所谓僚属或典史起居启状“。月旦是每月初一，即朔日。联系《唐六典》礼部式规定官员上起居表要在每月朔日，知所谓“月旦贺官”来源所在。它的实行表明唐后期礼制上行下效，节度使与其属下也有每月初一贺官之仪。对此《新集杂别纸》的一些书范“中近以月旦，曾附状起居”，近以月旦，令贵州知仪官附寄状上”亦可说明。而其中《私忌回书》一首“内伏奉荣示，以月旦合申陈慰，不令专候门墙”语尤可证明在节度官衙内，月旦本应祗候门墙，但在有事不去或在外不能参拜的情况下，即应有书候问起居。

应当说明，僚属或者典史对责任长官的起居状同样不始于唐代。《世说新语·言语第二》记晋丞相王导因族兄王敦谋逆，王含委职逃奔诣阙陈谢”，司徒、丞相、扬州官僚问讯，仓卒不知何辞。顾司(空和)时为扬州别驾，援翰曰：’王光(禄含)远避流言，明公蒙尘路次，群下不宁，不审尊体起居何如？”按当时王导官带扬州刺史，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539

监江南诸军事,顾和为其部属,故书语以问起居而捎带讥讽之意,是为一例。有趣的是,在杜友晋《吉凶书仪》中,起居一词在家族中是规定向祖父母、父母问安的专用词,不能用于其他人。但起居仪却又明确用于朝臣对皇帝或僚吏对长官,可见在家国制的天下,皇帝和长官是他们各自权力范围的家长和父母,后者在僚吏对长官的意义上尤其如此。这一点,唐代藩镇节度使与魏晋南北朝的三公和刺史开府带将军有十分相似之处。不过具体到唐代,用于节度使的起居仪又完全是唐前期皇帝笺表中月旦起居的翻版。在某种意义上,赴皇帝的朝见或节度长官的廷参也就可以称之为(问)起居,所以后唐明宗也曾定群臣五日一起居,上述书仪也有月旦专候门墙之说。而(问)起居也成为五代臣属参见时所用口头贺语,如《资治通鉴》卷一六○昭宗乾宁二(年895)记七月丙寅,李克用遣节度判官王瓌奉表问起居。这种情况与P.3691等《新集书仪》所记差不多。据这件书仪,藩镇僚属出使朝廷见到皇帝有初对圣人起居,先道:臣等起居圣躬万福。接着附本道节度使起居,道:臣离本道日,厶州厶军节度使某(甲注:称姓名)附臣起居圣躬万福。如出使藩镇也有每到州郡见节度使礼的初到相见起居,称:厶乙来日,本使厶官附起居厶官尊体万福。仪节几乎完全照搬。另外迎天使顿上送书有初马上相见,呼本使官,厶官起居厶官尊体万福之语,是代节度使对朝廷派来的天使问起居以表示特别的尊重。这和周一良先生提到的李涪《刊误》下今代谒见尊崇,皆[云]谨祗候起居……近者复云,谨祗候起居……
候起居某官”，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九起居在前，某官在后”，以及司马光《书仪》中谒诸官平状“中右某祗候起居某十位”的说法分一致，惟不“言祗候”二字而已。“起居”是谒见尊崇的意义应无疑义，但就月旦贺官而言在官场上并不是那么严格。后唐时期《灵武节度使书状集》中有一首《延州汝州风翔陕府侍卫左卫月旦书》，说明这“种月旦书”可以由藩镇发致有关官（员只是根据收书人地位不用起居字眼）。而“从月旦贺官”中所见仆射、司空、尚书等称实际上常常就是节度观察使的本官来看，由僚吏致书长官特别是节度观察使的情况是最多的。

除起居仪之外，于吉凶书仪和各类表状笺启书仪中更常见的前“揭贺元日”、“贺冬至”、“贺端午”等贺节仪，如刘邺《甘棠集》中有致朝廷藩镇官员的贺正贺冬仪近30首，占全部书仪的三分之一《。记室备要》中有贺正、贺冬及贺重阳书题，《3931中有《贺端午》及《贺端午别纸》。当然如果稍加注意，还会发现诸如贺雨、贺雪、贺破贼甚至贺祥瑞之类以往在奉达皇帝笺表中常见的名目也同样用于给节度使或官员的启状。正像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所规定的那样，一些贺仪贺启已成为属吏给长官或藩镇与藩镇、藩镇与朝廷官员之间常行或按时必行的礼仪。

致皇帝笺表和致官员启状名目的相似，固然可以说明是某些朝廷礼仪被普及，庆贺致敬歌功颂德的中心和对象也因此有所转移。而致贺对象的转移，基本上并没有改变贺谢仪本身的传统用①

——

①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载《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58—59页。
语，例如我们曾将S.1725v中的《贺破贼启》与P.390《唐前期书仪（武则天时期）》中《庆平贼表》加以比较，发现启所“用伏宣圣德，克震戎威”一类词语与表所用“的尚资妙算，天威致讨”、“圣略内昭，天威外震”意思差不多，但表的主题是恭贺皇家，而自称“名”、 “称下情”的启祝贺的却是荐拔自己“的恩造”或顶头上司。内中的推崇词语不过是借称皇“帝圣德”以颂扬长官。这种情况，正是唐后期某些贺官仪的特点。

这类官仪中更为典型的是郁知言《记室备要》。此书仪第一卷有《贺册徽号》、《贺南郊》、《贺册太后》、《贺册皇太子》、《贺赦》，仅从题目看似乎都是贺皇帝，细阅方知受贺者竟“是某官”。如《贺册徽号》称“伏奉某月日制书，皇帝建册徽号礼毕……伏以某官德茂清朝，道彰明代，致君而化齐汤禹，辅政而功比伊皋；河海晏然，乾坤朗（肃下略）。《贺南郊》称“伏奉某月日制书，皇帝郊天礼毕，大赦天下……伏以某官道契灵符，德昌圣历，固邦家之业，保社稷之鸿基，致使运泰时清，风和气（朗下略）。”以下诸贺仪的写法大同小异。从贺册徽号、郊天到大赦，都是皇家和朝廷的大礼重仪。但是不管有关无关，包括册太后、册太子在内，都要硬“和某官（这个某官，根据唐后期的情况只有可能是宰相、枢密使或节度使）拉扯在一起，不但在形式上涉及某官和皇帝、朝廷的词汇都一样用平阙示敬，而且在内容上大肆吹捧其功德，真是一件既荒唐又可笑的事，由此也可见皇威不振之下，贺官仪却是愈来愈兴盛。特别是它们与前揭藩镇支州往往不奉表笺的现象适成反衬和对照。官员的升迁及命运，很多时间会被某官所影响所操纵，所以对许多官员而言，官场“之仪”要比奉朝的笺表对自己的关系来得更密切更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晚唐五代敦煌书仪中各“类官仪”数量会大大超
在贺官仪不断增加的同时，还有一个倾向值得注意。这就是由于它们的形式、内容与笺表相似，故程式化的问题亦愈来愈严重。如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的《贺冬表》是：

臣某乙言，晷运推移，日南长至。伏惟皇帝陛下，膺乾纳祐，与天同休，罄无不宜。臣某乙诚欢诚喜，顿首顿首。臣某限以藩守，不获随例称庆阙庭，无任屏营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乙诚欢诚喜，顿首顿首，谨言。

这些贺语到了僚属的《贺冬启》就变成：

某启，晷运推移，日南长至。伏惟官位膺时纳祐，罄无不宜。某乙限以卑守，不获随例拜贺，下情无任惶惧。谨奉启不宣，谨（启下略）。

表与启除了某些用语有程度上的略微差异，几乎完全相同，而某些相同用语，亦可用于各种贺官场合。圆仁《入唐求法行礼巡记》卷一所言冬至之节，道俗向节度使致礼贺的所谓‘见相公即道：‘晷运推移，日南长至，伏惟相公尊体万福’”，即为一例。周一良先生曾指出此条贺语与敦煌归义军时代的一些杂谢、贺语类似，认为它们“都是近似书面的正式口头致词”，当时大约各种场合都有多少定型的口头致词。可见一些官仪在普及的过程中已程式化。

以上介绍的官仪主要是贺仪，谢仪的情况也大体不差。前述唐前期谢表最多的就是谢赐物及谢加官晋爵，此两类谢表唐后期

①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二）》，载《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86页。
逐渐降格为对长官（特别是地方节度使）的谢状谢启。如S.3399《杂相贺语》有《赐物谢语》:

天庭念边为重,土不产蚕,特降丝纶,兼之锦帛,此皆尚书功庸所及。某乙等忝事旌麾,下情无任感荷。

同卷《谢分散例物语》曰:

尚书福重三危,威声早著。特降天使,例物顿宣。某乙自料功踈,难胜厚赐,下情无任感恩惶惧。

这两件谢仪收书“人尚书”据赵和平考证可能是曹议金。两件赐物看来均属中原朝廷所赐,但是官吏感谢的直接对象却是分配赐物的归义军节度使。同一卷《端午日(贺按'贺'当作'谢')扇》,S.5643《诸杂相贺语》内《谢赐鞍马》《谢赐驼》《谢赐弓箭》等性质相同。这一方面说明,作为地方僚属,其谢贺的对象、敬奉的中心已从朝廷皇帝移至节镇长官;另一方面,本来是由朝廷皇帝例行的节赐,却转成为节度使向属下实行的恩赏。所以,与节度使谢皇帝诸仪的同时,书仪中见到更多的是官员谢节度使的启状。

至于谢加官爵方面,也是以地方僚属受节度使辟署或举荐的谢官仪最普遍。P.4050等卷晚唐河北（?）的一件吉凶书仪提到节度长官加官“说使主伏承天恩加拜御史中丞”,对一位藩镇同僚说“伏承司空仁恩,察以公干,擢拜河间长官”,提到自己则“是某[不]才,司空改差某州上佐”,司空仁恩差摄某州”,说明授官的来源、方式不一样。其中使“主加拜”是“由天恩”,而同“僚擢拜”或自己“差摄”都是“因司空仁恩”,所以感谢的对象也不同。官员必须向自己的直接提携者或责任长官谢恩。在朝官便首先是宰相,所以刘邺《甘棠集》中即见到有《谢赐绯上白令公及三相公状》一首。而
如果说，这还是朝官加官阶后对宰相所表示的一种客气和礼貌，那地方僚属加官后对节度使更要有谢官仪。因为正像P.4950所表现的，唐后期藩镇官职往往来自辟举或奏补，唐末以后更有墨敕授官，所以一切与授职升迁的“谢”便集中于节度使或直接长官。这47行：类作品敦煌书仪中比比皆是，如S.078《县令书仪》43—

蒙恩旨授，赴任，下情不伏蒙元帅令公台造，已赐指任感慰。此皆远依恩奖，每仗推扬，致兹叨忝之荣，免负提携（力以下略）。

这件谢仪说明，作“者蒙恩旨授”之“恩典”来源及感谢对象，都是“元帅令公”即某一节度使。这种情况，恐怕在归义军小朝廷统治下也最突出。如前揭《僧官书仪（》P.3715 + P.2729)中《谢改授僧官》《谢与兄弟奏官》，P.3625书仪中《谢授职》，P.2652《诸杂谢贺》中《谢僧统都衙》《谢都头、都牙官（史 吏）》等。其中如《谢僧统都衙》道：

“乙一小卑（史 吏），未施尺寸之功，特蒙司空荐拔，乙得伏事都牙阶 требования，下情无任喜跃。

“荐拔”自己的“是司空（节度使）”，谢“的却是“要伏事”的僧统都衙”；这正像授官加阶来自朝廷，却要感谢节度使一样，被谢的往往

是顶头上司，是与自己有直接关系者。这从人情出发，很易理解，但因此造成的礼仪中心多元化即不可避免。可以想像在敦煌社会，所谓谢、贺诸仪在各级官吏间进行，并归总于节度使，正像它们在中原朝廷也同时围绕皇帝进行一样，其间或者已无太大差别。

以上是敦煌写本书仪所反映的唐后期贺、谢诸仪普及的情况。如同前面已经谈到的，唐代社会的官僚化和藩镇体制并不是敦煌
一地独有的现象，所以礼仪的普及也不是敦煌社会或是某些书仪所仅见的。开、天以前传世文献中，贺官仪尚较少见。中唐以后已成上《贺裴桂州启》、裴渐多，如柳宗元有《代裴中相贺破东平状》、元《答郑员外贺启》、李翱有《谢杨郎中书》《贺行军陆大夫书》等，唯传世数量似尚不及给皇帝的稹有《贺裴相公破淮西启》笺表。晚唐如李商隐、罗隐、崔致远等人的文集中，这类谢、贺官书启已占有很大成分，其数量甚至超过给皇帝的谢、贺表仪。可见中晚唐以降，礼仪普及化的程度与敦煌书仪所反映的一致，这种情况正与唐社会的总体发展同步。

总之，起居、谢贺诸礼仪逐渐推广，反映所谓官场之礼已经从朝廷到藩镇，从中央到地方，由内而外、自上而下非常深入地渗透到唐朝官僚社会的各个层次和环节，并被整个社会所采用所接受，从而成为官场政务活动和日常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它的普及和程式化、固定化，正是唐朝整个官僚制社会成熟化的表现。官员们因此在其任职过程中，就必须小心翼翼地注意这些刻板的仪节，以不示时机地表达对于皇帝或长官、同僚的敬意，构建官场内彼此相互提携的关系，从而维护其个人在其中的地位及升迁。这也是他们政治生涯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但是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到另外的问题，这就是唐朝官场的礼仪在普及的过程中事实上已发生了由以皇帝为中心的一元化向藩镇体制多元化的转移。须知在表状笺启书仪中，不“仅官”仪的数量大大超过给皇帝的笺表，且在名目上也可以等同于致皇帝的笺

①《全唐文》卷五七二，中华书局影印本，第5783页；卷五七六，第5825、5826页。
②《全唐文》卷六三五，中华书局影印本，第6414页；卷六三六，第6419页。
③《全唐文》卷六五三，中华书局影印本，第6640页。
表而发生十分一致的现象。这种情况或可认为是唐五代官僚社会
上行下效的结果。但是正如我们已经陈述的,一方面朝廷的某些
重大礼仪活动,如前揭《 贺册太后》《、 贺册南郊》等实际上已被当作
了官员向长官示敬和歌功颂德的机会;另一方面,原来作为显示国
家昌盛的贺祥瑞等礼仪内容,也因《 城中有祥瑞贺语》这样的仪目,
堂而皇之地照搬到了归义军这样的边隅小朝廷之中。而诸如《 贺
立德政碑》《、 贺画影麟台》以及《 赐物谢语》《、 谢分散例物》等更是
将中原王朝的种种恩赏,一律转化为吹捧藩镇节度使的德政。这
说明唐后期五代政治多元化的同时也造成了礼仪的多元化。尽管
笺表之类似乎只是官场生活中某种细微末节的程式,但是,起居谢
贺官仪的推广,却昭示了以节度使为核心的地方小朝廷、小社会的
形成。藩镇节度使既然可以代皇帝和朝廷授官、颁节赐,关怀并决
定官员考课及任免升迁的大事,那么官员臣服、颂扬的对象便只能
是节度长官而不是皇帝。由此本应行于皇帝的礼仪却行于官吏之
间,这就正像周朝衰微后,诸侯大夫上拟天子,乃是一种礼的僭越
和下移。因此通过敦煌文书和传世史料中的笺表启状行用的变
化,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的官场生活,更反映了唐朝统治衰
落后下拟于上,地方权力僭越中央的普遍事实。而后者或者也是
唐后期五代礼仪变化中一个最值得关注的现象。

二、唐后期五代中央与地方的礼仪交接

书仪只是形成文字的礼仪,它的形成同时还必然有着诸多行
为的规定和实施。敦煌官文书仪特别是其中谢贺仪的众多其实是
唐后期五代中央地方礼仪行为繁复化的表现。唐前期在朝廷规定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五礼之仪中，涉及地方官的内容主要是针对诸州刺史上佐的朝参。除此之外，集使方面中央对于官员的礼仪和相关待遇，便多是依照品级进行，基本无内外之分。这是因为唐朝地方所行州县二级制，决定了州长官与中央关系是直接的，虽有采访处置使，但设置既不经常，且只起监督作用，无碍地方行政，所以中央与地方矛盾并不突出。但是在唐后期五代藩镇割据下，不仅行政中平添节度观察使等道一级行政长官，也因此使中央地方关系复杂化。中央与地方的礼仪交接由此受到重视，并通过藩镇和州等不同的方面、层次具体化了。由于这方面牵涉内容十分丰富，这里只围绕节度刺史的入觐朝参、拜官中谢和丧事仪节等略叙一二，以增广书仪所见。

（一）节度刺史的入朝朝参与上事中谢

唐五代官僚社会中相关地方官员的朝觐及拜官参谢等礼仪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并不突出，但是敦煌《刺史书仪》的出现，却令入注意到它们的重要。继周一良先生《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对《刺史书仪》涉及刺史拜官、上任、卸任的各种表状作出分析后，陈柞龙发表《看了周作〈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以后》，除了考订文书时代在后唐长兴中外，还采集迻录《五代会要》多条史料以说明与刺史相关的后唐典章制度、礼俗名物，内中实涉及节度、观察、刺史等外官的入朝、朝参及拜官中谢等仪，很值得重视。

①见《大唐开元礼》嘉礼，卷一○“九 朝集使朝见并辞”、卷一一“三 皇太子受朝集使参辞”、卷一二“六 朝集使于尚书省礼见”等条511、533、560、600页。陈柞龙《看了周作〈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以后》，载台湾《敦煌学》第六辑，1983年6月，第31—68页。
朝参班见和节度入觐

唐代的朝参有常朝和朔望朝参，又有正（衙·宣正殿）朝见与入阁（“紫宸殿便殿朝见”）之分。唐初制度，朔望朝参御宣政殿见群臣，谓之大朝。但唐后期如有大事如皇帝册立、即位、上尊号、颁新制、试制举人等多在宣政殿，也不局限是否朔望，而常（朝 肃宗以后单日临朝，双日不坐）则多入阁殿，也可以在朔望或平日有需要时举行朝参。班位依品级进行。《唐会要》卷二五《文武百官朝谒班序》贞元二年（年 786）条“有其……”

按据《资治通鉴》卷二八六天福十二年三月丙戌“朔百官行入阁礼”条下胡注引欧阳修曰：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见群臣，曰常参；朔望荐食诸陵寝，有思慕之心，不能御前殿，御便殿见群臣，曰入阁。宣政，前殿也，谓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谓之阁。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者，乃自正衙唤仗由阁门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随而入见，故谓之入阁。（见《新五代史》卷五四《李琪传》）然欧阳修所说有不确。程大昌《雍录》卷三已指出其失，认为玄宗之前早有入阁。并曰：唐西内太极殿，即朔望受朝之所，盖正殿也。太极之北有两仪殿，即常日视朝之所……此太宗时入阁之制也。至高宗以后，多居东内，御宣政前殿，则谓之衙，衙有仗；御紫宸便殿，则谓之入阁。但唐后期多于有大事时入宣政殿，德宗时且定五月一日御宣政殿受朝贺，是不受朔望之限。常朝外又有有事召宰臣或群臣入对延英之制，延英也是便殿。五代名称含义有变。胡注引欧阳修曰：五代之时，群臣五日一入见中兴殿，便殿也。此入阁之遗制，而谓之起居；朔望一出于文明殿，前殿也，反谓之入阁。又引《旧五代史》曰：梁制，每月初入阁，望日延英听政。后唐之制，朔望皆入阁。是五代朝参基本延续唐制而来，但入正殿称入阁，入便殿则称起居。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大历九年六月辛丑，宴泚及将士于延英殿条引卢文纪曰：上元以来，置延英殿，或天子欲有咨度，皆非时召见。又引程大昌《雍录》指出延英殿于高宗初建即有，但召对宰臣始于代宗。同书卷二四六会昌元年闰月己亥，开延英，召宰臣议之条胡注曰：唐自德宗以后，群臣乞对延英，率于延英门请对。《会要》曰：元和十五年，诏于西上阁门西廊内开便门，以通宰臣自阁中赴延英路。宋申锡之得罪也，召诸宰相自中书入对延英。按据《唐会要》卷二四《朔望朝参》关于元和十年三月壬申朔延英殿召对宰臣的记载，及同卷天祐二年有今后每月，只许于一、五、九日开延英，计九度其入阁日，仍于延英日一度指挥的规定，是朔望开延英已可取代正衙朝见。故后梁有望日延英听政及五日起居之制，皆以唐制为根据。
年九月五日敕，应文武百官朝谒班序”，内重要官员排列如下注文，中书门下、供奉官、若入阁，即各随左右省。其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通事舍人，若横行参贺辞见。御史台、留守、副元帅、都统、节度使、观察使、都团练、都防御使，并大都督、大都护持节度者，即入，班在正官之次；余官见者，各从本官班序。

此敕最后说“明辞见宴集班列先后，请依天宝三载七月二十八日礼部详定所奏敕公式令，诸文武官朝参行立，二王后位在诸王侯上，余各依职事官品为序下略”。朝参按照官品排班历来是一基本原则，但是以上官员是另行排列而不在本品官班内的，节度使等也在其内。此外朝参本是文武班分东西而立的，但是同件敕文关于“检校官兼官及摄试知判等官“除留守、副元帅、都统、节度使、观察使、都团练、都防御使，并大都督、大都护持节兼外，余应带武职事，位在西班，仍各以本官品第为班序”，也证明节度使等不按一般武职所带检校官职站位。事实上，由于他们所带官衔都很高（三公、侍中、中书令、仆射、平章事、尚书、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等），所以班在正官之次，不过是在朝廷正员之后而仍居主要首长之列，这无疑显示了他们职事的要重和礼仪地位的特殊。

但朝参和至正朝会这种礼仪节目一般节度刺史等外官只有入朝归觐和卸任到京时才得参加。《五代会要》卷六《诸侯入朝》后唐长兴元（年930）七月敕，就规定“诸道得替防御、团练等使及刺史，到京朝见后，并宜于班行比拟。如未有员阙，可令随常参官逐日立班”。由于五代改称正衙朝见为入阁，每五日便殿朝见为起居，所以
次年十二月，谏议大夫卢损又“奏请前任节度防御团练使、刺史，每五日随例起居”。至清泰元（年934）十一月御史台奏更强调“了前任节度、防御团练使、刺史、行军副使”五日起居和朝参“的辍班”问题，说明节度刺史等重要外官只要到京就得参加朝见。

节度使的入朝归觐在唐后期是大事。德宗贞元中，颜真卿出使淮西被李希烈所囚，希烈既陷汴州，僭伪号，使人问仪于真卿，真卿曰：‘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者诸侯朝觐礼耳’。所谓诸侯朝觐礼即指节度使入觐之礼。入觐朝见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要向皇帝行跪拜舞蹈的繁缛之仪，所以入觐是尊崇朝廷的表示①。一般节度使任职数年就应朝觐，但也有跋扈者十数年不入朝。行不行觐礼被作为藩镇是否敬奉和归顺朝廷的标志而受到重视。从以下记载可以看到几次重要的入觐朝见活动：

《旧唐书》卷二○○下《朱泚传》称：

（大历）九年，就加检校户部尚书，赐实封百户。幽州及河北诸镇，自天宝末便为逆乱之地，李怀仙、朱希彩与连境三节度，名虽向顺，未尝朝谒。至是泚率先上表，请自领步骑三千人入觐，诏修甲第以待之。泚至京师，代宗御内殿引见。赐御马两匹、战马十匹、金银锦彩甚厚，又以器物十床、马四十匹、绢二万匹、衣一千七百袭赐其将士，宴犒之盛，近时未有。

《旧唐书》卷一五七《韩弘传》记汴州节度使韩弘：

（元和）十四年，诛李师道，收复河南二州，弘大惧。其年七月，尽携汴之牙校千余人入觐，对于便殿，拜舞之际，以其足①

①关于唐代朝会之仪及节度使朝觐参见陈戍国《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0—242页。
长庆二(年 822)四月,裴度为河东节度使,入觐,见于阁内。

以上几次的接见都是在便殿"或 阁内"举行,此外又有比较特例"的 开延英"。如郭子仪大历九年入朝,就是入对延英《。 旧唐书》卷一四○《 张建封传》记张为徐泗节度使:

( 贞元)十三年冬,入觐京师,德宗礼遇加等,特以双日开延英召对,又令朝参入大夫班,以示殊宠,建封赋《 朝天行》一章上献,赐名马珍玩颇厚。

《 册府元龟》卷三八五《 将帅部·褒异一一》:

张茂昭为义武军节度使……宪宗五年冬来朝,十二月二日至京师。故事,双日不坐,其日特开延英殿对之。延英殿也是便殿。"但 开延英"一般是对宰相重臣,何况又于不坐朝的" 双日",故"称 礼遇加等"。张建封和张茂昭与朱泚、韩弘一样,是坐镇强藩、深有影响的人物。裴度也是出将入相的朝廷决策人。皇帝对他们的接见应当都是规格较高,并附之以宴赐活动,非常朝日开延英尤其可见对其入朝的重视。如前所述朝见本有宣政殿和入阁两种。宣政殿是皇帝正衙朝见处,欧阳修所谓" 衙,朝也,其礼尊;阁,宴见也,其事杀" 《。 旧五代史》卷三六《 明宗纪》天成元(年 926)六月诏关于蕃客的朝见就
说到依旧仪，大蕃须示于威容，即于正衙引对；小蕃但推于恩泽，仍于便殿抚怀。仪。但规模大并不就是礼遇加等，且正因为朝见和宴见意义不同，所以宋人张洎总结说：或夷蛮入贡，勋臣归朝，亦特开紫宸殿引对。勋臣和小蕃都是需要见的，所以节度使的接见要在便殿举行。至少重要节度使的殿举行朝见都是如此。所以对内而言便殿的接见反而等级更高。

从上述史料还可以看出，节度使觐见主要要行拜舞谢恩之礼。前揭《册府元龟》言裴度觐见，谢恩毕，趋至龙墀，伏奏河北讨贼无功之状，及蒙除东都留守，又奉诏许至京师，循叙恩德，因呜咽涕泗，伏而未起。通事舍人却举常令假宣止。度未及言，帝为动容，遽曰：卿所谢知，又称：是时赴朝仪式，阁中，且往延英待卿矣。群官未退，宰相不奏事。或遇称贺之礼，则谒者承旨假辞宣答。及是，帝以元臣敷奏，特异常礼，百辟在列，咸闻圣言，近岁未之有也。可知拜谢之际，皇帝一般不问，只是按惯例谒者承旨假辞宣答，行一套惯常的礼仪格式。奏事应在百官退后，或直待开延英召见，裴度行礼之后即直接奏事的做法是出格的。但是便殿接见毕竟可以使皇帝在百官退后与节度使叙话，了解庶事。如此不但可以使中央地方、上下之情得通，也可以表达皇帝的关怀垂询，所
“谓推以恩泽”，这不能不说是便“殿宴见”的意义所在。节度使除受到接见外，一般还有宴赐之仪。贞元二十年义武节度使张茂昭入朝，“锡宴于麟德殿，赐良马甲第及器用锦彩极厚。”麟德殿是德宗以后宴文武朝臣及藩将蕃客的常所。史称德宗兴元回京”，每间日宴勋臣于麟德殿。元和十三年二月，殿。”宪宗以淮西贼平，因功臣李光颜等来朝，欲开内宴，诏六军使修麟德殿之东廊，并特于麟德殿前造。元和十四年“七月甲会庆亭申，御麟德殿，宴宣武节度使韩弘及判官大将军等共三百人，赐物有差。八月，田弘正入朝”，宪宗待之隆异，对于麟德殿。参佐。将校二百余人皆有颁锡，进加检校司徒、兼侍中，实封三百户。”⑤穆宗时也于麟德殿宴李愬、李《旧唐书》卷一五六《王智兴光颜传》记王智兴大和中讨沧景首立其功”，贼平入朝，上赐宴麟德殿，赏赐珍玩名马，进位侍中“。后唐宴节度使多在洛阳嘉庆殿、长春殿，后晋、后周又有永福殿、广政殿等，历代虽殿名不一，但对入朝大藩之宴赐则为常事。唐末五代又形成节度使入朝献买宴钱，因循几为常制《。唐会要》卷二四《诸侯入朝》亦“作赐宴于麟德殿”。“按对于麟德殿”《，唐会要》卷二四《诸侯入朝》亦“作赐宴于麟德殿”。《册府元龟》卷一一一《帝王部·享宴三》，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317页。《旧唐书》卷一四一《田弘正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851页。《册府元龟》卷一一一《帝王部·都邑二》，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60页。③参见《旧唐书》卷一七○《裴度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419页；《册府元龟》卷一四《帝王部·都邑二》，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610页。④《册府元龟》卷三八五《将帅部·褒异一》兴元元年七月壬午条，中华书局影印本，第4580页。⑤《册府元龟》卷一三三《帝王部·褒功二》。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朝《记代“宗 永泰元(年 765)正月,宰臣王缙等奏,春秋之义,臣子一例。今后有大臣入朝,百僚望请朝罢,于中书行相见之礼。其宴践准故事,于鸿胪亭集”。“时上优宠大臣,入觐之日,建百官朝罢行相见之礼。”据史载代宗优宠郭子仪,呼为大臣而不名,则注。然此为公见公集,“中 大臣”当指郭子仪之外又有私宴《。资治通鉴》卷二二四记大历二(年 767)二月丙戌郭子仪入朝”,上命元载、王缙、鱼朝恩等互置酒于其第,一会之费至十万缗《。旧唐书》卷一二○《 郭子仪传》则载此次子仪入朝”,宰相元载、王缙、仆射裴冕、京兆尹黎幹、内侍鱼朝恩共出钱三十万,置宴于子仪第。恩出罗锦二百匹,为子仪缠头之费,极欢而罢”。另外一般节度使入朝,又“有 台参”之礼;节度使还任或改职赴任,行前也须面辞皇帝。凡此类皆同于授官,可详下拜官上事诸仪。

2. 拜官中谢
节度、刺史除拜之际 “有 中谢”之仪《。唐会要》卷六九《 都督刺史已下杂录》先天二(年 713)七月敕称”:自今已后,都督刺史,每欲赴任,皆引面辞。朕当亲与畴咨,用观方略“。皆引面辞”就是面辞皇帝的所谓中谢。同书卷二五《 杂录》开元十五(年 727)十月规定“ 诸道遥授官,自非路便,即不须赴谢”,说明在京城者是要拜见皇帝的。唐后期对此尤为重视,同卷载:元和元(年 806)三月,御史中丞武元衡奏”:中书门下御史台五品以上官、尚书省四品以上官、诸司正三品以上官,及从①《 旧唐书》卷一二○《

郭子仪传》记史臣裴洎曰”:代宗不名,呼为大臣”。中华书
三品职事官，东都留守、转运、盐铁、节度、观察使，团练、防御、招讨、经略等使，河南尹、同华州刺史、诸卫将军三品以上官除授，皆入阁谢，其余官许于宣政南班拜讫便退。从之。

(开成)三年(838)二月，御史台奏宣：“自今以后，遇延英开，拟中谢官，委司台立一日，依官班具名列奏。”如先奏，即不在中谢限。又敕新授方镇，延英开日，便令中谢。

这里提到的谢官也是“有入阁”谢及“宣政南班拜讫便退”两种形式，规定宰相以下的高级中朝官和节度观察使等重要外官使职入阁面辞中谢，一般官员却只能于宣政殿随班行礼点到而已。这个范围后来扩大到一般刺史，而且已改为多在延英殿举行。例如武宗时，王起以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节度使，赴镇日，延英辞，帝请之曰：‘卿国之耆老，宰相无内外，朕有阙政，飞表以闻。’宴赐颇厚。

崔珙拜岭南节度使、令狐绹自宰相出为河东节度使，都是延英中谢。可见入阁或延英辞由于可以向皇帝面奏，故比正衙谢规格高。节度观察使等除了连假三日的特殊情况可以到宣政门外走个形式，一般都须面辞。

《唐会要》卷六八《刺史上》：(元和)三年正月，许新除官及刺史等，假内于宣政门外谢讫进辞便赴任。其日，授官于朝堂礼谢，并不须候假开。国朝旧制，凡命都督刺史，皆临轩册命，特示恩礼。近岁虽无册拜，而牧守受命之后，便殿召对，仍赐衣服。盖以亲民之官，恩礼①

①《旧唐书》卷一六四《王起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280页。
②《旧唐书》卷一七二《令狐滈传》、卷一七七《崔珙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468、4588—4589页。
速之任，适遇寒不可废也。时新除河南尹裴复求；李吉甫，复求之甥也，特为奏请，遂兼刺史有是命，非旧典也。

此条所"说牧守受命之后，便殿召对"即入阁，刺史上任应等到面见之后，看皇帝是否有问话或者指示，所"以假内于宣政门外谢讫进辞便赴任"仅属特殊情况。由于刺史谢官后"，准敕例，不计近远，皆限十日内发"，为了使刺史及时到任，太和五年五月御史台奏，请"求如限内遇延英不开，亦请准常例进状候进止，便发"，不许妄托事故逗留。这与元和规定相类，也是在礼仪上的从权。但是开成元年闰五月中书门下奏"称伏准旧例，刺史授官后，皆于限内待延英开日，候对奏发日，详度朝旨，自今以后，除刺史，并望延英对了奏发日。地近限促，不遇坐日，亦望许于台司通状，待延英开日，辞了进发"，敕旨依奏"；还是尽可能地强调延英对见。至三年二月，又"有奉宣：新授刺史，于阁内及延英中谢，不必须候延英开"的规定，"则似乎在面辞和发日有限的矛盾下，最后甚至决定可以随时接见。唐代刺(史唐朝旧制"入阁申谢的对象甚至还包括京畿县令)遇到连假三日"可以到宣政门外走个过场的事看来还通不过，正常情况一般仍须面辞，说明节度刺"史中谢"本身是受到重视的。

和节度入朝觐见同样，外官中谢面辞少不了的是一套赞拜之仪《。刺史书仪》"有朝见记事"一首，记得替回朝时见皇帝礼"：初

①以上分见《唐会要》卷六八《刺史上》，国学基本丛书本，第1205、1206页。
②《唐会要》卷二五《杂录》，国学基本丛书本，第475页。
③《旧唐书》卷一七八《郑畋传》记郑畋宰万年，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631页。
拜，两拜，拜后舞蹈，舞蹈后又三拜，拜后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又两拜出班。致词：臣等得替归阙，获面天颜，臣无任瞻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致辞后又拜，三拜便出。“其中所说的赞拜之节与《五代会要》卷六《开延英仪》记次对官御史中丞、三司使、京兆尹等奏所司公事”，赞两拜，搢笏舞蹈，三呼‘万岁’，又三拜讫，奏‘圣躬万福’。奏所司公事讫，宣‘赐酒食’。又两拜，舞蹈谢讫，阁门使喝‘好去’，南班揖殿出，于客省酒食”基本一致；“惟致辞‘与奏所司公事’情况有别且未言赐酒食耳”。致辞“当是准备好的套辞，这在中谢也是一样《刺史书仪》‘有得官后谢辞散语’和‘朝辞’语。散语称：‘臣等言：臣素乏功勤，叨承睿渥。方忧旷职，未报明恩。今者伏蒙圣慈，曲降丝纶，再分符竹，誓竭驽钝之效，将酬雨露之恩。臣无任感恩谢圣，激切屏营之至。’朝辞语稍简，‘由臣伏蒙圣慈，除授臣州使，今赴本任，乍远龙颜’之类的话，知道两者有别。前者为一般中谢语，后者则是谢官的当日辞了进发。两种可根据情况选择。
入阁或延英辞对于朝廷而言本有考察外官和加‘以抚怀’的双重目的。前揭《唐会要》卷六八开成元年闰五月中书门下奏说明，入阁或入延英对见‘是重治人之官，欲陛下观其去就，察其言语，亦所以杜塞宰相陈情’。而新除刺史却因怕见皇帝察问，并往往进状便辞，盖恐对奏之时，错失乖误；由此奏中才强调必须要等待延英开面辞。同卷开成三年三月敕关于刺史谢官常仪规定：新授刺史，如遇入（阙阁）申谢者，其日，各随本班引入，候班退，刺史便接次对官立。候次对官班讫，通事舍人引至横街前，通事舍人口奏云，新授某州刺史某人等申谢。如唤近前，即引上龙墀；如不唤，即各自奏发日讫，通事舍人即宣某人等
也是说入阁班退后，皇帝要专门接见新授刺史。在其申谢时，可以"唤近前"，引上龙墀问话，这就是上面说的便殿召对，仍赐衣服。盖以亲民之官，恩礼不可废，与节度使的入觐朝对颇有相似之处。

五代节度观察刺史谢官之仪，也是基本依据唐朝。《五代会要·开延英仪》在宰臣、两省官和次对官御史中丞、三司使、京兆尹赞拜舞蹈及奏所司公事后，亦称：

合赴延英中谢官，文武两班三品，及御史中丞、左右丞、诸行侍郎、谏议、给事、中书舍人，并诸道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两县令皆入谢，并通唤。文武四品以下，及诸道行军司马、节度副使、两使判官、书记、支使、推巡令录等，旧例并不对敭申谢，只于正衙朝谢。"这条史料并未载明时间，但是规定的内外中谢官范围基本同于唐（朝"惟两县令前述史料不见，但唐朝长安、万年县令实亦如此，详前注），行军司马以下并不对敭申谢，只于正衙朝谢"其实也就是不行入阁赞拜，只"于宣政南班拜讫便退"的唐朝旧例，因此这里的开延英仪应当就是五（代很可能是后唐）抄录或因袭的唐朝礼制。入阁或入延英之所以比正衙谢规格高，也是由于有"对敭申谢"的机会向皇帝面奏。又《五代会要》卷六《杂录》：

(天成)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中书舍人刘赞奏"：往例，应诸道节度使及两班大僚，凡对明庭，例合通唤，近日全废此仪。伏乞特诏所司重定。向来格品若合通唤，准旧施行。中书贴
四方馆。据状称，旧例节度使新除中谢，及罢任赴阙朝见，合得通唤。文班三品已上官，武班二品以上官，新除中谢及使回朝见，亦合得通唤。从之。

这里“的通唤”即传唤，显而易见就是上述节度刺史和高级文武等官被单独召见之礼。

后唐时中谢范围又有所扩大。《册府元龟》卷六一《帝王部·立制度二》记明宗天成四（年929）正月中书“奏凡外朝官此后并令中谢”，得到批准。但是同书卷一○八《帝王部·朝会二》末帝清泰三（年936）三月庚子诏称阁门陈奏，对于内外官吏的入见重新作了规定，“将中谢”范围限制到节度观察两使判官，而且诸“如应诸州差判官军将贡奉到阙，无例朝见，以名御奏；放门见，赐酒食，得回诏，进膀子，放门辞”，改“为只令朝见，余依旧规”等等，充分说明了五代外官礼仪的升格。

外官在中谢面君之前，照规矩还有“状取进止”，即上揭《唐会要》卷二五开成三年御史台奏，请谢前一日，依官班具名列奏。“《唐会要》卷六九《都督刺史已下杂录》称：开元元年十二月三十日敕，都督刺史都护，每欲赴任，皆引面辞讫，侧门取候进止。又《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三》：凡出，不逾四面关则不辞见。都督、刺史、都护既辞，候旨于侧门。左右仆射、侍中、中书令初拜，以表让。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及诸司长官，谢于正衙，复进状谢于侧门。
《新唐书》所“说 候旨于侧门”，就是侧门取进止。此制看来至少始于开元。侧门，据《唐两京城坊考》卷“西京大明宫”条、程大昌《雍录》卷“端门掖门”条都说是在含元殿南的左右金吾仗院，即含元殿的东西廊上。但据日本学者松本保宣考证，侧门广义上也指通达宫禁的宫殿侧门，并指出唐“朝侧门论事”有别于通过宰相中书机构的正门，《刺史书仪》有内容“是右臣可直接到达皇帝蒙恩除授前件官，谨诣正衙祗候谢，伏听处分”的正衙谢状“和‘右臣蒙恩，除授前件官，谨诣东上阁门祗候谢，伏候敕旨’的谢恩状子，又‘有得替到京朝见状子’，称‘又臣得替到京，谨诣东上阁门祗候见，伏候敕旨。’状子和谢状一称于东上阁门，一称于正衙，周先生认为就是《新唐书·百官志》所‘说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及诸司长官，谢于正衙，复进状谢于阁门在宣政殿左右，可直达皇帝侧门”常朝的紫辰殿或延英殿。所以，谢于阁门也与侧门论事相似，应与谢于正衙者意义有别。书仪的谢恩状子称臣，“称‘伏候敕旨’，末尾是‘具全衔某乙状奏’；正衙谢状却是称‘右臣即名’，称‘伏听处分’，末尾是‘牒件状……具衔右牒’。按公文惯例前者对象是皇帝，后者是有司。这似乎也反映入阁”与“正衙朝谢”两种等级不同的情况。

总之，对于节度观察使和刺史所规定的入阁中谢反映了他们在朝廷礼仪方面的特殊地位，其来源正在中央对地方的极端重视和中央力图加强其统治权威的愿望。特别是朝廷对于刺史“中谢”的要求，尤宜理解为是中央越过节度使，而对州级官员施加的。

①松本保宣《唐代的侧门论事》，载《东方学》86辑，1993年，第36—52页。
②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载《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62—63页。
直接影响“和”关照“之一。因为通过“内通唤”，毕竟可使皇帝与地方长官亲自接触和直接对话，了解庶事乃至面授机宜，其意义与藩臣入觐见于便殿是同样的。

3. 礼钱、台参和上事诸仪
节度刺史拜官后的礼仪，非仅“有中谢”一节。陈祚龙由《刺史书仪》对宫城各门“的俵钱去处”，进而联想“至少后唐诸道、藩垣的文武大员进京公干，前往京中某些重要官署办事时，还得分别花散一笔‘入门费’的问题。”但陈先生提到史料中的“光省礼钱”“和光台钱”事实是官员新拜官后按制度必须交纳的礼钱，不是进京办事公干的入门费。例如《旧五代史》卷三六天成元（年926）七月辛巳条据中书门下“奏条制，检校官各纳尚书省礼钱”，自太师太尉至员外郎中不等，下诏曰：

会府华资，皇朝宠秩，凡霑新命，（各合？）纳礼钱。爰自近年，多隳旧制，遂致纪纲之地，遽成废堕之司。况累条流，就从减省，方当提举，宜振规绳。但缘其间，翊卫勋庸，藩宣将佐，自军功而迁陟，示恩泽以奖酬，须议从权，不在其例。其余不带平章事节度使及防御、团练、刺史、使府副使、行军以下，三司职掌监务官，州县官，凡关此例，并可征纳。其检校官自员外郎至仆射，只初转一任纳钱，若不改呼，不在征纳。仍委尚书省部司专切检举，置历逐月具数申中书门下。

这一条同被记载在《五代会要》卷一四《尚书省》后唐天成元年七月①陈祚龙《看了周作〈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以后》载台湾《敦煌学》第六辑，1998年6月，第31—68页。
二十七日条，惟行文略有差异。又《五代会要》卷一三《门下省》同年九月二十五日门下中书两省状根据以上规定也提“出准旧例，检校官合纳光省礼钱”，伏缘省司旧例，别无钱物，只征礼钱，以充公廨破使”，要求像尚书省那样征光省钱”，所冀朝廷故事，免失于根源；省阁旧仪，长存于规制”。其纳钱者依次排列，一等为防御、团练、刺史、诸道郎官、三司职掌、检校左右散骑常侍，二等为两府及次府少尹、左右司马、别驾、长史，三等为都押衙至大将军，四等为都头、都指挥使以下，五等为进奏官；只不过纳钱数较旧例略减，分别从一十五千至五千减为五千至二千不等。敕批“宜令中书门下两省准此，逐月具数申中书门下”。

御史台也是同样《。五代会要》卷一七《御史台(》《册府元龟》卷五一七《宪官部·振举二》略同)后唐同光二(年924)三月三十日御史台“奏所除诸道节度观察防御经略等使、刺史、县令及诸道幕府，兼诸司带宪衔兼官，合纳光台钱”，自兼御史大夫至兼监察御史，也较原来纳钱减半，从十五千至六千六百五十不等。要“求应有诸道节度观察使、刺史、经略防御等使及诸道幕府上佐官，井诸司班行新受兼官者，井合送纳前件光台宪衔礼钱”，并说明只“有送纳光台礼钱毕”才可以得到告身。可见光台钱“是带宪衔”外官所必交。由于外官基本都有宪衔，所以光台钱的交纳就几乎包括了所有节度使以下的官员。此外，周显德五年958)闰七月一日御史台申(见现)行事件“有应新除节度、防御、团练、刺史、宾幕、州县官兼带(五三?)院宪衔，合征光台礼钱，如是已曾纳过，准旧例不

①《册府元龟》卷六一《立制度二》同光三年正月戊戌敕，“称兵吏部以台省礼钱为名，所司妄有流滞。在京者遽难应付，外来者固是淹延”，要求减少礼钱的征收，可以说明礼钱索要已成为官员上任的障碍。
征"，也说明对外官光台钱的征求五代一直有之。以上对新上任的官员征收光省、光台钱一类都"以旧例""、旧规"或朝廷故事"作依据，何为旧例旧规?张国刚依据《唐会要》卷五七《翰林院》乾宁三(年896)七月条因翰林学士承旨陆表拜相而言"及故事，三署除拜，有光署钱，以宴旧僚，内署即无此例。扆入相之日，送学士光院钱五百贯，特举新例，内署荣之。仍定例，将相各二百千，使相五百千，观察使三百千，度支三百千，盐铁二百千，户部一百千"作了解释。他指出三署就是尚书、中书门下和御史台，认为五代的台省礼钱即光台钱和光省钱，其制当始于唐代，并且很可能滥觞于光署钱并由之发展而来。它由从三署超资得官例须纳钱本署，发展到凡带宪衔、检校官衔者皆须纳钱台省，因而其纳钱对象便大大扩大了。不过唐代的光署钱与超资得官似乎关系不大。五代和唐代的区别，更在于拜官礼钱是从使职扩大到使下职掌，而且是普遍地针对外官，显示了藩镇格局下的礼仪特色。晚唐五代外官礼钱的实用性很强，已不是所"谓"宴旧僚"的性质。文献通考》卷四一《学校考二》指出"：按五代币法，凡官府公使钱多令居官者自出其费。宰相则有光省钱，御史则有光台钱，至于监生亦令其出光学钱。"这里马端临对于光省钱、光台钱的理解显然有误。因为省、台钱显然并不完全是身居省台之职的中朝官出而是重在外官。但他所说用"于公使"则完全不错。张国刚已指出礼钱"的公廨破使"问题。自唐后期始，属于外官钱的部分愈来
愈不归中央政府掌握，五代地方军阀权力更不受约束。通过这样
的做法无疑可以很合法并且使藩镇官员们心甘情愿地拿出事实上
是属于他们将从地方得来钱的部分，不能不说是搜刮的妙法，而中
央机构的某些杂费开支也就有了着落。这使得中央对外官的任免
更像是一种交易，此即张国刚已论“中央政府一种变态的卖官鬻
爵”。

不过，外官礼钱的交纳意义尚不止于钱本身。因为礼钱的交
中书门下、尚书省和御史台是朝廷的代纳对象三署 表与核心。
对这三个机构纳礼钱，不但是外官对朝廷尽义务，实际上也是使其
尊奉朝廷的一种象征。特别是光台钱，是突出御史台权威的表现。
而与此相应，官员除纳礼钱外，还有除拜之际的台参之礼。

《唐会要》卷二十五《杂录》：
（太和）九年八月，御史台奏：应文武朝参官新除授，及诸
道节度观察经略防御等使，及入朝赴镇，并合取初朝谢日，先
就廊下参见台官，然后赴正衙辞谢。或有于除官之日，及朝觐
到城，忽遇连假三日以上，近例便许于宣政门外见谢讫，至假
开，亦须特到廊下参台官[。敕旨]依奏。

又《五代会要》卷十七《御史台》：
天成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御史台奏：本朝旧例合行公事
如后：……应诸道进奏官，每四季月初及五月一日、冬至，并新
除大夫、中丞，并合台参。伏自伪朝以来，全隳旧制，今准敕命
条流，请准旧例施行。应诸道节度、观察、防御、经略、团练使
及诸州刺史，新除赴任，及郎幕上佐官等得替，及准宣进奉到
阙及归本道,并合廊参,正衙谢见辞。如遇大夫、中丞入台,并合台参。凡有公事,及到发日,并合申报。如违,追勘进奏官典。右伪朝已来,全隳往制,罕成伦理,颇失规绳。伏乞特降明敕指挥,免令隳紊。从之。

原来,在正殿“外廊下”见台官就称为“为廊参”,而入台参见御史大丞就称为“为台参”。夫、中丞,廊参或台参是节度观察刺史等新除赴任或得替入朝时参拜御史台长官的礼节。御史台是对内对外的监察机构,负有纠举、弹劾之责。唐朝后期度支盐铁三司巡院和出使郎官御史兼“带宪衔”者作为御史台派出机构人员被称之为外台,可以监督藩镇。而藩镇官员对御史台长官的参拜,应看作是尊奉朝廷接受监督和遵守法纪的一种表示。天成元年御史台奏所说“伪朝”自指梁朝,所以唐朝的制度到后唐明宗时又恢复了。但以上廊参、台参没有言及仪式如何,大约比较简单,相比之下,节度使对尚书省的参拜之仪可能就更隆重一些。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四下》曰:

节度使掌总军旅,颛诛杀。初授,具帑抹兵仗诣兵部辞见,观察使亦如之。

《唐六典》卷五载兵部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军卫武官选授之政令。凡军师卒戍之籍,山川要害之图,厩牧甲仗之数,悉以咨之。武官名义上皆由尚书省兵部选授,由兵部领导,兵部长官理论上与地方军事长官有上下级关系,这里是“具帑抹兵仗”是节度使对其行属吏参见长官之(礼详下)。唐朝省台官吏上事日应拜见部门长官,节度使拜兵部之日始获真正代表其武职权力的双旌双节,所以我推测诣兵部辞见即代表了节度使上事见长官之仪。节度之权……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由兵部授给，同样代表了中央领导地方、以中央为权力中心的意图。

晚唐之际，节度使职权不断扩大，但一般情况下地位都不超过宰相，这一点也表现在“加兼平章事”之例上。《旧唐书》卷一七九《孔纬传》记：

纬家尚节义，挺然不屈。虽权势熏灼，未尝假以恩礼。大顺初，天武都头李顺节恃恩颇横，不期年领浙西节度使，俄加平章事。谢日，台吏申中书，称天武相公衙谢，准例班见百僚。纬判曰：‘不用立班。’顺节粗暴小人，不闲朝法，盛饰趋中书，既见无班，心甚快快。他日因会，顺节微言之，纬曰：‘必知公慊也。夫百辟卿士，天子庭臣也，比来班见，宰相以辅臣居班列之首，奉长之义也。公握天武健儿，而于政事厅受百僚班见，意自安乎？必若须此仪，俟去‘都头’二字可也。’顺节不敢复言。其秉礼不回，多此类也。

按“都头”者，《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僖宗中和元年（881）七月丙寅条，胡注解释说：‘唐之中世，以诸军总帅为都头。至其后也，一部之军谓之一都，其部帅呼为都头。’这里称李顺节为都头，是指他为天武（军唐末五十四军之一）军头和节度使。唐宰相礼绝百僚，所以上事日有班见百官之仪。李顺节想在拜使相日于中书上事而礼同宰相，却不料孔纬以其带兵为武职拒绝，使之无话可说。观孔纬之言很可以说明唐朝无论藩镇怎样坐大，节度使藩臣的身份还是不能变，事朝廷礼还是不可废，制度尊宰相即为尊朝廷之意。

李顺节事发生在昭宗大顺初，但是到了五代，情况就不同了。《五代会要》卷一三《中书省》：“}
后唐天成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书奏：“伏准故事，应诸道节度使凡带平章事，宜于中书都堂上事，礼绝百僚，等威无异，刊石纪壁以列姓名，事系殊恩，庆垂后裔。旧例，赴镇后合纳礼钱一千（贯 按《旧五代史》卷三七《明宗纪三》“作三千贯，充中书及两省公使。伏自近来，全隳往例。今皇纲再整，坠典咸修，合举成规，冀将集事。臣等商量，今请诸道藩镇带平章事处，各纳礼钱五百千，中书建立石亭子一所，镌纪宰臣使相爵位姓名，授上年月。其所余钱，请充中书修建公署，及添置都堂内铺陈什物。”敕：从之。”

节度带平章事的使相“于中书都堂上事，礼绝百僚，等威无异”，正是李顺节等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却不料在后唐明宗时已成“故事”；而且，这件事与赴任后应纳礼钱结合，还给了刻石记名的殊荣。不仅如此，同卷天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敕称：“诸道节度使带平章事、兼侍中、中书令，在京则中书差直省一员引接，及赴镇拟合追还。缘使相在京，百官请谒，须差直省引接，兼街衢出入，或恐朝列误冲。及到本道，自有客司通引官引接。”由此可见，一旦拜为使相，在京城也有百官请谒，甚至朝廷也差官为之引接喝道，真可谓威风八面，全不输于真宰相。这固然是唐末藩镇地方势力发展的结果，但由此也可见五代政权的藩镇性质，它在礼仪上的表现就是节度使地位职权更高，以致中央、地方之轻重、等级差别某些时候被抹杀了。

当节度使结束了在京城的活动后，使要赴任上道了。《新唐书·百官四下》在节度观察“使赐双旌双节”下“有行则建节、树六纛，中官祖送，次一驿辄上闻”一套仪式，而据《通典》卷三二《职官一四·都督》，也说节度“使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外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568

跟任之重莫比焉"着权力来的便应当是出行的仪仗《。旧唐书》卷一五四《吕元膺传》记其代权德舆为东都留守"，旧例，留守赐旗甲，与方镇同\。，说明留守和藩镇节度使上任之际都要赐予出行甲仗。由于唐朝还规定节度使可以自选一定数量的幕僚，所以推测节度使和他的幕僚及文武职吏们应当是旗甲鲜明、高举着朝廷颁给的旌节浩浩荡荡去藩镇《。旧唐书》卷一○七《玄宗诸子·颍王璬传》载安禄山反，以颍王璬为蜀郡大都督、剑南节度大使\。璬初奉命之藩，卒遽不遑受节，绵州司马史贲进说曰：‘王，帝子也，且为节度大使。今之藩而不持节，单骑径进，人何所瞻？请建大槊，蒙之油囊，为旌节状，先驱道路，足以威众。’璬笑曰：‘但为真王，何用假旌节是战时权宜，平时则是真旌节，假旌节乎？如《百官志》所说’：入境，州县筑节楼，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大将鸣珂，金钲鼓角居后，州县赍印迎于道左。‘真正上任之后，还有一番讲究’：视事之日，设礼案，高尺有二寸，方八尺，判三案，节度使判宰相，观察使判节度使，团练使判观察使。三日洗印，视其刓缺。

以上讨论的主要是节度使在京城受命的情况，节度使如果原在藩镇，就会由朝廷遣使送去旌节官告《。册府元龟》卷二一三《闰位部·命使》载：‘梁太祖乾化元年十二月，命大理卿王鄯使于安南，左散骑常侍吴蔼使于朗州，皆以旌节官诰锡之也。又命将作少监姜宏道为朗州旌节官告使副。《五代会要》卷二四《诸使杂录》同条于‘王鄯为安南送旌节官告使’下注曰：’旧制：巡抚、黜陟、册命、振恤、吊赠、入番等使，选朝臣为之。其宣慰、加官、送旌节，即以中官为之。今以三品送旌节，新例也。’此条应为唐制，送旌节官告使多

①《通典》卷三二《职官一四·都督》，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95页
当官告使到达时，会有一套隆重的仪式。一件《节度使新授旌节仪》记载如下：

凡节度使新授旌节仪：天使押节到界，节度使出，先引五纛，但有旗、幡，不得欠少弓箭方旗，后鼓角、六。衙官三十，银刀官三十，以上六十人，并须衣服鲜净锦绺缝褶子。卢帕头五十，大将引马，主兵十将，并须袴帑、袜额、玲珑、缨拂、金鞍镫，鲜净门枪、豹尾、彭排、戟。马骑、射鹿子人，悉须奴仆{}袜、缨拂、玲珑、珂佩。州府伎乐队舞，临时随州府现有，排比一切，像出军迎候。其五纛，从城卧擎，见旌节后，扶立。前引旗幡队遥见旌节，并须避道卧擎，走马过节后，一齐扶立，不得人马旗纛，当头袴着旌节。使出不过三十里，□十□。见天使之时，先问来日圣人万福，后(序 叙)寒(冷 温)。便抵邑，并马作乐入城，在路不得下马、旌节断。入城门中门，交头相覆。到毬场，宣付之时，三交三捧，不得交错。左旌右节，宣付了，相识天使，便令军将参天使，一时参贺(序 叙)答。便抵邑，天使上亭子。排比……就毬场断一…(…下残)。

这件《节度使新授旌节仪》已有暨远志撰文介绍。他考证了其中仪仗器物服饰官职等，并将之与张议潮出行图加以比照①，但相关授旌节仪还有几点需要补充：第一是仪式极具规模，不仅打出节度使的全副执事“，临时随州府现有，排比一切，像出军迎候”一样隆重，并“且见天使之时，先问来日圣人万福”，即所“谓问起居”，叙寒温后，入城“进到毬场，宣付之时，三交三捧，不得交错”，用极其①暨远志：《张议潮出行图研究 兼论唐代节度使旌节制度》《敦煌研究》1991年第3期，第29—39页，以上录文基本参照同文。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郑重谦卑的礼节，表示获得旌节的荣誉和对天子至高无上的崇敬。第二是仪式具有象征意义，授旌节仪规定藩镇事先准备好的六纛要从卧擎到见旌节后扶立，前引旗幡队也从遥见旌节时将旗幡“避道卧擎”到旌节走马过“后一齐扶立”，喻示只有受节后才能树立六纛立仪仗，由此也显示了节度使的威仪和军事专杀之权；第三是虽然在藩镇，但见“到天使”和旌节同于在朝廷见到皇帝，是在外等同在内，对朝廷礼数基本如一。

节度使见“到天使”送来的旌节官告后，应有谢表。《全唐文》卷五四○令狐楚《为太原郑尚书谢赐旌节等表》称“臣某言：今月七日，中使尹偕至。伏奉敕书手诏，慰喻将士参佐等，并赐臣官告旌节。宠命并临，荣光叠至，钦承捧受，感惕难胜。臣某中谢。”可知表是代替朝谢的。敦煌P.4065中有曹元深得到后晋王朝送来旌节官告的谢表或谢状“臣某言：旌节官告。国信使副某至，奉宣圣旨，赐臣手诏一封，赠臣亡父官告一道，告第一通，焚黄一道；故兄赠太保官告一道，告第一道，焚黄一道者。泽降丹霄，恩及下土。”这也是常见之礼仪。

刺史如与节度使相比，其受职上任自然不会有太大的排场。但从书仪所见，五代刺史拜官中谢后有见宰相之礼。《刺史书仪》有得官“后谢诸相公”，内称“伏蒙圣慈，除（受授）某州刺史。尽（盖盖尽？）相公曲垂陶铸，致此侥荣。唯竭忠勤，上答台遇。下情无任感恩荣惧。”又“有辞诸相公”，称“伏蒙恩，除授某州刺史，今赴本任，乍别圣慈，委分符竹。实知侥忝，但积兢荣。此皆太傅迥赐荐扬，曲垂恩煦。誓将兵檗，上答生成，下情无任感恩荣惧。”这两件分别是新授时谢宰相和赴任时辞宰相的致辞，说明授职赴任是要见宰相的。此外又“有谢两枢密笏记”，笏记是记到笏
板上的话，内容也是受官谢语。五代枢密使职同宰相，故拜官后也须参拜枢密使。五代刺史谢宰相很可能是延续唐代。刘禹锡有《谢门下武相公启》《谢中书张相公启》，是元和十年从朗州司马量移连州刺史后给宰相武元衡、张弘靖的谢启。时刘禹锡不在京城。他给武相启称"某即以今月十一日到州上讫。拘于印绶，巾诣谢，有志莫从。"大概也是代替当面参谢的。节度、刺史谢宰相未见规定，五代或已形成不成文的制度。

刺史一旦离京，与地方的关系便更多地取代了与京城的联系。观刺史上任与《新唐书·百官志下》规定节度使途路"上次一驿辄上闻"，颇有相似之处。不过刺史"的上闻"主要是闻于节度观察使而不是皇帝和朝廷。这"一上闻"从受任伊始，直到上任之前《刺史书仪》有《申本道状启各一封》《申状谢本道节度使与前状同》《行军副使启头书》《谢行军副使书》是受职后向节度使和藩镇主要官员通报致意。以下《申离京启状》《中路已更申一状》《到界首申状》就是从出发至到达界首申节度使状，其中《中路已更申一状》道"右去今月日已到州处安下。拜碧幢而在近，增喜跃以先（深申？）。"正是路途中到达某处的所谓次一驿辄上闻。当然出于礼貌，刺史一路上还有《经过州郡节度启状》《谢所经过州送生料书诲状》《谢生料及熟饭等》对经过的道州长官致意并对其关照和送物表达感谢。

按照《开元礼》的规定，刺使上任在本所也备仪仗并有一套接
见下属之仪。但唐后期刺史到达任所所在道后，不是径去上任而是要先去参拜节（度观察）使长官。在这方面《刺史书仪》有《到本道参谢后上马状》《谢本道节度使还答状》《谢生料宴设状》《辞本道节度使状》《辞了一两程再申感谢状》《辞与副使行军诸厅判书》《送土仪物色本道官员物色件段》等。将这些书范合而观之，可以总结过程如下：刺史参见节度使并献上表“达芹菲之诚”的马，接受节度使反馈“的颁赐”物品，参加节度使为其组织的欢迎宴会，向节度使告辞，并“在辞了一两程”后再三表示感谢，与此同时也要向藩镇其他官员告辞致意并送土产。当然上任后还有《到本任后谢上表一道》《谢本道[节]度使已到任后状》《与本道官员谢上书》等分别向皇帝、本道节度使和高官再申感谢。其中《与本道官员谢上书》“称”今月日已到本任，礼上讫，不任感庆”将自己的上任称“为礼上”，可见是将上任视为一个礼仪实行的过程。

刺史上任过程中的表状说明刺史面对的是朝廷和本道节度使的双层领导。而其参见节度使之仪丝毫也不输于节度使的见朝廷长官。表状中一再提到“右叨除属郡，获拜台庭”“右昨者获参台旗”“右获趋台阶”，对“于台庭”“台旗”“台阶”三者都用平阙示敬，而所谓“获拜台庭”“获趋台阶”也可以称为（廷庭）参或（牙衙）参。刺史的廷参节度使是军府重仪，这一点正与下面要谈的櫜鞬之服有关。

关于“櫜鞬三仗”和“廷参”的一点补充
在敦煌的节度使新授旌节仪中，未说节度使身着何服，但迎接

---

①见《大唐开元礼》卷一二六《京兆河南牧初(上诸州都督刺史同)》，民族出版社，第601—602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大将和主兵十将都是穿“戴幞、袜额”，则节度使恐怕也不会特殊。这一点可以与前揭节度使于兵部上事时强调的“具幞抹兵仗”相比照。《唐会要》卷七九《诸使下·诸使杂录下》太和九年条记曰：

其年十二月，左仆射合诸道奏："诸节度新授，具巾抹，带器仗，省中参辞兵部尚书侍郎者。伏以军国异容，古今定制，苟不由旧，务祈改常。未闻省阁之门，忽入弓刀之器，伏请停罢，如须参谢，任具公服，到本州县后交割兵马，诣实申奏。"从之。

按此事据《旧唐书》卷一七二《令狐楚传》得知此中左仆射乃令狐楚。所“奏具巾抹，带器仗”或“具幞抹兵仗”，实即身着幞头、脚登靴、头带红抹额、左握刀、右属弓矢的一种櫜鞬服”，其中抹额亦作袜额。马缟集《中华古今注》卷上“释军容袜额”曰“即以红绢袜其首额”，此袜额盖武士首服，皆佩刀以为卫从。这种红袜额在章怀太子李贤墓墓道东壁的仪卫图中就可以见到。同卷又释“櫜鞬三仗”曰：

起自周武王之制也。武王伐纣，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铸剑戟以为农器，示天下不复用兵。武王以安必防危，理必防乱，故彀弓匣剑以军仪，示不忘武也。旧仪，轱辘三仗，首袜额红，谓之乂抃三仗。说櫜鞬三仗起自周武王，恐怕是杜撰。但櫜鞬是戎服，不同于一般文武大臣所着的公服。身着櫜鞬服行礼是军礼，对长官行军礼是表示在军事上接受指挥，同时也是一种属吏（或下属）敬上之礼。

①见张鸿修《中国唐墓壁画集》，岭南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105页。
黄正建已有专文详细论述①,太和九年奏说明节度使戎服参谢兵部并非旧制,可以推断这种礼仪也是随着藩镇制度而逐渐兴起的。

黄正建指出,唐代节度刺史的櫜鞬军仪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节度观察使对朝廷使节和宰相。当朝廷使臣宰相来到或路经藩镇时,节度使为表尊重,往往具櫜鞬服郊迎。如元和中裴度到蔡州,李愬具櫜鞬候度马首”,会昌中李回奉使河朔,魏博何弘敬、镇冀王元逵皆具櫜鞬郊迎”,甚至牛僧儒罢相镇江夏,山南东道节度使柳公绰为表藩镇敬宰相之意,也是”具戎容,于邮舍候之”②。

这里还可补充《北梦琐言》卷三所载如下一例:

唐郑愚尚书,广州人,雄才奥学。擢进士第,敭历清显,声誉烜然。而性本好华,以锦为半臂。崔魏公铉镇荆南,荥阳(按指郑愚)除广南节制,经过,魏公以常礼延遇。荥阳举进士时,未尝以文章及魏公门,此日于客次换麻衣,先贽所业。魏公览其卷首,寻已,赏叹至三四,不觉曰”真销得锦半臂也。”又以魏公故相,合具军仪廷参,不得已而受之。魏公曰”文武之道,备见之矣。”其钦服形于辞色也。

本条所言崔铉和郑愚都是节度观察使,本是平级。但郑愚因崔铉”是故相”即曾任真宰(相不是因其现居使相)特表尊敬,先以文士对崔铉献文执门生弟子礼,再行节度使见宰相”的具军仪廷参”,所以崔铉赞其文武之道俱备”廷参”也称廷礼”或庭参”,具军仪就

①黄正建《唐代戎”服櫜鞬服”与地方行政长官的军事色彩》,载《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②以上分见《旧唐书》卷一三三《李愬传》、卷一七三《李回传》、卷一六五《柳公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681、4502、4303页。
是櫜鞬戎服参拜，是宰相经过藩镇之际节度使必行之礼。节度使对宰相‘军仪’始自何时？钱易《南部新书》丙部‘元度’具军容拜裴度，以‘为自后带宰相出镇凡经州郡皆具櫜鞬迎于道左，自此始也’。《说郛》卷一‘三宰相不合受节度防御团练等使櫜鞬拜礼’条针‘对今代节度使带平章者凡经藩镇，节察使必具櫜鞬迎于道左，未知礼出何代’的问题指出：景云以后《六典》、《会要》并无节度使观察使戎服迎拜使相之礼。若宜有之，则节度使降麻、防御使制下之日便合具军容诣中书谒谢。在城既无此礼，外府何为行之。宰相位虽崇重，犹与九品抗礼。今则俱是将相，岂可据受戎容！其分析原因，也认为与李愬拜裴度有关。事由唐安史乱后军镇出征常设元帅都统，李‘愬’以度兼宣慰处置使，宰相专征不异都统之重，故具戎服以申拜敬，且以礼示蔡民也。尔后为藩镇兼平章事者不谓我非元帅都统，惟以宰相合当节度防御等使櫜鞬拜礼，舛误相承，所宜改正。此条史料行文语气似出自唐人，它可证节度使除授本无戎服拜宰相礼。而宰相在外受节度使櫜鞬廷礼如果真是始于裴度，则看来也是符合元和削藩的形势，与朝廷强化中央集权的努力一致，不过后来就难免流于形式。櫜鞬军仪实行的另一个层次是节度观察使权力所及或其军府之内，其中很重要的一节是刺史参拜节度观察使。《旧唐书》卷四九《令狐峘传》最说明问题：久之，授吉州刺史，齐映廉察江西，行部过峘吉州。故事，刺史始见观察使，皆戎服趋庭致礼。映虽为宰相，然骤达后进，峘自恃前辈，有以过映，不欲以戎服谒。入告其妻韦氏，耻抹首趋庭。谓峘曰：‘卿自视何如人，白头走小生前，卿如不以此礼见映，虽黜死，我亦无恨。’峘曰‘诺。’即以客礼谒之。
映虽不言，深纠前政过失，鞫之无状，不以为憾。映至州，奏宜按部临人，贬衢州别驾。按此例甚为典型，黄正建已论证这“里戎服趋庭致礼”就是穿着櫜鞬服向观察使行礼，认为是属刺史礼，表示在军事上接受指挥。但这件事是因观察使始换而非刺史上任，对刺史上任还可以另举一例补充。《北梦琐言》卷四：唐柳大夫蘽，直清重德，中外惮之。谪授泸州郡守。先诣元戎顾相彦东川庭参，具毬鞬坚却之。亚台曰：“朝廷本用见责，此乃军府旧仪。”顾公不得已而受之。从这里知道刺史始到任即“须具毬鞬”庭参元戎（即节度使），此“乃军府旧仪”。所谓军府旧仪除了军事意味之外，事实上还表示刺史对节度观察使行属下参拜长官礼。《旧唐书》卷一一二《李巨传》记剑南东川兵马使段子璋反，路经蕪州，刺史嗣虢王巨仓皇修属郡礼迎之。《资治通鉴》卷二三二贞元二（年）七年十一月条记韩滉入朝过汴，节度使刘玄“重其才望，以属吏礼谒之”，说的话应当就是这种礼。《新五代史》卷一五《唐家人传第三》：钱镠奉周宝归杭州，属毬鞬具部将礼郊迎之。记述得更加清楚。毬鞬是节度属下之服，不仅管内刺史初见服之，副使以下也都要服。《桂林风土记》米兰美绩”一则言李渤自给事中除桂（林观察使），请吴武陵为倅副）。故事，副使上任具毬鞬。但吴武陵竟于宴会中致辞，“以红帛系首”为耻，结果不但为李所辱，更几乎被杀。相反的例子是崔沂《旧五代史》卷六八《崔沂传》记“其贞明中，带本官充西京副留守。时张全义留守、天下兵马副元帅、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守太尉、中书令、魏王，名位之重，冠绝中外。沂至府，客将白"
以副留守合行廷礼，沂曰：‘张公官位至重，然尚带府尹之名，不知留守见尹之仪何如？’全义知之，遽引见沂，劳曰：‘彼此有礼，俱副崔沂。”以副留守见尹之仪(‘尹职在留守下)老矣，勿相劳烦。’

为狡辩，拒绝行廷礼，虽得到张全义谅解，却不合制度。櫜鞬服作为使府属吏之服甚至不限文武《刘宾客外集》卷八《寄毗陵杨给事》：挥毫起制来东省，蹀足修名谒外台。好著櫜鞬莫惆怅，出文入武是全才。《白氏长庆集》卷二八《戏和微之答窦七行军之作》：旌钺从櫜鞬，宾僚礼数全。《文苑英华》卷八三二符载《保安镇阵图记》：载忝宾介，厕櫜鞬之末。以上诗文中主人公都不是武职，但作“为宾僚”或“宾介”的礼数却是要戎服櫜鞬。又《春明梦余录》卷三○《封拜考》说道：(然唐)中兴以后王公之格益轻，至有佩櫜鞬、捧酒炙而趋走于节度之庭者。

这是指安史之乱以后王公身份不值钱，以致甘为藩镇属吏。所以刺史行櫜鞬廷礼是刺史向节度使行属吏礼。从上揭史料可以看出，属吏礼除了佩櫜鞬一大特点外，还有到衙时的趋走之仪《。旧唐书》卷一○四《高仙芝传》记天宝六载六月(按当作十二月”)制授仙芝鸿胪卿、摄御史中丞代夫蒙灵詧为四镇节度使，征灵詧入朝。灵詧大惧，仙芝每日见之，趋走如故，灵詧愈不自安“。仙芝趋走如故”正是不改属吏的本分。同书卷一五一《王锷传》：时淮南节度使杜佑屡请代，乃以锷检校兵部尚书，充淮南副节度使。锷始见佑，以趋拜悦佑，退坐司马厅事。“王锷是准备去取代杜佑的，本可平起平坐，“却以趋拜悦佑”，又坐属吏厅事。这“里趋拜”也是以卑事尊，是表示谨守副使本分。趋拜也即《令狐
《峘传》所‘，以白头为说 白头走小生前’‘之 走(按此‘处 走’‘同 趋）’
后进者属吏，这在令狐峘认为是屈辱，故宁‘冒 黜死’之险也不愿
拜《。 旧唐书》卷一五二《 李景略传》言其曾为丰州刺史，在回纥中
有威名。后回纥使梅录将军入朝，梅’录 识景略语音，疾趋前拜曰
‘非丰州李端公耶?不拜麾下久矣，何其瘠也。’又拜，遂命之居次
坐’。此处所说虽非属吏见长官，‘但 疾趋前拜……又拜’很可以作
‘为 趋庭致礼’的参考。这种趋拜之礼行见长官，与在皇帝面前相
比，也只有场合大小之分。《 资治通鉴》卷二六○昭宗乾宁三年
(896)记武安节度使刘建锋被部下所杀，迎行军司马张佶为留后，
张佶又力主奉马殷为主。
马殷至长沙，张佶肩舆入府，坐受殷拜谒。已，乃命殷升
厅事，以留后让之，即趋下，帅将吏拜贺。复为行军司马，代殷
将兵攻邵州。
此处胡三省注曰’：坐受拜谒，留后受将校牙参之礼；帅将吏拜贺，
行军司马贺新留后之礼。’牙参是属吏礼，也就是军礼。张佶用先
‘受 牙参’‘再 趋下’拜贺的方式使兵权的转让显得有礼且肃《。 隆
平集》卷一六载药元福事曰’：慕容彦超盗据兖、海，周祖命曹英为
帅，向训副之，以元福为行营都虞候。谓曰：’已喻英、训，勿以军礼
见汝。’及元福至，英、训皆父事之。” 据《 旧五代史》卷一一二《 周
太祖纪第三》,时在后周广顺二(年 952),药元福军衔只是马步都虞
侯,推测是因其资格老,周太祖才免其用军礼参见统帅,所以不用
军礼在这里是优待。当然如就刺史( 朝廷派遣而非节度使直接任
①按此也见《 旧五代史》卷一一二《 周太祖纪》注引《 旧五代史考异》,文字略有异。
命的)参节度使而言,所谓“具櫜鞬”之类的军仪只是始见行之,此后再见,则不一定要如此了。櫜鞬之仪既是节度使府下的属吏或下属礼,由此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前揭《说郛》史料认为宰相受此礼“是倨受戎容”,而且从其中以卑事尊无条件服从的内涵,也完全可以了解节度使将此礼行于宰相所表达的藩镇尊朝廷之意。与军礼或属吏礼相对的是客礼。客(礼也称宾礼)不计尊卑分庭抗礼,在这个意义上它又与臣礼相对,所以古“有天子无客礼”之说。由来,它代表着一种平等待士的原则,不但可以用于朝庭处理蕃国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也可以用于达官贵士、割据诸侯招；汉魏以降不改其名,唐朝沿之。唐代客礼的形式怎样并不十分清楚,但不行趋拜是明显的《。李遐书文集》卷三《元鲁山墓碣铭并序》:“受署鲁山令,以痼疾不能趋拜,故后长吏佥以客礼待之。”此礼后来也常见于藩镇使主对某些人士《。旧唐书》卷一三三《李愬传》称李愬平淮西,吴元济大将董重“质单骑而归愬,白衣泥首,愬以客礼待之”;同书卷一六一《董重质传》说“他慨然以单骑归愬,白衣叩伏;愬降登阶,以宾礼与之食”。降阶相迎也是客礼要求,是李愬以此表示尊重,并未将其作俘虏或下属对待《。洛阳搢
《绅旧闻记》卷二《齐王张令公外传》记后唐时桑维翰将应举，其父拱为河南府客将，以事告河南尹张全义，全义令见：“桑相之父趋下再拜。既归，令子侵早投书启，献文字数轴。王令请桑秀才，父教之趋阶，王曰：‘不可，即应举便是贡士，可归客司。’谓魏公父曰：‘他道路不同，莫管他。’终以客礼见。’这里桑维翰父由于是张全义手下的客将，故“行趋下再拜”的属吏礼，而桑维翰“因贡士”身份受到优待，以客礼见而不“用趋阶”，是当时藩镇武人对文人举子常持的礼敬之仪。

正因客礼无统属性，所以《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德宗贞元九年（793）载陆贽上奏论边备六失说：“自顷分朔方之地，建牙拥节者凡三使焉，其余镇军，数且四十，皆承特诏委寄，各降中贵监临，人得抗衡，莫相禀属。每俟边书告急，方令计会用兵，既无兵法下临，唯以客礼相待。”是节度使间既不相隶属，便只能“以客礼相待”。《五代会要》卷二四《元帅》又载下面一条，也可说明军礼与客礼的区别：后唐长兴四年八月，以秦王从荣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其年九月，中书门下奏：‘秦王加天下兵马大元帅，自历朝以来，无天下兵马大元帅公事仪注。或专一面之权，或总诸道之司，其仪注规程、公式条目，载详故实，未见明文。臣等谨沿近事，伏见招讨使总管，兼受副使以下汭汭庭礼。今望令诸道节度使已下，凡带兵权者，见元帅阶下具军礼，参见皆申公状。其带使相者，初相见亦以军礼，一度以后，客礼相见。应天下诸军务公事，元帅府行帖指挥。其判六军诸卫事，则行公牒往来。其元帅府所置官属，补授军职，则委元帅奏请。’从之。
唐明宗时因命秦王从荣为制节度使见兀帅礼，实即元帅而特刺史见节度使礼的翻版，规定本来地位高于一般节度使的使相初见元帅也要"行櫜鞬庭礼"，此后才以客礼相见，说明属下参见长官的军礼与显示两者地位身份平等的客礼正是两种意味不同的官场礼节。客礼在正式的场合更多是行于同级或差不多级别的官吏之间，这已不是尊者对卑者的客气、优一种带有等级性的规待而是定。两种礼仪针对不同关系缺一不可，所以后来也延续至于宋代①。

櫜鞬（庭廷）礼和客礼作为两种不同的礼节在晚唐五代制度中的出现，说明围绕节度观察使府的藩镇礼仪已经形成和固定化。与此相应，上述刺史当上任之初对节度"使戎服趋庭致礼"，也可以认为就是刺史的上事之仪。对比节度使在兵部上事也要以同样的服饰仪节行辞见之礼，则其中的礼仪是完全相同的，并且刺史事长如事尊，对节度使的军仪庭见也相当于节度使见宰相或迎接朝廷来使，形成节度使→朝廷、刺史→节度使的关系。总之节度使统治下的藩镇就是地方的小朝廷，它的一切制度均参照中央执行，所以节度使在地方对下的权力、仪制也与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大朝廷没有两样。由此可知，唐后期五代这种礼仪的层次性和多元化、雷同化是几乎无处不在的。所以虽然唐后期五代朝廷通过种种方式强调地方对中央的礼敬，却并不能避免地方官吏在象征性应对的同时，更实际地将礼仪重心移于藩镇。加之朝廷对在藩①《容斋随笔·续笔》卷一"百官见宰相"条记天圣编敕文武百官见宰相仪，内容省使至阁门"使见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宣徽使，客礼展拜"，即为一例。②见《建炎杂记》甲集卷"八节度以军礼见宣抚"条，及乙集卷一"二刺史以上无阶级法"条所"言太祖阶级法：禁军将校有带遥郡者许以客礼见，自余一阶一级全归服事之义"等。
镇体制下，刺史行政上从属于节度使以及节度使支配刺史的权力又是完全承认的，这就使得刺史向节度使行属吏礼理所应当。当然与此同时，藩镇也通过对宰相“行军仪”影响朝廷。这样，从州到府，从地方到中央，整个国家内部从官场政治到礼仪上的藩镇化便是毋庸置疑的。

（二）马在中央、地方礼仪交接中的作用

传世文献和敦煌书仪都表明，唐后期五代，围绕正至、端午和皇帝诞节礼典的庆赐、进献活动是经常发生的。不仅如此，各种礼物的馈赠也以各种因由在中央与地方，或藩镇官员彼此之间进行。

《记室备要》下卷目录“有送书籍”、“送古董”、“送鹦鹉”、“送茶酒”等75首送物仪，大到送担子毡车和担子女二人，小到送蝇拂衣香口脂，包括衣帽毡缎、障扇琴棋、弓箭鞭辔、纸笔墨砚、交床暖座、药食水果、鹰鹞狗马等各种吃喝穿用玩乐观赏物品一应俱全。而给皇帝的进物表状、给节度使和中央大僚的送谢物状、别纸等也在《甘棠集》、《刺史书仪》、《灵武节度使表状集》、《灵武节度使书状集》等许多敦煌书仪中出现。各种方物和贵重物品的交流也不断在归义军和周边少数族和藩镇政权的往来中进行。送谢物本身显然成为调和中央地方以及藩镇间、官员间关系的重要内容和礼仪环节。

在这些献赐、馈赠之物中，马是最为普遍和常见的一种。周一良和陈柞龙两位先生都注意到书仪中《献马状》或《谢马书》一类文状的出现。周一良先生指出：刺史拜官后，有进谢恩马状。向皇帝进献赤扇马一匹。卸任到京，又有进朝见马状。《文苑英华》六二（九按，当作六四○）收有于公异、裴次元、令狐楚、李商隐等
所写端午日进马状,卷四十一又有降诞日进鞍马等状,似乎向皇帝贡献马匹是一种惯例。唐代节日和皇帝诞日藩镇进献礼物甚多,但马确乎是其中最不可少的。除了周先生已经提到的,敦煌书仪中如刘邺《甘棠集》有代陕虢节度使作《端午进马并鞍辔状》《寿昌节进马并鞍辔状》等;令狐楚除了端午、降诞日有进马状外,元日也有进马并鞍辔状。这类进马状几乎无一例外地是来自地方。

献马的仪式和活动古已有之。《周礼·校人》谓“冬祭马步献马”,又“道凡大祭祀朝觐会同,毛马而颁之。饰币马,执仆而从之。凡宾客,受其币马”。冬祭马步是祭马神。凡宾客者,郑玄注云,说明当时的赠马进马“宾客之币马来朝,聘而享王者”是在大祭祀朝觐之时,或由周王颁之,或由诸侯王进献。这种赠奉活动大约对历代皆有影响。唐初献马大多不是来自地方进献,而是少数民族或蕃国。如唐高祖起兵,遣刘文静聘突厥,突厥始毕可汗遣其特勤康稍利等献马千匹以助军。太宗时,薛延陀遣其兄子突利设献马五万匹、牛驼一万、羊十万以请婚,许之。贞观九年(635),沙钵罗咥利失可汗上表请婚,献马五百匹。武则天时,突厥默啜遣大臣移力贪汗入朝,献马千匹及方物以谢许亲之意。但是更多的情况是作为方物的进献。如高祖武德四年(621),百济王扶余璋专遣使臣献果下马;太宗朝焉耆、龟兹、疏勒、罽宾、骨利

参见《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下》,《旧唐书》卷一九四上、下《突厥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5、5153、5170、5183页。
干、康国屈突支，高宗朝吐谷浑、吐蕃、吐火罗、龟兹王曰素稽都曾献马或献名马。大食武则天长安中，遣使献良马；开元初，遣使来朝，进马及宝钿带等方物。突厥、契丹、渤海靺鞨、吐火罗、突骑施、康国、石国等昭武九姓国、宁远、俱密、于阗王尉迟胜开、天中无不有献马之举。与此同时，朝廷对少数民族有时也以马作为回赐或安抚。如贞观中堕和罗“国”遣使献象牙、火珠，请赐好马，诏许之；突厥郁射设所部郁孤尼等九俟斤并率众归款，太宗称善，赐马百匹、羊千口。”

唐后期五代蕃国的献马明显减少，但肃宗时回纥可汗以聘公主，一次献马五百匹；德宗时奚首领索低、南诏异牟寻，宪宗时吐蕃，武宗时黠戛斯，也都有献马。后晋天福中，契丹遣使致名马；高祖死，契丹遣使致慰礼马。马是蕃国和少数民族珍爱和赙马且贡献最多的物品，《旧唐书》卷一五一《范希朝传》载振武节度使所在有党项、室韦“蕃落之俗，有长帅至，必效奇驼名马”。可见在少数民族，献奇驼名马本身也是一种敬上之礼，这一风俗显然在东、北、西北周边地区都很流行。

在朝廷内部，唐前期赠马多见于皇帝对臣下立功立事的奖赏。

（1）参见《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百济传》，卷二《太宗纪》，卷五《高宗纪下》，卷一九六至一九八《吐蕃、南蛮、西戎等传》；并见《册府元龟》卷九七○《外臣部·朝贡三》，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1396—11403页。

（2）参见《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大食传》，卷一四四《尉迟胜传》《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册府元龟》卷九七○《外臣部·朝贡三》，第11405—11414页。

（3）参见《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传》《旧唐书》卷六一《窦静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237、2369页。

（4）参见《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回纥传》《北狄传》、卷一九七《南蛮传》、卷一八上《武宗纪》，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356、5284、595页《册府元龟》卷九七○《外臣部·朝贡三》，第11418页。

（5）参见《五代史》卷七九《晋高祖纪五》，卷八一《晋少帝纪一》；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043、1071、1073页。
或升迁时的赐予。如李靖武德中拜行台兵部尚书赐物千段、奴婢百口、马百匹。后以功进封代国公，赐物六百段及名马、宝器。太宗以张行成谏不应言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而赐名马一匹、钱十万、衣。高宗朝，武则天以刘祎之处事推善于一袭。参君，引过在己，加授太中大夫，赐物百段、细马一匹。羲因监修《中宗实录》，自书保护睿宗之事而被皇帝大加赏叹，赐物三百段、细马一匹。而钟绍京则因诛韦氏之功，赐实封五百户，赐物二千段、马十匹。《旧唐书》卷九八《杜暹传》记开元十四（年726），诏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遣中使往迎之。及谒见，又赐绢二百匹、马一匹、宅一区。《全唐文》卷二八九张九龄有《谢赐马状》，这里马主要用作骑乘代步，是皇帝优礼大臣，与其他赐物相比，并无太特殊的含义。朝臣的进物表状唐前期很少，如有也多是作为祥瑞。如《全唐文》卷二六一李邕《进文马表》便是将豹蔚腾文的文（马似即今之斑马）当作了龙章助圣的神物，并不是唐后期意义上的进献，也不是普通供骑乘用的马匹。地方官对于皇帝的进马大概是在代、德之际逐渐兴起的。史载代宗时，山南西道观察使张献诚，永泰二（年766）正月，献名马二、丝绢杂货共十万匹。汴宋节度使田神功大历三（年768）三。
《全唐文》卷四二五于邵《降诞日进马及织成红锦地衣状》、卷五一三于公异《端午进马状》和令狐楚的同类作品大致都是在代宗、德宗时期。代、德时期是朝廷进奉初兴。《资治通鉴》卷二大历元年记载道："冬，十月，乙未，上生日，诸道节度使献金银器五十件、缯綵一万匹"。可见骏马为寿是随着各类进奉兴起的，是其中的物品之一，并且至少在大历、贞元中已形成惯例了。

但节日和皇帝诞日为什么要献骏马呢？这一点涉及军事和经济的意义固不待言。冷兵器的时代，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安史之乱和多次的对内对外战争使朝廷对马的需要量剧增，加之诸蕃贡献减少，也是朝廷不得不求助于回纥马，以致长期欠下马价绢而造成财政重负的原因。马是朝廷最需要的物品。但除此之外，礼所言马的进献也是礼仪上尊奉天子的象征。《周于邵《降诞日进马及织成红锦地衣状》关于献马"有万国骏奔，二仪交泰"之说，令狐楚《端午进鞍马等状》也说："伏以陛下用仁时而生长养群生，举成数而陶甄品物；是以百蛮委瑞，万国归诚，同瞻日月之光，共奉乾坤之寿。"由此得知藩镇的献马是取唐前期一直以来蕃夷献"马万国骏奔"、百蛮委瑞的本意；即蕃国献马不仅为其地特产方物，也喻示着国泰民安、四远来归。从这个意义出发，藩镇敬奉朝廷，地方服从中央，为皇帝所驱使，和四夷没有什么不同。更何况，对藩镇和四夷而言，马都是作战的本钱，代表着征伐的形

《旧唐书》卷一二四《田神功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533页。
分见《全唐文》卷四二五、卷五一三，中华书局影印本，第4337、5500页。
象是崇尚武力的藩镇地万献与，在唐后期的形成下，从什么角度看都可以说是恰如其分。贞元、元和以降，藩镇于元日、冬至、端午、诞日的所谓四节进奉已成为不成文的制度，进马亦在这些节日和其他一些进奉中愈益普遍。《册府元龟》卷一六九《帝王部·纳贡献》在宪宗元和十四年泾原节度使王潜、宣武节度使韩弘贡献诸物“和“左右军中尉各进钱一万贯，马二匹”之下注曰：自淮右宿兵以来，度支盐铁及四方进献不已，始曰助军，寇平则曰贺礼，其后又曰助赏设；及帝加尊号，又陈献贺之礼。“助军”一类说法，加上武力削藩成功的事实大概使马的进献显得更为顺理成章。同卷同门载长庆元年（821）三月范阳节度使刘总一次进马一万五千匹，文宗太和八（年 834）十一月，太原节度使李载义因驱赶他的对头杨志诚自己也失败被逐，进马千匹。当然这样的进马，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意义似乎更突出。五代以后，马的进奉更为普遍。《旧五代史·梁太祖纪》有如下记载：（开平元年五月，907）辛巳，有司奏，以降诞日为大明节……（十月）庚午，大明节，内外臣僚各以奇货良马上寿。（开平二年正月癸酉）幽州刘守光进海东鹰鹘、蕃马、毡罽、方物。（九月）癸未，西幸，宿新安。丙戌，至陕州驻跸，蒲、雍、同、华牧守皆进铠甲、骑马、戈戟、食味、方物。……①杨志诚驱赶史载义并代任幽州节度使事见《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纪下》，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406页。
十月己未，大明节，诸道节度刺史各进献鞍马、银器、绫帛以祝寿，宰臣百官设斋相国寺。

十一月庚辰，御宣和殿，宴宰臣文武百官。诸道节度使、刺史各进贺冬田器、鞍马、绫罗等。

开平四年二月寒食假，诸道节度使、郡守、勋臣竟以春服贺。又连清明宴，以鞍辔马及金银器、罗锦进者迨千万，乃御宣威殿，宴宰臣及文武官四品已上。

五月己丑朔……自朔旦至癸已，内外以午日奉献巨万，计马三千蹄，余称是，复相率助修内垒。

开平四年十月己卯，以新修天骥院开宴落成，内外并献马，而魏博进绢四万匹为驵价。

乾化二年正月，以丁审衢为陈州，而审衢厚以鞍马、金帛为谢恩之献，帝虑其渔民，复其献而停之。

以上各种进献的场合，鞍马一项都是必不可少的。可知地方的献马在五代达到高峰。当然许多时候经济的意义仍然大于礼仪的意义，特别“魏博进绢四万匹为驵价”一条，说明地方进献有时候是将马价折绢。这一点，在后唐时更加明确。《五代会要》卷五《节日》：

天成二（年927）三月五日，门下侍郎兼工部尚书、平章事、判三司任圜奏：三京留守、诸道节度观察、诸道州防御使、刺史，每年应圣节及正、至等节贡奉，或恩命改转，或讨伐胜捷，各进献马。伏见本朝旧事，虽以献马为名，多将绫绢金银折充马价，盖跋涉之际，护养稍难，因此群方俱为定制。自今后伏乞除蕃部进驼马外，诸州所进马，许依天复三年已前事例，随
其土产折进价值,冀贡输之稍易,又诚敬之获申。兼欲于诸处拣孳生马畜,准旧制分置监牧,仍委三司使别具制置奏闻。根据任圜奏状”,虽以献马为名,多将绫绢金银折充马价”是本朝旧事”,而且”是天复三年已前事例”,说明早在唐末就是如此。可见地方献马之仪已发展为一种例行公事,折银绢不过是它的进一步形式化而已《。册府元龟》卷六八九《牧守部·革弊》记后汉阎建为景州刺史,正至节进马一匹,价值五万”旧例分配衙前及诸县今后所买进马,刺史出自人吏,因兹丐敛编民[,令俸钱”,说明马钱也变成一种摊派。从五代后来的情况看,献马在地方官似乎愈来愈频繁。据《册府元龟》卷一六九载,长兴四(年 933)十月,夏州节度使李彝超一次进马五十匹;同“月前秦州节度使刘仲殷受代归京,献马七十匹”;同年七月”,前邠州节度使康福入朝,献金龙鞍勒马十一匹”;同卷并在十二月灵武张希崇献马十八匹和控鹤都指挥使李重谦献马十匹下说明”时征马少,亲将首率也”。与此同时,献马的名目也愈来愈多,如后唐西都知府张篯进魏王继岌打毬马七十二匹,后晋时昭义节度使杜重威”进 助国马”,招讨使杨光远、郓州节度使安审琦、荆南节度使高从诲、陕府李从敏、西京李周进、镇州安重荣、秦州康福等都”有 谢恩加官马”,安审琦和凤翔李从曮又分别”有 谢恩册授秦王马”和 添都马”之献,数量自十匹至五十匹不等①,这又是在献礼名下行讨好朝廷之实。从实用的角度出发,藩镇献马大约已逐渐取代了少数民族进献和监牧所出。

①并见《册府元龟》卷一六九《帝王部·纳贡献》,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036—2045页。
与地方长官向皇帝献马相对，唐后期五代皇帝对臣下的赐马也时而有之，如《全唐文》卷四一八常衮有《谢赐马状》，卷四五○齐映有《为赵相公谢马状》《恩赐马一匹并鞍辔及告身衣两副等状》；但与唐前期不同的是，唐后期五代皇帝的赐马除对宰相近臣外，更多的是藩镇地方节将。《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记肃宗病中召辞郭子仪，帝乃引至卧内，谓子仪曰：‘河东之事，一以委卿。’子仪呜咽流涕。赐御马、银器、杂彩，别赐绢四万匹、布五万端以赏军。’安史叛将令狐彰归顺朝廷，与麾下将士溃围入朝，赐予名马、甲第。大历中朱泚朝京师，代宗御内殿引见，赐御马两匹、战马十匹、金银锦彩甚厚，又以器物十床、马四十匹、绢二万匹、衣一千七百袭赐其将士，宴犒之盛，近时未有。’赐马看来是朝廷用以赏赐战功，或用表皇帝对藩镇（也包括属国）的关怀和笼络。

《归义军僧官书仪》有《贺赐征马》一首，内“圣明远赐征马”语，说明是贺中原王朝所赐。史载唐昭宗赏大梁客将刘捍，以锦服、银鞍勒马赐之；汉隐帝赐前昭义军节度使张从恩衣一袭，金带、鞍马、彩帛等；时有投无名文字诬告从恩者，故特有是赐，以安其心。’当然皇帝的御用之物更不寻常。所以唐明宗死，闵帝命中使三十五人以先帝鞍马衣带分赐藩位；江南李景向中原王朝的进奉中有鞍马，而后周世宗以太府卿冯延鲁充江南国信使，赐物中也‘有御马五匹，金玉鞍辔全，散马百匹’，皆为特

①《旧唐书》卷一二四《令狐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528页。
②《旧唐书》卷二○○下《朱泚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386页。
③《旧五代史》卷二○《刘捍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71页。
④《旧五代史》卷一○二《隐帝纪中》，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356—1357页。
⑤《旧五代史》卷一四五《闵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15页。
⑥《旧五代史》卷一一八《世宗纪第五》，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572—1573页。
示其安抚之意。

献马赐马活动也在节度使及其属下之间进行。敦煌《刺史书仪》中有一件《到本道参谢后上马状》，内称：“具衔某毛色一匹。右叨除属郡，获拜台庭。合申芹菲之诚仪，不避（潜）僭逾之罪。”是刺史上任之际，要向所在长官节度使献马。反之，唐末五代的藩镇与割据政权也常常以宝马奖励将士。如张归厚为朱全忠军校，光启三（年887）春，与秦宗贤战于万胜，大破之；其夏，败蔡将张晊。太祖大。李克用因悦，立署为骑军长，仍以鞍马器币锡之

军使安元信解梁军上党之围，“赐所乘马及细铠仗，迁突阵都将”。敦煌S.5643《诸杂相贺语》中有《谢赐鞍马》：“某乙卑门末品，未彰汗血之功，伏蒙阿郎台造，特赐驱驰，下情无任感戴。”一望而知是归义军中的官员谢节度使的。P.3041、P.3625中也有同类谢状，是对节度使赐马的回应。

但是晚唐五代更常见的还是藩（镇或蕃国）之间以赠马来疏通关系。P.393《灵武节度使表状集》的《谢马书》，赵和平考定为朔方节度使致甘州回鹘的书状。书辞说明它是对回鹘“逾沙漠而专枉荣缄，随贡奉而别颁厚礼”的答书。马虽是回鹘可汗所赠，但与当时藩镇间的相互赠送没有什么区别。P.2539《灵武节度使书状集》中《礼宾引进内省书》后有《具马》一件，内称：“右谨送上，聊表贺仪，虽无逐日之报，愿则朝天之骑。”这是随同前书送去的礼物，是藩镇节度使敬奉礼宾使臣（的客省、引进、阁门使等，详后）。同书仪又有献枢密使的《具马》一件，也是藩镇送与中央大员的。史《旧五代史》卷一六《张归厚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25页。《旧五代史》卷六一《安元信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17页。
载明宗时，权臣安重晦以生辰，诸处人事得马五十匹，以充内厩，可见类似这种馈赠在当时很普遍。

《旧五代史》卷七二《张承业传》记载了下面一事也能够说明：

庄宗酣饮，命兴圣宫使李继岌为承业起舞，既竟，承业出宝带币马奉之。庄宗指钱积谓承业曰："和哥无钱使，七哥与此一积，宝马非殊惠也。"

这里庄宗"宝马非殊惠"之说，固然是嫌承业给的钱物太少，但也可以理解"为宝马"在当时的礼物中是太多太平常了，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然而这一点却又恰恰不能否定马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人际交往中。由于《周礼》关于大朝会祭祀币马的说法，所以币马二者结合，本来就代表一种正式的礼献。而当藩镇将它作为奉献或往来时，所表达的含义就更非一般礼物可比。

《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记曰：

全忠知克用迮不振，乃大举攻太原，分遣锐将氏叔琮等率魏博、充郓、邢、洺、义武、晋绛兵环入之，晋城邑多下。会大雨，汴兵粮乏，士疟疠，遂解。克用虽内愤悒，惮全忠强难与争，乃厚致币马谢，复请修好。

《旧五代史》卷二六《武皇下》：

（天复元年）六月，遣李嗣昭、周德威将兵出阴地，攻慈、隰二郡，隰州刺史唐礼、慈州刺史张瓌并以城来降。武皇以汴寇方盛，难以兵服，佯降心以缓其谋，乃遣牙将张特持币马书檄以谕之，陈当时利害，请复旧好。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币马”两者合为一事，已频繁地出现于五代史料之中。如《旧五代史》卷二五《武皇上》：

(中和二年，882)十月，武(皇李克用)率忻、代、蔚、朔、达靼之军三万五千骑，赴难于京师。先移檄太原，郑从谠拒关不纳，武皇以兵击之，进军至城下，遣人赍币马遗从谠，从谠亦遣人馈武皇货币、饔饩、军器。武皇南去，自阴地趋晋、绛。十二月，武皇至河中。

此事《资治通鉴》记在同年十一月，谓克用不敢入太原，独与数百骑过晋阳城下与从谠别，从谠以名马、器币赠之。时李克用初归顺朝廷，双方名马、器币的馈赠明示不再为敌之意。

同上书卷二○《马嗣勋传》：

光化元年三月，太祖令往光州说刺史刘存背淮贼以向国，又从李彦威复黄州及武昌县，获刺史瞿章。俄复使光州，持币马以赐刘存。

《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庄宗同光元(年923)：

(十月)乙酉，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张宗奭来朝，复名全义，献币马千计；帝命皇子继岌、皇弟存纪等兄事之。

《旧五代史》卷五九《王瓒传》：

及王师袭汴，时瓒为开封府尹……洎明宗至封丘门，瓒开门迎降。翌日，庄宗御玄德殿，瓒与百官待罪及进币马，诏释之。

同样，幽州刘守光不敌唐将周德威，只得遣使持币马见德威乞
庄宗同光中讨蜀，"伪降"蜀六军使王宗弼令人持牛酒币马归款。由此得知，币马已成为藩镇(间有时也用于对朝廷)示降求和或归顺修好的信物，它的使用有特殊场合，意义已超过一般的馈赠。如前所述，赠马本出自少数民族风俗。但政治形势造成经济困扰，并进而波及礼仪。在唐后期五代战乱频仍和尚武之风的影响下，少数民族的献马竟主要被藩镇的献马所取代。马也被朝廷内外上下当作最切合需要，最能表达善意、接洽关系的礼品之一，它在五代地方、中央礼仪交接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由此可知。这一点，无疑与前之櫜鞬庭参的实行一致，再一次地证明了礼仪的藩镇化、军事化。

(三)外官的凶事吊赠及辍朝、起复之制
如果说，唐后期五代朝廷在外官上任、入朝的过程中强调的主要是外官敬朝廷之仪，那么在外官的凶事处理上却是更多地显示朝廷对他们的关怀和厚意。随着节度使与地方权力的扩大，朝廷对外官的凶事之仪在细节方面的规定，远远多于对朝官。其中吊祭使的派遣成为调解沟通藩镇与朝廷关系、安抚地方的一种方式，同时辍朝和起复之制实行范围不断扩大，也表现了中央在地方官丧事方面特殊的优待之仪。

1.吊祭使的派遣和辍朝
唐前期内重于外，与吉仪的情况类似，外官的凶仪也并不突
《大唐开元礼》卷一三四《凶礼》仪目“有敕使吊”条，注“云其赗赙之礼大体皆同，吊使行之”，内“含吊贵臣及其妻丧”、“会丧”条有“遣百僚会王公以下丧”、“策赠”条“有敕使册赠贵臣”，“会葬”条有“遣百僚会王公以下葬”等。都是朝廷和皇帝对王公大臣死丧的吊慰和册赠。其“中贵臣”、“王公以下丧”虽不具体，但根据唐朝三品为贵、五品为通贵的规定，所指贵臣至少应为三品以上而无分内外。前揭P.3442杜友晋《吉凶书仪》表凶仪一十一首中，除了国哀和皇家丧事的告哀表外，又有《百官遭忧奉答敕慰表》《百官期亲丧奉答敕慰表》《百官谢父母丧蒙赠表》《百官谢期亲丧蒙赠表》；启凶仪四首中也有《百官遭忧奉答令启》《百官有期亲丧奉答令启》。是百官或其家属“当私门凶舋”之际，对皇家的吊慰封赠表示感谢。这些表启的内容说明一般情况下的皇家与百官丧事吊慰之仪，但所谓百官者仍是包罗内外而并不特以外官为重。《旧唐书》卷八四《刘仁轨传》传称：贞观、永徽年中，东西征役，身死王事者，并蒙敕使吊祭，追赠官职，亦有回亡者官爵与其子弟。从显庆五年以后，征役身死，更不借问。当然这只是就从征武官为论，并不是专指地方官而言。

但S.6537v郑余庆元和《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却明显地有所不同。本书上编在介绍书仪时已提到，在这件书仪的目录中，除了有与杜氏书仪相仿的《国哀奉慰第廿一》外，又有《起复为外官第十七》《官遭忧遣使赴阙第廿二》和《敕使吊慰仪第廿三》等。此三者明显地针对外官的丁忧和死丧，其中《官遭忧遣使赴阙第廿二》尤涉及外官，因中朝官无遣使赴阙的问题，而外官、特别是地方在节度使死亡之际才必须依礼申报朝廷。至于朝廷遣使吊慰的问题，也是于藩镇最有意义，说明了朝廷在外官凶仪方面的强调。
吊祭使的派遣如《开元礼》所记唐前期即有之，见于记载者多为宰相重臣及与皇帝感情极为深厚者。如萧瑀曾为宰相，贞观二十一年，征授金紫光禄大夫，复封宋国公。从幸玉华宫，遘疾薨于宫所，年七十四。太宗闻而辍膳，高宗为之举哀，遣使吊祭。太宗①，长孙顺德是玄武门的勋戚功臣，虽自大将军、国公常谥曰‘肃’。因罪除名，复官樊州刺史，卒后太宗仍为之罢朝，遣使吊祭，赠荆州都督，谥曰襄。但是唐后期吊祭使的派遣及赙赠见于记载却以蕃国和外官为多。吊祭使由于有赙赠又称吊赠使。《五代会要》卷二四《诸使杂录》乾化元年十二月，以大理卿王都为安南送旌节官告使一条下注载唐朝旧制中派往蕃国和地方的诸使中就有吊赠一使，说明它是一种很重要的礼仪使。不过吊祭使以宦官、朝官任者皆有之，而以朝官居多。除蕃国外，又以功臣、节度使丧际最要。死在京城和地方都要派遣，如李光弼死，部下护丧柩还京师。代宗遣中官开府鱼朝恩吊问其母于私第，又命京兆尹第五琦监护丧事。辛云京为太原节度使，镇抚回纥有功，所赠大历三年八月庚午薨，上追悼发哀，为之流涕，册赠太尉，辍朝三日，谥曰忠献。后宰臣子仪、元载等见上，言及云京，泫然久之。十一月葬，命中使吊祭。时宰相及诸道节度使祭者凡七十余；又如李澄自幄叛将李希烈处归国，助朝廷征讨，后为义成军郑滑许等州节度使。贞元二年卒，年五十四，废朝一日，赠司空，赗布帛粟有差，仍令左散骑常侍归崇敬充吊祭使，所缘丧葬，并勒《旧唐书》卷六三《萧瑀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404页。《旧唐书》卷五八《长孙顺德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309页。《旧唐书》卷一一○《李光弼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311页。《旧唐书》卷一一○《辛云京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314—3315页。
官给。" 贞元十一年八月，废朝四日，诏京兆尹韩皋监护丧事，嗣吴王献为吊祭赗赠使，册赠太尉，谥曰庄武。 此外功勋卓著者又如郭子仪，旧令一品坟高一丈八尺，而诏特加十尺。群臣以次赴宅吊哭……及葬，上御安福门临哭送之，百僚陪位陨泣，赐谥曰忠武，配飨代宗庙庭。③ 李晟，诏百官就第进吊。比大敛，帝手诏，誓以存保世嗣，申告柩前。册赠太师，谥曰忠武。及葬，又御望春门临送，遣谒者宣诏于柩车，百官拜哭于道。" 武俊之丧也有群臣赴延英门吊慰之仪。节度使的死丧对藩镇而言是重大凶事，所以朝廷对于节度使的吊祭事实上在代、德以后已逐渐形成制度。这一点首先与藩镇丧事的举办活动有关《。 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大历十一(年 776)十 二月条载段秀实为马璘治丧：泾原节度使马璘疾亟，以行军司马段秀实知节度事，付以后事。秀实严兵以备非常，丙申，璘薨，军中奔哭者数千人，喧咽门屏，秀实悉不听入。命押牙马治丧于内，李汉惠接宾客于外，妻妾子孙位于堂，宗族位于庭，将佐位于前，牙士卒哭于营伍，百姓各守其家。有离立偶语于衢路，辄执而囚之；非护丧从行者无得远送。致祭拜哭，皆有仪节，送丧近远，皆有定处，违者以军法从事。《 旧唐书》卷一三二《 李澄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657页。②《 旧唐书》卷一三四《 马燧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701页。③《 旧唐书》一二○《 郭子仪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466页。④《 新唐书》卷一五四《 李晟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872页。⑤《 旧唐书》卷一四二《 王武俊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876页。
由这里得知，节度使死丧，宗族、节度军衙、将士要共同举办丧事，有相应的仪节。敦煌《刺史书仪》中有吊仪数首，看得出是节度刺史等藩镇官员吊慰仪和答书。前三首是吊答家室或兄长之丧的，后二首则是吊唁节度刺史或某官员本人丧亡的。其中一首道：“昨者近知尚书得染疾，医疗不损，药饵无征，闻言身故。厶在此冤苦冤苦，痛当奈何，痛当奈何(!下略)”一首道：“厶顿首顿首，祸故无常。伏承厶官倾[逝]，皆闻问恻但，不能已已。惟哀慕摧割，何可堪忍。痛当奈何，痛当奈何(!'下略)这‘里‘尚书’、‘厶官’都是高官，第二封书信尤其看得出是用了前面已介绍过‘的重叙亡人‘的改良复书形式，说明吊礼吊仪在官场特别是节度长官死丧之际也要讲究。《资治通鉴》卷二三五贞元十五年二月又记宣武节度使董晋薨，行军司马陆长源知留后，与判官孟叔度不能抚循将士”;故事，主帅薨，给军士布以制(服《旧唐书》卷一四五“称 旧例，使长薨，放散布帛于三军制服”),长源命给其直;叔度高盐直，下布直，人不过得盐三二斤，军中怨怒，终于造反。可见军士本应照例为节度使服丧，其丧事隆重，应不亚于群臣对皇帝，特别是对大藩镇而言，朝廷的吊祭之仪固基于此。当然礼仪不过是形式，吊祭使的派遣更直接的原因是安抚藩镇。节度使死亡按照程序应当是由藩镇先发丧而后申报朝廷，由朝廷命使并除帅，但是不法藩镇常常匿丧不报。例如驻汴州的宣武军自节度使刘玄佐薨，竟五次作乱，节度使往往由军中自推。淮西吴少阳死，子吴元济不发丧，以病闻，因假为少阳表，请求元济主兵务。帝遣医工候之，不见而还”;以至“于及少阳卒，凡四十
不为辍朝”。德宗遣使的诏书称：“以少阳曾经任使，为之轸悼，命申吊祭，临遣使臣。凌虐封疆，遂致稽阻，绝朝廷之理，忘《新唐书》卷二一四《藩镇宣武彰义父子之恩。”

《旧唐书》卷一五四《吴元济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949页。

《3948

《旧唐书》卷一三四《浑瑊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709页。

②《册府元龟》卷三一九《宰辅部·褒宠二》，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775页。

③《旧唐书》卷二一四《藩镇宣武彰义父子之恩》。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600

千匹,布一千端,米粟三千石。丧事所须官给,诏京兆尹监护,谥曰

。李愬" 赐

"献武" 绢二千匹,布七百端,米粟一千石,委度支送"

魏博节度使田布薨",赠布帛三百段,米粟二千石,委度支逐便支

据《通遣”,后又支钱一千贯、卷一千匹以充葬用

典》卷八六《丧制》赙赠条记":大唐制,诸职事官薨卒,文武一品赙物二百段,粟二百石;二品物一百五十段,粟一百五十石;三品物百段,粟百石",以下依次递减,至从九品物仅十段《。 唐六典》卷三金部郎中条规定:

“凡赐物十段,则十

约率而给之:绢三匹,布三端,绵四屯。若杂

段,则丝布二匹,"二匹,绫二匹,缦四匹"。"十段"包含不同的丝

织品和计量单位,但就数量而言,似乎可以与十匹相当。所以以上

都属于

赗赙加礼"的情况。五代以一段为二丈,相当二分之一匹,

赗赙加礼的情况在节似乎单位数量较前减少 度使不是少数。

其实赗赙应由度支按品"级 准式"支给,但对朝廷有特殊贡献及需

要特别安抚者,则并不照常规办事。

辍朝之礼,是朝廷给王公和内外要官重臣的特殊礼遇。唐初

c大臣如李靖死辍朝七日,玄宗宰相燕国公张说薨辍朝五日,而宁王

宪竟辍朝十日。太宗宰相魏徵废朝五日,房玄龄、李纲、封伦、戴胄

都辍朝三日。高宗宰相于志宁、许敬宗、刘仁轨,武则天宰相狄仁

杰等亦享此待遇,开国武臣尉迟敬德、刘弘基卒,高宗均为之废朝

三日。开元十五年宰相苏颋卒",初,优赠之制未出,起居舍人韦述

《旧唐书》卷一四一《张茂昭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859页。

《白居易集》卷四九《李愬赠太尉制》,中华书局,第1026页。

③参见《白居易集》卷四九《田布赠右仆射制》,中华书局,第1027页。《册府元龟》卷一四○《帝王部·旌表四》,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694页。

《旧五代史》卷四一《唐明宗七》冬十月诏":凡赙赠布帛,言段不言端匹,段者二

丈也,宜令三司依此给付。"
上疏曰：'臣伏见贞观、永徽之时，每有公卿大臣薨卒，皆辍朝举哀，所以成终始之恩，厚君臣之义。上有旌贤录旧之德，下有生荣死哀之美，列于史册，以示请为之辍朝举哀，以明同体之义'，结果辍朝两日。开元《仪制令》本来规定百官正一品丧，皇帝皆不视事三日；百官五品以上丧，皇帝皆不视事一日。但是对有特殊贡献及朝望者不行常制。唐后期外官在辍朝礼方面原来只是行之节度使，一般也应照品级进行。但是《唐会要》卷二五《辍朝》记称：贞元十五年七月，以黔府观察使王礎卒，辍朝一日。故事，团练观察使卒，未有废朝者，自礎始焉。其年九月，义成军节度使卢群卒，辍朝。故事，节度使卒，从旨先废朝，然后除代丞李光素，至是，先除尚书右然后辍朝，非也。十六年，以徐泗濠等州节度使张建封卒，辍朝。近例，节度使带仆射以上卒，辍朝三日，尚书以下都团练观察使则否。洎贞元八年嗣曹王皋、十一年李自良，皆以节度使带尚书卒，各辍朝三日；至十四年，樊泽以仆射卒，辍朝一日；十五年，黔府观察使王礎卒，时为辍朝一日。元和九年六月丙子，天德军经略使周怀义卒，辍朝一日。经略使废朝，自怀义始也。说明辍朝对象不断扩大，从节度使扩大到团练观察使，又到经略使；后两使辍朝自王礎及周怀义始也见于《旧唐书》德宗及宪宗二

[1]《旧唐书》卷八八《苏颋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881—2882页。

[2]仁井田陞《: 唐令拾遗·仪制令第十八》，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刊，第480—482页。并参《开元礼》卷三《序例上·杂制》《唐六典》卷四礼部郎中员外郎条《唐会要》卷二五《辍朝》太和元年七月条。
纪，可见其事甚被当时所重。此外还有两点变化也很重要：一是将节度使由先辍朝再除代竟改作先除代再辍朝，二是不执行仪制令按官品规定的辍朝天数。节度使带从二品仆射就可辍朝三日，而且同级官员辍朝的天数并不一致，甚至官品低者超过高者。这些方面反映类似辍朝这样的礼仪越来越降格和趋于形式，它的政治实用性更重于礼仪。这一点，在同卷太和元(年 827)七月太常博士崔龟从奏中也可以看到。奏称：

伏以废朝轸悼，义重君臣，所贵及哀，尤宜示信。自顷以来，辍朝非奏报之时，备礼于数日之外，虽遵常制，似不本情。这里主要是批评朝廷不于闻哀日辍朝，为此奏中特举贞观故事，提“出 悼 悼之意，不宜过时”的问题，于是中书门下奏覆，称“过时而哭，于礼为乖，礼院所请合辍朝者，各以闻丧之时明日，请依。”但更具实质性的问题是辍朝对象无一定之规。所以中书门下同时又以《仪制令》和《官品令》旧制为本，提“出 缘令式旧文，三品以上薨殁，通有辍朝之制……臣等参配色目如前。其留守、节度、观察、都护、防御、经略等使，并请各据所兼官为例”；请求外官与内官的辍朝应以正、从三品为限。此外，复根据崔龟从上言，订立致仕官如非曾任三品以上，及历四品清望，并不在辍朝之例的制度，均得到皇帝批准。

从以上论奏可以知道，在文宗太和元年以前，辍朝制度并不是极为严格地按制度实行。特别提出品级问题和留守、节度等使据所兼官辍朝就是说明在外官按制度的尤其少，甚至不够资格辍朝的也辍朝。但辍朝提高品级本不可免。就是在太和以后，辍朝制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603

《旧唐书》卷一七《文宗纪》记太和九年二月庚午，因左丞庾敬休卒废朝一日。文宗诏曰："官至侍郎，朕所亲委，不幸云亡者，宜为之废朝。自今侍郎宜准诸司三品官例，罢朝一日。"官至侍郎者仅为正四品官。《唐会要》卷二五记会昌三年八四三中书门下"奏亲王公主葬日，准德宗以前实录，并合辍朝一日，请自今以后，准故事处分"；并"有京官一品，尚书省二品，及时旧相，方臻此位，比来同刺史曾任监例，辍朝一日，恐轻重不伦；望辍朝两日"和二王后辍"朝请编入令式"，以及驸马虽为四品，但因国戚，也应给予辍朝一日优待等条；都说明辍朝之制并非定制或仅依成例而在不断修改。其中涉及"刺史曾任监例"一条，尤说明辍朝在外官方面竟可以推广到某些刺史，甚至与京官一二品无别，这与唐初之制已相距甚远。

至于辍朝的天数也始终有很大的灵活性。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帝舅郑光卒辍朝三日，御史大夫李景俭上疏反对，提出不可使外"戚以辍朝之数，比于亲王公主"，请改为一日或两日。郑光生前官为右羽林统军兼太子太保，其所兼官是从一品。李景俭没有提出郑光的官品问题，说明一般情况下，即使从一品也只是一日，最多二日。宰相一般情况也是按制的。唐后期宰相唯裴度、贾耽辍朝四日，即杨给、崔祐甫、杜佑、赵憬等名相也不过三日。文臣除死难者如颜真卿、武元衡辍朝五日，一般均按品级进行。像唐太宗、唐玄宗朝宰相的情况几绝无仅有。但节度观察使的辍朝就比较复杂，也较宰相文臣逾制者多。辍朝天数自一至五日不等，五日者如郭子仪、浑瑊、李晟、王武俊、韦皋、张茂昭、刘总，四日者如马
燧，三日者如李光弼、李抱玉、田神功、李宝臣、辛云京、崔宁、严震、崔旰、韩滉、刘玄佐、刘怦、刘济。可以看出，四日、五日多是为朝廷立有极大功勋而有重望者。三日略次之，但本人也都是立有较大功勋而能保持一方平安，或是虽有跋扈不臣之迹却具有较大兵权势力和声威影响者。两方面朝廷都要照顾，这确实反映了朝廷既要加强中央统治又不得不对藩镇加以姑息的两难之境。

五代以后对节度使的辍朝却相对显得有规律可寻。自后梁以后，除少数特例如刘隐、罗绍威、李存审等有辍朝三日的记载外，大多都是辍朝一日。《五代会要》卷八《辍朝》记晋天福三年正月，因前兴元节度使张筠卒，太常礼院申：‘准故事，前节度使无礼例辍朝。’敕：‘宜特辍一日朝参。’说明卸任的节度使无论原先职位多高，已无辍朝之礼，可见五代礼仪实用性更强。而同卷记梁中书门下‘奏某官（薨注云次日入状赠官）……请辍今月某日朝’的‘请辍朝榜子’，也说明自唐至五代辍朝之仪已成定式。

2. 起复优典的对外执行

在全社会以官为重的思想驱动下，许多传统的礼仪道德也被破坏。从吉凶书仪类的《新定书仪镜》和《书仪镜》开始，我们已不断看到仪目中‘有吊起服从政’之类的内容。起服即起复。唐丧葬令规定为父母须行‘三年为父斩衰、为母齐衰三年’或‘一年父在为母齐衰杖周’之丧，三年服即二十七个月，一年服即‘祥、禫十五个月’，在官者须解官行服，终服才能再由朝廷授官。但真正能够终制者不多。官员服丧期间，朝廷可行起‘复夺情’之礼，恢复或授给官职。起先这只是对有国家重务在身不能服丧者的做法，但是由于某些原因形成惯例，所以武德初，朝臣上奏已有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605

“比为时多金革,颇遵墨衰之意;丁忧之士,例从起复”之说①,而唐前期宰相重臣、房玄龄、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李义府、如李勣苏颋、张说、张九龄辈,遭忧无不即时起复。史载解琬以监察御史丁忧离职”,则天以琬识练边事,起复旧官,令往西域安抚夷虏,抗疏固辞。则天嘉之,下敕曰:“解琬孝性淳至,哀情恳切,固辞权夺之荣,乞就终忧之典。足可以激扬风俗,敦奖名教,宜遂雅怀,允其所请。仍令服阕后赴上。”

玄宗时,张说为工部侍郎,丁母忧,固请终制。史“称 累表固辞,言甚切至,优制方许。是时人多趋竞,或以起复为荣,而说能固节恳辞,竟终其丧制,自是尤为有识者所像解琬、张说这样能自觉按称“旧礼法服丧的已是极少数,所

以才被时人所重。不过既然从上至下已将起复看作“权夺之荣”,则虽有武则天长安三(年 703)正“月 三年之丧,自非从军籍者,不得辄奏请起复”的敕令④,起复仍然成为官员百计谋求的一种待

遇《。朝野佥载》卷四即载武周时“有 张琮丁忧,自请起复”的实例。上述两件书仪中的《 吊起服从政》是属于凶仪的吊慰书,虽然从表

面看,用了许多诸“如 攀慕号擗,五情贯割”“和 孝感罔极,五内屠

裂,哀苦奈何,哀痛奈何”之类的叹惋之辞,但“对 圣恩择才,起服从政”与其说“是 吊”,不如说是贺,因为吊辞掩盖不了因起复得来的

荣耀之感,其中欣羡之意,尽在不言。

唐后期五代,令官员终止服丧的起复仍常常被作为一种殊荣,

不过实行起来却是内外有别《。唐会要》卷三八广德二(年 764)曰：“若无公卿大臣,不

得辄奏请起复”的敕令,起复仍然成为官员百计谋求的一种待

遇《。
其文官自今以后,并许终制,一切不得辄有奏闻。"文官不得奏请起复,而武人却可因国家需要形势紧急而继'续从权',按照这一逻辑,则如果说唐前期武则天已规定对'于从军籍者'特有优待,那么唐后期对武人有士丁忧'行起复'便尤其顺理成章。节度使如郭英乂、令狐彰、李纳、刘玄佐、王武俊、李怀光辈无不即时起复,易。朝廷对定节度使张茂昭弟茂宗将尚公主,母死竟然借吉成婚节度使的"起复"固然是谋求稳定和对藩镇加以笼络的一项政策,却也是藩镇和节度使一再坚持的结果《旧唐书》卷一一五《卫伯玉传》记大历初,卫伯玉任江陵尹、荆南节度观察等使",丁母忧,朝廷以王昂代其任,伯玉潜讽将吏不受诏,遂起复以本官为荆南节度等使,时议丑之。"德宗贞元中昭义节度使卢从史丁父忧",朝旨未议起复,属王士真卒,从史窃献诛承宗计以希上意,用是起授,委其对于强藩悍镇当然更是如此,这里还牵涉到节度使死后成功。"的子弟世袭问题。如贞元八年淄青节度使李纳死,军中以其子师'古'代其位而上请,朝廷因而授之。起复右金吾大将军同正、平卢及青淄齐节度营田观察、海运陆运押新罗渤海两蕃使"。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卒,朝廷初以判官郑通诚权知留后事,结果通诚欲引浙西兵为援",事泄,三军怒,五六千人研甲仗库取戈甲,执带环绕衙城,请愔为留后,乃杀通诚、杨德宗、大将段伯熊、吉遂、曲澄、张秀等。军众请于朝廷,乞(授 建封子张)愔旄节",朝廷初不允许,但在派兵讨伐大败而还的情况下,只得授愔起复右骁卫将军同正,兼徐。
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州团练使,知徐州留后；可见张愔的“起复”是藩镇叛乱的结果。宣武节度使刘玄佐死”，玄佐子婿及亲兵乃以三月晦夜激怒三军,明晨,衙兵皆甲胄,拥玄佐子士宁登重榻,衣以墨衰,呼为留后”,士宁乃以财物分赐将士,请之为帅；朝廷不得已,授士宁起复金吾卫将军同正、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等。而魏博节度使田绪卒时使,”子季安年才十五,军人推为留后,朝廷因授起复左金吾卫将军,兼魏州大都督府长史、魏博节度营田观察处置等使。服阕,拜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进位检校司空,袭封雁门郡王。未几,加金紫光禄大夫,以本官同中书门。刘士宁和田季安的起复也是由于朝廷畏下平章事“惧藩镇跋扈作乱。当然朝廷为了造成藩镇内部的变化,有时并不接受其子承父位、及时起复的要求。《旧唐书》卷一四二《王承宗传》记”：元和四年三月,士真卒,三军推为留后,朝廷伺其变,累月不问。承宗惧,累上表陈谢。至八月,上令京兆少尹裴武往宣谕,承宗奉诏甚恭,且曰:'三军见迫,不候朝旨,今请割德、棣二州上献,以表丹恳。'由是起复云麾将军、左金吾卫大将军同正、检校工部尚书、镇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成德军节度、镇冀深赵等州观察等使。”可见所谓起复,常常因朝廷屈从藩镇压力。配合上述吊祭使的派遣,也成为朝廷安抚、平衡藩镇势力的一种手段。
是针对于此而定,并且这“个 起复为外官”应当是试图对外官的起
复设定条件和范围。刺史与使下职掌官见于史料记载如来瑱,原
为伊西、北庭行军司马”,丁母忧,以孝闻。安禄山反,张垍复荐之,
起复 段秀实原为安西绥德兼汝南郡太守,未行,改颖川太守。”
府折冲,安史乱中兵马使李嗣业统兵赴朔方”,以秀实为援,累有战
功。而秀实父殁,哀毁过礼。嗣业既授节制,思秀实如失左右手,
。严震,德宗时” 山表请起复,为义王友,充节度判官” 南西道节
度使奏为凤州刺史”,丁母忧罢。起复本官,仍充兴、凤两州团练
《。 旧唐书》卷一八七下《 张伾传》,记张伾为泗州刺史,卒,使“ 子
昭义军泗州行营衙前兵马使重政”,军吏欲立为郡将,重政母徐氏
固拒不从。”朝廷下诏,称“其 于家为孝子,在国为忠臣,军政乂安,
行义昭著”,并”以 礼无避于金革,理当由于权夺”予以奖励”,起复
云麾将军,守金吾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检校太子詹事、兼御史
中丞,仍委淮南节度使与要职事任使。”
不过大多情况下,刺史节度使仍应由其长官节度观察使推荐。
《 唐会要》卷三八记大中五(年 851)八月宰臣奏,”称 伏以通丧三年,
臣庶一致,金革无避,军旅从权。近日诸使及诸道多奏请与人吏职
掌官并进奏官等起复,因循既久,讹弊转深,非惟大启倖门,实亦颇
紊朝典。臣等商量,自今以后,除特敕及翰林并军职外,其诸司诸
使人吏执掌官,并诸道进奏官,并不在更请起复授官限,其间或要
(藉 籍)驱使官任,准旧例举追署职,令勾当公事,待服阕日,依前奏
官。”鉴于使下职掌官奏请起复太多,朝廷不得不加以限制,但未必
①《 旧唐书》卷一一四《 来瑱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365页。
②《 旧唐书》卷一二八《 段秀实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583—3584页。
③《 旧唐书》卷一一七《 严震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404—3405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奏效,且其中“对要(藉籍)驱使官”的权令勾当公事“和待服阕日,依前奏官“其实也预留了余地。这种不受官位限制且实际上也与“金革“和军旅”之需无关的起复之制不仅助长了唐后期贪慕荣利的浇薄之风,也增加了节度观察使的权力,成为又一项由他们操纵而颁给属下的优典,礼仪则不得不更大程度地沦为政治工具,这是唐中央朝庭所无法控制的。五代节度使的起复相沿已成制度,则将之作为礼仪,已是莫大讽刺。

三、客将、客司与客省

宾礼为五礼之一。宾即是客,宾礼在中古时代具体为朝廷与蕃国的交往之仪。《唐六典》卷“四 礼部员外郎”条记开元五礼”,二曰宾礼,其仪有六”:一曰蕃国王来朝,二曰戒蕃王见,三曰蕃王奉见,四曰受蕃使表及币,五曰燕蕃国王,六曰燕蕃国使。主掌这一礼仪的机构是鸿胪寺。但是唐后期五代藩镇体制下,所谓客礼却有了对“内”新含义。与之相关,中央和地方都出现了另外待“客”的机构:在中央是客省和客省使,主要负责与藩镇地方或其他割据政权的人事往来;在藩镇相对应的则是客司与客将,其职一同于中央的客省和客省使。敦煌书仪中相关书启的出现,表明了以上职司在礼仪方面的特殊作用。研究晚唐以后中央地方的礼仪交接,尤其不可不注意到它们的存在及彼此关系。

（一）客将、客司

藩镇的礼仪职司

客司、客将的机构职名不见于正史官志的记载,却是藩镇和地方诸州几乎必设的礼仪职司。他们接待中央及他镇来使,赞导宾
客来仪，并为所在藩镇充当使节。在协调沟通藩镇与中央、藩镇与藩镇间的关系方面，及官员彼此人际交往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1. 客司和客将的出现

敦煌P.4092《新集杂别纸》是一件供藩镇官员与四方交往所用的书仪。在收书人是幕府官员的别纸中，除副使、节判、团判、支使、推官、书记和带各种检校衔者外，又有题为“知客”的一首。其书曰：

比以一间光尘，屡移岁序；空驰魂梦，莫遂披承。昨者轩车到州，方获款晤；虽慰倾翘之恳，实乖迎伫之仪。曾未启申，遽兹违远，悚惕依恋，岂任下情。

这封书信的大意是表达对知客的感念之情。写信人也是藩镇官员，虽慰倾翘之恳，实乖迎伫之仪，说明他“在轩车到州”时，曾受到知客的礼待，故匆匆离去后，要向知客再致谢意。

知客在地方亦称典客。《旧五代史》卷二○《刘捍传》称：刘捍，开封人。父行仙，宣武军大将。捍少为牙职，太祖初镇夷门，以捍聪敏，擢副典客。同书卷六一《张遵诲传》，言其原为魏州人，后奔太原，武皇以为牙门将。庄宗定山东，遵诲以典客从，历幽、镇二府马步都虞候。同书卷一一○《周太祖纪》广顺元（年951）正月：“制其先于在京诸司差军将充诸州郡元从都押衙、孔目官、内知客等，并可停废，仍勒却还旧处职役”一条亦有诸州“郡内知客”之名。

《五代史补》卷三欧阳彬入蜀一则记欧阳彬世为县吏，马氏之有湖南也，彬将希其用，乃携所著诣府。求见之礼，必先通名纸。有掌客吏，众谓樊知客，好贿，阴使人谓彬曰：‘足下之来，非徒然也，”

"
实欲显族致身，而不以一物为贶，其可乎？彬耻以贿进，竟不与。既而樊氏怒，掷名纸于地曰：‘岂吏人之子欲干谒王侯耶。’彬深恨之，因退而为诗曰：‘无钱将乞樊知客，名纸生毛不为通。’

无钱买通知客，即不予通名传达，是藩镇或州郡知客之职首在送往迎来。晚唐五代中央与地方、藩镇与藩镇之间往来频繁，须有专门待客的职司，但典客与知客者皆非其正式职名。《旧五代史》卷一○九《李守贞传》：

李守贞，河阳人也。少桀黠落魄，事本郡为牙将。晋高祖镇河阳，用为典客。

《新五代史》卷五二本传略同，“唯用为典客”作“以为客将”。又前述副典客刘捍，《新五代史》卷二一本传“谓（梁）太祖初镇宣武，以为客将”，知典客的正式名称就是客将。《资治通鉴》卷二五一昭宗大顺二年（891）三月条记胡三省注曰：“客将，主唱导，傧赞宾客，汉、晋铃下威仪之职。”同书卷二六四昭宗天复三年胡注复曰：“今阃府州军皆有客将，主赞导宾客，盖古之舍人、中涓，汉之铃下、威仪之职。唐末藩镇置客将，往往升转至大官，位望不轻。

案：客将一称多见记载，其所在的机构也称客司，周藤吉之《五代节度使的支配体制》，载《史学杂志》61卷4、6期，1952年4月、6月；《关于五代节度使牙军的考察》，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2，1951年9月。
之一,负责归义军与周边政权之间的外事交往活动,并指出客司的长官为都客将,一般由节度押衙兼领,下属又有知客或客将等。但客将、客司非归义军独有,它们不过是归义军借鉴内地藩镇制度的产物。只是传世文献未见有都客将之名,而是只有客将、典客。典客或知客,也多指客司的负责将吏。见于史载又有"客司小将"、客司十将"、客司子弟"等名,它们应当也是客将或客

此类人物初始官职不高,但不乏有才能者,如曾为客司之职属的李勋后竟中举,亦领藩镇为节度使。2.客司、客将的典客之责

客司、客将属于武职系统,但显然并不是藩镇设立的一般武将官职。史载,唐末濠州钟离人马嗣勋"即州客将";后州陷归朱全忠,即署为元从押牙、副典客,颇称任使"。宋令询"即州客将。知书乐善,动皆由礼。"海州人张筠,原为时溥偏将,后被朱全忠所获,梁方图霸业,以筠言貌辩秀,命为四镇客将"。有口辩、知书懂礼、言貌辩秀说明客将文雅聪慧,具备这些优点无疑是客将的职能所要求的。

①冯培红《: 客司与归义军的外交活动》《敦煌学辑刊》

②《北梦琐言》卷三《李太师光颜》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2—13页。

③《北梦琐言》卷三《薛能尚书镇郓州》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5页。

④《全唐文补遗》第五辑《大吴越国明州故汝南郡袁府(君从章)墓铭并序》,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446页。

⑤按十将乃藩镇武将职名之一,此处为客将所带军职。参见齐陈骏、冯培红《: 晚唐五代归义军政权"中十将"及下属诸职考》,收入《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第25—35页;贾志刚《: 从唐代墓志再析十将》《'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08—412页。

以上分见《旧五代史》卷二○《马嗣勋传》、卷六六《宋令询传》、卷九○《张筠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74页、880—881、1181页。
五代史》卷三五《唐六臣传》略曰：

初，唐天祐三（年904），梁王欲以嬖吏张廷范为太常卿，唐宰相裴枢以谓太常卿唐常以清流为之，廷范乃梁客将，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语裴枢纯厚不陷浮薄，今亦为此邪。"

是岁四月，彗出西北，扫文昌、轩辕、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归其谴于大臣，于是左仆射裴枢独孤损、右仆射崔远……吏部尚书陆扆皆以无罪贬，同日赐死于白马驿。凡搢绅之士与唐而不与梁者，皆诬以朋党，坐贬死者数百人，而朝廷为之空。

案：此事《资治通鉴》系于天祐二年，惟不言张廷范为梁客将事。但《白孔六帖》卷四二梁客将条与此同。太常卿是掌宗庙祭祀的典礼之官。朱全忠强欲以张廷范为太常卿，实在是要为篡唐作礼仪上的准备，唐宰相裴枢等"以清流"为借口提出反对只能招来杀身之祸。然而不管清流浊流，将客将直接转为太常卿，本身就说明客将是藩镇的礼仪之官，有将藩镇取代朝廷之意。

但作为礼仪官，客司、客将的职能主要不在主持祭祀一类活动，而在应接各方面的来客。唐后期五代，来到藩镇州府的人员非常复杂，有朝廷来使、过往官员、他方将吏、文人学子。客司客将的第一大职务便是应接、引见、招待各方面的来人来使。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卷一九有《与客将书》一首。这件书启说明崔致远曾以一介书生远投藩（镇即书中的相公、淮南节度使高骈），"在无媒进取"的情况下求助客将。书中极力渲染自己却缘虽曾食禄，未免忧贫；赵囊则到处长空，范甑则何时暂热的穷愁落魄之境，感谢"将军（客将）许垂拯拔，每赐吹嘘"，使自己得遂献投；为了使自己能获得重用，就连今欲专修启事，再献相公的事也要与客将
商量。说明来人来使，甚至到藩镇来谋事的人想要见到使主，都必须通过客将介绍安排。客将的推荐是很起作用的，他的职务在某种意义上十分关键。

在接待的过程中，一应相关食宿宴设等事，自然也由客司和客将负责料理。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卷一记载了进士杜荀鹤见梁太祖和午间由掌客设食，拦住不放归和生病期间由“客司守之，供侍汤药”《玉泉子》记襄州节度使裴均设宴，“因客司漏名”，致使郑滑馆驿巡官裴弘泰耽误了赴宴《资治通鉴》卷二八三言闽国主王(曦 延羲)暴戾，天福七(年 942)八月丙寅”，宴群臣于九龙殿。从子继柔不能饮，强之。继柔私减其酒，曦怒，并客将斩之“。是客将于宴会中还当祝酒劝酒，招待客人。由此推测，宴会的主持或赞礼人也是客将。

崔集卷一(四《唐文拾遗》卷四○)还有《客将哥舒珰兼充乐营使》墨敕牒一件，内称“:久委宾司，既见与言之可使；俾兼乐职，必期饰喜之克谐。尔其有礼为先，无荒是诫；迎送于燕台郑驿，指挥于回雪遏云。勿使英贤，或发养痾之诮；须令艳丽，先缄笑躄之声。事须兼充乐营使。”事“涉乐营使”是个什么官职。藩镇皆有乐营，乐者，音声伎乐也“。迎送于燕台郑驿，指(挥踪)于回雪遏云“是客将迎来送往的常务，由于安排食宿宴饯的同时，少不了歌舞伎乐。于“是须令艳丽，先缄笑躄之声”，原来，乐营使就是管理这些“艳丽”或者营妓的。以客将之职兼充乐营使，是配合他的工作需要。可以想见，正是由于上述接待之务完全①《玉泉子》，中华书局，1958年，第25页。又如《云溪友议》卷下《杂嘲戏》”：麻衣黎瓘者，南海狂生也，游于漳州，频于席上喧酗，乡饮之日，诸宾悉赴，客司独不召瓘。”与此类似。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77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是由客司客将负责，所以才会有书仪中来访官员走后，仍特作书向“知客”或客将致意的情况。

另外更重要的是，客将在接待中也要掌握具体仪节。《东坡志林》卷七记曰：

徐寅，唐末号能赋。谒朱全忠误犯其讳，全忠色变，寅狼狈走出。未及门，全忠呼知客将，责以不先告语，斩于界石。

误犯节度使讳是大失礼，客将预先告知提醒是必须的。当然如接待朝廷或其他藩镇来使，礼节更是忽略不得。《北梦琐言》卷一一记唐末朝廷以薛昭纬使大梁”，于时梁太祖已兼四镇，兵力渐大，有问鼎之心，速于传禅。薛公衔命梁国，梁祖令客将约回“。令客将约回”一事是派客将传达节度使不打算见朝廷来使的决定。这里涉及到礼仪，所以要通过客将传达。而藩镇如见来使，则引见之际主客双方所持的仪节，实际也要由客将或典客根据使命主的意旨与对方取得协调。同上书卷五记曰：

唐薛廷珪少师，右族名流，仕于衰世。梁太祖兵力日强，朝廷倾动，渐自尊大，天下惧之。孤（卿指薛廷珪）为四镇官告使，夷门客将刘（翰？）先来类会，恐申中外，孤卿佯言不会，谓谒者曰："某无德，安敢辄受令公拜？"竟不为屈。

何"谓恐申中外"?意不明。但此事可参见《新唐书》卷二○三《薛逢附薛廷珪传》：

子廷珪，进士及第。大顺初，以司勋员外郎知制诰，迁中书舍人。从昭宗次华州，引拜左散骑常侍，称疾免，客成都。光化中，复为舍人，累尚书左丞。
《册府元龟》卷六六一《奉使部·守节》：
李光序为散骑常侍，庄宗初平中原，与右拾遗曹琛往湖南马殷册命。先是，为梁中使往如邻国礼，或呼殷为殿下，宾客皆有丞郎给舍之目。光序等至，客司先会谒殷之礼，须尊梁朝旧事。琛谓之曰：“岂有湖南令公称藩事唐室，复欲天使称臣哉！如不受唐册命改图，即任所为。”既见殷，但呼公而已，其余学士舍人但呼为判官书记。

这里记载了马殷由对梁行邻国礼到对唐称藩变行属国礼的过程。虽然是被迫所为，“但客司先会谒殷之礼，须尊梁朝旧事”，说明棘手而敏感的仪节问题是通过客司来处理的。

又前节举《旧五代史》卷六八崔沂传，提到崔沂被命为西京副留守，沂至府，客将白以副留守合向留守张全义“行廷礼”的问题。可见无论是朝廷或他方来人来使，抑或本藩镇内部上下级之间，应行何种等级的礼仪都由客将掌握并预先告之，客司客将作为藩镇“礼宾司”的作用由此而知。

3. 客司、客将的出使、交接之职
对外出使任务。这一点也与归义军相似。但与归义军四邻多是少数族政权不同，内地的藩镇须协调处理的主要是与朝廷、与其他藩镇的关系，或是藩镇间的事务，其间多与客将有关。

《旧五代史》卷二《梁太祖纪》记天祐三年正月朱全忠密谋攻魏，因女卒于邺城，遣客将马嗣勋领长直军千人，杂以工匠、丁夫，而入于魏，声言为帝女设祭，魏肩其人信而不疑，结果朱全忠取邺计谋得手。同书卷一三《朱瑾传》记乾宁二年（895）春，朱全忠令大将朱友恭攻朱瑾，后以瑾伪遣牙将瑚儿持书币送降，故遣客将刘捍取符笥受降。《新五代史》卷三九《刘守光传》，记幽州节度使刘守光被晋将周德威围经年，累战常败，乃遣客将王遵化致书于德威请降；后守光被擒，仍由客将引来见晋王，也说明客将在两军作战中的协调沟通和礼仪作用。

至于客将充当使节的情况更是史不绝书。如前述梁太祖客将刘捍，《旧五代史》卷二○本传记：文德元年十一月（888），蔡将申丛折宗权足，纳款于太祖，使捍奏其事，加兼御史大夫。以后无论是从伐镇定王镕，还是移攻中山王处直；刘捍都是或被“命入壁门传谕”，持旗而入，竟达其命；或“单马入州，安抚而回”。这里王镕归降一事，据《资治通鉴》卷二六二光化三年（900）载情节曲折，但刘捍的作用显然很关键。所以天复三年（903），因李茂贞客将郭启奇来使，刘捍又与之往返复命，成为朱全忠与朝廷和凤翔方面联络的使者。

五代十国时期，客将来往于藩镇和地方政权之间，活动十分频繁。《资治通鉴》卷二五七记光启三年（887），唐以淮南久乱，命朱全忠兼淮南节度使。全忠遣内客将张廷范致朝命于杨行密，以行密为淮南节度副使。《吴越备史》卷三《忠献王》记开运三年
南唐攻福州，闽威武节度使李弘遣客将徐仁宴、李廷谔等奉表称臣。《新五代史》卷六二《南唐世家》记后汉李守贞反河中，遣其客将朱元来向唐主李璟求援。广顺元年，楚马希崇代马希萼，国人不附。部下徐威等欲杀希崇以自解。希崇微觉之，大惧，密遣客将范守牧等奉表请兵于。南平王高保融当周世宗征唐之际，又遣客将刘扶奉笺南唐。这些活动包括册命、求援、称臣、劝降，其身份可称是礼仪使者。典客一客将在藩镇交往中的作用是毋庸质疑的。与蕃国的交往也同样少不了客将。如刘知远勾结契丹，即遣客将安阳王峻奉三表诣契丹主。其中客将所起的作用，亦属奉表请降的礼仪使范围。以上客司、客将对内对外所承担的要务，使之成为藩镇不可缺少的重要机构和官职。《册府元龟》卷四七六《台省部·奏议七》记天福三年三月中书舍人李祥上疏奏节度刺史州衙前职员等事，提出节度州只许奏都押衙、都虞候、教练使、客将、孔目官，及有朱记大将十人，其中便有客将。事实上客将既由节度使奏署，便常常是节度使的心腹，或选有才能者担任。他们在藩镇接待四方来客，在征讨或结盟过程中充当使者，是藩镇形象的代言人。《说郛》卷九○《益州名画录》卷上记一则颇有代表性。此则言大中年杜相公悰镇蜀，起净众等寺门屋，请善画者陈皓、彭坚二人各画天王一堵，各令一客将伴之，这种形象正是人间客将对藩镇意义的写照。而客将本人在交往过程中的历练与因此而建立的诸种关系，也可使他们更易建功立业，或蒙重用。历史称悍便习宾赞，善于将迎。①《资治通鉴》卷二九○，中华书局标点本，第9465页。②《新五代史》卷六九《南平世家》，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59页。③《资治通鉴》卷二八六天福十二年，中华书局标点本，第9335—9336页。
自司宾局及征讨四出，必预其间，虽无决战争锋之绩，而承命奔走，敷扬命令，勤干莅职。李守贞虽然最初只“是河阳，以至崇显焉”一客司耳”，且不习戎行；但“是善接英豪，得人死力”，也竟成一方叛主。后唐宰相范延光和任永平军节度使、西京留守的张筠，后晋宰相景延广更是从藩镇客将“者往往升至大官”的显例。由藩镇客将迁转任朝廷阁门使、引进使、客省使则是客将升迁的一条通路，其中又以任客省使者为最多。

——中央机构中的(二)客省、客省使 客司、客将

客将、客司虽然多见于晚唐五代，却并不能认为就是藩镇的创造。事实上在有藩镇的客将、客司之前，中央机构中已有了它们的模式客省和客省使。由于前者和后者职能上的相似，我们不妨可以说客将和客司就是降低了级别的客省和客省使。在研究了客将和客司之后，只有再来探讨客省及客省使的发展，我们才能了解两者为什么会同时并存且有着怎样的互为递迁的意义了。

1. 客省与客省使的设立、发展

客省作为朝廷留止宾客的机构大约南朝即有。《宋书》卷六九《范晔传》记文帝元嘉二十二(年 445)十一月诛范晔”，其夜，先呼晔及朝臣集华林东阁，止于客省。”华林东阁是殿名，说明客省在宫中。《资治通鉴》卷一二四谓”：客省，凡四方之客人见者居之，属典

①《旧五代史》卷二○《刘捍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72页。
②《旧五代史》卷一一○《周太祖纪》，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450页。
③范延光任客将见《旧五代史》卷三五《明宗纪》，同光四年四月乙未条下，第492页。景延广事见《旧五代史》卷八八本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143页。
客省原是宾客留居的内客省。《通鉴》卷二一〇玄宗开元元年七月甲子，上因王毛仲取闲厩马及兵三百余人，自武德殿入虔化门，召常元楷、李慈，先斩之，擒贾膺福、李猷于内客省出。胡注曰：四方馆隶中书省，《唐两京城坊考》于延明门外为中书省，省内有内客省，引《通鉴》及胡注为证。值得注意的是，这内客省与《唐六典》卷一八《鸿胪寺》典客署所“凡酋渠首领朝见者，则馆而以礼供之”的客馆不是一回事。客馆据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应当是在宫城之外，承天门街之西，第七横街之北，从东第一，鸿胪寺；次西，鸿胪客馆。前节已经说明，这个鸿胪客馆，隋炀帝时曾称四方馆，但唐代以四方馆隶中书受四方章表，于是鸿胪寺典客署便另置接待四夷使者的客馆，说明地方和外夷事务是有所划分的。唐代客省临近中书省，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接待来自地方的内宾。黎虎认为客省隶属中书省，从最初的情况看有可能是如此。东都洛阳也有客省。《通鉴》卷七工部郎中下记上阳宫玉门曰台，即诸方通表通事舍入受事之司。内客省所在的延明门，距太极宫正殿太极殿和中书内省较近，与四方馆尚不在一处。按据宋敏求《长安志》卷七承天门街之西宫城之南，第二横街之北，从东第一，玉门曰台，即诸方通表通事舍入受事之司。《隋书》卷二八下《百官志》，中华书局标点本，第798页。并参石晓军《隋唐四方馆考略》，《唐研究》第七卷2001年，第311—325页。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71—373页。
“京门之西曰客省院”，安史乱中许远守城战败，与哥舒翰、程千里俱囚之客省”。客省显然也是接待机构，其性质一
同于在长安宫内的客省。

不过到了唐后期，长安太极宫的客省大概被迁至大明宫右银台门内，成为隶属宫内的机构。《唐会要》卷六六记客省曾一度因
来人众多而负担过重：
大历四（年769）七月，诏罢给客省之廪，每岁一万三千斛。
永泰已后，益以多事，四方奏计，或连岁不遣，仍于右银台门置
客省以居之。上书言事者，常百余人，蕃戎将吏，又数十百人，
其费甚矣，至是皆罢。
此事《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和《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均记
在大历十四年七月，《通鉴》且明谓右银台门客省是代宗所置。这
时唐帝居处、朝见都在大明宫，右银台门距宫内中书门下宰相机构
所在的旧华门、月华门都不太远。安史之乱后，朝廷要应对的地方
事务众多，右银台门成为宫廷内外的交接处，肃宗时，宦官李辅国
就曾“每日于银台门决天下事”。客省置于此，大概也是为了上
书言事的方便，不过这造成了客省接待事务的庞杂和停留人员过
多。对此《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更进一步解释说：
时回纥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与中国婚姻，岁送马
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而中国财力屈竭，岁负马价。
河、湟六镇既陷，岁发防秋兵三万戍京西，资粮百五十余万缗。
而中官鱼朝恩方恃恩擅权，代宗与宰相元载日夜图之。及朝

①《旧唐书》卷一八七《许远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902
页。
②《旧唐书》卷一一二《李岘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344页。
恩诛,帝复与载贰,君臣猜间不协,边计兵食,置而不议者几十
年。而诸镇擅地,结为表里,日治兵缮垒,天子不能绳以法,颛
赐僧巫留意祠祷、焚币玉、写浮屠书,度支禀,岁以钜万计。然
帝性俭约,身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三,欲以先天下。然生日、端
午,四方贡献至数千万者,加以恩泽,而诸道尚侈丽以自媚。
朝多留事,经岁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蕃夷贡
献未报及失职未叙者,食度支数千百人。德宗即位,用宰相崔
祐甫,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岁省费万计。

客省的混乱是和代宗朝内外治理无序有关的。但是这样一来,客
省接待的来人来客甚至有些内外不分。所谓“蕃夷贡献未报”似乎
不止于藩镇地方,还有一些长留朝廷的少数民族。所以德宗在清
理和省费的过程中,对客省职能也重新作了规划。除了接受贡献
和朝觐的具体仪节外,少数民族入朝的一般居处、接待之事有可能
不再经由客省①,而由唐后期设置的鸿胪礼宾使及代替客馆的礼
宾院负责。客省主要是“对内”的职务大概从此更明确了。

可能由于客省仍置在宫内,所以唐史料提到客省有时也称内
客省②。《新唐书》卷一四五《元载传》记李少良罢官游京师,“不
见调,(愤)元)载不法,疏论其恶,帝留少良客省,欲究其事。”同传又载
大历八年,有晋州男子郇谟行哭于长安东市,自称欲献字以言时
事”。京兆以闻,帝召见,赐以衣,馆内客省,问状,多讥切载。”从史

①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一书认为,客省的主要功能是收留两部分人员:国内的
和蕃国的。后者与鸿胪寺相类。“但是鸿胪寺所居蕃客是一般的外交人员,客省所居
是因故尚未能及时报答的一部分特殊的外交人员”。但笔者认为,唐后期客省职责内
重于外,代宗以后,在对外方面负责的主要是相关礼仪之务。

②见《唐会要》卷六六《鸿胪寺》:“天宝)十三载二月二十七日,礼宾院,自今后,
宜令鸿胪勾当检校,应缘供拟一物以上,并令鸿胪勾当。”疑此礼宾院已代替客馆。
料看不出客省、内客省的不同，《通鉴》卷二二四大历八年郇谟馆于客省《事下胡注》时于右银台门置客省《一段引上述大历十四年史料，也说明郇谟所在的内客省即大明宫客省。唐后期长安大明宫的客省于是成为主要招待地方来使的机构《。《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贞元四年(788)九月丙午诏节日文武百僚追赏为乐，宰相以下赐钱中有“客省奏事共赐钱一百贯文，委度支每节前五日支付，永为长式””。客省奏事《《唐会要》卷二九同条“各省诸道奏事官”，各省“乃客省”之误，看来诸道奏事官是可以住在客省里的。客省还拘留了一批前来投诚的叛镇官员如李惟岳弟惟。所以陆贽《翰苑集》简、朱滔判官郑云逵之辈卷一五《兴元论续从贼中赴行在官等状》指出，德宗自建中以后对于从藩镇来的无论是“降附者”抑“或输诚者”、论官军挠败者等一律不信任，咸使拘留，谓之安置。或诘责而寘于客省，或劳慰而延于紫庭。虽呵奖颇异其辞，然于圈闲一也。既杜出入，势同狴牢，解释无期，死生莫测，守护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絷维，动历年岁，想其痛愤，何可胜言!”可见客省在宫禁高墙之内，还可以用作软禁地方来人来使的处所。而无论是从地处宫内还是从主要招待地方来“宾”的意义看，称为“内客省”都是恰如其分。2.客省和客省使的“对内”礼仪之务客省既在宫内，则唐后期即设置由宦官充任的客省使予以管理。客省使除了接待藩镇州郡来人来使，还有更重要的上传下达①参见《新唐书》卷二一一《藩镇镇冀》，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950页《；《旧唐书》卷一三七《郑云逵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770页。
和礼仪节目《。职官条称"五代梁有客分纪》卷四四客省使、副使省使，国朝因之，掌四方进奏及四夷朝贡牧伯朝觐赐酒馔饔饩、宰相近臣禁将军校节仪、诸州进奉使赐物回诏之事"可以说明。掌四上达四夷使者和地方奏章并传宣诏命，方进奏和赐物回诏即负责上下之交接，而掌进奏又须与引进、阁门使等相配合。对此赵雨乐指出，客省使在大明宫右银台门外","如阁门使般承受外廷奏章，再通传君主之处分。但是，与阁门使比较，客省使之处理奏章对象似为地方之武臣，亦即"蕃戎将吏"之事务。臣僚奏章之传递方式，往往是先经客省使继而进呈至阁门，反映了客省使与阁门使之配合关系。"这一看法无疑很正确。但两使职能毕竟有所区别。据《职官分纪》同卷阁门"使掌供奉乘舆、朝会、游幸大宴，及赞引亲王宰相百僚蕃客朝见辞[退？]、纠弹失仪"；负责的主要是朝见时一般性的传宣赞引纠弹之仪，即宋人所"谓阁门官日(月日?)引班，乃今郡典谒吏耳"，纯粹只是仪节和手续。但客省使在接受和处理奏章方面却似乎更直接更具实质意义。根据史料记载，唐后期地方表章笺奏的递交可以有两条路，一条即前章已述通过中书省四方馆，另一条即客省。前者据郑余庆书仪可以通过馆驿递交，后者却是由藩镇或州郡派人专送的。《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下》记大和九(年835)三月甘露事变发生后，"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三上疏，问王涯罪名，内官仇士良闻之惕惧。是旧，从谏遣焦楚长入奏，于客省进状，请面对。上召楚长慰谕遣

①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 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第6版社，1
②参见《程史》卷"四一言悟主"条《文忠集》卷六一《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上海古籍影印四库全书本。"按日月引班"《文忠集》"作日引班"。
“宫外,一条是中书,一条是内廷,在传达路径和方式上都有远近之别,而后者则到达皇帝可以更快更直接。这在五代取消宦官任使后,便是两者在公事内容上有轻重缓急之分。《旧五代史》卷四《太祖纪》开平三(年909)《五代会要》卷五《杂录》作元年)八月敕称:

建国之初,用兵未罢,诸道章表,皆系军机,不欲滞留,用防缓急。其诸道所有军事申奏,宜令至右银台门委客省画时引进。诸道公事,即依前四方馆准例收接。这条史料说明,有关紧急军事申奏的诸道章表,后梁规定是由客省引进的,这种做法其实是相沿唐朝客省传递藩镇章表的旧制,说明通过客省是藩镇上达军机和与朝廷取得直接联系的一条通路。必须指出的是,唐长安大明宫中的客省不但距离宰相机构的中书门下近,而且客省所在银台门与延英门基本在一条线上,也就是说距皇帝坐朝的延英殿不远。五代客省的设置大概也本着这一原则,所以《五代会要》卷六《开延英仪》“有南班揖班退,于客省就食”的规定,而《职官分纪》卷四四也“说国朝客省在阁门之西”。这可以理解为什么通过客省递表奏事方便,以及客省与阁门、引进等使在传接上的配合。当然由于职务的相通与两者本来的联系,我们也不能认为客省使与四方馆完全无关。《职官分纪》同卷“在四方馆”条下“说国朝四方馆在朝堂门外,使(客阙)则客省、引进、阁门使副兼掌”,四方馆由诸使兼掌的情况五代以来其实已很普遍,它只能进一步说明诸使与四方馆在上传下达功能上的共性。
《新唐书》卷二○八《宦者下》：

天子入全忠军，全忠泥首素服，待罪客省，传呼彻三仗，有诏释全忠罪，使朝服见。

天复三(年903)朱全忠进军凤翔城下，唐朝廷借助平卢节度使王师范等力使朱全忠暂时受挫。但此事《资治通鉴》卷二六三记作：

“(正月)甲子，车驾出凤翔，幸全忠营。全忠素服待罪；命客省使宣旨释罪，去三仗，止报平安以公服入谢。”与《新唐书》略不同。案此时昭宗既至凤翔，则朱全忠不可能在大明宫客省，事实当如《通鉴》所记。胡三省“于命客省使宣旨释罪”下注曰：时客省使，盖通知阁门事，故令宣旨释罪。但这个解释并不一定正确。按照《职官分纪》所说“四夷朝贡牧伯朝觐赐酒馔饔饩，宰相近臣禁将军校节仪”，客省使须依礼节处置、调停朝廷“与四夷”“或牧伯”间的矛盾关系，如上述宣旨释罪”和引进章表都是处理和藩镇关系的具体表现，其中包含的绝不止是形式。

3. 客省使的五代特色

正是由于这一代表朝廷的礼仪交接作用，所以客省使是晚唐内职中较重要的职务。客省使之上，五代中原朝廷又设内客省使。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九述《康约言碑》，记墓主于文宗大和、开成中曾任河东监军、鸿胪礼宾使、内外客省使，后升至宣徽北院副使，说明客省使在鸿胪礼宾使之上，宣徽使之下。全唐文补遗》第三辑大中四(年850“唐故刘府(君士准)墓志铭并序》记墓主长子刘重约职也“为内外客省使”，内外者，不知是否由职兼内外而来，但很可能已是五代分设客省使和内客省使的滥觞。《旧唐书》卷二十
上《昭宗纪》记天复三年十二月辛巳，和崔胤、张濬一起被汴州扈驾指挥使朱友谅诛杀的有皇城使王建勋、飞龙使陈班、阁门使王建乂等，自崔，王建乂等几乎是最后一批被杀的宦官当权者。而同卷载朱全忠天祐元年迁帝洛阳并将其身边所有宦官尽数杀却后，闰四月“戊申，敕今后除留宣徽两院、小马坊、丰德库、御厨、客省、阁门、飞龙、庄宅九使外，其余并停”，也说明和藩镇打交道的客省使还是非留不可。五代时期，客省使不仅中原朝廷设立，即十国政权一旦建国称帝，也往往将原来藩镇时期的客司机构升格。如《蜀梼杌》卷上记天复七年（即开平元年，907）前蜀王建即皇帝位，十月下诏即有“客司为客省，乐营为教坊，使厨为御食厨”等官司职名的改称《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同光元年（923）二月记吴越王“（钱）镠始建国，仪卫名称多如天子之制。置百官，有丞相、侍郎、郎中、员外郎、客省等使。”反之则降格。如楚马氏臣服于南唐，惟有客司、客将而无客省。南唐当宋朝逼迫之际，不得不于开宝五年（972）二月下令贬损仪制，改客省为延宾院①。不设客司者即有客省，官职机构的上下，进一步说明客省是客司的替代，而客省使本身也愈益带有藩镇的特色。

和藩镇体制相配套的，在朱全忠诛杀宦官后，原内诸司使身份的变化。如赵雨乐所指出，内诸司使既可由朝廷的承旨、殿直、供奉官的三班官正常迁转，也可转向军职或由军将直接升迁。使职与军职之间，在五代藩镇政权下，代表着两种性质颇为相近之帝王元从集团。故此，在转迁之关系上，彼此有互通之趋向。②

①《南唐书》卷三《后主本纪第三》，影印四库全书本。
②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第127页。
代阁门使、客省使或者内客省使等的一个来源就是藩镇的客将,如《旧五代史》卷九六"记(孟)承诲,大名人也。始为本府牙校,遇晋高祖临其地,升为客将。后奏为宗城令,秩满,以百姓举留,移常山藁城令,皆有善政。高祖有天下,擢为阁门副使,累迁宣徽使"。在迁宣徽使之前孟承诲还任过客省使及内客省使。又载刘继勋,"当(后)唐天成中,晋高祖镇邺都,继勋时为客将,高祖爱其端谨,籍其名于帐下,从历数镇。及即位,擢为阁门使"。同卷一○七言阎晋卿者,忻州人也。家世富豪,少仕并门,历职至客将,汉高祖在镇,颇见信用。乾祐中,历阁门使,判四方馆,后又任为内客省使。又如张遵诲、朱弘昭、李仁矩都是由后唐庄宗或明宗在藩镇时的客将升为客省使或内客省使的。王峻、李守贞、李彦韬等也都有类似的经历。以上客将升为阁门使或客省使、内客省使当然并不都是一步到位,但是任使职者多有藩镇客将经历毕竟说明其职能有相似之处。事实上客将在藩镇的职务移到中央后规模肯定是扩大了。所以并不是都被客省使单独继承,根据《五代会要》等书记载,客省使、东西上阁门使和引进使都是后梁正式设立的使职。
使，有时门使、引进使与客省。诸使之下使职务也有临时交叉。承旨、副使、使又设副使，井设承旨等官的设置说明客将的职司到中央后复杂和规范化了，但总体上说，在针对藩镇地方的礼仪和交往方面这些单位是协同负责的，诸使的迁转大体本着门使→客省使→内客省使→宣徽→引进使→北院使→宣徽南院使的次序，是使职迁转中一条常见的途径③。这一迁转途径说明，为处理中央、地方关系而设的礼仪官职是五代中央机构内很核心的一部分，而其发展膨胀正是藩镇格局下的一大特色。

4. 五代客省使的外交职能

五代客省使在处理与地方的关系和事务中作用一如既往，并可以再分为两方面，即一是上面已指出的在中央对藩镇军州的礼仪接待和上传下达。这里不妨再举些事例。如《旧五代史》卷四《梁太祖纪》开平三年七月丙寅敕要求加强大内皇墙使诸门把守，“其诸司使并诸司色人，并勒于左、右银台门外下马，不得将领行官一人辄入门里。其逐日诸道奉进，客省使于千秋门外排当讫，勒控鹤官舁抬至内门前”，可见进奉是要由客省使安排，他们是藩镇进京后必须打交道的官员。所以《新集杂别纸》中有写明“是客省”的一封：

①如《资治通鉴》卷二六八梁太祖乾化元(年911)六月条《考异》引《大梁编遗录》“记三月壬辰，差阁门使王瞳、受旨史彦章赍国礼赐幽州刘守光”，是为一例。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743页。

②客省设承旨见《旧五代史》卷七九《后晋高祖纪》天福五年夏四月丙午诏，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039—1040页。

③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 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第171—178页。
伏以太保手文星异，足理呈祥；为间代之雄才，作明时之伟器。而自三秦著政，八水分忧；当下车之时，既歌来暮；及朝天之后，人有去思。今则允践崇资，（慕？）尽由睿智。事虽光于省闼，望继在于藩维；凡在恩知，忻抃攸极。

这位太保姓名不详，据书仪时间，应是后唐明宗时人。他官高位重，是客省的长官客省使无疑。书“中下车之时，既歌来暮；及朝天之后，人有去恩”，事虽光于省闼，望继在于藩维”数语，不但歌颂他给藩镇去京城的人带来好处，而且指明了他升迁给予藩镇的影响。此下又有“给承旨”书一封，内除赞颂功德外也“称梦寐潜通于陶（侃？），就望且异于子牟；凡在恩私，企抃同恳”。颇疑它的收书人也是一位客省承旨。另“在洺州判”之下又“有前知客尚书”一通：近因专使西行，已专附状；必许情恳，寻达聪（聪听）。伏承参从台幢，却朝京阙，欣喜之至，不任下情。谨专奉状陈谢，伏惟照察，谨状。

这“位知客尚书”从官名看，不大像是藩镇的客将，而有可能是客省使或副使一类的官员，而且书中特别提到“伏承参从台幢，却朝京阙”语，似乎是为此表示感谢。如此可见藩镇官员受到这“位知客尚书”的照应。

P.2539《v灵武节度使书状集》的一通书状注明是“给引进副使薛尚书客省副使杨仆射彦均”的。本书第六章之《P.2539v书状主人公再辨证》一节已考证薛尚书是明宗时以检校工部尚书任引进副使的薛仁谦，而客省副使杨彦均应当是有正史记载的杨彦询。这封书信是祝贺薛、杨二“人光膺圣渥，允副崇司”的，书中赞他
道光今古，名谥，伫从朝端”，副一人之启流，叶白群之倾瞻紫禁之权，更践黄枢之贵”；致书（人 灵武节度使）并说自“己 谬司藩守，早仰恩光”。薛、杨二人才任副使，就得到藩镇如此的祝贺和礼赞，由此可知客省及引进使职司与藩镇的关系。卷中又有一件《 礼宾引进内省书》，这件书状对收书人称司空，“但 礼宾引进内省”只说的是职务，官名和所在职司不具体，推测是为引进、客省等使预作的，书中说明“ 伏自荣膺异宠，美播朝端；虽申深翰之仪，未效献芹之礼。况叨恩顾，常切感铭。今则有少微诚，具则别幅”“。别幅”即 具马”书，所以总体上是一件送礼的贺仪。据《 刺史书仪》 P.3449+P.3864)，刺史得官上任前须辞谢，其“ 俵钱去处”有宫中各门，其中特提到阁门、客省门和阁门司等，都是请求关照之意。阁门、引进、客省都是藩镇或地方官员不敢得罪的部门，不但到京城用得着，就是平时也要与之周旋，搞好关系，需要时还得送上宝马等贵重礼物，则上述礼仪职司和客省使等与藩镇的关系是很清楚的。

另外五代客省使的主要职务虽不是对蕃夷，但其相关外交礼仪也包括少数民族及蕃国重要使者《。 册府元龟》卷九七六《 外臣部·褒异三》即有开平三年八月戊寅，梁太祖“于 御文殿召契丹朝贡使昌鹿等五十人，对见群臣。以远蕃朝贡称贺，罢，赐昌鹿以下酒食于客省，赉银蕃有差”的记载《。 五代会要》卷三○《 杂录》后唐天成元(年 926)六月条称”：从开元定礼之后，本朝故事，对诸番客又并于内殿引对，其殿名曰参殿，事在礼宾使、客省使，不下外诸司。现今施行不一。”举行于客省的宴会和召见引对事在礼宾使、客省使，说明客省使当此之际与礼宾使是共司其责的。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七《 保位部·纳贡献》记乾化二(年 912)四月”,广(州 刘岩)献金银犀
牙宝货及名香等,合估数(千 按据《 十国春秋》卷五八《 南汉·高祖本
纪》”,千“当作“ 十”是)万。是月,客省引进使韦坚使广州,回以银
茶上”:庄宗献,其估凡五百余万“《。 新五代史》卷四七《 刘处让传》
即位,为客省使,常使四方,多称旨。《“ 旧五代史》卷七十《 李严传》
载其“ 便弓马,有口辩,多游艺,以功名自许。同光中,为客省使,奉
《 册府元龟》卷一二三《 帝王部·征讨》记天福二年六月使于蜀“。 ,
“ 六宅使张言自魏府使迴,奏范延光叛命,遣客省使李守贞往延光
所问罪。《“ 十国春秋》卷六八《 楚二·文昭王世家》开运三”年 冬十二
月,契丹执晋主重贵以北。是岁,晋客省使王筠来聘,以国乱未
归”。

同样的奉使外交活动也常常在十国政权中进行,见于史载如
贞明三(年 917)十月”,越主岩遣客省使刘瑭使于吴,告即位,且劝
吴王称帝”

贞明五年八月吴杨行密以狼山之败,遣客省使欧阳
汀通好吴越;长兴四(年 933)夏四月因吴越王钱镠死,南唐遣客省
使许确入祭

《 资治通鉴》卷二九○广顺元(年 951)记南唐派右仆
射孙忌、客省使姚凤为册礼使,以楚王希萼为天策上将军、武安
武平静江宁远节度使兼中书令、楚王。”周世宗显德五(年 294)三
月( 时南唐改元中兴元年),南唐李景在奉表称江南国主并献上国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七○,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821页。
②《 吴越备史》卷二《 武肃王下》,卷三《 文穆王》,影印四库全书本,第464册,第
533、545—546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同时，还派临汝公徐辽和客省使上买宴钱二百万及客省使表的这些出使活动仍包括了贡献、通好、劝和、问罪、册礼、请降等多种。可以说，五代客省使在出使交接方面与客将完全如一，他们是国际间的礼仪代表。

由于客省使常常被中原朝廷或割据政权派遣侦察他国他方动向，所以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对间关系影响颇大。庄宗时派遣入蜀的李严便是伐蜀战争的始作俑者。《旧五代史》卷三三《庄宗纪》记同光三年八月戊辰，客省使李严使蜀回：“初，帝令往市蜀中珍玩，蜀法严峻，不许奇货东出”；故严不获珍货，归而奏之，致帝大怒，由是伐蜀之意锐矣。同书卷七○本传称：“时王衍失政，严知其可取，使还具奏，故平蜀之谋，始于严。”又如明宗客省使李仁矩本是去传达帝旨，令两川献钱，已引起藩镇不满。且当奉使东川之时，“因贪于馆舍，与娼妓酣饮”，得罪了节度使董璋，结成仇隙，致藩镇由此激反董璋，与朝廷交恶。

由于五代客省使在中原朝廷和其他割据政权交往中负有很大责任，藩镇或割据政权要向中央朝廷表示臣服和归顺，必须通过来访的客省使，所以客省使当此之际调节中央地方关系的作用不可忽视。当然承担此任者也不完全是客省使。例如杨彦询就是在任引进副使后将命西川及淮南称旨，累迁内职而到唐明宗时升《册府元龟》卷二三二《僭伪部·称藩》，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766页。此外又如陆氏《南唐书》卷一《列祖本纪》记南唐昇元二年（938）二月，闽遣内客省使朱文进贺徐知诰即位《。资治通鉴》卷二八二，记天福五年夏四月，因闽王延羲与王延政兄弟相攻，唐主遣客省使尚全恭如闽，和闽王曦及王延政。同年十二月，“闽遣客省使葛裕如唐贺仁寿节（参见《十国春秋》卷一五《南唐一·列祖本纪》昇元四年、卷九一《闽三·景宗本纪》永隆二年）。

① 参见《资治通鉴》卷二七六明宗天成四年五月条，第9029页《；旧五代史》卷七○《李仁矩传》，第931页。
为客省。使的，明宗时阁门使刘政恩也曾被差遣充西川宣谕使。这说明在以上五代几使中，其职能有时可以相代。不过，史料关于内客省使具体职事的材料甚少，不知与客省使是否有分工。但涉及藩镇事务和关系，尤其是出使事宜客省使似乎承担更多。内客省使官职既在客省使之上而在宣徽北院、南院使之下，距离中央权力核心就更近一些。五代愈到后来，使职愈益成为递进迁转的一个职级，但与藩镇地方的礼仪交接事务，仍当由阁门、引进及客省等职司共同进行。

综上所述，晚唐五代中央客省与客省使的职务与藩镇客司与客将极为相似，惟官职地位略有不同耳。由于五代政权本自藩镇而来，所以前者是中央化了的客司客将，后者则是地方化了的客省和客省使。两者一而二，二而一，其性质的相似，保证了中央地方的礼仪对接；特别是客省、客省使与阁门、引进等使司配合，形成唐末五代藩镇体制下最具实用特色的礼仪机构。如前所指，"客"的含义即是宾，因此无论客司、客将，抑或客省、客省使，它们处理的都是地方与中央或割据政权彼此政治关系中属"于宾仪"的那一部分。这个宾仪或宾礼与开元五礼中的宾礼事实上已有"对内"、对"外"的本质区别。藩镇政治之下割据势力或政权的交往往往多于对少数民族，故内宾之礼始重而内客机构始兴，这为礼仪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不过随着唐末五代随着客省权力的膨胀和机构扩大，蕃夷事务也开始部分地归于客省使。这事实上是藩镇客将职能内外不分在客省职务上的反映。史料记载反映入宋以后，客省

《旧五代史》卷九○《杨彦询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186页。
《旧五代史》卷四三《后唐明宗纪第九》长兴三年九月，第594页。
使出使割据政权和藩镇的机会逐渐减少，但接待和出使蕃夷的事务增加。这就形成了《职官分纪》所说“客省使’掌四夷朝贡牧伯朝觐赐酒馔饔饩’的情况，即内、外宾礼由分至合，客省使当然还包括其他礼宾职司)在相当程度上代替了原来的鸿胪寺。与此同时，藩镇地方的客司逐渐萎缩，州县的客司甚至发展为一种职役。中原和南方统一形式下的礼仪机构虽然没有回到唐初的原点，却变成了一种新的格局。这虽然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内，但时代的大变动之下礼仪和礼仪机构的发展，却是值得回味和深思的。
综括上述，本编力图从书仪制作的礼仪来源、书范程式、等级规格、婚丧礼俗、官场仪制等诸多方面透视与揭示书仪作为礼书的性质，尽管限于篇幅和所见，阐述不够充分，但多少可以窥测它丰富的礼书内涵。

书仪首先是作为礼书存在的，无论月（仪）朋友书仪、吉凶书仪、表状笺启书仪都是如此。各类书仪在教人写信或制作官牍时，将传统道德和社会礼仪准则教授给人们，成为人们修身、治家、交往甚至从政的礼仪教本。由于通俗易懂，容易普及，其宣传礼教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礼仪是社会变化和政治生活的产物，作为礼书的书仪是时代发展和变礼的见证。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这一观点，完全可以解释唐五代书仪的礼仪特点和性质。

唐前期书仪继承魏晋南北朝，作为这时期主体的吉凶书仪，以反映世家大族家庭礼法的家法、家仪为制作基础，以家族血缘关系

①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96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为其核心确立尊卑等级“、轻重”仪范,重视其每一细微规范,将家
族意识、礼法观念贯彻其中,并结合古礼精神和朝廷仪制,力图以
之作为全民生活的仪范。其内容以国家庙堂及个人家族为中心,
以表现家族关系的内外族书仪和婚丧礼俗为主体和侧重。但是唐
代在吸收前朝礼俗的基础上,也在不断建立适应时代的新特点。
在提倡礼仪用平趋轻的同时,一方面是言门第必须以官品为先,官
族并重形成为官僚社会新的等级标准;另一方面,当唐代官僚社会
日益成熟之际,官场诸 无论是官称行第般礼仪开始充斥书仪
抑或是单复书的合流乃至官牍别纸的出现都无一不是这一变化的
产物,这就使得在世族礼仪被简化的同时,繁文缛节却改头换面出
现在新的官僚礼仪之中。

唐中期以后书仪继续沿着上述轨迹发展。在全社会变礼思想
指导和推动下,吉凶书仪中原来以古制为框架,以朝廷礼制为指导
和约束的婚丧礼仪特别是服制在开元礼以后发生了愈来愈大的变
化。与此同时,表状笺启书仪开始作为书仪的主体出现,反映唐后
期礼的重心被转移于地方官场。藩镇格局直拟朝廷,官礼仪节之
复杂和森严隆重不下于庙堂;朝廷和藩镇、藩镇和藩镇的礼仪关系
成为晚唐五代最大的礼仪特色。不同时期的不同侧重,体现着时
代文化的巨大反差。这是唐宋之际礼仪的大变化。与此同时,俗
仪更多地取代朝廷正礼,在政权更迭的同时,荡涤和瓦解了中古贵
族制的社会。

书仪形式内容的继承和变化,引导百姓生活和思想的转变。
官本位的观念愈益支配现实生活,官位即是等级的标志。于是追
求官职身名成为全社会趋利走向的中心,甚至书信的格式体裁也
以官牍文范为借鉴和模本,这使得魏晋南北朝以来,曾经作为举世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旧仪”愈来愈只是徒具形式；官风日益薰习百姓，礼法下僭于上，书仪也日益与时俗合流。联系唐代在科举和铨选制度上所发生的巨变，不能不使人感到，整个社会在不断官僚化的同时，其实也就是走向了平民化，中国社会的发展于是在唐宋之际有了划时代的改观。
<table>
<thead>
<tr>
<th>种</th>
<th>卷</th>
<th>原名称或拟名</th>
<th>写卷编号</th>
<th>备注</th>
</tr>
</thead>
<tbody>
<tr>
<td>1</td>
<td>1</td>
<td>《朋友书仪》</td>
<td>P.2505</td>
<td>开元、天宝时期。</td>
</tr>
<tr>
<td>2</td>
<td>同上</td>
<td></td>
<td>P.2679</td>
<td></td>
</tr>
<tr>
<td>3</td>
<td>同上</td>
<td></td>
<td>P.3375</td>
<td></td>
</tr>
<tr>
<td>4</td>
<td>同上</td>
<td></td>
<td>P.3420</td>
<td></td>
</tr>
<tr>
<td>5</td>
<td>同上</td>
<td></td>
<td>P.3466</td>
<td></td>
</tr>
<tr>
<td>6</td>
<td>同上</td>
<td></td>
<td>S.361v</td>
<td></td>
</tr>
<tr>
<td>7</td>
<td>同上</td>
<td></td>
<td>S.5472</td>
<td>册页形式。</td>
</tr>
<tr>
<td>8</td>
<td>同上</td>
<td></td>
<td>S.5660v</td>
<td></td>
</tr>
<tr>
<td>9</td>
<td>同上</td>
<td></td>
<td>S.6180</td>
<td></td>
</tr>
<tr>
<td>10</td>
<td>同上</td>
<td></td>
<td>S.6246</td>
<td></td>
</tr>
<tr>
<td>11</td>
<td>同上</td>
<td></td>
<td></td>
<td>贞松堂本</td>
</tr>
<tr>
<td>12</td>
<td>同上</td>
<td></td>
<td></td>
<td>上图画本</td>
</tr>
<tr>
<td>2</td>
<td>13</td>
<td>《朋友书仪》别本？</td>
<td>P.4989v</td>
<td></td>
</tr>
<tr>
<td>3</td>
<td>14</td>
<td>※《朋友书仪》别本？</td>
<td></td>
<td>日本矶部武男氏藏本</td>
</tr>
<tr>
<td>4</td>
<td>15</td>
<td>唐前期书仪</td>
<td>P.4024</td>
<td></td>
</tr>
<tr>
<td>5</td>
<td>16</td>
<td>唐前期书仪</td>
<td>S.1725</td>
<td></td>
</tr>
<tr>
<td>6</td>
<td>17</td>
<td>唐前期书仪</td>
<td>P.3900</td>
<td>武则天时期？</td>
</tr>
<tr>
<td>7</td>
<td>18</td>
<td>《齐民书仪》杜友晋撰</td>
<td>P.3442</td>
<td>开元时期。</td>
</tr>
<tr>
<td>8</td>
<td>19</td>
<td>同上</td>
<td></td>
<td>Δξ.1307</td>
</tr>
<tr>
<td>卷</td>
<td>原名称或拟名</td>
<td>写卷编号</td>
<td>备注</td>
<td></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20</td>
<td>同上?</td>
<td>Дх.1441</td>
<td>文字与 P.3442 略有差异。</td>
<td></td>
</tr>
<tr>
<td>21</td>
<td>《书仪镜》（安西书仪?）</td>
<td>S.329</td>
<td>S.329 可以与 S.361 配合。天宝后期。</td>
<td></td>
</tr>
<tr>
<td>22</td>
<td>同上</td>
<td>S.361</td>
<td></td>
<td></td>
</tr>
<tr>
<td>23</td>
<td>同上</td>
<td>S.6111</td>
<td>碎片,可以与 S.10595 配合。</td>
<td></td>
</tr>
<tr>
<td>24</td>
<td>同上</td>
<td>S.10595</td>
<td>碎片。</td>
<td></td>
</tr>
<tr>
<td>25</td>
<td>同上</td>
<td>P.4784</td>
<td></td>
<td></td>
</tr>
<tr>
<td>26</td>
<td>《新定书仪镜》杜友晋撰</td>
<td>P.2619v</td>
<td>天宝时期。</td>
<td></td>
</tr>
<tr>
<td>27</td>
<td>同上</td>
<td>P.3637</td>
<td>分上下三栏。</td>
<td></td>
</tr>
<tr>
<td>28</td>
<td>同上</td>
<td>P.3688</td>
<td></td>
<td></td>
</tr>
<tr>
<td>29</td>
<td>同上</td>
<td>P.3849</td>
<td>分上下二栏。</td>
<td></td>
</tr>
<tr>
<td>30</td>
<td>同上</td>
<td>P.4002</td>
<td></td>
<td></td>
</tr>
<tr>
<td>31</td>
<td>同上</td>
<td>P.5020</td>
<td>分上下二栏。</td>
<td></td>
</tr>
<tr>
<td>32</td>
<td>同上</td>
<td>P.5035</td>
<td>分上下三栏。</td>
<td></td>
</tr>
<tr>
<td>33</td>
<td>同上</td>
<td>S.5630v</td>
<td></td>
<td></td>
</tr>
<tr>
<td>34</td>
<td>同上</td>
<td>P.4036</td>
<td></td>
<td></td>
</tr>
<tr>
<td>35</td>
<td>同上</td>
<td>散 0676</td>
<td>见《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td>
<td></td>
</tr>
<tr>
<td>36</td>
<td>《复定仪诸家略集并序例第一》（《新定书仪镜》?）</td>
<td>P.2616v</td>
<td>分上下二栏。</td>
<td></td>
</tr>
<tr>
<td>37</td>
<td>※唐前期书仪?</td>
<td>Дх.17011</td>
<td></td>
<td></td>
</tr>
<tr>
<td>38</td>
<td>唐前期书仪</td>
<td>P.3681</td>
<td></td>
<td></td>
</tr>
<tr>
<td>39</td>
<td>吐蕃占领敦煌初期汉族书仪</td>
<td>S.1438v</td>
<td></td>
<td></td>
</tr>
<tr>
<td>种</td>
<td>卷</td>
<td>原名称或拟名</td>
<td>写卷编号</td>
<td>备注</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13</td>
<td>40</td>
<td>《(元和)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一部并序》郑余庆撰</td>
<td>S.6537v</td>
<td>元和时期，抄本在文宗以后。</td>
</tr>
<tr>
<td>14</td>
<td>41</td>
<td>※《丧礼服制度图》杜佑撰（郑余庆《元和新定书仪》部分？）</td>
<td>P.2967</td>
<td>册页形式，中唐时代。</td>
</tr>
<tr>
<td>15</td>
<td>42</td>
<td>《文仪集并序》忻州刺史某撰</td>
<td>P.5550</td>
<td>中唐以前。</td>
</tr>
<tr>
<td>16</td>
<td>43</td>
<td>《新集吉凶书仪上下两卷》(吉仪卷上)张敖撰</td>
<td>P.2646</td>
<td>大中时代。</td>
</tr>
<tr>
<td>44</td>
<td>同上</td>
<td></td>
<td>P.2556</td>
<td></td>
</tr>
<tr>
<td>45</td>
<td>同上</td>
<td></td>
<td>P.3246</td>
<td></td>
</tr>
<tr>
<td>46</td>
<td>同上</td>
<td></td>
<td>P.3249</td>
<td></td>
</tr>
<tr>
<td>47</td>
<td>同上</td>
<td></td>
<td>P.3284</td>
<td></td>
</tr>
<tr>
<td>48</td>
<td>同上</td>
<td></td>
<td>P.4019</td>
<td></td>
</tr>
<tr>
<td>49</td>
<td>同上</td>
<td></td>
<td>P.4019v</td>
<td></td>
</tr>
<tr>
<td>50</td>
<td>同上</td>
<td></td>
<td>S.2200</td>
<td></td>
</tr>
<tr>
<td>51</td>
<td>同上</td>
<td></td>
<td>S.4761</td>
<td></td>
</tr>
<tr>
<td>52</td>
<td>同上</td>
<td></td>
<td>S.10735A</td>
<td></td>
</tr>
<tr>
<td>53</td>
<td>同上</td>
<td></td>
<td>有邻馆No.8</td>
<td>见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识录》。</td>
</tr>
<tr>
<td>54</td>
<td>同上</td>
<td></td>
<td>北图能8</td>
<td></td>
</tr>
<tr>
<td>17</td>
<td>55</td>
<td>《新集吉凶书仪》(凶仪卷下)</td>
<td>P.2622</td>
<td></td>
</tr>
<tr>
<td>56</td>
<td>同上</td>
<td></td>
<td>P.3688后2页</td>
<td></td>
</tr>
<tr>
<td>57</td>
<td>同上</td>
<td></td>
<td>P.3886</td>
<td></td>
</tr>
<tr>
<td>58</td>
<td>同上</td>
<td></td>
<td>S.1040</td>
<td></td>
</tr>
<tr>
<td>59</td>
<td>同上</td>
<td></td>
<td>S.8699v</td>
<td></td>
</tr>
<tr>
<td>60</td>
<td>同上</td>
<td></td>
<td>Дх.1256</td>
<td></td>
</tr>
<tr>
<td>种</td>
<td>卷</td>
<td>原名称或拟名</td>
<td>写卷编号</td>
<td>备注</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18</td>
<td>61</td>
<td>《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张敷撰</td>
<td>P.3502v</td>
<td>大中时期。</td>
</tr>
<tr>
<td>62</td>
<td>同上</td>
<td>Дх.1256v</td>
<td></td>
<td></td>
</tr>
<tr>
<td>19</td>
<td>63</td>
<td>晚唐时代(河北?)吉凶书仪</td>
<td>P.4050</td>
<td>册页,散乱,与下诸号次序可打乱重排。</td>
</tr>
<tr>
<td>64</td>
<td>同上</td>
<td>S.5613</td>
<td></td>
<td></td>
</tr>
<tr>
<td>65</td>
<td>同上</td>
<td>Дх.1458</td>
<td></td>
<td></td>
</tr>
<tr>
<td>66</td>
<td>同上</td>
<td>Дх.1467</td>
<td></td>
<td></td>
</tr>
<tr>
<td>67</td>
<td>同上</td>
<td>Дх.3814</td>
<td></td>
<td></td>
</tr>
<tr>
<td>68</td>
<td>同上</td>
<td>Дх.3849</td>
<td></td>
<td></td>
</tr>
<tr>
<td>69</td>
<td>同上</td>
<td>Дх.3870</td>
<td></td>
<td></td>
</tr>
<tr>
<td>70</td>
<td>同上</td>
<td>Дх.3875</td>
<td></td>
<td></td>
</tr>
<tr>
<td>71</td>
<td>同上</td>
<td>Дх.3902</td>
<td></td>
<td></td>
</tr>
<tr>
<td>72</td>
<td>同上</td>
<td>Дх.3905</td>
<td></td>
<td></td>
</tr>
<tr>
<td>73</td>
<td>同上</td>
<td>Дх.3917</td>
<td></td>
<td></td>
</tr>
<tr>
<td>74</td>
<td>同上</td>
<td>Дх.5247</td>
<td></td>
<td></td>
</tr>
<tr>
<td>75</td>
<td>同上</td>
<td>Дх.5247v</td>
<td></td>
<td></td>
</tr>
<tr>
<td>20</td>
<td>76</td>
<td>《新集书仪》</td>
<td>P.3691</td>
<td>末有书题,五代时期。</td>
</tr>
<tr>
<td>77</td>
<td>同上</td>
<td>P.3425v</td>
<td></td>
<td>分两栏抄写。</td>
</tr>
<tr>
<td>78</td>
<td>同上</td>
<td>P.3581</td>
<td></td>
<td></td>
</tr>
<tr>
<td>79</td>
<td>同上</td>
<td>P.3716v</td>
<td></td>
<td>末有书题。</td>
</tr>
<tr>
<td>80</td>
<td>同上</td>
<td>P.4699</td>
<td></td>
<td>首行有书题。</td>
</tr>
<tr>
<td>81</td>
<td>同上</td>
<td>S.681</td>
<td></td>
<td></td>
</tr>
<tr>
<td>82</td>
<td>同上</td>
<td>S.766</td>
<td></td>
<td></td>
</tr>
<tr>
<td>83</td>
<td>同上</td>
<td>S.5593</td>
<td></td>
<td>册页,存四页。</td>
</tr>
<tr>
<td>种</td>
<td>卷</td>
<td>原名称或报名</td>
<td>写卷编号</td>
<td>备注</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84</td>
<td>同上</td>
<td>S.5636</td>
<td>册页，八行篆书。</td>
<td></td>
</tr>
<tr>
<td>85</td>
<td>同上</td>
<td>S.8516</td>
<td>共有六残片，可与 S.8680，S.9937 缀合。</td>
<td></td>
</tr>
<tr>
<td>86</td>
<td>同上</td>
<td>S.8680</td>
<td></td>
<td></td>
</tr>
<tr>
<td>87</td>
<td>同上</td>
<td>S.9937</td>
<td></td>
<td></td>
</tr>
<tr>
<td>88</td>
<td>同上</td>
<td>S.10010</td>
<td></td>
<td></td>
</tr>
<tr>
<td>89</td>
<td>同上</td>
<td>S.10531</td>
<td></td>
<td></td>
</tr>
<tr>
<td>90</td>
<td>同上</td>
<td>S.10614v</td>
<td></td>
<td></td>
</tr>
<tr>
<td>91</td>
<td>同上</td>
<td>己x. 1454 + 2418</td>
<td></td>
<td></td>
</tr>
<tr>
<td>92</td>
<td>同上</td>
<td>北图有字 76 (从中拆出残片编为 L. 4425.2)</td>
<td></td>
<td></td>
</tr>
<tr>
<td>21</td>
<td>93</td>
<td>吉凶书仪？</td>
<td>己x.1055</td>
<td>存七行，内有“婚□书仪第三”字样。</td>
</tr>
<tr>
<td>22</td>
<td>94</td>
<td>《新集两亲家接客随月时景仪－卷并序》</td>
<td>P.2042</td>
<td>卷尾有“庚寅年” (930)题记。</td>
</tr>
<tr>
<td>23</td>
<td>95</td>
<td>《今时礼书本》</td>
<td>P.3909</td>
<td>晚唐五代？</td>
</tr>
<tr>
<td>24</td>
<td>96</td>
<td>吉凶书仪</td>
<td>P.4043</td>
<td>内称“干宁年岁次月日”，存祭文三首。</td>
</tr>
<tr>
<td>25</td>
<td>97</td>
<td>吉凶书仪</td>
<td>P.3213v</td>
<td>与 P.3214 似为一件。</td>
</tr>
<tr>
<td>种</td>
<td>卷</td>
<td>原名称或拟名</td>
<td>写卷编号</td>
<td>备注</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98</td>
<td>100</td>
<td>同上</td>
<td>P.3214</td>
<td>文中有“惟大周天复六年”字样。</td>
</tr>
<tr>
<td>26</td>
<td>99</td>
<td>吉凶书仪</td>
<td>S.9713</td>
<td>唐前期</td>
</tr>
<tr>
<td>27</td>
<td>100</td>
<td>唐后期书仪 (?)</td>
<td>S.1725v</td>
<td>元和以后</td>
</tr>
<tr>
<td>28</td>
<td>101</td>
<td>《甘棠集》刘邺撰</td>
<td>P.4093</td>
<td>册页，行笺。成书于干符中？</td>
</tr>
<tr>
<td>29</td>
<td>102</td>
<td>《记室备要》郁知言撰</td>
<td>P.3723</td>
<td>成书于咸通七年。</td>
</tr>
<tr>
<td>103</td>
<td>104</td>
<td>同上</td>
<td>P.3451v</td>
<td>同上，册页形式。</td>
</tr>
<tr>
<td>30</td>
<td>105</td>
<td>县令书仪 (?)</td>
<td>S.5888</td>
<td>同上。</td>
</tr>
<tr>
<td>31</td>
<td>106</td>
<td>削史书仪</td>
<td>P.3449</td>
<td>册页，散乱，可重排。后唐明宗时代。</td>
</tr>
<tr>
<td>107</td>
<td>108</td>
<td>同上</td>
<td>P.3864</td>
<td>同上。</td>
</tr>
<tr>
<td>32</td>
<td>109</td>
<td>《新集杂别纸》相州马判官撰</td>
<td>P.4092</td>
<td>后唐时代。</td>
</tr>
<tr>
<td>109</td>
<td>110</td>
<td>同上</td>
<td>S.5623</td>
<td>同上。</td>
</tr>
<tr>
<td>33</td>
<td>110</td>
<td>灵武节度使表状集</td>
<td>P.3931</td>
<td>册页形式，后唐时代。</td>
</tr>
<tr>
<td>34</td>
<td>111</td>
<td>灵武节度使书状集</td>
<td>P.2539v</td>
<td>后唐明宗时代。</td>
</tr>
<tr>
<td>35</td>
<td>112</td>
<td>※《杂译贺表状》</td>
<td>S.5566</td>
<td>晚唐。</td>
</tr>
<tr>
<td>36</td>
<td>113</td>
<td>归义军书状集</td>
<td>S.3101</td>
<td>晚唐。</td>
</tr>
<tr>
<td>37</td>
<td>114</td>
<td>书仪</td>
<td>P.3906</td>
<td>五代。</td>
</tr>
<tr>
<td>38</td>
<td>115</td>
<td>书仪</td>
<td>P.3100v</td>
<td>五代。</td>
</tr>
<tr>
<td>49</td>
<td>116</td>
<td>书仪</td>
<td>S.4374</td>
<td>晚唐五代。</td>
</tr>
<tr>
<td>117</td>
<td>118</td>
<td>书仪</td>
<td>P.3721v</td>
<td>晚唐。</td>
</tr>
<tr>
<td>41</td>
<td>118</td>
<td>书仪</td>
<td>P.4984v</td>
<td>晚唐。</td>
</tr>
<tr>
<td>种</td>
<td>卷</td>
<td>原名称或拟名</td>
<td>写卷编号</td>
<td>备注</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42</td>
<td>119</td>
<td>归义军僧官书仪</td>
<td>P.3715Piece1</td>
<td>咸通时代，与 P.2729 可以拼合。</td>
</tr>
<tr>
<td>120</td>
<td></td>
<td>同上</td>
<td>P.2729</td>
<td></td>
</tr>
<tr>
<td>43</td>
<td>121</td>
<td>书仪</td>
<td>P.2621v</td>
<td>归义军曹氏时期。</td>
</tr>
<tr>
<td>44</td>
<td>122</td>
<td>《杂相贺》</td>
<td>S.3399</td>
<td>曹议金时期。</td>
</tr>
<tr>
<td>45</td>
<td>123</td>
<td>《诸杂谢贺》</td>
<td>P.2652v</td>
<td>公元 946 年 (曹元深时期)。</td>
</tr>
<tr>
<td>46</td>
<td>124</td>
<td>杂谢贺</td>
<td>P.3800v</td>
<td>归义军时期。</td>
</tr>
<tr>
<td>47</td>
<td>125</td>
<td>杂谢贺语</td>
<td>S.5643</td>
<td>归义军曹氏时期。</td>
</tr>
<tr>
<td>48</td>
<td>126</td>
<td>谢语</td>
<td>P.3041</td>
<td>归义军曹氏时期。</td>
</tr>
<tr>
<td>49</td>
<td>127</td>
<td>杂谢贺</td>
<td>P.3625</td>
<td>曹议金时期。</td>
</tr>
<tr>
<td>50</td>
<td>128</td>
<td>会稽镇上使衙状</td>
<td>S.5606</td>
<td>归义军曹氏时期。</td>
</tr>
<tr>
<td>51</td>
<td>129</td>
<td>归义军表状集</td>
<td>P.4065</td>
<td>归义军曹氏时期。</td>
</tr>
<tr>
<td>52</td>
<td>130</td>
<td>状启集</td>
<td>P.3627</td>
<td>天福八年张通儒钞。</td>
</tr>
<tr>
<td>53</td>
<td>131</td>
<td>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曹元德书状稿</td>
<td>P.2945</td>
<td>归义军曹氏时期。</td>
</tr>
<tr>
<td>54</td>
<td>132</td>
<td>归义军(致灵州?)书状抄</td>
<td>P.2968</td>
<td>归义军曹氏时期。</td>
</tr>
<tr>
<td>55</td>
<td>133</td>
<td>沙州书状稿?</td>
<td>P.3151</td>
<td>后唐时期。</td>
</tr>
</tbody>
</table>
56 134 ※归义军公文抄？ P.2992v 归义军曹氏时期。

57 135 ※书状集？ P.4997 后唐明宗天成初年。

58 136 ※书信集？ P.4784

59 137 书仪？ S.7900v 仅存一行，共8字。

60 138 书仪？ S.10275 存四行节候用语。

61 139 ※后晋李崧表状文抄 S.4473 后晋时期。

62 140 唐前期尚书省礼部报都省批复下行公文程序 P.2481 唐前期
当这部书稿完成时，我数年的辛勤工作也暂时告一段落。但奇怪的是，当此之际却并没有期待已久的轻松感。因为严格地说，本书是在若干篇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无论从体例、内容和写作方式上都留下了诸多不足和遗憾。加之自己由于读书太少和某些方面的知识欠缺，也由于对书仪和礼仪这一主题尚不能更深刻、准确地理解、把握，所以书中的问题、错误肯定在所难免。尽管如此，毕竟是奉献了自己的努力，希望这部作品能够成为后人研究礼仪时的参考。如能做到这一点，则以往的工作也就不算无益。至于我期一切疏误的纠正和个人学养的提高则要寄托于未来，待自己能贡献给社会更精良的产品。

这部书稿的问世首先感谢历史所的领导和学术委员会的各位专家学者。是他们的支持和信任，使这部书稿通过批准，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并首次作为所内专刊顺利出版。感谢赵和平学长，在我初涉足书仪的课题时，就提供了许多资料和其他帮助，对我与他的商榷和不同意见给予极为宽宏大量的肯定。前人总是为后人铺路，在写作过程中，我对赵和平关于书仪的辛勤整理和许多重要发现始终极为钦佩。可以说，如果不是有他的著作和周一良先生开山在先，我几乎不可能顺利完成对书仪的研究。
感谢历史所的同事们，当书中的某些内容初以论文发表时，提供了尖锐而中肯的意见。每当我信心不足时，又给予我许多鼓励。陈爽、侯旭东等都曾给我资料方面的援助，黄正建、李锦绣等同室诸君更是我随时请教的良师益友，从他们所得到的诸方面帮助无从计数。我很庆幸生活在一个非常宽松、和谐的集体之中，如果不是这样，相信我不会有足够的勇气并能集中全部精力从事自己的事业。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还有一个最大的遗憾，这就是我再也没有机会将这本书献给我非常敬佩的师长周一良先生了。周先生病中我曾数次前去探望，虽始终未敢向他提起此书的写作，却暗自期望在全部写成之后能够请他指教，但现在只能将此书奉于他的灵前，作为对他永久的纪念。

最后，感谢商务印书馆著作室主任常绍民先生和责任编辑谢仲礼先生。他们为此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谢仲礼先生对本书做了精心的编校工作，纠正了书中的诸多谬误。希望同行、朋友和关注礼仪研究的读者先生们对本书提出批评指正。
近一二十年来，伴随学界对敦煌本唐五代书仪的整理和研究，将书仪纳入礼制、礼仪的范围加以整体考察，是一种可喜的动向。《唐礼摭遗》一书即从敦煌本书仪的研究入手，对朋友书仪、吉凶书仪、表状笺启书仪进行深入的考证和研究，纠正了已往学者的一些误识，并提出了一些精辟的见解。例如：作者认为吉凶书仪适应中古社会由贵族制向官僚化的转化，其内容由以家族血缘为中心向以官场为中心变化；作者不仅从尺牍和官文书集两方面探究表状笺启书仪的渊源，更从政治文学的角度说明唐后朝的藩镇割据社会对此类书仪扩张的影响；作者将家礼与古礼、家法与朝仪综合对比研究，探讨大族与主流社会的互动关系等。从具体上升到宏观，从个案到整体，体现了作者在求史实的基础上求史识的治史途径。

《唐礼摭遗》中对书仪所涉及的规格、语词、称谓、书体等诸多问题，作了极细致的探讨；而吉凶礼仪最为核心的是婚丧制度，此书则运用敦煌书仪中两种丧服图，讨论了唐五代丧服制度的演变。这些看似琐碎的考证、探究，反映了作者扎实的功底和学风。此书对于深入研究中国中古礼制、对于探讨中国中古社会的变迁做了很好的工作，本人乐意推荐，希望此书能早日出版，以推动礼制研究的深入开展。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赵和平

利用“书仪”来研究礼制，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也是非常有价值的课题。唐五代仪大体相当于主要流行于民间的各类“应用文”范本，牵涉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许多内容属于所谓“俗礼”的范畴。也就是说，本课题的研究实际上涉及到了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远远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文本研究，较之于被奉为圭臬的礼经和官方颁布的礼仪的制度而言，书仪有内容能更真切地反映当时社会状况，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但书内容庞杂，而且在传统文献中记载很少，非下大力气不能奏功。所以说，这是一个难度很大，但很有价值的课题。

大体而言，本课题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对文书本身的研究。对具体书仪规格，书仪中涉及到的语词、称谓、书体等，都进行了详细解说，对以往为人所注意不多、重视不够的行第、书体、
尺牍源流发展等问题，或在前人基础上补充新内容，或提出新见解。

二是作者对中古书仪的演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即结合不同的时代的特色，通过朋友书仪、吉凶书仪、表状笺启书仪相互递进、吸收、改造的关系，梳理出各个时代书仪自身演变的轨迹，同时也使读者对不同种类的书仪及其发展过程有更加详尽的了解。

三是作者对书仪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努力进行了发掘。如对吉凶书仪中反映出来的中古社会由贵族制向官僚化转变的探讨；表状笺启书仪的大量出现与唐后期藩镇割据、与中央地方礼仪交接的关系；唐初对嫂叔服、舅服制度的修改与北朝社会的影响以及服制的变化与中古礼制变革的方向等问题。这些非常可贵的探索，不仅推进了书仪和礼仪的研究，对隋唐社会史的研究也不无裨益。

总之，作者在这部书的写作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学术上也取得了某些突破，《唐礼摭遗》是一部资料翔实、研究深入的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吴玉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辛德勇